

冀鲁豫边区
群众运动资料选编
(上)

李运亨 主 审
谢忠厚 主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鲁豫边区
群众运动资料选编

(下)

李运亨 主 审
谢忠厚 主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同志1961年12月27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一文摘录

……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3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的门板还不够，连济南的门板也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国民党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摘自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

FOO / 20

134031

出版说明

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解放区之一。在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里，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边区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蔚为壮观，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边区的群众运动是边区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以珍贵、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记录了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发展历史、重大斗争、巨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深入了解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推进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书既是一部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编著，也是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

全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本文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的重要总结，是本书的总论。第二部分为专题资料，包括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文联工作、人民武装斗争和学生运动等6篇，均由当年从事此项工作的老同志撰稿和集体修改，最后由负责同志审定。这些专题资料是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第三部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行署，以及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负责人的有关指示、文电、报告、讲话、著述等，共81篇（含只列目者4篇）。这是研究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最重要的资料。第四部分主要为回忆资料，包括冀鲁豫边区20位原从事群众工作的老同志的14篇回忆录。这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另有莘县、滑县、肥城县党史工作部门提供的

有关资料3篇。书末有《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大事记》，供读者参考。

本书所选各篇历史文献资料，按成文日期（或原载报刊日期）为序编排。在坚持存真原则，力求保持历史文献资料原貌的前提下，仅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凡转载的文献资料，均只列目，标明出处，不录原文。全书一级标题格式予以统一。章节标题及各级序号一般照排，只对标题层次不清及同级序号不一致者进行调整。数字用法一般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对显而易见的错别字，一般直接订正，特殊情况在其后加中括号（〔 〕）予以订正。增补的漏字，用六角括号（〔 〕）标明。对错用或已淘汰的结构助词（的、地、得、底）和时态助词（着、了、过），一般以从俗字看待，不予订正。对无法补正的虚缺字，以数目相应的虚缺号（□）表示；虚缺较多者，插注说明。原文中的隐讳号（×）照排。标点符号明显用错以致影响原意者，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990年3月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予以订正。

对本书各专题资料及所选回忆录，我们本着尊重原作、文责自负的原则，不做内容上的重大修改和艺术加工，仅做必要的编辑处理。对其说不一的人物和事件（含人名、地名和时间），采取并录各说、暂时存疑的办法，未做硬性统一，留待日后研究敲定。

本书的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历时5年。我们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多方搜集资料，但因当年战争环境残酷，留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并不完整，特别是抗战前期的文献资料，竟付阙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纂工作中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指正。

本书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部分人员编辑。编纂工作是在徐运北、张承先、郭超、王克东、杨泽江等同志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并得到了杨得志、段君毅、赵健民等边区领导同志和原来从事群众工作的老同志

以及王传忠、刘洪声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得到了晋、冀、鲁、豫4省党史工作部门和档案馆以及冀鲁豫边区党史办公室的大力帮助。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河北省出版局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 者

一九九一年二月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
宣教工作审稿会议全体人员合影

1989年4月于河北省保定市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第一部分 概 述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谢忠厚 周振印 (1)

第二部分 专题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工人运动简况.....方 明 (67)

冀鲁豫边区妇女运动概况.....范世钧 (73)

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概况.....王 克等 (114)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文联工作简况.....鲁西良 (161)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斗争概况...郭乐天 白晶五 冯培昌 (184)

冀鲁豫边区学生运动简况.....陈惠敏 (216)

第三部分 历史文献

鲁西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宣教工作的报告 (节选) (227)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如何进行会门工作.....王从吾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

【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 (上) 第136页 】

在鲁西区党委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张霖之 (233)

(一九四一年二月)

鲁西妇救总会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决议..... (250)

(一九四一年三月)

- 鲁西农救总会九月主任联席会总结报告…………… (257)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 (275)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
- 今后边区工运的任务(节选)……………高光宇 (280)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 冀鲁豫各救总会关于开办民运干部学校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
- 【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97页 】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青抗先领导关系的决定…………… (288)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 冀鲁豫区党委青年运动委员会关于
 迎接华北青运统一准备工作的指示…………… (292)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关于边区
 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 (294)
 (一九四二年八月)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 (305)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 冀鲁豫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组织大纲…… (308)
 (一九四二年九月)
- 边区抗联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 (316)
 (一九四二年九月)
- 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是怎样坚持的?……………苏振华 (322)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 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草案…………… (340)
 (一九四二年)

-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草案…………… (346)
 (一九四二年)
- 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问题……………杨泽江 (357)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 减租增佃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元 贵 (363)
 (一九四三年一月)
- 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 (节选) ……黄 敬 (367)
 (一九四三年四月)
-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村级工作的指示…………… (383)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
 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401)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 (403)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 (节选) ……张霖之 (406)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 (429)
 (一九四三年)
-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改善团体领导的指示…………… (457)
 (一九四三年)
- 冀鲁豫边区租佃关系的调查与研究……………郭绍汤
 (一九四三年)
 【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 (中) 第783页 】
- 鲁西南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初步调查……………陶 力
 (一九四三年)
 【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 (中) 第769页 】

-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对一九四四年边区青运任务的指示…………… (463)
(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团体领导
关系与组织的决定…………… (470)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
- 在二地委(原冀鲁豫)关于发动群众
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发言……………黄 敬 (472)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减租增佃几个问题的决定…………… (483)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赎地问题的决定…………… (486)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
- 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万 里 (489)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
- 站稳脚跟 放下圈子……………张霖之 (496)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冀鲁豫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 (502)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濮县的农民运动及组织领导的经验……………黄 文 (504)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 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张霖之 (510)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 滑县查减运动简报……………纪登奎 (522)
(一九四四年)
- 冀鲁豫分局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 (541)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
- 对泰运工作的发言……………黄 敬 (544)
(一九四五年四月)

- 农民发动起来，要迅速坚决的
转入生产运动……………高元贵（549）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 在冀鲁豫行署专员联席会上的
总结报告（节选）……………徐达本（552）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
- 南旺接敌区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李哲（578）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为紧急动员起来参战
告各救总会员儿童姊妹团员书……………（581）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 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栗森（583）
（一九四五年八月）
- 在分局党校关于土地政策在边区的具体
执行情况的报告（节选）……………张霖之（592）
（一九四五年）
- 冀鲁豫分局民运部关于老区和新区发动群众
问题的工作通报……………（603）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 减租与生产……………（605）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新区情况研究……………李进宝（610）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 清平新解放区（三区）的雇佣运动……………张延积（615）
（一九四六年二月）
- 冀鲁豫区党委、联合会总会召开边区群运
座谈会，确定新区清算诉苦方针……………（660）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 开展深入与普遍的反奸诉苦运动……………郭 超 (667)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 对菏泽市当前群运的意见……………刘镜西 (671)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 大胆使用各种积极分子……………张承先 (674)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
- 二地委总结群运……………张耀华 (678)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 冀鲁豫行署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 (681)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 鱼台一月来清诉运动总结…………… (683)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
- 定陶政权干部怎样参加了群运……………孔百川 (697)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
-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 (702)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
 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 (709)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布告…………… (713)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冀鲁豫区的减租增佃概况…………… (715)
 (一九四六年)
- 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潘复生 (724)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 (733)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土改主要经验
 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 (738)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 在冀鲁豫区党委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张霖之 (741)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
- 湖西游击战中的土改运动汇报提纲…………… (757)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 在听取四、八地委典型汇报后
 关于贯彻复查的发言 (节选)……………潘复生 (762)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复查的指示…………… (772)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 五地委民运部长联席会上五个月来土改运动的总结…………… (778)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
- 四地委县书联席会三个月土改复查运动总结…………… (781)
 (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
- 认识新区特点, 大力开辟新区工作……………逯昆玉 (787)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
-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土地
 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 (789)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布告…………… (794)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 中央局冀鲁豫工作团关于整党与民主运动
 向中央局并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 (796)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 附一: 在五月十五日扩干会议上的工作总结…………… (797)
- 附二: 阳谷县三区赵台纠偏经过…………… (804)
- 附三: 阳谷县三区冀王庄第一阶段工作总结…………… (811)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土改工作总结…………… (819)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报告…………… (843)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建立青年团工作的指示…………… (849)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与结束土改工作的综合报告…………… (852)
 (一九四九年一月)
- 冀鲁豫区第一届青代大会关于目前
 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 (861)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第四部分 回忆资料

- 忆冀鲁豫中心区的抗战活动……………安法乾 (865)
- 关于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和妇女抗日
 救国总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安法乾 范世钧 (876)
- 对清(丰)南(乐)大(名)内(黄)
 抗日救国会的回忆……………谷剑侠 马毅之 (880)
- 肥城“红五月”运动
 ……………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886)
- 忆抗战时期范县的民主民生斗争……………成 润 (892)
- 忆冠县的减租减息与民主民生斗争……………司洛路 (903)
- 莘县境内的借粮
 斗争……………中共莘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912)
- 冀鲁豫边区群运史上的一项创举
 ——试述滑县雇佃贫
 运动……………中共滑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921)
-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妇教会工作……………季 凯 (934)
-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青年运动……………张世珠 (943)

鲁西北和冀鲁边“民先”总队部

始末……………徐少岩 张汝琦 许 法 (950)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直南地区

“民先”组织概况……………安法訖 李靖轩 (958)
活跃在鲁西平原上的济南乡师学生抗日

教导队……………刘少饒 朱德兴 王 克 宗 明 (963)

我对冀鲁豫边区青抗先的几点回忆……………郭乐天 (971)

聊城地区民兵斗争述略……………杨明坤 (975)

关于鄆北抗日民兵联防的回忆……………李勳臣 (994)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濮阳县五区党的主要工作……………杨敬仁 (1004)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大事记……………田苏苏 王 潮 (1018)

后记…………… (1052)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

谢忠厚 周振印

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冀鲁豫边区党组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和发展根据地，不断深入社会改革，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冀鲁豫边区位于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5省的接合部，北界漳河，南跨陇海路，东沿津浦路，西临平汉路，除泰西^①的山峦丘陵和湖西^②的湖泊湾汊外，其余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平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榨，整个地区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济、文化落后，地主势力强大，会道门很多；且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广大群众生活十分贫苦。早在1922年，这一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过农民协会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捐抗税，反对地主、豪绅、军阀、列强，进行过一系列英勇斗争。著名者有：1927年直隶省^③大名县反对“华洋义赈会”，要求按当地价格偿付所占土地款额的斗争；1928年山东省阳谷坡里农民暴动；1929年山东省泰安夏

①泰西，大致指鲁西黄河以南、泰山以西地区。

②湖西，指山东省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以西和江苏省徐州西北一带地区。

③直隶省建制于1928年撤销，改设河北省建制。

张镇农民协会同地方豪绅的算帐斗争，河北省濮阳县千口、化村等村民清算民团联庄团总蔡鸿宾贪污罪行的斗争；1930年江苏萧县黄口暴动；1932年河北省之濮阳、大名、清丰、南乐，山东省之朝城、东明、范县、濮县和河南省滑县、内黄、汤阴等10余县盐民驱逐盐巡出境的斗争；1933年河北省濮阳县姚家农民暴动，等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一地区各阶层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知识青年和乡村小学教师在河北省之濮阳、清丰、大名，山东省之朝城、濮县、泰安、东平、范县，江苏省之沛县等地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反帝大同盟、抗敌后援会等抗日团体。1935年，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发动了河北省之大名、濮阳和河南省之滑县、内黄4县边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革命武装。山东省濮县和范县一带，进行了抗粮、分粮吃大户和夺取地主武装的斗争，建立了一支游击队；沛县也发动群众开展了反抽丁挖河、抗税等斗争，建立了一支40多人的地下武装。这些斗争虽然大都遭到残酷镇压，但锻炼出了许多优秀干部，积累了斗争经验。1936年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以后，大力选派干部到这一地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地方组织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有更广泛深入的开展。这些斗争和工作，在冀鲁豫地区奠定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

一、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与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从此，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进入以全民族抗战为主要任务的新的时期。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七七事变到1940年上半年。主要是宣传与组织边区

一切抗日人民群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个阶段，边区各阶层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并实现了统一领导。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北方局遵照毛泽东“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的指示^①，确立了全党搞武装，建政权，放手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并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伟大号召^②。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和号召下，冀鲁豫地区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建立和发展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使群众抗日斗争烈火迅速燃遍了冀鲁豫广大平原。

（一）在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③。抗战爆发后，中共地下党员晁哲甫、刘大风以国民党保定行营政训处长张荫梧的名义，在清丰、南乐、濮阳建立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宣传群众，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活动，迅速发展团员300余人；并积极组织抗日武装，通过高树勋部队的关系取得河北省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的番号。1938年3月，中共直南特委建立清（丰）南（乐）大（名）抗日救国会（会长为马彩三），深入农村，宣传群众，动员枪支，组织武装，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等群众组织。4月间，中共直南特委又建立了濮（阳）滑（县）东（明）长（垣）4县边抗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7日第1版。

②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37页。

③ 直南，大致指今河北省京广线以东、邢台以南地区和今河南省清丰、南乐、濮阳、长垣及山东省东明县一带。豫北，大致指河南省京广线以东、黄河以北地区。鲁西南，大致指山东西南部菏泽、定陶、曹县一带地区。

日救国会（会长牛万里），以“保家自卫，防匪缉盗”为口号，通过区、村救国会进行工作，对发展抗日力量起了很好的作用。晁哲甫于1938年2月任清（丰）南（乐）边东县委书记后，与县委的同志共同团结地方士绅成立清丰县抗日民众自治委员会，改造地方民团，建立抗日民众联合自卫团。他还自筹粮款，先后在清丰六塔集和县城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半年间，清丰、南乐的知识分子几乎训练了一遍，救国会普遍组织起来，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歌声。他并根据直南特委指示，在训练班中发展了“民先”队员与共产党员。直南特委为加强对各县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于1938年5月在六塔集召开各县救国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边东、边西^①、南乐、大名、濮县、濮阳、东明、长垣、内黄等县20余人。大会通过了总会章程和宣言，选举了总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宣告成立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安法乾为总会负责人）。总会下设总务、组织、宣教、农民、青年、妇女儿童、武装等部。当时中共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县、区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多设在救国会内，通过救国会这一公开组织进行工作。年底，冀鲁豫边区农民救国总会（主任姚恒光）、冀鲁豫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付秀香、范世钧任正、副主任）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南分队（队长梁伯琪，副队长李靖轩）相继成立，有组织的群众发展到约30万人，并团结了众多知识分子。同年8月初，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会长刘齐滨，副会长程力夫）。在总会领导下，曹县、菏泽、考城等县相继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冀鲁豫和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建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1）成立半政权性质的组织“战委会”。如1938年5月，冀鲁豫边区抗日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清丰县分会成立，由直南特委统战部长晁哲甫任主任。它与县救国会合署办公，有力地保证了救国会对农、青、妇、武各项工作的推动和战争动员、部队供给、

①边西，系指南乐、清丰、大名县西部地区。

锄奸、扩军等项工作的开展。在总“战委会”领导下，清丰、南乐先后按合理负担原则，实行了统一累进税，每户每人平均1亩地者免征（南乐县规定半亩地者免征），3亩地以上者累进征收，累进率最高不超过3倍，以适当照顾地主的负担。这一税制改革，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2）坚决同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磨擦进行斗争。1938年2月，直南特委与国民党濮阳区专员丁树本建立了统战关系。在当时抗日高潮的推动和中共的帮助下，丁树本提出统一战线、军民合作、抗战到底三个口号。在中共领导的四支队与丁树本部配合，同日军进行常庄、小濮州等战斗，收复了濮阳之后，于同年夏，八路军办事处、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迁入濮阳。中共干部主要集中在国民党濮阳专署、县民训科和丁部政治机关及抗日救国总会内，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工作，开办大批抗日救亡训练班，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并从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39年春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丁树本政治态度急剧右转，抛弃了“团结抗战”的主张，执行“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他成立国民党指导专员办事处，取代为中共所掌握的政训处；成立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团体相对立的组织，强迫“民先”队员自首并集体加入国民党；撤换共产党员县长，对八路军三八六旅回民连强行缴械，收缴南乐抗日救国会枪支；扣押、杀害抗日群众代表，强行解散大名二区抗日救国会，公开指责群众供给八路军粮秣是“资敌”。面对这种反共磨擦活动，冀鲁豫边区救国总会冲破丁树本的百般阻挠，于11月在濮阳召开代表大会，组织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向丁树本进行讲理斗争。冀鲁豫边区救国总会派代表团到大名召开县代表会议，恢复了大名二区抗日救国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原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率领县政府全体成员接受中共的领导，并输送了大批爱国青年，从而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3）开展争取、瓦解反动会道门工作。直南、豫北被日军占领后，一些豪绅、地痞利用群众保家自卫心理，公开或秘密组织了大约30余种会道门团体。它们均有武装，遍

及大多数村庄。有日伪操纵和公开投敌的，如黄枪会、先天道、万寿道、圣贤道和大公团一部。有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的，如大公团、联庄会、大仙会、红枪会、黄香会、白枪会等。九公道、八卦道、南太离、北太离等则纯属愚弄群众、诈骗财物的帮会。反抗敌伪的会门组织，有天门会、大公团和红枪会一部。因此，争取、瓦解会道门组织成为中共团结群众抗日的一项严重任务。1939年2月，中共直南特委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后，均专门设立了做会道门工作的委员会。根据会道门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宣传教育、分化瓦解、孤立打击的不同策略，先后争取滑县联庄会和大公团一部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争取长垣县红枪会转变为抗日自卫团，打击了东明县通敌的红枪会，逮捕了清丰、南乐一带在敌人直接指挥下的太阳会、未来道、先天道、后天道的汉奸首领。同时，加强抗日自卫队、抗日救国会工作，把广大群众吸引到各抗日团体中来。（4）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为主力部队输送兵源。中共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四支队，到1938年6月发展到1000余人，开赴冀南，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七支队。在四支队编入主力部队后，又以原四支队一个排为基础，与清丰县抗日武装及濮县、范县组织的冀鲁豫边区民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合编，组成黄河支队。接着，八路军黄河支队与汤阴县抗日政府武装合编为八路军游击队第二支队。11月初，滑县县委争取的国民党滑县县长陈曙辉的武装，亦编入八路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共900多支枪、1300余人。1938年12月，以濮（阳）滑东长救国会自卫队为基础，建立起独立大队，并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1939年春，以滑县县委领导的各区自卫队为基础，又组建了豫北大队，至年底发展到2000余人。

这些抗日群众团体及其工作的广泛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八路军重创顽军石友三部和丁树本部南逃之后，直南、豫北、鲁西南连成一片。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辖直南、豫北、鲁西南共15个县）领导下，经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筹备，1940年4月17日，南乐、清丰、

濮阳、东明、长垣、大名6县代表在清丰县安庄召开军政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南6县专员公署，并设立了东长濮（阳）滑4县边防办事处。1940年5月间成立了冀鲁豫青年抗日救国总会（主任为杨泽江）。至此，冀鲁豫边区各抗日群众团体均已成立。

（二）在鲁西地区^①。1937年10月，在鲁西北^②，中共与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范筑先建立了统战关系。中共以范筑先六专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为基点，以240余名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依靠各县党组织，在六专区及周围20余县宣传、动员群众，燃起了抗日烈火，成为全国瞩目的一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与范筑先的协议，在各县建立了政训办事处。各县政训办事处以抗日战争动员为中心工作，自上而下建立农民、妇女、青年、儿童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发展抗日武装。1938年1月，以中共在堂邑县创建的第一支游击大队为基础，将冠县、博平、范县、寿张等县的武装合并，建立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很快发展成为中共掌握的一支骨干武装。1938年5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队正式成立（队长徐少岩），各县建立“民先”分队。到8月底，队员发展到2500余人。与此同时，农民互助会首先在冠县开展起来，到9月，全县农民互助会发展到13万人。这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斗争性很强，发动群众反对平均摊派，改善生活，动员参军参战，还直接领导一支30余人的武装（后发展为卫河大队）。根据冠县的经验，互助会的组织形式在莘县、博平等县也相继发展。这一组织在掩护地方干部工作、锄奸、清匪、维持地方治安方面起了较大作用。在朝城和城北张鲁镇一带，建立了回民抗敌救国会，会员达1500人以上，并掌握一小部分武装。他们发动了要求县长彻底开放民运和反对张鲁镇警察局长贪污的斗争，引起很大震动。临清回民组织也于同年秋成立，会员约2000人。他们组织20余人的文艺宣传队，积极开展抗日

①鲁西，大致指山东省津浦路以西地区（不包括鲁西南）。

②鲁西北，大致指鲁西之黄河以北地区。

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范筑先将军殉国，鲁西北联合抗战受到挫折。在与范筑先联合抗战期间，中共鲁西特委直接掌握的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范筑先殉国后，他们在冠县、馆陶、丘县一带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部、齐子修部形成对峙局面。临清、高唐一带则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坚持工作。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到达鲁西北后，中共地方组织即以八路军武装工作团名义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群众，发展武装，使形势逐渐好转。

在泰西，1938年1月，泰（安）肥（城）山区的抗日游击队组成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12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和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大峰山独立营等合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开赴东平和东阿、泰肥山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辟根据地。为统一和加强鲁西北和泰西地区的领导，1939年1月建立了中共鲁西区党委。随后，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鲁西，经过3月间樊坝战斗，开辟了运河以西郛城、鄆城一带地区；经过5月间陆房战斗，使泰西工作更为开展；同时，大力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农会和抗日民主政权。为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鲁西区党委于1939年8月小安山会议后，在运西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破路和改造地形。到年底，巨野、郛城、寿张、东平等县，除敌人据点外，能走汽车和马车的大路，大部改造成了8尺宽、4尺深的抗日沟。在卫东地区，经过发动群众，组建自卫队，改造政权，初步建立起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平（原）夏（津）恩（县）高（唐）禹（城）边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和1940年，泰西地区肥城、宁阳、长清、泰安、东平等县和昆山实验区，在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开展借粮斗争，群众运动蓬蓬勃勃，称之为“红五月运动”。当时初步实行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的村庄达500多个，参加抗日救国团体和自卫队的群众约15万人，这

是冀鲁豫边区发动群众实行“双减”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巩固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放手发动群众过程中，后期曾出现过一些“左”的政策偏向，区党委、地委进行了纠正。当时，个别上级领导对泰西、昆山等地群众运动中一些“左”的错误进行了过分的批评，区党委缺乏全面理解，曾影响了鲁西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1940年春，鲁西抗日军民发起反顽作战，连续取得胜利，并平息了反动会道门的暴乱，使鲁西北、泰西、运西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鲁西区行政主任公署和鲁西军区先后成立。3至5月间，鲁西妇女救国总会（会长郭军）、鲁西青年救国总会（主任王克，副主任张延积）、鲁西农民救国总会（会长郭英）和鲁西职工救国总会（负责人王震宇）相继成立。至此，鲁西区群众运动开始走上统一领导的轨道。

（三）在湖西地区。抗战爆发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建立统一战线，成立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任总动委会委员，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任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他们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选派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参加各级“动委会”，并以“动委会”名义在各地开办游击训练班，组织“民先”、抗日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群众抗日团体。1938年3月，郭影秋以“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身份召开青年代表会，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很快发展到苏鲁豫皖边区30余县，参加青年达万余人。在宣传抗日的基础上，群众踊跃参军，各地先后举办农民游击训练班，迅速建立了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1938年5月以后，沛县、滕县、临城、峯县等地抗日武装汇合，组建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编为3个大队，共600余人。沛县、丰县、砀山、单县、金乡、铜山、鱼台等地抗日武装也进行合编，组建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发展到20个大队，5000余人。7月，中共苏鲁豫特委建立，加强了对湖西

地区抗日工作的统一领导。12月27日，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到达湖西地区，改称苏鲁豫支队，在丰县西北崔韩庄一举歼灭了公开投敌的汉奸土匪王献臣部，并给增援日军以沉重打击。苏鲁豫特委和苏鲁豫支队乘胜展开全面活动，发展抗日武装，打击伪军伪政权，使湖西地区很快形成了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的抗战局面。同时，对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丰县县长董玉钰等人加强了统战工作，使这一地区出现了联合抗战的局面。1939年1月，苏鲁豫区召开了青年救亡团体联席会议，9个青年救亡团体20名代表共同决定成立苏鲁豫青年抗敌救亡协会（苏鲁豫特委委员李毅负责），选举金乡、鱼台、单县、丰县、沛县等5县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接着，苏鲁豫边区妇女救国会（孔真为主任）、农民救国会、职工救国会相继成立。5月，中共苏鲁豫区党委成立后，苏鲁豫边区总动员委员会随之宣告成立（主任王文彬，秘书长高文甫），统一了对各级工、农、青、妇和自卫团等群众抗日团体的领导。到7月底，苏鲁豫边区群众抗日团体会员达17万人。1940年4月，苏鲁豫边区参议会和湖西专署相继建立，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形成。

这个时期，冀鲁豫、鲁西、苏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共有100余万群众加入工、农、青、妇、自卫队、青抗先、模范班和儿童团等抗日团体。各地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和领导的统一，为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坚持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第二阶段，1940年下半年到1942年9月。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坚持和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而艰苦奋斗。但由于对中共中央1939年11月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领会不深，对减租减息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致使大部分地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基本群众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程度。

（一）根据地进入艰苦时期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对边区加紧“扫荡”和“封锁”，国民党顽军、

反动会道门和土匪也乘机兴风作浪。1940年6月10日至18日，日军2万余兵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顽军石友三也于6月28日重返濮阳、濮县、清丰、观城一带。驻单县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朱世勤也积极进行反共磨擦活动。这时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部和丰县县长董玉钰部转向反共，包围袭击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企图迫使中共退出沛县和丰县县境。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朱存桢等在大峰山区和肥城周围组织红枪会暴动，配合日军向中共进攻。反动“快道会”也在不到两个月内蔓延到濮阳北部、东部和清丰、南乐、滑县及观城一带，对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造成很大威胁。至1940年底，冀鲁豫区遭受严重损失，抗日根据地缩小了3/4；鲁西和苏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进入艰苦时期。

1941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鲁西与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和行署，隶属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湖西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从而统一和加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敌斗争的力量。9月间，鲁西与冀鲁豫两区群众团体也合并统一，边区工救总会（主任王震宇）、农救总会（主任高元贵，副主任许敬贤）、青救总会（主任王克，副主任杨泽江）、妇救总会（主任郭军，后为吴亚男，副主任范世钧）、文联筹委会（主任鲁西良）先后建立起来。

为了粉碎日、伪、顽、会、匪的进攻，坚持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下，工、农、青、妇、儿童团、自卫队、模范班、青抗先等各群众团体，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破路、拆楼、打狗、锄奸、配合军队作战。1940年7月，在第二次反击顽军石友三的作战中，濮阳、濮县、范县武工队、县大队和民兵，积极配合主力，孤立顽军据点，消灭零星外出抢粮、抓丁的顽军，发挥了巨大作用。各群众团体配合部队和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接敌区和有会道门的地区发动群众，以各种方式开展反对顽军和反动会道门的政治攻势，广泛宣传、揭露会道门被日伪、顽军利

用，被地主、流氓操纵，来反对八路军，破坏抗战的本质；对正在酝酿组织会道门的地区，规定不筹粮、款，暂停打狗、破路；强调各部队以模范的群众纪律来影响、争取群众，大批干部深入会道门群众中去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因此，会道门很快分化，一部分倾向于中共，抗日反顽；一部分转为中立，直南一带的反动会道门相继瓦解，只有少数会道门仍暗中进行活动。1940年8月至12月，国民党顽军6000余人包围鲁西南。根据地党政机关以200余人的武装，在曹县刘岗、曹楼、伊庄为中心的东西不过8华里、南北不过20华里的区域同顽军周旋，坚决依靠群众，利用战斗空隙实行减租减息，充分发动群众，做好统战工作，团结战斗，坚持三村斗争达四个半月之久，创造了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斗争的范例，在鲁西南广大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声望，为以后根据地斗争和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月以后，广大民兵密切配合八路军主力进行反封锁斗争，先后拔除许多敌人据点，并攻克内黄县城。在对南乐至清丰、濮阳至滑县等敌人公路封锁线进行的大破击战中，广大群众积极参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边区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在坚持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斗争中，不断进行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牺牲。1942年春，日军对观城县邵庄屯一带“扫荡”，冀鲁豫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总会机关部分领导遭敌包围，近20人被逮捕，其中一人受伤，泰西青救分会主任雷清亮和边区文联李育仁光荣牺牲。

在反对敌人分割、“蚕食”、封锁、“扫荡”的斗争中，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领导下，不仅加强了整军和派遣游击支队的工作，而且整顿训练了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逐步形成了广大群众性的民兵联防组织。若干个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宣传和组织群众，争取、瓦解伪军伪组织，建立秘密的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开展对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群众性斗争。1942年7月，南乐县东节村民兵乘敌人要民夫之机，混入本村敌人炮楼，打死日军9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7支、手枪2支、子弹6000余发，并将炮楼烧毁，受到

军区和行署嘉奖。南乐县张庄集、樊村、李家村、杜家村、阎村、武家村建立起6村民兵联防，在周围敌人碉堡林立的险恶环境下，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冀鲁豫行署机关、五分区后方医院、被服厂、枪械厂等都曾在这里设置或驻扎。到1942年底、1943年初，全区组织了142支小部队和游击支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全区参加民兵联防组织的人员由19358人发展到222153人，先后动员8万多群众破路140多次，平毁封锁沟240多华里，在敌占区较普遍地建立了抗日的两面政权。这对于粉碎敌人对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分割、“蚕食”，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边区工、农、青、妇、文等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生产救灾活动，帮助群众战胜敌人和天灾带来的严重困难。1941年4月12日至19日，日军对以内黄县为中心的沙区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全区被杀害群众约4000人，53户被杀绝，许多房屋、村庄被烧毁，大批粮食、种子、耕畜、农具被抢走。内黄县被烧毁房屋21159间，被抢走、烧毁粮食66228担；高陵县被烧毁房屋2844间，抢走、烧毁粮食66164担。沙区人民的经济支柱之一枣树被砍毁5万余棵。“扫荡”过后，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和救国总会及一、二地委与专署，立即抽调干部120余名，组成5个善后工作队，到沙区进行慰问和救灾。半个月內，工作团走遍125个村庄，在75个急赈村救济1410个急赈户。行署拨款1万元，无息贷款1万元。各界人民捐助6万余元。边区党政军民机关和人民省吃俭用，捐助了大量粮食、种子、农具、衣服、锅碗、席棚等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同时，边区部队对乘机袭扰的敌伪、土匪和会道门进行了打击和镇压。这样，很快稳定了沙区根据地局势。1942年秋，边区遭受大面积旱灾和蝗灾，大批群众饿死，外逃者不计其数。在鲁西北，由于日伪、顽军的残酷掠夺和严重自然灾害，堂邑、冠县、聊城间方圆四五十华里形成“无人区”，南乐县1.7万余人饥饿而死。面临这一严重情况，全区将救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合围扑打蝗虫。政府发放借款、

贷款，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在鲁西北和以内黄县为中心的沙区，还发动贫苦农民开展了向地主借粮斗争，并从濮范观中心区运去粮食430万斤，赈济灾民，从而帮助灾区群众渡过了难关。

为适应严酷斗争局面，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政策，区党委于1942年9月5日作出《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将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合并为各级抗联（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县以上工、农、青、妇合并为抗联后，取消原独立领导系统，设立各级抗联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和秘书处。根据地基本区的区、村不组织抗联，各救国会仍保持独立组织，归县抗联统一领导。游击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区、村组织抗联，但人员较精干。这不仅紧缩了各级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有利于加强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和工作，而且选派大批得力群众团体干部加强地、县党委和抗联会的领导，对于切实深入群众和组织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有重要的意义。

（二）放松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沉痛教训。这个时期，在发动群众上是有成绩的，坚持了平原抗日根据地斗争，但是教训也是很沉痛的。主要是对实行减租减息、发动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致使大部分地区基本群众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削弱。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少地无地。在漳河下游地区（安阳东部、临漳、内黄等县）土地高度集中，据调查，战前有60—70%的土地集中在5—7%的地主手里。鲁西南地区土地也比较集中。濮县、范县、鄄城一带土地比较分散，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占土地总数15%左右。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直到1941年、1942年，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据1941年12月对南乐县王洛集、内黄县牛马张固、范县后冯固和李菜园、观城县方庙等4县5个代表村的调查：无地的21户，占总户数3.8%，占总人口2.1%；贫农182户，占总户数33.2%，占总人口31.3%，占总地亩12.3%，每人平均地1.4亩；中农254户，占总户数46.4%，占总人

口50%，占总地亩48.7%，每人平均地3.5亩；富农69户，占总户数12.6%，占总人口12.6%，占总地亩23.5%，每人平均地6.8亩；地主22户，占总户数4%，占总人口4%，占总地亩15.5%，每人平均地14.2亩。就是说，仅占农村人口4%的地主，占有15%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33%以上的赤贫和贫农，只占土地的12.3%。详见下页表①：

地主阶级利用封建土地关系剥削农民，主要通行两种租佃形式：一是大种地，即地主把土地租给佃户，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全由佃户负担，土地收获物按约定租率交给地主，一般是对半分，也有将60%甚至70%交给地主的；二是小种地，即土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由地主出，佃户只出劳动力，收获物一般按麦季80%、秋季70%的租率，也有的按麦季90%、秋季80%的租率交给地主。此外，佃户还要义务为地主打水、喂牲口、织布、缝衣、放猪、放羊等。在鲁西南还有所谓课地，即死租地，地主只管按租率收取定额地租，不管生产成本和工具，也不管丰年或歉年，甚至不出土地负担。课地的租率，依据对许寺村的调查，高达80%。搞了减租减息增资的一些地方，地主反攻，退佃解雇，民众情绪低落。如滑县寺台村，佃户20个，雇工19个，退佃7个，解雇14个，不退者多为明减暗不减。高利贷盘剥更厉害，抗战前大多数地区有2/3的农户负债，年利一般在4分、5分，甚至“驴打滚”。地主阶级还利用“黑地”转嫁负担，造成地主地多交公粮少，贫苦农民地少交公粮多的不合理现象。如范县当时的“黑地”占土地面积的60%，地主把负担大部分压在基本群众身上。某村有地30顷，交公粮地仅占17顷，其负担为：地主12%，富农14%，中农12%，贫农62%。在以种枣和花生为主的沙区，地主、高利贷者与商人勾结，以极低的价格收买农民的枣和花生，以昂贵的价格卖给农民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卖青苗”来过活。据1940年

① 《冀鲁豫边区环境形势及村政权建设现状报告》，1942年8月。

冀鲁豫边区4县5个代表村土地调查（1941年12月）

类别	县村数	南乐县 王洛集		内黄县 牛马张固		范县 后冯固		范县 李菜园		观城县 方庙		总计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目											
无地	户数	2	1.4	10	7	2	2.4	2	3.6	5	4.3	21	3.8
	人口	2	0.3	25	3	6	1.2	7	1.9	24	4.2	64	2.1
贫	户数	56	39.7	45	29	32	39.4	15	26.8	34	29.3	182	33.2
	人口	250	35.2	240	28	217	43	67	18.5	162	28.1	936	31.3
农	地亩	350	16.5	356	11	314	19	105	8.6	220	8.7	1345	12.3
	人均	1.4		1.5		1.4		1.5		1.3		1.4	
中	户数	6.2		8		9.8		7		6.5		7.9	
	人口	64	45.4	72	47	39	47.5	32	57.1	47	10.5	254	46.4
农	人口	332	46.8	428	50	239	48	243	66.9	254	44.1	1496	50
	地亩	1096	51.7	1511	45	1022	61	788	64.5	893	35.4	5310	48.7
富	人均	3.3		3.5		4.2		3.2		3.9		3.5	
	户均	17.1		21		26.2		24.6		19		20.9	
农	户数	16	11.4	19	12	7	8.3	6	10	21	18.1	69	12.6
	人口	118	16.6	98	12	29	6	36	10	94	16.3	375	12.6
地	地亩	598	28.3	770	23	242	14	223	18.2	727	28.7	2560	23.5
	人均	5.1		7.8		8.4		6.2		7.7		6.8	
主	户均	37.3		40.5		34.6		37		34.6		37.1	
	户数	3	2.1	7	5	2	2.4	1	1.8	9	7.8	22	4
总	人口	8	1.1	51	7	8	1.8	10	2.7	42	7.3	119	4
	地亩	74	3.5	719	21	100	6	106	8.7	685	27.2	1684	15.5
计	人均	9.3		14.1		12.5		10.6		16.3		14.2	
	户均	24.7		107.2		50		106		76.1		81.1	
总	户数	141	100	153	100	82	100	56	100	116	100	548	100
	人口	710	100	842	100	499	100	363	100	576	100	2990	100
计	地亩	2118	100	3356	100	1678	100	1222	100	2525	100	10899	100
	人均	2.98		4		3.4		3.4		4.4		3.6	
总	户均	16		21.9		20.9		21.8		21.7		19.9	

统计，沙区农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光，也还不清后河村地主的债款。基层政权干部不少是地主、富农或其代理人，有的本身就是恶霸、坏分子。如观城一区，村政权虽经过改造，但63个村的村长中，小商人、旧政权人员、旧军人占1/3，他们多被地主、富农所控制和利用，不能代表基本群众的利益，根本谈不上实行民主政治。广大雇佣贫农生活无保障，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无地位。

由于当时领导上认识不足，未能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对封建剥削制度触动不大，基层政权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农村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基本上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占优势，基本群众优势尚未形成，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受到影响。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坚持边区长期抗战和各项建设，根据地并不十分巩固。在1941—1942年敌伪顽军的夹击下，边区根据地出现了向后退缩的局面。根据地1941年缩小1/3，1942年又缩小1/5。在边区，有敌伪军66300人，据点1098个，国民党顽军3.8万人，公路173条，封锁沟30余条，封锁墙3道，根据地被分割为濮范观中心区和鲁西北、沙区、鲁西南、湖西及泰西与运东等6小块。加之严重的旱灾、虫灾，根据地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粮食定量部队减少50%，地方工作人员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只能吃到2两粮食。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空前困难，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成为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迫切需要。

第三阶段，从1942年9月至1945年9月。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民主民生和大生产运动，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全边区群众运动形成新的高潮。

(一)全边区中心任务转变为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11月《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共产党必须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并要求在我军活动的区域，实行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经济

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改善工人生活；在政治改革方面，必须实行民选，改造政权。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党在各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是：一面实行减租减息，一面实行交租交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北方局于6月30日在对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时期，必须反对空谈，切实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基本区，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反对贪污浪费等，联系改造村政权，整顿或建立党支部；在接敌区，发动群众须从保护群众利益、减轻群众对敌负担、反支差、反“蚕食”开始，号召群众武装自卫；在敌统治薄弱的敌占区，开展隐蔽的游击战争，以维系人心与保护群众利益去发动群众。并指出：发动群众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只有更进一步依靠群众，才能克服边区目前存在着的严重危险。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1942年7月召开了民运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40年以来未能在全区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教训。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代表北方局在会议讲话中指出：目前广大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民主民生工作的彻底执行”，群众运动、巩固党、发展人民武装三大任务都是“以民主民生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这次会议对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组织、领导和步骤作出了决定。9月，刘少奇由华中回延安途经冀鲁豫区，又介绍了华中经验，指出了冀鲁豫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问题，并提出了批评和具体意见。他指出：你们没有被敌人打垮、挤走，保持了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是很大的成绩。同时强调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指出：如果不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总有一天，敌人会把你们挤垮、赶走。没有牢固的群众观念，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①。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刘少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

^①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171页。

减息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在总结本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广泛开展减租减息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动群众作为全区的中心工作。10月，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黄敬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湖西地区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11月至12月，黄敬主持召开了全区高级干部会议，并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以及自己的调查研究，在会上作了《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精辟地分析了边区的形势，正确地提出了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指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环节。开辟和创造根据地时期过去后即转入巩固时期，巩固时期的中心是发动群众。

“我们边区自从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以后，在相当长时期中没有抓紧发动群众这个环子。”“基本群众未得到应有的民主民生利益，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程度未得到应有成绩。”又指出：发动群众是巩固与建设根据地的中心一环，“轻视群众，没有群众观念，是共产党员忘本的行为”。会议对全区发动群众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要求在基本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并针对敌区、边缘区和敌占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发动群众的不同口号、内容和斗争形式。这次会议，标志着全区党的中心实现了向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伟大转变。

（二）濮县、范县等地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及在全区的推广。冀鲁豫区党委为了取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以正确地指导全区群众运动，于1942年9月下旬即从区党委党校、行署行政干校、军区陆军学校和边区抗联总会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中抽调干部500余名，组成政民工作队（亦称濮范减租减息工作团），由信锡华、孙光、刘星、高元贵率领，到濮范中心区（杨节、徐麟村分别任濮、范政民工作队长），开展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改造区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群众运动。工作队的工作方针是，协助当地抗联发动农民对地主封建势力展开斗争，通过斗争，树立基本群众首先是雇佣贫农在农村的优势。在工作方法和步骤上，可以先从减租减息入手，也可以先从反贪污、合理负担开

始，通过斗争削弱地主势力，改造政权，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地主抗日。在濮县，国民党军队曾长期盘踞，顽固势力从上到下占优势，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势力具有强烈的民主民生的要求。因此，先从民主斗争入手，即先搞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的斗争，然后转入减租减息增佃，再转入彻底的民主斗争，即改造政权，最后达到发展抗日力量的目的。在范县，共产党、八路军坚持了优势，但未抓紧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基本群众不满意，顽固势力保持着在基层的统治地位，并积累了对付共产党的经验。因此，先从民生斗争入手，即先搞减租增佃增资，在民生斗争中把顽固分子面貌揭穿、孤立起来，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然后转入民主斗争，而后再达到提高抗日斗争水平的目的。到年底，濮、范中心区基本群众已发动起来，民主民生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1943年春，二地委总结了濮、范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黄敬《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中，分析了边区农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以及濮、范两县的不同环境，明确地肯定了濮县、范县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经验。他指出：以民主民生为中心是正确的，但是各地历史和环境不同，“斗争的道路与斗争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提出：“反贪污斗争、合理负担、查‘黑地’表面上看是民生斗争，实际上是民主斗争，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民主民生斗争究竟哪一种斗争先开始，“必须从具体条件出发”。濮、范试点的成功，打开了全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道路。与此同时，纪登奎、金风、杨节、陈东生等在鄄城县旧城集进行试点，他们认真与群众同吃、同住，向贫苦农民学习，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开展减租减息增资斗争，改造农村政权，实行民兵联防，加强对敌斗争，也创造了新的经验。

区党委在取得濮、范经验后，即在全区搞不同类型的试点，逐步推广到面，使全区民主民生运动有步骤地展开。1942年9月，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到鲁西南领导发动群众工作。次年春，区党委组成由抗联负责人高元贵、逯昆玉率领的鲁西南减租减息工作团，协

助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他们在深入发动群众过程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组织群众团体，改造由地主掌握的村政权，树立了雇佣贫农在农村的优势。

经过一年的民主民生运动，全边区主要是基本区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农村的阶级关系开始改变，大部分农民参加了农救会，部分青年、妇女参加了自己的组织，基本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政治上有了地位，开始掌握村政权。通过群众运动，农民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农村党组织得到巩固与扩大，培养了大批干部。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运动中出现了包办代替的现象，主要是工作队包办代替地方组织，干部包办代替群众，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斗争虽然进行了，但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工作队撤走后，群众工作即陷入消沉，斗争成果难以巩固。

（三）滑县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展。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1943年11月成立冀鲁豫分局，黄敬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两区党的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强对边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领导。1944年春，冀鲁豫分局严肃指出和批评了前段运动中那种不相信群众、缺乏群众观念的包办代替现象。黄敬亲自对第八分区几个村的群众运动状况进行调查，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目前在一些地方，群众工作很沉闷，群众对我们很冷淡，主要问题是前段对发动群众不放手，民主民生运动搞得不彻底。会后，分局从领导上作了检讨，解决了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问题，决定在全区深入放手地掀起发动群众的热潮。

根据分局的指示，1944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实行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反对不相信群众的包办代替的作风，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全区民主民生运动。《冀鲁豫日报》发表《打破消沉局面》的社论，号召大胆放手，在全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反“黑地”、反贪污的群众运动。4月，冀鲁豫区党委又决定在四地委所辖滑县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民生斗争的试点，区党委、地委、边

区抗联总会及地区抗联选派李进宝等300多名干部帮助工作。他们从查减工作入手，以民主民生斗争为主要内容，开展雇佃贫运动。通过救济灾荒，解决群众生活和春耕生产问题，把群众初步发动起来。接着，发动雇佃农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的民生斗争，即要求地主、富农实行“二五”减租（减租25%）、“分半减息”（月息减至1分半）、“五一”增资（工资增加20%），向前追算到1942年初边区颁发减租减息法令以来地主、债主拒减的租、息和拒增的工资，使雇佃农从斗争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改善了生活，提高了斗争积极性。然后，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恶霸的民主斗争，重点打击鱼肉乡民、罪大恶极的地主，改换村长，选举农会干部，巩固农村阵地，并实行累进税合理负担，结合开展查“黑地”的斗争，减轻了贫农和中农的田税负担。还通过掌握地经纪，控制地价，以较低价格从地主手里购买土地，部分地解决了雇佃贫农的土地要求。在运动中，明确提出照顾贫农的原则，多方满足贫农的要求，强调执行依靠雇佃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削弱封建势力，使雇佃贫农成为农村中的骨干。在运动中，有的先从民主入手，有的先从民生入手。他们大胆放手地领导，改变过去那种包办代替的作法，最大限度地依靠群众，把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与积极正确的引导结合起来，把农民的“私仇”、“私愤”变成对不法地主的“公仇”、“公愤”，使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以雇佃贫为核心的广大农民的运动；先运动起来的村发展其他村，村村发展，联合斗争。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全县造成了农民群众自己的规模宏大的运动，有力地削弱了封建剥削制度，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树立了雇佃贫农的优势。

滑县在发动农民中，解决了如何依靠贫农的问题，为全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冀鲁豫四地委和冀鲁豫分局相继总结和推广了滑县经验。1944年10月间，在《冀鲁豫日报》上发表了四地委副书记赵紫阳署名的《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文章。分局通知各地，推广这一经验。滑县经验及其推广，

有力地推动了全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1944年底，张霖之在《冀鲁豫日报》上发表《站稳脚根，放下圈子》的文章，要求各级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站稳脚根，放下“圈子”，真正贯彻大胆放手，并要防止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向。各地在民主民生运动中集中群众的智慧，创造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和方法。到1945年春，一度消沉的群众运动又在全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四）边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重大成绩。濮范经验、鲁西南经验、鄄北经验和滑县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使全区不断地掀起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热潮，日益深入，削弱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摧垮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形成了雇佣贫农基本群众优势，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据濮县温小屯村1945年的调查，运动前后，6户地主、富农占全村土地由21%降低为15%，94户雇佣贫农占全村土地由8.6%上升为13.6%。据滑县70个村的调查，从1944年4月到1945年1月，原1066个佃户人均地1.5亩，增加到人均地2.4亩，增长36%；原809户贫农中，有227户上升为中农；地主普遍出卖土地，以赔偿群众过去的损失，而雇佣贫农买地却成为一种风气。又如，范县群众查出杨二杂货的“黑地”13顷，罚了4倍，共210万斤粮食，几乎相当于全县公粮，群众和干部都很受鼓舞。在环境比较艰苦的水东地区的一些巩固区，也发动群众进行了赎地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如1944年仅运西数县，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群众即发展到12万人以上，灾民合作社社员达3万人，民兵增加到1.2万人以上。滑县黄庄205户925人，其中92人参加农救会，9人参加工救会，22人参加青救会，137人参加妇救会，65人参加儿童团，67人参加姊妹团，267人参加合作社，13人参加民兵。另一方面，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基本群众的人权、政权（政治权利）、地权、财权之后，又实行了交租交息，保障地主阶级的人权、政权（政治权利）、地权、财权，调整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争取地主合作抗日，巩固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胜利开展和基本群众优势的树立，为战胜困难，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在接敌区、边缘区游击根据地，以反资敌、反贪污、反汉奸、反出夫为内容，采取政府发放贷款粮等措施，有时以公开的抗日斗争为主，有时以两面政策配合武装斗争，团结各阶层一致对敌，从而减轻了群众的损失，大大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开展。在敌占区，以实行抗日两面政策、开展合法斗争为主，千方百计地减少群众对敌负担，保存民族抗日力量，有效地保护了群众的实际利益。如，尚和县一、二区原来处在敌伪顽的包围之中，经过共产党、八路军发动群众抗旱救灾，开展反贪污、反恶霸、反资敌、减租减息增资等斗争，建立了农教会、妇教会、青教会和儿童团，组织起民兵、自卫队，对敌伪据点实行联防和监视，因而使原来的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根据地，连敌人据点所在的村庄，共产党军政人员都能进去开展工作。

提倡大胆放手以后，迅速扭转了群众运动中包办代替的作风。但是，有些干部把大胆放手与执行党的政策对立起来，以为对群众进行党的政策教育会束缚群众，就是包办代替。加之，在民主运动阶段缺乏明确的政策约束，一些地区出现“推平”的作法，侵犯了中农利益。如七分区购买400支枪花300万元，负担几乎全部压在中农身上。一些地区发生了不执行政策、重罚蛮干的偏向。后期发生了消灭地主的倾向，对地主不分罪恶大小，守法与不守法，一律重罚；对富农打击过重。据滑县的材料，被斗地主约占80—90%，富农被斗争的约占50%。冀鲁豫分局在运动中察觉到了这种偏向的严重性，于1944年12月作出对中农政策的指示，指出：为使贫农和赤贫农得到果实而损害中农，这是挖肉补疮的办法，必须纠正。在土地分散，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庄，应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共同发展生产。1945年2月，分局作出了《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大胆放手是针对着边区群众工作中领

导不相信群众和包办代替提出来的，把大胆放手误认为是重罚蛮干，甚至取消领导，这是一种偏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党的土地政策和中农政策，“细心地冷静地检查自己工作中这种倾向并加以迅速纠正”。根据分局的指示，区党委领导各地较快地纠正了上述“左”的偏差和错误，并妥善地做了善后工作。

（五）邓小平关于边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重要总结。由于边区群众运动中一度出现一些偏向，虽经分局和区党委加以纠正，在部分干部中仍存在着不同认识和争议。1945年春，中共北方局派干部分赴滑县、濮县、濮阳三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听取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县长程建明的专题汇报。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统一对边区群众运动的认识，正确指导全区的群众运动，中共冀鲁豫分局于6月间召开群众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对边区民主民生运动作了重要总结发言。他说：晋冀鲁豫区过去最沉痛的教训是在1940年、1941年没有真正执行中央1939年冬天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这影响到我们根据地工作的深入和巩固的程度”，“形成一九四二年严重的困难，从主观上讲，这是重大原因之一。特别是冀南，一九四二年后敌情极端严重，丧失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时机，最为可惜。”邓小平充分估价了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成绩，指出：“这次运动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下进行的，而且获得很大成绩”。第一，这次运动抓住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从而彻底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减租减息和发动、组织、教育群众的问题。实践证明：不彻底解决这个中心环节问题，“其他各项任务都是很难完成的”。第二，比较好地解决了群众观点问题，克服了过去运动中那种包办代替的恩赐观点，在干部中树立起群众观念，相信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因此，真正造成了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培养自己的领袖，运动的规模之大、之普遍，进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第三，这次运动明确提出了以雇佣农为核心和切实照顾贫农的方针。平原区有约占人口30%以上的贫农阶层（鲁西南有些村庄贫农约占70%），过去长期未能解决他

们的困难，未能把这一富有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这次运动，从减租增佃的雇佃运动开始，在民生斗争中把极大部分斗争果实分给贫农，使他们从长期贫困中解放出来，因而使贫农、雇农发挥了骨干作用，使他们上升到农会和乡村领导阶层的地位。第四，这次运动削弱了地主，打击了封建势力的气焰，而且由于运动的群众性和组织力量，使地主不易分化群众阵线和收买群众领袖，很难进行反攻倒算。第五，教育了干部，培养了大批新的本地农民干部。干部的思想由不相信群众到相信群众，由包办代替到信任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上级相信下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干部积极性大大提高，增强了上下团结、全党团结，使运动和各项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南乐县委在民主民生斗争取得胜利基础上引导群众及时转入生产运动的作法和经验，指出该县社会改革转生产及时，人心稳定，兵源充足，支前积极。另一方面，邓小平在讲话中，也指出了运动中存在的弱点和偏向，主要是大胆放手之下忽略了用党的策略教育群众，运动后期产生了“推平”的思想和“推平”的作法，伤害了中农，对地主和富农打击过重，斗争的方式比较简单等。他分析了这些弱点和偏向产生的原因，认为是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下所产生的，有些是在大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最后，邓小平对全区今后群众工作提出了意见：从全区来说，“仍应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求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在原冀南区，这是目前迫切的中心任务。在水东地区，应适当地但是坚决地进行这一工作。在原冀鲁豫区，大的浪潮已经过去，但也不应放松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必须切实注意克服不平衡的状况，对不同类型的地区要区别进行工作。已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要注意纠正偏差，切实团结中农，使各阶层安定下来，适时转入生产；还没有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要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充分发动群众，尽最大努力把减租减息搞得更好。这次分局群众工作会议和邓小平的总结讲话，对于统一全区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重大的作用，为全区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明

确的方向。

(六)边区群众生产和抗日积极性的空前高涨。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激发了群众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从1943年起，开展了生产救灾和变工互助、大生产运动。由于边区1942年秋季普遍歉收，1943年春荒极为严重。行署指示各级政府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组织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发放春耕贷款，帮助群众生产渡荒，帮助贫苦农民赎回因灾荒而贱价卖给地主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开展“借粮”斗争，使灾区人民战胜了春荒。1943年夏季，从边区西北部到东南部发生大面积蝗灾，严重地区飞蝗遮天盖地，一昼夜间就把大片秋禾吃光。经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基本战胜蝗灾，保住了秋苗。广大群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实行变工互助，生产自救。据7个专区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变工队的有10540人，参加互助组的有90658人，从而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1942年秋粮征购时，最高的专区完成59%；而1943年麦季征收时，最低者完成67%。1944年春，遵照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该区军民因地制宜确定生产项目，组织妇女搞好纺织等家庭手工业，使大生产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在群众未发动的地区，贯彻民主民生法令，解除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束缚，提高生产积极性。在接敌区，大力开展反资敌、反掠夺斗争，减轻人民负担。在濮范观中心区着力发动大生产运动。各军分区先后建立起小型兵工厂、各种民用工厂和农业生产基地，努力做到自给、半自给，改善军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这年夏秋，冀鲁豫区又发生大面积蝗灾，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扑蝗运动，使灾情大为减轻。由于开展生产救灾和大生产运动，搞好“坚壁清野”，有效地防止敌人的掠夺和破坏，使群众渡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边区财政收入增加，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在开展民主民生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前，组织民兵、自卫队，实行民兵联防，配合主力部队深入接敌

区和游击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44年春节后，全面掀起了青年参军参战的高潮。4月份以后，冀鲁豫军民连续展开对敌攻势作战，广大民兵和群众挖沟破路，开展政治宣传，配合部队攻克敌人据点数十处，歼灭大量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地区和一些县城，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区有民兵103304人，民兵和自卫队配合主力作战的达4.5万人以上，仅民兵即作战1898次（二分区、水东未计在内），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54名，俘2名；毙伤伪军964名，俘501名，争取反正231名；歼匪66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查获敌探、奸细484名。1945年4月，在南乐战役中，广大群众慰劳和支援军队，盛况空前。部队所经村庄，群众高呼拥护八路军口号，从村里送到村头，儿童团、姊妹团向部队献酒献烟。八路军攻入南乐后，妇救会、姊妹团、儿童团成群结队担着酒和鸡蛋，用大车拉着白馍、粉条、花生、猪肉去慰劳，并要求到火线去慰劳杀敌战士。虽经劝阻，她们还是派了代表穿过敌人两道火力封锁线，到距敌炮楼仅10米的最前线慰劳战士。从前线到后方医院，每隔二三华里搭一凉棚，由青年妇女、姊妹团员专门招待过路伤员吃饭、喝水。广大指战员很受鼓舞。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立即号召全区军民实行总动员，解除日伪武装，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各县遵照命令，立即组织反攻营，扩建基干团。15日，边区抗联发出致各救会员、儿童团员、姊妹团员书，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参军参战，立即掀起参军参战热潮。仅金乡、单县、巨野3县就有3000余名青壮年参军。为了促进参军参战工作，行署发出《为使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全区约60万名学生立即投入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宣传活动中。

在八年抗战中，边区军民团结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至9月，除几个县城仍由日伪盘踞外，东起津浦，西至平汉，南跨陇海路，北连德石，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全获解放，边区扩大为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根据地（含冀南区）。边区军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全区

(不含冀南区)被敌人杀害、失踪和被抓壮丁者共1331438人,损失物资折合小米(每斤100元法币计)约450.28亿斤^①。边区大规模抗日民主群众运动的胜利和根据地的空前壮大,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

二、解放战争时期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支援下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全国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民渴望的国内和平民主未能实现,历史进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历史转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把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光明的前途向广大群众讲清楚,同广大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自救,为彻底粉碎美蒋的进攻,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而奋斗。因此,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转入了以完成土地改革为中心、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为基本任务的新的时期。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5年9月到1946年上半年。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打垮日伪汉奸结合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这是一个由减租减息向土地改革转变的时期。

(一)边区群众运动座谈会确定群众运动的新方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危险,进一步发动群众成为巩固解放区、准备对付国民党进攻的一个关键。这时,冀鲁豫边区新收复区约占全区一半,未进行减租减息或双减不彻底的地区占一半以上,特别是新解放区农民群众过去长期在日伪与封建势力压榨下,生活困苦不堪。如博平县,大汉奸罗兆荣统治达7年之久,仅在3年中就杀害抗日人员家属575人,强占农民土地1479亩,敲诈群众97366468元(伪币),拆烧抗属房屋1498间。广大群众渴望复仇、翻身,迫切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 and 政治地位。194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

^①《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227页。

局^①对整个边区的群众运动作了部署，为冀鲁豫区在新的条件下开展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在根据地中心区，发动群众，大力扩军，建立和壮大正规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新解放区，抓紧时机，建立政权和武装，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将边区各级抗联改组为冀鲁豫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张承先为主任，姚会宾为工农部长，王萍为青年部副部长，范世钧为妇女部长），成立冀鲁豫区文联（王亚平任主任）。

1946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从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打下巩固的基础，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进一步集中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实施民主民生纲领。在老区，把可能抽调的干部集中到新解放区，将机关干部集中于群众工作。在新解放区，首先稳定社会秩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争取人心；然后，发动雇佃贫农，并以他们为核心，发动全体农民进行民主民生斗争，打击封建势力；在减租减息、回地、增资斗争中，先成立雇佃农、债户、卖地户等代表会，尔后建立农会。但是，由于照搬过去的一些做法，没有深入研究新解放区的实际，脱离新解放区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致使边区群众运动在三个月时间里没有多大的开展。这时地处边缘的新解放区曹县，创造了反奸、清算的经验，为边区树立了典型。曹县长期受汉奸与封建势力的统治，群众苦难深重。如四区：一般村庄当过伪军的青壮年约占全村青壮年的 $1/3$ ，朱楼村的汉奸仅分队长以上、旅长以下的就有14个。大汉奸朱晓堂有地七八十顷，全乡240顷地，他占了 $1/3$ ，但从来没交过公粮、支过差，繁重的负担都压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因此，发动群众首先从反奸、清算开始，在民主政权帮助下，打垮了几个汉奸统治堡垒。通过反

^①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同时冀鲁豫与冀南两区分开。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

奸、清算，全县128个村4600余人涌入了伸冤复仇的浪潮，没收了朱晓堂、王秋濯等9个大汉奸头子的财产，获得果实3471630元。群众在斗争中迅速克服了怕“变天”的思想，提高了觉悟。接着，转入减租减息增资斗争。全县除边沿区外，据5个基本区75个村统计，参加减租减息增资斗争的雇佃农有886人，共获得果实粮420519斤，盐16293斤，款561440元，土地168亩（工人增资数未计）^①。新解放区的长垣、杞县、阳谷、长清等县的农民群众，也自发地起来斗争汉奸、恶霸，清算他们的罪恶，并提出了强烈的土地要求。这说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必须迅速对日伪时期的汉奸和勾结日伪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不首先打垮日伪结合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减租减息就无法进行。

1946年3月26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新解放区的群众运动从诉苦、复仇、清算、反奸开始，是合于运动的规律的，“带有总结过去（清算犯罪）开辟未来（减租减息）的作用，斗争规模宏大而深入，顺而易举”。为贯彻这一指示，进一步开展边区群众运动，冀鲁豫区党委和边区工农青妇联合会总会于同年4月6日至21日召开边区群众运动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前段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部分干部因循雇佃贫独立运动的经验主义，肯定了新解放区开展诉苦清算群众运动的新方针，解决了诉苦清算运动中雇佃贫领导和中农关系及其处理方法等问题。区党委书记张玺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群众运动三个月来之所以没有更大开展，是由于道路太窄，手脚太小。“这次会议，从下而上的清算了我们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解决了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道路问题，从思想上清算了我们的片面群众观点，解决了边区从未解决的中农政策问题。”并强调指出：“单纯照顾中农与单纯照顾贫农，都是片面的阶级观点，它不是农

^①《曹县五个月来的群众运动》，载《冀鲁豫日报》1946年3月13日第3版。

民与地主斗争的观点，而是3亩地与5亩地斗争的观点。”会议要求：今后必须打破过去单纯雇佃贫运动的小圈子，从多数群众要求出发。在边沿区，以自卫斗争为主。在老区，要把查减和生产结合起来。在新解放区，未打开局面的地区，要从诉苦清算着手；雇佃贫运动打开局面的地区，要增加清算诉苦的新内容，使雇佃贫运动和清算运动结合起来；雇佃贫运动已经搞起来的，要以此为核心，开展大规模清算诉苦运动；清算诉苦运动已搞起来的，要立即增加减租减息增资的内容，把运动提高一步^①。这次座谈会在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史上，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它从思想上破除了狭隘的经验主义，正确地解决了新解放区群众运动的方针和道路问题。

(二)全区反奸清算和查减运动的蓬勃开展。群众运动工作座谈会以后，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即抽调300余名千部分赴定陶、南乐等新解放区，各地委也陆续抽调干部深入新解放区，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行署还发出指示，要求全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在新解放区肃清敌伪残余势力，给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地主以严厉惩处。《冀鲁豫日报》5月4日发表《组织起雄伟的力量，向新解放区大进军》的社论。在冀鲁豫新解放区，一个以反奸清算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平阴县20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汉奸刘绪安，临泽县4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特务刘鉴如，泰安、鄄城、汶上、东垣、单县、宁阳、成武、郟北、曹县、菏泽等10县6万群众向大汉奸吴乃九、李子才、周方略、穆远岐、林荣房、李肇凯等讨还血债，从而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有仇报仇，有冤伸冤”的斗争热情。各地召开群众大会，政府参加群众运动，公开给群众撑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大胆团结和使用各种积极分子，坚决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当家做主；迅速斗争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分子，

^①《冀鲁豫区党委、联合会总会召开边区群众座谈会，确定新区清算诉苦方针》，载《冀鲁豫日报》1946年4月21日第2版。

没收其财产，并在斗争中建立起乡、村政权。这样，广大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也获得一些财物和土地。如二地委于2月间抽调600余名干部，集中党政军民的力量参加群众运动，对压在群众身上的残余敌伪势力予以坚决镇压、打击。至6月，据济宁、嘉祥、巨野、东平、南旺、汶上、昆山试验区、鄆北、郛北、临泽、郛巨、张秋等1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新解放区4120余村中（寿张、张秋不在内），群众已发动和初步发动起来的有2775个村，在177.2万余人口中，工、农、青、妇等各种组织的群众达86638人，参加斗争会4987次。又如鱼台县，在雇佃贫运动基础上，开展反奸清算、反恶霸、倒粮倒息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迅速造成风狂雨暴、排山倒海之势，20天内，仅3个区就获得果实粮2920915斤、款271083元、地7927亩、房屋338间、布16918尺、油坊6个、大车11辆、枪24支、酒馆1个。济宁、菏泽等城市的反奸诉苦群众运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菏泽市，短短半月多，召开大小斗争会14次，参加运动的群众达万余人，包括工人、市民、教员、学生，以及城外的杨庄（南华县属）、水王庄（菏泽县属）等村的农民，获得了大量的果实。仅9家烟厂就检举出汉奸股金300余万元，没收汉奸陈诚、葛敏斋等人财产也不下300万元。

边区反奸清算群众运动的胜利开展，摧垮了敌伪汉奸结合封建势力的统治，造成了农村土地财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各地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大部分转到了农民群众手中。广大农民群众在运动中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得到土地，不少地方农民自发地搞了每人平均“3亩推平”^①。冀鲁豫区党委因势利导，及时指导运动由反奸清

^①这种做法，反映了广大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但超出了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关于处理土地问题的精神，伤害了中农的利益，带有“左”的倾向。对此，区党委采取已平分者尊重现状，未平分者不提倡的政策，强调不得伤害中农利益。后来，由于片面强调平分土地，这种做法发展为全区性的“左”的偏差，1948年全党纠偏开始后才逐步得到纠正。

算转向减租减息、倒租倒息、雇工增资、赎地等斗争，用多种合法形式来变更不合理的土地关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并创造了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与此同时，在老解放区深入开展了复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查减工作中整顿群众组织，解决抗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在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地区继续进行民主民生斗争，进一步变更不合理的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新解放区的反奸清算运动和老解放区的查减运动，为边区从减租减息向土地改革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也为胜利进行解放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这一时期，边区群众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反对蒋介石所谓“黄河归故”的斗争^①。1946年2月12日，行署发出大生产的指示，要求机关、学校全年生产达到粮食、经费自给50%，至少也要达到一个至两个月的粮食和部分公杂费的自给。区党委直属机关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带头搞好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区广大军民掀起了新的大生产运动。南乐、清丰、观城15万妇女恢复草帽辫生产。济宁也积极从事猾子皮生产。1946年1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始在花园口堵口，妄图水淹黄河中下游冀鲁豫和山东渤海解放区数百万人民，“以水代兵”，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在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下，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发动全区广大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菏泽、临泽等地15万群众集会，签名抗议国民党的罪恶

^①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下令在花园口炸堤决口，使黄河改道，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946年12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在花园口堵口，将部分黄水放入故道。1947年3月15日，蒋介石又下令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将黄水全部放入故道。他们的企图是用水患来毁灭解放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奋起进行斗争和抢险。详见《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专辑。

行径。共产党在黄河归故问题上赢得了全国舆论的支持，争取了时间。边区沿河人民，在经费、器材严重不足，国民党军频繁袭扰的情况下，抓紧筑堤防水自救，前后有30万民工上堤，完成土方1300多万立方米。在国民党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前，治河复堤工程已大部竣工，从而保证了解放区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后来支援解放军渡河作战提供了条件。

第二阶段，1946年下半年至1949年9月。放手发动群众，完成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参军参战，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边区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

(一) 执行“五四”指示，初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46年6月，国民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冀鲁豫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在领导全区人民大力支援前线的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还在5月间，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这标志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正式开始。晋冀鲁豫中央局于6月10日在邯郸召开土地会议，贯彻“五四”指示，决定：在腹心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同时，要团结中农，争取农村人口90%的多数；在边沿区，集中力量斗争汉奸、恶霸，坚决打击“还乡团”，继续进行减租减息；全区要结合土改，进行保卫边区的教育，大量发展民兵。据此，冀鲁豫区党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开展反奸清算和查减斗争，采取各种方式变更土地关系，在新解放区争取六个月内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老区以生产运动为中心，在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地区继续进行查减运动。6月15日，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再次指示》，明确规定了有关政策：（1）没收大汉奸的财产，除留一部维持其家庭生活外，分配给复员、退伍、荣誉军人和贫苦军属、工属及贫苦群众；（2）

恶霸地主非法所得及其非法行为使群众遭受的一切损失，应予清算和赔偿；（3）政府减租法令规定以外的超经济额外剥削应予清算；（4）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成立之租佃契约，从契约成立之日起，按政府减租法令予以清算；（5）地主隐瞒之“黑地”一经查出，按1至10倍核准处罚；（6）豪绅地主在灾荒期间以贱价取得群众之土地，准予群众赎回。为取得土地改革经验，区党委派出工作团到南华县进行试点。南华县委在工作团帮助下，首先开展反奸清霸运动，为土地改革运动扫清道路。在反奸清霸的斗争中，全县共镇压汉奸、恶霸等275名，对罪大恶极的首犯，召开万人大会公审、枪决。7月上旬，县委在朱楼召开全县土改骨干分子大会，介绍试点经验。从而在全县范围内，处处形成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武装组织起来，与敌人抢速度、争时间，搞好土改，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全区出现了没收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清算、倒租、赎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高潮。对清算出的土地财产，多数地区在村一级组成以贫雇农为核心和中农参加的管理委员会，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动”（即中农不动，以地主富农财产补充无地、少地农民）的方法，进行平均分配。亦有少数地区将包括中农在内的各阶层的土地彻底打乱平分的。区党委在运动中反复强调党的中农政策，要求保护中农利益，不搞“推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顺利发展。清丰县仅20天工夫即展开广大的群众土改运动，有组织的群众占全县70%以上。截至10月17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县12个区在清算和查减后，共获得土地40889亩（死当地未在内），一般农民每人分得2至3亩土地。军工属每人分得3至5亩土地。到内战爆发时，全区1/2以上的地区〔包括三分区丰县、沛县、沛（县）铜（山）、华山、砀山、成武、巨（野）南、鱼台、单县、金乡、单（县）虞（城）县，一分区的泰安、肥城、平阴县，二分区的东平、郓城，五分区的定陶、复程县，四分区的滑县、清丰、南乐，六分区的茌平、博平县，七分区的嘉祥、济宁县〕已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经过贯彻“五四”指示，实行土地改革，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地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土地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贫苦农民开始翻身做了主人。如博平县周桥村，全村176户，802口人，2139亩地。土地改革前，6户地主占全村土地12.2%，依权仗势剥削和欺压百姓，村民大多数无法生活，不少人相率逃亡。各阶层的状况如下：

阶层	地 主			富裕中农			中 农			贫 农			赤 贫			合 计		
类别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数目	6	29	260	8	34	169	94	464	1368	64	215	315	22	60	28	176	802	2139
百分比	3.4	3.8	12.1	4.5	4.2	7.9	53.4	57.8	64.1	26.1	26.8	14.6	12.5	2.4	1.3			

在群众性土地改革翻身斗争中，伪乡长王保如4口人，地35亩，给其留地9亩；伪保长周国范3口人，地27亩，给其留地12亩；伪副区长周广善9口人，地33亩，给其留地26亩；伪副团长张高玉全家逃走，地15亩，留与其叔3亩；地主周传诗6口人，地95亩，献出70亩；地主周传训9口人，地100亩，献出60亩。农民共得土地178亩，粮食16300斤，牛1头，柏树7棵。

土地改革后，周桥村消灭了地主，12户赤贫和25户贫农上升为中农。各种群众组织飞速发展，农会会员达210名，妇会会员达190名，儿童团员90名，姊妹团员40名，共530名，占全村人口的67%以上。土地改革后各阶层的变化如下：

阶 层	富裕中农			中 农			贫 农			合 计		
类 别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数 目	14	44	267	112	530	1560	50	228	366	176	802	2139
百分比	8	5.5	12.5	63.6	66	70.4	28.4	28.4	17			

(二) 全面展开土改运动,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冀鲁豫解放区,紧急的战争形势,使全区土地改革一度停顿下来。区党委决定组成黄河南、北两套班子,全力进行战勤、扩兵和游击战争。黄河以南地区要坚持斗争,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口号,紧紧依靠基本群众,组织民兵、武工队、游击队,控制农村阵地,坚持对敌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利益。但是,战争之初的几个月中出现的担架逃亡、群众情绪低落等事实证明:停止或延缓土改,单纯搞战勤、扩兵和游击战争,只向群众索取,而不给予广大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不能持久的。区党委吸取这一教训,使战争和土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全区全面展开土改运动。9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决定公开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在地主已大部清算但土地问题尚未解决的地区开展填平补齐运动,以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由于战争形势紧急,冀鲁豫全区除少部分地区贯彻执行中央局指示外,多数地区在10月、11月土改进展迟缓。11月冀鲁豫区党委对全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在《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准备游击战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不管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或正在准备游击战争的地区,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上要下决心,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或停止进行。在中心区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立即进行;已进行而不彻底的,应立即进行翻身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在游击区,视具体情况,第一步稳定群众,坚持游击战,保持群众优势;第二步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12月10日,区党委又发出《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民运工作会议,总结部署土改工作。会议肯定了战争开始以来群众运动取得的成绩,也检查了前段没有结合战争大力进行土地改革的失误,批评了一度不敢放手给农民土地的右倾情绪,决定了全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立即坚决贯彻土地改革,填平补齐,充分发动群众,结合战

争任务，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要求在土改中依法使用行政力量，逮捕、拘留、镇压地主、恶霸，解除群众顾虑；大胆使用积极分子；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封建剥削和压迫，实行耕者有其田。在非游击区，备战、参战与土地改革结合，深入开展翻身检查，进行填平补齐，做到不漏一口人，不漏一亩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新收复区，以复仇、保田、反倒算贯彻土改精神。在游击区和边缘区，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组织联防，前边警戒，后边分田、保田，步步向前推进；游击区中已进行土改的地方，亦实行填平补齐。在黄河以南，使游击战争与土改结合，在“反倒算，保田、保粮、保命”的口号下，形成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号召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放下旧思想、旧圈子，吸收新经验、新创造，除游击区外，争取1947年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以更好地支援前线^①。会后，《冀鲁豫日报》发表题为《打破土地还家中的障碍》的社论，指出：老区土改尚有空白和死角，地主阶级在经济上还未被彻底摧毁，斗争果实分配也不尽合理。号召各地向阳谷、河西、济（宁）北、观城等县学习，在战斗中领导农民搞好土地还家运动。冀鲁豫行署并于2月1日发布布告，对土地改革中若干政策做了具体规定：没收敌伪公地、大汉奸土地及地主匿报的“黑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贫苦的军、工、烈属。贫苦农民有权清算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收回被占去的土地，但不得连带清算地主之工商业。开明地主及革命军人、干部家属自愿献地者，对其生活给予适当的照顾。中农土地不得侵犯。祠堂、庙宇、教会、学田等公有耕地及公山、公荒、湖田、官地，根据当地公议分给农民，要保留社会福利事业所用土地。富农土地一般不予清算。禁止侵犯在减租减息后勤劳发家的新型富农土地。对清算的地主，酌留相当于中农的土地，农具、耕畜应保留一部分。农民分得土地即归农民所有，地主必须

^①参见潘复生1947年1月20日《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交出旧契，当众焚烧，并由当地县、市政府发给农民官契，以确定其所有权。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各地运用政权的力量，将地主集中拘押，培训大批贫雇农骨干和土改积极分子回村发动群众。区党委推广了阳谷县召开农民大会的作法和经验，以区为单位召开几千人、几万人的农民大会，讲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态度，然后分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齐行动，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在边缘区，区党委推广了河西县组织民兵联防“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经验。与此同时，边区野战部队也抽调干部组成翻身大队，分赴巨野、嘉祥、金乡、成武等县帮助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因此，全区形成了空前的土地改革高潮。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区党委则强调提高农民群众政治翻身和土地改革的自觉性，在运动中建立和扩大农会、妇会、民兵等群众组织，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进行阶级教育和民主教育，巩固土改的成果。

由于冀鲁豫全区土地改革处在复杂的战争形势下，其开展的时间、作法和进度，在黄河南、北各地都有所不同。在黄河北地区：除游击战争的部分区域和少数已解决土地问题的老区外，大多数地区转入翻身大检查 and 填平补齐运动。发动群众深入查田、查阶级，清查遗漏、隐瞒、假卖假分和干部包庇等现象，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等公开财产和埋藏在地下的现金、衣物等追出，重新填补分配给贫苦农民；先将地主“扫地出门”，再经民主评议给其生活出路以示宽大。对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在前段土改中占取果实过多的部分，采取思想教育、争取主动坦白、群众批评与纪律处分相结合等多种方法，令其退出，分给贫苦农民；少数拒不退出者，给予党政纪律处分或撤销职务。对一些土地过少的贫困村，采取贫富合村、贫富村联合斗争的方法，平分土地，做到消灭赤贫和贫农。在运动中，坚决执行“中间不动两头动”的方针，不搞绝对的推平，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少补地、房少补房，做到填平补齐。翻身大检查 and 填平补齐运动，打破了前一段只按有无租息、债务等纠纷问题清算土地的办法，公开提出“分田分财，填平补齐，少啥分

啥，穷多富少，彻底消灭封建地主的政策”^①，解决了对地主照顾过多和未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问题。同时，纠正了认为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有功劳应该多分果实的作法，以及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占有公地，没收汉奸地，借种地等侵占群众利益的作法，将退出的土地和财物全部交还群众重新分配。因此，这一运动是更深入、更广泛的土地改革，不单是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对于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也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和民主教育，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在黄河南地区，由于敌人进犯后，反动地主复辟、倒算，前段土地改革的成果丧失，因此，随着野战军作战的胜利和游击战争的开展，这一地区坚持了土地改革。根据黄河南各地具体情况，区党委进行了分类指导。在经过开展游击战争被重新控制的游击根据地（多数是原来的老区），区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及时提出从反倒算、反奸复仇入手深入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方针，各地迅速建立和恢复基层组织，严厉镇压和打击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的反动地主，收回被他们倒算去的田产、粮食。在此基础上，组织民兵武装，一面准备游击战争，一面开展翻身大检查、填平补齐，深入进行土地改革。在敌我拉锯的游击区，由于争夺激烈，土地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土地改革相结合，土地改革在武装斗争的掩护下进行，以小部队或武工队代表人民政府镇压反攻倒算的反动地主和坏分子，控制地主和保甲长，召开基本群众会议，表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态度，并强迫地主与农民订约保证不进行报复。在与敌占区接壤的边沿地区，有些地方在党委、武委会的领导下，建立起村与村之间的民兵联防，配合县基干大队、武工队，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把土地改革和反奸防特结合起来，一面打击敌人的进犯，一面掩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1月至2月，在巨（野）金（乡）鱼（台）和豫皖边战役期间，黄河南大部分地区被

①张霖之：《在冀鲁豫区党委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1947年5月17日。

收复。在区党委领导下，第二、三、五、七地委抓紧有利时机，迅速在收复区展开复仇反倒算运动，分田分粮，形成了游击战争区域土地改革的一次高潮。后来地区虽再度拉锯，被敌暂时占领过，但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全面地推开了。实践证明，在游击战争区域进行土地改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一定的机动武装，能消灭敌人的地方团队和还乡团武装，使敌人政权不能确立；二是必须运用民兵和地方武装，结合村党支部，领导农民控制住反动地主和坏分子，牢固地掌握农村阵地。否则，即使强令推行土地改革，成果也不能巩固，甚至会给基本群众招来重大损失。

经过五个月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冀鲁豫全区除少数游击区和边沿区外，约占 $2/3$ 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黄河以南39个县有30个县初步实行了土地改革或正在实行土地改革，一部分地区开始转入翻身大检查和填平补齐运动。在这些地区，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广大农民从几千年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但是由于在运动指导上较多地强调了反对右倾思想，而对“左”的苗头警惕和纠正不够，如强调中农献田，追浮财伤及地主的工商业，以及在游击区和边沿区少数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也推行分田分粮等。这些“左”的东西在尔后土改复查中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1947年4月下旬，冀鲁豫区党委在向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中，总结了全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经验：（1）实行土改，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必须在党内党外进行教育和斗争，求得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才能彻底完成土改，把群众发动起来。（2）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像千斤石头压在农民身上。政府要给农民撑腰，给地主以压力，让农民站起来大胆斗争。（3）以区为单位，召开各村赤贫、贫农、中农大会，每区几千人、万人不等，讲明政策及态度，会后分村斗争，

加强村党支部的具体领导。各村一齐斗，群众胆壮，互相鼓励，很快轰开局面。（4）分配斗争果实根据填平补齐精神，贫多富少，少啥给啥；积极分子不能有经济上的特殊，可以搞立功表扬。（5）不能把包括中农在内打乱平分当作我们的政策，必须明确中间不动两头动、不斗争中农的政策，来实现组织农民大多数，巩固农村优势。（6）充分发动妇女，才有农民大多数，才能彻底摧毁封建统治，并把妇女动员到生产战线上去。（7）土改中要加强党支部建设，才能使土改彻底，实现对农民的直接领导。

（三）边区土改复查运动的成绩和“左”的错误偏向。1947年5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总结五个月来边区的土改运动，布置下半年土改复查工作。会议认为，广大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及一部分浮财，打垮了封建势力，群众翻了身，可是，运动还没有深入下去，土地改革仍不彻底，地主封建势力还在利用合法与非合法的各种手段在阻挠这一运动的发展。指出：必须发动农民的大多数进行复查，才能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获得解放。张霖之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肯定了五个月来土地改革运动的巨大成绩和主要经验，提出了土改复查工作的方针和要求：要面向地主，清查地主阶级隐藏的土地、浮财、组织（地主掌握的假农会），把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彻底消灭，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孤立起来。经过复查，继续以填平补齐的精神分配果实，改善干群关系，联合中农，发动妇女，求得进一步充分普遍发动群众。会后，区党委于6月24日发出《关于彻底复查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放手给群众撑腰，走群众路线，树立和加强贫农领导骨干，联合中农，同地主进行斗争，坚决执行填平补齐，公平合理地分配果实。在区党委领导下，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的老区、半老区各地委先后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各县召开干部大会、积极分子大会、贫农大会、贫农和中农联合大会，举办老干部、党员培训班，贯彻上述土改复查工作精神。这样，迅速在老区、半老区普遍地掀起土改复查的高潮。各地土改复查工作，一般

经过了以下五个步骤：第一步，教育老村干部放下思想包袱，退出多占、贪污的果实；第二步，充分发动贫农，成立领导复查的贫农组织（有贫农小组、贫农委员会、贫农复查团等名称）；第三步，划阶级，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并将贫农和中农加以区分；第四步，以贫农为领导骨干，联合中农，从经济上、政治上清查地主、富农，解决部分村庄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第五步，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分配清查出的土地、农具和浮财等果实。在区党委领导下，黄河南、北土改复查运动均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解决一些地区土地改革中的不彻底问题和消灭封建残余势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区党委对土改不彻底的情况估计过重，对老区、半老区和游击区、边沿区的不同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加之崇拜农民的自发性，传播了“中不中，问贫农”的片面性口号，甚至规定农村党支部必须服从贫农组织的意见，削弱了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在复查中“左”的偏向严重发展。有的将地主“扫地出门”而不给生活出路，有的给富农留坏地，甚至发生一些乱打、乱杀的现象；划分阶级成份普遍偏高，一些中农被错划、错斗，如阳谷县11个村588户中农，有257户被错斗，占中农的43.7%；一些地方斗争工商业者，有的在追地主浮财中把其工商业也没收分配了。

（四）纠正“左”的错误，端正政策，结束土地改革。在冀鲁豫区土改复查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1947年10月，区党委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的潘复生、张承先、万里、郭超等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①，致函张玺、徐运北、刘晏春、申云甫，提出“复查运

① 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晋冀鲁豫中央局土地会议于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在河北省武安县冶陶召开，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发动与会人员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批判地主富农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整顿党的队伍。

动一般的停止（新区除外）”。据此，老区、半老区土改复查工作结束。从1948年1月中旬起，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冶陶会议精神，分期分批在县团以上干部、区以上干部中开展了整党运动，发动干部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重点批判地主富农思想。这次整党对提高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一度发生了“左”的错误，形成了思想批判过火、组织处理面过宽过重的偏向，大约有43.6%左右的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党内处分^①。

为指导全党及时纠正土改和整党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土改和整党的政策作了纲领性说明。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要求认真进行纠偏工作。1948年2月1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规定在占全区2/3以上的斗争彻底或基本彻底的一、二类地区，不再进行平分土地，只进行抽补调剂，填平补齐，也不再组织贫农团和贫农小组，对干部中的问题在填平补齐中结合整党加以解决；在土改不彻底的三类地区，按《土地法大纲》执行。2月和4月间，中央局又两次召开区党委书记会议，明确提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研究确定了纠偏的具体措施。据此，冀鲁豫区党委从1948年2月中旬起开始检查纠正“左”的偏向和错误。3月，冀鲁豫区党委针对各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对土改和整党提出了不同要求。黄河南地区的土改，依据我占优势或敌占优势地区，恢复区或边沿区、新区等，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如

^①据1948年10月24日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写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整党复议总结报告》，依据一期整党统计，参加整党的干部7927人，受处分的3464人，占43.6%，其中开除党籍的1039人，占受处分人数的13%。1948年4月以后，这些问题即逐步得到了纠正。

经过反倒算、反报复、反抓丁、反抢粮、恢复阵地、巩固既得阵地、建立新秩序等，逐步过渡到平分土地。在黄河北老区，一般不再重搞平分土地，只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抽肥补瘦的办法，调剂土地和生产资料。此后，冀鲁豫区步入了结束土改的阶段。与此同时，老区、半老区农村的整党相继开展。为取得农村整党和端正土改复查政策的经验，区党委和各地委都组织工作团进行试点工作，总结经验，使农村的整党得以健康地开展。

1948年4月间，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局关于纠“左”的指示和精神，明确指出：下一步工作方针是以组织群众生产为中心，宣传政策，解除群众顾虑，具体纠正土改、整党政策上的错误，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时注意纠正正在纠偏中将原村组织干部一脚踢开的错误做法。会后，在全区开始全面端正政策和纠偏工作。5月中旬，区党委和行署召开工商座谈会，贯彻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纠正工商业中“左”倾错误的决定。各地对工商业者一律不搞清算斗争，对土改复查中受到损害的工商业进行退还和补偿，纠正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统制、垄断和工人工资过高的做法，切实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对内贸易自由的政策。各地工商业者纷纷开业，逃亡商人相继返回。至8月间，濮阳店铺新增加332家，聊城工商业户由解放时的1069家增加到1249家，其他各城镇工商业户亦大多恢复和有所发展。与此同时，行署召开了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克服了在文化教育政策上以及对待知识分子上“左”的倾向。为补偿中农和安置地主、富农，中央局冀鲁豫工作团、冀鲁豫区党委工作团和各地委工作团认真开展了重点区、村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各地根据中央重新颁发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划分成份过高的作了甄别，重新划分了阶级。区党委又于6月间召开了重点区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指示，具体分析了黄河以北24个县的情况，认为地主阶级已基本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已不存在，贫雇农已得到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土地问题已基

本解决，决定在这些地方，不再提土改复查，也不再搞“抽补”土地，应以端正政策，恢复与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党与支援前线为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了土改转向生产的具体工作过程。会议强调提出：对错斗的中农和“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采取“坚决补偿安置”的方针。8月，区党委再次召开黄河以北县以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半老区端正政策、结束土改、完成整党工作的情况。经过公开纠偏，把各种“左”的错误在报纸上、文件上、会议上公开揭露，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干部、群众都发表意见，都能及时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各种“左”的错误比较快地得到了纠正，中农得到了补偿，地主、富农也有了生活出路，农村社会秩序安定了，许多逃亡人员被争取回来。据不完全统计，至4月间，二分区逃亡户返回183户，四分区返回3万多人；5月份，伪军伪组织人员自动返回的，东平县一、三、六、七区有300余人，泰西三、四、七区和平阴一区及肥城七区计有259人。到年底，黄河以北各县胜利实现了端正政策、结束土改、完成整党等任务，妥善解决了错斗户的补偿安置等遗留问题，树立了贫农优势，团结了中农和最大多数人，秋收、秋耕、秋种等农业生产也提高了一大步。

1948年底，行署发出《关于颁发土地证的指示》，在黄河以北土地问题已解决的地区，正式宣布了土改结束。土地证的颁发，最后地确定了各阶层一切男女老少的地权、财权，保障其不受侵犯，从而扫除了生产致富的思想障碍，使工作转移到团结生产上去。在黄河以南地区，9月下旬济南战役结束和大部分地区收复后，土改和整党工作迅速展开。根据华北局12月指示精神 and 黄河以北土改的经验教训，冀鲁豫区党委于1949年2月15日作出了具体政策规定，要求黄河以南地区在土地改革中更要十分慎重地区别对待，必须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但是必须将地主与富农、大中小地主以及恶霸与非恶霸地主加以区别，将反攻倒算的地主中的首要、重要、次要、胁从加以区别，将地富倒算与中农倒算加以区别，采取

分别对待的政策。在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黄河以北老区、半老区及黄河以南老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结束土改及其他工作围绕生产进行；在黄河南的半老区、新收复区，抓紧季节生产，搞好生产渡荒，土改工作也结合生产进行。到1949年8月，全区除黄河以南少数新区外，有2.4万个村庄结束了土地改革，约占全区村数的70%，有近1000万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至此，边区土改基本结束，全区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彻底变化，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土地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斗争中，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以贫农为领导骨干，团结中农，绝大多数农民参加了农会，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和民兵及文化团体也有很大发展。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将地主从经济上彻底消灭，而且从政治上彻底推翻，真正掌握了农村革命政权，发展了农民自己的武装，全区民兵达10万之众，共产党员达17万。从此，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统治被消灭，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巩固起来，广大贫苦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五）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生产热情高涨，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在土地改革运动的推动下，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他们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许多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全区军民决心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因此，不断涌现广大翻身农民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1946年8月蒋介石大举进攻冀鲁豫解放区时，在区党委号召下，不到一个月就有近2万人参军。肥城县二区区委书记石庆瑞、四区区委书记刘运生、五区区委书记刘肖林、七区区长赵亚刚等带头参军，全县仅20天时间报名参军达2000人。在群众性立功运动中，黄河以南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袭击敌人，一个月内共毙伤俘敌军及地主还乡团620余人，破坏桥梁3座，缴获汽车1部。南华县独立营副政委李本立率部在9天内取得了3次战斗胜

利，于菏泽城郊消灭菏泽县敌第四中队，毙俘敌中队长以下20多人，并破坏了敌人正在修建的耿海据点，被授予“对敌斗争模范”的称号。三分区李汝泰武工队于9月间建立，在半年内多次袭击敌人，俘敌70人；在集市、大会上宣传近300次，使10万余群众了解了形势，在40多个村庄领导群众反奸诉苦，倒地700多亩，倒粮6.7万余斤，枪毙还乡团28人；又在单县不少村庄参加土改，把土改与参军、整顿组织、发展党的工作结合起来，为三分区党政军机关返回湖西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武工队的典范”。1947年上半年，由于边区土改运动的广泛开展，有4万人参军，超过原计划3倍。昆吾、南乐、清丰、濮县等地5000余名妇女动员、欢送亲人报名参军，情景十分动人。阳谷县一次英雄大会上，有900名翻身分田模范坚决表示要再当翻身保田英雄，带头报名参军。在游击区，仅巨南、成武就有1500余人参加主力部队。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一个半月时间，由于土改复查的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又有5万青年参军。参军运动轰轰烈烈，“参加主力军，一齐下江南，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成为每个有志青年的豪言壮语。冀鲁豫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踊跃参战支前。1946年8月，边区野战军出击陇海路时，二、三、五地委出动1万余民兵随军破路，15.6万余名民工送粮送弹，抬担架，不畏艰险，随军作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各地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掀起了反攻杀敌的热潮。在野战军围攻郟城时，当地民兵在城南的石桥、徐垓、黄龙、引马一带建立了长达百里的联防线，村村设防，昼夜巡逻，不让一个敌兵漏网。7月9日，敌五十五军残部利用青纱帐潜逃，当地民兵和农民蜂拥而上，方圆10余华里杀声四起，将敌80余人全部擒获。整个战役中民兵和群众配合主力作战，取得了歼敌1500余人的战果。在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时，全区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全力支援大军渡河作战，修造木船120余只，组织训练水手1000余名，先后出动500多万人次民兵、民工，15万头次畜工，对保证渡河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据统

计，自1946年内战爆发到1948年8月，全区8个专区、51个县、209个区，除少数未出战勤的县、区以外，共担负战勤总人数达7263986人（壮年720580人），大牲畜374802头，大车184934辆。仅在25次重大战役中，民力负担（不包括治黄挖渠和村内勤务）民工折工为65176751个，畜力折工为6580586个，平均每个壮年出工90.4个，每头牲口出工12.5个。1948年11月间，在淮海战役中，广大军民响应“倾家荡产支援战争”的号召，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全力参战支前。数以万计的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风餐露宿，随军征战；老年、妇女、儿童在后方碾米磨面，赶做军鞋。全区共出动民工30余万人，牲口12万头，担架1万余付，大小车15万辆，运米1.05亿斤，几乎每村、每户、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了支前；并组成了几十万人的担架和运输队伍，跟随大军渡过长江，打到南京。许多人又直下云贵高原，在战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刘伯承司令员1948年12月给冀鲁豫人民的题词中写道：“冀鲁豫人民为完成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还是努力于支前工作，十分难得，特致敬佩。”

随着边区作为大战场局面的结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据1948年上半年黄河以南五分区4个县、三分区10个县、二分区2个县的统计，被抢走的牲口16775头，被抓未回壮丁22844人，被杀2436人，被烧房屋3285间，被抢粮食1613万余斤，被抢大车1764辆。加之水、旱、虫灾严重，城乡经济和生产受到极大破坏。1948年与战前比较，全区牲畜减少1/2，粮食总产下降1/3，猾子皮产量减少3/4，草帽辫产量减少94.5%，劳动力严重不足。为恢复发展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冀鲁豫行署于1949年1月下旬召开生产会议，制定了经济计划草案，决定大力恢复农副业生产，争取3年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会后，在农业方面，各地以组织劳动互助的办法，解决人力、畜力的不足，积极疏水防涝，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推广优良品种，并贷款70亿元（冀钞）扶植种100万亩花生，以解决榨油原料。在工业方面，于年初成立了冀鲁豫区实业公司，

统一了公营工厂的经营管理，并经过调整改组，新建了道口油厂、新乡油厂、平原机械厂和安阳振头火柴厂等公营工厂，从而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在税收和工商管理方面，在行署、专署、县三级成立了税务局，县以下成立了税务所，加强了工商行政管理，恢复了集市交易所。在金融方面，在加强农贷的同时，大力开展城市工商业存贷业务，至7月底，发放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的工业贷款552.5万元，商业贷款12690万元，冀鲁豫区供销社和各专、县级供销社也先后建立起来，有力地支持了城乡经济的恢复发展。这样，遭受战争破坏的城乡经济逐步得到复苏和发展。

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作出《关于成立各种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地委、县委选配干部，组织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青年工作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针。会后，在全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建团工作。到3月，区党委、地委、县委三级青年团筹委会全部成立，青年干部基本配齐。3月26日至29日，全区青年代表大会在菏泽市召开，民主选举葛步海、张大乙、洪学玉、史杰、黄明吾、梁步庭、铃风楼、王洪山、高桓（候补）等9人为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葛步海等17人、梁东峰等2人分别为区青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通过了《关于目前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与此同时，区党委于1月间召开分区以上妇女干部会议，总结全区妇女工作，明确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区党委又于2月5日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50人。会议历时8天，民主选举张秀岩、万丹如等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13名，候补代表2名；选举董文华、李曙明等出席华北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26名，候补代表2名；改选了冀鲁豫区妇女联合会领导机构，白林、范世钧等15人为区妇联会委员。4月上旬，冀鲁豫区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在菏泽召开，根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改选了冀鲁豫区职工总会，蒋中岳、李克东等9人为总会执委会委员，明确

了以发展生产为主的职工运动的方针，并选举了出席华北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从此，全区青年、妇女和广大职工，在青年团和青联会、妇联会、工会的带领下，投入了争取全国解放、建设边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1949年8月20日，冀鲁豫边区撤销，成立平原省。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冀鲁豫人民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6年8月第一次陇海战役起，至1949年4月支援渡江作战止，3年中，边区有10余万青年参加正规军；出动担架10余万付，大小车39.7万余辆，民工294.6万余人，牲口94.7万余头；民兵作战9435次，歼敌12636人；全区每年负担公粮6亿斤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公粮90余斤；还先后6批抽调上万名高中级和基层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冀鲁豫边区广大人民群众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

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社会改革的农民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统治和剥削下，农民过着贫苦和悲惨的生活。要动员农民群众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去，就要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为此，必须进行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与农民的迫切要求和客观利益相适应，使农民感到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及其维护这种利益的新制度而战。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和深入，广大群众必然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抗战期间，抗日斗争伴随着争取民主、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经济建设的斗争，包括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生产运动等民主民生的改革，这是发动人民抗日战争、打

败日本侵略者决定性的基本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①解放战争期间，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解放农民，“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②。在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中，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领导边区广大群众进行农村社会改革的伟大斗争，创造了一整套群众工作的体系、原则和方法，积累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是以创造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最后战胜敌人的。革命根据地是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革命军队的兵源和供给，支持战争的人力和物力，都要以根据地为来源，行军打仗也要以根据地为依托。没有革命根据地，革命战争就会陷入流寇主义而归于失败。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历史说明：创建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和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政权、人民群众组织，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又是互相配合的。在根据地巩固阶段，中心问题是发动群众，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形成人山人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978页。

②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同上，第1148页。

海。只要坚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论山地，还是平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都是可能的。正如罗荣桓所指出的：冀鲁豫平原虽无山地作屏障，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①没有群众的充分发动，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作依靠，衣食住行都无法解决，扩大武装、创造根据地、改造政权、培养干部、进行根据地建设以及粉碎敌人进攻等都会变为一句空话，即使有险峻的山川，也是无法生存和坚持的。冀鲁豫平原根据地的创建、曲折和胜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是否成功地发动了群众。在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由于没有及时地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广大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致使边区形势日益恶化，一直发展到1942年一些地区可以“一枪打透”的严重局面。1942年以后，由于边区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不断深入开展，充分发动和动员了广大群众，群众性游击战争广泛展开，边区形势迅速好转，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历史经验还证明：群众工作是实现党的路线和任务的保证，群众工作的任务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路线和任务。群众工作的成功与否，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有效地保证革命和战争的胜利。边区党组织在实践中认识了这个问题，并紧紧抓住了这个中心，在实现各项革命任务过程中，放手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提高了觉悟，充分发挥了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了边区平原根据地牢不可破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终于粉碎了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继而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二）要充分团结和发动群众，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执行中实事求是地纠正“左”的或右的偏向，完成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历史性任务。冀鲁豫广大的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

① 参见罗荣桓1939年8月在晋西区党委小安山会议上的讲话。

充分发动起来，从客观条件来说，是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广大的人民群众不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也不甘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牛做马。这是发动群众最广泛最深厚的政治基础。从主观条件来说，是冀鲁豫边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正确理论和路线，结合边区根据地斗争的具体实际，执行了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包括减租减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土地改革政策，等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要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照顾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又要保证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保证他们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边区党组织遵循这样的原则，在1942年秋总结一度忽视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教训后，就一直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改造区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在运动中，依靠贫农，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要地主减租减息，也要农民交租交息，争取地主合作抗日，而要打击的只是日本侵略者和极少数汉奸、恶霸。因此改善了雇佣贫农的生活，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又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一道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加强，调动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又比较及时、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老区实行分地分财、填平补齐、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政策；在新解放区，从反奸诉苦清算开始，充分发动农民土地还家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因此，全区形成了规模空前、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不仅从经济上、政治上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摧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使翻身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更加踊跃地投入到解放战争的狂涛巨澜之中。

实践证明，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要在执行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地纠正偏差，有右纠右，有“左”纠“左”，注意防止和解决“左”比右好的思想。这是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推动社会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冀鲁豫边区党组织在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社会

改革的12个年头里，在执行政策中曾出现过一次右的偏向、两次“左”的偏向，一经中共中央指出，区党委都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迅速地予以纠正。根据地创立时期，边区党组织认真宣传和组织群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群众普遍地发动起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由于认识不足，缺乏经验等原因，没有集中力量认真地、普遍地执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和法令，形成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右的偏向，结果，错过了两年有利时机，从主观上讲，成为造成1942年根据地严重危险的根本原因。1942年以后，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刘少奇的指示，坚决迅速地纠正了这种右的偏向，发动了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广大的民主民生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克服了“恩赐”观点和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错误做法，放手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1943年，一些地区又提出反“新贵”的错误口号，把一部分有缺点错误但尚属党内问题的干部一脚踢开或一棍子打死，一度影响了群众运动的发展^①。1944年，一些地区又出现了忽视党的领导，崇尚农民自发性，超越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范围而蛮干乱干的错误作法，如对地主、富农打击过重，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等。对这些“左”的偏向和错误作法，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邓小平在1945年6月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认真地及时地进行了纠正，保证了全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持续健康深入的发展。这是1942年后边区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不断深入，根据地比较快地得到恢复、巩固与扩大，形成强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个基本关键。这个经验说明，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有右纠右，有“左”纠“左”。“左”并不比右好，“左”与右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都是离开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终同样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共产党

^①参见张霖之：《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1945年1月。

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如何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无疑是正确的，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在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不“过正”就不能冲破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束缚，不“过正”就不能打破反动的统治制度和秩序，这种“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建立以后，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是根据需要与可能，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意见而制定出来的，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是与广大群众的眼前利益一致的。因此，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按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必须依法办事。群众运动中自发的超越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蛮干乱斗的“过正”、过左的偏向，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不利于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会搞乱革命的队伍。它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右的偏向一样，会严重危害社会的改革和人民战争的顺利进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①。

“过去某些‘左’的办法”，“是违反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于人民不利的，所以必须纠正。”^②在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区在土改复查和整党中，再一次出现了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忽视党的领导、超越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左”的错误偏向，提出“贫雇农坐天下”、“贫雇农说了算”的片面性口号。一些地方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伤害了部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局的正确指示下，冀鲁豫区党委于1948年3月至1949年上半年认真地进行了公开纠偏，对“左”的错误偏向不掩饰，不含糊，不只在党内、领导机关内和上层内讲讲了

①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73页。

② 同上，第122页。

事，而是在报刊上、文件上、会议上公开揭露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使干部引以为戒。同时，坚决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热情，正确地对待干部，正确地对待群众，以教育为目的，重在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只对少数确属违法乱纪的人才给以适当处分。这样，使全区土改和整党较快地端正了政策，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了，那种以为“左”比右好，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看法，完全是违背历史实际的，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根本原则的。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实事求是地纠正和防止偏差，既反对慢性病，又反对急性病；既反对右的错误偏向，又反对“左”的错误偏向，就一定能够领导广大群众把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持续健康地向前推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办好。

（三）要充分团结和发动群众，必须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原则和方法，注意培养群众领袖和表彰模范，发挥他们的表率作用。群众运动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基础上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走群众路线，贯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上来，使广大人民群众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使革命事业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的运动。冀鲁豫区党委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阶级路线及党的统一战线是一致的。走群众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树立基本群众优势，逐步削弱地主封建势力，又要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人士，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制度，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此，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当前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水平出发，用生动活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来解答人

们实际生活中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地抽象说教，而是给群众撑腰，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既要与群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又要善于用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样，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组织和发动起来，真正形成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运动，以实现伟大革命的目标。如果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从政策、指示出发，或只从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出发，去约束和限制群众，就会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错误。相反，如果由相信群众走到迷信群众的自发性，以为群众一切都是对的，以为群众能够自己制定政策，群众能够完全自己约束自己，就会忽视党的领导和理论的作用，犯放任自流、蛮干的尾巴主义错误。在长期斗争中，冀鲁豫区党委形成了贯彻这一科学领导原则的一套具体方法。如：坚持党政军民统一步调，做到工农商学兵一齐发动，男女老少一齐发动；注意调查研究，搞好试点，取得经验，由点到面推动运动。区党委调研室的政策研究工作和濮县、范县的经验及滑县经验等，都对指导全区群众运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深入基层，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共同生活，共同战斗，随时向群众学习，了解大多数群众的疾苦、要求和思想，同农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任务，针对农、工、妇、青、民兵和知识分子的不同特点，以尊重、关心和爱护的态度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经过访贫诉苦、群众酝酿和教育训练，提高干部群众的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群众启发领导，领导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这样不断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又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一步一步提高，形成统一的革命运动。召开好坏典型汇报座谈会，让群众自己表扬正确的，批评错误的，这样，优点与缺点公开了，取得共识，发扬与改正起来有更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加强村党支部

的核心领导，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建立农会及各种群众组织，从而及时形成群众自己的领袖，通过群众团体和领袖去掌握、推动群众运动，依靠大批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去团结、发动和带领群众前进，使群众在“动”中联合，由小“动”到大“动”，由小的联合到大的联合，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等等。由于边区党坚持了群众路线的领导原则和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将党的政策真正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冀鲁豫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残酷激烈的敌我斗争中经受了巨大的锻炼，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群众领袖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翻身诉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创造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经验的战斗英雄王克勤，英勇牺牲的东平抗日县长崔益平，越狱英雄罗少雄，被誉为“英雄村”的茌平县张楼村，以及范筑先、刘培桐、徐秋、黄白莹、杨静斋、李贞乾等，还有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哈里逊和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冀鲁豫协议会副委员长宫川英男。冀鲁豫区党委、行署还两次召开群英会，先后表彰了王五宝、孙风爱、王耀志、曹清泉、杨风珍、尹玉琢等267名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孔庆均、刘同纪、马学山、刘涛山、时念法、邱长印、王本、鲁振中等83名功臣模范人物。群众领袖和英雄模范是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中的灵魂和骨干，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伟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极大地激励着冀鲁豫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而奋发努力。充分发挥他们的桥梁、纽带和表率作用，群众运动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形成规模宏大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并表现出高度的思想、行动的统一和纪律性，较为容易地克服运动中某些错误和偏差。

（四）社会改革与发展生产紧密结合，是深入发动群众和巩固根据地的一个经常任务。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在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及时组织群众转入生产建设，在生产建设中继续解决好社会改革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既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又把群众运动提高到发展生产的新水平。这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地

位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巩固和壮大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创建边区根据地的12个年头里，从减租减息、民主民生、反奸清算到土地改革，边区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一步一步深化，边区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随着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展开，边区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于1944年迅速开展起来。经过1945年6月分局群众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明确地提出由民主民生运动转入生产运动的口号，使大生产运动在全区形成一个高潮，各种劳动力组织起来，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机关、部队、学校积极投入生产建设，因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很快得到好转，使基本群众优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巩固和加强，保证了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对日反攻作战的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区党委和行署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和查减运动的同时，展开1946年的大生产运动。短短10个多月，城乡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稳定了边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休养生息，全区初步医治了过去八年战争的严重创伤，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为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和全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实力。到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支前工作的结束，区党委和行署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基础上，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全区的首要任务，明确地提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争取三年恢复战前水平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繁荣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在全区形成了空前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因而使全区城乡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上更深刻地体验到跟着共产党走的光明前景。边区群众运动的这一经验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改革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是不断深入群众运动的一个关键性课题。生产建设是深入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项基本要求，只有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才能进一步表明社会改革的进步意义。在社会改革的各个阶段，必须注意

与生产建设密切结合，并要随着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发展和农事季节及时地领导群众转入生产建设。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反奸诉苦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以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这就为转入生产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必须从生产建设上来解决，使群众在经济上稳定持续地上升，才能够不断地提高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热忱，巩固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巩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反之，社会改革如果不与生产建设相联系，不与生产建设相结合，不及时地领导群众抓紧生产建设，群众运动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而陷入迷途，社会改革的成果也难予巩固。

(五)为了广泛团结和发动群众，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军政民密切配合。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把群众的认识逐步提高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的水平，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冀鲁豫区党委为使边区群众运动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宏大的运动，十分注意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地位，发挥群众团体的力量，在农村和各基层单位逐步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和民兵等基本的群众团体，教员、学生、儿童、作家、记者、商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团体以及宗教团体，也先后建立起来。农会成为人数最多、最有权威的群众组织，民兵等武装团体成为群众组织的中坚。这些群众团体，既有统一的领导机关联合会，又有独立的组织系统、特殊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在动员、组织农民群众和各阶层人民参加武装斗争和进行农村的各项改革中起着主角的作用。

实践经验证明，只有依靠群众团体的力量，而不是把群众团体当做摆设或附属物，不包办代替群众团体的职能，广大群众才会把群众团体看成是自己的组织，才能真正把广大农民群众和各阶层人

民组织和发动起来，各个村庄才能建设成为在党支部领导下的战斗堡垒，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成为摧不垮打不烂的伟大力量。为此，首先，区党委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必须始终把群众工作作为经常的主要工作任务，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边区党组织十分强调全党做群众工作，要求党员必须参加群众团体，生活在群众里面，党支部、党员必须从反敌伪、恶霸的斗争中，从执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法令，改善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的核心。同时，特别注意不断改善和加强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1938年中共冀鲁豫省委成立之初就设有民运部，以后边区各级党委长期设有民运部或民运委员会、青委和妇委，各群众团体内设有党团组织。实行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为了发挥群众团体的积极性，尊重其独立性，撤销了区党委以下各级民运部，改设民运工作委员会，由各级党委的常委和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书记，负责关于民众运动的方针、原则和政策的领导。并规定：民运工作委员会对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是“指导关系”，它的一切决定“交由各教会党团通过公开系统实现”，“不能干涉各教会的日常工作”^①，从而加强了各级党委对民运工作的领导。1944年起，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和根据地的扩大，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了对群众团体的组织领导关系。在县以上各级党委设民众运动委员会（简称民委会），专门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研究与决定群众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某些重大原则问题。区党委设青委会与妇委会，在区党委领导下专门研究边区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时总结经验。同时，要求群众团体内的党员和团员，“要无条件的执行同级党委决定，一切关于工作的重要决定，一定要经过党委的核准方能发出，不得同党闹独立性”^②。第

①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决定》，1943年7月18日。

②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团体领导关系与组织的决定》，1944年2月20日。

二，区党委十分注意群众团体的自身建设，要求搞好群众团体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指出：群众团体是群众自己的自愿的组织，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各团体在性质和任务上有差异，各有独立的组织和领导系统，但总的任务都是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团结、组织与教育广大群众，领导广大群众参加根据地各项斗争和建设；健全组织和民主制度，是改善群众团体领导的重要环节。在区党委领导下，边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民兵和文化界等各个群众团体都制定了章程，规定了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而且建立了边区各群众团体统一的各级联合领导机构。各群众团体内部的一切重要问题都经过一定组织的决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一经决定，每个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群众团体的干部要自觉地代表群众利益，站稳立场，深入下层，深入群众，深入工作，为群众解决困难。各群众团体均把工作重点放在村级和基层，大力健全村会和基层组织领导，广泛开展创造模范村的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落实到最基层，因而使群众团体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自己的和自愿的组织，成为保证边区群众运动健康深入发展的中坚。第三，冀鲁豫区党委反复强调：群众团体、政府和军队必须密切配合。指出最广泛地团结和发动群众，不单是群众团体的事情，必须在党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政府、军队等各部门紧密合作，各自尽最大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群众团体和干部要爱护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和各项制度，要开展拥军优属运动，积极参军参战支前；政府和军队要积极扶植和保护群众运动，政府和干部不能站在群众运动之外袖手旁观或作“调解人”，也不能站在群众运动之上强迫命令或恩赐、包办，必须站在群众运动之中，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用法令和政权的力量扶植和保护基本群众的利益，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从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军队要支持和参加群众运动，开展拥政爱民和大生产运动，爱护人民，减轻群众负担。这些作法和措施，逐步在全区形成了党统一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政府、军队密切配合的群众工作

体系。在群众运动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政府和军队受到了锻炼，不仅促进了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大大密切了军政民关系，加强了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和人民武装建设，保证了各项支援战争任务的圆满完成。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有许多“堡垒村”、“堡垒户”，有许多老大爷、老大娘、妇女和儿童，舍身保护自己的干部和战士。如黄河南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进犯，反复清剿，环境非常险恶。为了控制和巩固农村阵地，1948年，南旺县一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团分为4个小组分散活动，敌人不来时作群众工作，敌人来时隐蔽在群众当中坚持斗争。有一天，在大杜村坚持斗争的董星、贾林两位女干部，在高粱地里化装时被敌军骑兵排长抓住，她们乘敌不备将敌排长击毙，跑到附近大张村老百姓家里。这个情景在地里干活的人都看到了，但当敌人包围村庄威逼群众交出人来时，全村群众谁也不肯吐露一个字。这些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就是在群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鱼水情”的突出表现。

总之，冀鲁豫区党委在领导根据地群众运动中比较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了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们始终注意放手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和武装群众；在发动群众斗争中，及时注意整顿和健全群众组织；在完成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任务之后，及时将重心转入群众的政治教育，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掌握民主政权和发展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自觉地参加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纳入统一战线范围之内，即约束在现阶段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范围之内；注意在一个大的经济、政治斗争任务完成之后，及时引导群众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因此，根据地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逐步把群众提高到自为的阶段，保卫了群众既得的利益，巩固了根据地，实现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辉使命。党的领导是边区群众运动健康发展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和冀鲁豫根据地。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制定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边区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军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冀鲁豫广大群众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做的贡献，将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冀鲁豫边区党组织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执行党的社会改革政策，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

工人运动简况

方明^①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和巩固起来的，对整个抗日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工农业落后，文化落后，矿山、工厂极少，产业工人数量亦较小。农村中的工人主要是雇工和手工业工人。全边区人口约2000万人左右，农村工人约计100万左右，与产业工人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相比是非常分散的。

冀鲁豫边区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坚定地站在战争的最前沿，在参军参战参政、生产支前、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冀鲁豫边区的工人运动，在抗战时期始终是以武装为中心任务，初期是宣传动员和发动组织时期。这时鲁西地区和原冀鲁豫地区尚未合并，两地区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广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批铁路工人和兵工工人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参加了抗日活动。1938年津浦铁路破坏大队刘志明(共产党员)分队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平原——禹城间破坏敌人铁路。从江南铁路回河北原籍的工务人员程书法等人，受到抗日热情的鼓舞，在聊城参加了刘志明分队，积极参加了破坏铁路的抗日活动。同年5月，胶济铁路济南机务段地下党员房星奎宣传动员组织了20多名铁路工人，建立胶济铁路破坏大队第一区队第一分队，由张怀珍任分队长。这个分队经介绍到鲁西配合八路军十支队机枪营开展

^①今名方玉亭。

破路抗日活动，在张夏——崮山两站间弯道下坡地段卸掉钢轨螺丝10余节。黎明前，敌一运兵列车由北向南运行至卸轨地段，机车和十几节车厢翻滚到路基下面，造成日军的惨重伤亡，对当时保卫大武汉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这两个分队都编入八路军。当时鲁西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救会的组织先于工会组织，农村工人都是参加到农会里起先锋、骨干作用。由于工会组织尚未建立，因而还不能发挥工会独立领导工人运动的作用。

1938年5月，我党以爱国人士范筑先为名誉校长，在聊城创办有名的聊城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是曲阜三师校长张郁光，教务长是齐燕铭，讲师多是我党领导同志。学员编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有4个分队。在第一中队中特编了一个铁路工人分队，有27名铁路工人参加。他们在那里学懂了不少的革命道理，出校后成为鲁西工人运动的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军占领山东省会济南和铁路沿线城市之后，一些铁路和兵工工人在“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下，从城市转入农村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但当时尚没有与鲁西广大农村工人活动结合起来。特别是聊城失守后，形势紊乱，顽固分子对群众团体进行攻击破坏，有的县群团组织被顽固分子直接解散了，群众运动处于暂时消沉时期。

1940年鲁西区党委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上下结合，一齐发动，村、区、县工人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为成立鲁西总工会打下了群众基础。经过积极筹备，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中心区×县召开了鲁西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鲁西工人抗日救国总会。大会选出了以王震宇同志为主任委员的常委会和执委会，产生了鲁西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鲁西工人运动出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的新局面。

1940年8月，王震宇同志随鲁西各界代表团到鲁南临沂青驼寺，参加了山东省各界救亡团体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省工会执行委员。会后山东分局派干部到鲁西，加强对工会的领导，推动了鲁西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发展和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

用。

在鲁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经过我党领导下的战委会和工人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发动，并利用国民党的动委会进行号召，原冀鲁豫边区的工运工作也得到逐步深入。首先，是利用各种形式训练大批工会干部，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抗日，动员工人参军参战，扩大了四支队和八路军队伍，组织了工人自卫队，广泛展开了群众性的对敌武装斗争；结合武装斗争中心任务，开展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保护和生活，提高工人地位和抗战热忱，积极参加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对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央决定，1941年7月原冀鲁豫和鲁西两地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两个区的工人抗日救国总会亦随之合并为冀鲁豫边区工人抗日救国总会。当时冀鲁豫边区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敌我形势是紧张、尖锐和残酷的。在这种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边区工人阶级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击战。

1941年11月，在冀鲁豫区党委指示下，边区工会召开了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议。王震宇主持了会议，宣传部长高光宇代表总会作冀鲁豫边区工运任务的报告。会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总会组织了工作组到各分会帮助工作，推动各级工会组织开展了以对敌武装斗争为中心，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劳动保护和生活，贯彻边区政府颁布的《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各项工作。为了实现上述工运的任务，总工会领导抓住提拔培训工会干部这一关键环节。总工会工作组帮助各分会对各县、区工会干部轮训一遍，县、区干部回去后又对村会干部采取不脱产的短期轮训班的方式进行培养训练，提高了工会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对新干部的大量提拔，主要是通过各种斗争。从斗争中提拔的干部有其坚定性、积极性，与工会会员亦有较密切联系。

认真贯彻执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制定的，其中贯

穿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适当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是其中心内容。因为工人工资太少，生活太苦，地位太低，要发动工人起来抗日，必须提高其工资，改善其生活，不然是动员不起来的。农村一个雇工劳动一年，工资还拿不到200市斤粮食，根本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在提高工资斗争中，由200斤提高到400斤，这是雇主能负担得起的。在进行提高工资斗争前，先向雇工进行阶级教育，破除“穷人命不好，命中该受穷”的宿命论思想，进一步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提高了雇工的阶级觉悟。在提高工资的斗争中，也有个别地方发生了提得过高过左的情况，有的提高到600斤，雇主家来客时，雇工要坐上席做陪客等，发现后及时给以纠正。

提高工资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紧跟上进行武装斗争的教育，动员工人积极带头参加民兵、模范班，组织工人自卫队参加八路军，以武装抗日和武装保卫斗争胜利果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巩固工人群众的战斗情绪。在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基础上，积极动员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掀起了参军热潮。

边区的工人运动是怎样发动组织起来的呢？

开展边区工人运动的方式是上下结合，点面结合，改善生活与参加抗战结合。领导机关开会，发文告，一般号召，主要的还是靠组织干部深入基层到村里去，到工人群众中去，以点带面，所谓“一村开花一片红，朵朵红花开遍城”。首先选择一个影响力大的自然村，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和做好积极分子的工作，他们以一传十、十传百的串连活动，把全村的工人组织起来，做好斗争前的准备工作，向雇主进行算帐说理斗争，宣讲人民政府颁布的《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最后由区人民政府撑腰，务求必胜。喜讯传开，村村都动，最后普遍全城。边区的工人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组织起来的。

在各级党委和边区总工会的领导下，边区建立了7个分会、40多个县工会、200多个区工会，乡、村工会更是普遍，会员60多万，在国防和国营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兵工工会和军工工会20

多个，报社、银行、书店印刷工会3个，织布厂50多个，造纸厂30多个，卷烟厂十几个。这些企业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支援前线，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等。在工会的宣传组织下，工人积极性非常高涨，对军工生产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微山湖、南四湖、东平湖等湖区建立了渔业工会，进行了反渔霸斗争，提高了渔民的觉悟和积极性，利用湖区优势与敌人展开水上游击战。

冀鲁豫边区的工人运动，完全是在战争时代发展巩固壮大起来的，在发动工人抗日、支援前线、巩固根据地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认真回忆与借鉴。

第一，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是边区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边区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工会工作，工救会的工作由各级民委会专人分工负责，这样，既有专人分工负责，又加强了民委会的集体领导。这一决定确实加强了边区工人运动的领导，保证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二，工会工作是群众工作，是党与工人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广大工会干部必须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关心工人的生活，使他们不断增加经济收入，逐步改善工人的生活。只有抓住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提高和巩固工人群众的抗战热情，才能推动职工运动继续发展。这是边区工人运动中的一条可贵经验。同时，工人运动亦是整个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组织必须与其他群众团体密切配合，互相协作，相互支援，特别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更要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工人阶级才能起到模范、骨干、带头作用。

第三，加强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培养训练，是开展边区工人运动的关键。没有受过培养训练的广大工会干部和热心工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工人运动是开展不起来的，党的工运方针也是贯彻不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边区工运工作的初期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缺乏

计划性，缺乏原则性，也没有注意干部质量，有的干部不能开展工作，使工会威信受到损失。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后，重视加强了这一工作，提高了工会干部的质量和数量，从而使工运工作有了新的的发展。

边区工人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也有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和缺点。如有的工会干部认为在工会工人中发展党的力量是党的组织部门的事，不是工会本身党组织的任务。有的放松了在农村工人中发展党的力量，削弱了党组织的工人成份，造成党组织中的工人成份比例很少，党的战斗力也就受到影响。在提高工资斗争中，有的地方曾出现过左过高的要求，影响了雇主与雇工间的关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是不利的。

冀鲁豫边区妇女运动概况

范世均

一、抗日烽火中的冀鲁豫妇女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7月29日、30日，日军相继攻陷平津，从8月起，开始了对华北的全面进攻，华北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县城岌岌可危。冀鲁豫黄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要员大部抢渡黄河南撤，各地陷于一片混乱。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组织部发布《妇女工作大纲》，提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的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为总的目标，并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妇女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和策略方法。

《大纲》还特别强调了“培养大批党的与群众的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是我们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党中央的决定为边区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妇女工作大纲》更为妇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奋斗目标。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妇女运动一直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开展的，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妇女运动的开创 (1937年7月至1940年5月)

这一阶段是边区妇女运动的开创时期，中心任务是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培训妇女干部，组建各级妇女组织，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 直南豫北的妇女运动

(1) 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妇女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1934年秋，陈少敏受中共河北省委的委派，以妇女代表名义到冀鲁豫沙区工作。她和沙区的妇女党员一起，启发妇女觉悟，组织妇女群众为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千口村的张栋，中化村的赵兰枝，马集的王爱花，化村的王秀芝、王山兰、王宪荣等妇女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动员和组织妇女的工作。1935年农历正月十三向清丰县教堂斗争的胜利，给群众以极大鼓舞，并为开展妇女工作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37年冬，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地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1938年2月，清南大抗日救国会在清丰梁村成立。总负责人为马彩三，组织部长李升阁，宣传部长刘焯，青年部长刘信善，妇女部长刘翠琴。除各部外，还设有巡视员经常分赴农村，对基层救国会进行具体指导，同时还举办了各种短期培训班（农、青、妇）培训骨干。至1938年秋冬，除少数死角外，几乎村村都建立了救国会。救国会领导下的农、青、妇、儿童团、姐妹团、自卫队和游击小组蓬勃开展。5月，清丰县成立了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晁哲甫任名誉会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武装、锄奸、青年、妇女、农民等部。妇女部长是丁素珍、付秀香，工作人员有刘清霜、卢凤香、吴莲茹、张雅林、刘桂森等。

此时期直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也由秘密走向公开，取得了合法地位，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直南特委在

清丰县六塔集召开各县救国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总会章程和宣言，选举安法乾为总会负责人。总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儿童、武装等6个部，妇女部长杨均。1938年8月，总会迁至濮阳城内，杨均调离，陈友菊接任妇女部长。10月，陈友菊调地委工作，范世钧接任妇女部长。

1938年8月，鲁西南抗日救国会成立。在总会领导下，曹县、菏泽、考城等县相继建立了农教会、青教会、妇教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1938年冬，直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生、妇教会等系列组织”的精神，决定边区妇教会、农教会均单独成立组织，由边区抗日救国总会负责筹建并主持召开边区妇女与农民代表大会。

1938年12月，边区妇女与农民代表大会在濮阳城内国民党专员公署大礼堂召开。国民党专员丁树本到会讲话，表示凡是抗日的他都欢迎。安法乾代表抗日救国总会讲话。大会选举姚恒光为农教总会主任，付秀香、范世钧为妇教总会正、副主任。大会结束后，到会代表300多人在濮阳城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影响遍及全城并迅速传播到各个县、区。

1939年春，妇教总会成立3个部：组织部长申超臣，宣传部长申戈军，生活改善部长申超臣兼、副部长张巧凤。妇教总会的领导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认为边区抗日斗争在群众发动方面已出现了高潮。在上级党委连续大批地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的推动下，壮大了群众力量，大部分地区的村妇教会已普遍成立，抗日救国热情极为高涨。农会主任、进步村长、党员、积极分子都动员自己的母亲、妻子带领中青年妇女走出家门，冲破“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中老年妇女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行人，抓汉奸，精神大振，面貌一新。农村妇女抗日救国运动已出现了崭

新的局面，抗日歌声响彻云天。会议最后还明确了妇救总会的任务：①在组织发展中做好巩固工作，加强骨干的培养和对积极分子的教育，使她们成为各级妇救会联系群众的桥梁，带头完成各项任务。②在濮阳、滑县等地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妇救总会配合各县妇救会，积极安排，分批举办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力量、输送人才，充实健全区村妇救会。③各级妇救会要关心妇女的痛苦，解决他们的特殊问题，维护妇女权益，这是长期的任务。如果有人对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进行欺凌、侮辱、造谣、破坏，甚至打骂虐待，要及时在村政权和农、青救国会配合下，及时给予解决。大力宣传妇女应享受的权利，破除封建制度、旧礼教套在妇女脖子上的枷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争取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自身解放，提高妇女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地位，实现男女平等。④随着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妇救会要积极组织广大妇女群众拥军优属，慰劳伤兵，积极做军鞋、被服，解决部队急需。加强妇女儿童站岗、放哨和情报联系，配合正规军、地方武装有效地打击敌人。⑤为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要深入发动群众，做细致的工作，动员父送子、母送儿、妻送郎踊跃参军参战，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妇女要参加生产互助，完成农耕任务。⑥积极组织开办识字班、夜校、冬学活动，使其正常化，争取每个妇女能认识几百字，能粗读报刊、写信、简单记帐，提高文化水平。

至此，边区的妇女工作在妇救总会的领导下普遍开展，妇女救国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了15万余人。妇女培训班相继开办，大批妇女积极分子经过培养、训练提高，充实到抗日救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线。

（2）举办培训班，培训妇女干部

1937年冬，直南特委组建抗日武装四支队。四支队的女宣传员董维华等来到沙区，在内黄县千口村老地下党员张栋家办了内黄县第一期抗日干部培训班，学员多是妇女，共20余人，由董维华讲课。这是最早的以妇女为主体的培训班。

1937年11月，平津流亡学生杨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受党组织委派到清丰县开展妇女工作，住在城里付秀香家。在付秀香协助下，在城北唐营村召集20余名妇女开会，宣传抗日道理。翌年3月，他们总结了唐营妇女未组织起来的教训，认为必须从受日军残害最重的妇女发动入手，首先发动了张拐村（1937年12月曾遭日军洗劫，被杀绝20余户）的妇女，并组织她们到清丰县女子师范接受抗日培训（共培训40余人），由杨均讲课。俟后赵来光、马耀光即在城关区组织起老、中、青妇女小组及姐妹团，活跃在城周围村庄。

1938年2月，在丁树本部任政治部主任的罗士高、民运科长平杰三、组织科长张伟（3人均系共产党员），吸收一批男女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先后在濮县、濮阳举办抗日培训班。结业后，一部分学员分配到政治部宣传队，大部分充实到丁树本部队任政工干部。女学员梁伯琪、赵森到直南特委机关工作，赵保云留丁部工作，吴林涛参加了丁部宣传队。

1938年2月，晁哲甫从山西晋城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培训所返回清丰县，在清丰简师继续举办军政干部培训班，这时有30多名妇女知识分子参加，如刘清霜、阎双珍等。讲课的有晁哲甫、晁涌光、安法乾，杨均还专为妇女讲课（陈友菊协助）。这种培训班先后举办5期，培训骨干近千名，并从中发展了党员和“民先”队员。经过培训的骨干普遍提高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等理论的认识，坚定了抗日的信心。这些干部毕业后被分配到党、政、军、民各条战线，充实了领导力量，也为迅速开展农、青、妇等群运工作准备了干部。

在此之后，边东县委的郭献瑞也在南乐县办起了军政培训班，结业后的妇女同志除充实到城关外，大部分分到区妇救会工作。

1938年夏末，在清丰县动委会领导下，妇女部在草帽仙庄、六塔、固城及城关周围，由刘清霜、丁素珍负责举办了5期妇女培训班，培训了200多名妇女积极分子。

1938年8月，南乐县妇教会成立，程墨之、阎双珍任正、副主任。由程墨之负责，谷福之、武翠冬、李淑芹等合作，分别在百尺村、近德固、福堪及城内举办培训班，以农村妇女为主体，培训了200多名积极分子，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些党员回村后参加支部工作。

1938年7月初，在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刘晏春领导下，于清丰县梁村（特委和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举办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培训班，赵森任支部书记，赵森、范世钧讲课。学员以清丰县西北区为主，吸收城周围及各区老、中、青妇女及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少数女教师和女学生，如孟淑庆、马淑美等。

经过培训，老年妇女解放了一大步，兴致勃勃，青年妇女、壮年妇女好像挣脱了封建枷锁，自由活泼。如，当时梁村驻有黄河支队，他们在晚上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培训班的学员列队踊跃参加，互相拉歌，一阵阵互相高喊：“八路军来一个！”“妇女来一个！”最后共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培训班共办了3期，每期40多人，每期一个月，共培训了近120人。

培训结束后，学员都回到各自的村庄，大部分担任了妇教会会长、委员，有一部分参加了党支部工作，并积极发动妇女建立与健全村妇教会，组织儿童团、姐妹团，组织他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抓汉奸。

1938年5月，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成立，8月迁入濮阳县城。总会妇女部设立后，就开始了正规的妇女培训工作。11月，在濮阳县委大力支持下，妇救总会首先在秤钩湾和甘露寺举办妇女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均为村妇教会积极分子，其中有一部分是高小和初小学生。每期40人，学习时间三个月。

1939年，继续在滑县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由妇救总会的申超臣、妇救一分会宣传部长吴林涛和滑县妇教会梁伯琪、江亚民、吴卫汉等共同组织，学员由各村、乡政府选派，学习时间仍为一至三

个月，每学期学员近40人。毕业后，全部分到县、区妇教会工作。内黄县妇教会陈伯仲、栗旭明、盛利、王秀波、王耀民分别在井店、千口、太平、化村、店当、邢固等村举办妇女培训班，培训一批积极分子和骨干。

经过培训的妇女回到县、区以后，又普遍举办了基层妇女训练班或学习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培训基层妇女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妇委发布《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指示信，提出：“在坚持抗战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目前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各方面工作”，“抗战建国大业假使没有占半数人口以上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根据此指示精神，妇教总会于1939年春在濮阳城内外开展妇女培训工作。先以濮阳城西北黄宾为中心，吸收后黄宾、徐北汪、卓北汪、劳北汪、崔北汪、冯寨、胡村集、李家庄等10个村的妇女积极分子办了两期培训班，每期20天，学员是贫苦农民和盐民，由范世钧、申超臣、张巧凤、刘东明讲课。为适应当地的环境，把妇女培训班改成了识字班，组织妇女学文化，结合扫盲讲解抗日道理以发动妇女抗日。这一形式受到妇女群众的欢迎。识字班共办两期，60多人参加。

在其他县、区，以识字班名义对妇女培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1938年2月，清南大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妇女部干部刘翠琴、马玉珍就深入农村，走家串户，在清丰西北区组织村妇教会和妇女识字班，使妇女在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尤其是宣传动员妇女和女童放足，更受到妇女的热烈拥护。通过识字班这种形式，同样起到了培训妇女骨干的作用。1938年至1939年的两年里，就办了妇女培训班近20期，培训妇女骨干近2000人，发展党员数十名。随着办班活动的普遍开展，妇女的发动也呈现遍地开花之势。“遍地抗日歌声，遍地红缨枪”，正是这种崭新而壮观局面的生动写照。

实践证明，妇女培训班不仅是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园地，而且是宣传动员群众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有效方式，以后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都曾通过培训班发动群众，培养骨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 县、区妇救会普遍建立，边区妇女组织形成完整系统

1939年5月，濮阳县妇救会建立，赵森为主任。7月，长垣县妇救会建立，陈伯仲为主任。8月，南乐县妇救会建立，程墨之、阎双珍任正、副主任。9月，滑县妇救会建立，梁伯琪任主任。1939年冬，清丰县妇救会建立，刘清霜任主任。1940年5月，内黄县妇救会成立，张强、盛利先后任主任。新划的卫河县妇救会主任为任守容。顿丘县妇救会主任盛利。尚和县妇救会主任王欣。渭南县妇救会主任柳俊玲。高陵县妇救会主任栗旭明。1940年4月18日，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区党委下辖3个地委：直南地委妇救会主任程墨之；豫北地委妇救会主任陈伯仲；鲁西南地委妇救会主任赵淑林。至此，冀鲁豫地区自上而下的妇女组织均已建立起来，形成完整的系统。

2. 蓬勃发展的鲁西妇女运动

(1) 鲁西北的政治形势

1937年抗战爆发后，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范筑先，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与鲁西北的共产党人合作，守土抗战，并任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范筑先夫人武治国为会长，组织了抗敌后援会。这是鲁西北最早的妇女救亡团体。1937年秋至1938年春，大批的流亡学生和热血青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奔赴聊城。我党以范筑先六专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为基点，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民运部。党通过这个公开的行政机构来领导鲁西北的抗战工作。妇女部的负责人是解彭年（男），后由郝冠英负责。

1938年3月，成立了妇女救国会，范筑先夫人武治国任名誉会长，郝冠英、丁子玉为负责人。1938年4月，从延安和武汉分别派来女干部张扬、杨固、金维、许可和王玄、陈杰，更充实了妇女工作

的队伍。1938年5月，六区政治工作会议决定，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妇女部改为政治部民运科妇女股，张扬任股长。随着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以聊城为中心，在周围20多个县建立起抗日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支持下，各县妇女救国会也逐步建立，至1938年底，已先后在冠县、临清、茌平、莘县、阳谷、东阿、寿张、博平、观城、朝城、堂邑等县建立了妇教会。

(2) 妇女抗日救亡工作普遍开展

各县妇教会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主要是：

第一、动员女知识青年参加救亡工作

当时由于日军进攻，学校停课，一些女教师、女学生大都闲在家里，妇女干部就挨户访问，动员她们参加抗战。范筑先的3个女儿范晔青、范树琨、范树琬也参加了抗战，尤其是范树琨在其弟范树民（青年挺进大队大队长）牺牲后，亲自接任大队长职务，这一行动对妇女抗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聊城，经过妇女干部的动员，就有靳祖严、靳祖来姐妹，宋薰和刘氏姐妹参加抗日工作。在六区政治部创办的政治干部学校里，也有不少女青年报名参加学习。王玄、郝冠英都曾在该校担任过大队指导员。在政治干部学校毕业的女学员，大部分成为鲁西北妇女运动的骨干。鲁西党校也培养了许多女干部，如白林、林彬、李虹、丁纳、洪林等，都成为鲁西、运西妇运的主要骨干。

第二、利用各种集会，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3月8日，聊城各界妇女和群众2000多人参加庆祝“三八节”大会。范筑先夫人武治国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各界妇女行动起来，团结抗战。郝冠英代表广大妇女向范筑先献上一面锦旗。每当范筑先部队作战归来，妇女部（妇教会）的同志们就组织妇女夹道欢迎，赠送慰劳品以鼓舞士气。

1938年7月，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访问鲁西北时，在聊城、临清受到了热烈欢迎，妇女、儿童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在临清的欢迎大会上，妇教会主任李蕴华和妇女干部赵鹏的母亲在会上

讲话，代表妇女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扩大了国际影响。卡尔逊回到武汉后就公开要求美国停运援日物资，后又撰书介绍了华北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及他在鲁西北与范筑先会晤的情况，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了解到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些真实情况。

1938年8月，在济南战役中，范筑先的次子，青年挺进大队队长范树民和参谋长何方壮烈牺牲，广大群众在茌平东门外举行迎灵祭奠，茌平县妇教会也组织妇女参加。当时群情悲愤，哭声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妇教会的同志们经常组织妇女儿童上街张贴标语，演唱抗日救亡的戏剧、歌曲，或利用各种集会向群众演讲，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战，鼓舞部队士气。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就经常深入到农村和驻军营地演出。肖彬、颜菊清、窦秀余、许可、刘敏书、杨固、王惠芳、饶子春等女同志都参加了剧团，随团转战鲁西北大地。她们有时与当地妇教会配合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演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她们边唱边解释歌词，边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讲妇女在抗日救亡中的责任和作用，边唱边讲，声泪俱下，台上台下群情激奋，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宣传工作开展得普遍、广泛，组织工作及时，妇女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当时临清妇教会主任李蕴华曾写了一副对联：“群英荟萃呼吁抗日天地撼，妇孺揭竿声势震荡临清城”，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妇女儿童同仇敌忾的抗战气势。

第三、开办抗日小学

抗战爆发后，聊城和学校大都停办。政训处妇女部在袁家宅子的北屋办起了抗日小学。没有课本，就自己编写联系实际的课本，如《识字课本》中，就教“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等。通过教认生字，使孩子们懂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反抗外敌侵略的光荣传统，有无数的爱国志士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斗

争。这样一方面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文化学习之中，一方面又通过教唱抗日歌曲，向孩子们灌输抗日道理，还通过访问家长，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在茌平，妇教会以小学为阵地，向教师、学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教师、学生支援抗战。经过宣传动员及学生家乡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有8个学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其中有李贵荣（李康）、宁鸿喜、王在荣等4个女学生。

第四、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

1938年5月，聊城战地服务团成立，由金维、许可、张扬、范晔晴负责。团员共有40余人，全部是妇女。她们经过一个月战地救护常识的训练，开赴前线服务。

除以上工作外，妇女还编辑《抗日战报》的副刊《鲁西北妇女》、《妇女前哨》，报道和评论妇女运动的情况，扩大妇女工作的影响，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此外，也做争取团结一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家属的统战工作。

总之，在1937年秋至1938年11月，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争取了范筑先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使鲁西北妇女运动的开展有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从而出现了妇女运动蓬勃开展的大好局面。这一时期的妇女工作有的县、区还多局限于城镇，冠县、临清等县则深入农村开展。1938年11月中旬日军向聊城疯狂进攻，范筑先将军和优秀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700官兵壮烈殉国，聊城沦陷敌手。鲁西北地区的妇女运动从此全面转向广大农村。

1939年秋，鲁西北行政委员会成立。鲁西北妇教会随之成立，李蕴华为主任，组织部长张坤，宣传部长王也甲，生活改善部长樊策。各县妇教会也相继建立。

（3）泰西的妇女工作

1937年10月，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1937年11月，泰安妇女抗日救国会筹备会成立，成员有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女教师、女学生。女子小学校长周美娇任会长，中

共产党员范琳分管组织工作。该会号召各界妇女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7年冬，在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倡议下，成立了东平县抗日救亡协会。最早参加协会的17名成员中，有崔暮冬、万丹如、李蕴石、杨献玲、林楠、李虹等6位女青年。

1938年5月，建立了中共泰西特委，李蕴石任妇女部长。1939年2月，泰西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主任余冰一，副主任武静平。

1939年，郭军和余冰一到泰西县周家村办起了妇女训练班，对全乡有文化的妇女积极分子进行培训，灌输党的抗日主张和妇女解放的思想。训练班办了10多期，每期数十人，郭军亲自组织、讲课。培训结业的女工回到本村组织起妇救会，有的参加抗日工作，脱产干革命。这年冬天，日军、汉奸到周家村“扫荡”，全村30多户被烧28户，群众吃住无着。郭军和余冰一挨家挨户安慰，并和农会一起组织救灾；又亲自召集全乡地主开会，动员他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从地主那里借粮分到各户，稳定了民心。她们还用日军、汉奸残害群众的事实，教育群众只有对敌人进行斗争才能生存。

在抗日斗争实际锻炼中，涌现出许多妇女积极分子。周家村妇救会主任周二嫂被培养为村长，她当时已50多岁，中共党员，是泰西县第一个妇女村长。塔坊村的李秀梅、明家庄的明旭和武治勇，都离开了家门，投身到抗日工作中。

1938年秋，在中共长清县委领导下，在长清八区赵官镇成立了第一个妇女党支部。支部建立时有女党员10人，王岩、孟淑华分别担任党支部正、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活动，给游击队做衣服、鞋袜，支援抗战。

1939年3月，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达泰西，传达了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北方局关于建设泰西根据地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中共长清县委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全县的妇女工作，请求泰西特委批准从部队抽调王桂荣、朱慧、边涛、靳涛、张明、董辉、丁纳等女同志到长清县做妇女工作。

1939年6月正式成立长清县妇女工作队，王桂荣任队长，朱慧任副队长，主要活动在县城南山区（一、二、三、七区）和黄河西八、九两区及平阴一区。当时，根据党委布置的中心任务，妇女干部深入到农村走家串户，召开各种形式的妇女会，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和培养妇女积极分子。1939年初，县妇女工作队在七区房庄举办了第一期妇女干部学习班，人员由各区地方党组织推荐，只要愿意走出家庭参加抗日的妇女，不论文化水平、出身成份，都可以参加。学习班结束后，她们被分到各区工作，都成了妇女工作的骨干，为开展全县妇女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9年7月，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张耀南任县长。县农、青、妇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1939年8月，在原县妇女工作队基础上成立了县妇救会，朱慧任会长，原工作队撤销。在县妇救会领导下，各区妇救会也先后成立。从此，长清县的妇女工作，除敌占区外，全面展开。

1939年秋，肥城县妇救会成立，李虹任县委妇委书记、县妇救会主任，徐克为副主任。11月，东平县妇救会成立，王枫任主任。

1939年11月，泰西行政专员公署成立。是年冬，泰西妇救会成立，郭军任会长。1940年初，郭军调鲁西，朱慧继任会长。

（4）鲁西妇救总会的成立

1939年1月，鲁西区党委成立。1939年10月，鲁西区党委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发动群众，动员妇女抗战，县以上党委设妇女工作委员会，领导妇女工作。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赵博任妇委书记。5个地区也于1940年前后健全了妇救会，其负责人是：泰西妇救会郭军、朱慧、李秀梅；运西妇救会白林；鲁西北妇救会张坤；运东妇救会宋伟。

1940年3月8日，鲁西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成立，郭军任会长，白林任组织部长，万丹如任生活改善部长，林楠任秘书。妇救总会提出两大任务，一是促进宪政，二是加强生产。鲁西的各级妇救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健全起来，还成立了昆山县试验区，随即成立妇

救会，会长路宾。至此，全区已有20多个县和大多数区、村成立了妇救会，给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权建设以极大的支援。

3、战斗中的湖西妇女

抗战初期，徐州西北区党委书记王文彬为了培养妇女干部适应抗战需要，于1938年3月在丰县举办了妇女训练班。当时参加学习的有王子香、张淑贞、孙秀兰、徐国祥，主要学习了抗战十大纲领和妇女在抗战中的责任等。1938年秋，新四军彭雪枫的部队开到萧县。1939年4月，部队的孔真、张明组织了妇女工作队，在萧县、宿县等地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刚从抗日学习班结业的戴洪慈也参加了妇女工作队，她们都废寝忘食地进行抗日宣传。

苏鲁豫支队打下萧县台儿庄，消灭了很多日军。当时，群众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妇女工作队到处动员，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动群众慰劳部队。广大群众和爱国士绅纷纷捐钱捐物，献猪献羊。老百姓几天中就做了四五百双军鞋送给子弟兵。从此，萧县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局面。部队开走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教会、妇救会、青教会。

1939年6月，孔真调到苏鲁豫边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妇女科任科长，对外称妇救会筹备会。当时，妇女干部有刘莹、郭仙云、张令仪、李伟民等。

湖西区党委建立后，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湖西区妇救会又连续举办了两期，郝莲芳、李大侠、李小霞、郭仙云、朱慕兰、季凯等都参加了学习。这几期培训班培训了妇女干部三四十人，结业后分配到各县开展工作。湖边地委妇女部长是常俊亭，鲁西南地区负责人是金彩凡、周子凤等。

1939年8月，湖西区妇女组织在单县时寨召开了妇女代表会议，成立了湖西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孔真当选为妇救会主任。

1939年9月，湖西发生了“肃托”事件，孔真、金彩凡、郭仙云等被逮捕。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惨遭杀害。后经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湖西地区才转危为安。

1939年12月，湖西区党委改组，设立了妇委（对外称妇救会），孔真任妇委书记，朱慕兰、张令仪、金彩凡为委员。1940年11月，湖西区党委改为地委，赵雨琴任地委妇救会主任，戴洪慈任副主任。

这一段时间里，湖西局势严峻，斗争相当艰苦。日军疯狂“扫荡”，蒋介石积极反共，湖西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由于“肃托”影响，群众情绪消沉。但妇救会干部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斗争，带领妇女群众，掩护干部，救护伤员，缝衣做鞋，支援前线。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受到极大鼓舞，他们感动地说：“有你们妇救会支援，我们一定要拼命打击敌人！”

4、妇女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游击战争

抗战开始后，冀鲁豫地区从直南豫北到鲁西、湖西，各地的妇女群众迅速觉醒，妇救团体相继建立，广大妇女在上级党委和各级妇救会的组织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

（1）支援前线

在抗战期间，为部队战士做军衣、军鞋，是边区妇女的经常任务。抗日部队的被服、鞋袜，除少量由专业工厂供给外，绝大部分由广大妇女手工缝制。即使专业工厂，也主要由妇女组成。有的地方为部队制作被服还制定了公约。如沙区妇女每人每年为部队做鞋袜3双；清丰县平均每村每年交1—2次军鞋，每个成年妇女每次交2—3双。

1939年前后，部队迅速发展。由于政权掌握在国民党顽固派手中，部队在军需上有很大困难，没有菜金、津贴费和办公用费，衣服破烂。妇救会就发动妇女做军鞋、缝军衣、碾米磨面、洗衣做饭、募捐慰劳战士。如1938年八路军三八八旅在冠县需要军鞋，妇救会即发动妇女在10天内做了3000双军鞋送到部队。当时流行这样一首妇女做棉衣歌：“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收复失

地保家乡。”

(2) 掩护干部、战士，救护伤病员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在广大的冀鲁豫平原上，许多妇女为掩护干部、战士而舍死忘生。

1939年5月11日，刘克林（当时名叫刘忙活，党员，三区妇救会会长）掩护4个八路军战士，带他们躲藏在一个岩洞里。可她九个月的孩子直哭，她毅然用手把孩子的嘴捂住……直到敌人过去，虽然孩子憋得喘不上气受了罪，但却保证了4个战士的安全。1939年10月在敌人对中心区“扫荡”中，一位大娘为掩护长清县妇救会主任朱慧，就把她当做儿媳瞒过了日本兵。在这次遭遇中，由于群众掩护，100多名干部全部脱险。1940年春天，滑县胡营被敌人包围，为掩护我党干部陈光，村妇救会主任朱大娘指着陈光对前来搜查的敌人说：“他是我儿子，得了伤寒病。”敌人信以为真，慌忙离开了朱家。

为了掩护干部、战士，救护伤病员，妇女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七区女党员崔二巧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但她始终不吐一字，保守着党的机密，掩护了滑县县委书记马瑞英和濮阳干部李春彦。敌人把她双腿大筋挑断，用烧红的铁块烤焦了她的双脚，但酷刑始终没有使她屈服。

(3) 传送情报

随着战争向纵深发展，敌我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敌人对根据地实行的白色恐怖给我党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由于男同志出走极易引起敌人注意，为了便于开展斗争，妇女就担当起传送情报、联络交通的任务。冀鲁豫地区的李秀真、李二趁、孙九朵、常爱民、于秀莲、宋广趁、苗秀甫，鲁西的贾桂存、李寿玲、李丽等，都是出色的情报联络员。她们英勇机智、出生入死，常常以做生意、开卖铺为掩护，扮作要饭的、串亲戚的、烧香拜佛的去完成送信任务。她们想方设法，灵活巧妙地为党组织存放文件，为部队传送重要情报、采购军火，还到敌人据点打探情况。为了夺取抗战胜利，她们

一舍生忘死，贡献了全部力量。

（4）参加生产，支援前线

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增加边区物质财富、坚持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边区各级妇救会以此做为妇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40年，鲁西的妇女生产小组已有182个。多数生产小组与妇救会的小组统一，她们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文化，一起开展活动。这样，也便于妇救会对她们的帮助和指导。在未建妇救会的地方，则通过组织妇女生产小组逐步建立妇救会。

妇女们在农忙时，还必须下地劳动，牲口不足，就组织起来拉犁、拉耙。边区的妇女生产还因地制宜，如湖西区鱼台县妇救会就根据当地妇女特长和地理特点，组织了渔业合作社。正是边区勤劳勇敢的妇女在生产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才能用财力物力支援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

（5）送儿女、送丈夫参军杀敌

抗战开始，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发动妇女送子送郎参军是各级妇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12月9日、1940年1月28日，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扩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指示，要求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15万人枪，中原局至少应发展到10万人枪，并建立10倍于正规军和游击队的自卫军。而且由于战斗频繁，部队伤亡大，也亟需补充兵员。在动员妇女送子送郎参军的工作中，妇救会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许多妇女干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广大妇女。

内黄县千口村的妇救会长张栋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四支队成立时，她带头报名送儿子参军。

金乡县侯大娘（王桂英）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先后送到了部队，他们有的光荣牺牲。侯大娘被誉为“英雄的母亲”，解放后被选为人大代表、金乡县的副县长。

单虞县毛楼村开明士绅张老先生夫妻二人将两个儿子张国庆、

张庆玖都送到部队上，后来这两兄弟为国捐躯。

肥城县刘庄镇孙庄的李玉印大娘，自幼过着贫苦生活，1937年她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先送15岁的儿子孙波参军，后又送17岁的女儿参加革命。1940年日军包围了孙庄，两次抄她的家，逼她交出儿女，她始终没有交出。她还经常教育儿子好好干，抗战到底。

边区的妇女深明大义，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不惜一切牺牲，送亲人参军的动人事例千千万万。亲人参军走后，她们忍受住感情上的痛苦，挑起生活、生产的重担，积极支援前线，成为我军发展壮大，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后盾。

5. 妇女在斗争中获得初步解放

冀鲁豫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也初步获得了自身的解放。

(1) 学政治、学文化，参加抗日活动

在直南豫北，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与妇女培训班的开办，妇女识字班也普遍组织起来。清丰、南乐从1938年就组织起妇女识字班，每天晚上上课，学文化和时事。一些妇女干部常给识字班上课。

鲁西北地区利用农闲时间办冬学，一般是先召开妇救会员大会进行发动，再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说明妇女参加冬学的意义和好处，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点，讲清妇女要解放必须学文化，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必须学文化，要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学文化。这样，把妇女的切身利益与民族的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以启发和调动妇女学文化的积极性。从组织上，一个干部要保证动员5名妇女参加学习。有的村由村干部和开明的爱国士绅共同组织冬学委员会，领导冬学的教学工作，主要是请本村的小学教员或有知识的人担任教师。朝北县张鲁集的两处冬学有100多人参加。她们学习热情很高，把冬学课本随时带在身上，没事就拿出来念。在冬学中还学抗日歌曲，讲抗日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既学习了文化，又提高了政治觉悟。

湖西地区的妇女识字班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定期地随时举办。他们还编了《办冬学歌》，在妇女中传唱。如：“西北风吹来阵阵寒，收完了庄稼没有事情干。噢！冬学办起来，赶快把书念。睁眼瞎子真困难，处处受欺又受骗，不会写，不会算，你看可怜不可怜！”

自1938年开始，各个地区、各县、区所举办的妇女培训班虽以政治培训为主，但也有文化学习和文艺活动。妇女干部通过培训，在提高政治觉悟，提高政策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化水平。

许多妇女经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都脱离了文盲状态，坚持学文化半年到一年的识字班学员，大都能认识几百字，多的能认识上千字。有的能写信、记帐，有的调到区妇救会工作，还能写简单的工作总结。

(2) 反封建、反虐待，争取平等自由

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冀鲁豫广大农村，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与影响，妇女受压迫、受凌辱成了天经地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是赔钱货”等观念根深蒂固。不仅男人以此作为欺压、蔑视妇女的理论依据，连妇女自身也认为理所当然。

抗日战争开始后，妇女干部们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特别是在遍及全边区的各种形式的妇女培训班中，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封建、反压迫，争取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等道理，慷慨激昂的抗战歌声，使广大妇女耳目一新。思想上一旦挣脱了封建锁链，旧的传统观念便土崩瓦解，冀鲁豫的妇女以崭新的面貌，带着崭新的观念，和男人并驾齐驱战斗在广阔的平原上，为民族、民主斗争贡献出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反封建、反虐待，争取妇女解放，主要靠思想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改变传统观念，破除陈规陋习，逐步建立民主平等的家庭关系。如鲁西北的临清、冠县等地，许多村妇救会帮助妇女制定了模范婆婆和模范媳妇的条件。由于符合男女老少的要求，这些

条件得到了每个家庭成员的支持，许多新型和睦家庭陆续建立起来，对旧的封建家长统治是有力的冲击，对移风易俗、树立新的风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使妇女不受打骂虐待，帮助她们争取人身自由，妇救会对打骂、压迫媳妇的公婆和丈夫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就进行公开斗争。

对妇女宣传不穿耳、不缠脚，一些妇女积极分子就率先放足示范。鄆城吕庙村的妇女吴桂荣，参加妇救会后，第一个解下缠脚布。很多人笑话她，说她闲话。她说：“我跟共产党闹革命没有错。妇女们应该解掉缠脚布，走路、劳动才方便。妇女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解除封建势力对自己的束缚与压迫。”在泰西地区，妇女干部向群众宣传缠足的苦处、不缠足的好处，还教她们唱《放足歌》。在冀鲁豫地区，妇救会工作开展较好的村，30岁以下的妇女都把缠脚布放开了，15岁以下的女童不再缠脚。

各地妇救会建立后，便发动妇女把反“推穿”和反虐待结合起来。妇救会召开大会，讲明婆媳应当是平等的关系，儿媳终日在家劳动，婆家就应当管吃管穿，讲明“推穿”是不合理的陋习。

在妇救会已成立的地区，还进行了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工作，提倡婚姻自由自愿，解除不合理的婚姻。1942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婚姻暂行条例》，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又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二) 妇女运动在曲折中前进 (1940年6月至1942年9月)

1940年夏至1942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盘踞在冀鲁豫边区的顽军、土匪、反动会道门也趁势与日军勾结或公开伪化，形成对我抗日军民夹击的形势。英勇的冀鲁豫妇女，在敌人残暴的“扫荡”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展开生

死搏斗，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战胜了自然灾害，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终于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反“扫荡”中的英雄妇女

（1）惨绝人寰的浩劫

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扫荡”极为频繁，每一次“扫荡”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每次“扫荡”都给边区人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带来深重的灾难。数不清的妇女姐妹惨遭奸污、屠杀。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壁残垣，瓦砾焦土，完物无存，满目荒凉。被侮辱被损害的土地上永远记录下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英雄的冀鲁豫儿女是吓不倒的，在边区军民反“扫荡”的斗争中，妇女们以血肉之躯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2）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1年7月1日，根据北方局、集总决定，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9月初，各界代表选举出冀鲁豫行署领导成员，随之，两区群众团体合并。合并后的冀鲁豫妇救总会主任为郭军，副主任为吴亚南、范世钧（1943年郭军调走，吴亚南任主任），组织部长由范世钧兼任，宣传部长路克里，生活改善部长万丹如、副部长梁伯琪。总会下辖7个分会。

边区妇救总会及分会的组织机构健全后，加强了对边区妇女工作的统一领导。各级妇教会干部，在对敌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向群众传达上级指示，分析形势，鼓励妇女群众坚持斗争。

第一、“坚壁清野”。为了对付敌人的疯狂“扫荡”，群众有组织地进行“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任何有用的物资。妇女和男人一起把家中的粮食、衣服，甚至锅、碗、瓢、盆全部埋藏或转移，特别是公家委托保存的公粮、布匹、文件，给部队做好的大批衣服、鞋袜，更是精心收藏。

冀鲁豫妇救总会的鞋袜被服厂设在内黄县汪魏村，正是日军

“扫荡”的地区，被服厂的妇女同志白天把缝纫机头卸下埋在沙窝里，夜晚再挖出来进行生产。1941年“四一二”大“扫荡”中，妇女们肩扛背驮，转移着机器、被服等物资。

湖西区妇教会在敌人“扫荡”时，组织妇女疏散，用“把东西藏光、人跑光、缸水倒光”的“三光”政策对付敌人，使敌人来了没吃没喝。

第二、掩护干部。在反“扫荡”中，妇女群众舍生忘死地掩护我们的干部、战士，救护伤病员，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也决不动摇。

1941年4月12日，日军对沙区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华北民军司令朱程的爱人郝淑斋，因怀孕临产不能随队，就住在内黄县中化村的妇救会长赵兰枝家里。赵兰枝和她的婆母保护着郝淑斋随逃难的群众四处奔跑。22日夜，郝淑斋临产了，婆媳二人为她接了生并一直守护着、伺候着她，直到部队把她母女接回去。

1942年2月，日军两个师团及伪军共3万余人对我南乐、滑县、卫河等县进行“扫荡”。当时我卫河基干大队正在敌人的合围圈中。由于战士都穿便衣，妇女们就到敌人那里去“认亲”，老年妇女领回自己的“儿子”，青年妇女认回自己的“丈夫”。通过认亲，基干大队的绝大部分队员冲出了包围圈归了队。当时卫河县长刘子良，干部谢宝山、靳长印，也都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被掩护起来的。

1942年3月8日，抗日民军的一个团被日伪军2000余人包围在卫河县瞿固附近，团长万连友手持机枪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由于民军身穿军装不能突出包围圈，群众就给民军换便衣，男人的便衣不够，就换妇女的。有的妇女把新婚的衣服拿给民军，有的妇女宁愿赤身盖被子而把衣服脱给民军。赵庄的三个老大娘头上冒着横飞的子弹，扛着便衣送给战士。这次用换便衣的办法掩护民军800多名战士突出重围。

(3) 积极参加对敌斗争

广大妇女不仅鼓励亲人坚持战斗，而且还亲身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在瓦解敌军，对敌伪军的攻心战中，妇女发挥了特殊作用。妇女和男子一起参加破路挖沟，破坏敌人的交通，使敌人的汽车无法通行。在艰难又特殊的环境中，传送情报、侦察敌情的任务主要由妇女承担起来。

2、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由于日伪顽杂的不断抢掠、摧残和自1941年以来的旱灾、蝗灾，整个边区出现大面积灾荒，灾情尤以鲁西北和沙区为重。我边区党、政、军及群众团体，为挽救人民生命，坚持抗日战争，把救灾作为头等大事。行署颁布救灾贷款办法，发放救济粮、贷款、种子，组织生产自救。广大妇女在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边区的生产自救活动主要是以工代赈，组织男劳力从事运输，组织女劳力纺花织布或编织苇席以换取粮款来维持生活。在鲁西北，妇女纺织积极性极高，她们还组成了互助组，按个人专长进行分工。沙区妇女90%参加纺织，不分昼夜坐在纺花车或织布机前，夜里无油点灯，就燃香照明。沙区妇女在灾荒期间共纺棉200多万斤，织布50多万匹，换回粮食400多万斤。

重建家园主要包括回地斗争和重返家园。回地斗争就是帮助农民赎回被地主乘灾荒之年低价买走的土地；重返家园就是帮助贫苦农民重建家庭，使那些在大灾之年被迫卖儿卖女、典卖妻子而妻离子散的家庭团聚。在回地斗争和重建家园中，广大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妇女运动的高涨 (1942年9月至1945年8月)

1942年9月至1945年8月，是边区群众运动发展壮大时期，中心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民主民生运动。由于贫苦农

民真正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群众拥军拥政热情空前高涨。边区的军事斗争、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妇女运动日益高涨。

1、民主民生运动

民主民生运动首先从反恶霸反“黑地”入手，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斗争，继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在这场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妇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妇女们认清了封建剥削的根源，懂得了地主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并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她们参加对敌斗争更加积极，站岗放哨，生产支前，抗日斗争情绪高涨。

2、参加大生产和拥军支前

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各地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农村妇女能够 and 应该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与达到解放的道路，必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逐渐挣脱封建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冀鲁豫边区各级妇女组织一直把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作为重要任务，因此，在大生产运动中，妇女发挥自己特长，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

边区子弟兵对敌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边区的妇女，激发了他们热爱子弟兵、拥军支前的热情。1944年4月，我边区军民展开对敌攻势，连续取得作战胜利，边区妇女拥军支前，盛况空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鲁豫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冲破了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了家门，和男子一起参加

了抗日救国斗争，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争得自身的解放。数以千计的妇女知识分子经过培养教育，成为妇女工作的骨干和党的优秀干部，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地发挥了聪明才智和桥梁先锋作用；数以万计的劳动妇女，经过培训和斗争实践的锻炼，担当起村、区、县以及地区妇救会的领导职务，为边区的妇女解放事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千千万万的妇女姐妹，经过党的教育，经过战争的考验与锻炼，挣脱了几千年禁锢她们的封建枷锁，以无比的热情，非凡的勇气，为保卫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拼搏，义无反顾。在思想上获得解放、政治上获得翻身的边区广大妇女，还非常关心边区的政权建设，积极参加选举。八年抗战大大提高了广大边区妇女的思想觉悟，丰富了她们的斗争经验，同时也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为今后妇女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解放战争中的冀鲁豫妇女

（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边区妇女与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人民力量，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悍然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我边区妇女义愤填膺，誓做子弟兵坚强后盾，送亲人参军参战，努力生产，踊跃支前，积极参加反奸清算与土地改革，建设巩固的后方战勤基地。

在解放战争中，边区妇女为保卫冀鲁豫的每一寸土地，为支援千千万万的野战大军，节衣缩食，辛勤劳动，英勇拼搏，流血流汗，与全边区军民共同奋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妇女运动也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 妇女运动在斗争中发展 (1945年秋至1948年秋)

1945年秋，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边区成立了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张承先任主任，范世钧任妇女部长，以加强对边区妇女工作的领导及群众工作的协调。

1946年6月，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主任张承先、妇女部长范世钧、菏泽市妇委会主任李曙明代表边区各界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帮助下蓄意扩大内战的罪行。

8月28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冀鲁豫区，我黄河南岸地区成为敌我双方角逐拉锯的主要战场。我边区妇女围绕着“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中心任务，在极端艰苦、严峻的形势下，坚毅、勇敢、机智、顽强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做到了战勤、土改、生产三不误，保证了战争胜利。

1、保田保家，自卫反击

(1) 送亲人参军保家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边区各救总会发出告各救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书，动员各救会员立即行动起来，参军参战。

各级妇救会根据边区政府和各救总会号召，把扩军、拥军当作中心任务，全区立即掀起了参军热潮。湖西区各县妇救会门庭若市，有的是母亲带着儿子报名，有的是妻子送丈夫参军。在反霸斗争中翻了身的刘大年拉着妇女干部的手，要求帮忙，收她儿子当八路军，而且嘱咐儿子到部队后勇敢杀敌，为老百姓争光。由于广大妇女深明大义，不仅不拉后腿，而且积极支持儿子、丈夫当兵，边区的扩军进展迅速。湖西的金乡、单县、巨野3县就有3000余名青壮年参军。鲁西北的莘县14天内有500人参加了军。阳谷、冠县报名

新兵1000余人。清丰县古城乡梁村的妇救会长梅三芹在两个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又让三儿子马国英带头参加反攻营。到部队后，首长指派马国英代理营教导员，经他带动参军的许多青年都编在反攻营里。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区党委于8月15日发出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全区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安定后方秩序，保证前线供应，特别号召妇女下地生产，代替青壮年，使前方不挂家，一心打胜仗；又于8月20日发出《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武委会总会也于同日发出告全体会员、团员和民兵书，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参军参战，打退卖国贼的进攻，并做好优待军属和参战家属的工作，特别提出妇女会员、姊妹团员和儿童团员要劝说自己的丈夫、哥哥参军，要做劝夫参军的模范妇女、劝哥哥参军的模范儿童，年老的会员要送子参军，争取做模范父母。

在区党委和联合总会号召下，边区妇女积极动员和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军杀敌。广大群众自觉行动，形成争相送亲人上前线的热潮。自区党委号召至9月底，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区参军人数即达19590人。

1947年春，参军再现高潮。5月，范县妇女响应县委、妇联号召，送子送夫参军，10天之内即有3400名青年报名；滑县五区魏齐邱村妇女模范黄金朵4次与丈夫商量，终于取得丈夫同意，夫妻双双参军。青年男子上了前线，妇女把后方的生产、保卫任务也勇敢地担当起来。男子参军走后，妇女立即进行生产组织工作，并建立妇女民兵，形成一手送郎参军，一手接枪自卫的壮举。

（2）妇女后方参战支前

在紧张战争情况下，我边区妇女不仅积极地支持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远离家乡参军参战，或紧随大军担负战勤工作，而且还勇敢地承担了后方支差、战勤、供应军粮、制做被服鞋袜、照顾伤病员等繁重任务，有许多妇女还亲临前线参加战勤工作。

2、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

在中央指示和区党委工作方针指导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前方打击蒋匪军，广大妇女则在新解放区及后方积极参加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

(1) 反奸清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边区部队收复了大片土地。1946年6月，新收复区已占全区一半。新解放区的农民群众过去长期在日伪与封建势力压迫下，生活困苦不堪，广大群众渴望复仇、翻身，迫切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特别是广大妇女，长期遭受欺压蹂躏，更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因此，在新解放区，妇女运动的中心就是发动妇女参加诉苦复仇的反奸清算运动。

随着日军投降，反顽斗争日益尖锐起来。盘踞在郓巨二区安兴镇冯庄孙秉贤的保安团卞九部7年多来投靠日军，侵扰我抗日根据地，杀人放火，抢掠奸淫；尤其是1941年活埋我抗日女干部李冉等7人的罪行，郓巨七区的妇女牢记心头。日军投降后，顽军卞九部不但不向日伪进攻，反配合日伪军侵扰我根据地。我根据地军民愤怒已极，于1945年9月一举消灭卞九全部，卞九本人被我俘获。9月中旬在一区辛兴集镇，由县政府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卞九的老窝云寺的妇女和群众大批涌向辛兴集，有的还带上剪刀和鞭条。大会上，群众高喊：“卞九是残害李冉同志的凶手！我们要为李冉同志报仇！”“我有仇！”一下子涌出四五十人要登台，竟都是妇女。控诉大会进行了四五个小时，她们边诉边哭边骂，骂了还要打。卞九的小老婆不顾执勤人员劝阻，哭喊着冲向卞九：“我受他多半辈子气，他害死我一家人，我不能便宜他！”她哭着、喊着、又骂、又踢、又打，卞九那张大麻脸又是泥垢又是血点。最后，大会主持人代表政府宣布判处卞九死刑。卞九处死后，郓巨七区的妇女和全县百姓拍手称快，对正在进行的清算诉苦运动和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妇女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也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地处边缘的新解放区曹县，斗争了大汉奸朱晓堂、王秋濯等9

个大汉奸头子，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获得斗争果实3471630元，全县128个村4.6万余人涌入了伸冤复仇浪潮。平阴县20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汉奸刘绪安；临泽县4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特务犯刘鉴如；泰安、鄄城、汶上、东垣、单县、宁阳、成武、郟北等县的6万群众向大汉奸吴乃九、李子才、周方略、穆远岐、林荣房、李肇凯等讨还血债，从而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迅速克服了怕“变天”的思想，提高了认识和觉悟。据1946年6月统计，济宁、嘉祥、巨野、东平、南旺、汶上、昆山实验区、鄄北、郟北、临泽、郟巨等15个县中，新解放区的4120个村中，群众已发动和初步发动起来的有2775个村，参加工、农、青、妇各种组织的达86638人。

边区反奸清算运动的胜利开展，摧垮了敌伪汉奸结合封建势力的统治，在斗争中建立起乡、村政权，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激发了农民参军参战、努力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妇女在参加斗争的同时，更加积极地生产和支前。

（2）土地改革

1946年6月10日邯郸会议后，区党委即组织干部在华南县进行土改试点，各级妇女干部也参加试点工作。华南县委在工作团帮助下，首先开展反奸清算运动，为土地改革扫清道路。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我黄河以南地区。河南地区坚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边进行战斗，边进行土改。9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决定公开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11月，冀鲁豫区党委对全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黄河南北广大农民掀起了土改热潮。黄河北的清丰县，仅20天即开展起广大的群众运动，有组织的群众达全县人口70%以上，全县没收地主土地408895亩，一般农民分得2至3亩地，军工属分得3至5亩地。黄河以南的鄄城县张苏尹楼，一部分会员到前线抬担架，另一部分会员在村中进行土改。

各地在土改运动中，都注意发挥妇女的作用。冀鲁豫行署颁布的《妇女分地法令》中指出：“男女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一律平等，乃我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政策之一。由于过去农民土地未彻底解决，因之妇女政治经济地位之提高亦受到了限制。现为了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把妇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以便使之在政治上更前进一步，以贯彻男女平等的精神，特决定在土地改革当中，妇女应与男子以平等地位享受分地之权利（已婚者，即在夫家分地）。如原在出嫁前分得者，亦可于出嫁时自由处理分得之土地，别人不得干涉。”我广大妇女以此法令为依据，更加积极地参加土改运动。

《妇女分地法令》颁布后，各级妇救会组织首先向广大妇女宣传，并组织大家学习，领会精神，以充分享有应得的经济利益。广大妇女还通过土改要求解决妇女的一些特殊权益。对此，冀鲁豫区党委刘晏春同志亦曾撰写《对妇女工作的意见》，刊登于《工作通讯》。

高陵县五区在1947年6月就召开了246名贫农妇女土改会议，会上大家做了四条规定：①不与地主分子通气，不帮助地主藏东西；②妇女有开会和参加活动的自由，家庭不得限制；③男人不准重婚，小老婆要改嫁，不得设阻力；④婚姻要自由，父母不得包办。

阳谷县在1947年初开始了土地改革，地委书记申云浦在万人大会上做了土地改革的动员报告。动员大会后，农民、妇女、青年、儿童都发动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汉奸和恶霸地主。王庄村的农会和妇会联合起来开会，通过诉阶级苦，算剥削帐，广大的农民和妇女进一步认识到，地主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没有一样不是农民的血汗换来的，农民之所以受穷受苦，就是因为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霸占了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

濮阳县四区召开1500名农民妇女大会，讨论土地复查与解决妇女切身利益问题，560余名妇女热烈发言。

在土改中，妇女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范县五区的400余名青年妇女要求永远参加妇救会；一区吴桥村的妇女会员在几天中

就由55人发展到104人。

在土改运动中，妇女民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截至1947年底，全区女民兵已有33999人。

在土改中，妇女还结合反封建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如清丰县阳邵区副区长孔德社（女）为贯彻冀鲁豫边区婚姻条例，于1947年8月召开300多名妇女的诉苦大会，会后有一部分不合理的婚姻得到解决。

由于妇女在土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得到了群众信任。长垣县八区前小渠村，敌人曾设据点，各种组织被冲垮。经一个月土改工作，农会与妇会均建立起来。妇女领袖史建岩、张庆华被选为村长和农会主任，并组织起民兵自卫队。妇女们表示：男子上前线打老蒋，俺在后方保家乡。

3. 战斗在游击区的妇女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我黄河以南广大农村和城镇后，区党委为加强黄河以南地区的斗争，组成了黄河南北两套班子。

黄河以南地区的妇女干部，虽经区党委指示可以撤至黄河以北在当地参加工作，但许多妇女干部与群众生死与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在游击区战斗。尤其是当地的区、村妇女干部，在与国民党军和地主还乡团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无私无畏，在中国妇女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1）游击战中的妇女

黄河以南地区，为了坚持游击战的需要，不少县都挖了地道。妇女干部便随武工队、民兵一起，利用地道打击敌人。敌占区的妇女利用地道来进行工作，白天蹲在地道里，晚上出来活动，组织妇女开会、动员参军、布置战勤任务等。砀山及单虞县的妇女干部张秀芝、王素芬和芳堂区的女干部领导民兵，加强联防，以地道为依托，昼伏夜出，与丰县顽军经常激战得胜，稳定了砀东局面。

（2）坚强不屈的妇女英烈

国民党军侵占黄河以南地区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

当地反动武装、地主还乡团更对我清算、土改中的积极分子疯狂地进行报复，其手段之狠毒，惨绝人寰。妇女干部面对严刑拷打及死亡威胁，毫不动摇，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肥城县老城乡乔庄村妇女会长曹付兰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立场坚定，站在斗争前列，同地富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地主汉奸对她恨入骨髓。1947年4月的一个晚上，群众抓住了还乡团匪乔兴臣，曹付兰亲自参加于当夜处决了他。还乡团于7日进行反扑，曹付兰母子5人落入敌手。敌人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坚强不屈。敌人当着她的面，用刺刀捅她的3个大孩子，孩子们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她满腔仇恨，斗志更坚。敌人见问不出口供，杀了曹付兰，还把她不满周岁的孩子挑在刀尖上刺死，只有女儿曹桂云被群众救活，一家4口为革命牺牲。

郓巨县汗石桥村西街的妇救会主任关贵芝，是1945年5月入党的党员，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她积极宣传、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斗争，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46年，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解放区，郓巨县被敌占领。还乡团借国民党军声势，到处搜捕我政府干部和共产党员。关贵芝不怕危险，依然坚持工作。1947年2月18日，驻丁官屯的敌人出动十几个还乡团丁到军王庄去抓村里的积极分子。关贵芝当时正在该庄。她一看只有几个敌人，便化装成讨饭婆溜出庄，向区武委会主任王文善报告了情况。王文善当即带领民兵和区武委会的干部包围了军王庄，活捉了还乡团小队队长王如林，缴获了4支长枪、2支短枪。

鄄城二区何李庄的妇救会长谌金芝在坚持本地区工作时因地主告密而被捕，还乡团对她审讯20余天，施用各种酷刑，她未暴露丝毫秘密。1947年4月，敌人用绳子把她绑在树上，乱枪扎死在北门外。

无数的妇女英烈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壮烈牺牲，她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奋勇前进。

(二) 妇女运动在胜利中前进(1948年秋至1949年9月)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边区妇女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鼓舞下,鼓励亲人参军杀敌,尽心尽力支援前线。全区200万妇女组成声势浩大的支前大军,满怀胜利的喜悦,带着报仇雪恨的激情,不分昼夜,碾米磨面,支援淮海战役,迎送南下大军。在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形势下,边区20万子弟兵编入二野五兵团,横渡长江,进军西南。许多妇女又响应号召,参加南下队伍,跋山涉水,开辟新区。经过4年解放战争锻炼的妇女在斗争中成长,各级妇女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壮大。1949年8月平原省成立,冀鲁豫妇女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新的征程。

1. 支援子弟兵,解放全中国

(1) 空前的参军热潮

1949年2月开始的参军归队运动中,自2月15日至3月15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即有1.4万余名劳动人民子弟参军。东明县一区刘庄左云邦老大爷参加村里的动员会后,回家召开家庭会。两个儿子争着参军上前线,两个媳妇也争着让自己的丈夫去。最后左大爷说:“别争了,二小年轻,有发展头,还是叫二小去吧!”这样大家才不争了。两个儿媳急急忙忙做鞋袜、做衣服,准备送行。

清丰县第四区张二庄女党员杨亚镇,家有70多岁的老母亲和两个5岁以下的小女儿,她参加村民大会后和丈夫说通,自己保证照顾好老母和幼女,不使丈夫挂心。丈夫思想通了,第二天一早她就到村长那里为丈夫报了名。

这一次参军的1.4万名新战士和归队的1600名离队战士,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十七军补训师,于1949年5月4日隆重举行向江南进军的誓师大会。

(2) 尽心尽力支援前线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我边区军民全力支持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豫皖苏、冀鲁豫、江淮、豫西等军区部队，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方圆数百里的战场上进行的。参战部队60万人，连同民工等，在前线吃饭人数约150万人，每天需用粮食、饲料约350至500万斤。在连续65天的战役前后，边区数以万计的担架队员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随军出征，夜以继日地运送给养、弹药和抢救伤员。老人、妇女、儿童在后方碾米磨面、做军鞋，昼夜不停。全区先后出动民工30余万人、牲口12万头，组织担架1万余副、大小车15万多辆，运送小米、白面1.05亿斤。可以说，每村、每户、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了支前工作。

黄河以南的巨南县，在敌我拉锯战中，受到严重摧残。群众听说淮海战役是在长江以北解放军与蒋家王朝的最后一次大决战，蒋家王朝就要垮台，男女老少无不欢欣鼓舞，支前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要钱出钱，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支援解放军打胜仗！”淮海战役期间，他们支援军粮200万斤，妇女们组织起来碾米磨面、做军鞋，男的把小米、白面送往前方。当时正值阴雨天气，在送粮路上人喊马叫，入夜灯火齐明，广大群众克服种种困难，把粮食送往前方。解放军和南下干部渡江到达江西上饶和湖南长沙、湘潭时，还吃着冀鲁豫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的小米。

齐滨县二区妇女接到碾米任务后，争先恐后地干，有的妇女想出很多办法，把米碾得又快又好。如口湾村李进才之妻李大嫂，认为捣米太慢，碾米又少，她发明把豆腐磨子的上扇盖在地上安好的木桩上，磨下边放上谷子，拐出8/10的小米时再在地坑里捣一遍。这样一小时能春20斤谷子，又快又不烂米。全村很快都推广了她的做法。大李村50多岁的李大娘和老伴把米放在簸箩里用新砖搓，然

后放在地坑里捣，一天能碾好60斤米……

曹县五区后张庄村，70多岁的翻身妇女张秀荣，看见支前的小米急需口袋，便把儿媳妇新婚的被子剪开，做成口袋装米，并对儿媳说：“前方用米当紧，等打倒蒋介石，不愁没好日子过。”

鄄城县妇女碾米磨面373万余斤，做军鞋4万余双。鄄城东南的陈庄只有130多口人，村里分配的军鞋任务是200双，要求7天完成。妇女们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把敌人消灭在淮海战场，为了使子弟兵在大冷天不受冻，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她们提出来：“眼熬红，手磨烂，做军鞋，送前线；里也新，表也新，好鞋送给解放军。”全村65位妇女苦战5昼夜，完成军鞋230双，提前两天超额完成任务，受到区政府的嘉奖。

由于解放区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援前线，特别是妇女们碾米磨面，缝衣做鞋，在淮海前线敌我阵地上，形成鲜明的对照。天寒地冻，我军指战员早已穿上御寒的棉军装，一天三顿吃的是白馍小米饭。除夕之夜，元旦之晨，大家还包饺子吃；敌人被围在少数村庄里无粮无柴，甚至杀骡马、捉老鼠吃，把棺材板掘出来当柴烧。人心的向背决定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2、跋山涉水，支援新区

1948年10月，华北局决定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南方新区。1949年2月下旬，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联合组成南下干部支队，其中有不少女同志，如白林、李敬珍、李蕴华、李子平、陈杰、李耘平、刘秀英、徐广春等。

湖西地委南下500人中，妇女干部就有50余人，其中有吴荣坦、靳向纯、任守范等。这些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历尽艰险，行程数千里，抵达祖国的大西南——贵州，为建设新区再做贡献。

表现最突出的是任守范同志，她是唯一的和男同志一样背着行李行军走完全程的女同志。而且在行军中，她为体弱的同志背行李，宿营时，她又借铺板，烧洗脚水，做饭菜，使同志们及时休息吃饭。每次出发前，她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志们都

夸她是铁打的。行军结束时，大家一致评她为“行军模范”。任守范到贵州后，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参加了土改、清匪反霸运动，并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努力工作。1950年3月2日，她在贵阳市鸡场区工作时，被匪徒包围。当时她怀有身孕，但仍然英勇战斗，在突围时，为掩护另一位女同志而光荣牺牲。

3、妇女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妇女干部在斗争中成长

冀鲁豫边区政府一贯重视和支持妇女解放事业，不仅支持妇女反封建、反迫害、反虐待等民主要求，而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制定并颁布了维护妇女权益的法令，使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1941年11月，晋冀鲁豫行署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中规定：女工在“三八节”、童工在“四四儿童节”应各休假一日。《暂行条例》对男女同工同酬、青年女工和童工待遇也作了若干规定。同年12月，冀鲁豫行署颁布《冀鲁豫区产妇婴儿保健办法》，对妇女生产前后及婴儿出生之后休息时间、物质待遇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1942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在总则中确定了婚姻平等自愿，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及伙同娶妻。在订婚、结婚、离婚各条中均强调了双方自愿原则，特别对寡妇再嫁及离婚后女方及子女的生活照顾均作了明确规定。边区政府还公布了《冀鲁豫行署关于女子继承权等问题的决定》。

为了解决妇女干部的特殊困难，行署于1944年4月10日发出《关于成立冀鲁豫区婴儿保育院的通知》，并令樊策等同志负责筹备工作。1945年春，为了解决妇女干部生孩子的困难，保育院增设了妇产科，由任苏兼任科长。

1944年9月，冀鲁豫行署发出《禁止妇女缠足》的训令以及《禁止妇女缠足暂行办法》。各级妇教会据此进行广泛宣传并积极组织检查执行情况。过去由于缺乏明确法令，有些地区常常出现反复。

自从有了政府法令，在宣传教育基础上再加以行政措施，放足和不缠足逐渐普遍。

1947年3月，冀鲁豫行署颁布妇女分地法令，更使妇女经济地位得到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妇女参加土改运动的积极性。

1946年7月，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各级负责同志及民政部门要经常有计划地吸收与培养妇女干部，并逐渐提高其能力、地位，使妇女参政问题名副其实地见诸实现。

在妇女参政方面，边区妇女组织在战争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政权建设，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各级妇救会任务之一就是发动妇女参政。一是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各级政府的选举，二是推荐和选举有能力有威信的妇女同志担任各级政权的领导职务。如1939年肥城县选举李文甫任县长时，有 $1/3$ 的代表是妇女，她们都认真地投了票。

随着妇女觉悟的提高、能力的增强和在实际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中的许多人被选入各级政府，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许多人被选为人民代表，许多人被选拔为各级党政干部。

4、妇女组织发展壮大，妇女运动胜利前进

1948年5月15日，中央对妇女工作发出指示，提出：重视妇女工作是以完成整个战略任务争取全国胜利出发的。实现党的总政策总路线，没有 $1/2$ 人口的广大妇女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轻视妇女工作，将大大削弱革命的群众基础。因此，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整顿妇女组织，迅速纠正妇女工作放任自流的状态，把妇女工作的中心放到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在生产中改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地位，切实解决妇女的切身特殊问题，保护妇女的正当权益。

各地委、县委及妇女组织为贯彻中央指示，均对本地区妇女工作进行了研究、总结，肯定了妇女工作在土改、支前、参军、生产等各项中心任务中做出的成绩和贡献，对工作中的问题也进行了分

析研究并统一了认识，决定加强领导，整顿、恢复妇女组织，进一步明确了妇女工作的方向主要是：“组织妇女广大劳动力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共同发展生产，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明确了“这不仅是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是保证妇女利益的中心环节。”各县县委在研讨妇女工作后，均制定了具体措施，以整顿妇女组织，纠正抗战胜利后妇女工作自流的偏向。

通过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和妇女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妇女干部受到了教育，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政策观念增强，政策界限进一步明确，迅速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把广大妇女引导到发展生产、努力支前的工作中，使妇女组织在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夺取全国胜利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949年1月6日至11日，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以上的妇女干部会议。范世钧、李若峰（二地委），朱慕兰、苏健（三地委），江岩（四地委），王智（五地委），沙晓鲁、张风全（六地委），董维华、李虹（七地委），刘清霜、江波（八地委），李曙明（九地委），季凯（保育院），张露、吴颜（范县）共16位妇女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检查了贯彻中央妇女工作会议精神及区党委妇女工作指示的情况，汇报了妇女参加生产，妇女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情况及各级妇委的组织和建设情况；并对召开边区妇女代表大会，选派代表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and 选举与健全各县妇联组织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具体布置。

1949年2月5日至13日，召开了全区妇女代表大会，妇女代表150人出席。会议选举张秀岩、白林、沙晓鲁、范世钧、万丹如、边涛、李秀真、程悦、李秀等13名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选举董维华、李曙明等26名代表及2名候补代表出席华北妇女代表会议。会议还改选了冀鲁豫区妇联领导机构，选出白林、范世钧等妇联委员19名，候补委员2名。会上还讨论和明确了妇女工作的方针。

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

怀仁堂隆重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邓颖超、蔡畅在大会上做了报告，高度评价了解放区妇女的作用和成绩。我边区妇女代表李秀真向全国妇女代表汇报了冀鲁豫妇女在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使与会代表深受感动与鼓舞。

1949年8月20日，中共平原省委、平原省人民政府成立，并随即成立了平原省民主妇女联合会，选举万丹如为妇联主席。1950年6月，万丹如调华北妇联，范世钧继任省妇联主席，并兼任平原省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省妇联下设秘书处和4个部，组织部长李曙明，宣传部长冀雨、副部长陈静夫，生产部长李静，妇女儿童福利部长税悦，秘书长戴服劳。

省妇联组织建立健全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地、县、区、村各级妇联也相继建立、健全。各级妇联干部带领全省500万妇女在完成历史任务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三、巨大的牺牲，无私的奉献

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中，冀鲁豫边区500万妇女参军参战，流血流汗，出生入死，英勇拼搏，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努力生产，建设边区，为战争的胜利，为妇女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下面仅举几个典型例子。

1942年春夏间，敌人到鄆城县三区王垓村骚扰。群众刚跑出村就碰到了敌人，区干部冀衡福也在其中，王嫂正巧走在他身旁。这时敌人吼叫着：“抓活的！”“站住！再跑就开枪了！”眼看老冀就要落入敌手。在这紧要关头，老冀听到旁边一位妇女急促的声音：“别怕，你抱着孩子快坐下！”老冀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王嫂同他并肩坐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家3口。刚坐下，敌人已来到身边，一面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们，一面想动手抓老冀。王嫂见状大声说：“别吓着孩子！”敌人问王嫂：“他是你什么人？”王嫂从容地说：“俺孩子他爹。”敌人说：“是真的？如说瞎话，连你

和孩子一块杀！”王嫂马上反驳：“谁家会认假男人，谁给自己的孩子认假爹？”敌人没话可说，便走开了。老冀脱险后，望着机智勇敢的王嫂，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由于叛徒出卖，优秀妇女干部李冉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拷打。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昏死过多次，但她没有吐出半句软话，坚决保守组织秘密。孙秉贤见硬的不行，就说：“你一个青年女子何苦呢？你还是自首吧，自首书我已给你写好了，你签个字，我就放了你。”李冉大怒：“你想错了，收起你这一套！我不会向你们自首！”孙气急败坏地说：“你真的不怕死吗？”李冉断然回答：“为了抗日，为了救国，我决不怕死！”孙秉贤凶相毕露，大喝一声：“拉出去活埋！”李冉毫无畏惧，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刑场。孙秉贤走到李冉面前，指着几个行将就义的同志问她：“怕不怕？自首不自首？这是最后几分钟了。”李冉怒视着敌人：“少罗嗦！我怎样死？”孙恶狠狠地说：“一个样！”李冉立即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从容跳进深坑。牺牲时，她年仅22岁。

官四大娘本名李二趁，滑县人。丈夫李昌邦是个雇工，1933年参加共产党，后因与地主进行夺粮斗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夫妻开了个小酒馆做掩护，建立了地下联络站。

七七事变时，官四大娘已51岁，她加入了共产党，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李昌邦再次被捕壮烈牺牲。官四大娘忍着悲痛，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她多次智斗敌人，营救同志。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中，她积极宣传政策，带领群众进行斗争。内战爆发后，她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把一批批青年送上前线。1947年冬，还乡团包围了村庄，搜捕李二趁。她挺身而出，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在这里！”还乡团对李二趁严刑拷打，用石磨压住她的手指，用烧红的铁条烙她的全身，但四大娘仍守口如瓶。最后敌人在她脖子上拴住一块大石，把她推下井去。她一家3口为革命献出生命。生前人们称她为“四大娘”，壮烈牺牲后人们称她为“官四大

娘”。一个“官”字，说明她一心为大家，说明她属于人民。

河南省淇县黄洞乡靳月英，1944年支持丈夫冯金海参加了革命。1946年冯金海在一次战斗中因掩护战友而光荣牺牲，年仅25岁的靳月英化悲痛为力量，带着襁褓婴儿，继承丈夫遗志，被誉为拥军模范。土改时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斗地主分田地，当选为村妇救会主席，加入了共产党。建国后，她是劳动模范，全国“双拥”先进大会代表，模范共产党员；17次出席省、地、县各级军烈属代表会。1959年、1984年先后两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双拥”代表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的接见。

在长达12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冀鲁豫500万妇女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尽所有的物力、财力支援革命。妇女们在操持家务中，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将小米白面送到前方。大批妇女还直接担负着支前、劳军任务，掩护伤病员及党政军民干部；为部队制做鞋袜被服；参加破路、挖沟、“坚壁清野”，保存军用物资，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反“扫荡”斗争。她们日夜奔走于游击区、敌占区传送情报，侦察敌情，瓦解敌军……在整个战争年代，她们无私无畏，不怕艰难险阻，机智勇敢，百折不挠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一支庞大的妇女队伍，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前仆后继，战斗在冀鲁豫广阔的土地上，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广大妇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改善民生的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改变了传统观念，获得了解放与自由。她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永存，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将永远激励着广大妇女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

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概况

王 克等

冀鲁豫边区，地处鲁西、直南、豫北的大平原，是延安革命圣地和华北联系华东、华中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边区的广大青年和其他革命群众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创立了不朽的业绩。

(一)

早在1925年，山东党组织就曾派共青团员徐鹏翥、刘正甫到菏泽搞青运工作，先后发展田位东、孔庆嘉等30余人参加共青团（CY）。1930年6月直南特委成立，成润负责共青团的工作，直南各县相继建立和发展了共青团组织。1932年10月，共青团员沈奎卿联络菏泽、定陶的吴明翔等10余人，经团省特委批准，建立了共青团鲁西南特支。1933年3月济宁省立七中建立了团的特支。1935年春，张增敬任直鲁豫边区特委青年委员，即共青团团委书记，领导直鲁豫边区的青年工作。其他各地区程度不同地开展了共青团工作，并用读书会、书报介绍社、抗日义愤团和出版报纸等合法的形式，在进步青年中进行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日益猖狂，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1935年“华北自治”的乌云滚滚而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北平学生响应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国的运动从此掀起了新

的高潮，济南、济宁、大名等地的学生，在中共山东省委及河北、河南省委领导下，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成立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等青年组织，学生运动如火如荼。1936年2月在北平诞生了抗日爱国青年的先进组织、党的外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不久，“民先”在山东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济南创办了刊物《齐鲁先锋》。聊城、徐州、济宁、开封、曲阜、大名等地的党组织，也积极发展了“民先”组织。老一辈青年工作者，在冀鲁豫广大平原上播下了革命青年运动的火种。1936年11月，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造共青团，成立民族解放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大批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二）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49年8月冀鲁豫边区撤销，平原省成立，冀鲁豫边区的青年组织，经历了一个由先进青年组成的“民先”组织，转变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救会，再转变为先进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过程。边区青年运动的主要对象则由城市知识青年转变为农村工农青年，然后到更为广泛的城乡青年。这些历史性的转变，为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开辟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在这12年中，青年运动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七七事变到1938年。这一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青年运动由城市转入农村，实现了知识青年和广大农民相结合，青年运动与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完全融会在一起，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消极抗战，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局势混乱，人心惶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发出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号召。直南、豫北和鲁西南、鲁西、鲁西北、泰西以及湖西的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发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青年组织，广泛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发动青年，动员散兵散枪，组织游击队，使抗日烈火迅速燃遍冀鲁豫大地。

当时，国民党的有些地方政府和杂牌军还没有撤走。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我党在不少地方争取了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组织参加动员委员会等抗日组织，进行合法的抗日活动。国民党的聊城专员范筑先，是有名的抗战老人。他接受我党的建议，在各县建立了政训处和动委会，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被派到这些组织及游击支队工作，有的共产党员还被委任为县长，所以群众运动和青年运动开展比较顺利。直南特委也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冀鲁豫（老）边区救国总会，设立青年部专做青年工作。湖西地区也曾与国民党李宗仁合作，在第五战区组织了民众动员委员会进行工作。我党选派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参加各级动委会，掌握实际领导权。共产党员郭影秋以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名义开办两期青年训练班，召开青年代表会，组织青年救国团；青救团逐步发展到苏鲁豫皖4省30余县，团员达万余人。豫北地区与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也进行了合作抗日的活动。平津沦陷以后，一批“流亡学生”到达山东，经党的安排到韩复榘第三路军的政训处工作。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有240人集体到达国民党第六专区（聊城），有200人集体到国民党第四专区（临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济南乡师有学生50多人全副武装经菏泽开到聊城。冀鲁豫边区及其附近城市的爱国青年，也纷纷响应“脱下长衫到农村去打游击”的号召，自发地来到冀鲁豫边区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别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一些共产党员回到了边区，成为一支骨干力量，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们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办各种形式的干部训练班，培养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如泰西青年工作团，郓、鄄抗日青年训练班（群众称窝窝队）；单县黄后楼抗日青年训练班；冀鲁豫（老）抗日救国总会开办了大批抗日救亡训练班，在清丰县就开办5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

抗日积极分子700余人，并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1938年5月范筑先采纳我党建议，在聊城建立第六专区政治干部学校，每期学生400人，三个月毕业，4期共培训1000多名干部。各地抗日积极分子经过训练又分散活跃在各地。他们领导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运用各种形式组织青年抗日救国。冀鲁豫边区的各个地区都发展了“民先”，有的由党支部直接领导，有的也建立了基层组织——民先队部。发展规模最大的是鲁西北，到1938年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民先”队部，一部分游击支队中也建立了“民先”。1938年5月召开“民先”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鲁西北“民先”总队部，徐少岩为总队长。抗战老人范筑先对“民先”十分支持，担任顾问。总队部出版了机关报《先锋》，是年8月“民先”队员已发展到2500人。直南地区，1938年11月在濮阳城内召开千人大会，成立冀南“民先”分队部，梁伯琪、李静轩分任正、副分队长。边区“民先”队员共发展到4000人，对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在地方上建立“民先队”的同时，部队中也建立了先进战士的组织——“朱德青年队”，如鲁西北的十支队，泰西的六支队等，都建立了这种组织。各地区还运用学生会、读书会、十人团等形式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活动。有的地区如禹城、冠县、肥城、曹县、鄆城、沛县、丰县等也开始建立青年救国会（团）和儿童团的组织。这一时期青年组织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和知识分子。

二、1939年到1942年9月是青救会发展与巩固的阶段。各地普遍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学习、生产，参加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侵略军调集部队稳固后方，扩大占领区，对华北开始新的进攻。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与我闹磨擦，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扫荡”、反磨擦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1938年底到1939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分别进入鲁西和直南、苏鲁豫地区。1939年1月成立鲁西区党委。同年5月成立苏鲁豫区党委。1940年4月直南、豫北合并成立冀鲁豫（老）区党委，

鲁西南地委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各地、县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1940年4月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1941年1月成立冀鲁豫（老）行署。与此同时，迅速建立了地方军事领导系统，发展了抗日武装。

为了加强青年工作，1938年11月中央青委在延安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与西北青教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西北青教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议，全国青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实行大联合，参军参战。大会指出，要收复失地和保卫领土完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只有全国人民不分党派、性别、宗教信仰、地域、籍贯，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要把广大农村青年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参加延安青年工作会议的有冀鲁豫省委的辛明、臧育生、倪宗英，鲁西地区的刘培桐，直南地区的杨泽江。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各个地区都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工、农、青、妇、文、武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青教会成了青年群众的主要组织形式。“民先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儿童团作为青年工作的一部分也得到普遍发展。从1940年秋天开始，建立了青年群众的武装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1941年秋在各中等学校学生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边区学联筹委会。

1939年10月鲁西区党委召开全区青年干部会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委建立青委会，各地迅速配备了干部。1939年11月到1940年1月，鲁西各个地委都成立了青委会。区党委青委书记由民运部长徐运北兼任，副书记为刘培桐和王克。1940年3月间，刘调动工作，11月徐去延安，以后长期由宣传部长张承先兼任书记，申云浦也兼任过一个时期。泰西地青委书记是张延积、鲁西北地青委书记是王黎之，运西地青委副书记肖岩，运东地青委书记是王富海。这一时期多数县都已建立了青教会，到1940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鲁西地

区青救会员已发展到7.6万余人，其中工农青年占80%。泰西青救会主任张延积，鲁西北青救会主任王黎之。1940年4月4日成立了鲁西青救总会，王克、张延积分任正、副主任，组织部长张延积兼，宣传部长黄文，少年儿童部长冯克，军事体育部长梁欲文，秘书长李毓生。同月，运西青救会成立，主任史杰。不久，运东青救会也成立，主任王富海。

冀鲁豫（老）边区青救总会是1940年5月成立的，主任杨泽江，副主任洪学玉，组织部长谢忠信，宣传部长魏光明，生活改善部长洪学玉兼，武装部长刘东明。下辖两个分会，直南分会主任王桂生，豫北分会主任刘东明兼任。早在1939年1月，苏鲁豫区青年抗敌救亡协会成立，不久苏鲁豫青联成立，主任为孙衷文；区党委设青年部，部长孙衷文。1941年1月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湖西青联主任为高诚，以后为葛步海、张世珠。

1940年7月山东省召开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总会，会长为陈放；王克被选为宣传部长，仍在鲁西青救会主持工作；鲁西的张延积、李学智、田园，湖西的张德超等当选为总会执委。大会前，鲁西会员已发展到16万人，湖西为10万人，儿童团也大量发展。

1941年7月，鲁西与老冀鲁豫合并，成为新的冀鲁豫边区。两个青救会于9月合并，王克、杨泽江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张延积、纪登奎为正、副组织部长，黄文为宣传部长，冯克为少年儿童部长，郭乐天为军事体育部长兼任青抗先总队长，王黎之为青抗先总队政治教导员。

边区青抗先总队部建立后，地区设青抗先区队部，县设大队部，区、村为中队、小队。总队部举办训练班，训练区青抗先干部。至年底，全区青抗先队员发展到近万人。

青救会、儿童团以及青抗先的建立和广泛发展，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破路放哨，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执行政府公布的合理负担等各项法令政策，优待抗日家属，特别是

动员青年参军方面，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边区进行了大量的培养青年干部工作。自1939年冬季起，鲁西区党委青委会先后举办了3期训练班，每期百余人，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青年运动史和青年工作的有关理论知识，时间为一至二个月。各地县青救会也都举办了训练班。鲁西北青救会举办3期训练班，训练150余人。曹县青救会训练200多人。肥城、长清县的干部培训工作，做得更为出色。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曾号召“学习肥城青年，培养干部20万”。他说：在组织青年和培养青年干部上，山东有两个模范县，即肥城和长清，肥城人口60万，青年约6万。他们已组织起来的有1.2万人，两个月培养下级干部360人。他们干部很多，工作便很快推动起来，或者说因为他们推动工作好，所以才能培养出大批干部。这一批人不仅是开展青年工作的骨干力量，而且逐步输送到党政部门，尔后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骨干力量。

从1941年开始，日军多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国民党掀起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再加上我们工作上存在一些问题，1942年又遇到大旱，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时期。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反复“扫荡”，不断“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侵犯，使我根据地在1942年5月比1941年6月缩小3/7。根据地原有人口350万，只剩下200万，而且其中半数以上被迫也向敌人交粮。泰西只剩下纵横不到50里，而且碉堡林立。当时活动的中心区多在黄河两岸沙区，南北只有百余里，东西宽处100里、窄处仅30里，物产丰富的地区则完全被敌人控制。鲁西南除有一小片游击根据地外，巩固的只有刘岗、曹楼、伊庄3个村，从1940年8月开始，一共坚持了四个半月，叫作“坚持三村斗争”。敌人1942年4月3日对南（乐）清（丰）观（城）的大“扫荡”，1942年9月27日对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大“扫荡”，都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损失。一些干部被捕、牺牲，党政群组织遭到破坏。1942年4月3日大“扫荡”中，冀鲁豫各救总会干部18人

被捕。王克与杨泽江也在其中（杨于第二天途中跑回，王于次年回到边区）。他们被捕后对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泰西青救会主任雷清亮同志光荣殉国。在战争中牺牲的青年工作干部还有王桂生、靖瑞图、郭思九、刘效、张会芬、张德明、胡腾霄、阎庆堂、马功等，华北青委巡视团袁光在昆山工作期间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所有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青年工作者，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41年1月“肃托”中被错杀的优秀青年工作者、鲁西青救总会秘书长李毓生也永远为我们怀念。

1942年对敌斗争异常艰苦，水、旱、虫灾十分严重，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有的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卖儿卖女，一斗粮食可以换一个大姑娘。地方工作人员按规定每天只有旧秤12两小米，有些青年工作干部还勒紧腰带，节约出一部分送给抗属及困难户。当时没有洗脸毛巾，一块粗布用一年，没有牙膏，用盐代替；每年发一身单衣，没有染料，用黄泥土染成“紫花”。人人都以身上有“抗日虫”（虱子）为荣，几乎每个人都生过疥疮。但大家都以苦为乐，团结一致愉快地工作。各级青年组织率领青救会员、青抗先队员和儿童团员进行抗灾救灾和生产自救的活动，开展反资敌、打碉堡、割电线、破坏敌人交通的斗争。青年工作一直开展到接敌区、敌占区。如冠县青救会在红十字会内组织“青年小组”，对“扶乩”柳继圣的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勾结日伪等罪行进行评理斗争，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艰苦年代，冀鲁豫边区青年在区党委领导下，和全区人民一道，在各条战线上克服困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三、1942年9月至1945年日本投降，是青年工作深入发动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减租减息、民主民生斗争，参军参战、开展游击战争。

1942年9月刘少奇途经冀鲁豫边区，在听取汇报后，对革命战略与策略、当前工作、群众运动、党内斗争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在肯定成绩后指出：如果不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总

有一天，敌人会把你们挤垮、赶走。没有牢固的群众观点，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他还阐述了没有群众工作就没有根据地，以及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基本群众的道理。区党委根据以上指示，决定以深入发动群众为全区中心工作，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政民工作队，到中心区各县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并按照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的精神，作出《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将根据地县级及县以上的工、农、青、妇各抗日救国会合并为各级抗联，统一领导各群众团体的工作。抗联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和秘书处，分别负责所属范围的工作。区以下组织照常单独活动。各个救国会干部大批参加到统一组织的政民工作队，深入基层，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纪登奎在酃北发动群众，开展双减运动，创造了新的经验，影响很大。黄文在濮县的工作总结，介绍后效果良好。有的青年工作干部担任了党委工作或抗联主任。双减运动使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汇合在一起，青年在民主民生斗争中打先锋、作骨干，在斗争中建立健全青年组织，充分发挥了作用。滑县黄庄，经过斗争锻炼有20人参加了青救会，65人参加了儿童团，67人参加了姊妹团。各地青救会组织，和黄庄一样牢牢扎根在广大农民青年中，并积极动员青年参加青抗先，拿起枪杆参加抗日战争，保卫斗争胜利果实。青年们有组织地支援前线，主动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踊跃参加对部队的慰问活动。在1943年夏季灭蝗斗争中，青救会、儿童团又是一支突击力量。为了战胜灾荒，青年们积极参加生产救灾、变工互助、大生产运动，在抗日沟两侧比较普遍地、有组织地种上了蓖麻子和芥菜，既有利于反“扫荡”中隐蔽活动，又有利于人们生产渡荒。这一时期青年运动在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参军、参战、生产、学习、民主民生斗争等各项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全党全军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从1943年起，冀鲁豫边区整个形势开始好转。194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克服

困难，坚持抗战，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积蓄力量，准备反攻。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发布反攻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前进，接受日本投降。冀鲁豫行署与军区也联合发出反攻总动员令。各县随即组织反攻营，扩大基干团，数以万计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冀鲁豫边区除济宁、菏泽外，东起津浦，西到平汉，南到黄河，北联德（州）石（家庄）铁路，纵横千余里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我控制。

四、1945年8月到1949年全国解放。主要任务是动员青年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争取全国解放。

日本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匆忙下山“摘桃子”，不让我们受降，企图独吞胜利果实，一面施放“和谈”烟幕，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中共中央1945年8、9月连续发出指示，要求集中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扩大解放区，准备将来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冀鲁豫边区立即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正规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向周围敌人进攻，扩大解放区。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月，先后解决了菏泽、济宁，冀鲁豫边区完全连成一片。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区党委、军区、行署立即抽调300多名干部分赴定陶、南华、南乐等地的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各地区也都抽调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整个根据地内立即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农村90%的群众。青联会（青救会于抗战胜利后改为青联会）根据统一部署，动员青年参加正规军、地方武装及民兵，积极参加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

1945年冬，国民党为发动内战，以水代兵，单方面决定黄河河水回归故道，1946年3月于花园口正式动工，进行堵口工程。5月间，菏泽、临泽等地15万群众集会，签名抗议国民党这一罪恶行径。沿河群众和广大青年响应边区行署号召，5、6两个月中有21万人上

堤,进行沿河修堤工程。1947年7月,又动员10余万民工上堤,前后30余万人完成土方1300多万立方米,保证了边区数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了反对黄河归故的斗争和筑堤自救的活动。当部分黄河水开始流回黄河故道时,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会同黄委会于1947年1月13日发出通知,声讨水淹解放区的罪魁祸首蒋介石,号召边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抢险自救。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8月28日,国民党30万军队开始向冀鲁豫边区进攻。我军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采取了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方针,黄河以南遂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主要战场。区党委号召全区党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做好战勤工作。刘邓大军8月出击陇海路,二、三、五地委出动民兵一万多人随军破坏铁路,动员民工15.6万多人送弹药、运粮食、抬担架,胜利完成了支前任务。

1946年9月中旬,在国民党以30万军队占领冀鲁豫边区黄河以南农村、城市后,区党委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恢复这一地区。主要领导干部去黄河南坚持斗争,并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战斗口号。不少地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保护群众利益,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为了保证部队粮食供应,号召群众藏粮,开展护粮斗争,武工队、民兵保护夏收秋收,青年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1947年5月11日,新华社发表《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冀鲁豫掀起参军热潮,全区入伍近10万人。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8月,大军越过陇海路,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敌占区。华东野战军进军鲁西南。又经过一年的拉锯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菏泽守敌弃城南逃。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我军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时期中,边区青年特别是黄河以南地区的青年同

广大群众一起，积极参军与支前，对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青年工作干部转到党政各部门工作，有些带领青年参军。

1948年10月，华北青委在河北省平山召开建团工作会议。中央青委冯文彬和华北青委许世平主持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冀鲁豫区党委周国玺、鲁西南地委史杰、运西地委常邦国、运东地委王序南、边区学联史常学，湖西及濮阳地委也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明确了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青委会，首先搞好建团试点工作，然后，逐步全面开展建团工作。会后，鲁西南地委在曹县刘岗，运西地委在鄄城县旧城集进行了试点。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县以上青年干部会议。会后在全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建团工作。到3月间，区党委、地委、县委三级青年团筹委会全部成立，青年干部基本配齐。从此，边区青年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48年青年团华北工委成立。1949年3月26日至29日边区青年代表大会在菏泽市召开，成立冀鲁豫边区青年联合会，选举葛步海等17人为委员，梁东峰等2人为候补委员。会议并通过了《关于目前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选举葛步海、张大乙、洪学玉、史杰、黄明吾、梁步庭、高桓、钐风楼、王洪山等9人为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4月，在北京召开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冀鲁豫区党委派葛步海、梁步庭、黄明吾、史杰、张大乙等同志参加。

据统计，到1949年7月20日，冀鲁豫边区已发展团员7000人。

1949年8月20日，冀鲁豫边区撤销，成立平原省。平原省委青委随即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原省委成立，葛步海为书记，梁步庭为副书记。

1949年1月21日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建团决议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区青年工作，在八年抗战及二年半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是有伟大成绩的。”1937年到1949年的12年，是翻天覆地的

年代，是新人辈出的年代。冀鲁豫边区的广大青年，和边区的人民群众一起，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边区青年运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就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有些人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三)

边区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青年救国会（日本投降后改为青联会），其工作任务除自身建设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青年学习，教育青年一代，是青年组织的基本任务

列宁说：青年团的任务在学习。边区的“民先”、青救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始终把教育青年一代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革命道德的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鼓励和引导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并围绕各个时期的斗争形势，针对青年的思想实际，用青年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反复地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鼓舞战斗意志，把他们引导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没有强有力的、细致而又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能调动千百万青年投入战争的积极性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的命运，特别是关系到掌握未来的青年一代的命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责无旁贷，更要一马当先。

抗战初期，主要是进行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野心和惨无人道的罪行，指出亡国灭种的危险，号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群众万分惶恐。在此情况下，边区的“民先”与青救会等青年组织，根据党委部署，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即《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时期的任务》)和《论持久战》等著作,广泛教育青年,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前途,形势与任务,以及游击战争的意义与内容等,并用平型关战斗等军事斗争的胜利,说明日本军队不是不可打败的。同时进一步说明“国”与“家”的关系,“国亡”必然“家破”,“卫国”才能“保家”,“卫祖国、保家乡,齐心协力打东洋”,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天职,把抗战决心与胜利信念紧密结合起来。

青年人最富有理想,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教育特别重要。抗日战争是千百万人民争取生存的战斗,是正义的人民战争。总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那时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不分贫富和贵贱,而且“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为了争取幸福的明天,必须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向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们学习,向淞沪抗战的八百壮士、抗日英雄学习,向近百年来在民主民族斗争中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们学习。青年们一旦接受这些道理,就毅然参加抗日的队伍,落后的家长们千方百计拉后腿,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当时边区农村有一种传说:“共产党、八路军有‘迷魂药’,年轻人一吃这种药,就不要家了,也不要命了。”这种使青年人革命第一、英勇奉献的“迷魂药”不是别的,正是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教育。

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还对广大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形成“助人为乐、损人可耻”的社会风气,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正像当时在青年中广泛流传的苏联《祖国进行曲》中所讲的那样:“我们高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根据地与国民党的“大后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培育了根据地内的一代青年。

对青年群众还经常进行政治形势教育,特别是在形势重大变化

的情况下。青年群众的思想有时是复杂的混乱的，而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积极的行动。从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抗日战争到以阶级矛盾为主的解放战争，是革命的重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在以美国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几百万大军的进攻下，广大群众怕“变天”心理相当普遍，惧怕地主、还乡团在蒋军到来时向群众反攻倒算；部分群众还存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正统”的观念。同时，群众对我军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不大理解，缺乏胜利信心。此时，区党委着重指出，蒋介石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政府是独裁、专制的反动政府，揭露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的目的，就是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使已经翻身的解放区人民重新回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指出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建立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宣传我军采用的运动战，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用我军的赫赫战果，逐渐消除群众的疑虑，证明“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正义之师，是可以打败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反动军队的。这样，澄清了群众中的一些糊涂观念，激发了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积极性。

为了完成各项中心工作的要求，青年组织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对青年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如在减租、减息、增佃、增资及土地改革过程中，针对“地主富农养活贫雇农”的谬论，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和讨论，用算帐对比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是贫雇农养活了地主富农，而不是地主富农养活贫雇农。又如在抗战初期的参军工作中，遇到了旧社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说法的阻碍，我们便以人民军队与旧社会军队的不同性质和参军抗战是青年的光荣职责来教育青年，而且谱写了“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的歌曲教青年们演唱，不仅促使青年争相报名参军，还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

对青年除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政治形势和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外，还组织青年学习文化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鉴于边区农村文化落后，青年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很大，于是广泛开展了识字运动。比较普遍而又集中的形式是“冬学”，即利用冬闲期间组织学习。由于多是在夜间进行，所以又叫“夜校”。边区的冬学一般办在地窖里，这里气温比较高，外界干扰少，青年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唱歌，有说有笑，不仅学习文化，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形成了青年人喜爱的聚集场所。在农忙、半农忙的时候，学习组织形式则多种多样，有的组织青年识字班，以青教会小组、生产互助组或青抗先的班组为一班，由专人负责教学，或拜能者为师。有的开展“小先生”活动，由小学生教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识字。有的开展“一日一字”、“一日二字”运动，有的设立识字牌，挂在村头路口上，以便过路时多看熟记。由于识字运动的普遍开展，使边区数十万青年脱离了文盲状态，并且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在各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如鄄城青教会员肖银聚，原是文盲，经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入了党，参加了青抗先，在各项工作中事事走在头里，以后被选为村青教会主任。他能写会算，不久被提为脱产干部。他的先进事迹曾有专门报道刊登在边区青教总会刊物《新青年》上。

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根据1940年10月鲁西行署要求各村建立俱乐部的指示，不少地方组织了歌咏队和剧团。他们的文艺节目，从秧歌舞、小歌剧、活报剧、小话剧，发展到一定规模的话剧、歌剧、舞蹈和地方戏，如《白毛女》、《贫女泪》、《血泪仇》、《小二黑结婚》、《亲家母顶嘴》、《兄妹开荒》、《翻身保田》等。这些节目很受群众欢迎。有的还结合实际自编自导了一些节目，以配合中心工作的开展。各地青教会、学生会和儿童团组织，在重大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五四青年节、四四儿童节）开展文娱活动。有狮子舞、龙灯舞、踩高跷、跑旱船、地方戏、民族乐器演奏等，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把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的思想内容融会贯通于文娱活动之中。在体育活动方面，由于农村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开展军事体育活动，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如上操跑步、掷手榴

弹等，还有救护、抬担架的常识教育。有的学校和个别村庄，也组织过一些简易的田径比赛活动。

不论对青年进行教育还是组织学习，一般都注意了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采用青年人喜爱的活动形式。从抗战开始，一直广为采用的宣传教育形式是大唱革命歌曲，它在唤起群众觉悟、鼓舞斗争意志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抗战初期普遍流行的歌曲如《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长城谣》、《黄水谣》、《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揭露了日本鬼子的残暴，激发了群众的民族仇恨，坚定了保家卫国的决心。《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土起刺刀来》、《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青年进行曲》、《歌唱八百壮士》、《到敌人后方去》、《十家共一把切菜刀》等歌曲，指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我们要一以当十、百以当千，没有后退，只有向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给了群众以奋起抗战的百倍勇气。在号召参军、拥军及组织生产方面，如《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戴花要戴大红花》、《送郎上战场》、《五更缝棉衣》、《再见吧，妈妈》（苏联歌曲）、《八路军进行曲》及《二月里来》、《南泥湾》、《兄妹开荒》等，对参军、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全国动刀兵》、《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歌曲，引发了广大青年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激情。此外《边区进行曲》、《青年颂》、《青救会歌》、《青抗先歌》，在青年中流行也很广。《边区进行曲》的歌词是：

太阳照红了东方，春风吹荡着麦浪。

我们自由地走，纵情地唱。

在这广大的平原上，

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敌人，有过这样的后方。

东至津浦线，西到卫河岸，

黄河边，怒吼着武装抗日的群众一千万。

一千万，游击战，到处打得敌胆寒。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把他消灭在哪边。

《青抗先歌》的歌词是：

中华男儿汉，个个英雄胆，

鲁西的青抗先，英勇又善战。

打倒日本鬼，消灭汉奸队，

卫国保家乡，美名天下传。

当时还收集编印了一些歌谣教儿童唱。有一首歌词是：

日本鬼，太猖狂，奸淫烧杀又抢粮。

又杀猪，又宰羊，闹得鸡飞狗跳墙。

不要悲，不要伤，拿起刀枪干一场。

还有一首是：

日本鬼，喝凉水，打了罐，赔了本。

坐火车，轧断腿，坐轮船，沉了底。

上战场，碰枪子，呜呼一命作了鬼。

所有流传的歌曲，一般都通俗易懂，易为广大青年和儿童传唱。会场、田间和村头，响遍了抗战的歌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的抗战热情。除了大唱革命歌曲之外，教育青年的组织形式，还有训练班、宣传队、剧团、读书会、夜校、识字班，以及节日游园会等等。通过这些为青年所喜爱的活动，潜移默化地教育青年，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它的教育效果，要比“填鸭式”的大报告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对于青年的教育，还有一种形式，这就是组织参加斗争实践，如参战、支前、优属、拥军、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反恶霸、反还乡团等实际斗争，对青年的教育锻炼更为深刻。

对青年工作干部的教育。青救总会和分会都举办训练班，还出版了一些不定期的刊物。如鲁西青救总会于1940年夏出版了《鲁西

青年》，第一期上鲁西行署主任肖华的题词是：中国青年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抗日救国的主力军。1941年7月两区合并后，边区青救总会的刊物改为《新青年》，社长是黄明吾同志。泰西的《泰西青年》、鲁西北的《青年战线》、湖西的《边区青年》、《青年园地》、《青年阵地》等刊物，对推动青年工作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这些刊物都已散失无存了。

伟大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是教育青年的大学校，是锻炼青年的大熔炉。边区的广大青年，在党和青年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很快地健康成长，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不少干部。

二、广泛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在战争年代，对敌武装斗争是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边区各地的青救会在动员和带领青年参军参战中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动员青年参军，壮大主力部队

抗战初期，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战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冀鲁豫边区的大地。为了救亡图存，在我党的发动、组织下，大批青年纷纷参加抗日部队。青年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中有鲁西北的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青年支队，泰西的青年连，湖西的青年队、青年武装工作团，丘县、莘县等许多县建立了青年连。这些青年武装组织是脱产的，一般都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如鲁西北的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一次遭受四五百日伪军包围，突围中包括大队长在内的21名同志壮烈牺牲，有的在敌人的枪口下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青年武装在经过许多战斗后，相继编入了军分区和军区的主力部队。

1938年底和1939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的一部分部队开进老冀鲁豫和鲁西地区，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梁山、潘溪渡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军威大振，广大青年深受鼓舞。在“誓死不当亡国奴”、“保家卫国打东洋”的口号激励下，许多青年报名

参军，使我军兵员得到及时的补充，壮大了队伍。

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由于减租减息、民主民生斗争广泛深入开展，广大青年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以及政治地位都有极大的提高，经济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抗日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参军热潮迅速高涨。这时边区根据地各县，每年都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这些参军运动的特点，是直接参加主力部队，广大青年高唱着“当兵要当主力军，不是好铁不打钉”的雄壮歌曲，踊跃报名。“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场面随处可见。参军青年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敲锣打鼓，直接送到部队，受到部队首长的热情欢迎。当时的情景，真像过盛大节日一样。

1946年6月，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冀鲁豫全区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青年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积极性空前提高。国民党军队及地主还乡团所到之处，疯狂地反攻倒算，残酷地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农、青、妇组织的积极分子，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白色恐怖笼罩大地。这些暴行激起了青年的极大义愤，在“保卫解放区、保卫土地、保卫斗争果实、为死难的父老兄弟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边区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参军高潮。

在党的教育和青年组织的动员下，边区青年踊跃参军的范例不胜枚举。如鄆城旧城集，在1943年“十·一二”大“扫荡”后，一次就有青救会员40多名集体参军，先是组成了抗日青年沿河联防队，不久即升入了主力部队。鄆城六区申庄村青救会干部翟贵勤，入党当了支部书记。他是独生子，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人。在1944年春天的一次参军运动中，他以阶级仇、民族恨的道理说服了母亲，毅然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主力部队——七团。到部队后，他服从命令，作战勇敢，团结同志，被提拔为连长，1949年初在淮海战役中英勇牺牲。这个县在日本投降后，有400多人参加了反攻营，连同县、区武装，共800多人一起参加了主力部队。其中大多为青救会

员，不少区、村青年干部担任了班、排、连长和教导员。1947年秋，400多民兵在鄆城城内一次诉苦大会后，掀起参军高潮，一队紧接一队，当场报名登记参加主力部队的近300人。

又如冠县，1940年夏天，仅一区青救会就动员了100多名青年参加县基干队，秋末全部编入主力部队。1944年9月，仅20天的时间就有182名青年参军。由于冠县青救会动员青年参军任务完成得出色，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和鲁西行署通令嘉奖。1938年到1941年这个县参军人数为5950名，1942年到1945年为12410名。一个18万人口的县，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人参军，其中多数为青年。

再如阳谷县徐良府村，全体青救会会员集体报名参军，一次报名参军的多达上百人。有些年龄较小的，也积极报名参军，在审批时，不让谁去，谁就不高兴。宁仓小区，报名参军的青年一次就有200多名。南乐县较大的村庄，都是成排成连的青年参军。

参军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军人数也越来越多，全边区在1946年8月到10月的三个月中，参军人数多达10万余人。

在参军的热潮中，许多青年工作领导干部报名参军。如王黎之，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带头参军，担任了七纵队民运部副部长，在解放战争中驰骋疆场，转战南北。又如南乐县青救会主任魏焕斗带领一个反攻营参加了正规军。边区青年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军，大大鼓舞了青年的热情，对参军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边区青年是边区八路军(解放军)的主要兵源，而且是第二野战军几个纵队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青抗先”)是一支不脱产的农村青年抗日武装组织，受青救会和军事部门的双重领导。当时的民兵，分青抗先和模范班两个组织。青抗先队员都是青救会的优秀会员，一方面坚持农业生产，参加青救会的各种活动，一方面肩负对敌武装斗争任务。冀鲁豫边区青抗先的建立始于1940年秋季，在各

级青救会的关注下，青抗先组织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凡是有青救会的地方，都发展和建立了青抗先组织，县成立青抗先大队部，区成立中队部，村成立村队部。1941年9月边区青抗先总队部成立后，青抗先组织更加迅速发展，到1941年底已发展到近万人。

青抗先总队部大力抓了青抗先干部的培训，每年要举办两期训练班，主要培养中队一级的干部，每期三五十人，学习七八天，讲抗日形势和任务，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游击战术，还针对学员的思想情况请领导同志做报告。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大为提高，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一般都作战勇敢，不怕苦，不怕死，服从组织，联系群众，成为青抗先组织中的领导骨干。

青抗先比较活跃的县，有中心区的昆山、范县、观城，直南的南乐、高陵，泰西的阳谷、寿张，湖西的单县、鱼台，鲁西南的齐滨，运东的东阿等。

在接敌区，青抗先配合模范班及县、区武装开展对敌联防斗争，反击敌人的“蚕食”政策和碉堡政策，有时围困、攻打敌人的据点。没有机枪用鞭炮，没有大炮用土炮，袭击和扰乱敌人，使其坐卧不安。鄄城县五区仪楼、苏楼一带的青抗先与模范班等组成联防，不断袭击敌人，使得仅距3华里的张殿庄据点的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保卫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1941年春天，昆山东城、王楼一带的青抗先队员七八十人，在县大队长杨甫同志率领下，配合县大队攻打凤凰集据点。在战斗中，队员们表现勇敢，深受大队和当地群众的赞扬。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实验区大渚潭、傅楼、傅庄等村的青抗先队员10余人，到敌人据点侯集附近作宣传，在回来的路上截击了一股到我根据地抓人、抢牲口的日伪军。经过一阵交火，敌人仓皇逃去，队员们救回被敌抓去的人和抢走的牲口。军分区小报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军分区表扬了他们。1941年冬，驻扎在高陵县杨桑村的军分区被敌人包围，警卫连数次突围受挫，形势紧迫。高陵县青抗先配合区武装和模范班前去增援，从北面路沟打击敌人，军分区机关得以全部脱险。青抗先和模范班都受到军分区的

表扬。

在中心区，当敌人对我根据地大举“扫荡”的时候，青抗先便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进行反“扫荡”，开展“麻雀战”、地雷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42年“九二七”日军对我濮县、范县、观城进行大“扫荡”，当地的青抗先便积极保护干部，掩护群众转移，主动袭扰敌人。据不完全统计，当地青抗先队员在这次反“扫荡”中缴获日本钢盔9顶、日本旗十几面、步枪3支。后在《冀鲁豫日报》头版刊载了这一战果。1943年“十·一二”日伪军又对我濮、范、观、鄄中心区进行大“扫荡”，各地青抗先同样以反“扫荡”战来回击敌人。当时朝城日伪军300多人，出动汽车、大炮侵占观城的田海村。附近的李家村青抗先，配合模范班阻击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当天夜里，观城县青抗先大队长何涛带领三四十名青抗先队员，配合该县县大队袭击了住在田海村的敌人。敌人乱成一团，他们原想在田海村安设据点，经打击以后，第二天一早就逃跑了。

青年武装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锄奸。南乐县的翟村铺，原来是我们抗日活动的中心区，1941年后，周围安设了日伪据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青年武装（因系敌占区，没打出青抗先的牌子），最大的21岁，小的只有14岁，有长短枪10余支，他们除掩护干部、传递情报外，锄奸工作干得很出色。伪团长袁志儒是翟村铺人，住在附近的邵庄，清乡、抓人、要粮，无恶不作。翟村铺的青年武装于1942年冬天的一个夜里，与卫河县大队配合，除掉了这个汉奸。安庄的王金是敌人的侦探，干了不少坏事。翟村铺的青年武装于1943年10月配合当地区队处决了这个坏蛋。1940年冬，冠县县委决定处决投敌叛变的汉奸陈文堂。一区青救会主任徐万夫和前小化村的两个青年，到八里庄处决了陈文堂，并将预先写好的锄奸团布告贴在陈文堂的尸体旁，以示对其他汉奸的警告。

1944年青抗先与模范班开始合并为统一的民兵组织，到抗日战争胜利，合并工作全部完成。

第三，广泛开展拥军优属和支援前线活动

战争时期，军民关系十分亲密，边区人民群众把八路军称为子弟兵，八路军把人民群众视为父母，这种关系被称为“鱼水深情”。青救会在拥军支前工作上往往是打头阵的。部队来村，就腾出最好的房子让部队住，送米、送柴、挑水、挑菜。每到节日与部队一起开大会联欢，唱歌、演戏、扭秧歌、踩高跷、玩花船，十分热闹。当部队作战的时候，就组织担架队抬伤兵、当向导、送情报。此外还配合妇救会慰问伤兵，给伤兵送鸡蛋、熬鸡汤、喂药喂饭。当敌人“扫荡”时就掩护伤兵，给部队以精神上的鼓舞和行动上的支援。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主力展开了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边区青年的支前工作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进行一个大战役，所需要的担架队、送粮队、随军民兵就需几万人到十几万人，这时边区大批大批的青年民兵和青联会员，奔向辽阔的战场，和其他支前群众一起转战黄河两岸、陇海线南北。在大杨湖战役中，鄄城九区支前民兵一个连（大多数是青年）在区长边运民的带领下，和二野三纵队主攻部队并肩作战，每个民兵提两篮子手榴弹，紧跟突击队投弹手，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战，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

优待烈军属（抗日时期称抗属）是青救会的经常性工作。青救会会员担当了给烈军属代耕的大部分任务，给烈军属拾粪、送粪、犁耙土地、播种、解决种子困难。麦收秋收的大忙季节，青救会更是大力帮助。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到烈军属家中问寒问暖，挑水送粮送柴，解决烈军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烈军属有人生病，更是关心备至，请医生，煎药喂饭。每逢春节，青救会便发动会员开展大规模的优属活动，排着队，敲锣打鼓，给烈军属送对联和拜年，使烈军属感到无尚的光荣，这对扩大与巩固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破路、平沟、打狗、割电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游击战争，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青救会都是坚决贯彻执行。

破路。冀鲁豫是个平原。这种地形对敌人机械化部队作战有利，而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我军作战十分不利，使我军小部队的游击活动和群众在敌人进攻时的转移更为困难。为了改变不利的地形，在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破路活动。这是一个长期的浩大的工程，要将村与村之间的道路挖成沟，高可隐蔽人和牲口，宽可通行小车。开始有些群众想不通，说“八路军，真成了‘扒’路军。”青救会员除带头破路外，还经常向群众宣传破路的好处，说服群众积极破路。结果根据地挖得沟渠纵横，像蜘蛛网一样，限制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活动，便利了我军的作战和群众的转移。

平沟。为了分割我根据地，敌人在交通干道上挖了许多“封锁沟”，对我实行囚笼政策。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边区军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平沟活动。冠县在1940年冬组织了一次上千人的平沟大“战役”。青救会一马当先，成立了临时青年突击队，在冠县至堂邑的公路上，一夜间彻底平掉了60华里长的封锁沟。泰西区青救会，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动青年破坏敌人的封锁沟120华里。

打狗。在抗日时期，我们游击队夜间活动，一进村狗便乱叫起来，起了给敌人报警的作用。狗，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大障碍，因此，边区各地进行了打狗活动，青救会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一些群众把狗看作爱物，埋怨说：“青救会不去打日本兵，却成了打狗队。”青救会员们一方面自己带头打死自己家的狗，一方面对这些群众作耐心的说服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根据地里的狗基本上打光了，游击队的活动方便多了。

割电线。为了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一些县里的青救会还进行了割敌人电话线的活动。冠县青救会在194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组织青救会员四五百人，在冠县至馆陶之间，将十几里长的电线全部割掉。县委、县政府曾召开大会，表彰他们对敌斗争的模范事迹。

三、发动青年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及土地改革运动

从1942年9月开始，全边区掀起了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

地”、改造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的高潮，边区的青年运动也深入发展起来。

我们建立政权的几年中，虽然作了大量建设根据地的工作，有些地方也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斗争，但由于没有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进行减租减息、充分发动群众的指示，致使群众运动没有深入开展，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农民很少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影响了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区党委下决心将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建立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将大批干部下放到县、区或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边区的青年也迅速投入了这一伟大洪流。

边区的民主民生斗争，1942年下半年主要在濮、范等少数地区搞试点。进入1943年后，在全边区普遍开展起来。在原来没有建立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组织，或虽已建立过而陷于瘫痪的村庄，一般采取了以建立农会为主，农民、青年、妇女、儿童一齐发动的办法。先将青年农民吸收入农会，在斗争取得几个回合的胜利，青年得到锻炼，一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的条件下，再建立独立的青救会组织。原有青救会组织的村庄，也要重新发动他们与农民一起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在斗争中考验干部，根据其在斗争中的表现决定取舍。同时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选拔出来，建立新的青救会领导班子。经过充实与调整，青救会展现了新的面貌，有了新的活力。

青救会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广泛地团结了青年群众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壮大了群众运动的声势。在民主民生斗争高潮时期，真是处处集会，村村斗争，游行示威的浪潮此伏彼起，说理斗争的场面悲壮激昂，诉苦的群众声泪俱下，使青年们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而青救会员也往往在斗争中起着先锋作用。青年们接受新事物快，顾虑少，勇于斗争，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青年，在扎根串连时是积极分子，在斗争大会上能打破情面抢先发言，成为斗争中的一

支突击力量。张秋县塘子乡于1945年初解放以后，农会召开近万人的大会，斗争投靠日伪、鱼肉乡里的伪乡长、大地主张文元。贫雇农青年在扎根串连、宣传鼓动、清算斗争中起了骨干作用，取得斗争的胜利。在塘子村分配斗争果实时，他们又带头反对按户平均分配，坚持贫苦农民多分的办法，提高了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巩固了农会，并很快成立了青救会。由于青救会是有组织地参加斗争，一般都是列队进入会场，步伐整齐，气势雄壮，每到晚上，站在村头，便可听到青救会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集合哨声，激昂的革命歌声和悲壮的斗争口号声，使人精神为之振奋。

在民主民生斗争中，青救会还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地主和富农出身的青年做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他们当中除少数人对民主民生斗争持对抗态度外，一般都能采取中立态度。有些人还积极向青救会靠拢，一再要求加入青救会，唯恐将其打入“另册”；一旦被批准参加青救会，则表现十分积极。如果家长是斗争对象，便做家长工作，劝其遵守政府法令，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从而减少了斗争的阻力。有些人则从地主、富农的家庭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如鄆城高庄的高连全，后来当了我们的区队长。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在一次对敌作战中，他挺身指挥战斗，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又如鄆城旧城集的邢玉玺，他父亲被斗争过，而他不但在民主民生斗争中表现积极，而且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经过与地主阶级的几番较量，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被推翻了，经济上削弱了，农民基本群众的优越性建立起来了，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思想水平也大为提高。人们看到青年在斗争中的力量和作用，对青年的态度也就变了。家长们由过去限制青年到鼓励支持青年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并以自己的子女在民主民生斗争中表现积极为荣。青年妇女一般都参加了妇救会组织，有的地方青年妇女也参加了青救会（单独编组）。她们过去受社会的歧视和家庭的限制更大，此时，通过参加斗争解放了出来，有些人成了斗争中的骨干分

子，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有的入了党，成了村干部；有的成为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

在民主民生斗争的过程中，各级青年组织十分注意青年的特殊利益，如青年妇女的婚姻自主与受虐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进行宣传工作（歌剧《小二黑结婚》起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主动与妇教会、农教会配合，解决实际问题。这对团结教育青年，增强青教会的凝聚力，对倡导家庭和睦，转变社会风气，都有积极的作用。

在民主建政中，大批青年参政议政。在边区基层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中的负责同志，大都是青年人。一些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有觉悟有能力的青年，被选为村长或副村长，有些还当上了县长、区长。如冠县青教会主任芦成松后来当了县长。鄄城县青教会宣传部长常邦国还被选举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由于广大农民青年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得到改善，抗战热情更加高涨，参军参战、拥军优属、学习文化、发展生产等活动，都出现了新的高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民群众欢欣若狂。我军奉命举行大反攻，收复了一些城市和广大农村。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土地改革的时期。青年运动也在新的形势下迅猛展开。

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4月的一段时间里，新解放区的青年和广大农民、妇女一起开展了反奸反霸斗争，惩治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和依靠日伪势力残害人民的地主恶霸分子。如鄄城县的广大青年和农民群众一起，揭发控诉了汉奸王文宪、李子才、李明奎、孙连科、翟心殿、周方略等人的累累罪行，配合公安、司法机关，分别开了两次公审大会。除王文宪当时没有捉到外，其余5人都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执行了枪决。一些青年在控诉汉奸分子罪行的大会上，有的怀揣短刀、剪子，要亲手杀死这帮汉奸走狗。

在这个时期里，广大新解放区也参照老区的办法开展了民主民

生斗争，采取了青年和农民、妇女一齐发动的办法，待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再建立青年联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青年和其他群众一样得到了初步的发动，为土地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提出要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是一次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的伟大革命。新老解放区的广大青年，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和农民、妇女一起，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

在一些新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展的初期，少数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土地是不义之财”、“地主有好孬之分”，因此在分配土地时，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在破除这些错误观念的过程中，青年表现出了顾虑少、接受新事物快的特点，做了不少的宣传动员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斗争恶霸地主、丈量分配土地、分配房屋和浮财等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

1946年的秋天，正当土地改革热火朝天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在陇海线及鲁西南地区英勇反击。我边区青年，特别是黄河以南广大地区的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和全体农民群众一起，参加打倒蒋介石、保卫翻身果实的斗争。在“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口号下，一方面全力支援前线，组织武工队、游击队坚持对敌斗争，一方面坚持进行土地改革。敌人来了就打游击，敌人退了就搞土地改革，终于把土改斗争进行到底。

敌人在占领我解放区的一个时期内，对我翻身农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其中被杀害的有不少是青救会员和青年工作干部。如鄆城县旧城集的青救会主任张运山，被地主还乡团俘虏后，遭到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活埋。敌新五军只在旧城集就抓走20多名女青年，横加摧残和凌辱。敌人的暴行，没有吓倒边区青年，反而激起他们对敌人更大的阶级仇恨，在游击战争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配合主力军作战中，捉到许多地主还乡团人员，对那些罪大恶极者给予严厉惩处。

在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边区青年，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参军参战热潮，跟随我野战大军南下作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动员青年参加大生产运动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改善群众生活，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号召，在民主民生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青教会、儿童团表现得很活跃。首先在自己组织内进行充分的动员，讲明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树立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思想，号召青年、儿童在大生产运动中当先锋。同时运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在社会上宣传，教唱歌曲，编唱快板书，利用秧歌队、高跷队等宣传大生产运动。还有一些青教会组织的剧团，演唱宣传大生产的戏剧，如《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等，在社会上造成气氛，提高了群众搞好大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当时根据地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而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多数青年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参加生产活动的，有的青年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者。他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对家庭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如一些青年积极主动地搞深翻土地、改良土壤，并在温汤浸种、红矾拌种、锄麦、多积肥、积好肥等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

经过民主民生斗争，群众生活有所改善，但在生产上困难仍然很多。有的户有地没有牲口，有的户有牲口而缺乏人力。广大青年遵照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指示，学习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互助组，实行换工。有些群众对此不习惯，嫌麻烦，有些群众有“买卖好作，伙计难搭”的老观念，怕吃亏，怕搞不好引起邻居间的不和睦，迟迟不愿行动。而青年们则顾虑少，热情高，积极响应号召，说服家庭，率先行动，推动了互助合作活动的开展。

有很多贫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他们的生活最困难。

青年们率先响应号召，广开生产门路，在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支持下，开办木工厂、油坊、豆腐坊、弹花坊等。有的利用小本借贷做小摊贩，开小饭铺，解决了许多无地少地贫农的生产、生活问题。

青年、儿童在发展家庭副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饲养牛、羊、猪、鸡、兔活动中，割草、煮食、放羊、出粪一类的活多由青年、儿童来承担。青年妇女多从事纺花织布、做鞋、编草帽辫一类的副业生产，由供销合作社来解决他们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问题。

许多地方的青救会、儿童团还组织了自己的集体生产活动，如组织集体开荒、种树、扩大种植面积。有的利用废水坑种藕，既增加了收入，也改善了环境。儿童团则在所破道路两旁的土堆上点种蓖麻，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起到掩护军民转移、便利游击战的作用。

给烈军属代耕，青救会、儿童团总是走在前列。有的青年以家庭成员身份积极参加，有的以青救会、儿童团集体的名义给烈军属代耕、积肥、割草、打水、拾柴。

消灭病虫害，是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冀鲁豫边区1944年秋的灭蝗斗争是一次气势磅礴的群众运动。青救会在这次斗争中，起到了先锋队突击队的作用。

1944年秋天，正当秋禾将熟、丰收在望的时候，在冀鲁豫边区广大范围内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蝗灾。蝗虫到来犹如黄风骤至，顷刻之间，遮天蔽日，晴朗的天空顿时变得天昏地暗。蝗虫降落时像流矢一样飕飕落地，庄稼地里遍是蝗虫。特别是谷地里，谷叶谷穗上爬得满满的，站在地头上，只听得蝗虫吃庄稼时唰唰的一片响声。村内村外的大小树木，也都落满了蝗虫，把一些树枝都压弯了。群众对此又心疼又恐慌。党和政府号召组织起来扑灭蝗虫。一些群众开始没有信心，甚至有少数人散布说：“这是天命，不可抗拒。”这时，各地青救会、儿童团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最先行动，有组织地一面扑打，一面向群众宣传，破除听天由命的思

想。鄄城县旧城集有个巫婆——徐三老婆，过去装神弄鬼，诈骗钱财，民主民生斗争后偃旗息鼓了，这时又乘机大肆活动，说：“这是神虫，打不得”，劝说人们到地里烧香祈祷。青教会便一面对她进行批评，一面向群众宣传。这个巫婆不听批评劝告，不仅在她二亩谷的地头上烧香祷告，还不让别人到她地里打。结果临近的谷子经过扑打保住了，而她的谷子被吃得精光。青教会员抓住这个事例，大量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对动员群众齐心灭蝗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扑灭蝗虫的战斗中，青教会、儿童团的队伍最整齐，行动最迅速，在大兵团围歼战中最听指挥。指挥部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有时还边打边唱革命歌曲，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消灭了飞蝗，大大减少了损失。群众把这称之为“一个奇迹”。

在大生产运动中，青教会还经常开展评比活动，表扬在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批评二流子懒汉。一些好吃懒做的青年，在青教会的帮助下，转变为生产劳动的积极分子。一些青年积极分子，由于生产成绩显著，被评为村、区、县级的劳动模范。

(四)

青教会还加强了对学生会和儿童团的领导。

一、蓬勃发展的边区学生运动

边区的学生运动，是边区青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是在边区青救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在全民抗战热潮的鼓舞下，学生运动成为边区青年运动中朝气蓬勃的一个方面军。

在边区抗日根据地里，随着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除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小学以外，还建立了一些中等学校。最先成立的有筑先学院、边区抗日联中、湖西中学、鄄城中学、卫东中学、齐滨中学、泰西中学；后又合并成立运西中学、濮范中学、筑先抗日中学、泰运公学等；最后经过调整、

合并，建立了边区一、二、三、四中学，冀鲁豫抗战学院和筑先师范前身的第五中学。到1949年8月，各级各类中等以上学校已发展到22所，在校学生已达7626人。随着边区中等以上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学生队伍的迅速壮大，学生运动也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边区青救总会于1941年秋冬之间，召开了边区部分中学学生会干部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筑先学院的陈惠敏、满丰，鄄城中学的常邦国，边区联中的吴建模、马冠堂等。会议由边区青救总会王克、纪登奎主持。会上交流了各校学生运动的情况，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成立了边区学联筹备委员会，推选王克同志兼任主任，陈惠敏任副主任。研究了筹备工作的具体问题，决定尽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边区学联，以统一边区的学生运动。后因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改变，代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筹备会在以后的3年里主持了边区的学生工作。1943年调陈惠敏和运西中学的学生会干部苏本善专职作边区学联筹备会的工作，直到1944年底才召开边区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学联。边区一中的在校学生胡少华担任了边区学联的第一任主席。

在边区学联的组织推动下，各个中学先后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学生会是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自治组织，它的根本宗旨是组织青年学生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国活动，维护青年学生的正当权益。学生运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学校行政，积极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拥护共产党，真诚热爱八路军。二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使青年学生逐步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组织学生听政治课和学校领导的政治报告外，还经常请边区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作报告。黄敬、晁哲甫、段君毅、杨得志、王卓如、戴晓东、张承先、邹鲁风等同

志都亲自到学校作过报告，讲形势，讲任务，使大家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抗战的热情。学生会经常组织一些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水平。筑先学院曾就唯物史观的重点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进行热烈的大辩论，还就“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进行大规模的讨论。在运西中学曾进行民主集中制的大讨论，讨论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怎样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讨论时大家各抒己见，发言热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请指导老师或学校领导来作结论。通过讨论澄清了糊涂认识，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边区中等学校的教职员和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抗日的、追求进步的，但某些学校在建校初期，也有少数国民党顽固派观点的教职员和学生在进行活动。1942年春，在运西中学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学生仪振江，在坚持反共观点的国民党员、数学教员彭子风等人的支持下，拉拢少数学生，吹捧国民党为正统，攻击我党我军，与我争夺青年。在此情况下，学校党组织决定按照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其进行适当的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由学生会出面组织。通过这次斗争，青年学生中少数原来跟仪振江跑的人，也站到学生会方面来，仪振江、彭子风也承认了错误。

2、动员学生努力学习，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

冀鲁豫边区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特别在1942年前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分割包围，反复“清剿”，边区的中学大都是频繁地行军，教无定所，露天作课堂，背包作板凳，膝盖作课桌，门板作黑板，教材多为老师自编，学生学习全靠笔记。此时生活也非常困难，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摘榆叶、喝稀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抗日的热情是坚持不下来的。学生会根据党组织的布置，运用各种方式向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在学生中树立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思想，树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学习的思想，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行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上课，课余时间，

劳动休息时间，都有很多人抓紧学习，绝大多数学生保持了高涨的学习情绪。

教育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是学生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一个时期里，一些学校在学习政治与学习文化科学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并引起了争论。边区三中有人提出应“以数学课为中心”，有的提出“中心工作就是中心课程”。在筑先学院，曾出现过所谓“课外派”与“课内派”的分歧。一些担任学生会等职务的学生，有的忙于服务工作，认为战争年代，学了数理化也用不上，因而放松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被称之为“课外派”。而另一些学生，不担任什么职务，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抓得紧，但不重视社会活动和轻视政治学习，被称为“课内派”。其他学校也不同程度地有类似情况，有的已影响到两方面学生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学联筹备会在边区青救总会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王克同志在这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长篇总结性发言，正确地阐明了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法，解决了学习政治与学习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学联筹备会将王克同志的讲话印发到各校学生会，开展了一次端正学习态度大讨论。通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端正了学习态度，克服了一些人思想上的片面性，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团结。

3、组织带领学生参加实际的抗日救国斗争

(1) 参加对日武装斗争。有的学校适应对敌斗争的环境，组织和行动都军事化了，学生也是身穿军衣，发有步枪、手榴弹，担任站岗放哨等军事勤务，虽不担任主要作战任务，但在敌人的“扫荡”、突袭中实行自卫作战。卫东中学于1942年6、7月间的一个晚上，在朝北县的于家庄遭敌突袭，学生马昂和15岁的孙涛正在放哨。敌人攻上来的时候，二人沉着抵抗，掩护全校师生安全突围。马昂、孙涛在该村群众的掩护下脱险，事后受到学校领导的表彰。该校学生共产党员张耀奎，在反“扫荡”中与敌人遭遇，不幸被俘。敌人对其软硬兼施，毒打、放狼狗咬。他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糊，但坚贞不屈，痛斥敌人，最后被绑到靶上遭轮番点射时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英雄气概。

(2) 参军。边区各中学的青年学生，在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边区一中的学生于1945年春和1945年秋，两次报名参军100多人。边区三中的学生先后3批270多人报名参军，参军后大部分做了文化教员和连指导员。这两个学校参军的学生中，已知的就有冯道显、罗燕棠、冯子器等15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

(3) 支援前线。1942年9月在我军攻打鄄北张殿庄伪军据点时，运西中学的学生自动组织担架队到前线救护运送伤员。边区一中在1945年秋，50余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分赴鄄城、郓城、菏泽一带作战地服务工作。抗日战争末期，我军攻打菏泽、曹县时，边区三中的学生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和参加战场救护工作。解放战争开始，我军发起陇海战役，边区三中20多名学生参加兵站工作。他们组织了运输组、护理组、洗衣组、喂饭组；学生杨吉安等冒着敌机的轰炸抢救伤员；阎有信、李振华等给伤员洗血衣、端屎端尿，战役结束后受到县领导的表扬。

4、运用文艺形式，广泛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各校学生会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组织各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广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进行社会宣传。在这方面，筑先学院、边区一中、边区三中都搞得十分出色。各校的精彩文艺演出，给根据地带来勃勃生机，给人民群众带来异常的喜悦，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各校文艺活动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主要的有：歌咏队、业余剧团，还组织秧歌队、高跷队到各村镇进行化装宣传。除此之外，出版墙报、门板报，写宣传标语，画漫画，到冬学、识字班去讲课作宣传更是经常性的活动。特别是1944年五四青年节在边区青救总会和边区学联筹备会的组织下，举行了边区空前规模的青年大联欢，

历时5天,黄敬、宋任穷、杨勇、徐达本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开幕式。边区中心区中等学校的学生及部分小学学生参加了大会。会上除进行体育比赛、军事体育表演外,主要由各中等学校学生作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它对鼓舞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增强青年学生的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5、参加民主民生斗争等各项群众活动

1944年夏季,边区一中的学生组成若干分队下乡作群众工作,一部分到朝城、昆吾等县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和推行合理负担,另一部分赴鲁西南的东垣县搞征粮,与敌人进行夺粮斗争。1945年冬季,三中学生到复程县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帮助农民翻身,并多次参加了与敌人的夺粮斗争。

在民主民生斗争的鼓舞下,有的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内部开展了反贪污斗争。如运西中学的学生,于1943年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学生会出面揭发了总务主任张效鲤的贪污行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赴专署请愿,受到专员邹鲁风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专署即派工作组结合学生代表清查了张效鲤的帐目,并对其作了惩处。这对学生也是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

6、参加大生产运动

边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每逢麦收和秋收季节,都有组织地帮助群众割麦和秋收,还积极参加灭蝗战斗,节衣缩食支援灾区群众。在学校内也积极地发展生产,以改善师生的生活。边区三中的学生,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开展生产活动。专署划给100多亩地,拨给一些生产基金,学生就拉犁耕地,种上庄稼和蔬菜,还自己动手打井。一些女同学缫丝打线,织毛巾,打袜子。有的还熬小盐,做醋,放羊,取得了好收成。除改善了伙食外,秋后还给每个学生做了件棉衣。边区一中也在范县刘奶奶庙一带建立生产基地,在王化云校长的带领下,学生们从濮县县城运砖打井,并拾粪、种粮、种菜,改善师生的生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的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

服从组织分配，一批又一批地走上了战斗岗位。只边区一中和三中毕业生就达2000多人。有些人在战争年代壮烈牺牲。如运西中学学生会主任苏本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两次被俘，前次经营救脱险，后次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边区时代的青年学生遍布全国，从中央到基层，各行各业都可找到他们的足迹，许多人当了各级领导干部。

二、战斗在边区各地的儿童团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民主民生斗争中广大群众的充分发动，在边区各地青救会建立的同时，儿童救国团也普遍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儿童救国团简称儿童团，是广大儿童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组织，也是儿童接受党的教育和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当时参加儿童团的年龄，一般为7至14岁。儿童团受青救会的领导，青救会根据儿童的特点来指导儿童团的工作。县以上青救会都设有儿童部，县设儿童团长。各村的儿童团除了受青救会领导外，党支部、村政权和农会、武委会也都直接向儿童团布置任务，因此儿童团往往发挥着多种多样的作用。

儿童团活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和青救会是一致的或近似的。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儿童团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大唱抗日歌曲，首先自己学唱，再互相教唱，然后到各种场合去唱。有的会唱几十首，甚至上百首。儿童特别喜欢唱的歌还有儿童团歌：“小兄弟们呀，小姊妹呀，我们的力量是了不起呀，快团结起来，到前线去吧……”一唱起这支歌，他们便精神抖擞，分外神气。儿童们唱歌不分时间、地点，下地干活唱，走路唱，甚至吃着饭也唱。集合操练、开群众大会、外出宣传，更是他们大唱抗日歌曲的时机，互相拉歌之声此伏彼起。所唱歌曲，有激昂慷慨的进行曲，也有抒情的内容健

康的抗日小调，群众从这动听的歌声中受到了抗日救国的教育。

有的组织了儿童宣传队，用踩高跷、玩花船、说快板、演活报剧等方式作宣传工作。鄄城县旧城集的儿童宣传队在开展对敌伪政治攻势中到张殿庄伪军据点附近作宣传，民兵、区队封锁着敌据点，儿童宣传队就在离据点半里远的村子里演唱了半天，使敌占区的群众受到抗日教育。

2、站岗放哨，送信带路，是儿童团的经常任务

在根据地各个村庄里，到处可见到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他们手拿红缨枪，雄赳赳气昂昂，十分认真地盘查行人，目的是监视敌人的活动，防备敌人突袭，同时也防备汉奸敌探的侦察破坏活动。他们很喜欢自己手中的红缨枪，也喜欢唱《红缨枪》：“红缨枪，龙格龙格龙，红缨枪，龙格龙格龙，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过往行人往往被他们这种战斗精神深深感动。

当时区、乡的党、政、武机关的一些通知、信件和情报，往往要儿童团去送。他们对执行这种任务非常热情，又非常认真。信件、情报只要交到他们手里，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二话不说立即出发。白天送信还要背上个草筐，以作掩护，顺便还可侦察敌情。你若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会斩钉截铁地答复你：“听党的话，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

3、积极参加拥军优属活动

边区各地的儿童团和青救会员一起积极开展拥军活动，平时经常对儿童进行热爱八路军、支援八路军的教育。只要我们的部队一住下，儿童团就配合青救会、妇救会多方面地开展拥军活动，其中募捐劳军是这方面的经常活动之一。泰西肥城的儿童团曾在一次劳军中募捐数百元，一些儿童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也捐了出来。他们抬着募捐来的鸡蛋、军鞋、瓜果、梨、枣等慰问品，敲锣打鼓地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演出点节目或唱几支歌子。战士和伤员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表示一定要练好本领，英勇杀敌，

感谢小弟弟、小妹妹的热爱之情。在与部队举行联欢活动时，儿童团表现得特别活跃，唱歌、拉歌、呼口号、演节目，大大增加了欢乐的气氛。

在参军运动中，儿童团也积极作宣传工作，有的儿童还动员自己的兄长参军。他们给报名参军的大哥哥们戴红花，牵大马，敲锣打鼓地送到部队。稍大些的儿童，有的积极要求参军。他们多报年龄以示其岁数大，踮起脚跟以示其高。当批不准时，就急得跺脚，眼里流下泪来。有的儿童偷偷跑到部队要求参军，又被部队派人送了回来。有些儿童团中的小英雄，还自发地组织了游击小组，侦察敌情，参加战斗。1939年，泰西区曾有3个儿童，在敌人“扫荡”中，凭着20颗手榴弹，打退了二三十个敌人的进攻，为此受到军分区的表扬。

在优属工作中，儿童团表现得更为积极，常常与青救会开展竞赛，而且常常跑到青救会前头。平时给烈军属抬水、扫地、拾柴、拾粪，春节时和青救会员一起，排着长队，喊着口号，敲锣打鼓给烈军属送对联、拜年。

4、积极参加文化学习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学习文化。首先是教儿童识字，扫除文盲。有小学的村庄，动员儿童团员上学，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没有小学的村庄，动员他们上冬学、上识字班。儿童团员大都能认真学习，弄不到课本，就自己抄写，弄不到笔和纸，就用小棒棒在地上写。有些儿童团员学习进步很快，不用很长时间就达到脱盲的程度。

许多儿童团员不仅自己学，到家中还帮助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识字。许多村庄的儿童团在村头站岗的时候，身边都挂着一个识字牌，过往行人要会读牌上的字才予放行。这对边区扫盲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5、好好劳动，努力生产

在大生产运动中，儿童也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儿童团向团

员讲大生产运动的意义，讲劳动光荣，懒汉可耻，教唱《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等歌曲。儿童团员们相互开展劳动竞赛，表扬积极分子。对劳动不好的，有的加以规劝，有时在开小队会时给以批评，被批评者往往表示“知过必改”，随后便有明显的转变。

儿童团员生产的内容，主要是拾粪、拾柴、割草、放羊及帮助父兄干些农业上的辅助劳动，但有时也搞集体性的劳动，如小片开荒。当时最为突出的就是点种蓖麻子，有集体点种的，也有个人点种的，房前屋后，地头坑边到处点种。特别是在所破道路的两旁，密密麻麻地种满了蓖麻子。一到秋天，道路两旁一片葱绿，果实累累，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有利于改变地形，掩护群众，便于我军机动灵活地作战。1944年秋，边区各地的儿童团还在灭蝗战役中立了大功。

6. 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在民主民生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儿童团员们表现得非常振奋，活动也特别频繁。他们经常集合、唱歌、操练；讲民主民生斗争及土地改革的道理，讲恶霸地主剥削压迫农民及农民进行斗争的故事；编唱一些诸如“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之类的歌谣。这样，既教育了自己，也向群众作了宣传。他们积极参加农民群众的游行示威和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高呼口号，威慑恶霸地主，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有的儿童还登台发言，揭发和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在禁赌活动中，儿童团也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们首先在团员中作动员，然后查赌，发现有人赌博，或向农教会、青教会报告，或直接抓了赌具，进行批评，使根据地各村赌博恶习迅速收敛，有不少村庄赌博绝迹。在破除迷信活动中，儿童团是一马当先。青教会指导儿童团，对团员进行无神论的教育，使其懂得破除迷信的意义。儿童团员们一旦接受无神论的真理，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不但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还参加实际的破除迷信的活动。他们捣毁巫婆、神汉设的神像与供桌，警告其不得再装神弄鬼欺骗坑害群众，对屡教不改的还要配合农会、青教会对其开展斗争。对于那些散布谣言蛊

惑群众取神水、拜大树的人，也给以揭露和打击，使封建迷信活动大为收敛。

由于儿童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儿童团员的地位大大提高。起初人们看不起儿童团，认为组织起儿童团不过是唱歌、跳跳、玩玩，凑个热闹，大人的事不让他们参加；后来认识了儿童团的作用，不但有任务放手交给他们去干，而且吸收儿童团长参加村里重要的干部会议，打破了那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旧观念。过去儿童们在家里地位低下，一些家长动不动就训斥、咒骂，甚至动手就打。他们严厉限制孩子参加儿童团，限制孩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后来看到儿童团的集体力量，眼见儿童团办了许多好事，而且使自己的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能够健康地成长，同时加上农会、妇会、青会的帮助教育，这些家长才改变了对儿童团及儿童的态度，由阻挠、限制变成了支持，甚至以自己的孩子在儿童团内表现积极而觉得光荣了。

冀鲁豫边区的儿童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边区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同时，通过斗争的锻炼，儿童们也茁壮成长起来，许多儿童团员以后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有用人才。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有不少儿童团长和团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在刑场上英勇就义，这些小英雄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五)

边区的青年运动，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今天研究这些经验，对青年工作的继往开来是很有意义的。

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围绕中心任务开展青年工作

青年组织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又应保持青年组织业务工作上的独立性。边区的青年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它是党领导青年运动的得力助手，是党团结、领导广大

青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纽带。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①。边区各级党委对青年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为青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调配了大批优秀干部，并及时给以政治上的领导和工作上的支持。这是青年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和健康前进的根本保证。边区的青年组织也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勤奋工作，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党委对青年组织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即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指明政治方向，规定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这并不排除在具体业务工作上，青年组织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在日常工作上青年组织应根据自己组织的性质、任务和青年的特点来进行工作，充分发挥组织的作用，完成党所给予的斗争任务。为此，就需要正确处理党的中心任务与青年组织部门工作的关系。党的中心任务，事关革命全局，青年组织应全力以赴，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青年组织的部门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边区的青年组织，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按照这个精神来进行工作的。在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如参军参战、民主民生斗争、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等，青年组织都积极参加，运用自己组织的力量去完成应负的责任。青年组织对完成中心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锻炼提高了自己。

青年组织还有其本身的具体业务工作，要关心解决青年群众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诸如青年群众的学习、体育和文娱活动以及青年的婚姻自主问题，反对虐待青年妇女，等等。这些问题一般应在参加党的中心工作的过程中结合解决，但必须抓紧，不可忽视，否则便会缺乏对青年的凝聚力。解决了青年群众的一些切身利益，满足了青年群众的一些特殊要求，就更有利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682页。

更有利于在党的各项中心任务中发挥青年组织的更大作用。

二、摆正青年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青年运动是党所领导的整个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有其特殊的性质和任务。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青年运动既要以一个方面军的姿态参加斗争，又要保持其独立的组织和执行特殊的任务。

当时边区的青年运动，其主体是青年农民。农民是以阶级来划分的，青年是以年龄来划分的，青年仅仅是农民阶级的一部分。在当时激烈的历史大搏斗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整个的农民运动。青年只不过是作为农民阶级的一部分参加战斗，离开整个的农民运动，青年的翻身、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民主民生斗争和土地改革等重大斗争中，农会是唱主角的，青年组织应率领自己的队伍积极投入运动，在斗争中首先求得整个农民阶级的翻身和解放，同时也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样，在大生产运动中也脱离不了整个的农民运动。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先进的工业经济不同，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在一般情况下，农民青年是家庭中的次要成员，有些青年还只是辅助劳动力，在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参加合作社等问题上不能起决定作用。因此在生产运动中，要教育青年积极参加家庭劳动，在农业技术的学习推广中起积极作用，不要单独组织搞生产。

但青年运动毕竟有它的特殊性。青年有特殊的利益和要求，它有独立的青年组织，它有青年工作的特殊方式和活动内容。因此，还应保持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使其在整个群众运动中发挥突击队作用的同时，用青年化的工作方式来解决青年运动的特殊任务。

三、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

青年工作应研究青年的特点，采用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

关于青年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曾概括地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根据多年的实践体会，青年工作应根据青年的以下特点来

开展。

第一，好奇。他们年纪轻，知识不多，没有老框框，最少保守思想，最喜欢新生事物，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对老一套的工作内容和陈旧的工作方式，往往产生厌倦情绪。所以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要注意不断补充新的活动内容，采取新的活动形式和工作方式。

第二，好动。青年是长身体的时期，精力充沛，浑身是劲，爱动不爱静。所以进行青年工作，要尽量避免开长会，作大报告，不论进行教育或其他活动，都要多在动态中进行。如运用唱歌、演戏、体育活动、参观、调查访问及青年们喜闻乐见的其他形式，寓教育于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之中。

第三，好学。青年人是长知识、长才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喜欢学习，要求进步，渴望得到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青年组织应该通过一切活动，贯彻对青年的教育，使其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优良的道德品质、坚强的工作能力和英勇的斗争精神。

第四，好胜。青年人富于理想，勇于进取，不甘落后，具有强烈的竞争心理。青年工作应抓住这个特点来组织其活动。如在一些活动中展开竞赛，表扬先进等，使其蕴藏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四、根据斗争任务改变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服从斗争任务。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斗争任务，青年运动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必要的。抗战开始，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更广泛的青年群众参加抗战，取消“民先”，建立青救会，起到了团结各阶层青年共同抗战的目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进行土地改革，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中心任务，斗争的性质是阶级的大搏斗。此时，青救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建立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除了“民先”、青救会、青年团这些不同时期的青年运动的主

要组织形式外,还应建立团结广大青年共同斗争的其他组织形式。如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组织起来的青年联合会、学生救国会、青抗先、读书会、青年宣传队、青年剧团和青年俱乐部,等等。这些组织总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它适合不同青年的爱好,丰富了青年运动的内容,更有利于充分发动青年去完成共同的斗争任务。

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而有所改变,但必须始终坚持先进青年要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共同前进的原则。青救会是抗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其组织的成员十分广泛,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但青救会很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充当领导骨干,并对其深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党员,源源不断地为党输送新鲜血液。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在强调先进性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它的群众性,必须牢记团员以外还有更加广泛的青年群众,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代,是青年团组织长期、艰巨的任务。

五、继承发扬党的传统作风

在边区从事青年运动的广大干部和先进青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边区青年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保证。

第一,继承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传家宝,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为了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最基本的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的教育,提高青年参加斗争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任何工作都要思想领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青年的特点,寓教于青年所喜爱的活动之中。要注意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和干部的表率作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就能够带领广大青年前进。

第二,激励无私的奉献精神。要革命就要有奉献,没有奉献就没有革命。要教育青年学习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的高贵思想品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公而忘私，为了忠于自己的革命理想，可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战争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为新中国的诞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铺平了道路。

第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战争年代，斗争极其残酷，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极其困难，随时都有失去生命和家破人亡的危险。由于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广大青年不退缩、不动摇，坚决迎着困难上。当时大家睡草窝，吃小米，甚至几天吃不上饭，破衣烂衫，虱子一大把，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革命意志坚不可摧，充分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四，建立亲密无间的革命友情。在战争年代里，经过生死的斗争和艰苦的磨炼，在青年同志之间（包括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青年群众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这对克服困难，战胜艰险，坚持斗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大增加了青年们对党的向心力和青年组织的凝聚力。

以上这些作风，是青年运动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是当代青年的光荣职责。

* * *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转瞬已是40余年。回忆往事，心潮澎湃，往日那种炮火连天、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景象，历历在目。此时此刻，我们特别怀念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青年战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为后来的青年一代作出了光辉榜样。

青年运动中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本文由王克、史杰、高桓、常邦国4位同志起草，冀鲁豫边区青年工作老同志座谈会进行了审议。大家认为本文如实反映了历史面貌，总结的几条经验也很好。根据大家的意见，会后王克等同志作了充实、订正，杨泽江、李运亨同志认真进行了修改。）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文联工作简况

鲁西良

冀鲁豫边区在抗战前是战乱频仍的贫瘠之地，然而在解放战争开始时，这里却是晋冀鲁豫地区的主要战场，是刘邓大军南下的前进阵地，是第二、第三野战军逐鹿中原进行淮海战役的后方基地，前后出了正规军百余万人，战勤民工几千万人。谁能料到这一贫瘠之地，竟有这样大的战争承受力呢！

这首先是由于有了党、军队、政权工作的建设，有了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今仅对文联工作叙其梗概。

当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华北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原鲁西区党委和小冀鲁豫区(直南、豫北)两个地区党政领导实行合并，成立冀鲁豫区党委，下设文委。在文委领导下，鲁西、小冀鲁豫、湖西的文教会通过全区文代会，产生冀鲁豫文联总会。

文联总会的办事机构是在1941年3月18日成立的。

文代会根据鲁西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大纲增补新内容。其中宗旨是：团结鲁西文化职业者、文化工作者及文化团体，建立鲁西文化界统一领导机关，结成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斗争。其中关于会员、会员权利及义务规定甚详。改为冀鲁豫文联后，文教会组织大纲其他项目基本未变。

文代会选出：主任——鲁西良（原鲁西日报编辑部主任）；组织部长——马诚斋（原运东地委副书记）；宣教部长——袁复荣（原鲁西南地委宣传部长）；出版部长——孙景濂（字仰周）。

文联总会决定出版刊物《文化生活》，任命王行之（姚天纵）为编委会主任。另成立美术组，由陈丁波、杨扬负责；秘书处——张荷清、于近青。

文委给文联总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妥协投降；建立农村新文化基础，先抓已有的基层团体，如剧联、教联和军政机关的文工团、剧团；加强联系，加强交流，定期会演，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性质。

文联成立后，首先让干部集中休整，认真讨论文化运动的政策、性质和具体入手的工作方法。学习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讨论新文化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五性”，即：抗战的，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从新文化的性质，进而认识它的重要性：文化是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从宏观上看文化工作，在国家政治经济基础将要发生性质变化的时候，文化工作往往是革命的先导，因而每一个青年应看到自己的时代责任；具体讲，文化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组织者、先行者。

在认识任务与责任后，文联总会全体同志除个别留机关外，均下基层调查边区过去的文化基础，了解在农村文化活动中，有多少是封建的、反动的，有多少是可以提高，可以改造，可以利用的，以及所有调查对象的思想动态。

一、战前的文化基础

冀鲁豫区在抗战前，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千百年来一直是南北战争的接合部。春秋战国时期有桂陵之战和城濮之战，楚汉相争有垓下之围，三国曹操屯田，秦晋淝水之战，以至唐朝黄巢起义，宋朝梁山水泊，清末则有冠县18村义和团起义，黑旗军宋景诗起义。民国以后，这里军阀多，土匪多，会道门多，基督教、天主教的“教案”多，人民群众贫苦愚昧，受着兵、匪、会多层压迫。

五四运动以后，在山东聊城、直南大名、豫北濮阳、鲁西南的菏泽等中小城市有省立师范和中学，尽管省教育厅的领导腐旧，但

学校中的青年开始有民主革命的酝酿并有人加入国民党，随后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由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在冀鲁豫平原上不同程度地吹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春风。

早在1922年鲁西南南华中学就有中共党小组。1927年大名七师的谢台臣、晁哲甫就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聊城师范进步校长孙葆贤，教师王祝忱、韩侍桁、李光家、阎仲容，把五四精神引进了聊城。而在广大农村，人民教育喘息在军阀封建势力的统治下，小学校没有私塾多，每县不过三五所。农民读不起书，90%以上是文盲。小学教师待遇低，城市每月24元，农村只有3元，仅能糊口。

二、抗战一年后的新文化

1937年秋，日军沿交通线入侵华北地区，冀鲁豫边区全面展开抗日保家运动。日本侵略军先占领津浦、平汉铁路的点线，内地广大平原上，军阀、官僚和地主、豪商们避风南逃，农村多年的封建统治一时陷入混乱。农民拿起枪来，参加抗日。大杆土匪集拢起来，自封为“义勇军”，“司令”多如牛毛。会道门划地称霸。

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一部进入冀鲁豫边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抗日力量。

在鲁西，原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奉韩复榘命，退过黄河南下，但在下属中共地下党员和平津流亡学生劝阻下，转回来与中共鲁西特委联合抗战。一年后，他从一营的兵力发展到了35个支队3路民军的抗日游击队，有5万多人，建立地方县政府35个。沧石路以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北连成一片。经过抗击小股日军大小数十战，初步形成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此时，中共组织迅速发展（以鲁西为例，原有党员百余人，发展到万余人，每村都有三五个党员）。在此形势下，新文化运动也随之发展。

当时，各种抗日力量并不是统一的，敌、顽、友、我的力量时有变化，军力各有消长。但新文化运动，以民族大义、抗战第一的思想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公开地、秘密地展开活动，尤其是在各中小

城市、部队、机关组成了各种文工团、训练班。全区恢复乡镇小学，举办抗日中学，并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

1938年5月1日至6日，六区政训处在聊城召开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参加的有鲁西北各县政训处代表，各游击支队代表，政训处各直属机关代表等44个单位，300余人。这时鲁西北已有万余人的文化大军。会后，在聊城设政干校，由政治部接办军事教育团，5月1日出版了敌后第一张铅印的《抗战日报》和16开刊物《战地文化》。新文化运动，在城市上层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正当根据地初步稳定的时候，蒋政府又派山东沈鸿烈来敌后“摘桃子”。沈先在鲁西南曹县“试探”，嗣后到鲁西的东阿“巡视”，带着原山东省保安二十八旅吴化文的手枪旅和中央农工银行的印票机，以巡回宣传的名义招摇过市，不想遭遇日军被围。范筑先以抗日大义为重，在收复东阿县城后，迎沈到聊城，为其设立省府行辕。但是沈鸿烈居心叵测，先是以国民党中央正统要范服从，继而收买范部各支队，买通范之参谋长；国民党CC分子王金祥叛范，要求把游击队改为保安大队，终于鼓动阳谷会道门忠孝团，长清、齐河九县黄沙会叛范，不久使聊城失陷，置范筑先于死地。蒋沈这一反动逆流，打乱了鲁西城镇上层文化发展步骤，广大爱国青年必须深入农村，做更艰苦的工作。

在直南、豫北地区，1926年秋河南省委派人在大名七师发展党组织。1927年，一些知识分子党员深入农村宣传革命，建立农村支部，成立农民夜校，并出版秘密刊物。1938年夏，在直南特委领导下，成立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发动群众，建立各县工农青妇文群众抗日团体。

鲁西南地区，1925年有共青团组织，1927年建党，开展农运和学运工作。

总之，在抗战一年后，日军回师“扫荡”，占领中小城镇，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要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冀鲁豫党组织由地下转向公开，领导抗日斗争。经过1939年的

艰苦奋斗，战争进入相持，而政治思想方面，则在敌、顽、我、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群众之战。日本实行“强化治安”，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瓦解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蒋、沈国民党则搞三次反共高潮，使根据地的磨擦升级，由限共到灭共。石友三、文大可、王金祥等顽军搞“敌伪默契”。会道门与地主、民团大兴“土围子”，大搞封建迷信。在敌伪“铁壁合围”的“扫荡”下，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但是另一方面也激发了群众的觉悟，锻炼了干部。

文联总会成立后的各项文化工作均有很大发展。具体地说：

（一）新闻出版工作

在新区建立时，根据党的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是抓报社、出版社，进而抓教育、文艺各方面。

冀鲁豫区的新闻工作，可分三个时期：抗战初期，1939年后和1943年后。

1937年，冀鲁豫各地抗战形势不同，新闻工作的形式也不同。

鲁西地区，因为中共鲁西特委联合范筑先合作抗战，很快开辟了几十个县的根据地，建立了几个游击支队，把聊城建成了抗战中心，形成了抗战的范筑先及其司令部对不抗战的沈鸿烈及其省政府斗争的复杂形势。鲁西特委半公开地参加全区的军政领导，因而《抗战日报》得以铅印出版，成为敌后最早的铅印报。报社由司令部秘书申仲鸣任社长，中共党员齐燕铭任总编辑。

直南特委先出油印小报《创造报》，后改出《卫河日报》。

这时期，编辑工作既要照顾各种政治力量，又要有“主心骨”，不然就会成为“公共汽车”。同时还必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然，就可能形成“跳裸体舞”。

《抗战日报》在组织上虽说规定社内有社长、总编辑、记者，但并不拘泥于旧形式。成立社外的社论委员会，成员都是党的主要骨干，掌握宣传的“大政方针”。发展冀鲁青年记者团，以建立社

外通讯网，补社内记者的不足。报纸的首要任务是，在一定时期“要掌握重大思想动态”。除特委秘书长赵伊萍同志定期指导外，社外的社论委员会定期开会，把党的一定时期的重大政治思想具体表现在报社的社论里。当时，在重大政治思想上，对外的统一口号是：“抗日、团结、进步”，而具体掌握上，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要求民主，要求革命。特别在中共中央提出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问题~~以后，在聊城也讨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问题，确认敌后的民主政权是人民选择的政权，敌后人民的抗日意愿和利益高于一切。党报在宣传上必须掌握这一基本原则。而沈鸿烈则说敌后抗日政权必须服从国民政府，强加给敌后人民尊重蒋氏正统，尊重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而范筑先则要求承认和老西北军、老第三集团军（韩复榘）的历史关系，接受抗战纲领也要接受蒋政府现实领导关系，这实际上仍是接受蒋正统的思想。

《抗战日报》则义正词严地坚持政权性质是人民政权，不同于“旧六区专员公署”，也不同于沈鸿烈省府的“六区保安司令部”，而是鲁西的游击司令部。为此，特委秘书长赵伊萍同志署名在《战地文化》上发表了《论抗日政权性质》的文章。

当时报纸宣传的具体策略是，反对“反共”、“限共”、“溶共”、“限制异党办法”的反动思想，对范筑先的“哥们义气”、“良心抗战”，不提倡也不正面批评，而是等待和尊重其觉悟。

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决定《抗战日报》的性质。《抗战日报》的严正立场，确定了她在根据地的地位。这是鲁西在党报工作上的一个创新。

《抗战日报》面临的斗争是复杂的，因而在宣传上也要创造新的形式。如在宣传保卫大武汉上，报纸9月就刊载了冀南军区发出的各线敌军增兵，各地军民准备反“扫荡”的系列报道，而对发动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则有所节制。所谓保卫大武汉是沈鸿烈幕后提议，~~由石友三出面召集敌后进攻济南的所谓鲁南新泰会议~~，明为牵制敌军南进，保卫大武汉，实际上沈、石企图使敌后各抗日部队上

钩，暴露实力。

再是在复杂事件面前，注意策略性宣传，即认清事件的本质，在宣传上有所选择，注意后果。

新泰会议，范筑先并没有参加，只派了一个处长去，沈鸿烈却大加“表扬”，说范“深明大义”，扬言要向“国府”报功请赏。于是李树春（沈鸿烈的民政厅长）对范进行“苦劝”，王金祥从内部鼓动，说什么在“战斗中整军”，终使范筑先“服从”，组织14个支队的兵力，连挺进大队的娃娃兵也开赴长清、齐河前线。果然是造成了范部与长清、齐河九县的黄沙会的频繁冲突。接着就是坡赵庄战役，范部遭到重大损失，包括他爱子范树民的牺牲。《抗战日报》报道了这次损失的真相，同时也报道东进情况（当时就受到读者批评，认为游击队攻入济南市区是夸大，说用手榴弹炸毁几架敌机，是没有军事常识）。

当然这次东征客观上也有意义，那就是在失败面前，在敌占区有的群众领着日军攻击游击队，抄杀我军伤病员的悲剧面前，范觉悟到失败的原因。他说：“不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监督，是不能整军的；不整军，是没法打胜仗的。”范筑先令女儿范树昆代弟出征整编挺进大队，而且调到冠县后方归属鲁西北地委张炳元领导，并学习冠县农民互助会的组织经验。这时，《抗战日报》大量报道了鲁西军政会议进行整军、整政、整理财政的消息。

还有借纪念日进行重点宣传，如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进行重大宣传，使爱国主义思想深入各县区的群众。

报社内部的组织领导是：报社宣传大政方针的决定，由总编辑齐燕铭、特委秘书长赵伊萍和社论委员会主任张郁光负责。平时决定重大稿件的常务领导，由赵伊萍和管大同（特委宣传部长）负责，有时也请示省代表张霖之。报纸版面取舍和大样审查则由齐燕铭和莫循负责。社长只管印厂和日常事务。

在社外，大力发展冀鲁青年记者团。这个团本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组织的，领导都是党外青年。待大批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参加后，这个团就成为报社记者的地方大军。他们不仅能完成报道任务，而且是组织基层通讯网的有力骨干。

聊城失守后，鲁西的敌、伪、顽军事力量一时大增，侵扰频繁。报纸必须适应形势，于是改铅印为油印，下放到农村，继而改为《鲁西日报》，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为了应付敌人的分割，各专区都出版地委领导的报纸，如《泰西日报》、《卫东日报》。

初期的《鲁西日报》是下放地方秘密印刷的。那时“地下版”的组织领导分三摊：

经理部：管印报，送报到县区交通站，并取回地方投稿。大力开辟地下印厂，建立铅印厂。负责人先是孙景濂，后是张鲁泉。

编辑部：负责编辑稿件，分派记者，请示领导和采编领导层的新闻线索。编辑主任由鲁西良担任，直接向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同志请示报告。

报社社长、编辑主任和主要编辑都分别随区党委活动。

在敌人“扫荡”频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鲁西日报》没法隐蔽出报，只得把电台、收音机、油印机驮在马背上，随区党委机关行军。在行军休息时，抓紧编报，开机收听延安广播，及时编印出版报纸。

各地委报纸也灵活机动，抓紧基层通讯工作。

《鲁西日报》放到昆山以后，区党委派王绍云同志任社长，对报社建立铅印厂有很大推动。

在这期间，报社完成两大建社工作：一是抓紧建立地下工厂，准备铅印，要“狡兔三窟”，以适应长期在根据地出报的形势；二是发展农村通讯员组织，在情况允许的形势下，发展县、区直至农村的通讯网。

1942年后，边区地方部队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平定了石友三等顽军后，中心区出现了大片根据地。《鲁西日报》与直南的《卫河日报》合并，改为《冀鲁豫日报》。

这时的形势是，蒋军主要在旧黄河以南地区搞磨擦。蒋军35万

人与我军第一、二野战军形成拉锯战。我军大踏步进退，因而报社编辑部也一分为二。

在黄河北，主要报道农村土改、双减、反霸、参军与战勤和民主运动。在黄河南成立新华社河南分社，报道我野战军反磨擦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地方武装的成长。尽管报纸在不同时期宣传中心各有不同，但它总是成为地区的文化领导和文化统战工作的主力军。

鲁西地区与原冀鲁豫地区合并后，区党委加强对报社的领导，千方百计地为出报建立地下工厂，并准备铅印厂。

将《鲁西日报》、《泰西日报》、《卫东日报》与《卫河日报》的印刷力量合并，建立了3个地下印厂，以承担全区的地下印刷工作。

建立地下印厂是相当困难的。在干部配备上都是挑选干练的。在聊城时的铅印厂是齐燕铭同志苦心经营，购买了两个私人印所，建立起了《抗战日报》印厂。聊城失陷后，印机被埋在城郊，工人分散到各地委报搞石印、油印。经过1939年的战乱，隐蔽在城郊的印机没法再用。这年冬天，我们的地下党从济南动员了一批铅印工人，他们以在泰安办印厂名义，买了四开铅印机一部，圆盘印刷机二部，混合字架一部和一些零用工具，以运煤为掩护，将印机运至长清东菜园村（因为随来的印刷工人中有7人是这个村的）。经过泰西专署和长清抗日县政府，将印机转送至东平湖西岸的昆山，又经过抗日部队接送到湖心的小土山。

在土山，报社印厂和鲁西银行共同使用，但发现铅字不足，不能印书印报，又派人到济南去买。1940年这个印厂才和在昆山县的《鲁西日报》联系上。在戴庙附近小村挖了地窖，经试车后，仍不能印报，仅能印书。文联总会出版的36开本《文化生活》就是这个地下印厂印刷的。为了满足石印的缮写，印厂和报社共同成立油墨缮写室，将《泰西日报》、《卫东日报》、《卫河日报》等报社的缮写组调来合用。这个印刷厂，实际是边区文化运动的后勤部。印厂最初是孙仰周负责，后由张鲁泉负责。

(二) 文联基层组织的情况

因为各分区抗战形势不同，文联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现以鲁西北文联分会为例。

鲁西北文教会是1940年成立的，主任是丹彤，负责人还有鲍廷干、张风彩、尚中夏、乔晓波、黑若仙等。下辖四个县文教会：莘县文教会主任冯锡惠，冠县文圣五，朝北王子栋，朝城由尚中夏兼。

文教会的会员和团结对象，主要是中小学教员、青年学生和热心文化工作的积极分子，还有爱国的开明士绅，后又发展到农村说唱艺人。有的县组织到几百人，有的县发展了上千的会员。

为了争取更多人参加抗战，争取国民党“还政于民”，在鲁西北地区曾发起促进宪政运动。文教会当即召开宪政讨论会。鲁西北著名人士，如冠县的崔竹轩，朝城的赵锡九，莘县的李洪五，聊城的刘建侯都来参加大会。还有从敌占区赶来参加会的。会上揭露国民党政府独裁、反共，消极抗战。会员在会上踊跃发言。各县、区的文教会，也都分别召开这样的宪政促进会。

当时，环境艰苦，从聊城转来的《抗战日报》停刊，群众迫切要求抗战信息，文教会便编辑、油印小册子、传单，发到各村镇。又通过一些会员的关系动员堂邑、聊城刻印古籍的木板印刷工人，组织他们缮写、刻印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还编印一些宣传抗战的小册子送往敌占区，承印全区冬学教材，出版不定期刊物《启明》，内容有时事新闻、评述、文艺小品。鲍廷干用历史小品专栏借古说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农村基层的文化组织，过去没有人去组织，有些小组是自发的。据1940年的调查，农村群众自发组织的有武术队，平时在村头挖一个地窖，每晚练武，逢年过节出来亮相；有玩狮子、踩高跷、跳大神、聒皮猴、请紫姑。请紫姑是青年妇女的一种秘密娱乐。平时她们一起纺纱，在节日，半夜里秘密举行。举行时，是用紫衣服穿在扫帚或拖把上，两个姑娘拉着走跳，其他姑娘也跟着跳。忽然，

紫姑扑地，即有一人说是紫姑伏身，要求姑娘们向紫姑诉说苦情，她要回报天庭紫姑娘娘，记下姑娘们的苦情，以后会得到拯救。然后，她们就起而唱歌、跳秧歌舞，欢送紫姑。

这些形式带有迷信色彩，然而可以改造利用。如果组织起来，加强领导，给以新内容，这些人能够成为支前能手。

后来，有文化组织的村庄，在节日或开会前都能组织起歌咏队、拉拉队。

（三）艰苦的教联工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党领导的教育工作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各地区、各级党都坚持抓教育建设。在抗日政府，行署设教育处，专署设教育科，县里也有督学等设置。但仅有行政领导，还不能代替教学本身的研究、提高。这时的学校设置，一般较大的自然村要设小学，县设抗日中学，实施抗日、文化教育。在敌占区，日伪要求恢复小学，叫做“新民小学”，推行奴化教育，宣传“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来欺骗麻痹群众。顽占区，则利用国民小学灌输反共教育，宣传“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显然，学校成为政治宣传的争夺阵地。

我们的抗日教育，因为地区分割，战事频繁，必须加强横的联合，加强普通教育的战斗风格，教育救国会应时成立。开始几个村，以后又联合几个县，成立教联，基层教联归县教联和地区教联领导。

当时对我区教育的估计是：抗战教育四年艰苦奋斗，国民教育已有相当的发展，逐渐走向正规，社会教育已普及农村，广大农村群众经过抗战熏陶，政治要求不断增长，文化提高已成为普遍要求。教育工作亟需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鲁西文化界，在1940年拟定文教会大纲的同时，也拟定了教联大纲。因之在鲁西文教会成立之前，教联就成立起来了。它的组织大纲中规定的宗旨是“本会以团结（教育界、学校教员）从事教育

工作者，建立统一领导机关，加强国民教育事业，巩固鲁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期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任务。”

大纲中规定关于动员私塾教育与教会教育的处理办法。关于私塾，在有小学校的村庄，由村教育委员会动员与小学合并，私塾教员经过短期训练后，仍回原学校任教。没有学校只有私塾的村庄，则动员改为学校，教师经短训后，仍回原校任教，与学校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关于教会学校，应一律向抗日县政府备案，学校所用教材，要采用鲁西统一编订的教材。教会学校的教师，应由政府委派、调动与训练。

教联的对象，主要是小学教师。他们一般文化政治水平不高，但是工作很繁重，除教学外，还有社会工作：办黑板报、农民夜校、识字班、街头评论及传播秘密信息的“咬耳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提高，必须经过共同研究，相互提高。有的一片村庄，几个学校的教职员举行定期或不定期会议，会议形式不拘，赶集、探亲、会友，交流教学内容和社活动内容，交流与所在村的工、农、青、妇、儿童工作的配合。

这时期的抗日中学更艰苦些，规定在一定时期完成普通中学课程，而又要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增加政治活动的内容，如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教师要把抗日内容与普通课结合进行。如数学课讲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累进税率的算法，语文课选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现代作品。每班学生约四五十人，教职员和年龄大些的学生都配备武装。师生们仍侦察、行军、催餉、宿营，完全像部队的小分队。有时与敌人遭遇，和部队一样展开战斗。如卫东抗中，聊城四中、清丰抗中都遭遇过战斗，而且有的师生光荣地牺牲了。

教联成立，包括抗中，但因地区分散，学校又经常移动，不易联系。

（四）活跃的剧联工作

鲁西抗日剧团的工作，是有一定基础的。早在1937年9月，金

肇野、刘定一就在平津流亡学生政训班中组织了流动剧团到鲁西北工作。到聊城后，又成立了“孩子剧团”。随后又有党员邹鲁风、周持衡参加了山东省政府的“巡回剧团”，范筑先十支队成立了“冲锋剧团”，还有陈荒煤领导的从大后方来的剧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战士剧团”。

以这些剧团为基础，以后又组成各种文工团，主要是演话剧，但都包括文、音、美、艺各种宣传干部，随时编演活报剧、抗日歌曲、杂技等多种宣传节目。

冀鲁豫区是联系山东、河南、河北的枢纽，一些部队首长和延安、山东文化界人士常来常往，带来各地区文化界许多信息，提高了我们文工团的思想，丰富了活动内容。

有人说：文工团的组织，是在抗战中产生的特殊形式，是战争中的文化轻骑兵。

聊城失守后，这些剧团、文工团随之变成武装宣传队，分散到农村，随时随地进行宣传工作，也是与日军、顽军作周旋的武工队。一些演员，后被提升为抗日政府的干部，但是他们在农村却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1940年，在根据地中心地区的文工团、宣传队、剧团都很活跃。他们在大的乡镇、八路军驻地组织群众性剧团。当时大的团社有军区的“战友剧社”、八路军南进支队的“前锋剧社”等。

一些中小城市的戏班也整理旧剧目，成立新剧社，如濮阳的“民主剧社”、“民友剧团”等。在这一地区流行的旧剧班有豫剧、河北梆子、京剧、丝弦、大鼓和山东快书、琴书等。这些从业人员有了一定的民族觉悟，同时也为了谋生，都争取在抗战阵营一露身手。文联总会成立后，有计划地将他们组织起来，整理移植剧目，改革唱腔、音乐、武打。

文联总会为了工作的提高，进行试点，成立了直属的“大众剧社”和“冀鲁豫文工团”。前者以演传统的豫剧（河南梆子）为主，后者则吸收各种艺术人才，演一些新的节目。在上级领导支持

下，调来一批文化宣传干部，如军区夏川、丁汾、周子芹等同志都是自愿离开军区工作，到艰苦的岗位文联来的。夏川同志、丁汾同志是文联总会直属冀鲁豫文工团的正、副团长。文工团吸收了一些抗日中学的学生，经培训作为团员。剧团多演文工团自编的街头小剧、歌唱、相声、朗诵诗、小杂耍、小魔术等，逐渐上演一些中型话剧。

冀鲁豫剧联于1941年10月15日在范县境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及来宾500余人，会期3天。会议决定剧团宣传方针和组织章程，并规定文联总会有帮助建立基层组织的义务。大会建议：建立健全县、区剧联组织，加强定期联系、会演，交流经验。在群众自愿与需要的基础上，成立村镇剧联。帮助与相邻的驻军机关联系，请政工宣传部门给予人员、演出及用具等方面的协助。在条件许可下，文联总会组织会演、交流、观摩。会议中，交流了建社、建团及演出的经验，还交流了一些剧目。

参加会议的各剧团，急需得到有关编写剧目、培养演员及管理文工团的经验。前锋剧团做得好，会上，由该团团长冯组华、指导员冯森作了介绍。

南进支队，由平、津、保一带的青年组成，组织派他们常驻冀鲁豫区。他们来后，人地生疏，但很快就能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军民关系很融洽。同时，他们又与晋察冀老解放区的文联、剧联保持密切联系。

“前锋剧团”是1939年春成立的，开始时30多人。从冀中军区借来了一位导演讲授戏曲表演艺术，又派小团员到军区“火线剧社”去学海军舞、儿童舞、士兵舞等。当时，剧团只能演“纲目剧”，即只有提纲、大致情节、人物关系，稍加排演，即可演出。有时演员在台上即兴发挥，只要表演联系实际即可。该团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是因为：

加强了政治领导和教育——开始建团即成立党支部，每周上党课一次，党员过组织生活一次。剧团团员生活是军事化的，更多的

是做驻地的群众工作。

部队领导也很关怀，支队司令员赵承金经常与剧团联系，对剧目的内容提出修改意见，鼓励剧团“多演戏，演好戏”。他送3个女儿（13岁、11岁、9岁）参加学习和演出。支队政委谭冠三的爱人李光明是红军老战士，到剧团做宣传员，生活俭朴，团结同志，把老红军的优良作风传给团员。

及时编演新剧——部队首长常讲：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提高战士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一个方面，演出节目必须具备发扬爱国主义、团结同志、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的意义。演出的剧目有：宣传抗战的《夜12点钟》、《侵华泪》、《反战》、《第五纵队》；瓦解会道门的《一心堂》、《二郎神大闹佛堂》；反映军民关系的《可以来往的朋友》、《王老五逛庙》；鼓励参军的《拴不住》等。

全军支持演出——剧团本身虽有不少人才，但演出真实，要求提高，因而需要借调实际工作者配合演出，曾借用过战士、炊事班长、侦察员和道具服装等等。剧团只要提出要求，就得到部队支持。剧团发现需用的人才，也可通过组织调入。如在庙会发现纸扎匠张元祥，就调他入团扎制布景。

剧团人员一专多能，充分发挥工作效用——1941年至1942年，该团增至60人，除队长、政治指导员、各种教员外，下设戏剧组、歌舞组、音乐组、女生组，并在增加新的演出任务时设导演组、创作组、美术组。在演出时，还设有前后台主任、灯光、效果、服装、道具、布景化妆等，一人兼数职，各部门都有人各司其事，保证演出成功。

积极创作戏剧与节目——剧团一建立，就注意创作新剧本，并注意整理和挖掘旧剧本；积极创作现代歌舞、现代京剧，改编历史剧；创作新曲艺（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快板书、莲花落、相声、太平歌新词等）。

团员从十四五岁就培养成多面手，如15岁的靳士衍，会说相

声，能演《儿童万岁》，演《拴不住》的女主角，演《侵华泪》中的阿布中将妻。这个团以演话剧为主，传统剧目次之，曲艺新词多少不拘。

演员角色多了，就能够多演新剧本，根据时事宣传的任务，增加新内容的节目。如百团大战期间，编写了《夜12点钟》，故事是我军向同蒲铁路线发起猛攻时，我部队派一营长化装进入豆玉车站，通过党的地下关系，做铁路工人工作，与敌伪展开惊险的智斗，直至夜12点钟，里应外合，发动总攻，大获全胜，拿下车站。

剧本《抗日高于一切》取材于报纸，写一个八路军伤员在房东掩护下，战胜敌人。剧情是：一个伤员正在群众家养伤，突然日军小队闯入，房东大娘说是儿子病了，儿媳又忙说丈夫病了，伺候吃药。日本兵恶毒地命令儿媳当场与伤员亲吻。儿媳内心斗争，言语搪塞，拖延时间。当日本兵要掀被抓人时，她机智地猛扑伤员，狂吻而且大哭，日本兵被瞒。这时，民兵赶来，将日本兵消灭。这创造出一幕动人心弦的活剧。

地方发动参军运动时，剧团编演了歌剧《拴不住》。情节是：老两口思想保守，儿子立志参军，老两口立即给儿子办婚事，叫媳妇拴住儿子。不料，媳妇是个思想开朗的进步妇女，小两口以大义亲情说服爹娘。这个歌剧，刻画人物性格突出，生活气息浓烈，歌词生动，感人至深。

京剧组排练的《侵华泪》，内容是日军在“百团大战”失败后，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派阿布中将为特使，到南京汪政府摸底，寻找对策。阿布深感战争无前途，夫妻相对悲叹哭别。在南京的汪精卫夫妇却只会向阿布阿谀逢迎，一筹莫展。阿布微服出访，遇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对日军的仇恨，还有日伪军的反战情绪，社会各阶层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颂扬。这个剧1940年元旦演出。

京剧《陆文龙》是根据旧《陆安州》剧本（即潞安州，王佐断臂、说书，陆文龙起义）改编的。根据抗日战争中争取伪军起义的

政治要求，突出陆登年的殉国，加强乳娘、王佐、陆文龙的唱腔，文唱武打都很成功。靳士衍扮演陆文龙尤其出色。

《陆文龙》改编成功，鼓起整理传统剧目的勇气，因此进而整理了《吴汉杀妻》。主要情节是：王莽用药酒毒死汉平帝，吴、姜两大臣不服被杀。王莽假意将两家遗孤收养，认姜氏女为义女，招吴汉为女婿（驸马）。吴汉长大，文武全能，莽以为心腹，使镇守潼关。刘秀起兵，部将马成四处联络起义，路过潼关被俘。吴汉想将马成献给王莽。吴母告以前情，吴汉答应放走马成，回房杀妻。妻姜氏也说出真情，吴不忍杀害。但汉兵围城甚急，吴母为坚定儿子起义决心，自缢身亡；姜氏也为坚定吴汉起义信心，自刎而死。吴汉反出潼关，投奔刘秀。

以后冀鲁豫军区“战友剧团”排出《李秀成之死》，“大众剧团”排出《血泪仇》等大型话剧与歌剧。

（五）基层剧联的情况

基层剧联比基层文联还普遍些。在中心区或边沿区的村庄都有剧联基层会员。村里召开大会以前，拉拉队请他们出演节目。较大村的剧团能演出歌曲、相声、快书、小调、秧歌、曲艺等。

文联干部李坤在《文化生活》上著文，提出在有基础的村庄成立俱乐部，开展歌咏比赛、讲故事、演小戏等活动，以加强村剧联的工作。王勉在鄄城总结农村剧团的发展，首先是配备适当干部加强领导，再是抓住青少年的模仿与争胜心理为组织基点，发展村际竞赛，竞赛内容尽量选择现实题材。关于农村的戏剧形式问题，李枫林、李刚同志经调查提出，鄄城的旧戏有“高调”、“四平调”等，大部分是现实内容，但也有些历史剧，如《米建游宫》则错误百出，《黄皮脸卖嫁妆》是脱胎神话剧，《苦良民》是脱胎《捉放曹》，指出这些剧的道白、动作、音乐都有封建糟粕。基层提出要求解决新剧本，说明群众的积极性很高，而我们的文艺干部在基层是很缺乏的。当时，冀鲁豫边区在平叛之后，新区扩大，更需要

大量的精神食粮。

文工团集中各方面的文艺人才，能及时创作新剧目、节目。而如何提高基层水平，实属当务之急。经验证明，会演是提高剧联水平的好形式。1943年，当时形势允许召开大型会议，区党委在红庙开会，会期两个月。文联总会决定集中全区几个大剧社，“战友”、“前锋”、“大众剧团”、“民生”、“民友”等，给大家充分的交流时间。会间出演数场。闭会时，“民生剧社”侯桂仙演出《辕门斩子》，“战友剧社”演出《李秀成之死》，还有许多曲艺、歌咏节目，演至深夜，北风凛冽而无人离场，影响极好。会后，各剧团反映“收获很多”。

经过戏剧界的不断演出听到的反映和《文化生活》收到的来稿中都提出了一些前进中的问题，如对文工团演出大型历史剧，大布景、大乐队……县剧团不敢问津，影响到各地方剧团，剧越演越大，农民负担过重，对大型历史戏本身也存在如何使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如何与人民生活结合得更密切的问题。

基层文联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发展很大，如民间艺人联合会，本是文联的民间文艺部，后改为民间艺人联合会（简称艺联）。

抗战胜利前夕，报社记者访问了艺联负责人张富忱。他与各县民间艺人有联系，对改造民间艺人有许多创造和成绩。如他们派出的笙笛音乐实习班，实习效果很好。观城副县长李守诚来信说，观城县决定成立一个30人的艺人训练班，希望艺联帮助创办。记者问到当年的工作时，张富忱说，今年已派出4个实习班，一班音乐班去阳谷县，由笙笛研究会主任李玉喜、副主任××率领，在安乐镇等地活动，组织小型宣传晚会，或参加区、村各种会，以新谱、新段、新词向群众宣传，获得群众欢迎；二班洋琴班，8个人由班长郭之城率领去观城，在后方医院五分院18个所巡回演出，慰问伤员；三班去聊城；四班是魔术班，到观城，由当地政府分配任务，配合土改、复查、战勤、生产等中心工作。他们下去半个月时间，有3万多人次受到宣传教

育。

在艺联受训的，还有马戏班，魔术、洋片班，准备将来作扩展工作的骨干。

在年画改造方面，一方面刻印毛主席像五彩版试版，同时年画研究会派人到冀中辛集参观学习，加强年画的研究工作。

艺联设一研究室，出版民艺通报，沟通各方面联系，介绍各地民艺工作动态。

关于旧艺人的节目内容，张富忱同志谈道，除一部分是不满旧社会的讽刺作品外，多数是封建迷信、淫荡等低级趣味的东西，但一经改变内容，就为群众喜闻乐见。

艺联还动员城镇知名艺人为反攻城市做准备。如观城打洋琴的邓九如、郟城“单弦拉”王殿玉、南乐唱坠子的乔清秀等。张富忱讲，民间艺人遍地皆是，改造好，到处皆宝，改造不好，遍地皆毒。

二、新文艺运动点滴

冀鲁豫的新文艺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文化生活》编辑室曾通过采访和开座谈会了解了一些情况。

追溯到1928年，在鲁西聊城师范，校长孙东阁从济南请王祝忱，从北平请韩侍桁、阎仲容来聊讲学，韩讲世界文艺史，阎讲《红楼梦》，王讲社会进化史。这使聊师学生开始接触到俄国18世纪文学和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十年文学。韩介绍了《毁灭》、《铁流》、《战争与和平》、《复活》、《母亲》、《第41》等作品，同学们欢迎这股新思潮。聊师校刊《东风文艺》发表一些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1929年，到北平读书的郭奇、孙景濂、杨真等先进同学购买大量的“翻版书”，通过聊师高年级同学张致恭、张凝、孙宝树等以书版介绍社名义廉价卖给同学们，并代订北平出版的《语丝》、《沉钟》，上海出版的《拓荒者》、《创造》、《太阳》、《太白》等文艺刊物。这时期可以算是新文艺的播种期。

“九一八”以后，进步同学纷纷赴北平。孙景濂（笔名孙耕者）参加北平“左联”，与潘训、陈北鸥等联系，鲁西良在中国大学中共党员、教师孙席珍和齐燕铭的影响下，参加北平作家联合会，向《文史月刊》、《中流》等进步刊物投稿。当时，这些进步青年在寒暑假分赴农村作调查。鲁西良试作《初选》（揭露国民党地方选举丑态）、《替》（揭露乡村建设派在农村训练地主武装的失败）、《博士回家》（揭露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回家祭祖的封建思想）等小说在《文史月刊》和《中流》等进步刊物上发表。

这时期冀鲁豫在外求学的知识青年参加新文艺活动的已有不少人，如河南××县的王亚平在北平出版诗刊；河北丘县的何风文（袁勃）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经常向外投稿。

七七事变后，在聊城聚拢了大批文艺青年。《抗战日报》文艺副刊首先提倡新文艺运动，号召以小说、报告文学、文艺通讯、诗歌、小品文反映政治思想，针砭时弊，并提倡树立自己的风格。半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不少的文艺作品。当时只要求文艺上的真实性，提出小说要写时代的真实；报告、通讯必须实事求是；小品文则要注意策略、时机，配合实际斗争。一切文艺作品，都要注意政治思想、政治斗争的深度。

这一时期，除《抗战日报》副刊外，还有《战地文化》上刊登过张凝的《东征》和高境的小说、王玄的诗歌等。有些同志去延安学习时，写通讯、小说发表在延安、武汉等后方报刊上，吴伯箫写的《一坛血》是反映鲁西北人民反对齐子修投敌后的暴行的，解放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原聊师学生刘荫昌（改名晋驼）被校长资助逃往东北，后又到延安，写了不少小说、文艺小品，后出专集。

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后，根据当时环境困难、战事紧张、作者工作分散的特点，编辑部要求在小说写作上，作者要“深入生活，加强政治观察力”。题材可以自由选择，但内容不仅仅是“身边琐事”，而要注意积累资料，反映有历史意义的事。

当时，从全国各地到抗日根据地来的爱好文艺的青年有：北平

来的夏川、广东来的姚天纵、南洋来的马山、四川来的李育仁和周子芹、上海来的丁汾，还有南进支队的冯森、冯祖华等。他们都是创作和组织工作的骨干。如夏川曾在《文化生活》上发表《获道》、《不死的战士》等；冯森介绍晋察冀文联活动情况，他们批评写作中的“文艺至上”和文艺脱离实际的倾向，给边区文艺工作者以启发。

在写作形式上，大家一致认为战争环境中产生的新文艺作品，一定要注意短小精悍。小说可以写墙头小说，提倡写人物特写；诗歌提倡写街头诗歌。

在《文化生活》上发表过不少小说，比较长的有《湄南河的烽火》、《风沙儿女》等。许多小说注意故事曲折，以情叙事。也有反映群众对敌斗争机智性的，如《埋死狗》的故事。还有幽默性的小特写。如一地主，在减租减息工作人员去他家查人口时，他先说儿媳身子不舒服，不能见人；待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是查合理负担”时，地主马上叫出儿媳站在工作人员面前，指着儿媳的肚子说：“这是两口子！”

在发表的诗歌中，影响较大的是濮阳小学教员孙明的诗（《文化生活》第2期）。他的《赠给小学教师》，热情地歌颂小学教育工作者的愉快心情。也有长诗，如田兵同志越狱归来，以强烈的感情叙述越狱经过，歌颂战友在越狱斗争中深厚的阶级情谊。

1945年我军围困开封时，诗人、小说家王亚平，记者赵纯、许鲁野，画家赵××翻越城墙来解放区。后来王亚平主持文联总会工作，出刊《平原文艺》，新文艺运动更有进一步发展。直南、鲁西南、湖西各地区都办有综合性刊物，培养出不少青年作者。

报告文学，在《抗战日报》时期，报纸上就出现了，不过那时与文艺通讯不分。到《文化生活》和《冀鲁豫日报》副刊出刊后，报纸上发表过《李汝泰武工队》和《朝城××》，《文化生活》上发表了《民族母亲》（写民族英雄马本斋母亲的壮烈牺牲）。在刘邓大军南下进驻鲁西南时，发表了大量的写自卫战争的文艺性通讯，

“立体地”反映了战争、战勤和地方武装的工作。

关于小品文，《抗战日报》副刊曾经大力提倡，那时主要是对沈鸿烈顽固政府和范司令内部的顽固分子的斗争，以及对落后农民的落后思想的批评。从1938年6月到11月，每期副刊都登载一两篇，揭露沈鸿烈收买范部支队，霸占县政权，特别是对王金祥、沈鸿烈破坏13支队，杀害共产党员事件给以严厉抨击，使当时副刊起到正刊起不到的作用，“小品文”起了与读者“通气”的作用。

在《文化生活》上，小品文也有提倡。1943年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写的《整风随笔》（英雄主义与奴才主义），对某些干部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冀鲁豫文联总会为了组织《文化生活》的社会撰稿人和交流文艺思想，讨论研究文艺写作的基本问题，曾考虑成立“文协”。但由于条件、时机不成熟，有些爱好文艺的军、政工作负责干部抽不出时间参加研究会议，因此《文化生活》便成为交流文艺思想的园地。二分区专员邹鲁风、湖西专员郭影秋把他们在抗战中多年的诗作送《文化生活》选用。

在敌占区、顽占区，为了联系进步青年，成立了文艺小组。

当时文艺界对艺术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也有不同（当时尚未见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多数认为文学艺术是反映政治经济基础的，反映方法可以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讲，艺术是不能脱离时代的。古今中外，所谓传世之作，都是反映了它的时代，有历史真实，有时代意义。因而艺术必须为政治经济基础服务。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各种理解的不同。如文化工作的阶级路线问题，为谁服务问题，都未讨论清楚。《文化生活》编辑中有同志说：刊物对象应是小资产阶级，因为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懂。另一方面，又有人片面地强调无产阶级立场。如有的学校不许地主子女入学，甚至不许边区行署主任晁哲甫（1927年的老党员）的儿子入学，说他祖父是地主。

1943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掀起学习热潮。文联

组织大家学习“三论”（《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一个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为谁写作、为谁服务的问题。

1944年，从太行、冀中等根据地传来文艺工作经验，从延安传来整风文件，不久冀鲁豫也进入全面整风。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生命力是坚强的，尽管日军不断地疯狂“扫荡”，顽军处处搞磨擦，天灾（旱灾、蝗灾、涝灾）人祸扑头盖面而来，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仍然顽强地发展。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文艺先驱付出的代价。1939年筑纵文工团团长沙骏和8名男女团员在车轴战役中献出年轻的生命。1941—1942年日军4次“强化治安”，“铁壁合围”我根据地中心区，冀鲁豫文联总会两任组织部长马诚斋、鲁森被俘，《文化生活》主编姚天纵、李育仁，编辑王勉、田横等同志被俘，文联宣传部长袁复荣、教育部长孙仰周牺牲，杨扬失踪。“战友剧团”团长胡痴被俘，“先锋剧团”政治指导员冯森流尽最后一滴血，演陆文龙的靳士衍被敌人包围后，高呼口号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文联总会直属的冀鲁豫文工团团长沙川被俘，副团长丁汾牺牲。“大众剧团”团长王鸿猷牺牲，副团长魏广安受伤。

文化界的损失是巨大的，工作环境更困难了。然而先烈的英勇，更增加了幸存者的战斗决心。他们没有跑散，没有弯腰，而是接过牺牲者的接力棒，继续前进。被俘的同志，机智地越狱、逃跑，千辛万苦地回到冀鲁豫人民的怀抱，继续灌溉这里新文化的幼苗。

正是因为有了前面先烈们的英勇牺牲，才有后继者的创造和成熟。“战友剧团”的时乐蒙、“冲锋剧社”的张世德、“大众剧社”的万苇舟等同志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夏川在军事电影、军事文学等方面，田兵在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上都有很多建树，还有许许多多同志走上新闻界、影剧界、教育界、文艺界……成为全国解放后的新文化尖兵，继续贡献着力量！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斗争概况

郭乐天 白晶五 冯培昌

冀鲁豫边区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及苏北、皖北之接合部，南跨陇海，北靠漳河，东缘津浦，西临平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是联系山东、华中、华北和延安的枢纽，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前沿阵地，也是第二、三野战军同国民党逐鹿中原后方基地之一。边区民兵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部队的大力支持，在和敌人进行长期复杂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为保卫边区，扩大解放区，在前方直接配合主力军、地方军作战，在后方参与民主民生斗争，保卫农村社会秩序，保护农民生产，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带头参军参战，和边区人民一起，为解放战争准备了粮源兵源，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人民武装的组织状况

人民武装是指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自卫队和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地方政权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上，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救亡团体，扩大八路军游击队，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到1940年，日军回师华北，对冀鲁豫连续“清剿”、“扫荡”，国民党退守后方。此时，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县成立基干大队，区成立基干中队，乡村成立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村青教会成立了青抗先。

1941年，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军区成立了人民武装部，军分区设人民武装科，各县也成立了人民武装科，区设武装助理员，村设自卫队队部。军区武装部部长由张西珩、曾宪辉先后担任，乔明甫任副部长。同年秋，青抗先总队成立，各基层组织也相应建立。总队长郭乐天，政治部主任王黎之，各分区区队长有赵亚侠（二分区）、吴英（三分区）、楚云峰（四分区），其他多由分区武装科负责同志兼任。总队部受军区武装部、青救总会双重领导。

各级人民武装组织建立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在组织机构设置上也经常出现变动。军区武装部开始设组织动员科、宣传科。组织动员科科长孙大坤，宣传科长耿廷舟。不久，组织动员科撤销，改为组织科、军事科、宣传科。组织科长夏德义，军事科长孙大坤，宣传科长宋辛夷。1942年精兵简政，军区机关缩小，军区武装部改由行署、军区双层领导，部长乔明甫。原来部属的3个科，改为军事科、政工科，政工科长宋辛夷，军事科长粟森。1942年冬，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展，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适应群众运动的需要，各级人民武装组织改称临时人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边区武委会主任乔明甫，原来部属的科改为部，军事部长粟森，政工部长冯培昌。青抗先、模范班统称民兵，青抗先组织就此取消。

1945年夏，正式建立地区武委会。主任乔明甫，军事部长粟森，政工部长郭乐天，副部长冯培昌。

1946年，粟森、郭乐天先后调出，军事部长白晶五，政工部长冯培昌，副部长杨万奎。一分区武委会主任张裕民，二分区武委会主任由周贵生、孙正乾先后担任，五分区武委会主任由宋励华、杜恩训先后担任，六分区武委会主任赵克强、谢天民，七分区武委会主任×××，八分区武委会主任由冀炳南、郭乐天先后担任。

1946年7月20日，晋冀鲁豫后防战勤总指挥部成立，乔明甫任副司令员，张耀汉任边区武委会副主任，主持全区人民武装工作。

1947年6月15日，区党委决定，将武委会系统并入军区、军分

区，成为军区、军分区所属的武装部，主任改称部长。区、村一级的武委会，改在党内设武装委员，领导民兵及自卫队工作。没有军分区的地区，地委设武装部长，部长为同级党委委员，武装部实际担负军分区的任务。

二、民兵的形成和发展

人民武装建立初期，主要是以自卫队的形式出现。当时，18岁到55岁的男子组织起来，拿起大刀、标枪、土枪、土炮，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拿汉奸、特务，协同部队作战，担负向导、运输、通讯、抬担架等战勤任务。由于斗争形势变化，敌人经常到村庄清剿、抢掠。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自卫队自动成立了名称不同的钢枪班、基干班、游击班、锄奸组。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军区武装部为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军区的领导下，专门召开分区武装干部会议，解决扩大民兵队伍，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武装机构，以及统一名称等问题，提出自卫队先进分子参加模范班，青救会先进会员参加青抗先。这样，青抗先、模范班成了当时的两大民兵组织。

12月12日，军区在观城县朱家庙举行民兵大检阅，除一、四分区因受敌人封锁不能参加外，其他地区都有民兵参加。接受检阅的民兵约有5000余人。在大会上，杨得志司令员为扩大民兵队伍，发展人民武装，作了重要讲话。青抗先总队部在大会上授予六面队旗以示鼓励。民兵大检阅后，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在群众团体大力协助下，边区民兵得到空前的发展。1942年边区民兵由原来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各地抗日联防组织成员（多指自卫队员），由原来199338人发展到222155人。1946年边区形势好转，大片土地解放，民主民生运动普遍开展，群众情绪高涨，民兵扩大到103204人。民兵比较集中的村镇，多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进行民兵整训，搞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讲拥军优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教

给民兵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的军事动作等。在解放战争时期，民兵大量参军，但边区民兵仍有发展。据1948年不完全统计，共有民兵107728人，其中女民兵33989人。

民兵发展起来之后，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武器。解决武器的办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筹钱到敌顽区买枪。如鄆北联防，为了解决民兵的枪支，他们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口号下，规定有百亩地以上的富户买钢枪一支，50亩以上的富户买土枪一支，或几户合买一支枪。其他按照合理负担摊派，集资买枪。有私枪的经过动员拿出来交给民兵使用。不到三个月，联防各村都有十几支枪。枪的种类很多，有“日本大盖”、“水连珠”、“湖北造”、“中正式”、“套筒”、“老铅牛”、“独眼枪”等。

（二）自制武器。开始主要是依靠军队系统的兵工厂、修械所制造枪支，后来，不少地方把农村能工巧匠组织起来，进行仿造。民兵最主要的武器是手榴弹，凡是过去有“化铁炉”制造农具的地方，就把当地的工匠组织起来，建立炸弹厂，制造手榴弹。民兵把村里的麻秆、火硝、木材、破铜烂铁收集起来，送给炸药厂，换取手榴弹。沙区炸药厂是个老厂，建于1940年，原属军队系统。厂长李远有是个老红军，领导100多人专门制造手榴弹，为民兵建设作出了贡献。1944年以后，各分区武委会相继建立了军械修理站和手榴弹制造所，以解决民兵的武器问题。

（三）收缴敌人武器。民兵每逢打仗，都想多缴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大量地歼灭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使民兵的装备大有改进。据1948年不完全统计，民兵拥有步枪44590支、轻机枪281挺、掷弹筒74个、“六〇”炮15门、短枪1175支。

三、民兵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边区民兵采取多样的战术，积极

配合我作战部队，在对敌、伪、顽、会道门、土匪、地主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大后方，农村的社会秩序井然，盗窃案没有了，吸毒、贩毒、赌博害人案绝迹了，违法犯罪现象大大减少。人心安定，有时可达夜不闭户的局面。每个村上都有民兵，每个民兵手里都有捍卫农民利益的武器，在村支部的领导指挥下，随时警惕敌伪军的进攻破坏。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

泰西地区和直南地区都是开展人民武装工作较早的。泰西地区从罗荣桓同志1940年一次动员报告后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发动群众，凡年满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都编入人民自卫团，地区成立人民自卫团司令部。司令由分区司令员兼任，武装部长或科长任副司令员，县长兼人民自卫团团团长，县武装科长任副团长。团员除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外，还作些支前支军、运输、侦察、通信联络、警卫、维持地方治安等工作。全区自卫团发展很快，在自卫团里也发展了青抗先、模范班，整个泰西地区抗日武装形成两种形式，一种是脱产的武装，一种是不脱产的武装。脱产武装是军分区武装部队、县区基干队和脱产的游击队、游击队小组等，不脱产的是各县区村的人民自卫团。1942年后，地区情况有些变化，对敌斗争激烈，靠近边沿地带的有觉悟的团员，纷纷脱产加入游击队、游击组，有的参加了主力部队或县区武装，不脱产的联防斗争就很难坚持下去了。

直南地区的自卫队普遍建立后，因有濮范观中心地的依托，随着形势和斗争的需要得到相应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较好地开展了联防斗争。在模范班、青抗先的基础上，民兵发展很快，武器装备越来越强，能够配合主力、地方军作战，并能够独立作战。

（一）发挥民兵的优势，积极配合部队作战

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履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主力军是骨干，地方军与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三者各有专长与特点，有机地互相结合，对建军作

战、开展群众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十分有利的。

1940年鲁西南斗争形势恶化，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部分军队被挤到曹县的曹楼、刘岗、伊庄一带。东面十几华里、南北三四华里的狭小地方，受到土、杂、顽7000余人的包围。曹楼、刘岗、伊庄一带的民兵、自卫队，配合分区独立团一个营坚守了120多天，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保卫了地县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安全。1941年的春节前夕，我新三旅七团、八团开往该地，粉碎了敌人的包围，打开了鲁西南的局面。曹楼、刘岗、伊庄的对敌斗争，受到军区的表扬，后来成为有名的“红三村”。

1940年1月，考城县葛庄村的民兵，配合县大队攻打王桥梧据点。民兵因为对敌情、地形及群众的情况都很熟悉，所以配合部队作战都很得力。他们为部队提供情况，行军担任前哨，作战冲锋陷阵，使这次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共毙伤敌人100余名，活捉中队长以下280人，缴获长短枪216支、马8匹、马车8辆。为此，葛庄的民兵受到鲁西六分区的表扬，并获得奖励。

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沙区进行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当地民兵积极配合部队坚持腹地斗争，掩护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时，民兵积极配合我军一个团打到了清丰，攻克了白仑、疙瘩店等据点，毙伤敌伪军百余人。

抗战以来，边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民兵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不够普遍、不够平衡，成份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当边区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时，有些群众的武装便垮下来了。1942年上半年，军区抓紧进行整顿，淘汰了一些流氓地痞，完善了各种制度。9月1日，区党委发出《关于支部对民兵领导的决定》，加强了党组织对民兵的领导，建立了民兵的政治工作。1942年底，边区颁布了《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规定根据地中凡年龄在50岁以下、16岁以上者，不分性别，一律参加联防（妇女自愿），进行抗日、锄奸、防匪，以保卫根据地。随着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以及游

击战争中的实践，到1943年上半年，民兵组织得到了发展与提高，联防也发挥了较大作用。1943年7月30日，行署、军区发出《关于1943年下半年人民武装工作的方针和指示》，要求大量发展民兵，从斗争中和民主民生运动中提高民兵的军事技术、政治素质，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准备配合主力部队实行大反攻。在边沿区和群众基础薄弱的接敌区，要大力组织联防，切实掌握联防的领导权。各地区根据上级指示，加强了人民武装工作，使人民武装在对敌斗争、维持社会治安、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冠堂地区，是鲁西北的战略要地。这里是比较富裕的粮棉之乡，而封建势力雄厚，是日伪的“模范区”。我们在这个地区开辟工作时遇到了敌伪顽杂拼命的抵抗。1939年、1940年期间，天天有敌情，处处有枪声。有时敌伪顽杂联合起来向我根据地进攻，经常有小股敌伪向我骚扰。这里，我们地下党基础好，自卫队、青抗先、模范班、游击小组、民兵队，在农村已经形成了保卫农民自身利益的拳头，组织了联防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侵扰，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拔除了许多碉堡，平毁了敌人的壕沟封锁线。游击组、民兵配合主力与地方武装联合战斗，不计其数，著名者有：清水刘屯、汤村战斗，小郭庄战斗，曲掌固战斗，西焦庄战斗，孔村战斗，张柳绍战斗，乔庄战斗，吴海子战斗，贾镇战斗，廿里堡战斗，解放堂邑城战斗等。解放聊城、临清等地的战斗中，民兵中也涌现了王西元游击队，梁文焕武工队，吴兴、柴龙、韩洪林敌后武工队等大批能打善战的民兵模范班和神枪手。

1942年春季，朝城敌伪军对我中心地区进行“蚕食”进攻，在县内四面建立起40余个据点，敌人向南发展，直达我观朝县第三区境内。这时，在县武委会直接领导下，朝南联防很快组织起来，以十五庙为中心，赵楼、桑庄、杨行、李行、刘行一线，长约20华里，自卫队、模范班、青抗先共约800余人。每次敌人来犯，一村击鼓，四面支援，正面堵截，左右侧击，杀声遍野，使敌人望风而

逃。一天，我民兵派出侦察，探得日军与文大可伪军300余人拟于2月15日到十五庙杨行抢粮抓夫，立即报告县委与南下支队32团。32团决定14日夜主力在十五庙杨行设伏，令刘行模范班在该村隐蔽，待敌至杨行打响后，实行前后夹击，以彻底歼灭来犯之敌。15日拂晓，敌人进至杨行村口时，我主力部队全线开火，敌死伤数十人，仓皇败退。我刘行模范班全队出击，夹击败逃的敌人，在激战中，和敌人交手混战，敌伤亡10余名。我刘行模范班刘德清、刘××等3人不幸牺牲。战后观朝县政府、县长王树成对十五庙刘行模范班通令嘉奖，在刘行村召集联防区全体队员举行追悼大会，追认抗日烈士，对其家属进行抚恤。自此，朝南联防更加巩固，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使朝城敌伪军不敢向南侵犯一步。

自1943年起，我军正确执行了“敌进我进”方针，主要表现在敌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后进攻，派出大量武工队、民兵游击组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根据地，变敌之后方为我之前线，变我之被动为主动，从而有效地扭转了退缩的局面。

从1942年秋季开始，边区认真组织抗灾救灾工作。在行署抗灾总会指挥下，各级政府救灾委员会，从中心区调集1000万斤粮食，组织民兵、民工和县区武装护送运粮车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先后将350万斤粮食运往鲁西北，将600余万斤粮食运往沙区。在敌人封锁围困下，保证了人畜、粮食与车辆的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解除了燃眉之急。

1943年11月16日，濮阳县民兵配合我七、八团和南支三个团袭击八公桥孙良诚部，全歼孙良诚部八大处、警卫团、骑兵营，俘虏官兵3000余人，缴获马300余匹、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2000余支，还缴获了兵工厂和其他战利品等。

郟城县黄楼村共80余户，400多人，党的基础较强，群众觉悟高，党群组织健全，工作非常活跃。敌人早已把它看作向我中心区进攻“蚕食”的障碍。8月1日，城内的汉奸头子刘本功部伙同侯集、刘口等据点敌人400余人，突然向黄楼进攻，并从东、南、北三面包

围。支部书记张全建、自卫队长张绍兴，立即率领15名基干民兵把守寨墙，进行激战。汤垓民兵闻讯前来支援，民兵撤退到院落进行巷战。敌人连续数次攻击，死伤20余人。战斗从上午7时一直坚持到下午1时傅庄洼、刘庄、孙沙窝等实验区的民兵赶来增援。被围民兵一部乘机撤出寨外，11名民兵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党对黄楼民兵英勇杀敌的光荣事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政府授予11名民兵“民兵英雄”的称号，追认为烈士，召开追悼会，并对家属进行抚恤慰问。馆陶县六区塔头村的民兵，是久经严酷斗争锻炼的武装，素质较强。其骨干民兵中，有步枪、手枪，有三八式套筒、湖北造等，也有些土枪土炮，战斗力较强。1941年6月的一天拂晓，日军把村子包围，妄图一举消灭该村民兵。民兵立即据守村寨，顽强地战斗了四五个小时，终因经验不足，最后从村西面撤走。这一次，遭受了重大伤亡，30多名民兵负伤和牺牲，从而更加激起了人民和民兵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943年秋，馆陶敌人要在七区法寺村修碉堡。县委得讯后，教育群众不出人，不出粮，不出物资，决不给日伪效劳。全村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统统埋入地下，青壮年离开本村，地方武装、民兵队不停地对敌军进行袭扰，并监视地主、坏分子的资敌通敌活动，使敌人大大推迟了安“钉子”的时间。随后敌人又到八区南拐村安“钉子”，在群众、民兵的抵制打击下，敌人的阴谋同样没有得逞。这两个立足未稳的“钉子”无法存在，不得不撤退。上级把这个经验通报全区。

1944年是边区军民向日军发起进攻的一年。5月11日至17日，昆山县的民兵配合部队向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先后拔除戴庙、张博士集、大小安山村据点，攻克碉堡51处，毙伤伪军150余人，俘伪军中队长以下1000余人，解放了昆山大部分地区。

（二）联防作战，共同抵御来犯之敌

由于部队跨地区作战，而广大农村主要由民兵自卫，为了有效地进行自卫战争，边区广大农村在党的号召下普遍建立了联防。数

村组织一个联防区，制定联防公约，一村有事，数村支援，违者受罚。鄆北联防在边区是比较好的。它1941年成立，初期只有几个村庄，后来发展到几十个村庄，形成一条东西长70余华里的联防线，一直伸到敌占区的边沿。为了充分发挥联防的作用。他们积极改造地形：没有寨墙的地方，把胡同用泥土垒住，留一空眼瞭望敌情；村边的房上、墙上插满了圪针条，留下大路口，来往行人非此不能通行；村与村之间挖成5尺深的路沟，有的还挖了地道，战时用来掩护；院落之间互相连通，进入一家就能走遍全村。村里村外扯上地雷线，有真有假，叫敌人望而生畏，不敢妄动。敌人来了，一处枪响，四处支援。打胜了，把敌追到据点里去；打败了，四处分散，搞得敌人晕头转向。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万余人分8路向我濮、范、观中心区合击“扫荡”。鄆城县伪县长王文宪率伪军500余人尾随日军攻占东店子、西店子联防村，妄图摧毁我联防阵地。我联防民兵在区队的协助下，展开了阻击战，从上午打到下午3点。敌人久攻不下，只得退回据点。1943年2月25日凌晨，王文宪又带领伪军攻打梅坊村。县大队两个连，五区队和栗屯、店子、仪楼的联防队立即赶来支援。伪军见势不妙，落荒而逃。县大队、联防队撤走后，敌人又来攻打梅坊村。当时梅坊村有3个民兵班、二十几支枪、几门土炮。民兵们一面掩护群众转移，一面与敌人展开激战。当敌人快爬上寨墙时，民兵把准备好了的铁钉、耙齿装在土炮里轰击敌人，毙伤敌18名。王文宪见久攻不下，便亲自带领伪军往上冲。当敌人打进村庄时，民兵早已分散了。敌人气急败坏，烧毁民房400余间而去。

南乐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敌人摧残比较严重的县。这个县盘踞敌人几千人，县境内公路纵横，碉堡林立，还有很多封锁沟，县内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南乐县的张庄集、樊村、李家庄、阎村和武家村于1942年建立了6村联防，森严壁垒，敌人几次进攻都没有得逞。在八年抗战中，这里是南乐县坚持对敌斗争较好的地方。沙区高陵县，为了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

和“蚕食”，于1940年普遍建立了联防，对伪军孙步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民兵联防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致使敌人非常害怕，稍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1941年×月，鄆城县伪县长王文宪在日军的配合下，率伪军进犯我鄆城县东西刘楼、赵庄。区队和联防队坚决抵抗，子弹打光了，赵庄农会会长急中生智，背起大鼓，爬上寨墙擂打起来。敌人听到激烈的鼓声，以为联防队反攻，急忙撤回县城去。

内黄县的民兵联防，从1941年开始建立，由村与村联防发展到县与县联防，与滑县结成了联防县。村联防既有村各自为战的领导，又有统一指挥的准则，成为一支强大的对敌伪有威慑力的人民武装力量。一般情况下，没有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伪、顽、会、匪、杂等是不敢轻易向根据地进犯的，偶而进犯或向根据地骚扰，也是遭痛击后而逃窜。1941年秋，城姜村住了几个地方工作人员，东庄伪军得知后，当夜派出100余人偷袭城姜村，企图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当伪军摸索到工作人员住户附近时，我值勤民兵发现，鸣枪报警。民兵队长马上指挥民兵，高喊：“一连堵住东门！二连堵住西门！”紧接着，东西姜村、太平、野庄等村民兵立即鸣枪响应，并派出武装民兵跑步前去支援，伪军吓得四散逃窜。事后，几位地方工作人员说，亏了民兵防范严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区与区之间也有民兵联防和联防公约。对于联防公约，各村民兵形成自觉遵守的好风尚。这种强大的民兵联防又为主力军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42年秋，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沙区根据地主力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东庄、内黄县的伪军数千人乘隙联合向沙区进犯，伪军已深入到干口、大柴村、店堂一带。内黄县各区民兵主动联系，配合主力迅速向伪军发起总进攻，枪声四起，伪军丢下抢夺的物资溃逃。我追杀近20里，伪军旅长唐××逃至野庄时被击毙。

内黄与滑县的联防成立大会是1941年秋季在滑县召开的。滑县

县委书记赵紫阳、武装科长田×民、内黄县安子成参加了会议。会后，赵紫阳提出建立民兵联防核心领导，党团书记由赵兼任。当时，党组织对民兵武装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1942年某月，观城县二区武装干部李永成到康庄工作。朝城伪军7个连到小郭庄一带“扫荡”，李永成就叫民兵吹号，周围的联防村都吹起来了。敌人听到周围的号声，以为大军来到，不战自退。

1944年，我军对敌人连续发起进攻，民兵紧密配合，联防队成了联攻队。一年里，边区民兵计作战1898次，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54人，俘3人，毙伤伪军964人，俘501人，争取伪军反正231人，捉匪66人，缴获机枪377支、掷弹筒3个、短枪44支、地雷36个、手榴弹5361枚、子弹3893发、牛79头、自行车24辆、电台2架、造枪机床1架、电线100398斤、粮食81669斤，查获敌探奸细484人。

在联防作战中，我边区民兵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一分区茌平县张楼村的民兵联防，在一次对敌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被敌攻入村内。民兵、群众333人英勇牺牲，271人受伤，264人被抓走。张楼村的民兵、群众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受冀鲁豫人民的赞扬。该村被上级命名为“英雄村”。

（三）根据平原特点，机动灵活进行战斗

1、交通战

冀鲁豫边区地处平原，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边区民兵和广大群众在党的号召下，每年秋冬两季开展破路运动，把交通要道都挖成5尺深的路沟，做到村村相连，路路相通。打起仗来，敌人的汽车、坦克无法畅通，而我们却可以利用路沟掩护群众转移，有利于对敌人展开游击战。1943年秋，朝城县日伪军300余人到观城县田海、奶奶庙一带“扫荡”，南乐县李家村（位于田海以北三四华里）的青抗先、模范班三三两两顺着“抗日路沟”向田海村打枪。敌人惶惶不安，如临大敌，把田海村的树砍了不少，堵住村路口准

备固守。当天夜里，观城县青抗先大队长何涛在当地组织了三四十名民兵，在县大队的配合下袭击了这个村庄。敌人乱成一团，第二天一早就逃跑了。

在挖“抗日路沟”的同时，边区民兵和广大群众不断破击敌人的封锁线。敌人为了推行“蚕食”政策，修了不少公路，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公路附近设了不少据点。据1942年的统计，边区境内有敌人公路173条，共长8800华里，封锁沟30条，全长1400华里，伪据点899个，兵力6万，日军据点199个，兵力5000。另外，顽军37000人驻扎在濮阳、滑县一带，经常袭击我们。边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几块。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反“蚕食”斗争，边区军民展开了破击战。1941年3月，沙区军民大破南（乐）清（丰）、南（乐）内（黄）濮（阳）滑（县）等公路。部队袭扰敌人的据点，民兵掩护群众破路，一夜之间，把敌人的公路挖得不能行车。8月间，又组织群众2000多人，在民兵的掩护下，一夜之间分段破击了南（乐）清（丰）之间的公路和封锁沟。

1942年春天，朝城敌人对我中心区实行“蚕食”进攻，到处设据点、修碉堡，扩大敌占区，缩小和封锁我根据地，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这时，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采取分散游击方式，小部队活动，白天休整，夜间进击。敌进攻我时，我小部队插向敌人后方进行活动。民兵也组成游击组、武工队，夜间插入敌人后方进行干扰。朝城二区以民兵英雄“二太监”（赵启明）和张振海为首组成民兵游击组，活动在南朝公路上，经常出没在敌伪碉堡之间，打伏击，捉敌探。他们还经常给砖庄、吉祥寺等碉堡伪军上课（训话），讲形势，讲我军对敌伪军的政策，以争取瓦解伪军。他们通过侦察，摸清敌人出发时间和“蚕食”计划，以争取、瓦解与镇压相结合的方法，摧垮了40余村的伪政权组织，配合主力部队收缴10余个据点的枪支，争取自首或停止资敌活动100多人次。由于广大军民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敌人的“蚕食”进攻逐渐破产。

2、地道战

边区民兵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坚持就地作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展了地道战。1941年至1942年，敌人以强大兵力对冀鲁豫边区连续“清剿”、“扫荡”，根据地缩小，大块大块地被分割。民兵为了坚持内地作战，开始挖了些地窖、地洞进行防御。后来感到不保险，一旦敌人发现便无招架之力。于是，他们学习冀中地道战的经验，在军区武装部的领导下，开始挖地道，在锅底下、炕洞里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留了进出口，专门挖了“气眼”（通气孔）。有的还在地道内安上了“土电话”（设置各种暗号），以便于指挥。这样，地道成了民兵坚持腹地斗争的有力阵地。鄄北、南乐的联防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抗日胜利，地道确实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各地结合进行地道建设和民兵联防组织的建设，收到了可喜的成果。地道在对付国民党大军压境及疯狂的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党委把建设地道作为游击战争手段之一。当时五分区在土改结合地道建设上取得了较好成绩。三分区和其他几个分区，学习推广了五分区的经验，逐步使地洞与地道相贯通，户与户、村与村都连结成网，由单纯地躲藏到能躲能打，能守能攻，一个时期内成为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

1947年4月中旬，国民党第六〇〇团和还乡团等部约2000余人，向我三、五分区有重点地进攻掠夺，手段极其残酷。他们用刀砍、活埋、五牛分尸、铡刀铡死、剥皮等手段，残杀我革命干部和民兵。五分区安陵集一村，敌人刀砍村干和民兵12人，不让收尸，不让掩埋。兰封县一个区队被俘20余人，全部被砍死。中心区刘岗、曹楼等10村，一次即被杀害50余人。第三分区鱼台县被敌侵占后，还乡团大肆捕杀地方干部和民兵，并用地方干部、民兵的人头活祭国民党鱼台县长吴品山。在沛县，敌将我干部民兵杀害后，把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第五分区菏泽县民兵队10余人在地道内被毒死，敌人将尸首挖出来，又用铡刀铡。仅1947年一年内，我二、三、五、七分区被杀被俘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即达500余人，被抢粮达1720余万斤，被掠去牲畜16472头、大车1764辆，被烧毁房屋32842间。

1947年12月，国民党整编八十八师一个团和碭山保安团共约2000余人，携带大炮等重武器，向碭山县贾庄、后王庄同时进攻。开始时敌以炮轰击，后在机枪掩护下发起冲锋。我民兵队和区乡地方干部百余人，坚守地道，一枪不发，待敌人接近时，集中火力，猛烈开火，将敌人击退。一直坚持到傍晚，我先后打退敌人4次进攻。战斗进行两天一夜，共毙伤敌137人，而我无一伤亡。敌连续几次受挫后，又从徐州调来一榴弹炮团和第八十八师全部，以数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于12月23日发起疯狂进攻。坚持地道的干部和民兵，在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后实行突围，但因许多地道被敌炮火摧毁，又因众寡悬殊，除少数突围外，民兵和区乡干部68名被俘，其中区委书记以下35人惨遭杀害。

1947年冬季，区党委、军区吸取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军区部队对敌采取疲惫削弱、歼其零星小股的战法，积小胜为大胜；分区武装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县区武装坚持中心区斗争，成为支持民兵队、武工队坚持农村阵地的骨干力量。民兵队、武工队则组织群众依靠地道、地洞、路沟等捕捉零星敌人，镇压特务，控制地主还乡团的破坏活动。单县曹马区民兵5天作战15次，其中一次解放了被抓壮丁及妇女60余人，截回马车一辆。这个区的范庙武工队，在区武委会主任张守全的领导下，依靠地道、地雷杀伤敌人60余人，并击退有3辆装甲车装备的敌整编第五师一个营的进攻。成武县民兵20天作战52次，毙敌20余人。五分区军民在国民党整编第五师等7个旅的合围奔袭下，不分昼夜地反复对抗敌人之“清剿”、“扫荡”。

在大量敌军压境，残酷斗争之际，各县区干部战士和民兵出生入死，忍饥受饿，保卫群众利益，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深受群众支持爱戴。有的群众自觉地向地道里送水送饭，有的为掩护民兵或干部，以全家性命作保，许多妇女、老人被敌人吊打，坚贞不屈，一字不吐。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感人至深。

荷泽县五区武委会主任杜金铃，率领民兵作战，被敌人包围。

因众寡不敌，弹尽粮绝，他率民兵11人集体自尽。在整个战争残酷斗争的年月，边区军民奋不顾身，英勇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47年一个时期内，冀鲁豫边区在敌我双方兵力经常保持在50万人左右以及敌人严重摧残的艰苦条件下，参战支前民兵、民工数量巨大，仅民兵即占116.9万个工日，民工占3801.7万个工日。参战民兵伤亡数字很大，都按行署颁发的《民兵民工参战伤亡抚恤损失赔偿条例》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保证了民兵队伍的稳定和高昂的战斗情绪。

3. 地雷战

地雷战多用于边沿区。因为敌人经常出来窜扰，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民兵就将自己制造的土地雷埋在村庄周围，拉了很多地雷线，有真有假，有的把石滚搭上地雷线当成大地雷吓唬敌人。敌人提心吊胆，不敢偷袭。后来又将土地雷推向敌人碉堡附近，把地雷、快火手榴弹乘夜埋在敌人出入的地方以封锁敌人。

在内地，地雷主要用于敌人“扫荡”时，让它“看家”。敌人进行“扫荡”时，民兵将地雷埋在自己家的门前门后，有的把地雷埋在粮食屯里、衣柜里，有的门上挂个手榴弹，敌人一见就溜之大吉。

平原作战多用踏雷，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地理条件的限制，冀鲁豫边区的地雷战没有普遍开展，只是在物质、地理、技术条件成熟的几个点上开展起来。

（四）敌占区的民兵英勇顽强，坚持斗争

1942年7月8日，南乐县东节村的民兵为了拔掉敌人在东节村的据点，与县大队配合，巧扮泥瓦木工，到据点内突袭日军，打死9人，仅1名日军和1名翻译逃脱，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数支，受到了军区、行署的嘉奖。7月30日，日军80人，伪军400余人包围了东节村进行报复，用刺刀挑死8人，活埋180人，烧房800余间，制

造了有名的“七三〇”惨案。但是，东节村的民兵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敌斗争，在敌人继续占领东节村的情况下，于1944年配合县大队，又一次拔掉了这个据点。

翟村铺是南乐县西有名的大村庄，全村共有五六百户人家，1940年前曾是抗日游击区。1941年，国民党丁树本部一个营长杨发贤投敌叛变，任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旅长，下辖3个团，共2000余人。他们在翟村铺周围安了不少据点，远的十几里，近的五三里。在敌人的包围下，翟村铺党支部很坚强，组织了三十几人的青年武装。大的20多岁，小的十几岁，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自己拿钱购买了“底把盒子”十几支，主要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同志。县委书记魏明光，宣传部长陶鲁正，区委书记赵东甫，区长李敬轩和李祥等同志都在这个村里活动过。这里是他们从事地下工作的落脚点。翟村铺的青年武装为了保卫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维护当地群众利益，除掉了不少坏蛋。安庄的王鑫是敌人的侦探，经常给敌人通风报信，干了不少坏事。1943年秋，青年武装配合区队除掉了他。邵家庄驻伪军一个团，团长袁志儒是翟村铺人。邵家庄离翟村铺不到5华里，袁志儒常带着喽罗到翟村铺活动，与该村反动势力相勾结，清乡、查户、派款、要粮，作威作福，甚是嚣张，群众恨之入骨。翟村铺的青年武装，奉上级党委的指示，在外地民兵的配合下，于1942年冬除掉了勾结袁志儒的地主、国民党分子周兴斋，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翟村铺位于冀南、冀鲁豫两区的边界，是两区联系的纽带，护送干部、传递情报是该村民兵经常担负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他们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五）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主民生运动

为了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冀鲁豫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掀起了反贪污、反恶霸、改造村政权、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合理负担、查“黑地”、借

粮、赎地等群众运动。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工、农、青、妇、文、武的群众组织也得到发展与壮大，民兵组织普遍得到充实，已经形成农民自己的有力拳头。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民兵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边区民兵进行了几次整顿。1942年9月1日，区党委发出《关于支部对民兵领导的决定》，要求各地支部都把领导民兵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党员要在民兵中占 $1/3$ 或 $1/2$ 。民兵指导员由村支书或副支书担任，以保证民兵质量和民兵教育训练的实施。1943年，区党委又作出《关于整顿、健全各村民兵组织》的决定，使不坚定分子退出民兵队伍，枪保持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当时叫做“枪换肩”。经过整顿，民兵队伍大大加强，成为群众工作的得力工具。民兵在群众运动中，控制地主，维护治安，处处事事站在群众运动前列，为群众撑腰，保证了各项运动的顺利进行。

（六）保卫大生产，实行劳武结合

为了作到战争保卫生产，生产支持战争，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每逢春、秋两季，民兵积极保卫抢耕、抢种、抢收。为了充分发挥民兵的保卫作用，提高民兵素质，民兵实行了劳武结合的制度。一是变工互助。民兵保卫群众生产，群众有义务保证民兵生产不受耽误。民兵出勤时，群众代民兵积肥、收粮、抢耕、抢种。二是民兵不出勤时，在家积极生产，不仅是作战的英雄，而且要做劳动生产的模范，克服“二流子”现象。三是民兵边生产，边练武，一手拿枪，一手种田，随时准备打仗。

民兵的生产问题，按行署规定执行，互相换工，集中作战算工，战勤押运担架算工，剿匪维持治安算工，开会受训不算工。经常集中的武工队则以代耕方式解决，防止随便换工乱用民兵（因有区队者多用民兵代替），战争空隙禁止浪费民兵。

在劳武结合的同时，边区武委会还号召全区民兵开展神枪手活动。阳谷县民兵李延隆，是神枪手，打枪百发百中。一天夜里，民

兵到敌人炮楼附近活动，炮楼上挂着敌人的“救生灯”，他一枪就把它打掉。由于李延隆枪法好，出了名，有的部队作战时还专门请他去配合。边区武委会抓住这个典型，号召全区民兵开展神枪手活动，提倡民兵在生产间歇期间加强练武。从此，神枪手活动在各地展开，不少地区涌现出一批神枪手、神枪班来。特别是1943年以后，随着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样的活动更为普遍了，民兵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1944年4月以后，冀鲁豫军民连续展开对敌攻势作战，广大民兵和群众挖沟破路，开展政治宣传，配合部队攻克敌人据点10余处，歼灭大量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地区和县城，进一步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区民兵共有103304人，民兵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达4.5万人次以上，仅民兵单独作战即达1898次（水东区未计在内），杀伤日军小队长以下54名，俘敌3人，杀伤伪军964名，俘伪军501名，争取反正231名，歼灭土匪66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查获敌探奸细484名。

（七）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

1945年8月中旬，冀鲁豫三路大军对日伪展开反攻。我边区民兵除了积极支前外，还配合地方武装围困腹地城镇日伪据点。8月10日，日军无条件投降。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8月12日，边区行署武委会发出紧急通令，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紧急动员起来，迎接新形势，迎接新任务。各地遵照通令，立即行动，组织反攻营、反攻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同时，还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搞好治安防谍工作，严防溃散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侵入，保卫根据地的安全，巩固后方。

日本投降后，分区、县和区的地方武装都升级为主力部队，各县的反攻团、反攻营、反攻连分别代替了各级地方武装。县武委会主任执行县大队长职务，分区武委会主任执行军分区的任务。一纵北上之前，为了充实主力部队，边区武委会决定派军事部长粟森去中心区的寿张数县，动员了千余名民兵，编为一个民兵团，参加了

一纵主力部队。

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我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准备反击国民党的进攻。边区武委会向民兵发出训令，指出从元月13日停战令生效以来，国民党正规军及其他武装向我区进攻101次，使用兵力4万以上，要求民兵配合部队，坚决消灭来犯之敌，加强边沿区的防卫工作。据上半年统计，国民党军队向我区进犯300余次，使用兵力10万人。我区民兵、地方武装站在自卫的立场，被迫与敌人作战231次，毙俘国民党军5100人。

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边区民兵先后参加了陇海、定陶、巨野、鄆南、滑县、豫北、金（乡）鱼（台）巨（野）等较大战役，担负着护卫数以万计的担架、运输以及破击陇海路、配合部队作战等光荣任务。

各地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掀起了反攻杀敌热潮。在野战军围攻郟城时，当地民兵在城南的石桥、徐垓、黄龙、引马一带建立了长达百里的联防线，村村设防，昼夜巡逻，不让一个敌兵漏网。7月9日，敌五十五军残部利用青纱帐潜逃，当地民兵和自卫队员一拥而上，杀声四起，将敌兵80余人全部擒获。在整个战役中，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官兵1500余人。

10月28日，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消灭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我晋冀鲁豫军区集中6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邯鄆战役。我边区民兵、民工10万人，昼夜支前，送粮、送弹，抢运伤员，有的民兵营、民兵团在部队的统一布置下配合作战，为邯鄆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6年5月，南旺县（梁山）荣庄青年民兵班配合县大队截击敌人军车，歼灭敌军1个班，俘敌中尉军官1名，士兵、驾驶兵共12人。

1946年8月，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我二、三、五地委共出动民兵1万多人随军执行破坏铁路的任务，并动员了民工15.6万人，送弹药，运粮食，抬担架，胜利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1947年7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作战，边区武委会从东阿、博平、聊城、清平4个县调出4个民兵团，组成民兵支队，随同华野部队在单县、鱼台、金乡、成武一带与国民党新五军周旋作战一个月，胜利地完成了支前任务。9月初，奉战勤总指挥部命令，将民兵支队3个团撤回黄河以北休整，并指定博平团随华野十纵队参加围攻沙土集的歼灭战，一举将敌五十七师全部歼灭，俘敌师长段茂霖，毙伤俘敌军共500余人。我民兵团配合主力攻进敌营，占领把守敌机要部位和物资，守候枪弹仓库，转运伤员，押解俘虏，动员群众掩埋现场敌尸，清理散失武器和逃避隐藏的敌特、还乡团分子等。经过3昼夜，民兵团把战场清理完毕，圆满地完成任务，受到战勤总指挥部的表扬。

在沙土集战役期间，为了保证战役的全胜，冀鲁豫第五军分区部队和各县民兵队、民兵连动员并带领数千名群众，破坏民权至柳河间铁路华15里，将铁轨拆除，将电线全部割断，使敌人铁路运输中断，全线瘫痪，迫使敌人前后不能接应，无力再战。

在大力支援前线的同时，我边区民兵还积极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6年9月中旬，我黄河南的民兵、武工队，在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斗争中，依靠地道打击小股敌人，对付敌人大军过境，袭击地主还乡团和区、乡公所。截至10月底的统计，一个半月的时间出击敌人150次，歼敌35人，初步打开了鲁西南的局面。在同一时间里，考城县的民兵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还乡团中，俘敌100人，受到边区武委会的表扬。

1947年黄河河防指挥部成立后，齐河、河西、寿张、范县、鄄城、昆吾6个县成立了河防营。300华里的河防线都是民兵营把守，真如铜墙铁壁一般。7月，敌新五军攻克了我河东之东平县城，企图在我河防线东部东阿县城打破一个缺口，以便向黄河对岸攻击。我河防营民兵一排30余人以攻为守，到河对面迎头阻击。敌来势凶猛，民兵边战边退，至黄河边时，敌人已把码头口岸所有船只撤走，宣布戒严。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敌新五军追赶，在这紧急关

头，民兵队长命令全体民兵脱去衣服，背好枪弹游水过河。敌退至河边时，我基干大队在北岸用机枪掩护。我民兵队无一伤亡，受到了县和指挥部的通令表扬。

1947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开运工作会议，总结部署土改工作。在游击区，备战参战与土改相结合，深入开展翻身检查，进行填平补齐，做到不漏一口人，不漏一亩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收复区，在复仇保田、“反倒算，保田、保粮、保命”的口号下，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边缘区，更好地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组织联防，前边民兵警戒，后边分田、保田，争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更好地支援前线。

1947年7月9日，敌整编第五十五师溃兵利用青纱帐四处潜逃，行至郟城田场、李合庄一带。第一、二区民兵立即将他们包围起来，当地农民也扛着锄头、红缨枪蜂拥而上。顿时，方圆10里的土地上杀声震天，敌80余人全部就擒，武器弹药全部被民兵缴获。

我军收复定陶县城时，当地民兵积极配合，英勇阻击敌人援军。7月6日，敌整编三十二师一部沿单虞、单砀两公路北援。单县、成武、华山、砀山等地民兵和区小队，设伏在公路两侧，布设地雷，阻敌前进，使援敌两天只前进了100华里。我民兵缴获汽车1辆，毙俘敌连长以下50余人。整个战役期间，二、三地委各地民兵、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捕捉敌人溃兵，共俘获官兵1500余人。

1947年3月6日，临泽县基干队和三区民兵于菏泽至郟城公路间的都司集一带，一举歼灭敌人一支汽车运输队，缴获汽车18辆、炮弹54箱、大米300包，俘敌50人。军区通令表扬，并号召各县、区武装民兵向他们学习。

同年3月9日，七分区十九团一个营，在嘉祥县大队和两个民兵连的配合下，袭击盘踞在双凤村的敌人，击毙保安旅长阎恕以下45人，俘27人。

1947年7月8日，我一纵队攻克了郟城县城，敌五十五师一个正规连夜间逃跑迷失了方向，集体坐在一块高粱地里，被我郟七区区委书记

记刘芝带领的民兵小组发现。杨集民兵杨乃武急步冲到敌人面前，向天空鸣枪示警，并迅速抢过敌人一挺轻机枪，将枪口对着敌群。敌人一连人乖乖被俘。此次共俘敌121名，缴轻机枪3挺、自动步枪4支、步枪100支、子弹万余发。参战的民兵小组受到县和分区的通令嘉奖。

为了配合大部队作战，我边区民兵除保护地方治安外，还担负着大量的后勤工作，如各级战勤指挥部、兵站、随军办事处等等，都有民兵维护。在黄河归故斗争中，21万群众复堤，黄河渡口以及堤防安全都靠民兵维护。1947年春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将齐河、河西、寿张、范县、鄄城、昆吾6县划为河防线，全长300华里，共设置渡口码头10个，大小船只300余只，每县调集民兵一营组成河防营，每营400余人，负责沿河联防，保护堤坝、船只、码头设施，防止敌特破坏，维持口岸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斗争经过几年时间，直到打垮蒋家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河联防始告结束。1948年8月，我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黄河南二、三、五地委出动民兵组成随军担架队、运粮队、救护队、运送弹药队和破袭铁路民工，共计15.6万人次。有的随军支前半年不下火线，随军过了陇海路，又过了黄泛区。很多民兵民工要求参军，消灭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后来编成了一个民兵团，火线参军，编入主力部队。

民兵是部队的扩大。部队补充兵源、升编和减员的补充，主要来自民兵。为了扩军，区党委向全区人民发起几次参军运动，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3次参军就达7万人。1947年11月中旬至12月30日，一个半月的时间参军5万人，参军的绝大部分是民兵、自卫队员。不少村庄的民兵，在干部带动下，几乎全部参军。1947年全区民兵总数为107728人，共参军27908人。解放战争后期民兵总数只有79820人了，代替他们的多是新发展的女民兵。各级武委会干部，大部分带头参军，有的随军支前，有的带民兵打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深入，民兵在边沿区、游击区由零星的单独活动逐步走向联防，形成了有机的对敌斗争网络，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拳头。冀鲁豫的民兵组织，适应了游击战争形势的需要，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底全区民兵共有107728人，其中男民兵73729人，女民兵33999人，装备步枪44590支、轻机枪28挺、掷弹筒74个、六〇炮15门、短枪1175支。民兵已成为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维持治安、坚持根据地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了。

军区人民武装部于1948年12月30日公布战绩，全区民兵两年共作战9532次，参加人数2.4万多人，歼敌12419人，其中配合部队作战3125次，单独作战6407次。我区民兵完成了坚持腹地斗争，配合野战军、地方军全部解放黄河南地区，保卫500里黄河堤防，镇压特务、破坏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稳定社会秩序，支援前线，掩护运输，保护兵站、粮站等任务，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初期，仅湖西地区11个县三个月内被惨杀群众即达1.1万余人。1948年2月到6月，黄河南17个县被抓丁3.8万余人，被杀害干部、民兵、积极分子3000余人。我边区民兵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苦战12个春秋，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很大代价，有的全家老少被敌人杀害，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将与日月同辉！为国捐躯的民兵战士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四、人民武装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抗日战争时期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人民武装组织的建立，人民武装政治工作体制也随之确立。各级人民武装组织机构内，都设立政工机构（边区武委会设政工部，分区武委会设政工科，县武委会设政工股，区武委会设政工干事等）。各级政工部门设有一定数量的政工干部，在进行政治

思想工作中，对提高民兵政治素质、民族觉悟、阶级观念、战斗意志，以及对民兵组织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抗日战争中搞好联防，配合主力军作战，保家卫国、支援前线、参军、土地改革等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根据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及党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结合当时对敌斗争情况，冀鲁豫全区普遍对广大人民和自卫队、民兵进行爱国主义、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教育。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坚持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爱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开展武装斗争。在农村各阶层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中提出：团结抗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誓与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反动组织斗争到底；持久抗战，胜利属于中国人民。

根据地建立后，敌人开始对根据地“蚕食”、进攻、“扫荡”，设置封锁线、碉堡进行烧杀抢掠。刚建立起来的村民兵组织，感到以村为单位抗敌力量不足，于是自动联合邻村共同御敌。武委会发现这个办法很好，就号召以中心村、以区或以县组织民兵联防，以多胜少，打击来犯之小股敌人。只要一村枪响，联防民兵即群起而攻之，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骚扰。这对保卫群众利益、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根据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提出：民兵联合起来，以多胜少，坚决打退小股来犯之敌；一村受害，八方支援；坚决执行联防公约，联合对敌，保卫群众生命财产。由于敌人残酷镇压，根据地广大群众对敌无比仇恨，民兵联防在各地很快组织起来。这是民兵对敌斗争的很好形式。

民兵是不脱产的农民武装，军事训练素质差，武器装备更差，只能对小股零星敌人或坏分子进行打击镇压。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特别强调依靠和配合地方部队、主力军共同打击敌人。因此，对民兵经常进行“向地方部队学习”，“向主力部队学习”，“配合大部队作战时，坚决执行命令，听从指挥，完成任务”等教育。

民兵的教育训练，一般在冬闲或战争中（脱产）集中进行，总

结战例对民兵的教育更为深刻。教育内容主要是：形势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阶级教育、政策教育等。军事训练内容主要是：队列，武器使用与保养，开展神枪手运动，“麻雀战”、伏击战术等。

在战争环境中，结合政治思想工作，民兵经常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各民兵队制定杀敌立功绩簿，定期评比总结，战绩显著者通报表扬，发给奖状，奖给武器弹药等。这对激励民兵开展杀敌立功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根据不同时期形势变化，组织民兵对敌伪开展不同的政治攻势。如对伪军炮楼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为日本侵略者卖命——可耻”，“当汉奸办坏事绝没有好下场”等，争取伪军消极应付敌人，为我所用，待机立功。在前线作战时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对日本兵唱《满江红》歌曲，使其厌战思乡。当德国法西斯战败后，我则广泛宣传“德国法西斯被打败了，你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快投降吧”，“放下武器，投降人民，立功受奖”等等。在对敌伪开展政治攻势的过程中，广大民兵也受到了教育。

土改后农民翻身，民兵队伍得到了壮大，素质也相应提高了。在土改斗争中，广大贫雇农分得土地与浮财，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纷纷要求参加民兵，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原民兵立场不坚定，贫雇农不信任者，予以更换。因而民兵队伍更加纯洁，政治素质得到提高，数量也有所增加。这是民兵队伍质的变化。民兵真正成为翻身贫雇农的阶级武装。民兵中的武器也调整到立场坚定者手中，使队伍更加巩固。整个土改过程就是对广大民兵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过程，这是巩固壮大民兵的关键。

民兵是拿枪的农民，平时，以农业劳动为主，战争需要时轮流脱产，为战争服务。因此，要经常教育民兵“生产是能手，参战是英雄”，“一手种田，一手拿枪”，劳武结合；一旦需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时刻密切群众关系，决不能因手中有

枪而对群众蛮横，决不能因为参战，要求互助代耕而过分地增加群众负担。

日本投降后，发动民兵大参战、大参军。为了收复被敌伪占领的大片土地与城市，以及受降日伪军，需要大批军事力量。民兵除完成配合主力军作战，大量支援前线外，还需大参军，以扩大主力部队。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大反攻的时机来了，好民兵要积极参战，支援前线，服务战勤”，“民兵要带头参军，当主力军光荣”，“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要巩固要扩大”，“没有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农民既得利益就无法巩固”，“没有人民政权，便没有人民利益，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坚强后盾”，等等。在地方党委领导及武委会组织下，在各人民团体大力支持下，按区按县组织民兵营、团，开赴前线，配合主力军作战。许多民兵在人武干部带动下，大量参军，有的整班、整连参军，涌现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热潮，扩大了主力军，支援了大反攻。

抗日战争后期，冀鲁豫行署发布民兵参战中伤亡残废抚恤条例，这对鼓舞民兵积极参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解放战争时期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黄河又归故道，黄河南处于我军和国民党军队拉锯作战地区；黄河北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一面进行支援解放战争，一面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由于环境不同，任务不同，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式也不同。

黄河南：处于大拉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频繁战争中，国民党军大量抢掠人民财产，杀害我干部、群众，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人民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农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处于极不稳定极不安全的情况下，思想状况非常复杂混乱。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支援战争，在民兵与群众中，我们集中宣传“打运动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得失”的道理，鼓舞群众“在困难面前，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动员一切力量去争取胜利”；当

我军打了大胜仗后，就宣传“美国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纸老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当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时，我则宣传“到敌人后方去，把敌人引到后方，分散敌人，待机消灭之”。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大胜后，我则宣传“大反攻开始了，蒋家王朝的末日到了”。这样，在淮海战役时大量动员民兵参战、支援战争勤务就容易多了，思想工作民兵也容易接受了。除此之外，还根据民兵执行任务中临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

黄河南大堤，由民兵团分段把守防护，防止国民党军和坏人破坏，实行每日24小时值班站岗，对民兵们大讲蒋介石“以水代军”，企图阻止我军前进的阴谋诡计。护堤就是战斗，对一切毁堤行为坚决打击。民兵要一面护堤一面参战，对敌探、还乡团、小股敌军坚决镇压打击。

黄河南各县在战争环境下，普遍组织武工队，一面保卫党政机关及群众安全，一面对敌作战或支援前线。黄河北各县之民兵营、团，轮流到黄河南参战。当时，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是：我和敌军的战争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之争，为了保卫农民翻身的利益，必须积极参战；解放军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战，向解放军学习，配合解放军共同打倒国民党军，等等。

黄河北：当时环境相对比较稳定，一面积极支援黄河南参战和服务战勤，一面集中全力进行土改斗争。当时，对黄河北民兵和群众进行教育的内容是：战争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没有黄河南的战争胜利，黄河北的土改和环境稳定就保不住。黄河北的土改斗争胜利，大大鼓舞了民兵和自卫队的参战、支持战勤的积极性。土改中的阶级教育对民兵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教育民兵和农民，要彻底解放必须推倒“三座大山”，消灭国民党军就是推倒三座大山的当务之急。民兵和农民认识提高了，于是自觉地进行土改斗争，积极支援黄河南参战，主动地服务战勤。

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全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工、农、青、妇群众组织密切配合下，在人民武装政治工作体制下进行的。这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有效方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动员广大群众和民兵参战参军，支援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配合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没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能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以根据地有高度觉悟的农民作后盾，确实体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

五、人民武装斗争的基本经验

边区党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做到发展自己，战胜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的理论原则和冀鲁豫边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灵活运用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开展广泛的人民武装斗争。现概述如下：

（一）充分发挥人民武装的优势，铸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战争年代，必须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毛泽东同志“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指导思想，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建成以主力军为核心的三种武装形式——主力军、地方军、民兵的武装力量，对敌开展全面战争。

在革命根据地里，组成人山人海的战斗集体，铸成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边区发动各族各阶层人民武装起来，全民皆兵，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胜敌人的唯一有效办法。

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实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主力军是骨干，地方军与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三者有机地相互结合，对建军、作战、开展群众工

作，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都是十分有利的。

全民皆兵由三大部分组成：①主力军；②地方武装；③人民武装队伍。三种武装各有优势，又各有弱点。主力部队主要是打击敌人主力而不便分散对付各零星之敌，更不能作到维持解放区的治安。地方武装只能对付小股敌人，镇压地方的反动势力。只有人民武装起来（尤其是民兵），才能担负起村村抗击敌人，维持地方治安，支援战争勤务的浩繁任务。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三种武装力量必须互为依托，密切配合，才能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人民武装组织起来就是全民皆兵。根据群众的政治觉悟、阶级成份、年龄、性别而担负战争与支援战争的不同任务。以群众中觉悟最高、年轻力壮、阶级成份又好者组成民兵，可直接参战打击敌人，维持地方治安。其余青壮年人则为支援战争服务，站岗放哨，保卫黄河渡口，坚持拉锯战中保护群众，盘查敌特、坏人，缉私押俘，守库，护送伤员，指挥群众防空；组织并带领担架队支援军队作战，送粮送弹药，缝制衣服被褥鞋袜等。

民兵是不脱产的人民武装，武器较少，素质较差。为了有效地阻止敌人向解放区进攻，各村民兵联合起来共同作战（简称联防），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一个相对由弱变强、制服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对敌伪的强大威慑力量。

（二）民兵是不脱产的拿枪农民，既有其军事性，又有其群众性，必须照顾这个特点

民兵一面抗击民族敌人，镇压阶级敌人，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广大贫苦农民利益，同时，又是不脱产的农民。

民兵组织的发展壮大，民兵思想的巩固提高，是和农民运动、农村一切群众工作分不开的。民兵既是武装队员，又是村里工、农、青、妇群众组织的成员，农民的一切利益和民兵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依靠与加强村党支部对民兵工作的直接领导，是非常关键的。

民兵是不脱产的农民，除战争需要临时脱产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务农。因此必须时刻教育民兵种好田，多收粮；敌我争夺的边缘区、游击区，民兵一手拿枪，一手种田，负担是很重的，村党支部和民兵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敌情缓和时，要注意劳武结合，认真种好田，过多靠农民代耕是脱离群众的。民兵和脱产的人民军队不一样，他们的衣、食、住、行完全靠自己双手劳动解决，因而对民兵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任务安排等，均应照顾其特点。

（三）人民武装工作必须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发展壮大

冀鲁豫区党委1942年9月1日曾明确指示：“加强支部对民兵的领导，把民兵掌握在党的领导下，是开展与坚持游击战争，结合发动群众与游击战争与建立民兵政治工作的主要关键，也是实现党员军事化的主要武器，支部应当把领导民兵当成一个重要任务”。

根据指示精神，从边区到村都设立人民武装组织。各级人民武装组织在同级党委绝对领导下进行工作。村级党支部设武装委员，直接领导村人民武装工作。这是开展人民武装工作的有力保证。

农村共产党员合乎民兵条件者，应积极参加民兵组织。冀鲁豫区党委1942年9月曾指示：民兵中共产党员要占有 $1/3$ — $1/2$ 比例。党员是民兵的核心。村民兵中的党员组成党小组或党支部。村党支部副书记兼任民兵队指导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村党支部还经常讨论与检查民兵工作。民兵中的共产党员，在民兵活动中起骨干带头作用。民兵中的武器主要掌握在民兵党员手中。

（四）人民武装体制要适应形势的需要

人民武装机构体制是随着客观需要及斗争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边区武装部、武委会，先后由行署、区党委、军区分别领

导。当群众未发动起来，靠政府行政命令进行战争动员时，由行署及各级政府部门分别领导；当群众发动起来后，人民武装变为群众组织，由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当解放战争频繁进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又由军分区、军区直接领导。这些及时的处理变更是适时的，所以人民武装组织形式、隶属关系服从斗争的需要，这是行之有效的作法。

冀鲁豫边区学生运动简况

陈惠敏

冀鲁豫边区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根据地全面建设工作中，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发动青少年学生的革命运动。党领导下的各级学校为我党政军群系统培养了一批干部战士。学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适应形势的发展，恢复和新建中小学校

1940年10月，鲁西行署制定了《国民教育计划》。1942年6月，鲁西行署又发布了《鲁西目前文教工作实施方针》、《鲁西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1943年7月，冀鲁豫行署发出了《加强中学教育的决定》。根据这些指示、决定，边区各县尤其是中心区各县，一村或联村建立了初级小学，一县建立了若干处中心小学、一两处完小或抗属子弟高小，使大批辍学的少年儿童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中等学校也逐步发展起来，最先成立的是鲁西筑先抗战学院。1939年初，经鲁西区党委决定，在聊城政治干校基础上成立了鲁西筑先学院，但不久即停办。1940年春，在鲁西行署直接领导下，重建了筑先学院（内设中学部、师范部），随后又相继建立了若干中等学校；4月冀鲁豫边区抗日联合中学成立；12月在单县建起了湖西中学。1941年初，在鄆北成立了鄆北中学。1942年初，在鲁西北成立了卫东中学（1943年底鲁西北划归冀南）；同年底，在鲁西南成立了齐滨中学；泰西中学也于是年冬在泰西建立。

适应战争形势和培养干部的需要，边区学校的建制多次变迁。它们的教育方针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民族觉悟、有民主思想、有知识技能、能担负起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学校的招生对

象，除在编高、初小学生，知识青年和小学教师外，还招收了不少已参加工作的青年战士、文工团员和青年干部。我就是1940年底经组织批准，离开工作岗位，到筑先中学部学习的。中小学生学习年龄普遍偏大。中学生一般是十七八岁，少数二十几岁和十五六岁；高小学生一般十五六岁。所以，中学和高级小学都建立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群众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为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下边就凭自己的记忆对1940—1944年边区学生运动作片断回忆。

二、筑先抗战学院学生会

根据地的中等学校，都是以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为榜样，办抗大式的新型革命学校。筑先学院一直随同抗大一分校进行活动，更是处处向抗大学习。学生按军事化编队和管理，全部穿军服，配备有自卫武器。以班级为单位，编为区队，下设若干分队。全院编一个大队，由军事大队长（兼军事教师）统一指挥。学生会的工作，也以抗大校歌所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十六字校风，作为自己活动的规范。

（一）学生会的组建和发展

筑先学院学生会是在学院重建大约半年后组建的。先是像抗大各学员队一样，成立了一个救亡室，推选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统一组织学员的课外活动。一年级学员董凤鸣（现名董克夫）担任救亡室主任。1941年初，在鲁西青救总会的指导下，建立了筑先学院学生会，救亡室随告结束。自学生会成立到1942年底毕业离校，我担任了两届学生会主任，罗英（现名罗英朝）任副主任。

学生会的宗旨是：团结全体学生，为抗战建国，坚持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下学习，把自己培养成有爱国主义思想、有知识的抗战建国的革命战士。学生会的组织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委员制的集体领导。委员会设主任和专责委员若干人，组织全院学生开展各

种课内课外的学习等活动。

1942年初，筑先学院中学部扩大到3个年级4个班的编制，学员近300人。第一届学生会任期满，要进行改选，组织第二届委员会。为便于工作，先以班级为单位，成立学生会分会，再开全院学员大会，选举产生院学生会第二届委员会。

（二）学生会的活动内容和方法

学院历届学生会都开展了许多工作和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学院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开展各种课外学习活动。其经常工作有如下几点：

1、贯彻教学计划，组织课外复习。学生会的学习委员，除协助各任课教师检查督促语文、史、地、数学等课程的复习作业外，着重抓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政策课的复习讨论，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重点问题还要组织联组或班级大讨论。现在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是唯物史观课的重点讨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一是新民主主义课的重点讨论，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包括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这两次大讨论，都是在教师指导和学生会协助下，全班学员有准备地展开了几天的大辩论，最后归结到课文的正确结论上来。参加讨论的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做人民公仆、为民族民主革命献身的觉悟。出版墙报，交流心得，是由学生会组织的，也是课外复习的一种形式。当时有两种墙报：一是围绕课程复习的学习墙报，一是重大节日的纪念庆祝的墙报。各班都推选了语文水平高的同学办报。满丰（“九二七”反“扫荡”中牺牲）、杨子远、徐金宝、范新平、邹玉明（现名丁曼）等都是编辑组的骨干。开始一段时间，投稿者用几页纸写好粘在一起，贴到一块布面上，在墙上挂起来。以后办报水平高了，就将稿子集中起来，由编辑组设计好版面，请擅长书画的同学书写大小标题，绘制报头，办成图文并茂、非常醒目的墙报。各班墙报都有自己不断变更的报名，如“火炬”、“熔炉”、“锻炼”、“号

角”、“突击”、“挺进”、“海燕”等。

2、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学生会的文娱、体育委员的工作，就是按照同学们的不同志趣，根据可能条件，组织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

唱救亡歌曲，是最普及最经常的文娱形式，也是最有效的宣传鼓动。和抗大一样，我们筑先学院学员也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上早操、日常点名、饭前、课前、开会、集合都唱歌。各班组织有歌咏队，他们是先去抗大文工团学新歌，再回到班里教唱，班级开展歌咏比赛。大集合时，同抗大各学员队互相拉拉唱歌。经常唱的有《抗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跟着共产党走》、《青年进行曲》、《冀鲁边进行曲》，以及《黄河大合唱》中的几段曲子。我们当时不仅口唱其曲，而且心领其意，从中受到教育，大大激发了我们爱国主义热情，坚定了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体育活动，当时以田径、篮球、排球、单双杠为主。各班都组织了多种体育锻炼小组。全院组织了一个篮球校队，从各班选拔身强力壮、球艺较高的球员组成。其中孔祥（现名赵长文）、杨耀久、张宗武、程永康、王正兰是校队的五员“上将”。这个球队，除同抗大军事队球队比输球多些，同不少球队比，包括行署、军区球队，都是常胜的。筑先学院大约在1941年秋冬间组织过一次运动会，进行了各种体育比赛和射击、投弹、班排攻守等军事技术比赛。各项比赛，都进行了严格的评奖。

学生会还从各班选了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大约30多人，组织了一个名叫“海燕”的业余剧社，朱克华任社长，吴广新任导演。为提高艺术水平，除就近请文工团给以指导外，1942年春节还去野战军前锋剧社学习过一个多月。经过学习提高，他们逐步能演些街头小剧，并能按剧本演出多幕剧。1942年五四青年节时，以海燕剧社为主，组织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娱晚会，演出一个名为《狱》的剧和其他一些小节目。此外，也曾同抗大文工团共同组织过两校联

欢晚会。

3、监督师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生会民运委员的经常工作，就是每到一驻地，即督促大家清扫街道、院落，给房东、抗属和老弱孤寡打水，做家务劳动，并带领标语组刷写新标语。每次行军前，民运委员带领检查组到各家房东检查群众纪律，检查结果随时评比，在队前表扬和批评。以上这些，当时已形成了一种制度。被同学们称为“民运疙瘩”的郝振绪，曾连任院学生会的民运委员。每年麦秋两季农忙，学校都是全体总动员，停课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每年秋冬之交一次全民性的破路活动（挖新交通沟或整修旧交通沟），学校也是全部停课出工，参加突击破路。在以上两项活动中，学生会的任务是协助院部做好思想动员，组织劳动竞赛，鼓舞劳动热情，圆满完成任任务。

4、协助司务长搞好伙食。学生会生活委员的经常工作，就是参加伙食委员会，随时反映学员们对伙食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司务长出主意，想办法，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改善伙食，让大家吃饱吃好。另外，就是组织学员轮流值班帮厨做饭。我们许多同志都学会了烧火、焖小米饭、炒大锅菜。

5、列席院务会议，监督学校工作。学院领导很重视发扬民主，联系学员群众，为此，吸收院学生会主任列席院务会议，班分会主任列席班务会议。这在臧君宇任副院长主持工作期间，定为一条制度，通过这个渠道，随时倾听学员的呼声，以检查改进各方面工作；也通过这条渠道，将院部和班里的重要决议随时传达到学员群众中去。记得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中学部三年级的一位级任教师，因一名学员一再答错问题，罚他围着一个打谷场跑步，答不出问题不让吃饭。这种封建体罚的管理方法，引起师生的不平。院学生会知道后，非常气愤，非要拉着这位教师去院部讲理，并开会斗争了这位教师。这一方面表现了我们争取民主权利的勇敢，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我们年轻幼稚，不讲方式方法。还是院领导出面做了工作，说服教师承认错误，同时教育我们学生会干部，照常尊重老师上

课。体现根据地青年学生民主权利的还有一件事，即1941年秋鲁西、冀鲁豫合并后，召开边区各县代表会，选举新的行署领导人。我曾荣幸地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同王克、杨泽江、黄文、冯克等青年代表一起，出席了会议，投了庄严的一票。

（三）学生会的领导关系

筑先学院学生会是始终在鲁西青救总会、冀鲁豫青联总会领导下工作的。体现其领导作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吸收筑院学生会干部参加有关会议；二是发给筑院学生会有关的文件；三是负责人写信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筑院领导也有专人分工指导学生会工作，教导主任高衡（已病故）和党支部政治指导员沈建图（1955年飞机失事遇难），随时给我们具体指点和帮助。

（四）筑院学生工作的一个短暂插曲

记得1941年春学生会成立不久，又仿照抗大朱德青年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民先”式的青年先锋队。青先队在党支部领导下工作，青年委员孔祥任队长。学员中的党员、党员发展对象、学生会的活动分子作为第一批队员，大约30多人。只活动了几个月，根据区党委张承先的指示：为广泛团结青年学生，应充分发挥学生会的作用，不要另成立“民先”式的少数人的青年组织，青先队就不声不响地解散了。

三、边区学联筹备委员会

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时，在濮范观中心区已有筑先学院、边区联中和鄄城中学等几所中等学校，以及中心区各县完小或抗属子弟高小，都建立了学生救国会。这样一支发展着的青年学生队伍，引起了各级青联会和教育部门的重视。为便于对学生运动的统一领导，这些部门已在考虑着手加强学生会的工作。

（一）学联筹备委员会的发起和筹备过程

1941年秋冬间，边区青联总会召集中心区几所中学学生会代表举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联中的吴建模、马冠堂，鄄城中学的常邦国，筑先学院满丰（还是罗英？记不清了）和我。青联总会主任王克主持了会议。会上交流了各校学生会工作情况，讨论了如何加强各校学生会之间的团结和联系等问题，选举成立了边区学联筹备委员会，推选王克兼任主任，我是副主任。最后商定了如何着手进行边区学代会的准备工作。这次座谈会和边区学联筹委会成立情况，由纪登奎整理了一个文件，印发到各级青联会和各中小学校学生会，并抄送各级教育部门。

第一次筹委会会议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议，讨论了学代会召开的时间，具体筹备工作的分工。议定边区第一届学生代表会于1942年3月18日（即“三一八”纪念日——1926年北洋军阀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日子）召开。参加筹备会的几个单位的学生会，分工起草学代会文件。筑院学生会负责起草边区学生联合会组织章程。会后我曾就此请教过高衡同志，请他介绍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和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章程。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写出了边区学联组织章程（草案）草稿，还专程到青联总会就草稿征询过意见。

由于根据地战争环境日益艰苦，财政经济日益困难，各级党政军群机关都在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注重抓好基层工作，故学代会未能如期召开。在以后近3年时间里，青联总会就通过学联筹委会来推动学生会工作。1943年，我和运西中学学生会干部苏本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先后毕业调到青联总会做学生工作，至1944年秋又先后调离做其他工作。这年年底，召开了边区学代会，成立了边区学联，边区一中在校学生胡少荣任主席。

（二）学联筹委会3年的主要工作

学联筹委会建立后半年内，进行了学代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学

代会延期后，就转入以团结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经常性工作。3年中，组织或参与组织了以下几项活动：

1、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战争年代，一切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就是学生会第一位的工作。动员组织全体学生学好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课，是最现实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据地中小学都把政治时事课列为主要课程，不仅注重课堂上学，还特别注意学习报刊上重要文章，请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做报告。学联筹委会曾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黄敬、晁哲甫、董君毅（段君毅）、杨得志等边区一级的领导人曾亲自到筑先学院、边区联中、边区一中和抗大陆军中学视察，向师生做政治报告；张承先、戴晓东和其他一些专区级领导同志也曾到自己所辖的二中、三中、四中做过报告。学生会对这些领导同志的报告，都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从而提高了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明确了自己的斗争方向。学习先烈的英雄业绩，更是形象的爱国主义课。各校学生会都充分利用报刊上登载的抗战烈士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联筹委会也传播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当时影响大、教育深的是向左权将军学习；还有1943年10月在鲁西南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分区司令员朱程，专员袁复荣，1944年2月在鲁西北病逝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学联筹委会和各校学生会都组织认真的学习讨论。利用纪念日或庆祝节日，也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每年“五四”、“一二·九”，还有九月某日的国际青年节，各级青联会和各校都举行纪念活动。学联筹委会也发过纪念青年节的通知等。各校按照青联、学联筹委会的布置举行纪念活动，进行街头宣传，从中接受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

2、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学联筹委会曾针对当时各校学生中在学习动机和方法上存在的偏差，组织过一次端正学习态度的大讨论。问题首先从筑院反映出来。当时筑院学生中曾出现过所谓“课外派”、“课内派”的争论和分歧。担任学生会职务和区、分队长

职务的一些活动分子，有的轻视某些文化课如代数、物理、外语等的学习，认为战争年代学了也用不上，被称为“课外派”。而有些什么职务也不担任的同学则是所谓“课内派”，他们中某些人轻视政治学习，甚至有厌恶课外活动的情绪。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是错误的，在其他学校也有程度不同的反映。青联总会负责人认为这是学风不正的表现，便组织学联筹委会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王克在讨论会上做了题为“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长篇总结性发言，正面地阐明道理，批评了错误观点，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使参加讨论的同志深受教育。会后经过整理将这个发言印发到各校学生会。筹委会又发动各校学生开展了一次端正学习态度的大讨论，使原来的分歧趋向一致，学习态度得到端正，加强了学生间的团结。

3、加强各校学生间以及同校外青年的大团结。通过学联筹委会这个纽带，建立起各校学生会之间的联系。筹委会曾有组织地在各学校间互派代表观摩访问，有条件的还组织了联欢活动。通过学联筹委会组织的这一活动，增强了各校学生的友谊。还有一件明显的事例，1943年边区教育界选举参议员，筑先中学、运西中学、濮范中学、财校一分校，各提候选人1人，从4人中竞选1名参议员。在竞选中发生了分歧，个别教职员相互攻击，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学联筹委会对4校学生会干部进行了工作，通过他们做4校学生的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4校学生的友谊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同时，在筹委会倡导下，各校学生会都主动利用帮助农忙、办冬学以及利用各种节日文体活动，加强同农村青年、机关和部队青年的联系。

4、积极参与组织边区青年大联欢。1944年五四青年节时，在范县龙王庄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边区各界青年大联欢，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黄敬、宋任穷、杨勇、徐达本主持了开幕式。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边区青联总会和行署教育处，学联筹委会也做了一些工作。具体参加筹办的有青联总会王克、苏本善和我，以及行署教育处高敬如、运西青联分会王黎之，运西专署教育科长黄居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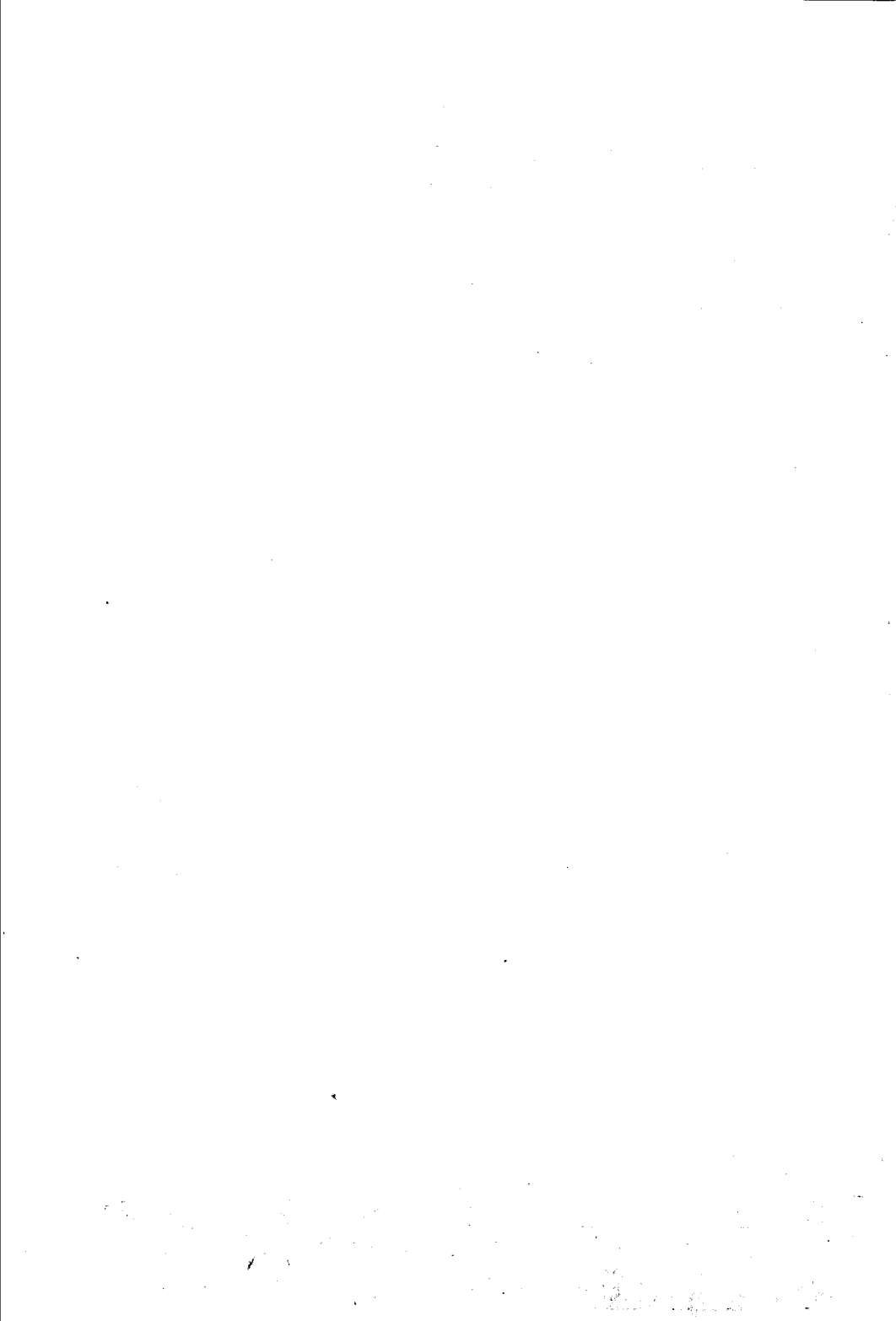
也是活动的最早发起人)，还有濮、范、观、鄄、郓各县青联主任、教育科长。驻中心区的各中等学校、中心区各县完小、抗高的高年级学生，以及驻中心区的边区一级、专区一级机关青年、部队青年，中心区各县部分青抗先队员、青教会员，共约五六千人参加了大联欢，历时五六天。会前各中小学进行了时事政策测验，会上公布结果，会中进行了各界青年间的体育比赛、文艺会演。部队青年和青抗先还进行了军事技术表演。报纸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导。这次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各界青年的团结，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三）学联筹委会的领导关系

以各校学生会为团体会员的学联筹委会，它本身又是青联总会的团体会员，接受青联总会的直接领导。学校专职干部属于青联总会的编内干部。学生会工作的大政方针，由青联总会制定，会议由青联总会召集，文件由青联总会印发。

学联筹委会的工作，也得到行署教育处的直接指导。筹委会一些大的活动事前都征得教育处的同意。我们曾多次向管振秋、张维之处长请教工作。高敬如科长也给我们多方面的具体帮助。

学联筹委会的工作，得到各个学校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筹委会经常联系的筑院、联中、筑中、运中和一中，这些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如筑院的臧君宇、高衡，联中、筑中的卞慎吾、李玉慈，运中的阎训、宫钧民，一中的王化云、张叔诚（已故）等，他们都是战前学生运动的前辈，又是当时边区学生运动的热情赞助和支持者。他们的大力支持使学联筹委会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给边区学生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鲁西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 宣教工作的报告（节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群众工作报告之二

一、鲁西群众的落后性。鲁西是一个交通蔽塞、文化落后的地方，先是张宗昌的压制，后有韩复榘的统治，这中间虽然受过汹涌澎湃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就是说在当时虽然组织过什么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但那究竟是牌子，官办的，和整个的革命一样，群众被当做国民党员升官发财的工具而出卖了。那些群众组织好像昙花一现的就过去了，以致鲁西广大的群众仍然是落后、封建与黑暗的境地。

二、政工人员与鲁西的群众工作。事变后从济南来的政工人员，一到鲁西便分发到各县成立政训处驻各县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主要的是配合行政当局开展群众运动，动员群众。办事处本身更利用画报、讲演的方式作一般的宣教工作，同时更派个别同志到各区武装及民团中工作，主要的是推动封建武装到抗日的路子去。这当然是偏重于武装工作，同时以政训处公开合法的名义来组织群众。不过由于当时鲁西形势的不稳定，主要的工作是进行下层统战工作，争取豪绅地主，推动封建民团抗战。如在南镇战役时的高唐民团王子范部，在平民团池宗安部，都是政工人员发动的。少数的县份里也有群众组织，在平、博平都有青年救国团的组织。

三、有历史意义的政工人员大会。〔民国〕27年5月初在聊城召开了全鲁西政工人员的大会。这个大会是有历史意义的。当然在争取范推动范的进步，在统战工作上，在政权工作、武装工作都有

了大的收获，尤其在群众工作来了一个彻底的转变。就是在这个会上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教训，并特别提出群众工作的重要，并详细的布置了以后的各县具体工作。从这个会议后，各县政训处以动员群众组织为中心工作，各县都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妇女、青年、儿童、农民，各种群众组织都统一在政治部领导下。

四、动委会的成立与政治部各县办事处的撤销。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动委会是敌后方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总的领导机关，是公开合法的东西。当时顽固分子对各县政治部不仅工作上常常发生磨擦，而且攻击不遗余力。为着对他们在形式上让一步，为着求得工作上更好的开展与更大的开展，便在8月1号自动的撤销了各县办事处，而集中力量作动委会的工作，就是经过动委会来动员群众。

五、群众工作视察团。为着广泛的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为着督促检查各地群众工作，经过总政治部组织群众工作团，首先到了阳谷，帮助阳谷同志在动委会中取得领导地位，帮助阳谷县青年救国团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三青团斗，并撤换了朝城办事处干事，健全了朝城的领导机关。视巡〔察〕团是以县为单位，这样在开展群众工作上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六、前方政治部的设立。在8月中旬范司令袭击济南的时候，长清、齐河的老百姓一方面由于过去没有组织，没有施行民族教育，一方面被汉奸利用，同时范的部队纪律不好，以致老百姓组织红枪会，不仅阻止了袭击济南，而且与部队直接冲突。在平东部，齐河、长清西部，当时红枪会声势相当浩大的，几次发生了与军队武装冲突大流血的惨案。政治部配合着范对济南的军事行动，组织了前方政治部，经常在潘店一带工作。前方政治队办了几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在潘店一带），成立了妇女、青年、农民各种救亡团体，长清、齐河一带半汉奸化的广大群众实施了武装教育，调剂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部分的组织和教育了群众。

七、在对济南军事行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暴露了范的部队纪律太坏，一方面暴露了广大群众的没有组织。在好些血的经验教训

中，就是在好些接近敌伪的地方，群众组织起来直接与我们的部队冲突，在好些地方老百姓反作了敌人的耳目，带领敌人打范的队伍。所以范在对济南军事行动之后，深深感觉到组织群众的必要。所以范回来马上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在县长联席会议上，范令各县县长在一个月內把各县的群众全组织起来。虽然不久即遭到了聊城事变，但范对群众工作重视和号召，在那短的时期是有相当意义的。

鲁西的群众工作是经过政治部、动委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关于各种组织和具体工作是这样：

（一）农民互助会

这是农民的基本组织，也是当时群众工作中的中心一环。组织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发动，自下而上的配合。当时各县的工作具体情形是这样：

1、冠县农民互助会。冠县是受水灾匪灾最厉害，人民受的痛苦也是最深的。冠县地方党首先抓紧群众的需要来组织劳苦群众互助会，所以冠县农民互助会的成份是相当纯洁——多劳苦贫农，一产生即是斗争的，首先和行政当局斗争，其次和豪绅地主、顽固分子斗争。当时县政府认为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请愿，改选乡村长，逮捕汉奸、土匪等是危险的。豪绅地主、顽固分子更加造谣，认为互助会是共产党组织起来，就要分地均粮等。不过由于基础的巩固而终能战胜谣言，克服一切困难，组织扩大起来。后冠县农民互助会县总会以下各区都有支会，乡村分会也都相当的普遍。据去年9月份统计，全县互助会人数共13万，占全县人口大多数（全县为20万）。互助会所作的工作主要是改善人民生活，实行五—减租、分半减息，反对平均摊派（给养捐税……）。其他像动员新战士配合主力扩军、募捐等工作也都作了一些。同时，在互助会底下有直接领导的武装——农会特务队（人数30余）。这一地方武装不仅起了掩护地方工作的作用，而且在锄奸清匪、维持地方治安更起了相当大的

力量〔作用〕。后来这一部分武装扩大为卫河支队，形成卫支的骨干。

2、莘县农民互助会。莘县农民互助会完全是经行政的发动——县政府与动委会的上层号召才组织起来的，基础不是完全建筑在劳动群众上，以致成份复杂，村分会会长还有些地主村长及流氓。后来全县农会发展到5万会员，由于缺乏斗争，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官办和组织的不健全。当聊城失守，县政权被顽固分子摧毁，农会亦顿形瓦解。

3、博平农民互助会。博平首先在城西成立了博西农民互助会，发动了向富户借粮的斗争，但组织仅限于10数村。后来虽然城内建立了总会，但由于干部问题，博平农会始终未能普遍的组织起来。全县会员人数共4000余人，博平失守后，农会随之瓦解。

（二）妇女工作

妇女工作在鲁西并没有普遍深入的开展起来，只是以各县政治部为中心，把城市〔内〕的妇女组织起来。但临清的妇女救国会会在各个群众团体里边起了先锋作用，在和顽固分子——国民党指导员谢灿章、汪伯言作斗争〔中〕，她们更积极的起了领导作用。冠县的妇女工作比较深入，村分会共建立30余处，会员共4000多。其次莘县、馆陶、博平、茌平妇女工作也都有有一些，但都未能深入。各县妇女救国会的工作一般的是发动慰劳、募捐，帮助军队制棉衣、鞋靴等。四区（鲁西北特委）由于长期的被顽固分子统治，以致群众工作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除去临清的妇女救国会起了相当作用外，在临清乡下只有少数农会的组织。濮县也在顽固分子的统治外，几次成立农民救国团，终未公开，组织亦未能普遍。

（三）回民工作

鲁西（包括四、五、六两区）的回民散布的区域只八九县，人数最多的县聊城、临清、丘县、冠县、朝城、莘县、恩县等7县，人口

约计七八万人，于〔民国〕27年7月间，以六区政治部□□组织朝城、临清、冠县、丘县等4县的回民群众。各县具体情形是这样：

1、朝城：回民分布在城内和城北张鲁镇一带，于去年5月间，由六区政治部的工作同志将该县回民抗敌救国会组织成立，会员约计1500人以上。当时准备以该县为基础，发布抗战行政纲领与成立宣言，号召组织全鲁西的回救团体，动员全鲁西回民群众参加抗战。该会由我们同志领导，总会以下设分会，分会包括若干小组，内部组织有总务、组织、宣传、民运、生活改善、武装等部门，并有主席一人负总责，更有一小部武装作为该会的武装部分。这一个团体组织后，曾发动过要求县长彻底开放民运的斗争和反贪污（张鲁镇的警察局长）的斗争，但以其他困难条件，都未能彻底胜利。后因在朝〔城〕负责回运的同志被调与县长对该会的破坏与镇压，所以目前已名存实亡。

2、临清：临清回教的成立也在去年秋季，人数约计2000人，大部在市内与卫河西岸。组织的情形与朝城相似，但文教工作比较好，经常有20余人代表回教宣教部在省间与会内进行宣教工作。今年秋有一次全体会员参加了拥范（范筑先）反胡（胡学仁）的示威运动，在临清曾有一度的政治影响。但以后经过胡专员的破坏与威胁，加之以敌之“扫荡”，该会未能长期坚持而终归消灭。

3、冠县：朝、临回教相继成立，冠县亦经当地同志组织成立，会员未详，但因干部缺乏，内部工作一直未能建立。

4、丘县：回民都集中于城东南陈村一带，于3县回教成立后，该县亦相继成立，会员约计1000人以上，一般都能站岗放哨，作盘查行人的工作。但于聊城陷落后，在敌人的“扫荡”下，也未能继续存在。

聊城失守后的群众工作

聊城失守后鲁西的形势是一个极端紊乱现象，到处是溃兵土匪

和敌人的骚扰。范司令牺牲了，各县县城失守，有的是顽固分子和我们更加对立了。过去支持群众工作的机关——各县动委会也被解散了。各县群众组织有的是陷于极端秘密和困难的环境中，如在博、阳、聊一带，有的是被顽固分子直接解散了，如莘县、朝城等县。馆、冠两县虽然是我们活动的区域，也是由于形势的紊乱和群众情绪的恐慌，群众团体也无形中消沉下去。后来我们改用在各县组织八路工作团直接掩护工作，尤其是支持群众团体，但遭到顽固分子的造谣破坏，也先后解散了（濮、范、聊、阳）。

经 验 教 训

一、从和平状态中组织的群众是没有力量的。在聊城未失守前，鲁西组织起来的群众总数为30万，但多数是未经斗争的，不仅是对领导战争没有受到战争的锻炼，□本身的斗争都是很少的，都是由各县政治部、动委会或经过政权的系统组织起来的，再加上教育的不够，生活的不健全，群众没有彻底的认识，以致战争一到来，形势一紊乱，便无形中瓦解了。

二、开展群众工作在方式上固然一面由上层的号召，主要的还靠下层的发动与民众生活的改善，启发群众的自动性，造成改善与参加抗战的热潮，这样才会有力量。过去鲁西群众工作多半是靠上层的号召，群众生活未能真正改善，以致战争一到，便无形瓦解。

.....

在鲁西区党委 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二月)

张霖之

第一部分 鲁西群众工作的检讨

一、从去年2月区党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到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

(一) 去年2月区党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有划阶段的意义，为了巩固党与深入群众工作，强调的提出了群众斗争，严格的反对了右倾，但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提出防止“左”的办法，而在“左”的支配下，开展了群众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是在“左”的支配下发动起来的，所以只是一时的呈现了群众运动的表面活跃。去年5、6月的群众运动，就是这种表面活跃的典型。

(二) 各级党对党的路线研究的不够，掌握的不稳，而在群众运动中又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群众团体随意捕人、罚款、处决案件，到处盛行着开“公审大会”和戴绿帽子游街。在某些地区，并发动了租地借粮斗争，以致社会秩序紊乱，破坏了社会统战，使社会上大多数群众不满意我们。某些地区，就在这种“左”的行动中，使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陷于消沉与垮台。

(三) 由于群众运动中的“左”的支配，所以在领导上及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强迫与命令，而以自己的愿望代替群众的要求。在群众团体并存在着严重的“宗派观念”与“行会色彩”，因此群众团

体没有巩固的基础，只是一种虚浮的形式的群众组织，经不起任何的挫折与打击。在今天，群众运动的消沉与群众组织的减少，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四）在这一个时候，区党委虽然曾经在文件上与口头上，对这种严重的“左”的错误提出纠正，但当时还没有引起我们全党同志的注意，到了8月才开始纠正这种错误，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上才提出“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新作风。从此以后，群众运动就转入了另一个阶段。

二、从去年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到现在

（一）在去年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上，对鲁西群众工作提出“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新作风，并严格纠正了“左”倾错误，同时由鲁西主任公署颁布了保障人权条例。

（二）自从新作风提出后，一般的群众工作干部开始深入下层，并着手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在这一方面虽然〔取〕得显著的初步成绩，但认真深入群众工作还是非常差的，这可以说是“深入乡村而没有深入群众，深入群众而没有深入工作”。

（三）自鲁西主任公署颁布了保障人权条例后，各地又呈现了右的倾向。在政权工作方面，不敢大胆的镇压汉奸及反动分子，以致在某些地区汉奸半公开的活动，反动分子大造谣言，极尽其挑拨伎俩。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严重的表现着这种错误。首先表现在整理组织上，在许多地区，曲解群众组织的自觉自愿原则，放弃了教育与政治动员。部分干部主张取消所有原有组织，重新征求会员。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其次表现在领导上，在各地，放松与放弃了群众的反汉奸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及群众中合法合理的民主民生的斗争，致使群众运动陷于消沉，有的垮台。

（四）各级党及群众团体的党团，对9月活动分子大会所提出的关于群众工作的方针与方向局部化，于是放弃斗争，实行和平整

理。总结起来说，鲁西群众运动常在“左”右中摇摆，是形成今天群众工作不深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 由于以上的错误，妨害了群众工作的深入与巩固，所以在这次敌人残酷的“扫荡”中，暴露了我们群众工作的严重弱点。这是值得我们鲁西全党同志高度警惕的——没有群众的支持，我党就没有物质基础！

第二部分 今后的工作

一、工作方针

今后鲁西群众运动的总方针，根据过去的检讨及山东去年联救大会决议的精神与目前的需要，应当是开展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以深入工作，巩固既有组织，发展新的组织。这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方针。

二、深入群众工作的几个原则问题

(一) 全党同志首先要认识，我们此次在反“扫荡”中暴露的严重弱点，就是没有能够动员起广大的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政治的军事的与物质的，因此也就未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群众组织不巩固，工作不深入，没有能及时地解决基本群众的切身痛苦，没有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所以也就未能动员起群众的伟大潜力，以更有力的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这就是我们此次反“扫荡”斗争中的最大教训。鲁西全党同志应当高度的认识到这一点，警惕自己。

(二) 克服此种严重弱点的中心关键——就必须鲁西全党同志认真的切实的去领导群众进行合法合理的民主民生斗争，以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去深入工作，整理与巩固既有组织及开[发]展新组织，在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去锻炼群众、教育群众与武装群众，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用群众力量

去打击敌寇、亲日派、反共派的联合进攻，并应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坚持阵地。这就是我们鲁西全党同志的严重任务。

领导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是为了解决基本群众的切身痛苦，改善其生活，提高基本群众的抗战热忱，进而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在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去进行整理与巩固既有组织，深入工作，则巩固组织、深入工作的口号是空虚的无力的口号，结果还是深入不了工作，巩固不了组织。开展群众的民主民生的斗争，是深入工作与巩固组织的有力武器（关于这一点，在具体工作中还详细谈）。提出民主民生的斗争，就有些工作同志把民主民生斗争与参战脱节，忽视甚至忘掉参战工作，这是不对的。在前边曾谈到，解决基本群众的切身痛苦，改善其生活，就是为提高抗战热忱，发挥抗战力量。也只有在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才能使群众更深切地认识到，非武装自己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不能求得自身之彻底解放。

现在为什么又提出合法合理的斗争？这是因为过去只提斗争，结果是在“左”右错误中摇摆，斗争不能纳入正轨，所以才提出合法合理的斗争来。什么是合法？是说一切斗争要不超越主任公署法令所允许的范围。它的标准是：①斗争不侵犯政府的权限；②斗争不破坏政府的行政；③斗争不代替政府。过去所领导的租地借粮斗争，拔烟苗、折烟袋杆的斗争，都是不合法的。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等斗争则是合法的。

什么是合理？它的标准是：①斗争能得到社会上大多数群众的同情与赞助；②斗争不破坏统一战线；③不超越现实。如过去在××县，儿童团团员由于他爷爷干涉其行动，就把他的爷爷当顽固分子，并叫他爷爷老同志，以争取政治上的平等。这种斗争是不对的，所以也就是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群众的同情。社会主义是真理，但在目前中国就把社会主义的办法拿来实行，就是超现实。我们还要了解这一点，在我们根据地里，合法就合理。但有的事情不在条文，但斗争是合法的，即要求是拿当地的习惯法，那就叫合理

合法。譬如去年××县所发生的还粮斗争，群众借地主之粮，原定秋收时还，但秋收因湖水泛滥，一无所得，不能如期还粮，地主却□迫苦索。群众有组织的到政府请愿不还（等下年秋收时还），这个斗争胜利了。这种斗争也是合理的。

（三）实现这一严重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在领导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展开反“左”右倾的残酷斗争。“左”倾与右倾都是我们的敌人，“左”倾与右倾给我们的损害是一样的，同志们要高度的警惕这一点。现在提出合法合理的群众斗争，是为了纠正过去的“左”倾与右倾，但这一新的口号提出，还有可能发生新的“左”倾与右倾，这又需要同志们提高警觉性，注意严防。

在合法合理的群众斗争提出后，有的同志可能变成合法主义者及把合理庸俗化，这是严重的右倾现象。合法主义者要求一切斗争必须依照法令条文，凡法令所未提及者就不能斗争，斗争就是违法。我们知道鲁西主署之成立将近一年，所颁布之法令，实不能顾到社会生活之全部，欲求所有群众斗争合乎法令条文，实一难事。把合理庸俗化了的，机械的了解合理的第一标准——斗争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处处要迁就群众的落后性，放弃政治动员与教育及领导作用，变成群众的尾巴，忘记了我们是先锋队是领导者，在很多场合要求群众跟着我们前进；另一方面，在合法合理的群众斗争提出后，还可能发生“左”倾现象，认为斗争既是合法合理，就拼命的去斗，不顾政府威信，不讲方法方式，不讲手续，甚至代替政府，破坏政府的威信等“左”倾现象。在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群众斗争，应取得政府的有力的配合与互相之间的帮助，但互相之间不要代替。坚决领导与开展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对“左”右不良倾向展开残酷斗争，是深入工作与巩固组织、开展组织的锁钥。

（四）组织斗争的重心，应当放在农民身上，因为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同时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也是农民。毛泽东同志说过：“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因此，我们全面的群众工作，应

加紧农会的工作，把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到农会中来。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削弱与妨害工青妇的工作，也不是为了加强农会工作就把工青妇的干部抽出一齐做农会工作，停止工青妇的活动，而是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就是要求各级党及农会党团，要切实的研究农民之大大小小的一切问题及痛苦，并要设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改善自己生活的合法合理的斗争，动员他们参加抗战，以解放农民大众。同时只有农民运动的开展，才更有力地推动工青妇工作的开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同志要清楚的了解，否则就会在工作中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与错误——一种是平均使用力量，工作失掉中心；另一种就是顾此失彼，妨害了全面工作的开展。

三、具体工作

(一) 关于民主民生问题

1、民主民生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与推动作用

关于以上的三个问题，在我们群众工作中，很少讨论与研究。因此对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所以在进行工作时常常是脱节的。

(1) 民主民生的具体内容。有些人把民主民生孤立起来去认识它，以为民主运动只是属于政治的，民生运动只是属于经济的，没有认识到这两个范畴的具体内容都是建筑在物质条件上的，都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武器。如果没有物质作为这两种运动的基础，那末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这两个运动的发生。

(2) 相互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个运动建筑在一个基础上，是一个目的，因此，它就不能不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我个人了解，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民主运动没有民生运动来配合，民主运动就没有内容，只有昙花一现，空虚飘浮，不能持久深入；民生运动没有民主运动来配合与支持，民生运动也就没有前途，得不到保障。这就是民主与民生的相互关系。

(3) 相互推动作用。民主运动的开展，给了民生运动以有力

的推动与保障；民生运动的开展，也就给民主运动打下基础，民主运动也就有了内容，容易开展。这就是他们相互间的推动作用。

只有清楚的了解以上三个问题，才能正确的掌握民主民生的运动，才能有力的开展民主民生的运动，才不致使运动孤立空虚、受到损失。因此，在群众运动中，就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空虚的政治号召；另一种是纯经济主义。因为这两种倾向的存在与发展，都会妨害了我们的工作。只有民主民生运动的密切联系与正确的配合，才能开展民主民生的运动。但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还要依靠广大群众的斗争来做推动机。

2、民主民生运动的具体问题

(1) 关于反贪污斗争，这就是一个民主民生运动的具体问题。能否正确组织与领导这一斗争，就会决定我们能否迅速开展农村群众工作。

①怎样认识这一斗争。这个斗争，一般说来，是属于民生方面的，但又具有民主性质。因此，这一斗争的组成基础是很广泛的，是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

②正是由于组成的范围较大，成份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斗争中，必须以基本群众来作骨干，支持斗争，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孤立顽固分子，以求得斗争的胜利。

③胜利后，对退回的东西（金钱或物质）的处理，应照顾到统一战线，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得到利益。单纯的强调贫农利益是不对的。退回的东西完全归抗属与贫农，就会使富有者不高兴再参加斗争，破坏了统一战线，削弱了斗争的力量，给顽固分子以反攻的空隙。

④胜利后应加紧整理与巩固自己的组织（工农青妇各团体）。没有组织的地方，要抓紧机会开[发]展组织，并要在群众情绪高涨时，开展民主运动，经过民主的方式，改造政权，成立民意机关，组织村政委员会，把斗争的果实拿在自己手里，以巩固斗争的胜利，保障群众运动，并推其向前开展。此外，整理与组织自卫队、青抗先

等群众武装，把斗争提高一步，把反贪污反坏分子的斗争提到武装反汉奸反敌人的路上来，兴奋群众情绪，巩固群众组织，以防反攻。这就是民主民生的相互关联与推动作用。

(2) 关于合理负担斗争

①这一斗争的基本群众，是贫农与中农，地主是反对的。因此，一般的说内容单纯些，易于实现。

②争取斗争的胜利条件，首先是从经济上政治上去教育群众，鼓动其斗争情绪，坚定其斗争决心与胜利信心。其次，应强调提出这是政府的进步法令，使反对者在政治上处于不利，以争取同情者，孤立最顽固的家伙。

③这一斗争常与改造村政权的斗争联系着。因为旧村政权多是代表地主利益，不改造村政权，就不易彻底实行合理负担，即能实行，也是在政府法令逼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常出现拖延、昧地、不彻底等现象。因此，这一斗争的发展常常是与改造村政权密切联系起来。如有这种情形，斗争就比较复杂，要争取胜利亦比较费力。这也是民主民生运动相互关联与推动的另一实际问题。

(3) 关于增资斗争

①要从政治上认识这一点。雇农是乡村的无产阶级，我们必须代表其利益，坚决领导这一斗争，加强工会组织，树立我们革命的骨干。但在斗争中反对一些过火的苛求。

②这一斗争范围较小，成份单纯，利害一致。因此，加强本身的团结，是斗争胜利的主要条件。

③斗争胜利后，要加强其阶级教育，启发其革命情绪，巩固其组织。

(4) 关于减租减息的斗争

①这两种斗争的基本群众主要是贫农，所以组成部分较小，容易一致。

②在鲁西，租佃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我们要彻底弄清各地的各种租佃关系，根据实际情形，依照政府法令原则，提出更具体的口

号。譬如说大种地按五一减租，小种地就应该五一增粮，如同样按五一减租，则地主所得太少。在鲁西北还有一种包种地，有时租价并不大，如仍照五一减租，则地主所得不够拿救国公粮的。这两种例子都与农村统战有关，我们应该展开讨论与研究。

③减息斗争，是最难实现的一种斗争。自减息法令实行后，借贷关系变为极秘密的事情，连借债人都不愿声明，这又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件事。据目前情形说，各地减息斗争都不活跃。因此，对减息斗争可按分半减息进行，但须规定还息的义务。

(5) 关于改善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

①改善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尤须照顾到各方面，因为青年、妇女、儿童受拘束，不自由，无地位。基本上是社会问题；同时是家庭问题，但是次要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家庭问题也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②在各地区改善妇女、青年、儿童生活的运动，有时妨害了家庭利益。如青抗先与儿童团，整日上操、会哨、唱歌，不顾及家庭的生产事业，造成与家庭的对立，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应严加纠正。我们上操、会哨、集体唱歌，但不能成为专门“职业”。除上操、会哨、唱歌外，还应当发动青年、儿童生产竞赛及集体生产等。

③所以在进行改善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时，就需要照顾到民族利益与家庭利益，否则就破坏了社会统战，造成青年、妇女、儿童与家庭的对立，这是于我们的工作不利的。

④但这并不是不关心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改善，并不是放弃他们生活改善的斗争。对于那些对青年、妇女、儿童的一切非理苛待，应当进行斗争。但是斗争不要破坏了统一战线，不要与家庭造成对立，妨害了工作的进行。

(6) 关于村政建设

①村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民主民生的运动，是在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去实现，所以要领导与开展民主民生的斗争，才能完成村政

建设。因此，一方面可用政府法令去推动；另一方面，要用群众斗争来保证。

②从民主民生斗争中来建立村政委员会及村代表大会，这才有基础有内容，否则就成为形式或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实验区的经验教训曾告诉我们，在有的村子实行普选，建立村政委员会，群众厌烦，认为是一种负担，这是与民生斗争联系不起来的。

（二）关于春耕运动

1、以上所谈的民主民生的斗争，是我们鲁西工作中相当长时间中的一个经常的中心工作；春耕运动，是我们目前一定时期中的中心工作，这一点需要我们同志弄清楚。要把经常的中心工作与临时的中心工作相互配合起来，才不致顾此失彼，使工作受到损失。进行临时中心工作，不要忘掉经常的中心工作；只有加强经常〔的〕中心工作，临时中心工作才易于完成。不要忘掉了临时中心工作，才能推动经常的工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同志们首先要了解清楚，否则工作就受到损失。

2、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春耕运动，主要目的是提高群众生产热忱，增加抗日财富，增加群众的收入，富裕群众的物质生活。这对于坚持鲁西抗战与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有严重的政治意义。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政府与群众干部，要起模范作用，帮助群众春耕及植树、养鸡等。

3、在春耕运动中，要广泛的组织农民互助小组、代耕队、合作社等。组织互助小组，主要的是组织贫农间的与中农间的互助，同时还要注意到贫富间的互助。不过这种互助如果掌握不好，可能使富有〔者〕吃亏，也可能使贫苦者受剥削而减低生产热忱，由互助变为互斗。所以无论哪种互助，都要基于自愿原则，反对任何强制。代耕队的代耕对象，应是贫穷抗属与无力生产的老弱。要以这种群众组织为基础，进行政治教育，把普遍的组织提高到政治的组织上来。

（三）加紧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

1、村级组织是我们的组织基础。如果村组织不巩固，只求数量

的增加，只在上层打圈子，那就无异沙地上盖洋楼，是不能持久的。整理与巩固村级的重要，早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终究用什么办法来整理与巩固呢？这是极需要解决的。

2、在这里我们可想到5种办法：

(1) 根据各地的工作经验，主要是从斗争中去整理与巩固，和平说教式的整理与巩固是没有什么大效果的。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使群众认识反动分子与顽固分子的真面目。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及出路。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实现基本群众的利益。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发现有威信的好干部。同时，也只有群众斗争中，才能暴露干部及工作的错误和弱点。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巩固我们的党，才能锻炼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也只有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组织，才能打不垮、摧不毁，算是巩固的组织。

有的同志或者要问，去年5月里各地掀起群众斗争，但结果引起社会紊乱（在某些地区发生红枪会的暴动），破坏了社会统战，以致在某些地区使工作垮台，这又怎样解释呢？但这不是〔说〕群众斗争是错误，而是在领导群众斗争中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又强调了群众斗争，去年那些错误是否又会产生呢？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的掌握斗争，不能高度警惕去年的错误，而去年斗争中的错误重演是完全可能的。为预防起见，将领导群众斗争的几个原则提供如下：

第一，要有理——只要我们领导群众斗争是有理的，那么对方就一定没有理。只要我们的斗争是有理的，就容易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就能得到社会上的同情与援助。这样，斗争就不会破坏农村统战，我们就不会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第一原则就是有理。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理取闹的群众斗争应坚决反对与制止。

第二，要有利——有理是我们斗争的有利的条件，但不完全等于有利。使有理的事情变为完全有利，那就需要我们了解当时当地

的具体情况，就要动员群众参加斗争，加强本身的组织，并要在政治上社会上动员舆论，争取同情者，孤立对方。总之，要把斗争变为完全有利，就必须通过群众，形成广大群众的运动，胜利才有保障。以个人行动代替群众运动的英雄主义，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每一领导同志应高度警惕。

第三，要有节——我们党中央曾一再指出，我们斗争是为了统一，为了有利抗战，因此，在群众斗争中不要提出过火的苛求，不要做出为社会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事情。总而言之，群众斗争的一举一动，要照顾到社会上的舆论。如果我们做的事情过于突出，超过了现实，为社会上多数人所不满，就要破坏统战，孤立自己，以致遭受失败。所以斗争要照顾到社会舆论、群众情绪，适可而止，就叫做有节。这是我们每一工作同志所应当注意与研究的。

(2) 加强教育，提高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要把这一问题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去认识它。过去各教对教育工作没有引起最大的注意，也给工作以损害。教育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①加强会员的组织观念，引起爱戴与拥护自己组织的热情，这就需要严格组织生活，并进行以下教育——入会与出会的手续，征收会费，必要时进行登记和宣誓等。

②加强现实教育，指明中国目前抗战情形，抗战中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最近皖南事变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的态度（中共中央提出的12条）及全国人民应持的态度等。

③加强前途教育，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与前途，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形等。

④加强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各教团体要广泛的组织俱乐部、识字班，在各村建立识字牌。群众教育是在鲁西各种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我们要克服这一弱点。

(3) 厉行群众锄奸运动，肃清汉奸敌探分子，巩固自己。

(4) 从生产建设及合作事业中去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

(5) 武装群众。我们要在群众的民主民生运动中把运动提高一步，因为群众运动走向中和状态时，就发生消沉与垮台的现象。因此，欲使群众运动向前发展，必须把群众斗争提高到抗日道路上来。这就需要我们组织与领导群众进行对敌人的武装斗争，广泛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扩大抗日军，以提高群众情绪，巩固组织。

3、对于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的办法，同志们不要机械的了解与运用，认为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主客观条件，认为必须由第一种办法开始，做到第五种办法，其中缺一不可。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整理的办法。如在我们已经巩固或相当巩固的村级组织村庄中，已经没有奸细的活动，我们还要煞有介事的从锄奸工作中去整理组织，这不是天大笑话吗？还有在工作很好的村子中，各种进步法令都已经过斗争实现了，群众武装也组织的很好，并很活跃，那就不能无事生非故意制造斗争。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各种教育，开展生产建设事业，从教育中、生产建设事业中去整理。关于灵活的运用各种办法去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需要同志们深切的了解。

(四) 关于组织及领导问题

1、关于组织问题

(1) 群众团体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问题

各群众团体应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在同级党的政治领导下独立的进行工作，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计划〔须〕取得同级党的同意），使各团体总会的工作计划能顺利的推行到村级，纠正一切事情都依赖党的心理及作风。在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与独立工作时，要严格防止不与其他团体配合或不受同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的过火现象。同时下面的同级党的领导，不要妨害群众团体的行政。

(2) 群众团体的干部调动问题

群众团体的干部调动，是属于行政范围内的，应由各群众团体决定，下级党委不能自动调动其干部。下级党委如对同级群众团体

的干部有意见，应报告上级党委，再转上级的群众团体调动。

2、关于领导问题

(1) 工作作风问题

要切实执行去年9月活动分子大会所提出的“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作风。这一口号虽已老早提出，但至今仍未为一般同志所真正了解。有的认为“具体深入”只是巩固既有组织，于是就死守基点，不求任何发展，不知深入工作巩固既有的组织，正是为了发展，就是要巩固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一村就要巩固一村，也就是把一村的工作从不好弄到好，从好弄到更好，使成为一个打不垮摧不毁的组织，以这些组织为资本去开[发]展新的组织。也就是把一件事从头弄到底，弄到有了结果，得出经验，以这些经验去领导其地区，使其全地区也都把这件事弄好。这就是“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内容和意义。

在这种作风下，就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做工作。一点一滴是“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具体表现。有的同志认为一点一滴的做工作，就是慢慢的去做，这是一种错误，应严格纠正。

(2) 深入群众与深入工作问题

①首先在意识上求得彻底转变。这就是说，与过去那些不能深入群众与不能深入工作的不良意识作残酷的斗争。在过去，有些群众工作干部常这样想：“我是工作人员，不是群众的一分子”，于是对群众讲话，就说群众是你们，说自己是我们，一切行为不和群众一样，不欲与群众为伍。又有些干部，认为深入工作是不需要、是不可能，不习惯于“系统细密”的工作，给群众解决问题不耐心不细致。又有些干部，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够，工作好坏认为与自己无关，不愿追求工作失败的原因，不愿细心研究工作的方法与方式。这是一些意识不好的例子。这些意识不求彻底改变，深入群众与深入工作都等于空喊。

②干部群众化——要在生活上行为上工作上与群众一样，不要特殊化。但我们与群众一样，并不是处处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变

成群众的尾巴。我们与群众一样，是为了便于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领导他们前进。

干部群众化，就是要我们的干部在意识上要成为群众的一员，要把群众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群众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要为群众着想，要处处代表群众利益，在危机中不忘掉群众，要有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和勇气。只有具备了以上的条件，才能深入群众，才能深入工作。

③工作具体化。工作具体化，主要的包括两个问题，一是了解具体情况，一是具体解决问题。不能了解具体情况，也就不能具体解决问题。不能了解具体情况，也就不能正确的执行与实现党的路线。洛甫同志说：“我们常常在工作中，找不到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具体办法，这在同志中也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借口，然而仔细研究起‘无办法’的原因，主要也是我们不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而来的。只要真能透彻的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办法也就会有的。”（《党的工作中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怎样了解具体情况呢？洛甫同志也答复我们说：“为了了解各种具体情况，我们必须常常注意于各种具体材料（不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现在的或过去的，实际经验的或抽象原则的，历史的或理论的，正面的或反面的材料）的搜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不怕麻烦、不怕琐碎、实事求是的探讨的精神，要到处去访问，要多找人谈话，要多看材料，要多检查工作，要注意实际经验。但了解具体情况，不就等于许多具体材料的堆积与描写。为了真正了解具体情况，我们必须依靠马列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与研究这些具体材料，从这具体材料中，去把握到现实的一定的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来定出自己的具体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马列主义的创造的批判的精神，要多研究、多考虑、多倾听人家的意见，多同人家交换意见，要反复思维。这里要有打破一切成见、一切陈腐的公式的勇气”；“具体情况（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具体情况，绝不能一次被了解清楚，而且具体情况本身也是变化的、发展着的，所以今天

正确了解的具体情况，明天可能已经不正确了，所以我们不应也不能等到具体情况完全了解之后，才开始我们的工作，不是的。具体情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一步一步的了解。而对于具体情况这一一步一步的了解，也就更能帮助我们的实践，达到胜利的目的”。（《党的工作中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了具体情况，就需要我们具体解决问题。我们要解决工作中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特别是困难问题。也只有具体的解决了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工作才能前进。因此，我们在领导上不是隐蔽困难，而是要发现困难，并要细心去研究困难的原因，找出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只有这种精神，才是领导者的精神；这种领导，才是具体领导，工作才能具体化。

（3）原则领导与具体帮助问题

原则必须适合于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必须合乎原则，这两个范畴不是矛盾的，相反的倒是相辅而行的。

在领导上，除原则领导外，必须具体帮助下级。在目前鲁西群众工作的下级干部，无论在政治上在工作上都很脆弱，只有原则领导而无具体帮助，他们将掌握不住工作的中心问题，会使工作受到损失。

（4）建立制度领导，严格纪律，反对自由散漫问题

在目前鲁西各群众团体中，尚无制度可言，团体纪律也未十分注意到，所以在各团体中特别是下级，充满了自由散漫的现象。去年主任公署宣布了制度领导，有很多群众干部感觉到不方便，受拘束，这是一种具体表现。我们为了建立领导，深入工作，急速克服这种现象，所以要求各团体严格建立各种制度，如会议、汇报、检查等，制定团体纪律，严密团体生活，消除工作中一切不良现象。

（5）创造基点及使用基点问题

创造基点是我们加强领导与深入工作的一种方式，但不要死守基点，使基点孤立。我们要以基点影响其周围地区，以创造基点的工作经验，领导全盘工作。

(6) 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方式问题

国内外形势是急速的变化着，工作的发展，也是不停的前进，只墨守过去老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对工作是不利的。为了加强领导，深入工作，推动工作前进，我们要求：

①干部同志都要有高度的创造性与独立工作的精神，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都要独立坚持工作，反对看不起自己，对工作没有信心，同时也反对“老子天下第一，自高自大”的现象。

②掌握住形势的变化及工作发展的特点，要及时的总结工作，随时交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改正一些不合乎时代不合乎工作需要的方法和方式，要创造新的方法与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的要求。

鲁西妇救总会

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决议

(一九四一年三月)

鲁西妇女工作，随着鲁西抗日战争的发展迅速的开展起来。由于干部的经验缺乏，工作走上了强迫命令、依靠政府的错误路线，以致整个工作虚浮形式。为了深入工作，于去年“红五月”间总会曾提出了积极开展斗争的号召。但因没有明确的提出防止“左”倾的错误，工作是在错误的支持下发展的，所以妇救会代替了政权，在斗争中随便打人、罚人、游街公审，并且查放足、“争取继承权”的斗争超过了现实的条件，以致形成“左”倾幼稚病的错误，不但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破坏了统战，引起社会人士对妇女工作的不满。

在第一次分会长联席会后，总会曾指出了“左”倾错误的严重，但未得及时纠正。去年9月间，在第二次分会长联席会议上，提出了深入下层，整理村会，建立精致细密、具体统一的作风后，工作开始深入，粗枝大叶的作风得以转变，“左”倾错误得以纠正。但到今天，干部仍然深入农村而不深入工作，并且曲解自觉自愿，曲解合法，不积极领导妇女去进行为改善自己生活的斗争，停止发展工作，和平迟缓的整理组织，以致工作陷入了异常消沉的状态。

总之，过去的工作一直是在“左”倾错误的行动中，直到今天，妇女群众并未紧密的团结在我们周围。为了建设与巩固鲁西根据地，及时粉碎敌人的“扫荡”，为了积极改善鲁西的妇女生活，为了正确掌握斗争，巩固组织，因此关于今后工作有总会如下的决定：

一、政治方面

(一) 我们全体同志应深刻认识, 这次所以未能动员妇女群众配合政府、军队全部粉碎敌人“扫荡”, 得到反“扫荡”的全部胜利,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深入, 没有切实解除她们的痛苦, 没有把她们的潜在力量启发起来。

(二) 克服这个问题的中心关键, 在于深入工作, 切实进行合理合法的、民主民生的、解除自己痛苦的斗争。通过斗争去巩固村会, 开展组织, 教育干部, 并用妇女的坚强的组织力量去打击亲日派, 准备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随时粉碎敌人“扫荡”, 巩固扩大鲁西根据地。

(三) 实现这一任务的中心环节, 在于领导合理合法的、民主民生的、解除自己痛苦的斗争。在斗争中要防“左”、右倾。“左”和右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工作的损害是一样的。因此, 在干部中我们要开展残酷的反“左”右倾的斗争。

(四) 组织斗争的重心应放在劳动妇女身上, 因为劳动妇女的痛苦最深, 要求解放最迫切, 斗争亦最坚决, 并且我们的最终目的亦是為了广大劳苦妇女的解放(因此平素亦要加紧劳动妇女的教育)。

二、具体工作

(一) 妇女应参加一般的民主民生的斗争

1、民主民生的斗争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 彻底实行民主政治, 才能获得政治上的一切权利, 才能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才能保障妇女经济利益。妇女运动广泛开展, 广大妇女才有民主的要求, 才能保证民主政治之彻底实行。(2) 改善人民生活, 才能减轻妇女痛苦和负担。只有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民生改善的斗争, 斗争才更有胜利的把握。(3) 因此, 我们不止领导妇女为改

善妇女生活而斗争，而且领导她们参与一般的民主民生的斗争（反贪污和增资，合理负担）。我们反对只看到妇女问题的一方面的狭隘观念。

2、民主民生斗争要正确联系，密切配合。民主的开展给民生以保障，在旧政权下是不能改善民主的；民生斗争发展起来，给民主斗争打下基础，有了群众基础，开展民主是很容易的。我们领导妇女斗争，要切实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不致使民主空虚，民生孤立。因此我们反对空虚的理想的政治号召，也反对没有政治条件的单纯的经济号召。

（二）领导妇女的合理合法的斗争，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

从和平中发展起来的工作，是未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活跃巩固组织。因此，领导妇女斗争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方针。但必须认清，妇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她〔们〕所受的压迫是旧社会制度的压迫，家庭的压迫是次要的，因此在解决她们痛苦的时候，要照顾到家庭利益。强调政治口号而不照顾家庭统战，不照顾社会统战，作出来的情况是超现实的，是不对的。在今天，改善妇女生活，应该在合理合法的原则下去进行。

1、什么是合理的？我们所做的事情：（1）要照顾到社会舆论；（2）不破坏家庭的统战与社会统战；（3）不要是超现实的。是否强调了合理，就抹杀了真理呢？不是的。在现实条件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超过现实就会脱离群众。因此必须经过合理的斗争，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才能达到真理之实现。

2、什么是合法的呢？凡在主任公署颁布的法令范围以内，为执行进步的法令而进行的斗争，都是合法的；凡合理的，虽未经主署颁布者，亦是合法（合乎习惯法）；凡合法的也都是合理的。但在执行时，应看现实条件如何而决定。

此外，注意合理合法的斗争在方式上与对斗争的处理上，亦必须合法（不侵犯政府法令及权限）。

（三）关于妇女斗争的几个具体问题

1、关于妇女财产继承的问题

妇女财产继承权是主任公署的法令，是合理的亦是合法的，但在今天现实条件很差的时候，除了在特殊情形之下（模范地区，群众觉悟特高，妇女工作特好，广大舆论同情，有足够的胜利条件），一般的不应该积极发动。因为：

（1）财产继承权还没有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教育阶段，还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

（2）今天鲁西的群众还相当落后，男子继承权是几千年的积习，妇女争取继承权，容易引起社会统战（旧封建势力）与家庭统战（父母兄嫂）的破裂。

（3）现实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是超现实的。在今天争取财产继承权的中心点，应放在宣传教育上，经过一定的阶段（大部群众能接受时）再去执行。

2、关于婚姻问题

中国的婚姻制度在旧制度的包办买卖之下，是十分黑暗痛苦的（如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并且关系往往维系在金钱上，同时对旧的礼教的罪恶往往誉为美德）。改善婚姻生活，亦是我们的严重任务，但因此必须□□□下面的计划去进行：

（1）经常进行关于包办婚姻及早婚之害的宣传，并强调政府婚姻法之正确及森[庄]严。

（2）对一般人不要强调自由恋爱，对身感痛苦之妇女，揭露旧社会制度之罪恶，使积极参加解放事业。

（3）对一般的婚姻纠纷，应采取息事宁人，促进家庭团结的态度。

（4）特殊受虐待的妇女，在已引起舆论不满，斗争已成为群众

的要求〔时〕，应按照政府保护妇女法令，积极领导斗争，并在斗争前后进行深入教育。

(5) 经我调解，双方自愿离异者，必经法律手续，不能擅自处理。

(6) 如果为虐死或被暗害之会员，我应积极发动妇女进行斗争，并联名向政府请愿或公告，要求保障妇女权利。

3. 关于放足问题

放足问题是政府法令，亦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缠足恶习必须彻底铲除，才不致影响后辈健康，妇女才能行动自如。关于放足问题，亦必须遵照如下原则去进行：

(1) 展开广泛的宣传形式〔势〕运动。

(2) 与政府配合建立各级放足委员会（吸收士绅名流及有威望的妇女参加），促进放足运动。

(3) 在模范地区，举行放足竞赛，妇救会保证自己的干部、会员起模范作用，并向落后会员进行说服。

(4) 在模范地区，经过一个教育时期，放足已为群众所接受时，由政府进行检查。

(5) 有意破坏及故意违犯者，应进行斗争。

4. 关于妇女参政问题

妇女参政是民主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正确领导妇女参政，不但可保证民主斗争之胜利，而且可提高妇女地位。但我们必须知道，参政并不等于掌握政权。我们今天领导妇女参政，应从教育上，从最下层着手。

(1) 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启发其参政要求。

(2) 发动所有会员参加政府普选，与破坏者作斗争。

(3) 将我们最有威信、最优秀的会员竞选到村政委员会里去。

(4) 有计划的培养妇女政权人材，不应临时乱抓。

(5) 妇女参政与改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6) 开展妇女参政中反倾向的斗争，〔清除与克服〕好高骛

远，只求掌握政权的错误观念或不相信妇女，不敢叫妇女参政的现象。

(四) 春耕运动

春耕运动是目前临时中心工作，但不要妨碍了经常的中心工作。只有加强经常的中心工作，才不致顾此失彼，才能易使临时中心工作完成。只有努力〔作〕临时中心工作，才容易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在春耕运动中：

- 1、每人至少种树1棵，养鸡1只；
- 2、多下力开荒；
- 3、围绕春耕运动，组织妇女合作社；
- 4、增加生产，提倡家庭副业，普遍建立生产小组。

三、加紧整理村级组织

(一) 从合理合法的斗争中去整理组织，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方针，因为只有从斗争中整理，才能提高群众的认识，暴露工作的缺点，锻炼我们的干部。但必须依照下列原则：

1、斗争要有理。只有有理，才能有社会舆论的同情。我们反对无理取闹。

2、斗争要有利。要具体了解情况，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斗争，反对干部代替群众。

3、要有节。斗争是为了统一，不要做出大多数不能接受的苛求，要适可而止。

(二) 从教育上去巩固、整理村会

1、严格入会出会手续。

2、要加强其组织观念，加强现实教育及战时教育，并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

(三) 利用各种教育方式(会议、俱乐部)巩固组织。

(四) 从生产事业上去巩固，特别是生产小组，应提高其政治

教育，使成妇救组织的核心。

这些整理的方法，要互相推动，哪一个合适采取哪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通过斗争。

四、组织领导问题

(一) 建立垂直领导，严格各种制度，定期检查、回[汇]报、总结。对上级决议，执行坚决，对下级帮助要深入具体。

(二) 干部的配备调动，应通过上级批准施行(深入两级)。

(三) 在领导上，要深入群众、深入工作。

1、从意识上转变，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

2、深入群众，干部要群众化：

(1) 意识上群众化；

(2) 生活上群众化；

(3) 行为上群众化，深入群众，提高群众。

(四) 严格组织纪律，反对自由散漫的现象。

(五) 要求每个干部在领导上要有创造性，不要物[墨]守陈规，依赖上级。反对自暴自弃，自高自大，要耐心的、大胆的、虚心的领导工作。

同志们，这是总会关于今后工作的决议，希望你们接到后，进行深刻的研究讨论，并配合当地环境认真执行。我们必须负责与保证把决议挨级传达，深入到村，并求得工作上的实效。

鲁西农救总会

九月主任联席会总结报告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部分 总的总结

壹、总的成绩

三个月来鲁西的农会工作，在全体同志的一致努力与艰苦工作下面，在各方面都获得了不少的成就。这些成就具体表现下列各方面：

甲、接受了5月扩大会的精神，统一了鲁西农会的领导

(一)传达了扩大会的精神。扩大会后各都传达了大会的精神并进行了讨论，提高了干部工作情绪与信心，做了深入工作、转变作风、纠正缺点的动员。

(二)初步的转变了作风。扩大会后，一般的同志认识了漂浮、不实际、不深入、不群众化对工作的危害，认识了只有深入工作，转变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纠正工作中的单纯方式与主观现象，才能极好的开展工作。由于干部在意识上有了这种认识，就开始了对坏作风（不实际，不深入，不群众化，不关心群众问题）的纠正，开始了对工作的研究，开始了深入工作。这具体的表现在：

(1)为了便于深入工作，接近群众，区级取消了伙食单位，分别在群众家、在会员家里吃饭。

(2)开始了对村级工作的研究，并深入了村会工作。

(3)个别投机分子怕深入、怕艰苦、怕困难，在深入工作中

被刷洗，提高了干部质量。

(三)统一了领导，纠正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扩大会前由于总会的不健全，在领导上还没有很好的统一起来。虽然3月决定在鲁西统一领导上起了它很大的作用，但在彼此的联系上，各地经验交换上，步调的齐一上还非常不够，还存在严重的各自为政的现象。5月大会后，这种现象是纠正了。

乙、在培养干部与对外宣传工作上有了显著的成绩

(一)提拔培养了干部，建立了组织。一个月中各地都开办了训练班，大批的训练和培养了干部(特别是不脱离生产的区委员)，部分的健全了组织。

(二)对外宣传上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配合进行了政治攻势与各纪念日的各种工作的宣传，在瓦解敌伪、揭破谣言、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与抗战信心上，都起了它的作用。

丙、开展了民主民生的运动

(一)大力进行了主署改造工作。在5、6月，农会是号召了整个组织进行了这一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农会是起了它应有的保证作用。在个别地区保证了普选，形成了群众的选举运动，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提高〔了〕群众对民主的认识。

(二)配合政府进行村政权的改造。这一工作一般是在民主民生运动中进行的，各地都有具体的成绩，仅运西就改造了□□□村政权。这些被改造后的村政权，大部分都是农会本身踊跃的负起了村政的工作，这是农会的光荣，是值得我们发扬的。不过选举的方法还未能完全依照政府所规定的村政建设的步骤来进行，个别的还有以简单的推选方式来进行的。

(三)领导了反贪污反瞒地的斗争。这一工作在数量上以鲁西北为多，仅莘县就检〔举〕出“黑地”××亩，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增加了救国公粮的收入，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抗战力量。

貳、缺点

上面总结了我们的总的成绩，但在缺点这方面也是很严重的。主要的缺点是未完成三个月的工作计划。

三个月的计划是在大会上经各地同志共同详细讨论制定的，是扩大会议上的共同决议，但现在根据各地同志的报告总结起来，完成之程度还不到计划的 $1/2$ ，这是值得我们严格的检讨，提起高度警惕的。没有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

甲、总会的领导不够

三个月中，总会的领导表现了十足的官僚主义，没有到各会进行检查和帮助工作，没有及时发现偏向，给下级解决问题。这固然是由于总会的不健全，在客观上存在着很多困难，但另一方面，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克服这些困难，使在领导上起它更大作用，还是不够的。

乙、缺乏工作责任心

同志们对工作计划的重视是异常不够的。有的同志知道有个三个月计划，但计划的是些〔啥〕便模糊不清楚了。有的同志抱着工作好坏与他无关的心理。另外在各级领导上亦未能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按期检查和总结工作，及时纠正工作的偏向和缺点，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这一计划完成。

以上现象表现我们对完成工作计划的忽视，没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来保证计划的完成，表现了我们工作责任心的不强，表现我们实现决议的精神差，执行决议不坚决，轻视和忽视工作纪律。

丙、大会的精神传达不深入、不细密

大会精神一般的是传达了，但是深入细密是很不够的，因此，干部也未能全部接受大会的精神。不少干部对大会精神是一知半解的，特别是泰西，对大会的精神是相当模糊的，因此在工作上不可免的要发生偏向，影响工作，妨害着计划的完成。

丁、临时的突击工作与会议过多，牵扯了干部的力量

各种突击工作中，突击公粮等，有些干部离开了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专作临时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脱节，因而临时工作既没有很好的完成，经常工作却受到大的妨害。同时对会议没有很好的计划，没有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会议，致使会议过多，影响工作。

叁、对各地区的估计

甲、对泰西分会的估计

泰西的工作历史较长，工作基础较好，工作也较普遍，在客观上很多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接受新的工作精神差，使工作不能深入，影响工作的进行与发展，在工作方式方法与新的精神上表现落后。这固然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但是我们不应该强调客观的环境而原谅自己，抹杀主观的努力，□□克服困难。

乙、对运西分会的估计

运西分会的工作，原有工作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但三个月的进步〔是〕很快的，在某些地方形成了活跃和朝气，这是了解和接受新的精神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在掌握工作、认识问题〔上〕还有某些缺点。因此，运西今后应大大地发扬现有的优点，使工作大量的发展，继续深入巩固，使全部工作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加强各方面的修养，使在政治上工作上提高一步。

丙、〔对〕鲁西北分会的估计

鲁西北的工作历史较久，基础较好，但正是由这原因而在工作〔上〕表现了老大高傲，大大的障碍了工作进步。自今春虽接受了新的精神与作风，但转变的非常迟缓，进步非常慢。

丁、对运东分会的估计

运东的工作三个月来没有什么进步，相反的由于环境的恶转，某些地区在敌人和叛军进攻下，不能坚持而遭到了垮台。这一方面表现〔了〕工作的脆弱，经不起环境的考验，另一方面表现了领导上的不强，未能起到领导上应有的作用。这是运东最大的缺点。

戊、对昆山县的估计

昆山的工作，在工作基础上讲是不够强的，但工作是比较正规深入。但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干部的落后，致使工作表现松懈、平板，进步慢，未能更彻底的转变作风，更艰苦实际的深入工作，因此妨害了工作的进步〔和〕很快的实现“创造昆山县为模范县”的口号。

第二部分 几个具体工作的总结

壹、武装工作

甲、三个月来武装工作的成绩

三个月来，开始纠正了农会不关心武装工作，忽视和轻视武装工作，甚至不愿意进行武装工作极端错误的现象，认识了武装工作特别是人民武装工作的重要，开始了对武装工作的重视与领导，并在部分的地区以大的力量进行了人民武装的工作。一般的在农会中对武装工作是有了初步的转变，因此在武装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具体的表现在：

（一）组织和领导了人民武装

（1）组织和领导了脱离生产的农民武装，打击了敌人。这一工作以曹西北做的较有成绩，组织了脱离生产的农民武装，人数共251人，并领着进行〔了〕十几次战斗。干部对人民武装工作的重视上以及领导武装对敌斗争上，都为其他地区所不及。

（2）组织了农民游击小组。这一工作各地都有成绩，而鲁西北、运西、昆山成绩较佳。计鲁西北38个（原有在内人数没有统计）；运西21个，共78人；昆山7个（人数未统计）。成立的方式：经过动员自动参加的，部分的已有枪支，并在打击敌伪叛匪上起了它的作用。特别是在莘县部分的地区，形成群众自动的武装，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展开了对伪叛的斗争，打击齐子修，造成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例如武装保卫耕锄、保卫收割，每次敌、伪、叛、土匪

出来烧抢时，必予以打击。有一次，150余土匪出来抢东西，被击败，土匪死、伤10余名，我们也有3个会员光荣牺牲，并有5名受伤。再又如某次伏击敌人的战斗中，缴获了敌人子弹、牛、驴、大车、电线等。

（二）会员在人民武装中起了模范作用

（1）在自卫队中，农会稍有基础的村庄，会员一般的在自卫队能〔起〕模范作用，在昆山、鲁西北、泰西等地，都有很多的例子。特别是运南莘县，会员领导打敌人。

（2）在游击小组中（不是农会领导的）也同样的起了模范和保证作用。在有农会的地方，游击小组的组员大部是农会员，比如在昆山的某些村庄，会员占游击小组人数的2/3。这些游击小组都能英勇打击敌人、土匪，在群众中建立了高度的威信，成了群众打击敌人、打击土匪、保卫家乡的自卫武装。

（三）动员了会员和农民参军。这一工作各地都有成绩，但未能精确的统计。同时，这一工作也是武装工作中成绩最小的、工作最弱的一环，我们应该很好的提起注意。

乙、武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上面总结了我们在武装工作中是有了些成绩，但是这些成绩还很不够，并且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必须无情的指示〔出〕，作彻底的纠正。

（一）还存在着忽视武装工作重要性的偏向。目前敌人正以新战略方针积极的向边区进行极残酷毒辣的进攻，在军事上的分区“扫荡”，采取“清剿”、烧杀毁灭，由外向内密设据点，修筑公路，作长期的彻底摧毁。政治上的诱降、麻痹、自首政策，特务的各种活动，文化的毒化教育，“治安运动”等，使边区的环境日益紧张，斗争日益尖锐。在这种极度紧张的环境下，我们只有大量发展与建设武装特别是人民武装，和敌人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斗争，才能坚持与建设边区抗日根据地。但是我们某些同志，对边区的环境没有足够的认识，尚在异常麻痹，对大量的开展与建设武

装特别是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坚持和建设边区的唯一保证，没有清楚的了解，同时存在着忽视武装与不愿意作武装工作的极端错误严重的现象。

(1) 武装工作在我们的5月大会上曾作了报告和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为7、8月份的中心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并未能引起全体农会工作同志的应有注意，对这一工作还是表现了相当的忽视。我们没有从上而下的在干部与会员中进行很好教育与动员，没有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布置这一工作，没有有计划的对这一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因此这一工作未能收到应有的成绩与效果。

(2) 在部分的干部中尚存在着认为群众基础差，群众落后，便不能进行人民武装工作的观点。因此在意识上不愿进行这一工作，害怕作这一工作，尽可能在和群众谈话时避免讲关于武装群众的字样。这种现象在昆山、运西实验区，在部分的干部〔身〕上严重存在。这些同志好像是瞎子，好像失掉知觉，没有看到群众对武装的要求（不□群众的武装要求有时不一定是直接要求抗日）。这种现象必须给以彻底的纠正。

(二) 冒险的军事行动。某些地区群众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武装起来了，战斗情形〔绪〕提高了，但我们未能对群众进行战略战术的教育，有时领导群众去干，如运西的自卫队，在敌人出来时，拿着红枪追敌人，□□走了，没受到损失。又如某些地〔区〕游击小组的全部牺牲（虽不是农会领导的，但应该警惕和教育）。鲁西北人民武装和敌坚持战斗，这虽表现我们的英勇，但是这种冒险的行动是会使群众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降低武装斗争的情绪。

(三) 对正规〔军〕的爱护与优待工作做的很差。这一工作是我们武装工作中最忽视、最没有成绩的。比如我们对进行爱护正规军，掩护和照顾伤员的教育，与动员逃兵归队以及优待抗属、慰劳部队的工作，都做的很差，这会给我们大量发展与补充正规军以莫大的妨害。

丙、人民武装工作的经验

(一)掌握群众武装的要求。群众对武装的要求，不管哪地区都存在，如武装抗日的要求，武装反叛军的要求，武装防土匪、强盗的要求等，并有些地区是非常迫切的。不过他〔们〕对武装的要求，是根据当地环境与保护其切身的利益而出发的。我们必须善于掌握着他们的要求而进行武装组织，然后逐渐提高他们，由保护切身利益保卫家乡联系到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到抗日。适当掌握群众的要求，是最容易组织和发动群众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的。有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如泰西、昆山的利用防匪，莘县利用反叛，运西南的利用反敌伪，都大量的建立了人民武装，开展了对敌伪叛的斗争，与打击和消灭了土匪，保卫了地方安全，增加了抗日力量。

(二)培养人民武装的群众领袖。土生土长的、在地方有威信的武装干部，是最容易发动、扩大与巩固人民武装，并在打击敌人上也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这点我想用不着证明。因此我们应该选择好的干部，很好的培养与扩大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并在必要时计划的有条件的抽调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领导人民武装工作，以期大量发展人民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贰、村会工作

甲、三个月来村会工作的收获

扩大会后，村会工作是引起了同志们相当的重视，一般的强调了这一工作，因此在村会工作中收到了显著的成绩，纠正了村会消沉垮台的现象，部分的整理和巩固了村会，初步的建立了村会工作基础，使一部分村会走向活跃。具体的表现是：

(一)一般的是深入了村会工作，开始了对村会工作的研究，注意了村会工作的领导。三个月中我们的各级干部对村会工作的认识上有新的转变，克服了过去的强迫命令、上名册的村会工作方式，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有内容的进行村会工作。干部开始了深入村会工作，具体帮助领导了村会工作，注意了村会工作的研

究,部分的做到了面向村会,深入村会工作,一切工作要通过村会。

(二)整理巩固了村会,建立了基点。各地区都以大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取得了成绩。根据各地区的报告,以运西较优。各地区的数目除运东、泰西无统计外,共计如下表:

地区名	整理村会数	巩固村会数	基点村数	备注
鲁西北	91	23	10	
运西	30	11	23	
昆山	10	11	6	
共计	131	45	39	

统计中,村会有的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决定的各种条件,如整理村会最低要求,巩固村会的条件等。

(三)获得了初步的方式方法与经验。上面我们说到对村会工作有了新的转变,因此在村会工作的方式方法与经验上,也获得些初步的成绩。比如在整理、巩固村会中,认识了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内容的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才是正确的整理、巩固村会的办法。在创造基点中,必须了解创造基点村的意义与选择基点的条件,适当的配备基点村的力量,加强基点的领导,基点才不致流产,才能起基点的作用。在发展村会工作上,我们逐渐采用了新的方法,如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通过能解决群众的切身各种问题与经过各种斗争,以开展村会〔工作〕,使发展的一村就是巩固的一村。

乙、村会工作中的缺点

村会工作我们是有上述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缺点也不少,并且这些缺点还异常严重。

(一)村会工作和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没有密切联系起来,在整理和巩固的村会工作中未能通过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

去进行。因此在三个月村会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任务与政治任务脱离的现象，因此也就使得我们整理巩固的村会不能真正的巩固与活跃起来，同时大大的妨害了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立即纠正的。

（二）村会工作中的几种偏向

（1）村会工作中狭隘关门的现象。三个月来，村会工作中表现出狭隘关门现象。比如在鄂南某村5个老的农民会员，因年龄大些，表现的不积极不活跃，不严格遵守会议制度，我们的同志便将这5个很好的、很愿意加入农会的老会员开除了。比如运西实验区×××基点村，一般的各方面都起了基点的相当作用，但就是不发展，以致现在还是半年前的40多个会员。在该村有人亲自向我们农会的同志讲：“你们农会只是代表穷人的利益，但是实行进步法令不也是同样的代表富人的利益吗？”“你们为什么光说代表穷人利益，不说代表富人利益呢？你们不会说个代表富人利益吗？”又如范县某村的发展村会是在没有工作的地区用个别谈话个别扩大的方式，在一个村住了20多天，发展了7个会员，经过严格登记宣誓的结果只剩了3个。这样加入一个群众团体，甚或比加入一个政党还要严格些。另外例子还很多，我们不多谈了。

这种狭隘关门现象，会大大的损害了农会工作，会使农会形成孤立，会严重的妨害着工作的发展。我们要严格的纠正这种错误现象。

（2）机械形式的进行村会工作

A、整理巩固忘记发展。鲁西北的朝城，根据报告全县共有7个区，有工作的有3个区，3个区中只有2个区有区农会的组织，但在三个月中没有发展。在报告中只有一个区提到发展问题，发展的一个是巩固的一个。

在鲁西实验区，这区的工作一般的还深入，创造了一些经验，收到了些成绩，但是也同样犯了忘记发展的毛病，从春天就是〔十〕几个村会，到现在还是十几个村会。

在观城县，在6月中的报告中发展了24个会员，但是也开除了

23个，净存1个。

以上真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严重现象。

B、机械的了解情况。运东、东阿在整理村会中光单纯的了解情况就20多天，每天出去了解，但还没有了解清楚。了解情况是在工作中了解，单纯的了解情况，是不会了解清楚的。

C、机械的搬运整理村会的几个步骤：登记、宣誓、民主改造，不知道根据村中的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工作，灵活的进行村会工作。

D、机械的了解乡村统战，将士绅庸俗化。如运东的某些村子，整理村会必须召开本村的士绅座谈会，好像是将士绅座谈会也成为整理村会的一个重要步骤，好像不开绅士座谈会就不能整理村会似的，同时将士绅庸俗化。每个村子都有很多的士绅，这样虽然进行了士绅工作，但会将我们某些群众过去办过公的、识几个字的农民关在农会之外，这是要不得的。

(3) 县会直接创造基点。县会直接创造基点这种方式是不好的，因为县会直接创造基点，势必妨害对区会的领导，妨害区会的领导，形成包办。因此我们决定县会不直接创造基点。但有些县的同志，没了解到这点，仍旧直接单独的进行创造基点的工作，如鄆城□基点。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值得我们提出。

(4) 忽视会费工作。交会费是每个会员的义务，是加强组织观念，是巩固和考验村会的一个方法，因此我们在5月大会上曾强调了这一问题。但未能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对收会费的工作还表现着很严重的忽视，始终没有很好进行收会费的教育，对收会费工作缺乏了信心，个别认为收会费影响和妨害工作，特别是还有在收会费中表现了自流现象。我们的同志在村会中交会费是随便的，不愿交就散，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今后应当很好的进行教育，纠正转变这种错误观点（详见收会费的指示信）。

丙、两个主要经验

(一) 深入了解情况，大胆的有魄力的解决问题，是巩固与开

展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说巩固与开展工作首先将具体情况作深入的、详尽的了解，发现大小问题，认真的解决这些工作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与解决问题后进行我们的工作，那是最容易收到大的效果的，特别是在发展工作中，如果能注意这些问题，有魄力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一定能提高我们的威信，大量的发展组织，并可做到发展的一村是巩固的一村。同时这种影响还会逐渐扩大到四面八方的群众，〔他们〕都来找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且可利用这些问题，大量的开展工作。比如范县的八区的问题，有一家人被土匪架走弄死了，土匪怕受告，他先告了主家，结果主家被政府扣押起来，受了罚，一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我们知道了，便抓紧与解决了这问题，提高了我们的威信，推动了工作，提拔了干部，这种经验我〔们〕应该好好的接受。

（二）把群众的经济要求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工作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村会工作，村会才真是巩固的。各地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很多村会因某件事情群众的某点要求，村会工作（下缺33个字——编者）因某些刺激而活跃的村会，如不抓紧进行工作，经过一个时期消沉垮台是必然的，是不会长期活跃的，因为它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和它本身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经常的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这点，即会对村会发生动摇，失掉信心。如群众的经济要求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建设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的巩固起来的村会，是经常活跃巩固的。今后我们应很好的接受这一经验，很好利用这一经验，来开展与巩固我们的工作。

叁、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工作

甲、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方面的成绩

（一）减租减息工作。这一工作每一地区都引起了注意，并发动和领导了减租斗争，收得了些具体成绩，部分的改善了群众生活。减租以运西较为活跃。根据各地已统计来的数目如下表：

地 名	运 西	鲁西北	昆 山	共 计
减租数目	882.3石	27户	94人	
减息数目		10户		
增资数目	750元			

(二)合作社方面的。三个月来没有多大成绩，只是做了些宣传与教育工作，有了些成立合作社的对象，如范县，但未正式成立。

(三)生产互助方面的工作。三个月来有了些开展，生产小组、互助小组由于同志〔们〕较前重视，是有了成绩。在某村庄提高群众的生产互助热忱，可惜除鲁西北、昆山外，各地都没有统计，并且没有总结，因此没得出更多的经验，仅得范县的一两个作简单的介绍：

互助小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力与牲口力共同互助。这种多半是这几家感情很好，有人无牲口，同时一家买牲口又买不起，于是几家共同出钱买一个或两个牲口，将几家的活共同在一起作。也有的几家只有一个牲口，活做不过来，几家筹钱再买一个，结成一犋。另一种是人力互助，就是几家共同在一起做活。这里介绍两个小组，一小组是7个农会员，在一起互助，活大时在一块，活小时分作两班。吃饭是各人吃各人的，吃饭时抽一个人回家取几家的饭，吃饭时照例是先把好的吃光，水是做谁家的活谁家供给。有一次这组的3个组员一齐被派差了，出去好几天，恰巧这几天正在忙着收高粱。在家的这4个组员，看到他们3个出差了，先商量一下，先收他们3个的。等他们回来后高粱全给他们收到家去了，于是这组的互助劳动情绪更高了。据村会长的报告（当然不够精确），他们5天可以省一天的工。再一个是几个佃农在一起互助，他们事先谈好，和东家也谈好，趁哪天在家的活松时或是晚上，他们几个合

起来做一家的活，积极紧张的干，在最短时间内将活做完，再快去给东家做。另外佃户的家中也进行互助。这种互助既不妨害地主的生 产，又能解决了佃户的困难，是可以采用的。

生产小组，几家在一起磨粉、养猪，4家共有400多块钱，春天已成立，因我们没有很好的领导，也没有什么发展。

乙、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工作

虽然是收到一点成绩，但是我们对这一工作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生产建设工作，更为同志们所忽视、所不注意，因此大大的妨害了这一工作的发展，影响我们工作的开展与巩固。在这一工作中表现了以下不可漠视的缺点：

(一)在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能深刻透彻的了解斗争情况，甚至不研究领导斗争的技〔艺〕术，且不通过群众路线，多是包办代替。我们的干部强要求群众起来斗争，和对方打官司。正是由于这些缺点，使得民主民生的运动不能很好的开展，妨害了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减低了干部领导斗争情绪，影响了工作。

(二)对生产建设工作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这一工作忽视与不注意

(1)合作社的工作，我们没注意(特别是生产合作社)没领导，因此新的合作社没有开展，而旧的合作社反垮台了。因此有好多组织生产合作社的有利的条件，便利我们开展生产的组织，如造盐、造纸、织布以及有利于抗日根据地各种生产组织，特别是家庭副业性质的，但是没有注意。

(2)合作社的官办现象。由于我们的同志对合作社的性质模糊，不清楚，不了解合作社是群众自身的经济组织，不是农会的一部分，因此产生了合作社的官办现象。我们的同志操纵合作社，支配合作社，直接处理合作社的问题，因此使群众脱离合作社，认为合作社不是自身的组织，对合作社不关心，没兴趣，这样合作社不能很好的开展是必然的。

(3) 生产互助工作，我们进行的也是异常不够。互助是农民的要求，农民中互助的形式是很复杂的。我们根据我们规定的组织形式，组织农民进行互助，一定能提高生产情绪，增加生产。上述例子，已可证明，但我们没有注意经常的做这一工作，更谈不到劳力与武力的结合问题。

丙、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工作未能很好的开展所给我们的损害

(一) 群众生活不能适当的改善，村会工作缺乏经济基础，因此村会工作不能更进一步的巩固与活跃。

(二) 物质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困难。目前我们的吃饭、穿衣与各种日用品，以及抗战的一切供给都增加了困难，我们如不加强开展这一工作，将会遇到更困难的局面。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肆、会员教育

甲、三个月来会员教育工作，有了一些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于对会员教育引起了注意重视，初步纠正了过去忽视、不进行会员教育的现象，开始了会员教育工作，因此在会员教育〔上〕收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

(一) 制定了教材。会员教材除总会编印了一种外，各地还制定了些教材提纲，虽然这些教材还有些缺点，还不一定切合实际，但总算是注意了这一工作。

(二) 进行了些会员教育工作。会员教育，各地零星的进行了这一工作。在会议上，在整理村会中，对苏德战争的教育、前途教育都进行了一些，收到些效果，加强了会员的认识。在个别的村会，经过教育进行了整理，并活跃了个别的村会工作。

乙、会员教育是我们工作中最弱的一环，存在严重的缺点。会员教育是较前注意了，但还只注意，并未能有计划、有步骤配合各种工作任务与政治任务来进行会员教育工作，更缺乏适当的方式方法。因此在会员教育中，表现了很多严重缺点。

(一) 无教材。教材的缺乏，总会应当负绝大部分的责任。虽

然有很多客观的困难，如有教材没人写，没油印工具，但不管怎样，总会是要负责的，而且应当负责的。

(二)会员教育无计划，无布置，无检查，无总结，这种现象各地都是如此的（就是个别地区布置了会员教育的工作，也是皮毛的、主观的指示几个要点）。因此在会员教育中，呈现着自流现象，下级干部没教材作依据，不知怎样进行教育，不得不自己知道什么就讲什么，想起怎样讲就怎样讲。如运西有个这样的例子，在村级的训练班中，我们的同志作了一两天的政治报告，从国际到山东、到鲁西、到运西的那一套都搬出来了。

(三)会员教育工作与政治任务，与组织任务脱节。这一严重的缺点不是一般的，用不着我们详细的申述，上边的缺点可以证明。同时同志们只要想一下，就可详悉这一缺点。如在组织工作中的教育（农会的组织教育、会费教育），武装工作中的教育，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中的教育以及其他工作的教育，临时的某种教育等，都没有计划的进行。

(四)缺乏一套会员教育的方式和方法。目前我们在会员教育上，极缺乏经验，还难确定哪种教育方式最适合于农民的要求，更没有创造出新的方法方式来，□建立会员教育制度。

丙、努力〔做〕会员教育工作，创造一套适合会员要求的方式方法，今后应值得我们去重视。

伍、领导问题

甲、三个月来领导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不应忽视的。无论是对领导的重视上，对领导的研究上，对领导的方式方法的运用上，都和过去有显著的不同，这是值得我们提出并继续发扬的。这些进步表现在：

(一)建立制度，领导了工作。在各种的制度的认真执行〔上〕，虽然还存在着些缺点，但是会议、汇报、检查一般的是建立了，并有大部已开始执行。同时在具体的帮助上也有个转变，干

部开始具体帮助工作，深入下层领导，在整理巩固村会与建立基点中，我们的各级干部都具体帮助下级的工作。

(二)开始了领导上的研究，初步的运用了领导方式。开始根据各地情形决定领导方式，并注意了提拔干部与培养工作的总结和缺点的纠正。三个月来各地都这样进行的，特别是昆山与运西。

(三)纠正了某些领导上的缺点。鲁西的农会由于各级领导机关的不健全，特别是总会机关建立较晚，因此在领导上存在着很多的缺点。这些缺点在这三个月中有了些纠正，比如初步改变了工作作风和纠正了上名册、强迫命令的发展路线。

乙、领导上的缺点，官僚主义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首先从总会检讨起。总会对各地的深入具体领导，对各地具体情况的了解都是很不够的，因此就无法实现正确的领导。同时各级农会也同样的存在着这种现象，如领导的包办代替，不通过群众路线，不够深入实际，自高自大，民主作风很差。

(一)掌握不稳中心工作与中心地区。我们在掌握中心工作与中心地区〔上〕都是很差的。在掌握中心工作上，往往因临时工作而放弃中心工作，没有想到中心工作是不能轻易放弃的，不能掌握中心工作，而加强临时工作或突击工作。另方面抓着中心工作，但又忘了和其他工作的联系，这也是对工作大大不利的。在掌握中心地区〔上〕也是同样，在领导上都是平均使用力量，而忽略了对中心地区的掌握、抓紧和加强中心地区而推动全面工作。

(二)没有注意健全区级的领导。我们分会、县会同志大半是对区会的领导上不能很好的通过区，帮助与推动区去进行工作，多半是包办和代替区，甚至和区干平分工作。这样就一定不能实现区会的领导，一定妨害对区级干部的领导、帮助与培养，妨害区会的领导威信。

(三)领导的事务主义。领导的事务主义也是我们丝毫不容忽视的。这一现象以县区级为最厉害，不能很好的研究与讨论工作，

有计划、有步调的进行自己的工作，而形成跑腿主义与整天办理粮票，收菜金、津贴的事务，不能很多的克服事务上的一切困难。

丙、三个月的工作计划没有胜利完成，检讨起来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领导脆弱。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并对今后的领导提起高度的注意。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

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

各分会、县会负责同志：自今春敌人开始所谓“强化治安运动”以来，对华北与边区的进攻，在其战略指导上有了基本的改变——敌寇采取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对我根据地采取了彻底毁灭政策。这种改变，在今年4月中旬沙区大“扫荡”与最近对我泰西的平阿、泰肥两山区的“扫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为了应付日寇的新进攻，为了建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要求我政民间有高度的密切的配合。因此，经各界救国联合总会详加讨论，作出如下的指示：

甲、〔对〕过去配合的检讨

自总会为了加强领导，深入工作，发出建立垂直领导号召以来，各级同志是坚决拥护了这一号召与执行了这一号召，至今无论在领导上工作上都收到了些不可抹杀的成绩，但也发生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偏向，如：

(一)有些同志认为：群众团体有群众团体自己的独立工作，政府的法令与我们无关，政府的法令是由政府的工作人员来执行。这样，就对政府法令采取消极态度，不研究法令，不彻底执行政府法令。

(二)有些同志只顾在根据地内来作整理与巩固村会的工作，而忘掉向敌区、敌占区进攻，从开展敌区、敌占区工作中去巩

固我基本地区的工作。在某些地区竟发生了这种现象：部队与政府前进，克服了据点，开展了边区工作，要求群众干部去配合，群众干部以“没有总会的指示”为借口而拒绝之。

(三)(以下脱落约23个字——编者)，就不能参加别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自己应作的还是不应该作的。因此，在各地有些军政民共同紧急任务，需要群众团体动员干部和全体会员去参加，则竟以“恐怕妨害自己的工作”而不去参加。

(四)有些地区的负责同志本位主义很大，对于曾经过总会决定应派出参加某种工作之共同代表，竞争执不下，互相推诿，逾期不派出。如各级优待抗属委员会，总会曾决定各级各群众团体应共同派一次要干部经常驻会以支持工作，但至今已有数月之久，有很多地区尚未派出，致使优抗工作受到损失。

(五)有些同志认为：今后为了密切政民间的配合，为了避免发生无意义的纠纷，要求上级政府和群众团体遇事联署下指示信，竟忘掉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模糊了群众团体的地位。因为政府是立法机关，群众〔团体〕则不是立法机关；政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各群众团体是一部分群众的组织，只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利益；政府的一般法令与指示，群众团体是不能联署的。

(六)还有些同志不明白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认为地区是我们开辟的，先来者居上，或认为政府是老大，我们是老二，以致在工作中□□政府，侵犯政府权利，破坏行政系统，而损害抗日民主政权在群众间应有的威信，这是动委会旧时代的旧作风的残余，是极端要不得。

上述这些偏向，应该尖锐的指出，加以严格的纠正，以建立政民间高度的密切的配合关系，为粉碎敌人新进攻与建设巩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下脱落约22个字——编者)的损害，□□民族解放区史上的罪恶。

乙、今后配合的原则

为了建立政民间的正确配合关系，总会指出以下的原则，希各级同志应根据着对过去配合工作的检讨，展开热烈的讨论与研究，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执行。

(一) 政府所颁布之各种进步法令，群众干部要深入的去研究，并以自己的组织力量，保证彻底实现。因为现在的抗日民主政府，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它代表着各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实行中如发现个别法令的缺陷，应站在爱护政府的立场，向政府建议，请求政府加以修正。但在未修改前，仍得坚决执行。

群众团体在政治主张方面、政策方面，是应该服从抗日民主政府的，所以群众团体的各种工作，如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战、改善群众生活等，固然是群众团体自己的事，但要依据于政府的法令，不能超越政府所应许的范围。法令是政府政治主张和政策的具化，群众团体一定要研究法令，彻底执行法令。

(二) 我们要号召各级干部和全体会员严格遵守政府的各种制度，尤其是财政经济制度。群众团体的干部和会员，是奉公守法的模范，那些以群众团体为护身符而企图破坏政府各种制度的坏分子，在各群众团体中是不容许存在的。

(三) 关于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条例，总会于必要时，为了提高干部和会员对这些法令的认识，为了给以更具体的执行方法，要发出指示信，但有些是不写指示信的。指示信有无与否，各级干部要遵照行署的训令彻底执行，切不可“无总会指示”为借口而拒绝执行，或采取不关心的态度。

(四) 因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同，各地区有些具体工作和紧急任务。关于这些工作与任务，总会实不能一一指示，各地负责同志应与同级政府及当地驻军共同讨论，切实执行，并随时报告总会。

(五) 有些个别村、区行政人员，任意破坏上级政府的法令与制度，贪污腐化，欺压群众，鱼肉乡民，群众团体可以号召群众反

对他、改造他。这并不是破坏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相反的是反对个别坏分子，刷新村、区行政机构，建设村、区政权。

各分（六）在工作中，要坚决反对不执行上级政府的规定；对群众干部的“抓一把”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妨害群众工作，同时也妨害政府法令的彻底执行。如有这样现象发生，应迅速报告总会，求得彻底解决。

丙、几个具体工作的配合

在今冬有几个具体工作，如破路、抵制仇货、优待抗属和屯积秋粮等，需各级部门号召全体会员，保证政府法令的彻底实现。

（一）破路——要遵照行署训令，规定10月15日到11月15日为破路月，10月15日到22日为破路突击周。在突击周内，实行抗田戒严。除及时深入的动员工作，号召全体会员与群众积极参加外，并派出干部负责督促检查。

（二）优待抗属——要遵照行署训令，各分会、县会派主要干部参加优抗委员会，并共同派全次要干部，代表各群众团体经常驻会，以支持工作组。各区会除派主要干部参加优抗委员会外，并主动的与同级政府部队共同商讨驻会人员，因为区优抗委员会，只需要一个人经常驻会。关于这一个驻会人员，如真需要群众团体干部驻会，各群众团体就应坚决的共同派干部驻会。

各级优抗委员会的驻会人员，津贴菜金由政府负责。

（三）抵制仇货——抵制仇货是开展对敌伪经济斗争与繁荣根据地的有利武器，各级群众团体要遵照行署训令，派干部参加宣传与检查。这些干部最好多由会员中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抽调。这样可以培养与提拔新干部。

（四）屯积秋粮——屯积秋季公粮，有关军民食，要遵照行署训令，各分会要共同派有力干部3人（最好是生活改善部的人）参加秋粮屯集委员会，并有计划的分派干部到各地督促与检查屯粮工作。这样检查工作要与检查群众工作联系起来进行。这是干部力量

的使用问题，各分会要严格注意。各分会要共同派干部参加（至少10人）。这些干部是由会员中与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抽调，粮票、菜金由政府负责。各村会干部要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并领导会员与群众，保证屯粮工作的如期完成。区级因为只负责转运公粮，〔所以〕不组织屯粮委员会。但各团体要及时讨论这一工作，详细的布置这一工作。

冀鲁豫边区农民抗日救国总会

冀鲁豫边区工人抗日救国总会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冀鲁豫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冀鲁豫边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筹委会

今后边区工运的任务（节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高 光 宇

一、边区形势与我们的总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总力战”的方针下，已经对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的全面进攻，掠夺华北的资源，实行“南进北进”，进行新的冒险战争，企图用新的更毒辣的手段达到确保占领地的目的。敌人接受了4年来“扫荡”失败的教训，在对我进攻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敌我的斗争形势是更紧张、尖锐和残酷了。边区的严重形势已经到来，而且将来会更加艰苦，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目前严重的形势下面，我们必须加强对敌斗争，以我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战、全力战粉碎日寇的“总力战”，粉碎日寇任何毒辣的进攻。没有对敌斗争的胜利，我们便不能完成建设根据地的任务。

我们怎样开展对敌斗争呢？在目前敌后战争的环境中，主要的应是开展对敌的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展开政治经济的文化的全面斗争。没有广泛的深入的对敌武装斗争，其他各个战线上的斗争便不能展开，我们也就不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因此目前边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便是积极的展开对敌武装斗争，造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 本文系高光宇同志在冀鲁豫边区工人抗日救国会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上的报告。

我们工会工作，同样的要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为完成这个中心任务而斗争。但是发动对敌武装斗争，是不能脱离其他工作孤立的进行。我们必须从提高工人地位，加强工人教育，改善工人生活中去完成，不然便不可能。

根据以上的要求及我们目前工运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深入工人合理合法的民主民生运动，改善工人生活，以大量发展新组织，巩固既有组织，广泛的动员工人参战参军，参加民兵、自卫队，开展对敌武装斗争，造成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和二次工代大会所确定的任务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在不过根据形势，特别加强了武装斗争。

二、我们的具体任务

(甲) 积极动员工人参军参战参加民兵，组织工人自卫队，是我们今后的中心工作

开展对敌武装斗争，广泛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边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我们的中心工作便是根据这点而确定的。但是，我们怎样来完成呢？

1、建立健全各级武装部。由于干部缺乏及我们对武装工作的重视不够，各级武装部尚未建立起来。今后我们为了加强武装斗争，各级应积极建立武装部，并努力加以健全和充实。区会及村会要设立武装委员，使各级有专人负责。

2、深入武装斗争教育，使我们的各级干部及广大会员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中国革命特点之一，便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不广泛的开展武装斗争，便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在目前我们便不能粉碎日寇的进攻，打开边区的严重局面。总会编有武装工作的教材，各地要有计划的进行教育。

3、有计划的动员工人参加八路军、民兵和自卫队。八路军是坚

决抗日的军队，是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工友明白八路军和我们工人阶级的血肉关系，有计划的动员工人参加八路军，动员工人参加青抗先、成年人参加模范班。我们号召优秀的工友到民兵去，在民兵里边并且要起模范骨干作用。在规定年龄的工友，要一律参加自卫队。只有我们武装起来，我们民主民生方面的利益才会有保证。在武装斗争中，我们工人应当站在先锋的地位。

4、切实执行优抗工作。优抗工作的好坏，是我们能否动员人民积极参军的重要条件。各地的村会要大量的组织优抗小组，给抗属以劳力的精神的优待。为抗属挑水、种地，配合政权及各团体解决抗属的各种困难，使抗属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使他们感觉到愉快和光荣。反对轻视忽视这个工作，认为这只是政府的事情的现象，反对单纯的粮食优待。

5、组织工人自卫队。在公营企业中工作的工友，要积极组织工人自卫队。工人自卫队的任务，就是加强工人军事教育，以工人自己的力量保卫工厂，厉行锄奸。公营企业的工友要赶快把工人自卫队组织起来。

军区武装会议的决定，工会今后不能单独领导工人武装，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我们要防止个别干部便由此而放松武装工作、消极怠工的现象。

(乙) 大量提拔、培养干部，充实、健全区级领导

目前工会的干部，是非常可怜的，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差。“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今后只有很好的解决干部问题，提拔、培养大量有才干有威信的干部，才能开展工会工作，这是一个关键。

过去我们在提拔、培养干部方面，是有不少严重缺点的。一般的说起来，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对提拔、培养干部，都重视不够，

缺乏计划性。个别地区注意了这个工作，也缺乏原则性，提拔干部没有最低限度的标准，以致所提拔的干部不但不能开展工作，而且使工会的威信受到损失。乱提拔，不加选择，不管其动机如何，来的就要，不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只注意动员工会脱离生产的干部，以上的严重缺点必须纠正，提高计划性原则性。

3、我们怎样去提拔、培养干部呢？我们必须克服目前的许多缺点，并防止新的缺点，如感情用事、越级提拔。提拔干部要反对只看金字招牌，但也反对一点也不注意成份的现象。我们要从斗争中、工作中发现积极分子，特别加强教育，培养其威信，提拔、培养一批优秀的干部。提拔干部要有最低限度的标准，不能滥提：①要忠实于民族解放及工人解放的事业；②要有责任心，工作积极负责；③要与工人群众有联系；④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提拔干部我们反对单纯的技术观点，主要的应从政治上着眼；但既然是干部，就需要有相当的能力。

4、我们怎样培养、训练现有干部呢？①我们要特别加强干部教育，建立干部学习制度，克服干部不愿学习的现象，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帮助下级干部总结工作，吸收工作经验，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现在我们很多干部，不会总结工作，做了就完了，不管胜利或失败，都没有经验教训，这是不能提高干部能力的。②开展自我批评，克服干部中的许多缺点及不正确的意识，提高干部的品质。目前干部间无原则的和平共居的现象应立即停止，对现有干部加以轮训。我们要求现有干部能够普遍的提高一步。

5、区会要实行民主改选。过去的区会委是委派的和任命的，今后我们要认真的进行民主改选。只有如此，方能提高会员的积极性，增强会员的组织观念，并能发现大批有威信的、和工人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经过民主改选的区会，我们要求：①有健全的区委员会；②至少有一个脱离生产的称职干部；③不脱离生产的干部能够工作。

(丙) 彻底执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改善工人生活

1、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制定的，不但照顾了工人的利益，而且照顾了厂方的利益，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阶级团结，提高工人的生产与抗战热忱，增加抗战力量。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我们应当在干部中展开深刻的研究，并加强会员教育，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2、执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我们目前主要工作之一。因为工人的生活太清苦了，地位太低了。我们必须对工人的利益加以切实的保护，否则便很难进行其他的工作。

3、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的中心问题，是工资问题，但工人工资的增加却远远的落在物质〔价〕高涨的后面。工人每年所得的工资甚至不够个人的吃穿，家中老少陷于饥饿之中，所以增加工资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今后我们为着适应战时物质涨落不足的情形，要实行粮食工资制。粮食工资是最合理的，不论对雇主雇工都有益处。在增资中我们要掌握正确统战原则，过左过右都会使我们遭到损失。我们不能只顾工人一时的利益，要照顾到工人的职业问题，不但只看目前，我们要看更远一些。

4、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第二个问题，是劳工保护问题。我们坚决反对打骂与侮辱工人，□□保护女工、青工和童工，缩短学徒年限，改变学徒店员的待遇。工人得了疾病，资方要负责补助其医药费。提高工人的地位，尊重工人的人格，改善工人待遇。

5、彻底实现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①要加强工人教育，提高工人觉悟，没有工人本身的团结和积极争取，便不能实现。②要召开雇主座谈会，并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向各界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③干部要加强劳动政策的研究，防止“左”右的倾向。④方式方法要灵活，工会要站在调解的立场去处理劳资问

题。⑤要有中心有基点的去实行。政府颁布了劳工保护暂行条例，但是距离彻底实行，尚有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

6、增资以后工人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了，我们就要特别强调执行劳动纪律，以巩固阶级团结。工会要保证执行劳动纪律。我们暂且规定以下三条，以后可随时根据需要加以充实和修改：①积极工作，增加生产，反对怠工和偷懒；②要爱护生产工具，爱惜并节省原料；③遵守劳动合同。

(丁) 加强会员教育，提高会员文化政治水平

1、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是我们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工人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水平，丰富工人的革命知识，工人阶级便不能完成其领导革命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工会也不能走向巩固和活跃。只靠增加工人的经济利益，不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因此，加强会员教育是我们工会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2、已往我们各级组织对会员教育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呈现了没计划、不系统、零乱不正规的现象。今后要为建立正规的会员教育而努力。总会要负责编印课本及教材，要大量开办流动训练班，组织识字组、夜校、俱乐部。但是，工人的学习不要妨碍生产。

3、在目前，我们要以大力动员工人参加冬学，抓紧冬季这个良好的时机，通过冬学来实行会员的文化政治及组织教育，巩固活跃工会组织。冬学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将使会员教育奠定初步基础。

4、健全宣传教育机构。我们的宣传教育机构是非常不健全的，有不少县份，根本没有一个人负责。这样怎能够深入会员教育工作呢？因此我们要积极提拔、培养宣教干部，充实宣教机构，加强对会员教育的领导。我们除有计划的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外，我们还须要努力培养一批工农宣教干部。非知识分子不能做文

教工作的观点，是不对的。

(戊) 加强国防企业与手工业工会的领导，提高工人的生产热忱（略）

(己) 开展生产建设事业

1、经济建设是根据地各种建设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如果不能发展工业，农业及商业，繁荣根据地的经济，富裕根据地的财富，在经济上取得自足自给，我们便不能支持敌后长期的斗争，供给战争的广大需要，在日寇的封锁及蹂躏之下，我们将发生重大的困难。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工人在发展根据地的工业上负起重要的责任。我们必须积极的参加生产建设事业，在大发展根据地的经济的任务下完成我们工人所负的重大责任。

2、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各种手工业，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开办各种日用必需品的工厂。但是我们怎样开办呢？①有管理工厂经验的失业的老工人，可向银行贷款，自己经营；②可以和地方士绅共同经营，由他们出一部分资本，帮助政府开办。我们有计划的动员工人参加工作。这些办法都可以。当然，在今天敌后的环境开大工厂是没有这种条件的，但小规模工厂是完全可能建立的。

3、我们要有计划的吸收敌〔占〕区的工友到根据地来参加工作。敌占区的工友在敌人的蹂躏之下，他们是不甘心的。我们应当努力吸收他们到根据地来参加工作，在〔把〕他们从火海中拯救出来。大城市沦陷以后，流落内地的失业工友，我们也应积极的把他们动员出来。

4、我们要加强技术的研究。手工业工会及开办起来的工厂的工会，要成立技术研究委员会，在现有基础上努力改良技术。

(庚) 为争取30个模范村工会而斗争

1、创造模范村会是我们巩固深入工作的一种方式，是带有竞赛

意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及一定的时期内，号召各村会争取模范，使我们的工作提高一步，使之更加巩固活跃起来。今年下半年，我们要为创造30个模范村会而斗争。

2、模范村会是有一定的条件；只有完全达到了这些条件，才算模范。我们的模范村会有六个条件：

- ①保证会员参加自卫队、民兵；
- ②保证会员□□归队；
- ③保证实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
- ④会员要受到两次流动训练班的训练；
- ⑤会员要爱护村会，村会能讨论问题；
- ⑥有健全的村委员会。

3、我们怎样争取这个计划的完成呢？首先我们要进行深入的教育动员，使会员明白模范村的意义及作用、模范村会的条件，发动会员自己起来努力争取。其次要发动革命竞赛，造成竞赛的空气。再次我们要加强村会的领导，深入工作，转变作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争取计划的完[圆]满完成。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青抗先 领导关系的决定

(三月十五日)*

目前边区青抗先工作已获得相当发展，树立不少成绩。但由于未能建立独立系统，与各方面关系不明确，领导上的混乱，对青抗先的独立性、民主性认识不足，缺乏教育与训练等，致使青抗先工作陷入不应有的消沉无力与进步迟缓的状态中。区党委为了改善对青抗先的领导，在领导关系上有如下决定：

甲、明确认识青抗先的性质与任务，建立正确的领导观念

1、青抗先是青年群众自己的不脱离生产的半武装组织，是以工农青年为基础、力求武装全体青年的独立群众组织，因此必须保持与尊重青抗先组织上的独立性与群众性，青抗先工作方能得到很好发展。所以，青抗先有其独立组织系统，可以单独的颁布行文，有自己的关防公章。

2、但同时青抗先是民兵的组成部分，今天又必须是抗日战争任务的担负者，所以在军事的指挥与领导上，执行抗日战争的任务上，应绝对接受抗日政府武装部门的领导，应服从民兵斗争的统一性。当各地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未建立时，青抗先有其独立组织系

*原件无年份。据当年参加过冀鲁豫边区青运工作的同志推断，此件应为1942年的文件。

统，接受武装部门的指挥与领导。在武委会建立的地方，则青抗先各级队部合入武委会，成为武委会的青年武装部。

3、青抗先工作是民兵工作的重要一环，这不只是青年工作部门的工作，而是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所以在人民武装工作中不只注意游击小组与模范班，对青抗先同样予以注意与帮助。

4、青抗先是青救会的组成部分之一，是青年运动中的坚强骨干。为了满足青年的共同要求，加强其领导，各级青抗先一定要接受各级青救会的政治领导。

乙、为了克服过去错误，今后青抗先 与各方关系有以下具体规定

1、青抗先与青救会关系

a、青抗先是青救会一个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受其领导。但青救不是直属上级，青救无权力直接指挥调动青抗先。要切实克服过去包办代替或切断上级队部领导的现象，尤其不应在进行青抗先这一中心工作时放弃对青年全面活动的领导，把青抗先工作独立起来。

b、青救会要领导青抗先积极参加青救会全面活动，满足青年共同要求，解决队员困难；对非会员的队员亦应经过说服教育，吸收他们参加青救以及青年的全面活动。至于青抗先的政治、文化、娱乐工作，更应通过青救进行。因此，要反对在发展青抗先中非青救会员不要的关门现象，及青抗先不参加青年全面活动的单纯军事观点。

c、青抗先要按时向青救会报告工作，参加一定会议，接受青救政治领导；同时，青救亦应按时向其指示工作。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或不团结时，应向各自上级报告解决。

2、青抗先与武装科的关系

a、青抗先在军事上要绝对统一于武装科指挥与领导，但武装科不是直属上级，一定要尊重青抗先的独立性、民主性，不得干预其

组织上的独立性，抹煞青年群众的特殊要求。

b、青抗先是民兵的骨干，青抗先工作计划应服从于武装科在武装工作上的统一计划。青抗先不得强调独立性，与整个武装计划相抵触。武装科亦应重视青抗先工作，把青抗先工作作为自己武装工作的重要部分，及时的给青抗先工作以方针，帮助实现青抗先工作计划。

c、青抗先须按时向武装科报告工作，参加武装科会议。武装科应经常指示、检查青抗先工作。

d、青抗先弹药供给问题应由武装科统一计划，与游击小组同一待遇，尽量解决其困难。

e、青抗先干部的生活供给由武装科负责。

3、各级青抗先干部的住址问题

a、为了统一对敌，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克服青抗先组织上的散漫现象，适应今后严重战斗局面，已经组织起来并建立了青抗先队部的地区，在武委会未建立时，应争取其与武装科靠近活动，共同生活。但这一要求的实现是一个工作过程，不应简单命令从事，要进行充分的动员工作。青教会应动员其接近武装科，武装科应加强其帮助，密切彼此关系，在不引起青抗先队员不满的情况下，达到青抗先与武装科共同行动之目的。目前已住在武装科的青抗先队部，即应仍住在武装科。青教负责动员、说服青抗先干部安心接受武装科的军事指挥与领导，并仍应加强青教对青抗先的政治领导与帮助，密切与青抗先的关系。同时武装科也应转变领导作风，改善领导关系。

b、但估计到某些地区青抗先工作方在开始，青抗先的发展尚须更多依靠青运的开展，这些地区在青教内仍应设立武装体育部，负责开展青抗先工作。青抗先队部难独立成立时，初期仍可与青教体育部一块办公，随着青抗先的发展，求得逐渐建立青抗先的独立组织系统。对这些地区的青抗先工作，武装科仍应加强领导与帮助，解决其困难与供给问题，不应有所例外。

丙、切实树立青抗先系统工作， 打破目前消沉、混乱现象

1、树立青抗先独立组织系统，严密组织，加强领导，是活跃青抗先工作的重要关键。故除青抗先要配适当干部作青抗先工作、建立青抗先系统外，各级武装科亦应负责适当配备干部。

2、青抗先的组织路线仍是大量发展，但在有相当基础的地区，亦应加强教育训练工作，从巩固中求得发展。提高现有干部质量，是巩固、活跃已有青抗先的重要保证。

3、青抗先切实要执行总队部规定制度，树立各级队部独立工作，充实工作内容，深入下层，严整组织。

4、树立青抗先特殊作风，除队风、队礼、队歌、队旗逐渐实行外，要创造一套青年化的活动方式、工作方式，以活跃队员、干部的情绪。

各级党委接到此指示后，即负责解决关于青抗先各种问题并改善对青抗先的领导。

冀鲁豫区党委青年运动委员会

关于迎接华北青运统一

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各级党委转各级青委：

一、北局青委决定今年8月成立华北青联筹备会，并召开党的青年工作会议。其主要任务与目的是总结抗战来华北青运经验，确定今后青运发展方向，准备统一华北青运，依靠华北青年团结统一之模范精神，积极推动全国青年之团结统一。我们边区亦准备派3至5个代表参加盛会。目前即须加强具体实际的准备，以实际工作的成功来迎接大会的开幕。

二、为了能更确实完成准备任务，我们要求各级青委认真进行下列工作：

(一)贯彻1942年的工作计划与精神，以1、发展1万个坚强战斗的青抗先；2、完成1500个有工作内容的村青救；3、胜利的民主改造各级青救组织；4、完成两个与4个村的调查，作大会的献礼。

(二)要根据边区青联制定的《统一华北青运宣传提纲》，经常有计划的通过“五四”等各种机会，运用各种力量，采取各种方式，联系自己工作，在组织中进行不厌倦的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全体干部、队员、会员深刻了解统一华北青运的实际意义，主要是求得各地工作深入平衡发展，推动与深入本身工作，展开对敌尖锐斗争，活跃会员生活，鼓舞干部情绪，教育广大群众，并非求得简单的形式化或一时的热闹。

(三)实际的迎接大会，还必须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与总结工

作的巨大工程。望各地同志根据青联制定的调查提纲、总结提纲，有计划的抓紧每一个时间，对一定地区（特别是接敌区、敌占区或基本区），对一定问题（干部、文教、抗先、武装、儿童、对敌斗争等）作出调查与总结，随时寄来区青委。5月底前各级青委须彻底的详细的完成这件工作。

三、各级青委要通过这一工作来正确认识下层问题，转变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以实际工作祝贺这次会议的成功。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
关于边区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

(一九四二年八月)

第一、对边区青年运动的认识

边区青年运动发展的现状进入极不平衡的状态，许多不同类型的地区中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就是在同一性质的地区内，县与县，区与区，甚至村与村之间亦有显著差别。特别在两边区合并后，群众运动与青年运动的发展，更有其特殊不同。

边区工作这种发展的差异性，使我们工作布置、领导方针、一个运动、一个号召不能同样贯彻，齐一步骤，统一行动。过去我们没有掌握了这个特点，空想造成全区青年运动的大热潮大运动，因此流产了，碰了壁，这是第一。

第二，边区青运发展较晚，基础还薄弱时，就遭受了敌人、叛军的打击和摧残；更由于在青运每个阶段的工作环节犯了某些缺点与错误，造成了我们工作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边区青运3年来并未充分发挥对敌斗争应有作用，敌人“蚕食”开始时，在我们麻痹情况下，造成青运有基础地区退出、垮台和大部青救消沉的严重现象。目前由于敌人对华北进攻的方向是由西到东，由北到南，再加上边区在华北所处的战略地位及敌人统治较薄弱，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也就迟缓（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夕），使目前青运有可能利用这一空隙时间，我们就应该迅速紧张的抓紧这空隙时间开展工作。这

*本文系边区青联8月决议。边区抗联于9月通过，并通知各抗联分会根据这个决议和当地具体情况布置工作。

种发展趋势，使我们不能搬运其他先进根据地青运的一般发展规律，机械争吵什么“巩固”为主“发展”为主的问题，而应按边区环境，工作复杂性、不平衡性等具体情况，提出不同工作方针和方法方式，而又必须抓紧敌我斗争变化的时间性来改变方针。

第三，两个地区（老冀鲁豫和鲁西）青运发展表现着显著的两个特征、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冀鲁西区：强调了青年组织的独立性、特殊性，超过了一般群众运动而畸形发展，造成了突出孤立与“先锋主义”不良倾向。

（二）冀鲁豫区：强调了群众运动的统一性、一般性而取消了青年运动独立性，犯了限制青年运动发展的错误。

两个地区合并以后一般趋势，又一致的强调了青年运动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同时青运脱离了政治任务，又没有掌握住边区工作特点，也未掌握住根据地群运只有农运得到发展，青运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只有一般农民生活得到改善，青年生活才能得到改善的规律，而片面的强调青年特殊痛苦的解决，片面“活跃”“先锋”求得青年群众的发动，使这种畸形的群众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使青运陷入了消沉停顿状态，并将由局部进入全部消沉状态中，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第四，青年统战的组织成份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在边区青运中开始发展时，只组织了一部先进知识青年，以“民先”为主体的所谓青运的“黄金时代”，是关门主义的青运阶段。1940年提出“深入工作，创造以广大工农青年为基础的青年运动”后，青年干部又抛弃了组织知识青年。长期埋头于下层工农青年工作，极端的发展，又使青年运动转向了第二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目前青运阶段）。特征是：（一）地主子弟、知识青年关在门外；（二）真正贫苦青年、雇工佃户青年未被发展起来；（三）青救组织80%以上是一般的中农、贫农成份，形成青年运动广泛的统战未开展，而工农青年亦未占有确定的优势的畸形状态。

第五，青运表现宗派关门的原因和边区青年干部的质量特点是不能分开的。

边区青年干部75%（今年2月统计）是中农小知识分子（高小程度者），工农干部全地区仅15名。这些成份的主要特点是斗争的坚持性和彻底经常性不够，社会经验贫乏，不关心农村青年痛苦，造成一方面脱离广大工农青年现象，另一方面则清高的脱离了农村知识分子，甚至以鄙视的宗派主义态度排斥他们；就是在少数的先进群众中也未生根，只是站在群众头上的“工作员”，以致环境艰苦时情绪低落，甚至悲观失望。

第六，这些小知识分子的特色，反映在领导上的显著特征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空谈主义。整天在领导机关空谈，发指示，闹配合，闹特殊，闹独立，闹本位，闹不团结，高谈“□□”“发展”“巩固”等名词，对实际工作则漠不关心，因此使边区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种空谈主义与官僚主义实质上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上面6个问题，也说明边区目前青运的大缺点和力量薄弱的状况，在边区敌我斗争形势处于重大变化，暴风雨的前夜时，我们应抓紧有利时机，工作“老一套”的领导应当打碎，必须创造边区青运发展的新道路。

第二、目前边区青运任务

一、“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改善青年生活，发动与武装青年，开展游击战争”，是边区青运总方针，和边区党政军民的总方针“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一致的。具体的讲，这个方针包括改善青年生活和发动组织青年参加武装斗争两个基本内容。但是在这里必须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向，只注意工农基本群众的发动，忽略了或违背了青年统战的原则。因此在根据地执行这一方针，就必须明确的分为三个具体任务：（一）改善青年生活；（二）发展巩固青抗先；（三）团结知识青年、地主富农子

弟。三个问题如何联系，究竟如何执行呢？

(一) 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改善青年生活

这个口号的本身就是说，从一般民主民生运动整个农民生活改善中求得青年特殊痛苦的解决、生活的改善。这就是要发动青年和农民坚决执行土地政策，坚决执行减租减息，反贪污，清理村财政与改造村政权的群众运动。

怎样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怎样求得青年特殊痛苦解决呢？

1、我们认识，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青年农民生活也就得到了基本上的解决，因此，对民主民生运动我们应发动青年积极参加。因为青年社会地位低下，社会经验缺乏，由于民生斗争是一种农民和地主（减租减息）、工人和雇主（工资）的斗争，而青救本身是各阶级各阶层全体青年性的统战团体（这是和农会、工会不同的），它不但要照顾工农青年利益，同时也得顾及团结地主富农子弟，因此在斗争上一般应以农会为主，青救配合动员工农青年参加，而优秀会员、干部与有独立经济地位的青年，应亲身领导，成为民生运动的主力。同时应争取与教育地主富农子弟同情与帮助这些工作。我们的口号是：“青年应成为执行法令的模范！”

民主斗争是全体性青年的要求，如反贪污，改造村政权，反恶霸，反不平事件等，青年应成为这些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成为斗争的骨干与先锋。至于全体性的民主要求，如合作社赈济，青年也应积极参加。

关于民主民生政策、斗争策略、工作方式与步骤，我们要向农会学习，要与农会齐一步骤去作，不可幼稚、突出与漠不关心，要坚决克服右倾与今后可能发生的“左”的行动，以达到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改善青年农民生活，发动工农青年参加抗战的目的。

2、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提高青年斗争情绪，求得青年特殊痛苦的解决，这第一个重要前提，是深入的调查研究与了解发现青年的细小痛苦的要求。青年目前的痛苦，最明显的是家庭束缚学习要求，政治地位低下，□□繁重，早婚与过□劳动问题（参看两对青年生

活的调查)。但这些要求是复杂的多样的,个人与个人的不同,各阶级的不同,知识与劳动、富有与贫苦青年不同,各地区的不同。因此我们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本质,想出解决的办法。

解决青年痛苦要能掌握住当时政治条件、政府的法令原则和群众的要求三个条件,也就是要根据当时环境,遵照政府法令(并可加以发挥),为广大群众有利与同情的三个原则,同时要与其他团体配合与发扬民主。

具体的方案与具体改善的方法方式,应根据有关青年利益的法令去执行。应在不断的斗争中去创造与积累经验,一般的应注意青年统战与家庭和睦,利用和平的说服调解与必要的对坏分子(人民痛恨者)打击来达到目的。

的确这一工作的开始很困难,因青年群众觉悟程度低,有怕事心理,因封建思想的束缚与风俗习惯的传统,青年常常提不出要求,我们干部亦随之而说“青年没有痛苦”,或者只知道青年的唯一要求就只是手榴弹。我们应提出:说青年没有痛苦的人是官僚主义者,现有问题不能解决是不下决心解决;中心问题在于我们青年干部对这一个改善青年生活工作有没有下苦功夫。

(二) 关于发展巩固青抗先问题

青抗先是否是中心工作?民主民生和青抗先究竟哪个工作为主?这就必须了解青抗先工作所以陷于停顿消沉、部分垮台的原因,除干部少、关系不明确、恐青救包办等外,基本原因由于青年生活没得到改善与广大基本工农青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青年受着多方面的束缚,不能发挥其积极性。所以青抗先工作脱离了群众要求,硬成为中心工作,是不妥当的。我们应按具体情况执行,可分轻重迟缓〔缓急〕。

在根据地一般应以民主民生工作为主,从民主民生运动中抓紧一切机会开展与巩固青抗先。但在接敌区对敌斗争尖锐地带,青年武装要求迫切或实际已在无组织的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应首先积极建立联防,已有联防地区,又须紧接着开展民主民生工作,树立民

兵骨干，以充实巩固联防与联防内的青抗先工作，发挥青年在联防斗争中的突击先锋作用。

我们干部必须学会掌握这一方针。我们要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抓紧一切有利机会建立青抗先组织。8月份，县县青救学会了这一方针，在□□减租运动中发展的抗先数目，相等〔当于〕过去一年的十倍，特别的完成了计划，充分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这里我们必须纠正过去青救、武装科双方宗派本位的观点，统一青抗先发展道路的认识，一致扶植领导青抗先的发展，包办、忽视都是不对的。

至于抗先工作其他更多问题，一般的可执行过去抗先的指示与参照下面各项进行。

（三）团结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包括两部分，小学教员、学校学生（中学、高小）及失散在农村的广大知识青年。这些是青年运动中主流之一，过去是被我们严重的忽视，关在门外的，在目前争取与团结知识青年的意义在于开展青年统战，团结青年一代，使之成为开展接敌区、敌占区工作的桥梁，推进农村国民教育、青年教育的第一助手。

1、团结农村知识青年

广大知识青年失散在农村，由于：①根据地群众工作基础尚弱时，就受到敌人摧残、打击而沦陷为敌占区。②有大部分地区与敌军交接，或由于顽固反共，对知识青年争夺的积极，更由于我们忽视，乃使部分知识分子为顽固思想所蒙蔽，对我们怀疑、恐慌，主张什么“南来北来都应付，老老实实做好人”的等待时机观点。③中小知识青年受家庭的束缚，参加了劳动。④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宗派主义，对他们的排斥与忽视。就是做了一点，也是和王农青年一样看待，开些无意义的会议讲八股，很难适合他们的口味。

成千成万的知识青年长期在农村，5年来，在敌我与反共派三方面争夺下是起了一些变化。一部分参加了抗战，一部分参加了劳动或上私塾，所谓不多事的好人，一部分则逐渐流氓化或参加三青

团,受了顽固反共派思想的影响.但在一般的讲,在思想上的特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个别被汉奸利用者除外),部分受了顽固反共派和封建思想的蒙蔽,思想极不稳定,大部虽同情抗战,却等待时机而积极性不高.对争取团结青年知识分子,我们仅根据某些地区经验提出以下意见:

(1) 我们开始这一工作,首先选择些有很多的同学关系者,对有威信的学生展开拜访联络交朋友工作,或号召学校学生会开展互助失学青年学习工作,先组织少数先进同学,号召他们发展组织,再扩大组织.这里须特别注意团结知识青年,要从满足学习要求做起,再解决其各种困难,同时应注意他们前途教育,说明国共两党长期合作问题,根据其怀疑心理坚定其抗战意志.

(2) 组织形式应根据下列三个原则:①知识青年根据自己要求而自动结合;②顾及到他们的特殊地位与特性;③注意防止其宗派主义脱离工农群众.

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可采用以下各种形式:

个别的可聘为村青教指导员、青教宣传员、青年文化教员或文化娱乐委员等团结他们.

集体的组织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应按他们的要求结合,如泰西的珠算会,鄄城同学抗日救国会,□区的读书会,寿、范、朝、阳边的青年农余学社等,还可以用冀鲁豫日报读书会、写作小组、冬学文化教育组及其他形式去组织团结他们.这些小组或团体受村青教或县区青教领导,但需发挥其活动的特殊性.

较大知识分子,可聘为青教顾问或总会分会直属会员.

(3) 知识青年组织的任务,一是自身学习修养,二是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三是和工农青年一齐参加抗战工作.这三个任务执行,在开始组织时,应强调其自身学习重于本身利益,再逐渐提高和工农青年的接近,开展青年文化活动,担负村青教文化教育工作,管理俱乐部,进行冬学教育,以逐步提到对敌斗争的更大任务.

2、团结小学教员

这项工作过去是空谈，现应从头作起。我们须了解边区部分小学教员的落后性（如“安生”“发财”的思想），因此：①第一步，是得将青救和文教科的互助条例及行署青联对青救、文教科、儿童团、小学教员的关系决定，在教员中深刻传达，为他们所深刻认识。②可聘请他们为青救指导员（隆重的发给聘书）。此外，我们的干部可通过教育科，用教育科的名义检查帮助小学教育，或密切与各县教联联系，互相帮助工作。③特别应注意动员儿童上学，照顾解决他们在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的困难，使青救逐渐成为开展国民教育的第一助手。

3、学生会的工作

最近学运有些发展，个别学校开展了对不合理事件的斗争。这种民主精神与保卫学生利益的行动应高度发扬。目前学运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学风，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展开更多的社会活动。此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学运应求得统一”，鲁西北运西分会首先应成立学联分会，其他地区亦须加强对学教领导。

以上三件工作一定要和文教科、文联、教联取得配合。我们在掌握上，学生工作应确定县级以上机关负责，下层干部要注意普遍的团结知识分子，并有重点团结小学教员，防止“抓一把”与平均使用力量。

团结知识分子工作在开始时遇着两个困难，也是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青救与三青团的团结问题。争取与团结三青团大多数团结抗战，是青年运动的既定方针，因此我们对三青团应慎重调查，分别其内部抗日分子和反动分子，以分别进行工作。对大多数三青团〔员〕应帮助其学习进步，推动他们参加青年团体，或组织其他青年团体，或公开活动，互相帮助，一同抗战。对其反动顽固青年，对破坏抗战的特务，一方面抓紧其事实与证据，在广大青年中揭露、开展斗争。在知识青年中应有计划的教育，消除他们怀疑心理，达到团结抗战目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青年干部的宗派主义严重的存在，成为团结知识青年的最大困难之一。我们应在整风浪潮中与宗派主义开火，彻底将它肃清。

二、根据边区总方针，在接敌区、游击根据地的方针，是从切实保护青年切身利益，反对敌人残害青年的各种斗争中，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其具体任务是：

(一) 切实保护青年切身利益，团结广大青年。敌人对青年的残害是十分毒辣的，假如不认真保护青年切身利益，则根本不能达到团结、组织、武装广大青年的目的。因此必须根据敌人对青年迫害的花样（抓丁、抽丁、劳役、奸淫等），以及敌人给予青年的家属亲属的各种压迫等，在不同地区灵活展开合法、非法、和平、武装的各种斗争，减轻敌人对青年的迫害，减少对敌负担。

(二) 组织青年积极参加群众性游击战争。在游击根据地、我占优势接敌区，我们应动员青年参加与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统治薄弱区与劣势接敌区，亦必须进行荫蔽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小组，发挥青年在斗争中的骨干作用。

(三) 加强青年政治文化教育与进行尖锐的思想斗争，配合政治攻势进行“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教育，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提高胜利信心。

执行以上三个任务时，在开始须先注意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以团结广大青年，恢复青年情绪，再逐渐提高到群众武装斗争，并随时贯穿对敌政治斗争与深入青年教育。根据此方针与任务，在组织形式与领导上应求得适当改进，并随时准备恶劣环境到来时的及时转变，减少不必要损失。

1、在能公开活动地区，组织村抗联统一领导各教，划分工农青妇小组，或按街道分组，或不划小组，并可组织各种灰色组织补助之。但须注意适当的发挥青年特殊系统工作。

2、不能公开活动地区，采取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公开的和秘密的应划分清楚，避免遭受摧残。主要的还是

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开展敌伪青年团体中工作。于必要时，可组织抗日非法组织，但力求短小精干。

3、随时准备环境恶转，由公开活动转为秘密。因此我们要注意群众思想，动员准备职业干部，转变村会组织形式。在开始首先转变活动方式，隐蔽的对敌斗争。当敌人已不注意时，我们应即时根据群众要求自下而上的组织各种有内容的，经济、学习、政治、职业的灰色组织，并掌握本村迷信落后团体，大量求得转变。当敌人进一步控制，强制组织自卫团、新民会、青年团，抓青年训练时，我们应有计划的打入掌握，争取长期隐蔽与合法地位。这里干部及组织不易领导时（成为敌占区时），可适当处理之。

4、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是我对敌斗争的总任务。我们必须有组织的发挥青年武装斗争作用。在能公开活动地区，仍建立青抗先，但在领导上与武装科统一进行。村级和模范班须取得一致行动，统一组织，共同选举一人统一领导。同时，这些地区发展民兵时，可根据青年觉悟程度与青年要求，适用多种多样形式武装青年。为准备坚持残酷斗争，在民兵内应建立秘密游击小组，并加强与自卫队团结，防止突出孤立。在敌统治薄弱区和我们占劣势接敌区，应转变和组织游击小组，开展隐蔽的武装斗争。

5、在干部领导上，从村到县组织抗联统一领导。早些准备秘密干部，求得职业化。在平时教育他学会斗争方式，密切其与广大青年的联系。在环境恶转时，公开干部应调整隐蔽，红的干部必要时应抽出工作。同时应强调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密切联系（因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保证干部坚持斗争的首要办法）。至于灰色组织要由职业干部负责，不可和公开〔组织〕混乱。县与区，区与村，领导机关与职业干部间应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加强及时领导，抓紧有利时机对敌斗争。

在领导上的分离和干部不团结的现象应最后肃清，这是坚持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工作重要保证之一。

第三、转变领导与整顿“四风”

最后实现问题还是决定于干部和领导问题。我们目前转变领导基本问题，还是在于实际深入工作，转变作风。这个口号在1940年就提出，但转变迟缓，拖延直到今天收获不多，其原因首先由于空谈主义、官僚主义。现在为实现转变领导提出两个实际问题。

一、确实深入工作。过去空谈深入而无人深入，现在我们要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是头大脚轻，现在我们要彻底简政，充实县区级。过去我们各团体本位、分离，浪费力量，现在我们实现统一领导。为迎接严重形势的到来，实现这一口号，我们就必须在领导上求得彻底改革。最近各救总会决定组织抗联，我们青年干部要拥护执行这一决定，做深入工作的模范。某些同志强调独立，不满意这统一，对青运悲观失望，不安心工作，是不对的。我们为了统一而放松了青年工作，也是错误。反之，我们了解这次决定的真正精神，正是为了更有力的开展青年运动。我们要坚持青年工作岗位，正确掌握青运的统一性、独立性，提高每个干部的工作效率，保证青运在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与加强农民运动中得到转变与开展。

二、领导转变的中心问题，是彻底转变“四风”。我们青年干部应根据群众运动的整风计划去执行。整风在边区青年运动中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和作用的。边区青运是在进步力量占优势的农村，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搭架子的方式发展的，没有真实内容。全体青年干部是知识青年新干部，对下层实际情况了解极差，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亦不大懂得，故在工作上最易产生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知要求青年抗战，不解决青年痛苦；只主观想象，空洞的发号施令而不注意各方面的条件，周密考虑各地不平衡的特点；只满足组织少数青年而不善于团结广大青年；只知空喊组织独立、特殊而不知道和別人配合工作；总是老一套而不灌输新的实际内容；宁愿先进分子包办，不愿充分发挥民主群众作风！

以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坚决肃清这三股阴风。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一、为了迎接今后边区残酷斗争局面，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紧缩各级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克服头大脚轻现象，并将群众团体中之大批有力干部派到下层去，加强下层领导，切实的深入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及为了群众团体统一使用力量，实现目前党的总方针，“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区党委特决定将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合并为各级抗联（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

二、各级抗联的组织与职权，规定如下：

甲、组织

1、县以上工、农、青、妇合并为抗联后，取消独立领导系统，由各级各教会原有之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

2、县以上各级抗联执行委员会，可选举（在战争环境下亦可由上级抗联指定）各级抗联常委会，总抗联常委5人，各专区抗联3人至5人，各县抗联3人至5人。

3、县以下区村组织，可分为两种情形：在游击根据地与接敌区，区村级亦组织抗联；在根据地的基本区，区村级不组织抗联，各教仍树立独立组织系统，归县抗联统一领导。

4、县以上抗联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和秘书处，游击根据地与接敌区之区村抗联设组织、宣传、妇女、青年各委员，不设秘书处。

乙、职权

1、组织各级抗联后，过去工、农、青、妇各教会的全部工作，归各级抗联统一领导，各级执委或常委讨论各种工作（统一的和特殊的）时，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最后决定，原来各教执委或常委无任何最后决定权。

2、为了尽量发挥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的特殊性，县以上各级抗联常委会可召集青年执委或妇女执委的单独会议，其决议由各级常委会负责执行。（日一具总第二四六—）

3、组织各级抗联后，工、农、青、妇的所有干部，统归各级组织部管理与调动。但调动青年干部与妇女干部时，必须征求各级青年部与妇女部的同意。如有不同意见，由常委会作最后决定。在未组织区村抗联的地方，各教会的工作仍归区村各教会单独讨论与决定。在组织区村抗联之始，为了保持各教会的原有工作，为了发挥青年与妇女工作的特殊性，原有各教会干部仍尽量作各教工作，不要长期使用，但在环境恶劣条件下例外。

5、各级抗联设青年部与妇女部，是为了经常掌握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研究与积累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的经验，所有关于青年与妇女的组织、宣教工作归各级抗联组织部、宣传部掌握。

三、各级各教会合并为抗联后，在干部中可能发生一些不正确的了解，在工作上也可能发生一些偏向，宜事前注意克服。合并为抗联后，大批的干部被派到下层去，可能有些干部认为是降级，发现虚荣心和地位观念。我们要事前在党员与非党干部中作深入的动员工作，教育党员和非党干部认识到深入下层是最实际的工作。

四、合并为抗联后，有些干部（党员与非党员）认为是取消了工农青妇各教会。这种了解与认识，是不正确的。组织抗联，并不是取消各教会，是各教会的合并与统一领导。这种统一领导，可以节省干部，在工作效率上，也是肯定会加强的。同时，大批强有力的干部被派到下层坚持工作，独当一面，上级领导机关将更有更多的

时间去考虑问题，研究问题，使领导更行加强。

3、在今后工作中，可能强调农民工作的一般性，而忽视了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的特殊性，也有可能原来各教会干部仍强调各教会特殊性的工作，而使一般任务落空。这些偏向，都会给将来的群众工作很大的危害。在今后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上，要切实注意克服这两种偏向。

4、在紧缩群众团体领导机关与好的群众工作干部到下层去的号召下，可能过于削弱各级领导机关，使各级领导机关不能实现自己的正规领导。这个偏向，也值得我们严格的注意。

四、关于各级抗联的组织大纲、工作条例和其他重要问题，由总抗联讨论与决定。各级党接到这一决定后，应提到各级民委会和各级各教会党团详细讨论，并保证彻底执行。

冀鲁豫边区各级工农青妇 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组织大纲

(一九四二年九月)

第一章 总 则

(一) 依据边区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及工作上的需要，将边区各级工人抗日救国会、各级农民抗日救国会、各级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各级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教会）合并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抗联）。

(二) 各级抗联之名称为：

(1) 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总会联合会（简称边区抗联）；

(2) 冀鲁豫边区第××专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专区抗联）；

(3) 冀鲁豫边区××县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县抗联）；

(4) ××县第×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区抗联）；

(5) ××县××村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村抗联）。

(三) 各级抗联成立后，即取消各级各教会之独立领导系统，过去各级各教会之全部工作，归各级抗联统一掌握与领导，但在必要时，仍可用各教会之原来名义对外。

(四) 各级抗联成立后，除在根据地之基本区，各教会之区村组织仍保持独立领导系统，允其使用原来之各种戳记外，各级各教会

之各种戳记，一律作废，并依照边区抗联所拟定之各种戳记式样和名称全文，制定新的戳记。

(五) 各级抗联之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机关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村抗联由会员大会选举)，但在战争日益频繁，敌我斗争局面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可由上级领导机关指定。

第二章 组 织

(甲)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组织

(六)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执行委员会，由各级各教会原有之执行委员合组而成。

(七) 为了发挥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之特殊性，县以上各级抗联仍保留原有之青救执行委员会与妇救执行委员会。

(八) 县以上各级抗联常务委员会之人数规定如下：

(1) 边区抗联5人；

(2) 专区抗联3人至5人；

(3) 县抗联3人至5人(游击根据地与接敌区只限3人)。

(九) 县以上各级抗联设主任1人(必要时设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青年、妇女4部与秘书处。各部长由各级常委兼任，如常委不足分配，可兼职。秘书处之秘书长(或秘书)由适当干部担任之。

(十) 边区抗联之各部可设干事2人；专区抗联如工作需要，可设干事1人至2人，但须经边区抗联批准；县抗联不许设干事。

(乙) 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之区村组织

(十一) 在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各区村原有之各教会组织合并为区村抗联。

(十二) 区抗联之执行委员会，由原有各教会之执行委员合组而成，如无各教会组织之新开辟地区或恢复工作地区建立区抗联

时，执行委员至少3人，区抗联之脱离生产的委员，不得超过7人，从长期着眼，应尽量职业化。

(十三) 区抗联可设常务委员3人，内部分工为主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青年委员与妇女委员，由3人分别担任。

(十四) 村抗联设委员3人至5人，内部分工为主任1人，组织、宣传、青年与妇女委员各1人。如人数不足时，可根据工作情形减去一种或两种委员。

(十五) 村抗联以下之组织形式，根据环境好坏，分为下列三种：

(1) 如环境许可，则设雇工小组、农民小组、青年小组与妇女小组，如村内有手工业工人，亦可设手工业工人小组；

(2) 如环境恶劣，则根据街道划分小组；

(3) 如环境更恶劣，则不划分小组。

(十六) 为了迎接更残酷的环境，及时转变组织形式，村抗联与各种灰色组织同时存在，经过村抗联掌握与领导各种灰色组织。

(十七) 在环境恶劣不能公开或半公开组织村抗联时，则组织灰色团体，此种灰色团体之领导方式另定之。

(丙) 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村组织

(十八) 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村，仍建立各教会之独立组织与领导系统，以发挥各教会工作之特殊性与独立性，使各教会工作迅速发展起来。

(十九) 各教区会组织如下：

(1) 各教区会之委员会，由各教区代表大会选举3至9人组织之。

(2) 各教区会之脱离生产的委员，农会不得超过3人，青教会不得超过2人（青抗先除外），妇教会不得超过2人，但在特殊条件下（如开始工作或集中力量突击工作）可临时酌量增加。

(3) 各教区会除脱离生产的委员外，另设不脱离生产的委

员。

(4) 各救区会除设主任1人外(必要时设副主任),不另行分工。

(5) 区儿童团不设立脱离生产的委员,归青教会领导。

(二十)为负责执行县抗联之一般决议,掌握统一性的工作与统一使用力量,在根据地基本区除建立各救区会外,可组织区抗联。

(二十一)区抗联由各救区会主任组织之,区抗联设主任1人、组织委员1人、宣传委员1人。

(二十二)各救村会之组织如下:

(1)各救村会设委员3人至5人,皆不脱离生产,由各救会员大会选举之。

(2)农救村会设主任1人,组织、宣传、雇工与生活改善委员各1人。

(3)青救村会设主任1人,组织、文教、儿童与军事体育委员各1人。军事体育委员由青抗先队长兼任。

(4)妇救村会设主任1人,宣传、组织与生活改善委员各1人。

(5)为了加强配合工作,可组织各救干部联席会,主席一般由农会主任兼任。

(丁)工会与农会之关系

(二十三)各级抗联组织后,原有之各级工会与农会干部统一使用,每个干部都负担两重任务,做农会工作,同时做工会工作。

(二十四)在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村组织,工会与农会实行合并,取消工会名义,原有干部统一使用。

(二十五)为了开展公私企业工会工作,在专区以上各级抗联必要时设专人负责。

(二十六)各县之手工业工人,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村农会。在

村农会下设手工业工人小组。如一个地区手工业工人较多，同时可组织某种手工业工人（如铁匠、木匠等）抗日救国会，参加县抗联或区农会为团体会员。

（二十七）各县之盐民，基本上是农民，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村农会。如一个地区较多时，同时亦可组织盐民抗日救国会，参加县抗联或区农会为团体会员。

（戊）团体会员与青抗先

（二十八）各教会合并为各级抗联后，原来各教会之团体会员即成为各级抗联之团体会员。

（二十九）县以上之青抗先队部，受同级抗联之政治领导，其工作由各级青年部掌握。

（三十）在根据地基本区，因青教会仍保持区村级的独立领导系统，青抗先受青教会之政治领导。在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因青教会无独立领导系统，青抗先又与模范班统一领导，其领导关系另行规定。

（己）各级秘书处之编制

（三十一）边区抗联设秘书长1人，会计1人，事务1人，文书兼收发1人，交通员4人至6人，油印科5人。

（三十二）专区抗联设秘书〔长〕1人，会计1人，油印员1人，交通员2人至4人。

（三十三）县抗联设秘书长1人，交通员2人至3人。

（三十四）各级抗联之交通员，可以与同级政府交通班合并，合并后，可再行减少。

第三章 职 权

（三十五）县以上各级抗联之执行委员会，为各级抗联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之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如下：

- (1) 决定该地区群众运动之总的任务与方针；
- (2) 负责执行代表大会之一切决议；
- (3) 选举与罢免常务委员；
- (4) 决议召开代表大会。

(三十六)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常务委员会，为各级抗联闭会期间之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如下：

- (1) 负责执行执委会之一切决议与青救执委会、妇救执委会之一切决议；
- (2) 负责执行上级的指示与决定；
- (3) 负责领导一切日常工作；
- (4) 负责检查下级工作；
- (5) 掌握与使用干部，并决定干部之任免；
- (6) 决议召开执行委员会、青救执委会与妇救执委会。

(三十七)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青救执委会与妇救执委会，由常委会决议召开，其职权如下：

- (1) 决定该区之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之总的任务与方针；
- (2) 研究与总结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之经验教训；
- (3) 负责研究与讨论上级抗联关于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指示与决定。

(三十八) 在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抗联因与各救区会同时存在，其职权较县以上各级抗联为小，其职权如下：

- (1) 负责执行与传达县抗联之一切指示与决议；
- (2) 决定该区一般工作的计划；
- (3) 掌握各救区会之统一性的工作；
- (4) 统一分配与使用各救会的干部；
- (5) 负责总结该区之全面群众工作。

(三十九) 在根据地之基本区，因有专区抗联存在，各救区会之职权规定如下：

- (1) 负责执行县抗联关于该县救会工作之特殊指示与决议；

(2) 负责执行区抗联的一般决议与计划；
(3) 决定该救会之工作计划，但不得违反区抗联之决议和计划；

(4) 调动与使用干部，但须经区抗联同意；

(5) 决定下级干部的任免；

(6) 有向区抗联汇报工作之义务；

(7) 负责执行该救区代表大会之一切决议。

(四十) 在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之区抗联，因为各救区会存在，其职权比基本区之区抗联为大；

(1) 负责执行县抗联之一切指示与决定；

(2) 负责执行区抗联代表大会之一切决议；

(3) 决定工作任务与计划；

(4) 决定干部调动与使用；

(5) 决定召开区抗联代表大会。

(四十一) 村各救干部联席会之职权如下：

(1) 统一全村工作步骤与计划；

(2) 解决统一性的实际问题；

(3) 召开全村会员大会。

第四章 会 议

(四十二) 各级抗联之代表大会与各救区会之代表大会，如环境应许，工作需要，经上级抗联批准即决定召开。

(四十三) 各级抗联执行委员会之召开日期，规定如下：

(1) 边区抗联执委会，每年开会一次；

(2) 专区抗联执委会，每半年开会一次；

(3) 县抗联执委会，每两个月开会一次；

(4) 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之区抗联执委会，每月开会一次，如环境不应许，即延期召开；

(5) 根据地基本区之各救区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

(四十四)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青救执委会与妇救执委会为不定会议，必要时即召开。

(四十五)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常务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抗联会与接敌区、游击根据地之区抗联常务委员会，每半个月至少开会一次。

(四十六) 村抗联与各救村会，每10天开会一次。

第五章 附 则

(四十七) 本组织大纲，由边区各救总会之常委联席会通过施行。

(四十八) 本组织大纲有未尽事宜，由边区抗联常委会修改之。

边区抗联关于 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九月)

(一)十个月以来，我边区大部分地区农民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广大的农民在民主民生斗争中已获得实际利益，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得到某种程度的提高和改善，这是与边区妇女利益紧密联系着的。从妇女与农民家庭经济利益的一致性来看，随着农民生活的改善，妇女的生活亦相继得到某些保证，这是开展妇女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在部分地区如灾区，在号召妇女参加生产的实际工作中，也团结了多数妇女群众，博得了社会人士的同情与帮助。这都是我们工作中的收获，是我们干部深入群众，埋头苦干的成绩。但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偏见和主观力量的不足，大大限制了妇女工作的开展，甚至有些地区根本不作妇女工作。这表现在：以农会为主，就放弃了妇女工作，“只作农会工作，不作妇女工作”，认为“农民发动起来后，再发动妇女不晚”，或“巩固农民会时再提妇女工作”，强调干部不够分配，就忽视和忘记了妇女工作；或有的地区即便作一些，也多是站在利用妇女群众的观点上，未进行组织和教育等，因此大部分地区造成了妇女工作完全停止的状态，新生力量既未组织，旧有力量也趋向垮台。这二种认识上的错误，造成了工作中严重损失，应提起我们高度注意与深刻反省的。

(二)今后妇女工作方针是：“在发动农民的基础上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从生产中加强妇女教育，提倡家庭和睦，改善妇女生活”。应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分别布置：

甲、在农民基本上已发动起来，农民政治觉悟已初步提高，妇

女也有某种程度的发动，妇女所受封建束缚在群众自觉的程度上已有了某些改变，应动员妇女大量参加生产，进一步组织妇女文化工作，如建立识字班，唱歌，加强妇女教育，大量吸收青年妇女参加组织。

乙、在农民已初步发动起来，农民痛苦部分解除，但政治认识还低，妇女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或妇女一度发动过，妇女组织形式上建立，应继续发动妇女，解决妇女问题，与参加与援助农民斗争。同时要抓紧斗争火候，根据群众要求，号召妇女大量参加生产，从生产与斗争中整顿原有组织。

丙、农民开始或尚未发动的村庄，应动员妇女参加农民斗争，解决妇女问题，启发妇女觉悟，进一步从生产上号召组织团结广大妇女。

丁、在接敌区、游击区主要是对敌斗争，减轻对敌的负担，应动员妇女配合，并提出家庭和睦口号，调解家庭纠纷。按情形不同，亦可组织生产。

（三）几个具体问题

甲、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问题

1、各地区主要以组织纺织生产为主，鞋袜编织、草帽鞭〔辫〕等则根据当地情形组织。至于农业生产，则带有季节性的，于麦收秋收时号召。

2、生产方式。开始组织时原则采用个别生产方式，根据妇女的觉悟及要求，有重点的创造集体生产方式，鼓励妇女生产。如：有的纺，有的织，“个别纺，集体织”，“共同纺织”等。在生产中要注意纠正妇女自私、偷、滑、懒等不良现象，加强妇女团结，增进生产效能，提高生产情绪。

3、贷款（贷棉）与自由集资。过去各地区生产工作，差不多绝大部分是由贷款（或贷棉）——公家的，与分配斗争果实的一部分——刺激起来的，今后应力求转向以自由集资为主，防止不经贷款即不能组织妇女生产的偏向。但目前经过斗争和继续领导斗争的

村，仍应提出斗争果实之一部做为妇女生产贷款之用，同时贷款或贷棉时要按其生活程度不同，分别等次，贷给穷苦妇女，并及时检查，防止不生产，吃了，花了及不织卖布的现象。对自由集资的妇女亦应给予实际帮助，由我们统一介绍购买原料及成品推销的地方，加强妇女的团结与彼此间的联结性。

4、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生产小组应成为妇教会的基本组织，可力求与妇救生活小组统一起来。生产小组的划分应根据居住的邻近，感情的融洽，以家为单位，自愿的结合，小组人数最多不超过9人。

生产工作可由生产委员负责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妇女生产，从生产中发现与解决其中困难问题，并在生产进程中发起号召与组织竞赛（如开展览会，小组与小组竞赛），奖励劳动英雄，激发生产热情。同时在生产小组中还可建立一种不定期的会议制度，进行互相批评检查，与有计划的灌输妇女政治教育，克服过去领导上自流放任现象及纠正妇女的单纯经济观点。

5、加强对工商管理局、合作社的配合，互相建立一定的关系，对合作社、工商管理局我们是介绍与保证的关系，纠正过去某些自己经营的事务包办的现象。工商管理局、合作社负责业务上的指导与帮助，如贷款或贷棉，原料的供给，成品的销售，工具的改良。各地干部应主动的取得配合，研究具体办法，以利妇女生产工作的开展。

乙、领导妇女参加群众斗争的问题

1、首先我们干部应从意识上转变过去忽视从斗争中发动妇女的观点，要抓紧每一个斗争环节，只要与妇女有利害关系的每个问题，我们都要去认真的发动她们，如减租、反贪污、查“黑地”、反恶霸、改造村政权等，经过这些斗争去组织与教育妇女，使其了解政府法令。加强穷苦妇女阶级教育，从参加实际活动中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2、在各种斗争中，要善于动员与抓紧□□妇女、孤寡妇女、中

老年妇女及积极分子家属，以她们为骨干去团结其他妇女。

3、要与各教密切配合，要在村积极分子中深入动员，说明妇女扯腿现象对工作的妨害及妇女发动后对斗争的帮助与其作用，加强他们发动妇女的信心与决心。

4、对地主、富农妇女，要动员她们在舆论上同情斗争与不阻挠斗争，必须善于利用妇女的富于感情及慈悲心打动她们，帮助斗争进行。

5、在斗争中要注意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成为组织妇救会的骨干力量。

丙、解决妇女问题

1、各地应接受过去的经验，在处理妇女问题中防止不“左”即右的两种偏向，主要是右，表现不敢与不愿去处理。今后我们应掌握家庭和睦的原则，大胆去处理妇女问题。要认识，今天的工作基础已给予我们处理妇女问题不少的有利条件。

2、方式——原则上是调解说服，如果为群众所痛恶的反虐待反压迫的问题，应坚决领导斗争，在群众面前揭发，教育妇女，教育群众，但应不违犯家庭统战和社会统战，即是说不要侮辱对方的人格，要能达到争取教育的目的，以博得社会大多数人的同情。这就是说，必须经过斗争前后耐心的从双方动员与群众中的动员，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

3、不要片面的站在妇女利益的一方面，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既合理又合法，以使各界人士了解妇救会是代表妇女利益的，而不是女的可以压迫男子、婆媳平等等，造成妇救会孤立的现象。

丁、妇救会的组织问题

1、目前妇救会的组织路线应以大量发展为主，在组织上要克服过去宗派狭隘的现象。除中老年妇女外，要大量发展青年妇女，吸收地主、富农妇女参加。在开始组织时，要拒绝吸收为群众所仇视的“破鞋”参加，以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与赞助。经过多方教育后，妇女对“破鞋”有了初步的认识与转变，可个别吸收并改造“破

鞋”。如原有组织成份不好，可重新组织或改组，找出其中积极分子，团结与组织其他妇女，以求组织上的大量发展。

2、发展方式。应采取个别登记、小组登记或通过积极分子介绍，从下而上的建立组织，以防止成份的复杂，影响妇救会的发展。必须深入调查妇女的成份，普遍宣传妇救会的主张，以打破过去对妇救会所抱的成见，如认为妇救会是“破鞋”会等，争取各界人士认真帮助，动员自己家属参加妇救会。

3、妇救会的领导成份，最好以中年青年妇女为主，以保证妇救会的活跃与巩固，并可各个吸收地主、富农妇女参加，纠正不相信她们和对她们关门的现象。

4、妇救会的组织形式

①村委员会分工：主任、组织、宣传、生活改善、生产各委员，可根据组织情况、工作需要增添副职或减少（生活改善可负责解决妇女问题、放足等，生产委员专门领导生产工作）。（凡会员在15人以上可设3委员。）

②妇救小组以7人至9人为合适，青年小组划开，婆媳不同组，妯娌不同组，姑嫂不同组。

③年龄：15岁以上妇女参加妇救会，14岁至7岁儿童妇女不参加儿童团，可组织姊妹团，受妇救会领导。（妇救会组织简章另定。）

（四）妇女干部的作风

甲、要加强调查研究的精神，要深刻了解妇女生活，分析各阶层不同年龄的妇女生活特点与要求，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团结教育与组织广大妇女，及时解决妇女问题，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

乙、纠正对妇女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如认为做妇女工作落后琐碎，愿作农会工作，认为做妇女工作地位低，不吃香，要求调动工作等，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不了解我们所担负的重大任务。今天我们不仅自己要坚决为民族解放、妇女解放去埋头苦干，深入工作，而且还要动员与争取所有一切力量去帮助妇女工作。因此，如

果我们不去作与不愿意去作妇女工作，这伟大的任务放在谁身上呢？

丙、我们要有朴实、艰苦的生活态度，我们要有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我们要耐心的从工作中培养当地妇女领袖，我们要抱定决心从群众中锻炼自己。这是我们的妇女干部应有的优良作风，是开展妇女工作的先决条件。

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 是怎样坚持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苏 振 华

鲁西南是边区最南端的一个分区，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威胁着敌人的交通要道——陇海路和敌人的战略据点——开封、归德，贯通东与巨南，东南与苏鲁豫边区，南与水东区的直接联系，为华北华中的交通要道与阻止顽固反共军北进反共的门户，在坚持边区抗战、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意义上来说，是起着战略支点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鲁西南也就成了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尖锐刀锋。在1939年秋，鲁西南曾经在四个多月短兵相接的反顽斗争中，只剩下了三个村庄。当时仅有的100多地方武装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了整整四个半月的斗争，而且终于胜利的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创造与发展成为今天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6个抗日县政府和统一的专署，发展了30倍以上的抗日武装，把鲁西南广大的群众从敌伪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目前，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形势，正处于空前紧张残酷的阶段。敌人正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向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着轮番残酷的“扫荡”、“清剿”和“蚕食”。个别地区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失，根据地地区的缩小和分割形势更加严重了，根据地游击性增加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坚持敌后斗争的某些同志对坚持敌后抗战失去了信心，对抗战两年就能胜利的正确启示表示怀疑，右倾情绪在生长着。当着这样的時候，介绍鲁西南坚持三个村斗争的经验，并进一步研究与学习这些经验，这对克服悲观情

绪、继续坚持敌后（特别是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一）坚持鲁西南三个村斗争经过的简略叙述

鲁西南是处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接合地带，由于地区偏僻，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极为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会门极盛行的地方。抗战前每到青纱帐起，土匪即四处蜂起，绑票勒索，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抗战后更成了土匪会门的汇集地（特别是曹州府，是有名的出响马的地方）。同时，地方杂牌部队也到处活跃，牵牛架户，烧杀抢掠。人民痛苦，不堪言状。直到1939年秋，我冀鲁豫支队五大队进入鲁西南地区，积极的打击了日寇，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摧毁了日寇的伪政权，从敌人的手中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兴奋了鲁西南广大的群众，传播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坚持了鲁西南的抗战，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当时只有几个县城有敌人据点，除县城附近地区以外，我们部队到处都可活动。在我们这种胜利的影响下，一部分上层分子都积极的帮助我们组织武装，老百姓参加八路军打鬼子的热潮，在怒潮一般的猛烈地高涨着。因此，很短时期内就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抗日武装，建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了部分的群众，于1939年的秋天就建立了鲁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但当抗日政府刚建立不久，群众的抗日热潮尚未普遍高涨起来，群众尚未完全组织，党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根据地的建立还只有一个雏形，会门土匪还很活跃的时候，日寇就开始了残酷的“扫荡”。接着，顽固反共派石友三也率领大军北上，并先后占领了濮阳及其以南地区，鲁西南与边区的联系就被顽固军所切断而处在孤军无援的游击环境之中了。尤其严重的是在当时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乱打汉奸，乱罚款及所谓要钱要人要粮要枪的“四要”主义的严重错误，以及过左的乱杀人、暗杀等的锄奸政策上的错误，没有及时发动群众巩固已经发展起来

的武装。在敌人大“扫荡”、顽军北进反共、我主力北移的形势下，部分挨过打、受过罚的□□地主就抓住了我们政策上的错误，利用了顽军暂时力量上的优势，积极组织会门，配合石友三积极的反对我们。又加上我们当时主观力量上的薄弱（当时只留下少数地方党政干部和不到100人的游击队），同时也由于只注意了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忽略了政治上的争取，结果会门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了。会门由开始提出“只打群众团体，不打八路军”的口号，而更进一步到“只打新八路，不打老八路”的口号。我们就处在顽军和会门的相互夹击之中了。

到1940年顽军联合进攻、会门暴动的严重形势下，鲁西南的工作就无组织无计划的退却了，鲁西南就被敌伪顽所暂时掌握了。除了少数几个地下党员之外，公开工作就全部垮台了。

这个时期斗争的失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没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观念，不讲政策，不从长期打算，不从爱护群众利益出发，只顾自己本身的一时的狭隘的利益，严重的脱离群众，发现错误不立刻纠正等的严重恶果。

1940年秋天，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检讨了鲁西南失败的教训，重新提出了恢复和建立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一方面对退出来的干部进行了训练，进行党的各种政策的教育，指出了鲁西南过去失败的错误，提出了恢复鲁西南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着的严重（但是能够克服的）困难；另一方面，首先派遣了少数有社会关系的干部秘密的回到鲁西南进行了对各种情况的了解，经过很短的准备时间，把退出的干部和不到100人的游击队又重新回到鲁西南，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恢复了纵横不到20里的一块游击区。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工作尚未打下基础，敌伪顽（主要是顽军）向这块游击区的第二次进攻又开始了，这就进入到了三个村的斗争和坚持。在坚持三个村斗争的开始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相距很远的。当时，除所有县城完全被敌人控制之外，包围我们的顽军就达8000人以上，顽军占据的地区幅员纵横200余里。而我们仅有脱离生产

的游击队120人，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几个村最多不到80支枪，合计不到200人，而且均未受过任何军政训练，大部分都是刚脱离生产的农民。我们能活动的地区，东西不过七八里，南北不过20里，其中基础最好的只有刘岗、曹楼、倪庄等三个村庄。因为这几个村庄的群众曾受过一年多敌顽伪军的残酷压迫和无限制的敲诈勒索，再加上土匪的骚扰，群众的生命财产已经感觉到了没有任何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由于我们政策上的转变，群众已切身经验和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坚决抗日并且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而日寇、伪军和顽固反共派只有使他们走向更加悲惨的道路上去。群众已经感觉到，顽军除了对他们压迫敲诈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好处，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依靠八路军和武装自卫，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这就打破了群众过去希望中央军来保护他们利益的幻想，而将这种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了。当时我们的力量虽然占着绝对的劣势，但政治上是占了上风，取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有了广大的群众为我们的依靠，在社会上取得了合法地位，广大群众接近了我们，部分进步的上层地主及开明士绅对我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极少数反共分子所煽动起来的会门，也开始瓦解了，这就是坚持三个村庄斗争的客观条件。然而，顽固反共派仍然利用着他们军事上的暂时优势，直接或间接的配合敌人继续向鲁西南根据地作全面的进攻。斗争从1940年8月开始，到1940年12月30日止，一共进行了四个半月。当时我只独立团有140人，枪120支，县政府不到60人。在力量的使用上，独立团全部集中作骨干，轮流移驻各村，看哪里敌情紧张即使用到哪里去，其余的都分散在各村里，在武装上是非常少的。如倪庄、景王两个寨共7棵枪，刘岗自卫队6棵枪，梁集李楼15棵枪，独立团集中在曹楼。当时除西北还有一点空隙之处，是全部的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了，与边区仅有某种程度的书信上的联系，在斗争与工作上是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能取得外部任何的援助与配合。

在顽军的联合围攻开始时是异常猛烈的，如游击分队长张二把

持守曹楼，王子魁带了400多人去进攻，冲到寨门边，把整个寨子都包围起来了，同时用迫击炮向村内轰击。但几次的连续冲锋，都被张二把持指挥全村的军民英勇的反冲锋击溃了。但部分群众因感到我们的力量太小，对敌人严重进攻都表示了恐慌。特别是倪庄的群众，在少数的地主活动下，部分开始动摇了。于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就分别的深入到各村去，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动员，向群众解释了胜利的条件，特别强调群众有反对土匪，坚守围寨的经验，顽军的不统一和内部的矛盾等等。经过这次动员之后，群众的情绪提高了，群众就决心坚守围寨，都抬出土枪土炮来，同时大家砍枣树修围寨，添设鹿寨，谁也不吝惜自己的东西。

然而敌人的围攻却一直的继续着，顽军在几次的进攻被击退之后，仍企图以长期围困的办法整死我们。我们则在群众的拥护和帮助下，和群众一起战斗着，生活着。没有粮食了，群众借给我们粮食；没有弹药了，群众就从地窖里刨出他们埋藏的子弹来；没有棉衣布鞋了，他们就单衣赤脚在风雪中坚持着战斗。情况最紧张的时候，宋大牙和战士们常常在深夜里卧在冰雪上监视敌人。敌情最紧张时，全村的老百姓不分昼夜都动员起来了，老太婆鼓励着自己儿子，妻子鼓励着自己丈夫，小孩子则给自己的爸爸拿烟送茶。每个村不分男女老少，也都按联庄会的形式自动的组织起来了，并且成立了自卫队，至少选出100人看寨，紧张时每夜最少四班（平时二班）。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村子的寨墙上都点上数百红灯，每到天光暗淡、星月交辉时，红灯耀眼，与枪上红缨相映照，刀光闪闪，人影依稀，炮声、梆音遥相应和，大有中古戍边之遗风。

在坚守中，我们曾经失去了两个寨子，一个是赵连城的大户庄。当时大户庄所处的形势是很孤立和突出的。守大户庄的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王化理同志，一个非常坚决的和勇敢的革命战士。当敌情已万分紧急时，他几次奉命撤出战斗，都被全村的男女老幼含泪痛哭、跪在他的面前留住了。王化理同志最后只好攒着泪决心死守，终因势孤力弱而陷落了，王化理同志也就英勇的战死了。其

次一个寨子，就是大小寨，也同样的被攻陷了。

在大户庄及大小寨失守之后，群众的情绪又恐慌和动摇起来了。但这时不干下去也是不行的，同时紧接着两个村子的陷落，我们马上就进行了新的动员和解释，指出两个村子失陷的原因（如有奸细活动，工作组织不好等）。经过一番有力的鼓动之后，群众的情绪又提高起来了。这时顽军进攻的精神也大大减弱，虽然仍常常用二三百人不断的向我们进攻，而我们的抵抗却更为顽强和坚决。每个人都抱着光荣战死的决心，英勇沉着迎击着敌人的进攻。因此，敌人每次进攻被两三个游击队员就击溃了。

正当着这前无进路，后有追兵，欲前不得，欲退不能的时候，敌人的“扫荡”又开始了。敌人分兵数路，合击曹楼、倪庄等三个村庄。敌人一来，顽军就将三个村庄退让了出来，我们也就相机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等到敌人“扫荡”扑空而回的时候，我们又回到那儿去。顽军看我们并没有被敌人消灭，又将我们死死的包围起来，我们的处境是更加困难了。

在这一时期中，在顽军内部，因历次进攻的失败，彼此的矛盾是更加尖锐起来了。我们就抓住了这一时机，对顽军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对顽军内部的争取和分化。首先就利用了与胡老头（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向胡老头子进行了统战工作（王道平的老婆和胡的老婆结成了干姊妹）。胡老头子中立了，马逢乐（地方民团的头子）也就停止了□□的活动。赵云祥（杂牌军）虽然有2000多人，但他这时主要的还在于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只要不侵犯到他的利益，他是不会积极的配合王子魁的（虽然他并没有明显的表示态度）。从北面来进攻我们的戴四跛子（土匪头），也因将他的老婆捉来了，和我们论交情，释放了他的老婆，也停止了他的进攻。这样一来，只剩了反共反八路最坚决的王子魁的2000多人了，顽军联合进攻的力量基本上是分化了。

但是顽军仍然在曹楼、倪庄、刘岗三个村子的周围将我们围困和封锁着，我们仍然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在风雪交织中坚持三个村

的军民，虽然忍受了一切苦难，克服了严冬所给与我们的无数的困难，然而当冬去春来的时候，一个更为严重与复杂的问题又发生了，这就是群众的春耕和下种问题。当时群众是看得很明白的，仅靠我们当时的一点力量是无法把顽军的围攻打破的。围攻不能打破，他们就无法进行春耕和下种。但如今年的春耕下种无望的话，那就只有坐地等死了。因此，对这一个问题群众都在忧虑着。显然他们并不怕顽军的围攻，而却害怕不能种地。老百姓心焦这一个问题，领导斗争的干部也心焦这一个问题。而同时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的问题。老百姓的粮食眼看就要断绝了，没有饭吃饿着肚子是不能坚持斗争的。可是这又怎么办呢？特别是当戴主任（地委）到河北去开会时，群众都欢喜得很，都说戴主任到河北请救兵去了。但开会回来时，老百姓看到并没有带了救兵来，戴主任仍然是光着身子回来的，群众就灰心失望了。于是陈老五（争取来的一部分土匪武装）的一部分游击队拉走了，当了皇协军。王道平（争取过来的一个大土匪头）哭了两天两夜。战士们都是忧虑着，哨兵看到领导同志，无精打彩的绷着眉头，不说一句话。人们感到前途是迷茫起来了，坚持是已经不可能了。可是，不坚持又怎么办呢？

就在这样的時候，新三旅南下增援了。当时新三旅是伪装十军团一八一师南下领子弹的名义来的。部队已进到顽军的附近了，他们还不知道。群众都半信半疑，看到这个队伍纪律特别好，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大相信是十军团的队伍，直到第二天拂晓，看到抬着梯子向王子魁的驻地出发了，才认出是八路军。老百姓马上就兴奋起来了。

就在增援来到的时候，宋大牙在城墙上就大唱大笑起来。他不说一句话，只是引腔高歌。大家问他，也不回答一句。当时敌情是很紧张的，老百姓都抱着一颗紧张的恐怖的心在跳跃着。但当他们看到宋大牙这种狂欢和歌唱时，都跳起来了，大家都叫着，互相传说说：“宋司令唱歌了，不要恐慌，一定有办法了！”

新三旅向王子魁进攻的炮声打响了。王子魁拖着—部分残兵败将，光着屁股跑掉了。三个村庄的斗争，就这样得到了胜利的结果。

（二）三个村庄为什么能坚持至四个半月之久呢？

第一，有了单独坚持鲁西南斗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斗争开始时，上至主要负责干部，下至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说明了坚持鲁西南斗争的重要性和能够坚持这个斗争的一切有利条件，正确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指出了敌人的弱点（敌人内部的矛盾和不统一，群众对他们的反对，敌人孤立等），也正确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如群众拥护，我们内部是团结的，只要坚持到—段时间，就有主力援助），说明了过去鲁西南群众同土匪斗争胜利的实例，鲁西南群众有反土匪斗争的经验（一个寨子被土匪包围了五个月，最后击破了土匪的围攻的光辉例子）。并指出了当时的严重困难（如力量小，处境孤单，群众还未经过严重的考验），同时又指出了在坚持斗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险。经过了深入的动员之后，上级与下级，军队与群众，甲寨与乙寨，都有了一致的深刻的认识，提高了坚持胜利的信心，在思想上打下了誓死坚持、“同患难”、“共艰苦”、牢不可破、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造成了军队与群众间一切为着斗争胜利的一致方向，造成了军队与群众牺牲—切坚持到底的决心。

第二，真正的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依靠了群众。当时的群众受了敌人的残酷压迫和敲诈，已经感觉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群众要求反对顽军底压迫的斗争情绪如火如荼的高涨了起来，造成了我们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有利条件。当时在领导上抓住了群众这一迫切的要求，提出保护群众利益，反对敌伪顽压迫老百姓、掠夺老百姓的财物，“八路军愿与老百姓—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坚持鲁西南的斗争！”在这样的口号下，把几个村庄的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在坚持严重的斗争过程中，虽然环境是那么的紧张的处在敌

人的四面包围里，仍利用了一切的时间进行了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把减租减息与坚持斗争的胜利联系起来，抓住了顽军压迫群众的具体事实和我们保护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了群众。由于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受了革命的教育，在严重的斗争中，表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参加斗争的热忱，这样军队与群众的结合就更加紧密了。如群众对部队说：“你们离不开俺们，俺们也离不开你们。”又如，有不少的老太太鼓动着自己的儿子上围寨去放哨，说：“八路军帮俺们减了租，俺们才得多分一些粮食，过些好日子。要是顽军打进来了，俺们老百姓又得受顽军的压迫了。”还有些老太太每日早晚烧香拜佛，求神保佑八路军同志和她的儿子的健康，保佑他们打胜仗，不要受伤，求神降罪，顽军死光。（曾有一个村子，在四个多月的斗争中，只买香钱就花了好几百元。这虽是一种迷信，但也可以看到群众对军队的爱护与热忱，与对敌人的愤恨。）另一方面，部队艰苦卓绝的模范行动和斗争精神，也给了群众以极大的感动。在非常困难时与紧急的条件下，部队中无论干部或战士都宁愿忍受痛苦，不愿损害群众一点利益。在整个的严冬里，他们没有穿棉衣，赤着脚在严寒的冰天雪地里，在朔风的怒吼中，没有一点畏惧的在寨墙上看守着寨子。干部也同样的不畏严寒与风雪，昼夜不息的查岗查哨，领导和坚持对敌人的斗争。有时群众送给一些白面慰劳部队，为了表示部队可与群众共艰苦，把白面送还，同群众一起吃黑窝窝。由于这种艰苦卓绝、爱护群众的模范行动，激发了群众对我们生死与共的友爱互助精神和死也得死在一块的决心，军队与群众更加坚固的结合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造成了三个村子的斗争能够在几十倍敌人的围攻下坚持到胜利的主要条件。否则，仅仅依靠百余枪弹、粮食都没有充分准备和来源的游击队，要坚持这样严重的斗争局面达四个月之久，是不可能的。

第三，正确的执行了党的政策。从决定退出的干部回到鲁西南恢复工作、建立根据地时，第一项工作，即是向各阶层各党派宣传

解释我党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及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并在适当的会议上，承认我们过去在政策上所犯的错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宣传解释工作，并在实际行动中改正了过去的错误，使党的各种政策付诸实行，纠正了“左”的锄奸错误，执行了保障人权法令，停止了罚款、捉人、要枪等的错误作法，实行了合理负担、统支统筹的财政经济制度，纠正了吞并地方武装的错误，认真建立了军分区的工作，扶植与保障了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巩固，真正的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同时，并揭破了日寇及顽固反共派的造谣诬蔑，收回了过去坏的政治影响，表示了我党我军代表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而且吸收了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与我们共同抗日（如几个地主亲身参加坚持三个村的斗争），孤立了极少数的顽固反共分子，正确的执行了我党对顽固反共派破坏团结抗战、反共反八路军的政治的斗争原则。鲁西南坚持三个村庄的斗争，当时主要的是顽固反共派的军事进攻。顽军力量虽有8000人以上，但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表现在：

A、各派顽军在反共反八路军的总的目标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因自身的利害关系的矛盾，在其反共的实际行动上，在反共的积极性上，都有其程度上的差别，这就使他们的步调不能协调和一致。

B、顽军中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封建地主武装（杂牌顽军），地位、地盘与力量大小之争是很厉害的。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深刻的矛盾，也就给了我们争取与打击、拉拢与孤立的机会，造成了我们分散与瓦解敌人力量，联合一部，打击一部，各个击破的客观条件。

C、有的顽军虽直接或间接的与敌人勾结，但尚未公开投敌，和敌人仍然还有矛盾，敌人仍采取对顽军实行威胁、“扫荡”，逼其公开投降。这就无形使顽军的力量受到一些牵制，不能全部的集中进攻我们。

D、由于顽军过去对群众无限制的压迫与剥削、敲诈，除极少数的反动地主帮助顽军外，广大的群众及极大部分开明士绅与顽军

是对立的。对顽军斗争策略上，具体的分析与把握了以上的特点，开始斗争时，即抓住了顽军这些特点，在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团结抗战的方针下，对各派顽军采取了争取一个，麻痹一个，打击一个，孤立少数，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斗争方针。在这种方针下面，只要能求得暂时和缓或中立，不管其出于何种立场，都进行了统战工作，与其暂时妥协或力争其中立。经过了艰苦工作，就争取了好几股顽军暂守中立的局面，集中了主要的力量，打击了最顽固的。开展了广泛的统战，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在有原则的条件下作必要的让步。当敌人“扫荡”这些暂守中立的顽军时，我们虽然只有百余武装，为表示积极配合友军作战，实行自己的诺言，曾经几次主动的配合其作战。由于我们这种宽大诚恳的态度，感动了几股顽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对我们的同情。这种艰苦的统战工作的结果，有的顽军暂时中立了，有的顽军对我们的进攻也暂时的消极下来，剩下反共最坚决最积极的就只有以王子魁为首的2000多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集中了军事上政治上的一切力量，于1941年的春天，配合了新三旅南下，彻底解决了王子魁的全部力量。自此，顽固反共派联合围攻我鲁西南的反共阵线被粉碎了。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斗争，顽优我劣的形势改变了（顽军由8000人削弱到2500人，我则由100余人的游击队发展到3000人）。顽固政权自此瓦解了，鲁西南的抗日政权就建立了起来，抗日力量继续增□的扩大，顽固势力日形缩小到一个很狭小的地区了。

第四，有了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群众领袖。鲁西南坚持三个村庄的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干部。几个庄寨领导干部虽不全部是地方人，但是经过了长期的工作，已经与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如地委书记戴晓东（老百姓叫戴主任），司令宋励华（老百姓叫宋大牙），都是群众最爱戴、最亲近的领袖，没有5岁小孩不知道戴主任和宋司令的。群众对他们的信任从以下的事实中就可看出来：如群众之间遇有大的纠纷不能解决的时候，都跑到戴主任或宋司令那

儿去，请他们解决。甚至连一些家庭小事，夫妻因争嚷一件小事吵嘴或打架，也都跑到戴主任那里去要求帮他们解决。而这些事情只要一经戴主任或宋司令几句话开导开导，双方当下就和解了，纠纷也就平息下去了，夫妻关系家庭和解，也就亲亲热热的回到家里去。

当坚持三个村的斗争最危险的时候，群众中有的对斗争的胜利表示怀疑，少数的在几十倍的敌人的围攻下，开始有些畏惧和动摇，有的终日愁眉苦脸或叹息，但只要戴主任或宋司令给他们一讲话，群众的情绪就立即稳定下来了。群众对他们有着一种坚固的信念，群众相信他们有办法的。特别是情况最紧急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诚实的笑或嘴里的歌声，就是这种办法的标志。因此，每当大家很苦恼或对坚持斗争表现忧虑的时候，只要一看见戴主任或宋司令脸上的那种坚毅沉静的微笑或听见他们的歌声，群众的情绪就立刻稳定下来，战士们也就更加□有了一切信念和决心，沉着的抵抗着敌人。群众也就会欢笑着：“宋司令唱歌了，胜利有把握了！不要害怕敌人，一定打不进来。”这样，整个的群众也就会马上活跃起来，紧张起来，战斗起来。

除了这些主要负责干部之外，其余的干部，差不多全是当地的干部，与群众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这些干部为什么有那样好的联系和建立了那样高的威信呢？

A、真正的帮助群众解决了群众的切身问题。在艰苦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不仅帮助了群众解决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迫切要求，而且用了一切可能，关心到群众最细微的家庭小事，成了他们的教师或良友。

B、干部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模范行动。如宋励华同志在坚持三个村庄的斗争中，一冬里身上没有穿过棉衣，脚上没有穿过袜子。有时群众送给他一些白面等东西，他自己不吃，而同群众一起吃黑窝窝头。在斗争中，昼夜不息的同群众在一起看守围寨，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等艰苦奋斗的行动，给了群众以最深刻的

教育和感动。在三个村的斗争最后胜利时，群众自动的向宋励华献□献棉衣棉裤。这里，可以看出群众对他们的热忱拥护。

C、很虚心的倾听群众的呼声，解答群众的难题。只要是群众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不管正确与否，总是耐心的解释和说服，从没拒绝过群众的意见。同群众接近时，总是以群众的态度、群众的语言向群众解释问题，因此群众也最容易接受，同时也从群众中学习了不少的经验和知识。

第五，争取和团结了游民分子。整个鲁西南，特别是菏泽（曹州府），由于军阀和地主残酷剥削，黄河水灾，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极度痛苦，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有名的农民起义和义和团暴动与匪乱。在抗战前旧政府时代，抢粮□□、“土匪抢□”是一种经常的社会现象。因此，在鲁西南地区游民阶层（流氓、兵痞、土匪）占有相当的数量，而且他们□□□□□□互相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地主阶级为保存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与游民首领都有密切的联系，暗地里掌握着这些游民武装。所以这个游民阶层有相当的力量。旧政府官吏上任，如果不同这些游民分子巴结，不去拜访他们，即有□位的危险。在坚持三个村的斗争的过程中，由于掌握了鲁西南这一社会的特点，进行了争取游民分子的艰苦工作，把这一批有相当力量的游民分子都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了（如在争取的人中，有当过35年的大土匪头子和青帮头子），参加了坚持三个村庄的艰苦斗争，经过了长期的改造，而且成了今天地方武装中一部分干部。这一部分人的被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不仅是削弱了反共顽固派一部分的社会基础，安定了鲁西南根据地抗日秩序，而这在今天反对敌人利用游民（特别是游民领袖）发展与成立伪军来反对我们，亦有很大的作用。敌人在鲁西南伪军不能很快发展起来，这批游民分子争取在我们手里是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如何争取游民分子呢？其争取的经验是什么呢？

A、从政治上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逐渐改造其流氓思想。一般的游民分子的文化程度都很低，头脑简单，但社会经验却很丰

富。他们长期过着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的流寇生活，养成了怕组织怕纪律的散漫的生活习惯，因此，特别害怕组织生活，不愿学习，不愿听长篇大论的演说。因此对游民分子的教育方式，在初期须要很好的讲究，多采取个别谈话或写信，有计划的解释一些政治问题。这种方式教育的效果是最大的。

B、游民分子的家庭一般的都是很贫苦的，而他们的花消应酬则很大，因此必须适当的照顾他们家庭的困难和个人方面应给予必要的特别待遇，或给以适当的职业，这样才能停止他们的绑票、抢夺，安置他们的生活。要是领导上不注意这些，既不允许他们绑票架户、违犯政策，对他的家庭问题和他的生活问题又不给予解决，而这些游民分子一天没有钱花就不能过日子的，这样就很难团结他们一道共同抗战，并且有跑到敌人方面去的最大危险。

C、抓住进步的首领，去孤立与打击不可争取的个别坏分子，经过他们去争取更多的游民。同时，对个别极坏的游民分子，在多数游民分子同意之后，要给以必要的打击和镇压。

D、游民首领彼此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有计划的训练几个主要首领，经过他们去争取其他游民分子，也能起很大的作用。

E、发展起来的武装不要强编，要经过他们同意后，派遣政治坚定、思想意识正确的坚强的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进行政治教育。但进行工作仅是求得与他们商量，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给他们权利。只要经过艰苦的政治工作，土匪武装是可以改造的。边区已有不少的土匪武装建立了政治工作，改变了原来土匪的本质，成为有相当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对土匪武装不去进行艰苦改造与争取工作，采取简单的强编土匪武装的办法，是愚蠢的，其结果既不可能巩固，又容易逼使土匪部队的首领脱离我们，甚至跑到敌人方面去，更会影响着争取其他的土匪武装。游民分子特点之一，讲义气，重感情，奉承上级，爱戴“高帽子”。抓住这一特点，主要负责干部需找其个别谈话或写信，方式要活泼，多谈些政治问题，对其错误进行个别批评，对其功劳给予适当的鼓励，以这

种方式去教育最深刻。

第六，认真的武装了群众。在绝对的敌优我劣的形势下，只要依靠广大群众武装，就能坚持最艰苦的斗争，就能够战胜敌人和一切困难。鲁西南坚持三个村的斗争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真理，显示了群众武装的伟大力量。在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反对敌人的压迫和掠夺的口号下，把几个村的群众全部武装和动员起来了。凡是青年壮丁都参加了自卫队，协同我们一起作战，老头子、小孩子亦全部参加了战时服务。在武器的使用上，发挥了一切旧式武器的效能，如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以镰刀、木棍、□□当作武装使用。不管武器的好坏、作用的大小，群众每人都有一件武器。在四个半月的艰苦斗争中，几乎完全是依靠群众的这种武装力量（子弹打完了，群众就将自己家里从前埋藏的子弹拿来给军队用）。当时百余人（原件自此以下脱落 两行半，约 49 字。——编者）也就成为坚持三个村斗争的群众武装的骨干和群众依靠的唯一主力。另一方面，在单独坚持斗争的地区，如果群众已经武装起来了，对脱离生产的武装不要绝对分散，应注意适当的集中使用。全部分散就失去群众武装斗争的骨干，在危急的时候就没有突击力量，这就会造成单纯的防御，可能遭受到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第七，领导机关特别注意了鲁西南单独坚持斗争的严重局面，随时指示了如何坚持斗争的一些具体办法，鼓励他们单独坚持鲁西南斗争中的英勇模范行动，给了他们一些国际国内重要生动的政治情况和新闻消息。每逢情况非常危险，领导干部感到没有办法，群众情绪低落的时候，恰巧总是接到军区、区党委给他们的指示，告诉了他们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给予他们政治上、精神上很大的鼓励，立即就兴奋了全体干部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坚定和提高了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解决了他们不能解决或没有想到的困难。这里告诉了我们领导同志一个经验：凡是坚持单独斗争的地区，如果不能及时给予具体的指示，鼓励其斗争情绪，并供给各方面的有利情况，就可能使下面同志在严重的局面下迷失方向，缺乏应付严重斗

争的办法，甚至丧失坚持斗争的意志，以致遭受失败。

第八，正确的执行了锄奸政策，严厉的镇压了奸细分子的活动。三个村庄斗争一开始，即在党内外群众中进行了锄奸教育，提高了党和群众的警惕性，对奸细分子采取了坚决的镇压，对少数尚可教育的坏分子进行艰苦的、耐心的争取和教育。因此，在严重的斗争环境中巩固了自己的斗争阵容，保证了没有一个投敌逃跑，严密的保守了秘密。虽边境离敌人不到5里，近者有二三里路，在四个半月的斗争中，敌人始终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及我们内部的一切情况。□□□□不坚定的□□□□□□的分子，在群众的监视之下，也不敢活动。

第九，斗争进行到严重的阶段时，要尽一切可能给予实际的援助，坚持斗争的地区要组织局部的进攻。鲁西南三个村庄坚持到四个半月之后，人力物力已经达到很大的消耗，经过了长期紧张艰苦的斗争环境，群众情绪已达到极大限度的疲劳。当时摆在群众面前的切身问题，是1941年的春天即将到来，快到群众耕地下种的时候，但如继续下去，势将影响春耕和下种，这就严重的影响到群众的生存条件。即使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将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而坚持这种斗争的。但正在这样的严重形势下，在千钧一发的危急的时候，新三旅南下增援了。这就援助了鲁西南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解决了群众的春耕问题，提高了群众的情绪。经过这一次艰苦严重的斗争，打开了鲁西南的局面，建立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

第十，解决了会门。当鲁西南在坚持三个村的斗争的时候，除了顽军的联合进攻外，其次威胁最大的就是会门的疯狂与坚决反对我们。鲁西南关于会门起因和发展情形虽有它的长期历史，但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策的错误。当时鲁西南会门的本□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虽是对立的，但一部分反动地主和顽军却利用了我们政策上的错误，抓住一部分群众的落后心理，积极煽动与组织起来了。他们企图利用这种落后的封建迷信组织来坚决的反对我们。但

是，顽固反共派这一套猎刀杀人的阴谋毒计，最后终于被群众的切身经验所识破了。顽固反共派一方面利用会门反对我们，一方面却又利用会门加紧压迫和剥削群众，促使手执长矛的老百姓走向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送死。群众经验证明了，组织会门的村庄，结果只是敲诈、压迫、无限制的沉重的负担以及无代价的繁重的差使，土地的荒废，人命的牺牲，除此之外一无所得。而会门首领敲诈了老百姓无数的财富，取得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过着逍遥自在的腐化生活，并且逐渐的与敌人勾结，接受了敌人的委任，当了汉奸，出卖了会门群众的利益。群众认识了参加会门不仅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弄得家破人亡，在会门首领的指使下，替他们效劳作汉奸。由于群众有了这样的觉悟，因而会门自身开始走向瓦解，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多数会门群众开始倾向我们，会门首领汉奸面貌更加明显，与群众更加对立，更加孤立了。这样就形成了解决会门的客观有利条件。但在坚持三个村斗争时，当会门正在疯狂严重的时候，由于对会门的处理采取了冷静慎重的态度，研究了会门内部的情况，分析了解决会门的有利条件和如何才能解决会门的具体办法，由于正确的执行了党的政策和艰苦的工作，终于会门被我们解决了。

解决会门主要经验是：

A、抓住了会门本身的弱点和其内部的矛盾，利用了各种关系。如利用了士绅、亲属、朋友写信或个别谈话，或利用各种群众会议散发传单，揭破了顽固反共派反共首领的反动阴谋，从政治上打击了最坏的头目和个别的村庄。同时又广泛的宣传我党各种政策及对会门的态度，提出了宽大为怀，不咎既往，“过去杀了八路军人员的人，只要不继续反对八路军，能自新悔过，绝对不报复”等口号。经过了这一广泛宣传解释，就揭破了会门的罪恶，传播了我党的政治影响，解除了顽固反共派欺骗群众、组织会门的政治资本。

B、根据了会门反共程度的不同及其内部矛盾、各会门力量大

小不一的特点，采取了以政治说服和争取为主，以打击威胁为辅的政策，对绝大多数的会门采取了长期耐心说服争取的方针。只要他们不主动的向我们进攻，我们绝不以武力去解决他。即使有时被迫与会门发生冲突，俘获其人、枪时，给予优待，经短期的训练全部释放，绝不杀害一人。经过了这种艰苦的工作，争取了大多数会门村庄同情我们，走向中立。对个别争取无效，不听说服，□□□□□，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的村庄，则集中力量给予歼灭打击（不打则已，一打必须彻底）。对愿意派代表与我谈条件，但不愿我部队接近的少数村庄，表示愿意讲和时，威胁的部队即自动撤退，以示我们的诚意，但须迅速实现谈判条件，严防拖延时间、重整旗鼓来反对我们。

C、纠正报复主义。由于会门与我们尖锐的对立，过去杀害过我们不少的同志，打过我们的部队，收缴过我们的武装，侮辱过我们的部队和政府，因此，无论部队或群众对会门的仇恨都是很深的；再加上我们党内大多数是农民成份，最容易反映农民的狭隘报复主义。解决会门，主要是依靠正确的政策和耐心艰苦的政治工作，单凭单纯军事的打击和简单的镇压报复，不但不能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会门，而且会更加促使会门仇恨和恐惧我们，而且给了敌人欺骗群众的政治资本，给解决会门问题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在处理个别会门村庄时，虽然他们过去曾经杀过我们的人，打过我们的部队，只要他不继续反共反八路军，宣布解散会门组织，我们保证了不报复，不咎既往。由于宽大政策的实施，不仅是争取了过去对我们仇恨最深、反共最坚决的会门，而且解除了其他会门对我们的恐惧心理，表示了我党宽大为怀的政策，感动了被欺骗的会门群众，从思想上解除了会门的武装。

鲁西南经过了坚持三个村庄的艰苦斗争，不仅是最后的战胜了一切困难，彻底的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坚持了鲁西南最艰苦的局面，而且创造了今天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冀鲁豫边区抗战，保持华北、华中底联系的一个坚强的堡垒，同时也是我们将来举行反攻的前进阵地，与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可分离的。

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日 联防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人民抗日联防之组织是以适应民众抗日、锄奸、防匪、保家之迫切需要，发动人民联合武装自卫，群〔策〕群力，守望相助，安定社会秩序，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为目的。

第二条 本联防系根据人民参战之义务，为发扬民主，建立人民自卫武装之独立领导系统，统一民兵、自卫队之行动与配合之组织，呈请政府备案后须享有合法之地位与合法权利。

第三条 本联防之任务规定为：甲、袭扰敌之据点，封锁敌人之交通，打击小股出扰之敌伪，肃清盗匪。在敌出动“扫荡”时，掩护群众退却。乙、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捕捉敌探，检举内奸，防止奸细活动。丙、担负担架运输、传达情报等战时勤务，并进行空室清野藏粮等战争动员工作。丁、配合主力军或地方军作战。

第四条 本联防之组织原则，系根据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机关均由本地人民武装代表并吸收士绅名流选举成立之（选举法另定之），并经民主讨论制定联防公约，一经通过，参加联防之人民均有遵守之义务。

第二章 组织细则

第五条 本联防之领导机关为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边区、县、区三级得由同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之，专署级不成

立。在一行政区眼下不易成立区联防委员会时，若干村可成立中心村的联防委员会。

第六条 各级联委会的组织如下：

甲、边区区级联委会由13人至15人组成，并为处理有关抗日联防之经常事宜，得设驻会委员3人至5人，主任委员1人。

乙、县级由11人至13人组成之，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1人或2人。

丙、区级由9人至11人组成之，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1人或2人。

丁、中心村联委会由7人至9人组成之，设主任与副主任委员各1人。

第七条 为便利执行联委会之决议，并负责进行民兵、自卫队之作战教育、经费供给及武器、弹药之分配等事宜，得在县〔以〕下各级联委会设立指导机关。其组织如下：

甲、县设大队部，设大队长1人，副队长1人，教导员1人。下分四股：

①第一股军事股，股长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指挥作战、侦察、联络、通讯、军事教育。

②第二股政治股，股长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宣传教育、锄奸、敌伪工作。

③青年武装股，设正、副股长各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该区青年武装之领导。正、副股长得由同级青抗先队长、指导员兼任之。

④第四股供给股，股长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武装、弹药及财粮供给及伤亡抚恤等事宜。

乙、区级设中队部，设中队长1人，副队长1人，指导员1人。下分设军事、政治、青年、武装、供给干事各1人。在区以下，因地区过大，为便利防务，得设中心村队部，设队长1人，副队长1人，指导员1人。村以自卫民兵为联防之下层基础组织。

第八条 为各级队部便利执行联委会之决议起见，各级队部之

队长或政治负责人，得由同级联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兼任之。

第九条 各级队部工作人员之任用，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得由同级人民武装代表会议推选之。股长及干事，得由各级队部聘请，经联委会之批准任用之。

第三章 编 制

第十条 在联防区不脱离生产之村民，得按自卫队组织条例编制之。联防队部执行过去自卫队部之任务，并可组织半脱离〔生产〕的民兵，如模范班、青抗先，其组织见各自组织条例。模范班、青抗先受联队部指挥。联防不设脱离生产的常备武装，以区中队执行支持配合作战任务，但联防可成立轮训队，担负一部常备任务。

第四章 职权及与军政民之关系

第十一条 本联防之最高权力机关为边区人民武装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边区抗日联防委员会。该联委会乃权力机关。因边区不设军政机关，故须同时执行之职责与权利。因此对各级队部为领导关系，统一作战教育，统一经费筹划及武器、弹药的筹划与分配等事宜。在边区联委会未成立前，各地联防之最高权力机关，属于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各级联委会职权如下：

甲、县区联委会乃权利〔力〕机关，向各该级武装代表大会之决议负责，并有督促同级队部切执行之权。

乙、有维护与执行联防公约之权利。

丙、按照下级及同级队部所提交之案件，有讨论、批准或否定之权利。

丁、下级联委会在不妨碍上级联委会之决议之原则下，得制定自行公约，经县府批准后，有维护与执行之权。

第十二条 各级联委会正、副主任委员之职权如下：负责执行联委会之决议，处理本会日常工作事宜，并负责召集联委会开会。各

级联委会正、副主任及委员，得兼任各该级队部之军政主要负责人。

第十三条 边区联委会为边区人民武装最高权力机关。根据民主原则，对县区联委会无直接领导关系，但有指导关系，而县区上下联委会之间亦无垂直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关系。各级联委会与其同级队部之关系，联委会为领导机关，联防队部为执行机关。联委会之一切决议决定概应由同级队部执行，而各级队部接受联委会之决定，应保证实现之。但联委会不干涉联防队部之独立系统与内部生活，并不得代替队部直接指挥民兵、自卫队。

第十四条 抗日政府对联委会为领导机关，联委会选举之后，须经呈请政府批准备案（县区级统向县政府备案），始得行使职权。各级联委会应接受同级政府及其武装部门对各该区民兵、自卫队军事、政治作教育之领导。凡有关政府法令范围事宜，需提交政府处理，联委会无权自行处理。但与联防有关事宜，联委会或队部有向政府提出建议之权利。政府须保持联委会之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生活，应重视联委会之决议与提议，并负有帮助解决各联防区内之武装、弹药、粮款、伤亡抚恤等实际问题之责。

第十五条 军区、军分区与县区级军事机关，负有对联防之军政机关进行军事政治教育、指导帮助之责。并在作战时，各级队部应接受主力军或游击队所给予之配合作战之命令，但军队不得干涉民兵及自卫队之独立系统与内部生活，并有负责帮助解决有关联防之武器、弹药、干部等实际问题之义务。

第十六条 为加强联委会之统一领导作用，并因目前边区以民兵组织武装还在开始发展的过程时期，因之，在各该联防区内之民兵自卫队等人民武装之作战教育等事宜，均应统一于各级队部领导之下。模范班的领导系统建立到县。模范班、青抗先在军事指挥上绝对统一于联防队部，在组织〔上〕须着重其独立性，青抗先各级队长须兼任青年武装股长；模范班各级队部〔长〕兼任军事股长之职，参加各级联防队部工作。当青抗先、模范班是直接系统，与联

防队之决定发生抵触时，青抗先得报告上级队部，由上级队部与联防队部讨论解决；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必须遵照同级联防队部之决定。

第十七条 联委会对其群众团体为配合关系，群众团体应动员其会员积极参加联防，并起模范作用，而各联防队部应负保护群众团体之责任，并帮助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群众组织。

第五章 教育训练

第十八条 本联防民兵、自卫队之教育训练，统由各该级政府武装部门协同联委会之军事股及政治股负责人员统一计划办理之，并在县级政府得组织巡回教育团分赴各区实施民兵自卫队之普训。在村级得暂请本村之小学教员为文化教员，任文化教育事宜。

第十九条 本联防得以区为单位建立轮训队，轮〔训〕队抽调各该区之民兵、自卫队实施训练（人员与时间另议）。

第二十条 县联防之教育训练经费，由县级政府统筹统发之。

第六章 供给及伤亡抚恤

第二十一条 各县联防之一切经费，统由县政府□同联委会统筹之。

第二十二条 各级队部之工作人员待遇，均与同级政府武装部门之工作人员同，各级队部之办公费□另定之。

第二十三条 本联防之武装弹药之筹划与分配，均以县为单位统筹之。

第二十四条 本联防区内之民兵、自卫队作战伤亡，遵照阵亡将士抚恤〔办法〕办理之。如有被敌人烧杀过重之村庄，得由各级联防区之联委会讨论，经政府批准，酌量抚恤之。

第七章 会议及任期

第二十五条 本联防之会议如下：

甲、县级定期为一年一次，区级联委会半年一次，中心区三〔个〕月一次。

乙、各级联委会之会期。边区常会半月一次，县级联委会定期为三〔个〕月一次，区级联委会定期为两〔个〕月一次，村武装委员会定期为一〔个〕月一次。如遇有临时事宜，召集临时会议。

丙、边区联委会由驻会委员，县、区、村级由主任召集之。

第二十六条 各级联委会之委任期与各级武装代表会期同，但得连选连任之。

第八章 联防公约

第二十七条 本联防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得由武装代表讨论制定联防公约。

甲、凡是年在50岁以〔下〕16岁以上，不分性别，一律参加联防（妇女自愿）。

乙、凡参加联防之村庄，一律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封锁袭扰敌人，服从联防委员会之领导，执行联防队部所指定的任务，违者以违犯联防公约论处。

丙、各联防村，必须侦察敌情、奸细活动，传送队部，如发现放纵与□□事情，以违犯公约论处。

丁、如遇不联防一村发现敌情者，联防村有在队部指挥之下无条件的互助相应援之义务。如遇情况紧急时，就近邻村应驰援之，如故意迟延不到者，以违犯公约论处。

戊、凡违背公约者，由联委会讨论决定〔以〕纪律制裁之。

附 则

本条例由各级武装代表会讨论，经政府批准后施行之。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暂行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该队定名为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第二条 该队为不脱离生产的义务的人民武装组织，依据政府法令在一定年龄内之男女公民均须编入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并在执行基本任务上接受政府之指挥，但在其组织性质上仍为人民自己之抗日武装组织。

第三条 该队以组织及加强广大人民武装自卫力量，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保卫人民利益，争取抗战胜利，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

第四条 该队基本任务如下：

甲、配合抗日军队作战，进行群众游击战争；

乙、维持抗日根据地的治安；

丙、担任抗战勤务；

丁、加强军政教育训练，踊跃参军参战。

第二章 队 员

第五条 本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之男子，18岁至45岁之妇女，除患神经病者、重残废及被政府褫夺公权者外，其余不分性别、种族、信仰、阶级，均应登记参加编制为该队队员

*原件无日期。据内文推断，当是1942年的文件。

(妇女暂以自愿为原则)。

第六条 该队队员有下列权利：

- 甲、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罢免权；
- 乙、参加本队会议者有发言权、表决权；
- 丙、对本队一切问题有建议权。

第七条 该队队员均有下列义务：

- 甲、遵守纪律；
- 乙、坚决服从上级领导指挥；
- 丙、坚决执行命令与完成任务。

第三章 组 织

第八条 该队于边区、专署、县、区、村各设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武委会)。边区武委会委员由9人到11人组织之(互推常委5人)；专署武委会由委员7人到9人组织之(互推常委3人至5人)；县武委会由委员9人组织之(互推常委3人至5人)，区武委会由委员7人至9人组织之(互推常委3人至5人)，村武委会由委员5人至7人组织之(不另设常委会)。

第九条 边区、专署、县、区、村各级武委会设主任秘书1人，下设作战部、组训部、青年武装部，各部设部长1人，干事若干人。边区级与县级武委会附设妇女干事1人(没有妇女自卫队者不设)。村级武委会直辖以下各队：

民兵队	{	模范队(班)
		青抗先(游击小组)
自卫队	{	普通自卫队
		妇女自卫队

第十条 该队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十一条 边区至区各级武委会均由各级武装代表大会选举之(在未正式成立武委会前得成立临时武委会)，村级武委会由队员

大会选举之，临时武委会产生由各级武装部门、各级抗联、各级政权军区军分区代表推选之。

第十二条 村级武委会为该队之基本组织，村武委会主任为该村行政委员会当然委员。

第十三条 边区至区各级武委会委员任期均为一年，村级武委会委员任期为半年，得连选连任。

第四章 编 制

第十四条 凡合于本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者施行男女分编，男子编为民兵队（自愿为原则）与普通自卫队，妇女编为妇女自卫队。

第十五条 编制：5人至15人为一班，3班为一小队，3小队为一分队（以行政村为单位，如有过大过小村庄，2班或5班可编一小队，2小队至5小队可编成分队）。班设正、副班长，小队设正、副小队长，分队设正、副分队长，皆不脱离生产。

第十六条 普通自卫队之分队、小队及班得以下列标准编成之：

甲、18岁至23岁编为青年队；

乙、24岁至45岁编为壮年队；

丙、46岁至50岁编为老年队。

第十七条 妇女自卫队之小队、班得依下列标准编制之：

甲、18岁至25岁之妇女编为青年队；

乙、26岁至35岁之妇女编为壮年队；

丙、36岁至45岁编为老年队。

第十八条 民兵队——青抗先、模范班或游击小组称为民兵。民兵为人民武装中高级组织并依自愿原则参加而组成之，执行比普通自卫队较高之任务，即农忙时从事生产，农闲时从事训练，战争时参加战斗，成为人民武装中之骨干组织。其编制标准如下：

甲、18岁至20岁之男子参加青抗先；

乙、21岁到35岁之男子参加模范班；

丙、21岁到23岁之男子参加青抗先或模范班，依队员本身自愿决定之，但不得同时参加两种组织。

丁、15岁至17岁之男子组织少先队，由青抗先领导之。

第十九条 凡参加民兵者不再编入普通自卫队之组织。

第二十条 普通自卫队之三大任务：

甲、站岗放哨、锄奸缉匪、抗日戒严、维持地方治安；

乙、担架运输、空舍清野、侦察、通讯、担任后方勤务；

丙、破路拆堡、构筑工事、救护伤病员，在“扫荡”时掩护抗日工作人员。

第二十一条 妇女自卫队之五大任务：

甲、站岗放哨；

乙、缝洗慰劳；

丙、侦察锄奸；

丁、救护掩护；

戊、空舍清野。

第二十二条 民兵之三大任务：

甲、袭扰敌伪，配合作战；

乙、破坏交通，掩护群众转移；

丙、侦察锄奸，封锁据点。

第二十三条 民兵除主要执行其三大任务外，平时也可执行自卫队之任务，但为了便于执行其高级任务，应尽量减轻其对普通任务之执行。

第五章 职 权

第二十四条 本队最高权利〔力〕机关为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为边区武委会。

第二十五条 各级武委会正、副主任职权如下：

甲、领导与推动各部门工作，召集本会各种会议；

乙、命令与指挥军事行动；

丙、对外交际。

第二十六条 各级武委会各部职权：

甲、作战部——①负责侦察敌情；②指挥作战；③研究民兵战术；④爆破技术指挥等；⑤并进行军事教育及送信联络等工作。

乙、组训部——负责组织调查统计及审查配备干部及平时战时的政治教育、宣传鼓动等政治工作。

丙、战勤部——负责担架、破路人力动员及民兵供给等工作。

丁、青年武装部——负责青抗先工作。

戊、妇女武装部——负责妇女队工作。

第二十七条 边区到村各级青年武装部在各级武委会的领导下，依据武委会之统一方针、决议与教育计划，根据青年特性，负责青抗先工作，但任免干部、作战指挥等统一于武委会，青抗先无单独行文发布命令之权。

第六章 人民武装部门与各方面的关系

第二十八条 武委会与抗联之关系

甲、各级武委会主任为各该级抗联当然常务委员（村级救国会则为武装委员），出席会议，报告、讨论群武工作及领导上的配合问题，不兼抗联主任，不讨论此种性质问题时可不出席。

乙、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群众工作的全部任务，因此，抗联须将群众武装工作作为自己部门工作的重要部分。群武部门得领导武装保卫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从日常工作中发动群众参加民兵，参加武装对敌斗争。

丙、抗联与武委会得互相委托到下级指导及随时注意检查工作，互相交换文件，交换经验，以取得工作之配合与帮助。

丁、武委会在通过群众运动组织民兵时，须依据抗联工作方针去进行群武工作，但抗联不得干涉武委会内部行政。

戊、抗先工作统一于武委会领导，各级武委会设青武部长，不

另有垂直系统。有青教会地区，青武部长应是同级青教会委员之一，青武部干部之处理、调动得商同青教会，但最后决定权在武委会。

己、青教会必须注意给青武部配备得力干部，妇教会给妇武部配备得力干部，并帮助发〔展〕妇女自卫队。

第二十九条 武委会与军队之关系

甲、武委会系人民武装领导机关，与军队无隶属关系，但在军事活动上，人民武装应该接受各级军事机关之指挥，但必须通过各该级之人民武装领导机关，不得乱加干涉。

乙、各级军事机关及部队，对人民武装教育训练有协助之责，并应带领人民武装对敌进行斗争。

丙、各级军事机关之军政会议及武委会之会议，得互相派人参加，以便讨论有关武装建设及军事斗争结合问题。

丁、武委会于每一工作阶段得向各该级军事机关汇报群武工作与军队之配合情形，但军事机关亦须向群武部门报告领导及建设人民武装事宜。

第三十条 武委会与政府之关系

甲、武委会系人民武装领导机关，对政府无隶属关系，但在执行人民武装基本任务上，如进行群众游击战争，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维持抗日治安，担任抗战勤务等，武委会必须接受同级抗日政府之领导。

乙、武委会有领导人民武装保卫抗日政权之义务。

丙、武委会应协助各级公安机关进行锄奸工作及协助各级工商管理局进行缉私工作，但均不得直接处理案件。

丁、各级武委会在侦缉盗匪、烟、赌、逃兵、走私等工作上必须接受同级政府指挥，并须将案犯送交政府处理，不得自行处罚，违犯者须受法律处分。

戊、各级武委会主任须兼各级政府之武装科长、助理员，出席政府重要会议；武委会之重要会议，同级政府之主管人或民教部门

负责人也须参加，以便讨论武装与政府结合问题。

己、人民武装之组织训练、干部调动、上下行文，武委会不经政府，自行处理之。

庚、政府负责供给武委会经费，武委会须向政府造预计〔决〕算（脱离生产干部是省粮款，民兵弹药地方粮款）。

辛、各级武委会须向同级政府作定期与临时之工作报告与经费报告，政府对武委会之开支有审核权。

壬、为了适应现实情况，便利工作，供给问题，各级武委会自行伙食单位（游击区之区可与抗联同伙），专县级武委会可向同级政府造领粮食经费，区级可由区部按规定代替造领，伙食单位须根据需要与某部门结合或自己单独。

第七章 会 议

第三十一条 本队边区、分区、县、区级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在临时武委会期间暂不召集），村队员选举大会半年一次，均由各该级武委会召集。

第三十二条 各级武委会召集会议时间如下：

甲、常委会，边区到县均为一月一次，区以下均为半月一次。

乙、执委会，边区到县均为半年一次，区三个月一次。

丙、联席会，边区召集分区半年一次，全区召集县半年一次，县召集区三个月一次。

第三十三条 各级代表大会、村队员大会及各级武委会于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

第八章 纪 律

第三十四条 本队全体队员及全体干部均须遵守本队条例，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第三十五条 违犯纪律者得按其轻重予以教育或处罚（批评、警告、处罚勤务、撤职、罢免等处分）。

第九章 经 费

第三十六条 本队经费来源如下：

甲、政府供给；乙、胜利品一部或全部。

第三十七条 本队经费由武委会统一预算，经政府批准，并由政府直接开支之。并须按月向同级政府报销，政府有审核本队经费之权（县以下统一于武委会开支）。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由行署、军区共同颁布，自颁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第三十九条 在本边区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未召集前，本条例之解释权与修改权属于行署、军区。

附 件

- 一、各级临时武委会的产生法；
- 二、各级临时武委会的编制及经费供给之决定。

各级临时武委会的产生法

一、在边区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未召集前，边区到区暂成立临时武委会。

二、边区到区各级政府负责召集同级军政民机关团体代表会议，推选该各级武委会委员及主任委员，成立临时武委会；村武委会是由自卫队队员大会民选产生之。

三、各级武委会的委员标准最好是：

1、边区武委会委员由行署、军区、抗联各产生1人，武委会正、副主任，各部部长，秘书为委员，并吸收分会3或2及县会主任1人为委员。

2、分区武委会委员由专署、军分区、抗联分会各产生1人，武

委会主任、各部部长及县会主任1人为委员。

3、县武委会由县府抗联基干队各出1人，武委会主任及各部部长及区会主任1人为委员。

4、区武委会主任由政权、区基干队、抗联各1人，村会1人，武委会正、副主任，各部部长为委员。

5、村武委会由武委会主任、模范队长、抗先队长、妇女队长产生之。

各级临时武委会编制

一、边区武委会

1、主任1人。

2、组训部长1人，干事1人，妇女干事1人（暂不设立）。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干事1人。

4、青年武装部长1人，干事1人。

5、秘书1人，缮写员1人，油印员1人，管理员1人，通讯员3人，伙夫1人，马夫1人，马1匹，公用自行车3辆，油印机1架，共计干杂人员16人。

（如各级武委会经费统一由武委会造报预决算，得增设会计1人）

二、专区武委会

1、主任1人。

2、组训部长1人。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爆炸）。

4、青年武装部长1人。

5、秘书1人，通讯员1人，伙夫1人，公用自行车2辆，油印机1架，干杂人员共8人。

三、县武委会

甲等县

1、主任1人。

- 2、组训部长1人。
-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爆炸）。
- 4、青年武装部长1人。
- 5、抗勤部长1人。
- 6、秘书1人，通讯员1人，伙夫1人，自行车1辆。共9人。

乙等县

- 1、主任1人。
- 2、组训部长1人。
-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爆炸）。
- 4、青年武装部长1人。
- 5、抗勤部长1人。
- 6、通讯员兼伙夫1人，车子1辆。共7人。

丙等县

主任1人，干部〔事〕2人，通讯员1人，共4人。

四、区武委会

基本区

- 1、主任1人。
- 2、组训委员1人。
- 3、作战委员1人。
- 4、青年武装委员1人。
- 5、抗勤委员1人。
- 6、通讯员兼伙夫1人，共6人。

游击区

主任1人，干事2人，共3人。

五、村武委会

- 1、正、副主任各1人。
- 2、组训委员1人。
- 3、作战委员1人。
- 4、爆炸委员1人。

5、青年武装委员1人。

6、妇女干事1人。

7、抗勤委员1人。

村级按工作之需要得设干事若干人。

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问题*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杨 泽 江

(一)什么是群众团体?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是什么?群众团体与军队、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关系怎样?在边区有许多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有的是正确,但也有不少是错误的,同时又在几年工作中不断改进这种认识的。因为群众团体的立场是决定群众工作任务、工作方式与各方面关系的根据,所以过去在工作中便产生了种种的错误。

现在仅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团体干部立场问题作一初步的原则研究,并希望能引起各地同志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二)过去我们有些什么错误认识呢?

第一,认为群众团体干部与八路军、抗日政府干部一样,认为群众团体只是军队与政府的御用机关。这是一部分干部尤其在民国29年动委会时代前后厉害的一种错误认识。因此,突击屯粮、募捐、扩兵等成了主要工作任务,行政命令,威吓压制群众便成了□□□工作方式。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便衣八路军”或“七路半”,便产生处处谈政民配合,与军政比地位,比享受待遇,甚至相互垮[拆]台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就使群众团体与军政各方面的关系至今没得到正确解决,并使群众团体干部在衣食言谈作风上十足八路军化、官僚化了。

第二,认为自己是先进的人,是“群众领袖”,是工作人员,是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边区抗联1943年1月20日编辑出版的《工作研究》创刊号。

上边派来的，而认群众为阿斗，为落后农民，因此群众便应将自己看作是上级，是领袖，甚至是老爷，是“官”，这在过去几年中是相当厉害的一种认识。

从这立场出发，□□抗日，高喊民兵联防，向群众要东西，发展组织，巩固整理组织便成了主要任务，自上而下的、偷偷摸摸的□□作风或强迫命令，便成了主要的工作方式。因此，脱离群众的空谈主义、官僚主义，抗战□□的坏作风便相当长时期的在群众团体中占了统治地位，在衣、食、住、行、言谈各方面创造了与军政尤其与广大群众不同的特殊化的一套习惯。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群众运动的长期消沉，会员越组织越少的严重现象。

第三，在开始开展民主民生运动转变〔为〕群众运动的时候，一部分人的错误认识是：认为自己是上边派来的工作人员，是为农民作好事的，是准备将来当“群众领袖”的，而自己不是群众，群众的力量也是不可相信甚或是无力量的，因此便产生了干部包办代替群众斗争和过分依靠政权的严重错误，严重的阻碍了群众的发动与民主民生运动的实现。

第四，对农、青、妇各救会的认识不同，立场认识不明确，在目前仍是十分严重的。过去曾认为农会应照顾各阶级利益，青救、妇救应将全体各阶层青年和妇女利益一般的平等看待，都是不正确的。

以上四种认识的共同错误是：

1、自己是工作人员、八路军、群众领袖，甚至是统治者，并不是老百姓，因此可以站在群众头上“屙屎屙尿”。

2、群众的痛苦不是自己的痛苦，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不是自己行动的根据，而只有“抗日救国”要东西，才是自己的主要工作。

以上四种错误，是随工作的发展逐渐发展和形成的，在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错误认识。在目前来说，一般的是以第三、第四种为最严重。

（三）为什么产生这些错误认识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边区群众团体主要是在树立起抗日根据地以后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群众团体的干部又多是小资产阶级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农以上的农民，真正的工农干部是少有的（个别也腐化了），他们在长期合法保障情况下□□□□与实际群众斗争，与工农大众发生血肉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干部未得到彻底改造，也就形成产生以上错误认识的主要根源。

第二，边区群众基本上未真正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干部也未真正的领导群众斗争，造成干部对群众力量、群众利益认识不明确，对群众作风、民主作风在群众运动中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更由于抗日战争对人民的要求十分频繁，干部多用强制命令进行工作，因此就产生了“群众落后”、“群众无力量”，只有军队枪杆、政府法令、工作人员的强制方式才是力量，才能作出工作成绩的荒谬认识。

第三，我们在实际锻炼上，在革命理论修养上，是幼稚的年青的。这是一部分干部对群众斗争、群众力量，对群众团体的立场、工作任务，组织□□□□□□□□发生错误认识或认识不足的原因之一。

（四）我们群众团体就是老百姓的团体，干部的立场就是老百姓的立场。因此，农会应是农民的团体，就应代表农民利益；青救和妇救应是青年和妇女的团体，就应代表全体青年和妇女首先是大多数工农青年、工农妇女的利益。因此，各救会的干部就是老百姓，就是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而不是政府、军队干部，更不是官僚了。

因此，群众团体就应有自己独立的组织，□□□□□□□□要求，独立的斗争方式与独立的人格；军队、政府□□□□□□不应包办他、代替他，群众团体也不应机械的学习军、政、党的一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将农民阶级和广大人民真正发动起来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摧不毁打不烂的伟大力量。

因此，我们还应注意下面几个问题的实现：

第一，应将群众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负责解决，应将群众

的要求当作自己行动的根据，应将保卫群众利益当作自己第一等任务，当作团体工作任务提出的出发点，要随时随地为群众利益着想，绝不作一件违背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就要耐心的听取群众呼声与意见，要随时随地都知道群众心里的跳动、呼声与要求，并切实领导群众为满足自己要求去斗争，绝不空喊和以无丝毫价值的单纯允诺给群众。

第二，抗日民主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八路军及任何抗日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应拥护他爱护他帮助他，并亲密的团结起来，为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响应党军政的一切号召，以及为打倒日本法西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共同任务去奋斗到底。

当某些法令和事情与群众利益、群众要求相抵触或暂时抵触时，我们一方面应耐心说服群众，克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长久利益、全部利益的矛盾，一方面应随时随地向上级团体报告或向政府、军队建议，求得合理解决，绝不可漠然视之、置之不理，或侮骂群众为“落后”为“顽固”，更不可不尊重军政法令与威信的无原则的乱批评。

在这方面，群众团体干部没有任何合法团体和人民以外的特权（如捆人、罚款、杀人等违法行为）。我们应作执行法令的模范，应经常接受党军政各方面的指导与扶助，但绝不可在工作上形成配合机关或特殊人物，同样也不可运用军政同样的权利与方式去对待群众、领导群众。

第三，我们应善于根据群众的现实政治经验去领导群众前进，绝不可命令群众、强制群众，犯先锋主义，以避免脱离大多数群众，形成“光荣的孤立”状态。因为认为自己是上级团体，是“群众领袖”（？），群众就应绝对服从自己的观点，是不认识群众，不懂得民主，不懂得组织原则，不懂得领导艺术的脱离群众的封建等级观念或官僚主义。

我们应认识，群众是实利主义者，有浓厚的保守性、□□□□当群众未感觉到需要以前，是绝不会行动起来的，如果施以强制命

令，必会遭受到相反的结果。同时我们应认识，当群众认识了真理时，必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不可制服的力量。因此当群众失去了正确的政治领导时，必会引起组织涣散，行动不统一，以致失败的危险。

所以在领导群众的方式上，应善于发扬民主精神，服从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并应善于不断反复的说服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经验，并根据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去领导群众前进，只对破坏群众利益的个别破坏分子、顽固不化分子才采取强制方式。

所以群众落后论是错误的，干部包办代替群众斗争，对群众的官僚主义态度以及强调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主义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我们不但要善于领导群众，同时应该虚心、诚恳的不断向广大群众学习。因为大多数干部的生产斗争知识与社会斗争知识比起广大工农群众的知识来说，是相差甚远的。过去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奇迹，历史上的英雄及现在的伟大抗战与任何一事业，离开群众力量的积极发挥与支持，是丝毫不能成功的。过去的一切伟大发明、伟大斗争，以及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工作方式，离开广大群众的创造性，是无法发[实]现与进步的。就是所谓“理论”，也是数千年来人类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或一个伟大人物空想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工作离开理论固是不能正确的行动，同样应认识，我们的工作与理论离开了群众斗争，亦是无法创造与前进的。

因此，我们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应不断向群众学习，并从群众行动中、经验中来不断改造自己，改善工作与团体的领导。因此，部分干部认为自己的一切比群众强，自己只是群众的先生，不是群众的学生的自高自大英雄主义，是应在群众斗争中即刻消灭与克服的。

第五，为了正确掌握群众团体的立场，干部必须与广大群众生活在一起，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群众一样，使自己的服装群众化，言语通俗化，并在待人接物生活习惯上尊重群众的传统，绝不特殊

化，绝不脱离群众，以保证随时随地保持干部与会员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这问题虽不是转变群众运动的中心问题，但如不注意，必会增加工作的困难，造成脱离群众的错误。

最后，我们大家应认清，群众团体干部脱离了群众，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就会全部丧失自己的力量与丧失团体存在的可能。因此，希各地同志们对此问题提起高度注意，并不断改进我们的认识与全部工作。

减租增佃工作中的 几个具体问题*

(一九四三年一月)

元 贵

在濮、范减租增佃工作中，遇见了几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未开始工作前，是想不到的。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的减租增佃工作中，可能也将遇到。兹根据濮、范工作经验，提出下列解决办法，以供各地同志讨论。

(一) 里打一股(即里打一劈)的增佃问题

里打一股是小种制中一种比较隐蔽的超经济剥削，在濮、范一带，佃户把它叫做“养老股”，是有很大大意义的。里打一股的办法有两种：一为东家(小种地的地主俗叫东家)参加部分劳动，里打一股；一为雇用廉价雇工里打一股。在第一种办法中，东家只参加部分劳动(不是参加一个人的全部劳动)，分粮时却当一整股来分。更其甚者，东家只参加辅助劳动(指打水、喂牛、赶大车等)，或叫不成年的子弟与年过五六十的老头子参加部分劳动，分粮时分正[整]股。在第二种办法中，东家雇用劳动力不大的雇工参加劳动，这种雇工因为劳动力不大与纸币跌价的原因，工资是很低的，东家就从这里来渔利。这叫做两头(佃户与雇工)吃亏、一头赚便宜的办法。

增佃办法是先实行二五增佃，再教育佃户把里打一股改为破股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边区抗联1943年1月20日编辑出版的《工作研究》创刊号。

——就是少出力少分粮，多出力多分粮的意思，雇工要实行以粮代价。在才开始减租增佃的地区，为了减少地主的阻力和易于发动佃户，对已实行里打一股者，暂不改变，等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再领导改变里打一股的斗争。但增佃后，地主为了报复而里打一股时，则坚决反对。

（二）干半劈的增佃问题

什么是干半劈？就是小种制的佃户在东家吃饭，把每年应分的粮食拿出一半，给东家当饭钱。这种干半劈怎样增佃呢？于是就成了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把增佃的粮食同样分给东家一半，另一种主张把增佃的粮食全部归佃户。在这两种主张中，我们的意见还是以第一种主张比较好些，因为佃户吃东家的饭，不论年景好坏，收成怎样，都是给东家一半粮食（自己应分粮食的一半）。是否吃东家饭，可由佃户自己决定，如佃户感觉不合算，可以不吃东家的饭。

（三）多给铡草喂牛的佃户几斗粮食的增佃问题

在濮、范常有这样的租佃关系，一个东家觅好几个佃户，其中有一个佃户除耕种土地外，还负责给东家锄〔铡〕草、打水和喂牛，照例东家每年多给几斗粮食（有4斗、8斗和一布袋不等）。增佃办法，除按应分之粮食实行二五增佃外，多给之粮食亦增加25%。

（四）二地主增佃减租问题

二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大地主出租给二地主，为大种地制或定额地租制，二地主再出租给佃户时为小种制。这种二地主是应〔允〕许存在的，因为小种制是比大种制或定额地租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主要原因是二地主参加经营）。增佃减租办法，是二地主对大地主原则上实行二五减租，但主要的还是佃户对二地主实行二五增佃。

另一种二地主，是大地主出租给二地主，为大种制或定租制，二地主出租给佃户时，亦为大种制或定租制。这种二地主很少，要遵照边区政府土地使用条例，严加禁止。其减租办法，是佃户直接对大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就是根据大地主出租给二地主的租额，实行二五减租，不是根据二地主出租给佃户的租额去减。

（五）老幼孤寡与抗属减租增佃问题

有些老幼孤寡，因自己无生产能力而将自己土地出租，佃户一般的说中农以上者居多。对这种地租，我们主张根据具体情形，以调解方式不减、减一成、减一成五或减二成，其负担依照政府规定办理。贫农抗属出租土地时，减租增佃办法与老幼孤寡同；如抗属系中农以上者，仍根据法令实行二五减租增佃，不得将减租增佃问题与优待抗属问题互相扯皮。

（六）瓜田与菜园减租问题

瓜田原则上实行二五减租，如佃户不愿减则不减，因瓜田都一年一说，又无一定租额，地主可随便提高地租。如因天旱不收（如今年），所得不足成本，可根据土地使用条例第三十条，用调解方式进行减、免租。

菜园有一定租额（比普通地租高），可实行二五减租。

（七）战前战后租额问题

减租增佃是根据战前租额去减，这是每个同志所熟知的事，但在工作中遇着这样几种情形，即：

- ①战后租额变化，同时副产物的分配与负担问题也起了变化；
- ②战后因土地变坏而降低租额，或因土地变好而提高地租者；
- ③战后租额变化，而副产物的分配与负担问题并未起变化；
- ④同样劳动条件同样土地，而租额不同。

对这几种情形，我们减租增佃办法是这样：

第一种，要根据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和增佃，但副产物的分配和负担问题也同时按战前分配情形与负担情形去解决，就是战前副产物怎样分配就怎样分配，战前怎样负担就怎样负担。如政府有特别规定者（如行署规定在范县大种地与定租地实行二五减租后，地主负担8分，佃户负担2分），就依照政府规定实行负担。

第二种，要根据战后租额来减，因为土地变坏，地租就应该降低，土地变好，亦应提高地租。这种情形在黄河两岸地区常遇着。如不因土地变坏或变好而改变租额时，就依照战前租额来减。

第三种，根据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增佃。

第四种，不管租额相同与否，要依照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增佃。因为要使全区或全县租额划一，是不可能的事情。关于大种制与定租制地租不得超过375%的规定，在边区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减租减息的几项重要规定》的布告已无规定，只是规定依照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如地租低于375%者，亦实行二五减租（详见边府《关于减租减息的几项重要规定》的布告）。

（八）变更负担问题

有些地区并未实行任何合理负担，或已实行合理负担而政府未明文规定负担办法者，大种制与定额地租制实行二五减租后，不变原来负担。如负担战前战后有了变化，可仍按战前负担办法实行负担。在范县这次减租增佃中，大种制与定租制实行二五减租后，地主负担8分，佃户负担2分；在濮县因为实行了简易合理负担，则地主负担6分5厘，佃户负担3分5厘，都是因为政府有明文规定，各地不可机械的采用。

在濮县、范县工作 总结大会上的发言（节选）

（一九四三年四月）

黄 敬

一、农村各个阶层的分析

首先了解划分各个阶层的根据。其根据在哪里呢？就是根据他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靠什么方法得来的（通俗说即用什么方法弄到吃喝）。这是确定为哪一阶层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个问题的分析，是以劳动得来的或不劳动得来的（所谓靠天、靠命、靠祖先都是错误的）。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有的劳动，有的不劳动，就产生了剥削与被剥削经济上的不平等，社会上就分成了阶级，但基本上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不劳动与劳动）。不劳动的人去剥削劳动的人，所以一般的说，劳动的人就是被剥削的，不劳动的人为剥削的。剥削阶级的生存是在打击他人抬高自己，他的幸福是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的，这就产生了他们剥削阶级的意识。

其次就是分析农村有哪些阶层。大体来说：

（一）从经济上来划分为：地主阶级、富农、中农、贫农、游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某些自由职业者。现在分开来讲：

1、地主

地主的生活资料来源，是不劳动的，是剥削阶级。他的剥削方式是封建剥削得来的，主要是依靠地租和高利贷两种东西（而地租更主要些）。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是革命的对象，不是一个革命的动力。因为他是一个封建势力，而中国

的民主革命就是要解决封建势力。但是要看到，中国的地主，特别是今天的地主阶层有很显著的不同，主要的是：由于中国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并且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民族矛盾都是主要的矛盾，因为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产生了上层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矛盾，因为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同，帝国主义对大地主拉的近，对中小地主拉的远，中小地主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厉害，另外，大地主与帝国主义勾结，在经济力量上比较大，他就形成农村的实际统治者。中小地主在一般的情形下，在政治上是无权的，这就发生了中小地主与大地主争权夺利的矛盾；地主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进行经济剥削，同样也剥削了中小地主。一个是有钱有势，一个是无钱无势，就产生了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就产生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矛盾。在今天的抗日战争中，地主一般都感觉到敌人的威胁，尤以大地主的威胁更大，因为他是当权者，有钱有势。因此就产生了投降派及顽固派（亲日的大地主及抗日的大地主）。但投降派的大地主还有很多的不同，与日本的关系不同，就有动摇的、后备的、坚决的诸种不同的程度。

（1）关于顽固的大地主。他的特点是抗日，但怕日本，感到抗日是抗不了的，再加上感到减租减息新法令的威胁，所以抗日〔是〕动摇的。但是基本上还是抗日的，特别在今天知道日本不能长了，更增加了他的抗日方面。

而投降派则对一切抗日的力量与人民都反对，已成为民族的敌人。而顽固派的大地主是农村的当权者，一切斗争都会遇到他，民主民生都从他那里去取得，因此他就感到痛，就要反对。但是这种反对是有限度的，只要我们一拉他，还可以回头合作而不到日本方面去。因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上座”，还要保障他的人权财权，所以需要懂得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的道理。只要我们的策略运用的好，就可以放手去斗争（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和条件）。因为我对顽固地主的斗争，是为了救他不作亡国奴，是“治病救人”。

（2）中小地主。不仅抗日，而且赞成民主，但是并不赞成民

生。但是他和顽固地主是有区分的：他赞成民主，顽固地主则反民主。这是我们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依据，也就是今天新民主主义的完成与“三三制”政权在全国实现与否的问题。有些同志以中小地主反对民生，则把他看成顽固势力，这是对中间势力要求过高的。我们只能要求他与我们一同对顽固势力斗争就可以，而不能要求他同我们进行改善民生斗争。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反对改善民生与顽固势力不赞成民生看成一样，是有基本上的不同：因为中间势力在民主问题上存有希望，这就缓和了他们的态度和反对的程度。同时，民主也可以改善他的民生，他可以少负担一点，可以改善了他的生活，就是说在民生中失去一些，在民主斗争中又得到了补偿。

就是顽固势力反民生和反民主，但是他还希望我们去抗日，保住他的大部财产。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的，所以，只要我们的政策好，他仍可以被我们拉回来共同抗日的。

2、富农

基本上来说，他可以算作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他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剥削雇佣劳动，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剥削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富农有着比较不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未得到顺畅的发展，所以富农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表现在他也放一些高利贷，剥削雇佣劳动中夹杂了一些封建的办法，比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剥削更厉害，更带原始性。

富农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特别是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因为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的金融与市场，农产品则卖不好价钱而洋货更贵。一般说富农在农村是无权（也有例外），但富农是今天中国经济上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今天中国正是冲破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压迫发展资本主义，而富农就是其代表。同时，富农在政治上有抗日民主的要求，因此在民主革命中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今天抗日，实行民主，在抗战后实现全国的民主。他是一个民主的势力。

3、中农

他的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劳动，一般说并不剥削他人。他的生活是自供自给，有时还有些富余，或者爬到富农，或者扩大再生产，或者放一点高利贷（在生活来源中不占重要地位），有时也雇几个短工，这一般的是富裕的中农。

由于战争及封建的压迫，一般的说中农是向下低落的阶层，上升的机会很少，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这也就是贫农逐日增多的原因。他的受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往往以商业形式、土地关系形式、政权形式上来出现。有时买地也受到大地主的排挤（买不到好地，自己的好地反可以□□□）。有时年景坏了，还受到高利贷的剥削。中农因为土地较少，在政治上无权，因此他们的政治表现不仅抗日，而且赞成民主及改善生活，在民生改善中可以□□改善其生活，减息以后可以借到一些钱。特别是当封建势力削弱以后，他可以有大量发展的可能。他们具有强烈的民生要求、民主要求及抗日的要求，因此他们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不仅今天可以共同实现民主革命，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是我们的同盟者。“因为他人多地少，□了也不要紧。”但这又表现了他们的自私自利还有顾及〔忌〕。他们不爱惜别人及公家的东西，包含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企图打击别人上升。这种思想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很容易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主要是经过中农传到党内来的（在农村）。只有加强民主教育、改造以后，才可以变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害怕中农，不仅在民主革命中，即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农对我们的态度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虽然他有弱点，但基本上是一个劳动阶级；虽然可能产生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可以克服的。在根据地民主民生斗争胜利以后，贫农有了保障，即可以上升为中农，因此对中农的政策更加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克服中农的思想不是从打击与排挤他们，而主要的是接近他们教育他们，克服他们〔的思想〕，叫他们了解只有与

无产阶级一道，才可以有利他们，求得与我们合作到底。

4、贫农

是一个劳动阶级，完全被剥削的阶级。一般说没有地或地很少，不够吃，须要作些短工、小生意或小手工业，或者吃一些糠，甚至要一些饭，诸多方法以补其生活的不足。有的同志把贫农认为就是佃农，这是不对的。因为佃农不是一个单独的阶层，主要的虽是贫农，但也有中农，甚至〔有〕个别的富农。这不是一个划分阶级的标准。

贫农经常受到生活的威胁，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受着中国一切的剥削，是比中农还厉害，在□□最没有地位，最痛苦。因此他们的革命情绪□□，仅次于雇农，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天然同盟者，比中农更可靠些，在数量上并不少，是革命的主力军。

5、雇农

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资料来源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他们的痛苦也最深，受到三方面的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富农的一切损失都尽量转嫁到雇农身上去。所以雇农是今天农村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阶层，最有觉悟性，没有家室之累。但雇工也有他的弱点，如：

（1）农村的雇工很少。因为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尚不发展，加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则其文化程度很低。

（2）由于农村大规模的富农经济没有出现，他们处在分散的状况，成为中国农村雇工在质量上很差的弱点，组织性及纪律性都不强。

（3）很大一部分从贫农破产而来，小生产者的意识在他的头脑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很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些弱点往往成为对方进攻的弱点。我们应很好的教育与改造他们。

6、知识分子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的情形。由于中国之殖民地半殖民

地及半封建性，使中国民族有不可终日的现象，目前则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社会生活也是不可终日的，使民不聊生，直接威胁到知识分子，感到失学失业，没有出路。

另外，由于中国不民主，文化落后，中国的工农文化很低，所以知识分子就起了特殊的作用。许多科学的知识，都要依靠知识分子来传播。他们政治感觉比较灵敏，文化水平较高，所以在革命中他们往往起先锋及桥梁的作用。如清之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首先都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所以，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革命是很可宝贵的。

但是知识分子也有他的弱点，就是其知识主要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他们的实际经验很少，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起来。另外，由于知识得来容易，把一切事情都看的很简单很容易，看不起工农群众，轻视物质力量，自高自大，非常空虚，经不起挫折，困难来了容易动摇，只相信自己，易犯主观主义、英雄主义。这就必须把知识分子改造，把他的理论经过实践的考验，克服他的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把知识分子、工农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才有活力，才是可宝贵的。

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是不可缺少的，必须以大力来争取他。因为工农没有文化知识，而革命是有理论、有战略与策略的，这就须要以知识分子的文化来提高工农的知识。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把两者的缺点克服。这就要求党很好的注意争取与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

在抗战以来，从党的主力都转入了教育部门，强迫很多学校教员参加国民党。他们很了解，思想阵地一丧失，则一切都丧失，就永不能翻身。因为思想是推动人进步的力量，所以我们与他人斗争，首先要争取思想阵地。而今天的国民党员都退到小学校中去，等待“天时”。因为小学校教员是农村思想领导的中心，我们就万万不能忽视这一工作。在农村中，封建势力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力量，我们必须承认，可是我们过去对文化工作做的很差。例如，小学教科书找不到“共产党”三个字，而共产党则是新民主主义的灵

魂。今天边区群众反而害怕共产党，这就是由于我们文化工作的落后所致。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一般的说，他们可以参加革命的。除了一部分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势力服务以外，一般的知识分子可以争取来参加民主革命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区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知识分子的子弟。他们的子弟往往大部分可以革命的。只要我们政策不错误，则可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的。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耐心争取与改造工作，二者都不应当偏废。

7、手工业者

即自己出卖劳动力，有着生产手段，独立生产。他们的上层可能雇佣少数人，下层则一般是不雇人的。他们受到帝国主义、高利贷及商人的压迫。他们是可参加革命的（下层革命性更强）。他们一般与中农差不多，只要我们的贸易工商政策不犯错误，他们也是可靠的同盟者。

8、商人

有两种：小商人不剥削人，主要的靠自己；少数上层有少数的剥削。前者比较好，后者比较差。只要我们贸易政策不犯错误，他们可以参加民主革命的。一般商人大体同富农差不多（大的商人除外）。他们若没有土地，则与村政权的关系不密切。他们也具有民生要求，反对苛捐杂税；而小商人则更有民生的要求，更加接近我们。

（二）总结起来对这些阶层作了经济上的分析，现在再从政治上区别他们，基本上有四种：

1、投降势力（亲日派）

他们的社会基础为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及少数的游民阶层，内部成份复杂，经常在政治上起变化的。

2、顽固势力

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抗日的。不赞成民主民生，当他处于优势的

时候，想尽办法阻碍之；处于劣势的时候，则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优势，但搞不好，则可以跑到投降派方面去。若我们的政策好，在民主民生实现以后，顽固势力不跑掉一个，并且部分的或个别的转化为中间势力，表现他们在民主运动上的积极性。他们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也有例外，在一定条件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是顽固势力，如李、白、阎等地方实力派。当我们的斗争仍限于国内当权派时，并且对他们有利时，他们为中间势力；但当斗争转到对他们的时候，则为顽固势力。在农村中也可以找到这种人。此外，本身为顽固势力，不一定为大地主，但他是当权者，斗争到他的时候，则表现一定的顽固性，但又同大地主的顽固性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对顽固分子之态度机械化了，应当尽量把某些个别的顽固分子争取转化为中间势力，运用中间势力的旗帜打击顽固势力，是重要的武器。

3、中间势力

在经济上基本上中小地主及富农、商人和作坊主（中等资产阶级），而在政治上中小地主即为开明的地主，但个别的大地主也可能为开明的。对商人，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是可以争取为我□商人的。因为目前敌人对商人的苛刻是空前的（天津倒闭了3000家商店），如低物价政策下，商人的痛苦是更大的。

中间势力在政治上不仅赞成抗日，并参加民主斗争，但不一定赞成改善民生。在将来，中间势力的范围可能起些变化的，但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中小地主则可以转化为顽固势力。但在新民主主义整个革命阶段中，不会发生基本变化的（个别变动是可能）。

4、进步势力

雇工、无产阶级、农民（主要指中农及贫农，富农在内）、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进步的，部分为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

（1）游民阶层的划分。他们的立场很不明显（有乳就是娘），但是游民是无产阶级的一个落后的阶层，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可

以成为进步势力。从我们的政策与他的可能发展的前途，是进步势力；从现状来看，他是动摇的阶层。

(2) 青年的阶层的划分。青年与其父兄往往不是一个阶层，不了解生产的关系，他有上进心，有知识（一般都念过几年书），受到帝国主义及封建压迫（即宗派关系及社教），在这一点上说，成为进步势力的可能性极大的，比其家属进步性是大的。因此，边区的青年运动有特殊作用。

(3) 妇女阶层的划分。妇女与她的公婆及丈夫不同，她受封建的压迫（婚姻的不自由，没有财产权及宗法社教的限制等）。妇女是各个阶级的，在争取之下有很大可能成为进步势力。

二、对濮、范两县环境之不同的认识

甲、两县在发动群众以前有何不同？

(一) 濮县：经过了顽军长期的盘踞，叛军走了不久即开始了民主民生运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由于顽军的存在，从阶级力量之对比来看，顽固势力不仅在农村有他的优势，就濮县全县来说，有他总的优势，上下是一致的。但由于濮县的顽军比一般的顽军更坏，在农村里顽固势力上下勾结，鱼肉乡民，许多中小地主及富农因而破产下降。而当权者及与顽军有勾结者则不同，进步势力则只感到活不下去了。长期□顽军盘踞，消耗了顽固势力的政治资本，不仅进步势力反对他，中间势力也来反对他，顽固势力的政治资本几乎耗尽了。因而引起了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在民主民生上的极大不满，他们有了共同的要求，长期的锻炼了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具备了强烈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所以在长期反顽斗争中就建立了我党我军的高度威信。在局面一打开，他们就要求实现民主民生。所以我们的干部一去，民主民生斗争即广泛的开展起来了。

(二) 范县：抗战以后，一般的说，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优势，顽固势力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但当我们取得了初步优势以后，

并未抓紧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中心环节，长期的维持了我上优（有总的优势）下劣（下层为顽固势力）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深深的锻炼了顽固势力，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就采取了两面政策来对付我们。

其两面政策的特点：对上层则阳奉阴违，对下层则采取蒙蔽政策，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来保持他的剥削统治，采取口蜜腹剑的办法来压迫群众、剥削群众，使群众的民主民生的痛苦都转到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身上来，因此弄得不仅顽固分子不满意我们，即基本群众也不谅解我们。同时对我们的阳奉阴违，也麻痹了我们自己，一切都听士绅、名流的话，实际到了村里，完全是两样。例如合理负担在范县实行得最早，隐瞒的土地在60%以上，在群众看来是认为实行了40%。村长给他少报了几亩地，很感激，但结果地主瞒了很多的土地。有了“黑地”，则我们的收入要减少，则势必加重群众的负担，这样就造成了群众对我们的不满，而地主则乘机扩大事实，进行破坏宣传。

对当村长花样也很多，例如以轮流的办法当村长，其口号总是“□□”来支应我们，造成我与群众的直接的对立，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大大的垮下去。地主不仅把群众争取过去，甚至我们的共产党员也争取过去（支部的变质），结成一个顽固的统一战线。

由于范县局面打开以后我们没有真正实行了民主民生，使得地主有很多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地主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基本群众则在□□过了几年毫无办法。这就造成了与濮县完全不同的条件。

虽然濮、范两县有这样的不同，而范县的中间势力及进步势力都没有地位的，他们所受的压迫并不低于濮县。问题在于他们尚不了解，基本群众对民主民生要求在客观上都是存在的，因此以民主民生为中心的还是正确的，但斗争的道路与斗争的办法是不同的。当然，范县的中间势力及进步势力对顽固势力不满，但比起对八路军来则还近一些。但这一点揭穿了，群众会恍然大悟。

乙、两县在发动群众上，经过了什么不同的道路？

(一) 濮县：基本势力与中间势力对我们有高度的威信〔信任〕，他们有高度的民主要求。合理负担即为民主斗争，经过这一民主斗争，可以达到他们的民生目的，所以这一工作很快的完成了。同样，反贪污斗争也是先由民主斗争而转到民生斗争，增佃减租，然后再到彻底的民主斗争，最后即可达到抗日的斗争。

(二) 范县：开始是从减租增佃增资入手，在民生斗争中把顽固分子的面貌揭穿，把顽固分子孤立起来，把基本群众独立组织起来，划清了与地主的界限，然后即转入民主斗争中去，而后即可过渡到抗日的斗争。

以上是两县经过的不同路线，而两县的波折也是不同的。

在濮县，党在长期反顽斗争中有了经验，加以群众对顽固分子的不满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同志易为这比较平衡的发展所迷惑，而忘记了平衡中的不平衡，所以对于打堡垒的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都缺乏周密的计划，对口号的提出上、力量的使用上都不够恰当的。所以，濮县的斗争发展比较普遍，但深入性不够。

在范县，则因为阻力特别大，顽固势力特别高明，广大的群众在鼓里生活着，中间势力紧跟在顽固势力后边跑，所以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显著。群众一旦觉悟了，则情绪很高，而未动起来的地方仍甚消沉。由于这种不平衡，就不得不使范县的党采取打堡垒的方式，干部不得不集中使用。但也因过于强调了打堡垒，忘记了其他方面，这就是抓住了环子而障碍了对链子的掌握。所以说两县群众基本上起来了，而濮县比较平衡，范县则严重的不平衡。

三、为何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

性质基本上是民主斗争？这样认识对

边区发动群众有何意义？

在最初发动群众的时候，农村的优势没有在我们的手里，首先

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哪一种斗争开始。有的主张从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开始，有的则主张从减租减息增资开始。决心的不易下，就是因为民主斗争与民生斗争有性质的不同。民主斗争在发动斗争时到人较多，后一种斗争则比较少，增资仅是雇工，减息主要是债户，增佃主要是佃户，而这些人一般的条件下，都是占的比较少数（有的例外）。

但是由于两种斗争质量上的不同，则发生了争执。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等各种斗争，在雇农佃户未觉悟以前，参加这个斗争是不大积极的，参加积极的为中小地主、富农和中农。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加上中农，尚未组织起来形成独立的力量时，加以基本群众很多先天弱点，如文化水平很低，政治经验及社会经验都很少，技能也差的远，在思想上组织上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所以在这些斗争开始时，其领导权往往落在中间势力的手里，要不即为干部所代替。所以，这种斗争虽然可以吸引较多的人数，但质量差。基本群众虽然参加了，但是他尚未觉悟起来，而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很容易妥协，特别在顽固势力很大，基本群众未发动起来，往往会出卖这一斗争。而增资减租减息则不同，斗争以后基本群众很快会形成独立的力量。当这时，中农则大量的倒过来（与前者不同）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这样过渡到下一个斗争，则有了骨干的保证。我们去的干部若比较弱，当基本群众与地主的界限还很含混、顽固势力的蒙蔽力还很强、中间势力尚未分化的时候，先开始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往往是失败的（范县即如此）。而当顽固势力已经比较孤立条件下，则前几种斗争即可以开始。所以，究竟哪一种斗争先开始，各县各区都是不同的，各有它基本上的不同特点，所以，这就必须从具体条件出发。

所以，反贪污斗争、合理负担、查“黑地”表面上看是民生斗争，实际上是民主斗争，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但民主斗争，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是为了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剥削，结果

还是经济利益，但不等于经济利益。这样就可以确定斗争的果实处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处理果实时必须慎重。

究竟怎样进行这三种斗争呢？首先就是在群众发动的时候从民主斗争开始。但在斗争开始的时候，领导权往往在中间势力手里。这时我们要了解，中间势力的参加这种斗争，是由于他也活不下去，非斗不可了，参加斗争是真实的，不是假进步。虽然他们是真实的，但是他们的幻想很多，只要顽固势力相信他们的地位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一脚把基本群众踢开，与顽固势力妥协的。所以，在顽固势力的引诱下，基本群众要起来的时候，〔他们〕出卖这个斗争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带有很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

我们的态度是无产阶级立场。当这个斗争开始了的时候，虽然没有取得领导的地位，我们也要去参加这个斗争；虽然在基本群众与中间势力的界限未清楚划分以前，也要毫不犹豫的参加这个斗争。但是决不是永远作为中间势力的尾巴（尾巴主义），而应努力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把无产阶级的界限及中间势力的界限划分清楚，并在可能条件下争取斗争的领导权，使基本群众由被动到主动，转换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民主的环子过渡到下一个民主斗争的环子。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健全的统一战线，就能有保证的过渡到彻底的民主改造的斗争中去。而争取这种形势的转换，基本的一点就是把斗争的果实更多的在民生上着眼，使群众看清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的斗争对他们有利。我们要更多的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防止绝对化），但不要叫中间势力绝望。这样就能够把基本群众及中间势力的界限划清。因为在这些斗争中，中间势力更多的照顾他自己或者完全照顾他自己，而基本群众则更多的照顾他自己，两者的界限在斗争中就可逐渐划分开。但是我们对中间势力决不应因此界限而放松了对他的争取，正确的态度是一面斗争，一面联合。

在斗争开始的时候，行政的力量可以多用一点，以上层的优势帮助下层的劣势，这是完全可能的。当条件未成熟的时候，可以隐

蔽的发展力量，要善于运用政权的形式、自上而下的方式配合自下而上的斗争，但不能过多的强调行政方法。另外，派去的干部要积极的去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找积极分子建立农会，把群众的腰竖起来，启发其阶级的自觉，就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但干部配合他们，不是代替他们），和中间势力联合起来，树立自己的力量，以便条件成熟时争取优势，求得民主民生的彻底实现和建立正常的统一战线。

关于组织形式，如算帐委员会和合理负担委员会（严格说来这是领导政权的形式），它的任务不是执行政权中的一切任务，而是专门解决每一个专门斗争的内容。参加的人应该是“三三制”的，有基本群众，有中间势力，所以这一形式不等于农会。在这个组织中，共产党员及进步力量可以比中间势力大一点。在我们力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可以小一点，使中间势力有说话的机会，可以各得其所，启发其积极性。所以农会代替算帐委员会则是不好的，但是必须以农会来动员基本群众以公民的资格去参加算帐委员会。如农会弱一些，则可以由政权出头，但应以“三三制”的政权面貌出现。

另外一个条件，即在民生斗争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的地方，则我们在进行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的斗争，则在一种不同的情况下，就是农村已经产生了雇农、贫农、中农，已经结合为联盟，形成初步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势力则在我们民生斗争以后对我们有些不满，特别民主斗争，比较“左”的条件下（即便在好的条件下，也不会很满意的）。但另外他还希望在民主斗争中及抗日的斗争中来补偿他的损失，这样，他的不满可以消减一些。但在过左的情形下，他将怀疑是否要“共”（即实行共产）。总之，他会□有不满、恐惧与希望三种情绪在交织着。在顽固势力则更不满和恐惧，因为他有“病”，没有了解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他就尽量利用中间势力的不满与怀疑来组织他的同盟者，组织力量准备阻止民主斗争，因为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民主斗争。但是他基本

上还希望抗日，在这一点上，他还有一点希望，然而有一部分也就动摇了。基本群众在这时候则大不同，特别农村的雇农、贫农情绪非常高。中农也感到这些好事而要求民主了。游民分子也来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了，开始觉悟起来，但是程度还不高，特别由于多少年来的压迫，产生一种报复的思想，斗争的策略性还不高，只看对手的好〔？〕处而忘记了其坏〔？〕处，往往表现过左的行动。在这时候，我们的干部也往往只顾到立场、群众观念而忘记党的策略，为小利所迷惑。但对小利的争取是好的，必须服从大的利益，必须注意今后强调了民主而忽视了民生（群众的小利），而在群众头上泼冷水。基本群众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小利）是对的，但小利必须服从他们的远大的永久的利益才是好的，贪小利则不对。

所以，关于这个斗争在民生完成过渡到民主斗争时，领导上必须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1、基本群众进一步求得力量的较大与巩固，而巩固是主要的。这时群众的策略性是不够的，我们不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而是把策略性赶上积极性，对他的积极性还是要发展，不过其中心环子是在提高其策略性。两者都应当继续提高，而不是在压低其积极性去符合其策略性，而是提高策略性到积极性的高度。在组织上也是以巩固为主要环子，发展为次要的，来真实的把农会改造一下。选举时慎重举行，加强会员的组织观念，在大会上应宣布各种必要的事情，区县农会最好参加。把农会划分为小组，走上正常的状况，重心是巩固，但不停止发展。这时应以教育为主，要训练积极分子、会员和提高干部。

2、我们提高策略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基本优势的发展与巩固，在于发展进步势力中求得中间势力的联合，达到孤立顽固势力。这时候双方都来争取中间势力，这就须要注意方式与给以利益，同时还要有力量。所以，对中间势力的政策要慎重，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农村无产阶级已实现了它的领导权，基本群众有了力量，已经开始取得初步的优势。另外，从中间势力本身来说，也不要怕，

他与我们走比同顽固势力一同走有利（濮县就是例子）。一旦有了中间力量，就可以教育中间势力，揭破顽固势力的罪恶，从各方面来孤立顽固势力。

3、对顽固势力事实上要侵犯他，这是不可免的，但方式上一定要讲求，尽量地使他不破裂，少痛一点。这是为了作下一个环子的准备，即达到大家团结来共同抗日，发展普遍的游击战争及正常的统一战线。若搞错了，则会遭到很大的痛苦。但是民主一定要实现，决不应因为他不高兴就放松了对民主的争取，即在基本情况未改变以前坚决进行下去，但方式一定讲求，叫他少难过一点。

所以这一个阶段中的领导，三个环子的中心是争取中间势力。但防止对基本群众的积极情绪泼冷水，去讨好中间势力，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提高基本群众的策略性，并发展他的积极性，同时在思想上、组织上来扩大进步力量。把发展与巩固不应机械分开，但是我们发展进步势力的目的在达到对中间势力的争取，所以把策略性及巩固为中心环子。而同时顽固势力之能否孤立，就在于能否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争取了中间势力，才能巩固基本势力，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

但是，对顽固势力的孤立还要区分，斗争中还有拉，应根据具体条件出发。对中间势力，当我们已经取得实际的优势的时候，必须在方法上及形式上以平等待人的精神对他们，以启发其积极性，而不是降低我们的优势去迁就他。

四、发扬民主主义的精神和作风，是保证 群众运动的发展与深入的中心一环， 也是一切胜利的保证（略）

冀鲁豫边区抗联

关于村级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

随着边区群众工作的开展与逐渐深入，建立村级工作是在目前万分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一切工作在于村，村是一切决议、法令、指示的最后执行者，村是各种组织的基层，村是直接与群众联系的基础，这些已经是肯定的答案。村，它不仅是我们活动的战略基本单位，而且是一切物质供给的主要渊源，它不仅是一切具体法令实施园地，而且是统一战线的真实政策“三三制”政权实现的基本园地；团结与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日，又必须在村中来具体实现；至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发挥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又必须认真的在村中来作。如此，村级工作是非常复杂而繁重的了。正因为村级工作这样的复杂与繁重，它更加重了目前村级工作的重要性。

目前我们的工作虽然有了日渐开展与逐渐深入，但它还是有极大的不平衡，是以有的地区与个别村庄民主民生工作根本没有开展，群众没发动起来，抗日组织根本没有建立；有的地区则进行了减租减息、反贪污等民主民生工作，群众有了初步发动，而抗日组织亦有了初步建立。同时在这些地区，在发动群众程度上又有所不同，有的还需要我们继续发动，有的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作些深入巩固工作。正因为我们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在村级工作的复杂性上则更增多了，是以在我们工作较好的村子便产生了少数积极分子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影响工作不能深入，上级决议、计划便不能实现；在落后的村子或在我们工作较弱的村子，便是封建统治者

当权或地痞流氓专政，来镇压农民、阻止群众运动。在我们县区级的领导上不是包办群众，便是包办村级干部，甚至于多数领导同志看不起村级干部，因此，就忽视培养村级干部，以致工作混乱，便发生乱干蛮干的现象。除此以外，在我们中心地区，由于工作逐渐开展，工作范围与内容逐渐扩大与复杂，现有干部数量未有增多，新生干部未曾提拔之际，力量不够使用，工作上顾此失彼。在这样条件下如何实现村级领导，已成在我领导机关或干部中议事日程的中心了。

因此，我们就必须解决村级工作问题，充实村级工作内容，加强对村级工作的领导，使村级工作向着正确的道路发展。特别是目前开展群众运动中的村级工作，更有它丰富的内容，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工作方针与不同的领导方式、不同的作风。这样就需要我们在村级工作上一切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要从现实出发，从具体出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坐机关，下命令，必然会遭受到回击与碰壁，必然会使工作造成恶果与受到历史的惩戒。

根据目前工作需要及工作发展不平衡情形，关于村级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第一、几种不同类型村会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

由于我边区群众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故在不同的工作地区应有不同的工作方针和不同的工作方法方式。根据目前情形，我们提出以下的四种不同村会和具体工作：

甲、没有我们工作的村庄和我们工作初步开始、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村庄。在这些村庄，一般说来表现有以下的特点：

一、封建势力在村中占统治地位，村政权为少数人所操纵或为地痞流氓所把持。

二、农村中阶级关系没有很大的变动，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封

建势力都占统治地位。

三、群众对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军队没有明确的认识，时常被顽固势力所欺骗和蒙蔽，模糊群众的视线。

四、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压迫与束缚，群众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组织力量，甚至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敢向农村统治者进行斗争。

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应是大胆放手的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发动与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动员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参加民主民生运动，使广大农民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农会。同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农会组织，可让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参加（地主的儿子和妇女除外），在农会内不单独建立青年小组与妇女小组，以〔免〕妨碍今后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开展。

在这种地区和村庄的工作，应根据不同的情形、群众不同的切身要求来进行，一般说来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可以从减租、反贪污等工作开始，用来满足群众的要求，改善群众生活，使群众为着个人生活的改善而敢于向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发挥群众的斗争性和积极性，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

乙、我们已开始工作，群众已开始发动或初步发动起来的地区和村庄。在这些地区和村庄，它表现有以下的特点：

一、在我们的帮助和发动下，群众敢于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如减租、反贪污等，同时在斗争中一部分贫农有了组织——农会，但这时的农会组织一般说来是比较宗派、比较狭隘的（因这时农会会员多半是贫农）。

二、部分群众特别是贫农，开始认清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组织力量，能在农村中形成骨干，能向封建势力作斗争。

三、封建势力部分的被削弱，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统治，开始有了动摇。

四、在工作开始时往往是先进行民生工作，如减租，由民生工作转入到民主工作，如反贪污、改造村政权。当群众进行民生斗争

时，顽固势力往往在经济上采取某种程度的让步，在政治上仍设法维持其统治，但到群众进行民主斗争时，顽固势力则拼死挣扎，千方百计的来顽抗，形成斗争最尖锐形势。

在这样的工作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应是继续深入民主民生斗争，进一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特别是争取中农参加农会，在可能范围与具体条件下建立单独的青年与妇女组织——不设青年与妇女小组，团结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准备树立群众的抗日优势。

在这种地区和村庄的工作内容，一般说来应是：

一、继续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如反贪污、清查“黑地”、改造村政权，解决雇工复工问题等。

二、加强群众教育，特别是阶级教育与组织教育。

三、在下列的条件下可建立独立的青教会与妇教会：

1、广大中农参加了农会，他与贫农、雇农结成了统一的联盟，形成独立力量。

2、在农会里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有了自觉的力量。

3、在斗争中培养与提拔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的村级干部。

4、农村中的中间势力团结在农会的周围。

从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武装斗争，进行组织自卫队、模范班等人民武装。

丙、经过了减租增佃、反贪污等斗争，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并且群众已初步树立抗日优势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它的特点是：

一、基本群众已有了觉悟并进行了减租增佃、反贪污等斗争，群众已得到应得的利益。

二、村政权得到了改造（有的是建立了“三三制”村政委员会，有的是抗日积极的农民来掌握村政），自卫队、模范班有了组织，并且在抗日的进步分子掌握着。

三、村农会有了比较健全的组织，农民已认识到农会是自己的团体，在阶级认识上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敢于向封建势力作自觉

的斗争。农会能给农会员解决问题，并在村中有了威信。

四、中小地主同情我们，并有的富农要求参加农会，但顽固势力还企图“复辟”。

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应是调整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防止农民的过左行为，加强农村阶级团结，巩固农村统一战线，从加强农会员教育中（特别是阶级教育），从生产中（如组织合作社等）巩固农会组织，以树立群众的抗日优势。

在这些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一般说来应是下列几点：

一、调整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以巩固乡村统战，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

二、进一步加强会员教育，从思想上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们为保卫既得利益而继续进行斗争。

三、在有青救会与妇救会的村庄里，对青年农民和农民妇女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但对地主的儿子和妇女则应着重进行民族教育。

四、加强会员的民主教育，以平等精神对待各阶层人士，建立村会的经常工作，无论在组织上或在政治上巩固村会组织。

五、动员会员参加与掌握民兵，进一步改造与监督村政权，使其真正保卫群众利益，以防止顽固势力的“复辟”。

六、根据群众要求与具体条件，建立农村合作社，从生产上来巩固农民利益、巩固群众组织。

丁、经过群众斗争（如减租、反贪污等），村会有了雏形组织，但群众未发动起来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和地区，它的特点是：

一、在群众进行斗争时，不是群众性的而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包办代替，根本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

二、少数村干部的独断专行，不民主，包办群众，摆官架子，看不起群众，甚至有的干部被顽固势力收买利诱，以镇压群众。

三、在斗争中没有抓紧时机进行教育，群众认识不明确，不能相信个人的组织力量。

四、在进行斗争时单纯的经济观点，没有提高到政治眼光来估计和评价。

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一般说来，应是耐心的说服教育，动员群众继续深入民主民生斗争，从解决群众的迫切要求与细小问题中来重新发动群众。至于具体工作，一般说来应是：

一、加强村级干部与积极分子的教育，使其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能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解决切身问题。

二、纠正少数村干部的不民主、独断专行、包办群众的官僚现象。应以仁至义尽的态度，以民主精神来说服教育，对本质不好与不称职的村级干部，应适当的民主改选。

三、抓紧群众的迫切要求，不放过群众的细小问题来进行斗争（如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反“黑地”、反对村干的不民主等），发动群众。

第二、村会教育问题

甲、教育方针

目前我们群众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对广大农民及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应加强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但对地主的青年和妇女应进行民族教育，以巩固其抗战胜利信心，不为某些严重困难所影响、所动摇。目前我们的群众教育工作，必须使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联系起来，忽视阶级教育是不对的，但把阶级教育孤立起来而忽视民族教育，也是不对的。

乙、教育目的

群众教育的目的是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之在思想上巩固与我们的联系，以新的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巩固村会组织。我们要教育群众，目前不仅是为了抗战，而且为了将来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如果没有群众教育，不给群众以新的思想武装，这个任务是不会完成的。

丙、教育内容

一、思想教育

1、打破广大人民“靠天吃饭”、“事由天定”、“命该如此”的宿命论思想。

2、介绍苏联革命前后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的不同生活，特别要有系统的介绍今日苏联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对苏联有羡慕与景仰的印象。

3、指出农民们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合理、现在所处的地位以及将来的地位，用群众的实际经验来教育群众。

4、确定群众应有的人生观，应走的政治方向。

二、阶级教育

1、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2、中国有些什么阶级？各阶级都是怎样生活着？

3、农民的贫穷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要受冻受饿？

4、农民们要想不挨冻受饿，应当怎么办呢？

5、中国农村中的阶级分化。

6、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7、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

三、组织教育

1、农会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才能参加农会？

2、参加农会有什么好处？

3、农会的组织原则是什么？内部怎样来分工？各委员都是干些什么事？

4、怎样划分农会小组与领导小组工作？

5、怎样做个好的农会会员？

四、统战教育——包括民族教育与民主教育。

五、策略教育

用实际的生动例子向农会中的积极分子讲授（在此暂略）。

丁、教育方式

一、主要的是从实际斗争中，抓紧实用群众本身所体验到的来进行教育。

二、开办脱离生产的训练班，训练农会中的积极分子或村级干部（怎样开办另有指示）。

三、举办不脱离生产的农会员流动训练班。

四、通过会员大会或农会小组会议进行教育。

第三、村级组织建设问题

甲、村会组织形式及其职权

一、村农会

在村农会中一般的有会员大会，村委员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等。

1、会员大会

A、会员大会的职权

①为村农会最高权力机关。

②对村农会委员及委员会有选举、罢免、改组的权利。

③对村委员会之决议，有重新讨论通过否定的权利。

④有提出新议案，讨论通过交村委员会执行的权利。

B、村农会会员大会召开的手续及议事规则

①经村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召开。

②全体会员有 $1/4$ 的人数向村委员会提议，村委会得立即召开大会。

③会员大会必须有 $2/3$ 的会员到会才得宣布开会。

④讨论问题表决时，有 $1/2$ 以上的人数举手赞成，才算通过。

2、村委员会

A、职权

①为全体会员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

②研究和执行区农会（抗联）的工作指示和决议。

③执行村会员大会的决议。

④负责召开村会员大会。

⑤经常研究和解决会员及农民的□□□要求的问题。

⑥负责对全体会员进行教育。

B、村农会委员会的人员及其分工（即村会组织形式）

①主任委员

负责召开村委员会；

推动和检查各委员的工作，保证对村委会决议的执行；

在一般情况下，为村农会对外代表，特殊情况时，需经村委员会讨论通过委托之。

②组织委员

负责执行村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登记和统计会员，整理发展组织；

负责划分小组；

注意会员的优点、缺点，及时提出鼓励、批评和纠正。

③宣传委员

负责对会员进行教育；

调查和收集外界舆论和谣言；

统一会员对外的宣传口号。

④生活改善委员

经管农会自己的财产（经管办法由村委员会决定）；

代表农民利益提出讨论关于全村公共财产的处理及村中财政经济的意见；

注意和研究如何使会员及全体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积极进行生产。

⑤武装委员

负责研究和解决会员及农民对于武装对敌斗争的问题；

研究和解决战争动员和支差的问题；

代表农民利益协助自卫队长、模范班长工作。

C、几点说明

①关于村委员会委员数目问题：一般应是5人，大村最多可到11人，小村及开始组织时，最少不得少于3人（主任、组织、宣传），超过5人以上时，可设副职，或分别执行委员与常务委员。

②村农会武装委员，在村自卫队已有组织时而且自卫队长系农会员时，自卫队长可兼任村会的武装委员。

③村农会的生活改善委员，在村中已有合作社组织而合作社社长系农会员时，〔社长〕亦可兼任村农会的生活改善委员。

3、小组会

A、小组会的性质——是农会员过组织生活做工作的组织单位，是农会的组织细胞，但它不是一级组织。

B、小组会划分的原则

①每组以5人至7人为限。

②划分小组时，一般应注意到街巷居住远近及农民的生活习惯、感情结合等。但应注意其发生宗派现象、互相包庇的毛病。

③村委员会的委员应参加小组过生活。

④父子不同组，亲兄弟不同组，婆媳不同组，妯娌不同组，男女不同组。

⑤以富力分富农组、中农组、贫农组是不对的。

⑥在斗争中为了便于掌握，使积极分子不过于分散，划一两个积极的作核心小组，也是必要的，但不应是公开的，以免孤立。

⑦在整理农会时，为了工作方便，也可划出不保险分子为一组，或只将最多嫌疑的划分一组，以便整理教育。但应注意：第一，其组长必须是忠实可靠的；第二，不可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孤立、是外皮。

C、小组内设组长1人，由全组组员选举之（开始时也可暂时指定，有机会即再经全组通过或重行选举）。

D、小组长的职权

①传达村委员会的决议和指示。

②领导小组开会并当主席。

③领导小组进行工作，完成委员会给的任务。

④对小组组员进行审查和教育。

4、小组长联席会

①性质：不是权力机关，只集体汇报小组组员情形及工作情形，接受村委会传达布置工作，不作决定（但在整理不健全农会时也可暂代替村委员会职权）。

②小组长是推动小组活动的枢纽，必须是坚强可靠的积极分子充任之，尤其在斗争中须有先锋作用。

5、各种制度

村农会的工作制度，我们不能机械的来规定，这主要的是看工作需要与否，由各村自行规定，自行建立，但根据一般情形来看，提出以下几种制度：

①小组会7天一次、10天一次或15天一次（主要看工作需要，需要时可1日一次或1日数次），但平时最长不应超过15天要开一次会，否则组织会由松懈涣散下去。

②村委会7天、10天或15天〔召开一次〕。

③村会员大会，临时召集，暂不定期。

④组长联席会，临时召集，不定期。

二、村青救会

1、村青救会一般的亦有青救会会员大会，村委员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等。至于各种会议的职权，详见以后的村青救会组织简章。

2、为了建立独立的青年组织，在目前村青救会中可设下列委员，各委员的职权详见青救会组织简章：

①主任委员；

②组织委员；

③文化教育委员；

④社会服务委员；

⑤青抗先队长。

三、村妇教会

1、村妇教会一般的亦有妇教会会员大会，村委员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等。至于各种会议的职权及其他问题，详见以后的村妇教会组织简章。

2、为了建立独立的妇女组织，目前在组织妇教会的地方可设下列委员：

- ①主任委员；
- ②组织委员；
- ③宣传委员；
- ④生活改善委员。

以上各委员的职权亦详见村妇教会组织简章。

乙、会员成份及年龄

一、农会

1、农会是农民的阶级组织，参加农会的人一定是只限于出劳力的农民，换句话说，不出劳力的地主即不能参加农会。过去有的地方地主来参加农会，这是不对的，这是没有认清农会是阶级组织的错误认识，我们必须纠正。

2、我们组织农会与吸收会员时，必须注意到以下问题：

①当农民未发动起来，特别是贫农在农会中未形成骨干力量时，一般的是不吸收富农参加农会。

②当贫农在农会中能形成一种骨干力量时，我们应吸收和争取广大中农参加农会。

③当雇农、贫农、中农结成统一的联盟，在农村中形成一种独立力量时，农民已发动起来，应吸收抗日的同情农民利益的富农参加农会。

3、村农会会员年龄

①年在25岁以上的农民均可参加农会。

②年在22岁至25岁的青年农民可在其自愿原则下，参加青教会或农教会。

③年在22岁以下之青年农民均应参加青救会。若没有青救会组织，可参加农会；若有独立的青救会组织，则必须动员说服使其参加青救会。

二、青救会与妇救会

1、青救会与妇救会是农村中各阶层青年和各阶层妇女的统战组织，参加青救会和妇救会的人，是包括各阶层的青年和妇女，即是说地主的儿子和妇女均有资格参加青救会与妇救会。

2、在建立青年和妇女工作时，必须注意到以下问题：

①目前是以建立与巩固农会为主，故一般说尚不应提出建立青年、妇女组织的问题。因青年和妇女组织的建立，根据一般经验，是在农民发动起来以后，农民发动不起来，青年与妇女工作是很难做好的，故目前青年与妇女工作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村庄的事情。

②在未提出建立青年、妇女组织之前，并不是农会拒绝青年和妇女参加农会，而且是欢迎与争取他们参加农民会，但这只是以他是农民的青年和农民的妇女，才吸收他参加（因是农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因为他是青年、是妇女而吸收。换言之，地主及其他不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和妇女，农民应拒绝吸收，因为在农会内的青年和妇女，应一律把他们看成是农民。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生活上的一致，可以将他们按年龄、按性别划为一组过生活，但他们这一小组应是农会中的农民小组，而不应另眼看待他们成为青年小组和妇女小组。在村委员会内，不特设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但是农会中的青年会员和妇女会员，均有被选为委员之资格，那他仍是以农会会员的资格而当选，不是因是青年或妇女而当选。这就是说，应当把青年和妇女参加农会和将来青年、妇女建立独立组织看成两回事，不要将青救会、妇救会和农救会混为一谈，这样是会减轻将来妇女和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影响青年和妇女工作的开展的。

③青年和妇女独立组织的建立，应是在上述（见第一部分乙项）地区及村庄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时（见第一部分乙项工作内容第三节1、2、3、4各条），即可提出和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以满足

这一人群的特殊要求。这时农会应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和地位，来帮助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的组织。

丙、村会领导成份问题

一、农会

1. 农会的领导成份必须掌握在可靠的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积极分子手里。

2. 当农民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农会的领导成份必须以贫农为主。

3. 当农民已发动起来，农会的领导必须有中农参加。

二、青救会和妇救会

1. 村青救会与村妇救会的领导必须掌握在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手里。

2. 当村青救会与村妇救会中农以上的成份居多，而大多数贫苦青年农民与贫苦农民妇女还没有参加组织时，村青救会与村妇救会的领导成份上必须以贫苦的青年或贫苦的妇女为主。

3. 当各阶层青年和各阶层妇女大部分参加组织，同时青年农民或农民妇女在组织上占优势时，这时领导成份上除以青年农民或农民妇女为主外，必须有条件的（抗日的，赞成民主的，同情青年和妇女解放事业，并同情和拥护青年农民和农民妇女利益的）吸收其他阶层参加领导，在数量上不得超过全领导人的 $1/3$ 。

第四、群众团体与各方面的关系

甲、正确解决群众团体与各方面的关系。这首先必须明确认清群众团体本身的任务与工作范围。分开来说：

一、农会。农会是被剥削的劳动农民代表农民自己利益的组织，是合法的农民自己的团体。因为农民从来是被剥削的阶级，政治地位不平等，遭受重重压迫，必须有单独的组织来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此农会除对农会本身及会员指示工作，进行教育外，对农会以外的人民没有任何强制人家执行农会意见的

权利。

二、妇救会。妇救会是各阶层妇女的联合组织，所有妇女只要服从妇救会的章程，就有权利加入妇救会。因为妇女受着共同的压迫，有着共同的要求，主要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或要求生产以及解除其他束缚等。因此妇救会的组织就必须解决妇女这些不同要求，以团结各阶层妇女共同抗战。

三、青救会。青救会也是各阶层青年的联合组织。所有青年他们的共同的迫切要求是学习，我们的任务就要在思想上改造这一代青年，满足各阶层青年的共同要求。

四、所有这些群众组织，就是在政府所颁布的进步法令范围之内共同奋斗，求得群众的合法权利。所以，一切群众团体的共同奋斗、求得合法平等权利的实现，就是要使群众自觉的实行政府法令。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也就是实现政府法令。地主资产阶级几千年来以法令压迫群众，不许同他们平等，而抗日民主政府则是以进步法令给群众以合法的斗争武器，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

乙、群众团体与政权的关系

一、村政权对群众团体是指导关系。村政权不能干涉群众团体内部工作（在法令范围内），同时，村政权应帮助群众团体，使群众团体健全巩固，以便利村中工作的容易进行，但不能支配与利用群众团体，而应是尊重群众团体，因他是群众自己的组织，且是进步的抗日的组织。

二、群众团体对村政权是拥护、帮助、监督，但主要是应经过自己会员去作，不得形成群众团体的事务主义和包办代替。

三、农会会员被选为村长，或为全体农会拥护而选出的村政权，农会应以工作发展阶段之不同，进行不同程度的帮助。

1、在民生斗争阶段和民生斗争阶段后，农会对自己拥护选出的村长的帮助应特别多一些，因为：

①我们的村长经验能力低，如我们不大力帮助，会使他因困难

很多而灰心丧气，工作消极。

②因他虽在农会中不错，但一离开农会，和村中士绅地主各样人士打交涉，可能阶级意识模糊起来，以至于腐化，为人家收买。

这时的帮助，应从各方面帮助，但方式应注意，不要形成包办代替，应注意培养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威信。

2、在民主斗争阶段之后，村政权的独立工作能力大了，这时应严防包办现象。对村政的帮助方式是通过农会员，保证村政工作顺利完成。

3、农会开会时，必要时可以请村长来列席参加。如村中召开群众大会、干部会、村政委员会，开会时，也应请农会长参加，发表意见，以帮助村政工作的改进。

丙、村农会和人民武装的关系

人民武装，它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它是政权的组织部分。农会和它的关系，在工作落后的地方，人民武装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或建立了而不起作用，农会的武装委员对人民武装工作应更多的负责，通过自卫队及会员积极模范的保证作用，整理自卫队，建立模范班，甚至领导人民武装对敌斗争。但至人民武装的负责人民选出后，并能负起人民武装工作的责任，则农会应领导自己的会员积极在自卫队、模范班中起模范作用、保证作用，不应代替包办武装系统。

丁、群众团体与合作社的关系

一、村合作社是群众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社员是包括了农村中各阶层人士，因此合作社又是包括各阶层的统战组织。村各教会合作社不是领导关系，而是通过自己的会员在合作社中起保证与领导作用（特别是农会员），而不应包办代替合作社。

二、村各教会应扶持与帮助村合作社的发展，这主要的是应动员自己的会员来参加合作社，在参加合作社时各教会会员应起模范作用，以扩大合作社，使合作社向独立方向发展。

戊、村农会、村青教会、村妇教会的各种关系

一、村农会、村青教会、村妇教会，彼此间的关系是配合关系，而不是某一村教会可以领导其他村教会的。过去有的地方村农会包办村青教会或包办村妇教会，就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行为，我们必须纠正。

二、农、青、妇的要求不同，我们讨论各团体的工作时则应分别开会，不应混在一起。如减租斗争是农会的事，在发动农会进行减租斗争时，青教会与妇教会应动员青年与妇女响应减租斗争，到减租实现后，应在群众中进行解释教育，向农民说明青、妇出力的事实；等到青、妇讨论本身事情时，农会就应当帮忙。这样不但能增加工作效能，并且能加强农村群众团体的相互团结，如此有计划有步骤的来进行工作，比混在一起好得多。

第五、关于提拔村级干部问题

甲、各地应大胆的提拔新干部

一、干部的提拔条件

- 1、有新的民主民生斗争经验；
- 2、有能力，有发展前途；
- 3、是真正积极可靠的农民分子；
- 4、在群众中有威信，没有坏的影响。

二、提拔手续

1、应是由小组长、村委员、不脱离生产干部或区执委等逐渐的提拔。

2、由村委员提为区干部时，必须经县会批准。

3、目前提拔是暂时的，以后须经会员大会选出才是正式的。

乙、待遇

一、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

二、必要时可以按他的需要、工作能力、进步速度给予一定量待遇（由区报告县级，讨论通过后经分会批准）。

第六、深入村级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甲、认识村级工作的重要，明确村级工作观念，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是实现村级领导的基本问题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体验到，领导一个村的工作是不容易的。现在还有的干部对下层情况不知道，即使知道的也是少数，他们到了村里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不从细密处着眼，根本不问具体情况，把个人关在房子里主观想象的一套计划搬出来了。在会议上，同志们同胞们讲了一套，就分头下去各作各的去了。这样的村级工作是不会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现象是必须纠正的。

乙、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包办代替，是实现村级工作的中心环节

在过去的村级工作中，包办代替现象、独断专行行动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在村级领导上不是包办村级干部，便是包办群众，以至于在村中蛮干、乱干、瞎干、胡干，致使工作不能走入正规。有的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村中新贵当权，镇压群众，骑在群众头上撒尿，这样村级工作也是不会建立的。是以我们必须彻底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包办代替，反对少数干部不民主、独断专行，建立村级正常工作。

丙、深入检查、具体指导、具体帮助，是实现村级领导的实施步骤

我们要求在今后的村级工作中，区抗联同志要具体深入到村，到村会小组中去。在深入村会中的领导方式上，区抗联委员应参加村会委员会，为村会委员，将区抗联的意见在村会中讨论，变成村会意见来执行。其他在区的工作同志应参加村会小组会，或为副组长，将自己的意见在村会小组会中来讨论执行。这样容易发现问题与培养干部，同时更具体的帮助了工作。

在帮助工作上要具体，要多想办法，要多让下层同志发表意见，每件事要作记录，要多搜集下层材料。

以上是关于村级工作的意见，望各地同志接到后深刻研究，具体在村中来执行。如有不妥之处，望多反映意见，以便提出修正。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 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

(甲)区党委遵照北局、分局指示，为了发扬群众团体的积极主动精神，尊重其独立性，与避免对群众工作的双重领导，特决定自区党委以下各级民运部一律取消(个别初开辟地区，如特别需要，可暂时保存)，民运部长应通过各救团体公开系统被选为各救团体主要负责人，民运部工作人员一律分到各救工作。

自区党委至县委，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分区委只许设青年委员与妇女委员，支部只许设青年干事与妇女干事，以领导区村级青年与妇女工作。农会与工会工作，由分区委透过党团直接领导。村会归支部领导。

各级民运部取消后，要注意防止因民运部之取消而形成党内对民运工作忽视的现象。取消民运部，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正是为了加强各级党委对民运工作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各级党必须加以深切的认识，并对各级民运工作党员干部作深入的解释。

(乙)民运工作委员会的职权

民运工作委员会，是党委会的组织部分(并非办公机关，这是与民运部不同的地方)，其职权如下：

- ①研究计划与决定党在该地区的民众运动方针。
- ②受同级党委会委托，检查与督促各救党团工作。
- ③统一工农青妇各委员会的工作步调，求得适当的配合。

民运工作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交由各救党团通过公开系统实

现，不能干预各教会的日常工作。其对上级报告和对下级指示，均通过同级党委会。

（丙）民运工作委员会的组成

民运工作委员会，由各级党委的常委与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之重要负责同志（书记或副书记或各救党团书记）组织之，人数由7人至13人，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书记，必要时可设副书记（党委委员及其他条件适合之干部都可以担任）。民运工作委员会应定期开会，确实负起关于民众运动方针、原则与政策领导的责任。

（丁）与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的关系

民运工作委员会对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是指导关系，可以听取各委员会的报告，以资讨论与决定民运工作的整个方针与任务。同时各委员会有向民运工作委员会作报告的义务，各种委员会的决议与指示，不能违反民运工作委员会关于民运工作方针与任务的决定。

关于各种委员会的干部之调动问题，可以提出讨论与决定，但调动之权是属于党委会，民运工作委员会不能直接调动。

（戊）与各救党团的关系

各级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应成立党团，人数不可多，在目前说以3人至5人为适宜。各地过去成立的各救团体的联合党团，不合乎组织原则，应立即取消。

各救团体的党团，是归各级党委直接领导。民运工作委员会，可以受同级党委的委托，检查督促各党团的工作。关于各党团干部之调动，亦可以提出讨论与决定，但调动之权属于党委会，民运工作委员会不能直接调动。

（己）各级党委接到这个决定后，要切实讨论与执行。各级民运工作委员会限8月15日以前成立起来，并将成立情形报告区党委。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 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此次敌人“扫荡”，是对一年来群众工作的一个具体测验。为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工作与领导，要求各地委各县委接到此指示后，拿出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工作（检查工作不是消极的挑毛病、找错误，而是积极的发扬成绩，扩大成果，研究问题，解决困难，反省自己，帮助下级解决问题），作为讨论及执行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具体准备工作。

(二)检查工作的内容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各地参考（关于敌占区、游击区检查内容，各地委自订）。

(1)关于改善群众生活方面，我们不能盲目的、一般的说我们经过了民主民生斗争，已改善了群众生活，必须从实际上去了解其内部真相，才能真正认识了群众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才能正确的领导今后的群众工作。不要为假相所迷惑，不要怕暴露自己弱点，自欺欺人。因此，就要检查：

甲、减租减息工作是否彻底，有无明减暗不减的情形，“扫荡”后有无倒租退佃勾地等情形（对明减暗不减者，需从去年应减数目减起；今年已还息者，要组织倒息）。

乙、增资工作是否执行？

丙、反贪污、查“黑地”斗争是否彻底？（好些地方进行了反贪污斗争，没有建立村的民主制度与财政制度。查“黑地”中有的村干部甚至区干部为地主迷惑或收买，“黑地”未报，有的查出后应罚不罚。）斗争的果实分配是否落在基本群众手里？（好多地方

为区村干部所把持或独吞。)

丁、合理负担、支差问题执行的是否彻底？是否合于党的政策？（有的地方仍是按摊派或只是公粮实行合理负担，村款仍为摊派。在支差问题上，有的村干不支差，富有者不支差，以及出车时草料自备，跟人不算差等，引起中农之不满。）

戊、经此次“扫荡”，敌灾严重地区群众生活及非灾区基本群众生活仍无办法，如何救济，如何给基本群众生活打开生路？

己、合作社的工作是否已与群众的经常利益及生产结合及如何结合？

(2) 关于组织与教育方面

甲、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是否能与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及政治任务相结合（即从满足群众切身要求入手，逐渐从组织上教育上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适合我们的政治要求）？或是与改善群众生活斗争及政治任务不相关联的单纯的技术工作（主要指组织工作），或空洞的教条主义（主要指教育工作）？

乙、如何加强组织工作？

丙、支部教育与群众教育如何进行？

(3) 关于领导方面的

甲、支部一元化的领导情形怎样？

乙、英雄主义的包办代替，给予我们工作中的危害如何？

丙、如何发扬民主作风？

丁、改造新贵的经验教训。

戊、对政策的执行是否有忽“左”忽右的现象？

(4) 在检查工作中应注意的几点

甲、我们在检查村级工作与领导〔时〕，与检查自己的领导联系起来，反省自己，把一切错误全推在下级身上与己无关的态度是不对的，只抱怨支部与村干也是错误的。

乙、对新贵的问题，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英雄主义，包办代替的领导，不关心群众痛痒所造

成。只为新贵不检查自己与改造自己的领导，新贵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改造新贵必须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群众观念与朴素的民主作风，才能彻底改造新贵。

丙、要有重点（不要企图把所有支部检查一遍）。地、县、区三级各只直接做一两个村庄，作全面的深入的检查，即从支部、小组、党员、群众、村会、村政权、地主、士绅〔入手〕，然后把各方面的材料做详细研究与分析。

丁、因为检查工作不是消极的找毛病，因而在检查工作帮助下级解决问题〔时〕，要注意领导上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要掌握住从满足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切身要求中去提高群众。

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节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张·霖·之

第一部分 一年来发动群众的研究

壹、一年来发动群众的估计

一年来群运的发动是很不平衡的，原因很复杂，有干部多少、领导的问题等等。所以估计只能是一般的（多限于基本区）估计。一般的说，一年来群众只是初步的发动。其表现：①部分或大部分的农民参加农会，部分的妇、青有了组织。②进行了许多民主民生的斗争（当然还有许多不彻底）。因此，群众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使基本群众的政治地位有了提高，开始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③群众已经相信了自己的力量，初步由自在阶级走向自觉自为。根据这几个条件，可以说初步发动了。有些地区已超过了这些标准，有些地区还不够。

一年来群众之发动有了大的成绩。去年高干会后，我在进行民主民生斗争中扩大与巩固了群众组织，在斗争中也扩大与巩固了党的组织。在群众斗争中，部分清洗了隐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太落后分子。在群众斗争中，也暴露了顽固分子的一切黑暗与罪恶。群众认识了，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水平，宿命论已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群众了解了阶级的剥削。同时，在一年的斗争〔中〕，也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初步的改善了党的组织成份，由过去60%、50%的中农，到贫农雇农占到80—90%。也初步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过去群众受痛苦，我未予以解决，感到我党不能给群众以东西，对我很冷淡，党与群众的关系很不密切；今天敌

“扫荡”中埋我们的人、驱逐我们人的现象没有了。今天当然还是很不够的，今后争取光明，克服困难等等问题，都需要更加依靠群众。

一年来群运中，我也培养了大批的干部，丰富了我们的领导机关与群〔运〕，初步摸到了发动群众中一般的发展规律。

这些成绩就给予我们今后边区斗争上以有利的物质基础，这说明去年高干会的报告之正确性。但是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从区党委的领导上讲，在发动群众中当有以下缺点：

①对边区发动群众中所处的时机、环境、特点、困难等等的估计是不够的。对敌情的严重所给予的困难估计不足，不同于1938年、1939年，这给发动群众以大的困难。〔对〕几年来在战争中群众的疲惫、经济上的损失，估计也不够。严重的环境，更加要使我们发动群众中万分注意，使群运要更加正规，稍一不慎就要翻天。我既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这就要有高度的策略指导。高度的策略指导运用不好，不与具体条件联系起来，就往往又限制群众的发动，限制群众的自动积极性。

②对包办代替给群众的危害认识不够，因此去年对群众工作的要求是过高的，在今天的条件下这是要求过高的。此即区〔党〕委之缺点。

从下面的执行中来看，也有以下的缺点：

①即包办代替的问题。未看到发动群众是把广大群众一齐〔动员参加〕斗争，一齐运动，一齐提高起来，只看到几个干部、少数积极分子，未放到广大群众身上。所以有些地方斗争进行了，〔但〕未发动起群众来，发生了强迫命令。只看到少数干部的积极，群众工作未得到应有的成绩。积极分子必须是能联系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否则不叫积极分子。

②高度的策略指导与具体情况未能结合起来。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孤立顽固力量是正确的，但这仅是策略指导。更要看群众是否了解，是否觉悟，是否拥护你的策略，同情你的策

略。有些顽固头子小恩小惠，群众并不了解要反对他，有些中间力量倒为群众反对。我们并不顾忌群众的要求，捏着群众的鼻子非去斗不可，这也就妨碍了群众自动性，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我对中间力量并非不斗争，而是斗的要适当。这是为了提高群众政治觉悟，达到斗争大地主的目的。

③这些缺点就不能不使我们今年重新提出继续发展与深入的问题而延误了时间。

貳、在继续发展与深入的方针下，提出以下之几个问题

第一，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问题

目前中日民族矛盾是第一位，一切斗争要服从于此。阶级斗争要约束在统一战线范围之内，这是为了达到抗日。依靠顽固地主、中间力量抗战到底是不可能的。地主能否坚持抗战，要看基本群众的力量。要把村庄变成抗日堡垒，不发动群众也不可能。这都必须有阶级斗争。现有农村是封建的监牢，内部充满着矛盾，主要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还有顽固力量与中间力量的矛盾，中间力量与自己与农民的矛盾，还有家长与家人，农民与青年，男人、女人，婆婆、媳妇等矛盾。农村又是层层统治层层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局面主要是地主所造成。矛盾的支配权也攥在地主手里。主要的矛盾是对地主，地主把主要矛盾再分散到他种矛盾，以维持其统一的统治。我之农村工作即用一切办法揭穿这些矛盾的真象。地主把阶级斗争变成宗派斗争、姓氏斗争、宿命论以维持统治，我要揭穿这些矛盾，把矛盾的支配权转到抗日人民手里。打破地主的支配矛盾，唯一的武器是抗日与民主，以此揭破地主的暗幕，这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正常统战。不是此后就无矛盾了，而是我要支配矛盾。

第二，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下，在各种地区发动群众的规律不同

(1) 基本区

甲、其特点：我建立了抗日秩序，敌人经常直接的威胁较小。农村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与地主。地主用封建办法造成复杂的矛盾局面，限制了抗日的发展。我要在农村建立抗日堡垒，必先做反顽固势力的斗争，摧毁了封建的统治（政权），建立抗战与“三三制”〔政权〕，以巩固抗战力量，建立正常统战。基本区农村不把封建统治摧毁，抗战力量〔就〕不能巩固。担任这个斗争的主力是雇农、贫农，以基本群众为核心，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基本群众走向政治舞台，抗战力量才能巩固。所以基本区必先发动农民打垮封建统治，发动基本群众进入斗争，树立群众的政治优势，〔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宣传鼓动工作与细密的组织工作。否则树立优势是不可能的，把群众从封建统治下拖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地主尽量掩饰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宿命论是发动群众的主要障碍。宿命论是封建思想的最大迷惑，不把思想问题解决，发动群众是谈不到的。恩赐的减租是不行的。要求是一回事，敢不敢、应不应该又是一回事。发动群众是由不敢到敢、由不自觉到自觉。这就是说，没有宣传鼓动工作，就不可能到自觉。因此每个同志谁看轻了宣传鼓动工作，工作一定无成绩，这干部也不一定是好干部。不会宣传鼓动者，就一定不能成为群众领袖。不会宣传鼓动工作者，就要包办代替，就要强迫命令。无宣传工作，群众就不能认识自己是〔一个〕阶级，也就不能组织群众。宣传鼓动也非盲目的，必须注意两个问题：①即调查研究，这才不会无的放矢，搔不着痒痒。要调查本村地主统治的黑暗及其事实，调查群众的政治经验，看群众的觉悟程度（对地主黑暗的感觉），调查后加以研究。有些群众觉悟很低，我要把群众对地主的低级的模糊的私仇私恨，提高到明显的高级阶级觉悟。对党的教育，基本上教育党员从阶级的观点去看问题。不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在抗战中就不能把握稳局面，要犯“左”犯右的错误。②关于鼓动的方法与技术也要注意。根据搜集的材料进行准备

与计划，为考验其效果，先找十几个群众或干部试验一下，如听者无形于色，即是失败了，材料的搜集就是成问题了。给群众讲了以后，还要征求群众意见，补充自己的不足。在宣传鼓动中，不要光说大道理，要举出实际例子（必须是与本村情形符合），讲话要通俗、新奇、生动。为了使群众更对我之宣传易于接受、体会，必须反对先生讲学生听的办法。讲到群众痛痒时，要予以深究回味的的时间，使群众讨论。刺到群众之痛楚，群众一定会交头接耳，一加讨论就能激发其愤恨与情感。在宣传中为使上下呼应，接〔结〕合双方情感，在讲到群众之痛楚时，下面要先布置积极分子，激发群众的情感，使我宣传鼓动者的情绪与下层密切结合。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即使启发了其觉悟，鼓动了其情绪，但真正行动起来，撕开脸皮干就不行了。这时要用反激法，很容易使农民走向斗争。喊口号时可以用引导办法，利用催眠方式……。过去我们就忽视了这些办法。

乙、基本区发动群众的规律

农民是群运的主力，抗战的主力军是基本群众。①一般说群众参加斗争必须与其切身利益相联系。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主要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增资等。我要从基本群众入手，一般的因合理负担已经实行了，故应从减租减息、增资等入手。减息如只按中央规定是不相同的……从此来满足群众的要求。在斗争中再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做组织工作，提高其政治地位，形成一个抗日力量。

②在减租息中，开始起来的是贫农，中农还不甚积极。贫雇农斗争后，形成力量后，中农才可以起来参加农会，这样就构成了抗战中的基本力量。

③这时做了几个斗争，与地主对立了，就有了武装的要求，用武装保护自己，镇压敌人，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时因大局未定，中间力量动摇着或依附顽方，群众要继续斗争，争取中间势力，所以武装的性质还只是农会系统的（这时不可强调武装的独立系

统，而把武装与区武装与自卫队长发生一定的联系，准备逐渐的独立起来，等顽固分子孤立了，中间力量过来了，再建立独立系统）。

④这时群众开始撕破了封建的统治，震撼了全部封建统治（基本群众形成了独立力量），基本群众很兴奋，一切被压迫者也很兴奋，青年与妇女尤其受波动。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扩大进步力量，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用一切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这时是策略指导的中心一环，这就是反贪污恶霸，改造政权实行“三三制”。中间力量与顽固力量在民主上是有矛盾（中间力量对我之矛盾，亦须适当斗争）。

⑤又由于群众撕破了封建统治，妇、青欲动，我即应组织青年与妇女，这时可减少我组织他们的困难，错过时机，很难组织。因农民有反顽固斗争的要求，也有其浓厚的封建思想，〔所以〕他不能以平等的精神对待其青年、妇女、妻子。这时候农民的力量尚未巩固起来，要想巩固尚须要更大更多的力量。青年、妇女必须出头，动员的力量越大，对顽固势力的打击就越大。青、妇这时参加这些运动，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故易组织。如这时期过去了，再组织青、妇就往往与农民〔发生〕矛盾。故我要竭力组织青、妇，并借机提高其地位与威信，批评与打击轻视青、妇的言论、行动，给农民以启发教育，打击顽固派造谣。故青年运动亦不能反家庭。青年〔提出〕生产学习，妇女提出家庭和睦——必须平等，才能和睦，和睦就是平等，不是约束妇女甘受压迫，而是要经过斗争。故青、妇的发动与巩固必须与反封建的斗争相结合，否则妇女不能积极参加生产。家庭和睦达到，则即转入生产，不要过度解放。妇、青之参加组织与斗争，就是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表现。

⑥当中间力量争取过来，村内即民主问题了。青年、妇女是在民主中最积极的，农民不那样积极。在吸收中间势力、顽固势力的子女上，对中间力量也是一种争取与团结。青年接受真理快，〔这〕对于顽固分子也是进一步的孤立了。于是他就不能不老实，不能不

与群众站在一起做公民了。这样正常的统一战线就告一段落了。这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实行“三三制”，彻底民主。由以上的发展规律，说明过去机械的在一县一区一定时期内进行一种工作，这是不合乎群众要求与发展规律的（这也并非否认一般号召，只是说要看具体的条件，有中心工作，有按具体情况规定的工作）。

⑦今后的工作就应转入巩固工作。现在有些把巩固工作神秘化。巩固工作不是主观要求，而是根据群众的要求集中上来，制成计划，坚持下去，和发展是一样的。为什么群众要求巩固呢？因为〔在〕群众要求下，群众组织起来了，个人的幸福就寄托在这个组织上了，该组织的任务也就是群众的要求，否则就不是其组织。该组织之参加者是为要该组织满足其要求，巩固这一新组织，就是为满足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凡组织不合乎群众利益者，□都须予以改造。如实行民主改造，反对新贵，改选负责人。故我不能以为民主民生斗争完成了，群众工作就完了。组织工作就是不断的提高群众，不断适合群众要求，离开群众的要求与利益，是没有什么组织工作〔的〕。新贵把持组织，群众要求不能满足，就不会服从组织，不会拥护组织。过去就是组织工作脱离了群众了。组织工作所以并非神秘的。

⑧再说到改善群众生活问题。做了减租息等工作后，并非说以后就不改善群众生活了。组织是一定始终不能脱离群众的要求与利益的，不能改善群众一些生活后，就转而一味向群众□□要求。由于群众痛苦从两面而来，一因社会存在着剥削制度，一因天灾与自然限制，因此改善群众生活必从两面着手。一面要做彻底的民主民生斗争，改革剥削关系，改善生产关系，刺激群众的生产，〔一面要〕提高群众生产力，便利于生产力往前发展。没有减租息、合理负担，贫中农生产情绪都不能高。执行了民主民生斗争，改造了生产关系后，使生产关系较合理后，就转向生产问题，发展生产力。但有很多困难，如物价暴涨暴跌（合作社要解决这个问题），群众生活就要受到大的痛苦。不解决此，生产力亦不会提高，地主亦可从

中发财，补救损失。所以合作社不能搞起来，就不能刺激生产，群众仍在痛苦中，你向他要求一些东西是不行的。这个任务就是〔搞〕合作社。其次增加生产亦非空话，必有一定资本，如挖井、肥料、种子、劳力、牲畜等等。不解决此，生产力亦不能提高，根据地财经就枯竭。在此情况下，中心转入生产，我之组织工作就要服从此任务。必须要保护生产，保护资财，防敌抢劫，故民兵建设就必须提出来，武装保护生产。生产是科学，可从中打破靠天吃饭论，必须予以教育。

掌握这一规律，可以少走弯路。

（2）在灾区之发展规律有所不同

灾区的问题就不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之类了。救灾不是从农会开始，而是从合作社开始，由合作社从事生产。这就必须供给生产资料、垫底粮，但我又不能完全供给，于是又进行借粮斗争。过去在沙区救灾时，对贫农照顾不够，如只供给本钱，中农可以，贫农就不能维持了，有的把贷款当路费走了。再一个即借粮，由游民分子领导，游民欺软怕硬，真正有粮的未借到，中农的倒借出来了。斗争果实往往为游民分子所吞噬大部，但这是个别的。沙区的斗争大大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但教育组织工作弱，群众了解自己力量不够，认为我是慈善机关。

（3）接敌区群运的发展规律与基本区不同

敌人、伪军直接抢掠、威胁、烧杀，这就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故反敌人、汉奸、投降派就成了群众的普遍要求。我发动群众的任务就须根据这个情况领导之。这种情况下，受到威胁的地主可以搬家，富农可以搬家，中农最成问题，贫农不在乎。虽然大家都受到威胁，但程度不同。中农是最迫切了，贫农在反汉奸、敌人、投降派中得不到什么利益，地主易妥协，中小地主常成为领导者。贫农因不能改善其生活，妨碍其劳力的发挥，未能从民族斗争中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在我无工作的游击区之联防，在性质上是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安定社会秩序，是使基本群众走向政治舞台，开展民

主民生斗争的前奏。社会秩序现已安定，即应马上由进行反汉奸、投降派的斗争转入民主民生斗争，使群众走向政治舞台，转换武装领导权。在敌情严重地方，亦可以武装封锁敌人，进行反资敌、贪污，反投降派，从中组织民兵，再求得安定社会秩序。故接敌区一定要从反投降派、反汉奸斗争中打开局面，再转入民主民生斗争。

叁、在我们的群运中，还存在着许多不正常不健全的现象与严重的缺点。这是由于领导上的问题。领导上严重的缺点，主要是英雄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的妨碍，缺乏经常的正确领导

官僚主义领导的表现：去年即提出开展群运必须先加强群众观念，但目前官僚主义的第一表现，就是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视我区群众之疼、饿、死为自己的责任，因此就不了解群众痛苦，就不能了解群众的迫切要求，也就在领导上不调查群众的具体情况。这样领导就不会从群众中来，工作的任务与计划不是向群众去找，而是向上级去要，这样的工作计划与任务就一分不值。反之，工作计划一从群众中集中分析而来，而制定计划下去，就是不可阻挠的力量。“充实组织工作，下级一定要向上级报告工作与情况，这是个一定的任务”（联共）。官僚主义者希望自己一段工作搞过了，再等待上级再来个计划，不向群众中去问。我们等上级，群众呢，却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还等待着解决。不是下面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我未看见。我们只知道对上级负责，而不知道还要对群众负责。上级指示下不来，他的结论就是埋怨上级领导不及时，或埋怨群众落后。有的认为租息都减了，其实都还未彻底，这是根本不了解情况一种官僚主义。再一种，群众一有要求，他就〔用〕宣布法令的办法，只要少数干部或几个先进分子一拥护，就百事大吉，心满意足，宣布斗争已经胜利了。这就是我们领导思想上不面对群

众，只停在先进的少数分子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只有一般号召，无具体的帮助，无具体的检查。（这是最严重的官僚主义啊！）

英雄主义领导的表现：他没有群众观念，也没有组织观念。他主观毫不受客观的限制，强调主观的能动性。他一定要碰钉子。他不把主观的能动性去掌握客观的发展规律。他的眼里没有民主，但对上就要民主，对下要下级的民主，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要集中了。自己做到民主，对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这种人的法宝，不是依靠群众的经验与要求，而是依靠自己的地位，依靠自己的法令，强制命令群众。有地位观念者在领导上一定要强迫命令，他可以强迫群众执行与群众切身利益无关或有害的事情，他不能把上级的指示具体化，他不教育、不说服。每个工作如不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就一定做不好。英雄主义不了解群众要求，不提高群众，不教育群众，不向群众学习，不顾群众利益，单纯去命令，所以在工作上常常与群众利益违犯，当群众尚不能接受我之领导意见时，他不做宣传鼓动教育，而大骂群众落后。

总之来说，我们的眼睛都是往上看的，所以简单化。眼睛向下，领导才能丰富。中央领导方法的决定乃是党20多年来斗争的结晶。由于以上之恶劣的领导方法，故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以下的毛病：

各种法令之执行是非常的不彻底，如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会后应按区党委深入检查工作的指示深入检查。我处群众生活之不活跃，就是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够，斗争的果实不能全为群众所得。由于生活改善不够，故群众对自己的组织高度的热情是缺乏的。这因为我之领导上的毛病。此□由于英雄主义的领导，群众观念薄弱常基于自己的风头主义。他只看到少数的干部，他未把领导放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自动性之□才是高明。他只看到了几个少数积极的干部分子。因此经过了各种斗争的地区，也是以恩赐的观念进行的，未宣传鼓动，未启发，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很差。由于这种领导

的结果，在斗争中走向政治舞台的不是广大群众，而是少数的站在群众之上的所谓新贵分子。新贵的产生就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领导者的思想、观点、方法就自然的影响到下级，领导者强迫，村干部也就强迫。所以新贵〔的产生〕应从我之领导上来检讨。

再即新贵缩影与地主复辟问题。村中的新贵的产生，是因为有新贵母。英雄主义，无群众观念，无民主，无组织观念，他的领导就产生了小新贵。在群众中吹播自己的英雄，对群众以老子自居，村中的一切工作完全归功于自己。区级干部亦如此。（县、分区又何尝不如此？）自以为就是群众的财神和恩人，所以他就要求特权和优先权。不认为斗争是群众的力量，不认为共产党改善民生领导斗争是本分，因之他要求在群众之上，不在群众之中。反贪污、查“黑地”的果实他要保存，减免他有优先权，免差有优先权。除优先权外，他有特权，如抽头，免减有指定权，有捕人权。他无时无刻不站在群众之上。区干部到村要求村长弄油水给他吃，对村干部的领导是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对群众是老子对孙子。县级干部对区村级的这些问题，因为自己有新贵观点，也看得惯。区干部在地主家吃饭，□了“黑地”不罚。反贪污果实村干部存放，自己从中赚小，自己吞噬。还有借一还四之放高利特权的（用反贪污、查“黑地”的果实）。由此看我们的领导，有的对这些事不知道，有的知道而漠然置之，群众因而怨恨，感到自己是牛马，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在村干部面前不敢讲话，敢怒而不敢言。我们是新贵，新贵看新贵就看着顺眼。牺牲群众利益，满足新贵要求，结果跟新贵一齐倒霉，这就是我们英雄主义、官僚主义领导的危害。所谓新贵缩影即一般如此。县级、地区级就是英雄主义。这就是不能以平等待人，就是新贵。把一切功归自己，失败在他人不听自己的话。摆资格，自命不凡，吞噬公粮，买钢笔，做背包，拉官腔，假传圣旨，说官腔，瞒上欺下，牵连上级，抱粗腰，压迫人，信仰个人，小看群众，轻视劳动，封锁群众……每个同志应据此来检查自己思想上是否有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下面也不会有。新贵发展的结果，每

天过鬼的生活，群众敬而远之。群众要求反新贵，就因我县区干部也有些贵，所以贵气相投，鬼鬼相贵，结果官逼民反，旧鬼复辟，应运而起。斗争的果实落在新贵手中，农会便有名而无实，新的组织就永远不会巩固，永远无广大群众的支持。（村干部产〔生〕不出来，是群众无发动。）我推翻了旧统治阶级以后，代之而起来者系少数新贵，而非群众的统治。至时反新贵成为地主与群众的要求，过去的老冤不冤了，光棍无法了。我是冤，现在还是冤，这就造成众多老冤的反抗，旧统治者乘机兴起。这时我们要转移斗争，强压着转移，结果来回拉锯，无有结果。新贵看青偷青，给地主复辟的机会，中间力量不满，我不针对处理即不能垮掉地主复辟的基础。由此可见，地主复辟是乘我们内腐之机。要杜绝，必须先把内部搞好。反复辟必先从此搞起。今天我在农村经济上是劣势，我改善群众生活还不够，群众之一部还须依赖地主过活，这也是地主复辟的原因之一，但非主要的。政权在我手，只要我内部巩固，就可以战胜地主这一优势。打走地主的统治是容易的，但肃清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改造小生产者的落后地位，是极不容易的。故不要以为初步斗争胜利就完事大吉。

从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来看产生新贵的原因及共产党与农民的运动的关系问题：

从主观上检讨是因领导的官僚、英雄而产生新贵，但在客观上农民的特点也是主要的客观原因。艰苦朴素、忠实勤劳为其优良品质。广大农民生在封建社会中，受到地主无限的剥削压迫，他是最痛苦的阶级，因而他是革命的，故他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能始终跟着我党走，他们是我之基本群众。我党应时时照顾其利益，代表农民的利益，这是我之责任。（不顾其利益，不关心其利益，向他们要报酬，这就是无立场无群众观点！）没有基本群众与我在一起，我党即是空架子。这是农民的作用。但不能否认，农民有严重的缺点：落后、保守（压迫者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机会）、眼光狭小、自私自利；封建思想，贯之于等级观念；宿命论，造成其不主

则奴的观念。对他们这些缺点应有足够认识。其落后与保守妨碍了其创造性与建设性。他们多是狭隘经验论，其眼光狭小、自私自利，故不能看到远大的前途，不能正确地结合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常常是牺牲团体利益服从其个人利益。所以历史上独吞革命果实，投降统治阶层的事情层出不穷。因他们受了封建思想的蒙蔽，他不能平等的待人，也不能平等待己。从历史上农民的革命运动中，可以找出以下规律：即统治阶级压榨剥削得农民不能再忍受时，即非用武装推翻其统治不可时，他才起来。〔由于〕农民的保守性，起来是不容易的，不压得他没办法时，他是不起来干的。这时为打倒共同敌人，他能以同舟共济的精神团结起来，其内部阶级划分并不明显。但在享受革命果实时就斗争了，杀掳同伴，镇压群众，领袖已由群众爬到群众之上了，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反回来再压迫群众。这即是可以同患难而不可以同富贵的历史教训。新贵出身时并非都是坏的，当他被压迫时，可以同群众一起打掉顽固力量。但政权夺回来以后，新贵即可执之再镇压群众。政权夺回后，落在多数革命者手中，就是镇压反动派的，落在少数人手中时，就用于镇压群众，使少数人成了新的统治阶级。今天我之农会村政权是否是群众的，群众是否有权，应好好回味反省。

但农民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历史的规律之覆辙可以避免。这只有靠共产主义的教育，以民主的精神去领导农民运动。这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并把农运中最积极的分子，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的水平，吸收他们入党，作为农运骨干，团结多数分子，再逐渐提高他们。在农运中不发展党是多么危险呢！没有党的领导，要把农运发展下去是不可能的，叫农民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今天我要检查党在各村中对群运的领导作用怎么样。今天在群运中，在党内出了不少新贵之原因——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还会发生新贵呢？

这固是我英雄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主要还是我们群众观念的薄弱，看不到广大群众的力量。这是尚未深刻了解革命是广大群众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事业。故革命必须有广大的群众，群众运动

的标志就不能看几个领袖，几个积极分子，而要看广大的群众是否解放了，有权了（权到谁手里去了），有饭吃了，是否真诚的拥护我党及其革命的组织了。这应该是衡量群运中的基本的标志。积极分子提高中间、争取落后一齐去革命，但积极分子一脱离了群众就无力量了，就无意义了。我们应以阶级为转移，以群众为转移，但我有了公粮吃，忘了问题就此发生，群众也不为我所看见了。不从组织〔上〕提高广大群众的积极主动性，改善群众生活，而只看见了几个少数的积极分子，这就是英雄、官僚的原因。眼里没有群众，基本问题是我之政治觉悟还不高，在处事处处人己〔方面〕，未能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立场，一切行动思想尚未约束在无产阶级的范围以内，这是每个党员应检讨的。这是阶级的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眼里就不会有群众。我们还未完全弄清我是为阶级为群众服务的，我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因此就不能以阶级利益为利益、以群众利益为利益。在群众之外，就必然要在群众之上，只有在群众之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因而领导机关与干部口中的阶级与群众只成了名词，因为他未〔在〕群众之中。一旦自己的团体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矛盾了，他就讨厌群众了。因我并非以阶级出发的，而是以群众是〔否〕能满足我之要求为出发〔点〕，所以群众观念抽象了，说可以，但实际的去服从群众利益就完了本事了。犯这些毛病的不自觉性就是没有阶级的立场，地主资产阶级从未可怜过群众。

政治觉悟不高，其原因：

第一，从领导干部本身来找：边区干部绝大部分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半于抗战后入党，过去未受过严格的阶级教育、组织生活。他们没有或很少经过旧社会严重的政治的经济的困难与压迫，所以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真正的痛苦生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自己遭受过，谈到群众痛苦故无所痛于心，了解的不是那样深刻，似乎群众解放不解放都可以。

第二，还有些干部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遭受过困难与压迫，

对于旧社会有些体验，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参加革命后，很久了，到今天成了干部（他们当然是党的宝贝），生活上改善了，他们多在部队，有枪杆，可以不受饿，他们对群众痛苦也就有些消逝了，也就轻视物质了。抗战后，我强调了抗战与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在国共合作抗战中，强调了联合忘了斗争，缺少提到阶级上来认识这些问题，也〔是〕形成阶级意识模糊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官僚主义。

第三，中国历来没有民主的习惯，也助长了英雄主义与新贵。所以反新贵必须首先从领导机关与干部本身反起。这虽是我进步当中的弱点与错误，但不予以注意，对将来的进步就是致命的障碍。我们要反省过去在群众观念上、在领导作风上的错误与缺点而克服之，如此才能有我党的健强的领导，才能〔有〕正确的农民运动。转变领导就是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再回群众之中坚持下去。当然不是尾巴主义。坚持就是依靠宣传鼓动说服群众，不是抹煞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鲁迅说：领导者“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肆、在我们的群运中存在着不健康的现象

由于我农会的组织与内容尚不完全一致，还未做到其应做的许多工作。

在我们的农会中，中农占着主要的成份，形成不健康的现象。这种现象与我们的工作发展阶段有关系。一个斗争与哪一阶层的联系密切，该阶层就一定积极。在减租中□中农并不十分积极。在减息中中农与贫农亦不相同，要求的积极性不那样迫切。增资则主要是雇工，在（合理负担中，在）反贪污、查“黑地”中亦多分配于贫农，中农在领导这些斗争中都比较差。但到生产与合作社中，中

农就较积极。由于领导成份主要在中农，形成一种比较消沉的状态，雇工、贫农的生活改善并不彻底，他们关心雇贫生活差，雇贫农尚未提高其政治地位。我们的斗争主要□□于贫农有利中。这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教育中农，引导其积极性。

还有在中间力量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富农、中小地主，这种群众斗争与组织之特点，多半是从反恶霸、贪污，改造政权等斗争开始组织了群众，中间力量取得了领导权。〔对〕这些斗争中的中间力量应有正确认识，即他们与中间基本群众有矛盾。这种情形说明我政权尚无基础，群众尚未形成独立力量。因为中间力量领导的斗争代表了群众，他也就团结中农以上的群众，把旧统治者推下政治舞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斗争中不会有民主，他控制着基本群众向顽固力量作斗争。他自己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基本群众力量下才能参加民主。当他登上统治舞台，因为他团结了群众，掌握了政权，故我们的法令往往受其阻碍，果实亦不能分给基本群众。中间力量领导斗争之目的即控制基本群众，去报复顽固派的私仇私恨。中间力量本身有浓厚的压迫统治的本性与恶习，他们领导群众斗争常是站在群众之上。当群众向他要求民主与改善生活时，他就要镇压基本群众。所以我对中间力量领导的斗争不能抱过高的希望，对中间力量的团结，必须是在基本群众形成独立力量向他进行过适当斗争以后。过去我常对中间力量抱幻想，帮助其建立力量与威信。但如顽固力量很大，群众不敢动，中间力量与顽矛盾深，中间力量是可以用的。〔要〕给群众以启发，不要以中间力量为主去进行组织，而〔应〕迅速转入民主民生斗争，以贫雇农为主去组织。

为流氓分子所掌握的组织：多半形式的，组织上只是少数流氓分子借组织之名狐假虎威，迎上欺下，贪污腐化，群众则对之貌合神离，对流氓分子敢怒而不敢言。这由于流氓好脱离生产，他的生活来源，依靠欺骗、敲诈、投机，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阶级是由经济来决定的）。光棍不吃眼前亏，见冤不捉一律同罪，这就是流

氓的处世哲学。老实群众在□流氓中是眼子，就要被捉。当我发动群众和顽固分子斗争时，这就成了流氓分子出头的机会。他们参加斗争的企图是从中搞鬼，混水摸鱼。由于流氓的这些特点，所以上层流氓常成为统治阶级的走狗，和统治者一齐压迫群众，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流氓不满。他们在村中无地位，群众很讨厌，顽固势力常用损人利己的办法。顽固分子常喜平静，一般中下层的流氓分子又喜乱，与勾结地主的上层流氓有矛盾，要求打破现状，故也决定他能参加革命运动，他们常处在接合部中过活（？），故我对流氓应正确认识，流氓分子之上层成为地主狗腿，中下层则一般的说尚属于进步力量，有改造的可能，否则对流氓不会有正确的政策与方针。因此对流氓分子一般的不用打击对立的办法，应采取教育争取的方针。在争取教育中当有斗争，对上层流氓经争取不回头来，也应予以适当斗争与打击。由于群众对流氓不满，因为他欺软怕硬，所以非至孤立的他无办法时不能争取，故不能放之于领导地位，这样群众会不满，限制群众斗争的参加范围，或者流氓借领导地位欺压群众。故我要用明提暗离的办法，名义上夸耀之，实际上将其与村组织离开，勿使在群众组织中占地位。如流氓胡作乱为，则采〔取〕明打暗拉的办法，或用群众力量打击，暗中拉之。对流氓分子要用群众力量改造之——采取不理态度。掌握群众后，他才对你俯首贴耳。因流氓不参加生产，改造他的中心是使之回到生产。发动群众起来以后，更缩小其欺诈的范围或杜绝其欺诈之路，然后给以出路，给他想生产的办法（如贷款租地等等）。“光棍洗了手，饿死狗。”已经改造的流氓有了觉悟了，他们也可以成为干部。

伍、关于树立农村基本群众的优势与发展富农的问题

第一，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与树立优势。在农村中树立政治的优势，在村中顽固势力退位了，即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利用政治优

势逐渐再削弱地主的经济优势（不是维持其现状，更不是扶植）。政治优势是否巩固，也即看能否从政治优势下再逐渐建立经济的优势，削弱封建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在村内要树立坚固的政治优势，首先要看农村的经济变化怎样，基本群众生活的改善程度怎样。只有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基本群众才会起来拥护组织，参加政权。否则就是空架子，政治优势也就是不巩固或未建立。忽视群众生活的改善去谈政治优势是不行的。政治优势的不巩固、未建立，群众生活未改善是一个主要原因。群众情绪的不高，对其经济生活的改善是不够的。不削弱地主，群众生活不能改善；不增产，群众生活也不能改善。削弱地主主要用我之各种政策削弱之。变动地主土地就谓之“左”，是不正确的。农民革命基本上〔是〕土地问题，故对大地主土地还是没收的。但我又非盲目的经济主义，以满足群众要求为准。所以我又须从满足群众要求中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与觉悟，去组织群众树立真正的民主生活，产生真正的群众领袖。过去我未了解到这些东西，所以只是政治上的号召多，而从如何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上是不够的，所以号召常落空。在估计群众政治优势也常从组织形式上、群众情绪一时的高涨上去估计，或从片面的反映上去看，而从经济变化上去看是没有的。因之在估计农村政治形势上就失之过高。还有的只注意了群众生活改善，但对宣传鼓动组织工作不够，群众的组织与政治觉悟不高，所以不要只去看形式，而要看实质。

第二，关于发展富农问题。中央提出按吴满有的方向前进，吴满有贫农出身，土地革命后得土地，由贫农、中农直发展到富农。他是共产党员，又是劳动英雄。他是自己勤俭劳动走向富农的，他是完全拥护党的政策的。目前为什么要发展富农：①从中国革命性质上讲，我是民主革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扫荡障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资本主义是私有的。②从各面的需要上来说，无论改善民生，无论抗日供给，无论从革命前途的发展上说，都需要发展富农，发展资本主义，打下走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这是

与群众要求相适应的。把农村经济只限于中农是不行的，进一步改善生活必须发展到富农，使用进一步的生产工具，增加生产。这样的资本主义与旧的资本主义是不相同的。旧的资本主义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发展的，是剥削工人的；我们的发展资本主义，是在“三三制”政权下发展的，它是照顾各阶层的，是富农、雇工利益兼顾的政策。强调发展富农不顾雇工是不对的；强调增资不顾富农亦不对。再即根据地政权在我手。此外，发展富农是否减弱革命的基本力量？我是要使贫中农上升，这是否是减弱革命的基本力量？政权是我所掌握，把贫中农升为富农是要经过了许多斗争的，在斗争中基本群众已得到了启发，他从中农走向富农是在党的领导下，这就给了地主以很大的削弱，给了他们以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样发展富农才能把群众积极性提高。目前边区政策上要照顾富农经济发展，但中心任务不是发展富农。因广大基本群众尤其是贫农生活还很痛苦，所以边区中心问题是如何改善贫农生活及雇工生活的问题。

陆、关于借粮问题

从几年来各地借粮斗争的经验上可以得到如下的几个问题：借粮斗争一开端容易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给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大的震撼，地主富农厌于生产，对地主富农刺激很大。但也不能否认借粮给了群众临时困难以解决，给了群众以兴奋。其原因：由于这一斗争无一定经济条件的约束，即一般的贫苦农民对富有者借，所以斗争一起就马上普遍到各地，两面政策的掌握非常困难，主观力量难于控制；流氓分子借机活动，在斗争中积极，多掌握了领导权，尤其在我工作薄弱地区。游民分子又常常欺软怕硬，所以中农就倒霉了。这就违犯了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波动了社会秩序。由于借粮无一定条件，所以又往往助长了懒汉〔思想〕，果实为流氓大吞大吃大喝。由于这些情形，借粮问题只有在极端严重的灾荒下不〔才〕应进行这一工作。只要我有办法救济，就不应采取这些办法。因而去年在潢县的借粮是考虑不周到的。在沙区及鲁西北的借

粮则是正确的。该二区处在极端严重的灾荒下，死者甚多，地主富农囤积居奇，从中渔利，引起社会人士的不满，我们无其他办法很好的救济，这样的借粮可以引起广大的同情。在灾区进行借粮中，应注意以下问题：要尽量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争取合法，借时应立约予以保障，很快的转入正常的借贷关系，安定社会，争取同情，并给地主以一定的利息，减少地主恐慌，争取舆论同情。已借到的果实，要即刻从事生产，勿坐吃山空。

柒、今后群众运动中的策略指导

首先要解决群众自动性、积极性的不高的问题。边区环境严重，必〔须〕使群运正规化，既不过分刺激地主，又要充分的发动群众，这是矛盾的。因此在指导上就要解决这一矛盾，这就必掌握以下的原则：

第一，要切实掌握住民族形式的武器，就是说要把阶级斗争以民族的形式出现，在各种斗争上就要强调为了民族与抗日。地主阶级在抗战中是动摇的，抓住民族形式就是打击地主之动摇方面。地主之要求抗日是我所联合的，是其光明面，也是其迷惑群众的〔一面〕。但其动摇、投敌、资敌是其黑暗方面，脱离群众的一方面，也是我们要打击的一面。在敌后，故我应强调抗日，反投降，反汉奸，表扬抗战，打击投敌行为。在政治上、经济上削弱他，都要以民族形式出现，这才不过分刺激地主。政治上予以揭发，抓住投敌、勾敌的顽固分子，大量发动群众向之斗争，甚至没收其财产，使群众斗争在不破坏统战下掌握了民族形式，把它提高到最高度。

第二，抓住民主的武器：由于地主的封建统治与专政，其不民主造成他〔与〕广大群众和中间力量的矛盾。他最怕用民主打他。民主是广大群众与中间力量的要求，这即是我争取中间力量的基础，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斗争就是民主的内容，这是打击顽固分子、团结中间分子的有利武器。民主是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必须有了平等，才有对事对物自由选择的权利。没有平等

就谈不到民主，要求民主就是要求平等，反对少数人的特权与压迫。这与顽固派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就是打到了他的要害。民主政权的出现也就是地主统治的垮台，在顽固派统治的村庄就绝不会有民主，有了民主也就不叫做封建统治。只有基本群众的优势建立后，才能实行民主。争取实现民主的条件，须经过严重的斗争，获得平等地位以后，才能谈实行民主，故应把争取与实现民主分开。所以在顽固力量统治的村庄，实行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基本群众未形成力量时，是争取民主问题，而非实行民主，故称之为民主民生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削弱地主统治，改善群众生活、取得平等地位。在此期间有关贪污恶霸等等民主法令中，应抓住这一点，充分发扬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反贪污斗争，〔要〕充分的发动群众。群众的最后发动，积极性最高，往往就在反恶霸斗争中。这时群众就再无所顾忌了。这也能争取群众舆论同情，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在基本群众形成力量、中间力量转向我们时，即是群众已取得了平等地位，我已具备了实行民主的条件，即应大胆的实行民主。其意义：首先是巩固我之组织，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刷洗我组织中之一切黑暗，保护群众的利益；其次，进一步的摧毁封建统治，〔使〕民主范围扩大，顽固分子的活动缩小。反之给顽固分子留下进攻的空隙。基本群众政治上已经提高了，每人都可站在本身立场上发言，不会为地主利用。开始实行民主，不管对内对外就不可以压制民主，实行民主的困难亦即在此。而且极端民主的现象也是难于避免的，而是如何纠正的问题。实行民主是非常不容易的，党必须有真正的民主精神，有关本村的事情必须尊重大众的意见。大家表决的决议与支部决议违背或不符合时，一面检查自己的决议，有不对者应予以改变，如果是正确的，党员应根据支部决议向群众解释，使之放弃错误意见，拥护正确。如群众实在不拥护，我党员应投反对票，绝对不能采〔取〕任何非法行为制止群众表决。既通过后，党员应无条件的服从，但仍要说服到群众了解时，

再经一定民主手续改变，绝对不能用任何非法手段。从此可以看出三个东西：一即民主精神，即平等待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实行民主。二即民主的内容，即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斗争，不能形式化，不能强制群众，违犯着群众的利益去“民主”。三即民主的制度，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度。三者不能孤立，无制度即可极端民主化，无内容必形式化。因而在支部中实行民主，必〔须〕注意克服支部对村内政民各种问题不调查，主观的制计划，做决议。强调党员无条件的执行党的决议（这当然是应该的），再加之党员无民主精神，这就形成对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之执行，在大会上公布，压制民主，不允许别人发表相反的意见，强奸民意，这即引起群众对民主的失望——党员不用宣传工作争取群众，而是强制群众。其次在支部党员中，把支部决议变为群众决议，要在多方面搜集群众意见，支部要加以研究。为慎重起见，可先将支部意见交小组讨论，搜集党员意见，再去搜集群众意见，然后再形成决议。这即一切决议从群众出发，把群众意见集中综合。

第三，掌握合法合理的原则。在民族民主形式之下可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但把二者孤立起来则易“左”，故□必须掌握合法合理问题。合法即斗争必以政府法令为依据，这即须对被斗的顽固分子找到法令根据，犯法事实，以杜绝其反攻，而麻痹地主。但政府法令尚不能包括群众生活的全部，在法令所不及的范围内，我应依据群众的习惯法，群众情绪、舆论及风俗等，这即是合理的原则。即大多数人的同情，适合群众的要求与赞助，使群众起而维护了真理。在合理合法中具体的应注意到：

①任何斗争，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和赞助。斗争的对象是否群众痛恨？斗的方式方法是否合适？

②不破坏统一战线。

③不做超现实（即群众尚不了解、不能接受的，目前尚做不到）的斗争，口号不能过高，但也不是尾巴主义。

第四，掌握速战速决的原则，这包括：①不过分刺激地主，充

分发动群众，打的时间越短越好，打后即拉。尤其是在对中间力量的斗争上，勿零打碎敲。②不给地主以反攻的机会，不要经常刺激。③这也可以保持群众情绪，斗争之缓而长者，群众常常疲惫。

第五，高度的策略原则必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例如，掌握村政权者非顽固力量，但亦很坏，但不能因是中间力量就不斗，但并非不要策略指导。只从具体情况出发，不照顾策略，也要发生“左”右偏向；照顾策略指导，往往会限制群众斗争的积极性，缩小斗争范围。

捌、关于我各种政策的实施问题

边区工作发展不平衡，故各种政策应照顾边区不平衡之特点。如民生未改善者，负担面就不能要求到80—90%，应按工作发展的条件，否则常会妨碍群众工作。为此各县委应注意本县特殊情况，及时反映到上级及区党委，这才能配合群运的开展。应把行署法令好好的研究，不适者应迅速反映上来。为了适应工作的不平衡，县可制定纯地方性的法规。在民主民生政策上，主要掌握：为改善民生必须进行增资减租的斗争，是□□再即掌握合理负担，从增加基本群众收入及减少、除免群众负担的两方面着手。减息问题必须与合作社结合起来，息减了之后，要马上组织合作社，举行信用贷款，否则为害群众生活不小。工商局银行勿单纯营利，要扶植群众生活。

第二部分 关于党的工作（略）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

(一九四三年)

第一部分 濮、范两县的形势特点

壹、工作开始时的形势特点

基本上两县的局面已经打开，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优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有了一套），但下层农村仍为封建地主掌握着，所以农村中各阶级对我们的关系不够经常：地主对我们不满，但表面应付我们，暗中反对破坏；中间力量有的跟着地主走，有的采取观望、消极的态度；而广大基本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对我们也是消极、观望、不十分信赖的态度。因此，虽然我们基本上取得了优势，各种法令虽已实行，但不够彻底；加以主观上对政策执行的某些缺点与错误，使广大群众对我怀疑，不敢依靠我们，使我们陷于孤立，我们的统治力量表现的非常薄弱。

（一）范县。因为执行政策上与工作上的缺点，使我们几年来的统治表现出无力量，从各阶层的表现可以看出：

甲、地主。民主民生工作虽已部分实行，但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并未削弱，他们采取了以下三种办法，来维持他在乡村的统治地位：

1、利用其上层人物（士绅）掌握我们的弱点，作为他们统治的护身符。如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过去只看士绅脸，没有站稳立场，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区党委出版的《党的工作》第13期（增刊）。

甚至有些领导干部，把士绅的意见当成群众呼声。

2、利用他们的传统地位，瞒上欺下，阳奉阴违，来达到他统治的目的。我们统治上层，他们统治农村，利用他几千年来的统治经验。我们的法令下去即变质。

3、利用游民作其爪牙，欺压乡民，增加群众负担，嫁祸于我，造成群众对抗日政府的不满。地主为避免战争中的动员与差役，不直接掌握村政，而用游民作为统治的工具，地主在背后操纵，保持了他在农村的统治。我们实行合理负担，他瞒“黑地”。葛口全村共30顷地，合理负担地17顷。其负担的百分比为：地主12%，富农14%，中农12%，不但如此，并贪污分肥，把负担的重点放在群众身上。

乙、富农。因为地主把法令变质及他们的无权，负担较重，加上增资工作的推行，而其本身对民主的要求又未能满足，所以他们对我们是消极观望的态度。

丙、中农。负担与富农差不多，支差繁重，在农村中历来无地位。他们要求民生与民主，我们因为没有给他解决问题，表现对我冷淡，在斗争中前顾后盼。

丁、贫农与雇农。过去减租虽然减了，但马上发生的便是退佃解雇。减租增佃是他们的要求，我们对他们保证的不够彻底，因而对我们不相信，不敢依靠。

戊、游民分子。不仅没有被我们改造，也没有被掌握得住。

一部分游民被敌人掌握对付我们，到我基本区抢掠破坏，扰乱社会秩序。

另一部分被地主掌握，做为自己的爪牙与打手，在农村中横行霸道，欺压群众。

再一部分打入我们组织内部——区队、区政权等下层组织，以我们的招牌为非作歹。甚至白天是我们的人，夜间是人家的人；白天抗日，夜间作非法的勾当。

因为以上原因，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使得广大群众对我们感到

无味，我们的一切工作也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二）濮县。由于叛军的长期盘踞与蹂躏，我们虽然已基本上取得了优势，而广大群众的创痕未复（只听到我们的，没见到我们的，群众还没有在他的切身政治经验中了解到我们是他们创痕的唯一的医治者），所以，对我们的信任与依靠也不坚决，我们的力量也不十分大。

甲、地主。土地经济萎缩得较厉害，土地变更了1/3。贫农下降速度较小（多做小生意来弥补损失），生活也十分差。

1、当权的地主大部分与叛军勾结，狼狈为奸，将负担利用买红条贪污，或买叛（请客送礼）等方法，不但弥补了他们的花费，而且还可从中渔利，把负担转嫁到广大群众身上（如贪污等）。

2、在野的地主，他们的确有一部分是下降了，即所谓“干尖子肉头”，中小地主（谁也不啃骨头，都是要吃肉）只一部分下降而为富农了。

乙、富农。在叛军在时，除受叛军的欺压外，还受地主的白眼与压迫。经济下降很大，一部分为了逃避负担，将土地出租，甚至因土地的减少逃往外乡。因此，他们要求民主。在反贪污中表现积极，然而对增资工作则不感兴趣。

丙、中农。在经济上一部分起了质的变化（变为贫农），即未起质的变化的，在生活上已达到极贫苦的境地（吃的坏，出卖劳动力，甚至出外行乞），而在土地上的变化不大，因多卖牲口与农具。

丁、贫农。在这一时期下降的比较差，原因是：叛军在时出差繁重，他们可以出卖劳动力来弥补一部分损失。但他们的生活也极贫困，可是他们不出差。

戊、小商人。叛军在时他们最赚钱，生活也最好。

己、游民分子。在叛军在时，虽一部分与我有关系，帮助我们（这时他们被好汉□掌握，与我有关系，是为了保存他们的利益），但未被我们掌握；大部在叛军与地主之养育下，疯狂的活跃

起来，叛军走后对我们怀疑与畏惧。

濮县在叛军的长期蹂躏与地主的统治与压榨下，广大群众对我虽好，因为只听到我们的，没有见到在实际上给他们解决问题，所以，在开始时对我们也是观望。

贰、经过了四个月的工作，濮、范形势起了些什么变化？

（一）濮、范各阶级上起了什么变化？

在执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增佃及反贪污以后，濮、范各阶级力量开始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在濮县农村，广大群众基本上已经发动与组织起来，在范县是部分的地区基本上发动起来。

甲、从广大基本群众来看：

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了解到自己的痛苦，想在斗争中去摆脱。如群众说“过去他比咱高一丈，现在咱比他长5尺”；“我们穷了半辈子，今天才知道是怎样穷的了”。过去是听天由命，现在知道迷信是不能解决问题，统治者给的穷苦，只有斗争才能得到解决，一斗即斗出粮食，这是个实际问题，“慢慢的天就晴了”。

在政治上有了觉悟，敢向地主进行斗争，认清了地主与自己的界限，了解到自己是个阶级（了解到咱们是一伙，要对他们那一伙斗斗）。

在组织上，开始有了组织（四个月中组织了将近2万人，改善生活600万元）。这些组织是在斗争中觉得组织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这些群众基本上已团结在党的周围了。同时，在斗争中党发展了二三倍，不仅在数量上的增加，从成份上与觉悟上来说，也是较好的，打下了巩固党的基础。

所以说，广大基本群众已发动起来，是在减租增资斗争中组织起来了；是农村中无产阶级与半无产者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力量。广大的中农由对增资减租同情（但怕落人，不表示态度，

待倒粮后，他们说“是应该的”），到公开的拥护与声援，直到依靠的地步。游民分子说：“八路军政府是向穷人的。”〔他们〕向我们提出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但因为我们没有照顾到他们的问题，发生了一种偏向——偷，捉住了就承认：“是我偷的，因为穷，没的吃。”

乙、从中间力量（富农、中小地主、不当权的实力派）来看：在四个月中，他们与顽固势力开始有了分化。他们对于民生改善虽不甚满，但他们要求民主亦甚迫切；更由于广大基本群众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力量，在此情形下，他们便动起来开始分化。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反对农村当权派。这是今后树立我们优势的**决定因素**。顽固分子已孤立起来，于是他们则大叫“现在是赵匡胤溜河沿——兴龟不兴龙了”，“老百姓不安分守己了”，“扶保纣王，不嫌纣王无道”，“天不能光黑”。

而中小地主等中间势力则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善恶不报，时候不到。”基本群众认识到了组织的必要，如说：“人多心不齐，干啥也无功。”当权派的地主，看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反对也不行了，便说：“倒就倒了吧。”“你们调查调查我这个人怎样？”“问问县里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并自报“黑地”。

因此，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上，基本上已完成了任务。

（二）我们干部在这次斗争中起了什么变化？

全体干部在群众运动中锻炼与改造了自己，初步检讨了自己，交流了经验，对今后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了新的认识。

甲、党的工作干部

在过去单纯的作了些技术工作，把工作庸俗化，技术化，脱离群众，脱离了现实，党不起核心领导作用，仅仅成为法定的领导干部。如对支部了解非常表面，不深入，模范支部起着□□作用。对干部的审查，仅限于填表，而不是在实际斗争中去了解干部。

乙、政权干部

过去部分的干部认为，政权机关是个“向群众要东西的机关”，

是个森严的衙门，继承了统治阶级不少的恶劣办法，反认为自己有了政权工作经验。而今天认识到，要推行我们的法令，必须经过群众路线才能实现。过去未能耐心的去组织与发动群众，却说群众“赖狗扶不上墙”。如禁止资敌，出一布告，只是简单的命令，结果群众由公开资敌变为秘密资敌。

政府片面的向群众要，模糊我们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就必须与〔为〕群众着想，来解决群众问题，因而在过去，我们的政府是有威有权无力。经过了四个月的工作，解决了群众的问题，群众对我政府的威信是提高了。

丙、群众工作干部

过去的群众干部把群众团体与群众分开：我是农会干部，你是群众；我是工作人员，你是群众。侠客作风：“他妈的，我给你减租，我一个粮食也不要，你还不愿意，非要不行。”不是站在群众当中为群众谋福利，而是站在群众头上。也有一部分干部只会“同志们，同胞们”，不懂法令。过去认为群众简单，群众落后，实际上证明这是错误的顽固思想。群众是最复杂最有办法的，不论在对付地主时或算帐中，都有很多的新鲜办法。如葛庄农会拒绝地主参加农会，说：“你是读书的文人，我们都是握锄把的人，说话粗声粗气的，怎能参加一个会！”又如我们说25%，群众不懂，佃户只说“4斗灌1斗”，大家都听懂了。过去认为边区群众落后，所以工作做不好，是不对的，工作做不好，应该严格的检讨自己。

丁、武装干部

武装干部在实际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克服了不注意群众工作、简单化的工作方式等弱点，了解到农村是不简单的。

在此工作中，使党、政、军、民的干部彼此交流了经验。

（三）在实际行动中初步地看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藏身巢穴，体会到大众语的伟大，真切的初步认识到了什么是知识分子与什么是理论。

甲、有些干部到村中去八股的讲话，就是主观主义，不了解群

众的实际问题。甚至有些干部完全脱离群众，到农村中吃不到饭，则骂群众落后，不满意制度。而实际上群众则给了他以严厉的批评，如有人说：“疮长在胳膊上，你偏偏往腿上去扎。”不了解情况，就一定会碰钉子。

乙、大众语的问题。群众最能了解其意义，如对合理负担说：“送葬的掉了裤子，有哭的，有笑的，还是笑的多”；对减租增佃中的问题说：“又要叫马将，又怕日死马，要想叫马将，别怕日死马”（意谓：对落后群众别顾虑太多，处处沾便宜）；对减息时说：“放帐的不经官，帐多不必愁”（意谓：还不起还该不起呀！）；在反贪污中，地主威吓算帐委员会的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意谓：现在你领头，将来我得势了先找你）。这些话比咱们文诌诌的名词有力得多，群众容易了解与接受，这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丙、知识分子与理论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到农村中成了没知识。有些学的理论不少，到农村中吃不上饭，骂群众落后。有些不感觉新事物，整天醉生梦死，不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干部整天想吃好的，赶集上店，自寻消遣。还有的被地主麻痹，住在地主家不出来，或被地主收买跟地主走，认为地主苦（合理负担，减租减息都要他的）。这种干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民主民生斗争中淹死了，处处表现着无知。在工作中证明了农民是有知识的，比站在群众之上的干部更有办法一些。更有些自称的“工农干部”不了解乡村问题，不懂得农民心理，那只是空辱农民干部的名义。这些毛病与缺点都是值得我警惕，须在实际斗争中去纠正。

（四）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广大群众已在初步的亲身经验中敢于依靠我们，了解了党是爱护他们的利益的，这说明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决不是主观愿望所能达到的。这就是过去我们未能发动起群众的基本原因。因此，党的口号必须放到群众中去考验。只有党的口号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时，才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濮、范四个月来可以说党与群众结合起来了，基本上都已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农会的建立就是今后濮、范工作继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二部分 过去策略的检讨及今后的策略运用

壹、过去的检讨

(一)几个具体工作中的策略介绍

甲、合理负担。在濮县25天完成了370村庄，占全县88.5%，这是边区的创举。

1、为什么实行简易合理负担？

叛军走后，各阶级有两个要求，一是平均数，即叛军在时多出负担者，现在和少出的平均一下，主要是地主；二是改善生活，中农以下的广大群众，要求减轻负担，改善生活。其次是我们的要求，是迅速屯粮。叛军走后曾宣传实行每人去1亩的合理负担，各阶级都很兴奋。当时派粮320万斤，每人去1亩不能完成，准备改为平均摊派，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广大群众不满。这时我们便研究了一个村的情形，估计了全县〔情况〕，确定实行简易合理负担办法，其特点：

①以田赋地亩为计算标准，并保证在田赋地内无“黑地”。其他“黑地”不着重查。

②按田赋地之分级（如河压、河占、堤压等地质之好坏）评议之。

③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完成屯粮为主。

2、实行简易合理负担后，基本上打破群众冷落消沉的状态，在农村中起了很大的变化。贫农说：“不实行合理负担，咱得逃荒；实行了就不逃荒了。”所以在合理负担计算好后，贫苦者自动拿公粮，怕合理负担不实行了。中农说：“有哭的有笑的，还是笑的多。”地主说：“合理负担，我看最不合理。种1亩拿1亩，这种1亩

拿2亩，不合理。”

3、简易合理负担不仅保证了征收公粮任务〔的〕完成，并且打破了边区合理负担执行的记录，而特别重要的是锻炼了干部，使干部了解哪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哪是少数人的要求。当时干部认为平均数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因为干部接近的都是地主富农少数人，只听到他们的跳叫，而听不到群众的要求，不接近群众——一部分人认为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不能实行简易合理负担。有些干部在执行中采取中立态度，个别受地主影响随地主跑。自执行后，我们对简易合理负担的认识：

①实行简易合理负担不但不会影响屯粮征收，而且促进了公粮的征收。

②清楚看到了贫富斗争的各种办法，基本群众负担减少，可以从富有些的身上补救起来。贫苦群众积极拿粮，少数人不拿也没话讲，好像母鸡下蛋似的脸一红就下来了。实行合理负担后，基本群众真正掌握到我们手里了。这由尚和县与濮县的比较可看出来。尚和实行平均摊派，造成广大群众与我对立，并〔且〕屯粮计划只完成一半。

③合理负担的合理性应根据主客观的力量有所伸缩，□□□□的合理只能是幻想，过去的合理负担只在书本上合理，在脑中合理，实际上实行不了。

④因工作地区不同，实行的方式上也有所差别。在空白地区，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多用政权力量，更多的注意启发群众情绪，把广大群众拉到手，使群众认为抗日民主政权与旧政权不同；在有工作的地区，时间上许可，群众对我认识，可更多的采取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去执行。

在范县的合理负担——有1000顷“黑地”，地主实行倒累进率。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占了便宜，并且还争取了群众来对付我们。而现在的合理负担办法极不统一，应很好的统一起来。

乙、减租增佃（以粮代价工作同时进行的）

1、濮县的减租增佃是在合理负担执行以后实行的，广大的基本群众已经起来依靠我们，同时在合理负担中便了解了租佃关系，所以在进行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

在范县的减租，以粮代价工作则不好作。由于过去对减租后的永佃权保证不够，地主勾地解雇，干部包办代替，加以教育工作的不够，则造成了地主富农的报复，故佃户与雇工有很大顾忌。

在濮县减租增佃以后，地主则感到很大威胁，警觉性很高。范县地主开始麻痹，减以后则表示恐慌。

2、今天检讨这一工作有如下的特点：

①减租增资斗争中，主要是地主与佃农，雇工与富农，斗争双方比较明确，所以就直接引起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在斗争中创造了骨干组织，造成今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同时必须认识，减租不是单纯的地主与佃户的斗争问题，广大的中农是会同情拥护的，并在政治上及舆论上加以声援；在斗争中改善了农村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力量。

②利益明显，斗争比较直接，所以群众容易发动，也容易掌握，有的认为这只是个别的顽固分子不高兴，实际上这只是看到容易的一面，因而忽视了艰苦的教育与组织工作，造成轻视对方的观点与机会主义。

在范县二、四区几个大的村庄打开以后，就改变了群众过去的消沉懈怠的心理，组织了部分的群众。在斗争中，中农在开始同情，但不敢公开表示出来；到倒粮时，中农则公开表示拥护；最后看到退工解雇的问题有了保证，中农则大批参加农会。

斗争开始时，动员雇工及佃户的过程是由不该到应该，由希望别人代做到自己干。减了以后并在法令上给以保证，这是雇工与佃户最高兴的时候。

地主这时的表现，一听说减租，对干部封锁不理，不给房子住，不令佃户与干部接近；斗争既起，则表示对佃户如何好；在倒粮以后，则提出对佃户的威胁，说“这是砂锅子捣蒜，一锤子买

卖”，对佃户精神封锁，不给工作，不给说话，说佃户把牛喂瘦了，或说调戏他家女人了等加以罪名，来退佃解雇。所以，如作的不好则会明减暗不减，双方都不满意。因此在工作中必须防止“内奸”，保证地主不勾地。

③今后应注意的

A、检讨起来，一般的不应将减租增资在同一村庄同时进行，否则会多树敌人（与地主、富农同时对立），应分别先后进行，以便各个击破，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建立反动堡垒。

B、在减租增资以后，佃户和雇工可能成为农会的主要成员，这是不可免的。只要我们注意对中农的争取团结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不难扩大广泛的农民组织。

C、反贪污问题。（略）

（二）这一时期我们的策略指导与检讨

甲、群众工作的特点

在工作开始时，濮县为叛军退出区，范县有我们的部分群众工作基础，但这两县的共同特点，是在于群众基本上尚未发动与组织起来。

我们抓紧这一特点，就是首先应当把基本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那么压迫基本群众的是谁呢？是地主，就须向地主去斗争，争取民主民生的实现，以取得基本群众的优势。

乙、我们对地主的方针基本上是联合抗日，因此不能过分伤害他。一方面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取得民主权利及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地主能生活下去，共同抗日。为了启发与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就必须进行一适当的斗争。

目前濮、范基本上把群众发动起来，并初步的大量的组织了群众，因而我们基本上是完成了发动群众的任务。但有其缺点：

1、对顽固势力与中间势力分不清（顽固势力是农村当权派，要求抗日，反对民主民生；中间势力要求抗日与民主，反对民生改善）。有的同志把地主、富农弄为一谈。顽固势力与中间势力不仅

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是本质上有区别的。对富农〔是〕发展的方针，但对其封建剥削的一面是反对的，因而斗争的程度也不同。对中间势力不满意，民生改善认为是假进步，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在斗争中没有掌握好分寸。

2、在斗争中，对地主的斗争认为是打落水狗，也是不对的。

（三）今后的策略运用

要想达到发动与组织群众的目的，必须正确的掌握住策略，从不断的领导民主民生斗争中去完成。

甲、今后几个具体工作的特点

1、目前反贪污斗争中的特点

①反贪污斗争本身是广大群众对少数贪污者的斗争问题，但必须看到：贪污分子的特点大部分是运用村政权，或者与村政权有关的来进行贪污。反贪污斗争本质上是民生问题，但反贪污斗争又常常联系到改造村政权。因此这一斗争不能单纯看成是经济斗争，它必须与改造村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根据濮、范现有工作基础，农村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按目前濮县的反贪污斗争就与改造村政权的斗争结合更为密切了，包括了树立基本群众的优点及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揭发与分化顽固势力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就看我们是否犯错误的问题。

②在进行反贪污斗争中，首先要找到主要分子是谁，找到后台。有的村长是游民分子，但后台为地主，利用牌长掌握村长，或者用帐房掌握，或者以破落户充任村长，地主露面。因此就必须分清主要与次要分子，不是所有在朝的都斗。同时在处理斗争的果实的时候，不仅照顾到基本群众的利益，还要注意到中间势力的利益，应当通过村民大会去处理。

③改造村政权应改造它的一套，不仅改造一个村长就算完了。

2、在反贪污斗争中应注意的几点

①不要笼统的把在朝的贪污分子当成对象，须要分清主要次

要，以便打击主要的，争取次要的，去孤立最顽固的。

②算帐委员会要以“三三制”去组织。他是代表全村所有参加反贪污斗争人民的意见去进行工作，因此，农会不能直接指挥算委会。农会对算帐委员会或个人有意见，可以号召农会的〔以〕团体名义或号召农会会员以村民的资格提出意见。

③反贪污的果实不应交农会，应交村民大会，农会起保障作用。但农民大会通过由农会处理时不在此限。

乙、减息斗争问题。边区目前灾情严重，合作社少，借贷所没有，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减息问题，而是能否借到钱与粮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情况，不是一味的强调这一工作。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以下三种条件下才有可能：

- 1、灾荒问题有了具体解决办法。
- 2、金融问题解决，统一了货币。
- 3、农村合作社有了组织。

目前年关减息也是群众迫切的问题，可以采取拖延办法，有纠纷可以调解之。如果成了诉讼案件，则可执行分半减息的法令。

在减息中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复杂的，必须注意。如濮县的债务人多〔为〕地主，债权人多为鄆北小商人及范县的富农。

丙、救灾问题。边区的灾区相当大，濮县中农的粮食只能维持到年底，贫农则更难维持生活，所以在灾区应以救灾为中心工作。赈灾不是基本办法，主要的是给灾民找出路。这一问题应与边区的统一货币联系起来，把法币排挤出去，把一切非必需品运出去，换回必需的粮食来与敌人作经济斗争。但这一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有政府的贷款与群众团体领导，难民才能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政民要共同去调查，农民干部要农民化。可以将农民组织为运输队，干部参加领导。

丁、优待抗属的问题。这一工作也必须成为群众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工作。这不仅关系到部队的巩固问题，并且在群众中还该涉及到一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问题，并且这一部分群众与我们有特殊的

关系，我们不仅爱护他救济他们，并且应提高他们的地位。优待抗属的顺序应当首先是正规军、地方军，最后为工作干部。应马上纠正只优待自己，不优待别人；只优待地方军，不优待正规军的自私的宗派观点，并应分别家庭经济状况来予以物质的帮助与精神的安慰。

以上诸问题，应当根据具体的环境特点来灵活的运用，而不应机械的搬家。

贰、对今后形势的估计

（一）对战争形势的估计

目前是在与敌人争取时间。敌人对我基本区（濮、范）的进攻与占领，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早晚与地区先后的问题。敌人迟来一天，对我们有利一天。我们应抓紧时机发动组织群众，巩固力量。估计敌人将来的进攻可能采取的办法大概为：

甲、“铁壁合围”，不安据点，短时间便走了。

乙、由四周向内“蚕食”，步步为营。

丙、由于我们地区的广大，敌人可能先占领几个主要的点线，向外发展到面的占领。

丁、像“九二七”〔大“扫荡”中〕的八分区一样，率领绝对优势的兵力，大量的安据点，使根据地变质。

布置工作要估计到以上的情况，但基本情况未变动以前，我们要大踏步前进，同时准备敌人到来时的工作方式。领导干部应更多考虑这一问题，布置工作千万不要麻痹。

（二）对农村三种力量动态的估计

甲、顽固势力。顽固势力的特点与进步势力的分水岭：顽固势力是农村的当权派，要求抗日，不赞成民主，更不赞成民生。大地主投降派是降日反共；中小地主及在野的地主则要求抗日与民主，反对民生。我们对顽固派斗争时〔要〕分别对象，分别程度。目前顽固势力之特点是感到恐慌，今后可能：

1、主动的退却，拖延时间，等待时机。被迫退却或主动退却，在斗争中掌握群众情绪，什么方式都可以，但用其他方法挽回损失，掌握村中的权柄，并来麻痹我们。

2、坚决与我们斗争，甚至结成联盟、找后台（如仙庄附近的村开了20多个村的村长会，又如范县士绅200多在葛口请县长的客），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此时出面者常常是被动者，操纵组织者常在背后。

我们的目的〔是〕分化揭发之，使之结不成联盟，找不到后台。

3、下毒手，改变斗争方式。对方计划最后无有办法时，他们可以〔用〕最毒辣最卑污手段：

①利用流氓或土匪打黑枪（黄河两岸的特点）。②作内线工作，打入我们组织，甚至打入我党，从内破坏我们。③收买利诱腐蚀我们干部，破坏我们的工作，如吃喝、给钱。我们有些干部提出“吃孙喝孙不谢孙”是不对的，吃的多了，便在腐化堕落中淹死了自己，如某些干部消极或逃跑回家了。

我们同顽固分子斗争，同投降派斗争是有区别〔的〕。对顽固势力斗争是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对投降派是对汉奸的斗争。因此，打“落水狗”的办法是不对的，“打得地主缩也缩不回去”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的分别，不但是抗日而且要求民主，中小地主、富农及在野的地主，谁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跟谁走。对中间力量的估计：

1、与顽固势力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既没有答复他们的要求，也没有在反贪污中照顾他们的利益，觉得我们不够朋友，加上顽固分子竭力拉他，这是对我们极不利的，广大优势的树立则不可能。

2、同我们一块走，与顽固势力分化开，来依靠我们。这是在我们不过分伤害他们的利益时，减租增佃后保障了劳动纪律，而且在

反贪污中照顾到他们的利益，答复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不仅有义务，而且有权利，感到我们可靠，这是树立优势的焦点。这是我们应该力争的。

3、中间势力起分化，绝大部分是中立的态度。这是我们不能较圆满的答复他们的要求，也不过分的损失他们的利益，但对他们的地位尊重不够，态度上不够诚恳，有些地方感到伤心与被利用；同时我们与顽固势力的力量都很大。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总之，我们对中间势力是争取与团结，而不是发展他，而是发展自己。即便有些斗争，也是为了争取与团结。

丙、进步势力。不仅要求抗日民主，而且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包括了中农以下的成份。我们不仅改善他们的生活与答复他们的民主要求，还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

对濮、范进步势力动向的估计：

1、在不断的斗争中组织与巩固起来。取得优势就必须：

①把现有组织提高一步，把广大群众由经济利益斗争提高到政治利益斗争，继续组织广大群众，在发展与组织路线上不发生错误。

②在揭发与分化顽固势力，争取与团结中间势力〔上〕不犯错误，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

③抓紧时间集中力量。

2、停留〔在〕现有基础上，不仅不发展，相反的还要削弱。这在下列条件中是可能实现的：

①这就在我们不能把广大群众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不能组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单纯的经济观点。

②不能提高基本群众及干部的阶级觉悟及斗争能力。干部包办一切，自己当“太上皇”，当“诸葛亮”，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使群众运动变质，内部分化。

③不培〔养〕群众的组织观念，不会运用组织力量（组织农会

为了减租，减了租便冷下去了），不了解组织就是力量。

3、现有的基础消沉、分化、崩溃，已得的成果失掉。在下列条件下可见到：

①已得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减租增佃后，粮送回或退工解雇；在反贪污后将款送回）。个别地区已发生这现象。

②已有的组织不团结，四分五裂，闹内江。

丁、游民分子的问题

一般是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有时不固定属于哪一阶级，所以说游民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

1、游民分子的来源

①城市的失业的工人及职员，没有正当的职业，特别是抗战以来都跑到农村中来。

②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多数的农民的生活下降，一般贫苦者无法生活，不能不另想别途。

③历年来长期内战，制造了大批的游民出来。

2、游民分子的特点

生活来源是用一种不正当的办法取得的，如骗子手、娼妓、闯江湖的、卜者、巫婆、土匪、流氓、土棍、经纪等都是（应与部分是依靠不正常的不正当办法取得生活资料的区别开来）。游民分子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社会上无地位，对社会不满，又无身家性命的顾虑，就产生了革命性；一方面因为他在生活中不占地位，又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捣乱社会秩序，缺乏建设性，是反革命的，不是社会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善于运用他的革命性，改造他的破坏性。他们的组织口号是“有奶便是娘”；行动口号“此地不养爷，别处养爷处；别处不养爷，回家卖豆腐”。

3、目前在濮、范对游民分子的处理产生了偏向：

①因为不了解什么是游民分子，扩大了游民分子的范围。如将好吃、好喝、好嫖、好赌、好穿、有流氓习气的人都划到游民分子范围之内。

②忽视了游民分子的两重性，忽视了他的革命性，只注意到他坏的一面，没有去改造他，教育他。四个月来无有大胆的运用他，掌握他，对他们的是关门的。

我们对游民分子的态度，对最坏的应当镇压与打击；但对大部分都应设法争取与改造之。基本办法是叫他们参加生产，改造与恢复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成为基本群众的一部分。争取游民分子也就是取消了地主的爪牙与打手，可以缩小敌伪对我进攻的空隙，并且还可争取一部分的游民去对敌斗争。否则为顽固分子所掌握，则成为阻碍群众进步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很好的去掌握与改造他们。

（三）根据目前工作现状，决定我们目前的策略

甲、从斗争的对方来看（基本势力与顽固势力）

1、首先从顽固势力看。四个月斗争使他们起了如下的变化：在开始时认为是小民捣乱，不关痛痒（如说“简直是井底蛙想吃天鹅肉”）；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就马上看到他们的地位不稳，逐渐下降，便起来以息事宁人的办法企图取消斗争；如群众再进一步干下去，则内部起分化。中间力量〔是〕以群众为转移。

2、从基本群众来看。几千年来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组织与斗争的经验和信心，也感不到自己力量的伟大，并回忆考虑着叛军的创伤及将来敌伪的威胁。而在四个月斗争中也已经部分的组织起来，有了觉悟和敢公开进行斗争。

在斗争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应占领阵地，争取先机找出对方的弱点，坚决予以打击，求得斗争的胜利。首先注意他们的分化，组织与团结自己的力量。

乙、从目前的工作现状及今后工作的发展上来看，目前基本上发动了群众与部分的组织了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要树立我们的优势，建立正常的局面。树立优势的标志在于：

1、在思想上，把农民由自在的状态达到自为的阶级，在思想上提高一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觉悟到自己是阶级）。

2、在政治上，使农民能够在同地主斗争中取得胜利，并在斗争中去丰富自己。

3、在组织上，由无组织到有组织，把广大农民组织到一定组织中去。

目前游民分子已不只在政治上认识了我们是能解决他的问题，而且在组织上感到了有组织的必要（一村反贪污后，一游民分子要参加合作社，不让加入，竟跪下来求）。

树立优势的目的，就在于打开统一战线的正常局面，即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基本群众占优势，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包括了顽固势力，组织成共同的统一战线。为此，今后的策略指导应当由民生的环子过渡到民主的环子上去。因为中间势力要求民主，而基本群众也必须从经济斗争（民生）提高到政治斗争（民主），否则已发动起来的群众是很难巩固的。

丙、如何具体运用策略？

我们对中间势力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争取。

1、打。打击顽固分子是为了分化与揭发他们。对下毒手的地主我们必须予以打击，揭发他的阴谋。一般的说，在基本上对他不利的时候，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斗争办法不正面出头，采取两面派的态度，阳奉阴违，把法令变质，利用我们的空隙，上拉下打，采取防御的进攻来对付我们。在我们打中了他的要害时，也有正面斗争，常以“肉头”地主与我们斗。对这种地主应争取，无效时须以斗对斗，用斗来争取他（目的在于分化与团结他们），斗以后使他反悔，使他认识是“上了谁的当”。不分对象，不研究情况的乱打是要不得的。

2、拉。我们不仅要看到斗争对象的现象，而且要认识其本质。对怕群众力量的地主，可以用群众力量来争取他；对在斗争后暂时消沉，暗中仍在想办法的，应予以揭发；对愿意和缓局势，改善与群众的关系，动摇想回头的，我们应大开方便之门，不记前仇，团

结与争取他，集中力量去打击主要对象，达到分化与争取的目的。

3、以理斗理，以力斗力，但不要过火。应着重推动群众组织力量，来完成斗争的胜利；不在不得已时，政权不出头，着重以理斗理。今天的斗争要合法，但是单纯的法律观点是不对的。

地主最怕的是打官司、登报、开会，因为他们没有理，是少数人压迫与剥削大多数人。地主的力量是经济力量，我们的力量是组织力量、政治力量与法律。今天我们就是要以群众的进步力量来对付他的经济力量。

第三部分 组织与领导上的几个问题

壹、坚决克服包办代替现象

（一）包办代替的具体表现

甲、政民工作队是代替包办了濮、范两县的工作。工作队本身就是不适合的，在空白地区假若没有一套组织形式便应建立，已有组织不够充实的，就应加强与充实之。工作队往往产生工作队在，工作有，工作队走，工作无的毛病。如果是为了着重建立开展这一地方工作，应帮助本地领导机关培养原有组织的威信。到那里工作的同志，都应参加当地的各种组织进行工作。

这次在濮、范工作队干部较强，则影响了本县原有组织对工作的领导与威信，加以工作队本身分工不清，责任不明，更采取了军队的一套组织形式，影响到工作效率的发挥与干部的工作情绪。

工作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如专门做一种调查研究工作或负有其他特殊任务时可以用，一般是不适用的。所以，在濮县的流动教育团，范县的“扫荡工作队”，都是值得考虑的。

乙、干部代替群众。在斗争还不成熟的时候，即开始斗起来，形成了干部的蛮干；又没详细的调查研究，对情况有时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否认了在斗争进行中阶段之间的距离，而主观的蛮干，或想超阶段的一下干成：这都要碰钉子的。

在每一个斗争中必须经过由不应该到应该，再到人家干，到自己干的这四个阶段，也就是说由宣传鼓动，再到组织，最后进行行动。在这四个阶段中间都有它的距离，有它一定的工作，在每个阶段有它适当的口号，忽视了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而要求迅速完成这一斗争，必然会产生盲干。干部动群众不动，即偶然胜利，这胜利也不能很好达到群众的发动与组织。

丙、个人代替组织

1、干部到农村去领导工作，在无群众组织的地方，应该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来；在已有组织的地方，自己便应参加到里面去，尊重原有组织，帮助他们进行工作、解决问题。

而我们干部到村里后，站在群众之上，当“太上皇”，当“诸葛亮”，不听取群众意见与呼声，以个人意见来处理问题，代替群众与组织，更没有注意到发现积极分子，培养群众领袖，提高村干的工作能力，障碍了农村已有组织的进步。

2、到各组织去时，这一干部即算原组织成员之一，事事应以少数服从多数之原则来进行工作及提出意见。若该地决议违犯上级决议时，可制止并提出意见。

而我们干部则自以为高明，不听取组织意见，不服从决议，以个人意见来代替组织领导，不经过当地组织便布置工作。

丁、党政军民互相代替

政府给农会布置工作，群众团体私自逮捕人，党不经过党团布置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结果在工作上是互相乱抓一气，因此，造成了互有意见，不团结。这完全是由于各部门没有认清自己的工作任务与范围。

（二）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

甲、不了解民主集中制的真实内容，不了解没有真正的民主便没有真正的集中。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是组织服从个人；在少数服从多数上是多数人听他自己的意见，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对他是个压力。不了解即便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也必须经过多数人通过，成

为大家的意见才能执行。

乙、对上级的关系上是以个人为转移。对下强调集中，对上强调民主。总之，认为自己是个天才家，只有组织不好，甚至采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办法来达到个人的私欲，不了解自以为能便是无能，自满就是不满。

丙、一切都从个人愿望出发，不是根据客观实际的要求，自己想怎样便怎样，把希望与可能当成现实，不了解由可能到现实的转变中间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当遭到失败的时候，更不虚心检讨自己而归罪于客观。

丁、不了解工作发展的规律，在工作中是由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与领导方式。

以上四点其思想根源，根底上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具体表现。所以这是观念意识上的问题，看不起群众，看不起上级与下级，只作不听，只说看不看，好简单，怕麻烦，以致使工作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三）如何克服缺点，求得工作顺利开展？

必须从观念意识上做起，克服错误就应首先深刻认识其错误的严重性，才能克服它。

甲、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而不是包办代替，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领导。对政权与群众团体的领导，是通过党团经过党员的活动及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实现领导，党委和党的机关没有权力来直接命令政权及群众团体。因此就必须纠正过去对政民领导上包办代替的现象。

党是无产阶级战斗的参谋部，对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掌握政治原则、路线与政策，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这就是说各级党委应成为实际的领导者，不应成为法定的领导机关。所以，各级党委与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很好的研究党的路线及政策，才能使党起保证作用与核心作用。为此必须：

1、健全党委的领导机关，实现党中央一元化的领导，还要吸收军政民的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要加强。今后濮、范可经常保持三个以上的党委〔成员〕进行经常工作。这并不是说让三个党委〔成员〕整天坐在机关里，他们的领导责任在经常了解情况，讨论问题，总结经验，保证工作顺利的进行，防止错误的发生，更要建立各种制度及具体分工，实现领导掌握全面工作。

2、建立与健全县区政权及抗联的党团工作，以便实现党委的领导。党委应定期的布置工作与检查工作，而党团本身要定期的向党做工作报告，以便建立党对他领导上的正常关系。

3、建立与健全县委的民运部门，适当的抽调干部来充实这一部门工作。如无专责干部，可由抗联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兼任。

4、濮、范两县都要有一个公开的党员出现（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解释党的政策，使群众对我党有一新的认识，以解群众对我之疑团。在一般情况下不代表县委，仅以党员面目出现。

我们应该了解，党的政策与政治主张都是公开的，只有组织是秘密的。我们应广泛的对群众加强宣传与教育。

乙、关于政民工作队取消（3个学校的）建制，统一于党的领导的问题。今后工作取消，各个单位的界限打破，所有干部统有〔由〕县委分配，无论哪一部门哪一地方的干部，都要安心的去长期坚持濮、范工作。

无论在何地都是同样的工作，只有站在对敌斗争，发展我们的力量，解决群众问题上来看才是对的，站在个人进步上也是对的。因为〔只有〕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才是我们的实际大学。

丙、关于政府对民主民生工作的态度与责任。政府必须将目前的民主民生工作当成自己的中心任务。过去部分干部认为是群众工作，政权只是配合，这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包办代替群众团体，更不是与群众团体混为一谈，各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必须作到

的几点：

1、张贴布告，翻印有关民主民生的法令。

2、认真将行署建立调解委员会的训令实现起来，建立各级组织来调解民主民生中发生的纠纷。我们应密切配合这一工作，个别干部只机械的按法律处理问题，结果给群众头上泼冷水，今后应当注意纠正。

3、处理民主民生中发生的问题时，必须站稳立场，更多的采取仲裁方式与调解方式。

4、应当求得村政权的初步改造，应创造一套适合区政权领导村政权的办法来。

丁、群众团体必须将民主民生斗争当成自己的中心工作，从这一群众运动中达到名符其实的群众团体，不是少数工作人员的独占机关。应注意下列四点：

1、在群众运动中，群众干部应站稳自己的立场，不是站在群众之外来替群众解决问题。所以，工作员便是群众的一分子，言语、行动、服装必须群众化，坚决克服“我是群众团体干部，你是老百姓”的观点，否则便会遭到王先生到农村去一样的失败。

在工作中不放松对我党主张的宣传与教育，在行动上必须以群众意见为依据，与群众共甘苦。我们的意见还可在斗争经验中去通过，如此善于领导群众，才能成为群众领袖，绝不是站在旁边说风凉话，自充高明的人所能取得的。干部政策上要看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如何而定，不是依据我们对干部的要求。

2、发动与组织群众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不是其他。在这次民主民生工作中，不但整理与改造过去的，而且要大量开展与建立新的。必须知道，没有广大农民的彻底发动，要想建立其他组织是不可能的。农民组织是群众组织中的中心一环，目前应抓住组织农会，其他组织（青、妇等）必须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建立：

①中农以下的绝大部分农民已参加了农会。

②农会不仅有了一套，还能接受任务，自动推进工作，解决内

部的一般问题，在与地主斗争时基本上取得胜利。

③农民妇女及青年有了独立组织的要求与必要时。

在这三个条件成熟时，可提出青年、妇女的单独组织。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经过支部讨论，得到分区委的同意。区要成立时，分区委讨论，县委批准；县则经过地委批准。在农会条件不成熟而过去有的青会、妇会不应削弱。不能单独工作时，可在农会中设青、妇小组，注意培养其工作能力，作为将来正式建立青会、妇会的基础。

3、既定以建立农会为主，则应认真研究村农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以及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关系。

4、彻底研究一下区农会对村农会的领导方式。

戊、武装问题

抓紧目前群众相当高涨的武装情绪，提高一步。在整理自卫队中建立游击小组、模范班，〔使其〕逐渐走上抗日斗争。在民主民生斗争中去建设人民武装。目前解决的问题：

1、整理组织。自卫队，打更坐夜，解决支差问题。

2、建立与健全自卫队、游击小组，接着是模范班、青抗先，由防匪锄奸，慢慢提高到抗日斗争。

3、武器问题。把富家的枪动员到自卫队来，一方〔面〕自卫队有了武器，而且可转移枪口对外，并应领导群众改造与使用旧武器。

为了解决人民武装的武器问题，濮、范可成立炸弹厂。

己、建立军政民联席会议，以解决相互配合上及彼此间的关系问题，求得工作上的协调与顺利开展。

贰、应如何使用力量？

（一）用打堡垒的办法进行工作（即工作要有重点）。一个是找出首领村（即复杂的，问题多的）进行工作，去影响其他；一个是在一村从头到底，着重创造经验，再传播到其他村子运用。为什么呢？

甲、为了同敌人争夺时间，选择重点，集中力量做个彻底。因为在时间上的宝贵及环境的紧张，必须求得全胜与速胜的办法。

濮、范两县工作虽都有重点，但范县是将这一环抓住了，失掉了链子，对整个工作抓的不紧；濮县的重点是带脚的，随着工作任务跑，放弃了重点村，是抓住了链子放松了环子。

乙、基本区应站在发动群众的观点上来打堡垒，传播经验，不是孤立突出的。正是为了全面工作的迅速开展，应抓住中心环子推动整个链子，但不要过分强调打堡垒，使之发生另一偏向。在纵深的工作里，须注意工作向全面平衡发展。

丙、如何使用堡垒

1、把堡垒作到名符其实，以此村去影响周围地区的工作。干部要多而强，以便打开堡垒影响他村，并吸收经验介绍给他村以为参考。但传播经验是根据其地区的具体环境的需要，而不是机械的搬家。

2、堡垒打开后，应抽调干部到其他地区工作。在工作中应注意提拔干部，培养干部的能力与信仰，以便继续支持工作。打堡垒时不能集中力量是不对的，但过于长期的集中也是不对的。

3、濮、范干部已抽走1/3以上，今后更要掌握堡垒，用打堡垒办法领导全局。

干部减少了，中心村是否可减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二) 干部问题

甲、干部决定一切。只要把堡垒的情况已经估计了，办法及干法也足了，则一切决定于干部。干部使用的好坏，则决定工作的快慢与好坏。所以，应选择基于干部（群众观念与组织观念较好）去掌握堡垒，并配合次要干部人数，先打大堡垒，然后抽出去再打小堡垒。要使工作作到“一步一个脚印”，克服过去干部走工作也走的错误。

乙、新干部的发现、培养与提拔。我们应该知道，工作中没有大批土生土长的干部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群众领袖，我们的工作

是不易作好的。为了培养与吸收本地干部参加当地组织为领导骨干，我们应注意：

1、如何发现干部。在每一个群众运动中都有他的群众领袖，那就必须注意去发现并善于选择一个统一的群众领袖。在统一的领袖未产生之前，要很好的去注意各个积极分子，适当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发扬自我批评的空气。如其中有党员，应起模范作用，使他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工作，加强教育，防止内讧，使他们了解团结就是力量，并在他们中间找出统一的领袖来。

2、如何培养干部

①选择的条件：A、与群众有联系的。B、能够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大家利益的。C、成份好，说真理的，顽强不屈。文化低些没有关系，只要培养与教育他也能成为最好的干部，因为他的立场稳。

②首先培养他的威信。教育他们一些具体办法及总结一些经验，培养他们的团结精神与工作能力，注意他们的英雄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要以广大群众监督他，开干部会、小组会，倾听大家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注意不要“老妈妈坐飞机似的只顾抖起来”。

③培养干部的办法。可以开短期训练班及工作中带领积极分子一同检查与布置工作，以便从实际工作中去培养与教育。

3、提拔干部。原则上是慢慢的来，任务不要过高，给他学习时间，不要随便调动，以免影响干部情绪。区应注意多提拔不脱离生产的干部。

叁、在领导中应建立的几个制度

(一)四个月来领导上的经验教训

甲、几个经验

1、确定任务前的准备工作，必须考虑总的任务是什么，当前的具体任务怎样干。应预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主客观力量如何，时间多久，工作怎样配合，各种工作的关系。否则，只是一般原则是

不会解决问题的。弄清情况作好准备工作，一方〔面〕根据工作需要，一方〔面〕根据下面意见。

2、旧任务检查总结与新任务的提出。

3、如何开会与搜集材料，无准备与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会就不开。

4、作一村不巩固战果就转移，结果那村没成，这村也凉了，不能巩固胜利。正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掉一个”。

乙、几个教训

工作队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过高，是主观主义的，原计划两月，结果用了四个月。转变村的优势那7个条件是不对的，达到了这七条只不过有了工作基础。

提出急行军是不对的，结果完不成，应该提的任务少些。如濮县的教训，是在减租工作中来准备减息，但减租已结束，减息还未调查出来。

（二）领导者应有的责任

甲、调查研究情况决定任务。

乙、过去干的什么？现在干什么？将来做什么？预先来布局。常说：“吃不穷，花不穷，计算不到就受穷。”

丙、我干什么？大家干什么？我怎么干？大家怎么干？

丁、总结工作，传播经验。

（三）建立几个制度

甲、会议制度。县委应将常委会与执委会定期召开，好好分配时间。

乙、建立检查制度。上级检查下级，亲自去或调来；同级互相检查，下级检查上级。

丙、总结制度。应一个工作一个总结。大队部做了，但各同志自己作日记都未作总结，这样不能将自己提高一步。希望同志们今后更多的注意，不仅是上级要求下级，而是自己要求自己。

（根据信锡华同志传达整理）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 改善团体领导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

自从各救会改组抗联以来，各地团体在统一团结上，在深入工作上以及各部门关系上均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在大部分地区开展了普遍的民主民生运动，发动与组织了大部分群众，奠定了进一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基础。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各群众团体性质、任务与各方面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与恰当的解决，由于团体组织不健全与团体内部民主制度未确实建立，尚十分严重的妨害着群众运动的开展与妨害着群众团体进一步发展成为群众自己的自愿组织，形成一个伟大力量，因此抗联特作如下决定：

一、各救会是群众自己与自愿的组织，各团体在性质与任务上虽有些差异，但其组织都是独立的，其任务都是保卫群众切身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组织团结广大群众，教育与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政治水平，并领导群众参加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因此，团体应有自己的组织任务、工作方式与日常工作，与各部门的关系，必须明确解决。

政府是根据地的权力机关，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与领导全体人民抗战建国的机关，因此我们必须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协助战争动员工作，而不得违犯法令，不得代替政府捕人、审讯、征粮、罚款，形成二政府的错误。

政府除保护与帮助群众团体工作外，也不应干涉团体的内部事宜（在不违法的条件下）。

八路军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是根据地的有力支柱，因此团体应拥护与爱护军队，帮助军队作战，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不得代替军队护兵、催粮，形成军队支差机关；军队也不应干涉团体组织与工作。

但是与党、政、军的工作又必须密切配合，统一步调，达到团结一致、巩固根据地的目的。

二、广大的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我们大部分干部对农村和农民了解与联系不足，因此今后各级抗联应将调查研究农村具体情况与各阶层群众的要求及其变化当成经常工作之一，并以此作为发动、领导群众与决定政策、任务的主要根据——在了解中要有重点，要细致，要经常及时，并掌握其变化特点，向上级及时汇报。

这是团体领导作风的特点，是决定团体工作任务的主要依据，是考验团体领导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志，是克服团体领导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首要办法，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倾向都是目前各级团体领导上的主要缺点之一。

三、团体的活动，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活动，团体工作的好坏决定于村级工作的好坏。目前广大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大部分干部主要应切实的、经常的进行村级工作，这是各地进一步深入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步骤。因为脱离村级工作，即必然的脱离群众；不会作村级工作，即不能领导群众前进。在领导村级工作的方式上应注意：

- 1、在开始发动群众的时候，可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必须与强迫命令区别开）进行了解情况、宣传鼓动群众、发现积极分子的工作。当部分群众已初步形成组织时，就应通过这一组织领导此村工作，转为自下而上的方式，绝不可在形式上通过，实际上包办，继续以亲自出头为快。

- 2、在群众已经发动组织起来的村庄，一切问题由村会决定，一切服从村会决定。一方面在村会中积极发表我们的意见，求得大多数通过执行，一方面应协助村会解决村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绝不

可包办代替。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村庄，应尽一切可能培养村级组织能力，区抗联要经常指示检查工作。

3、一个区在大部分村庄群众已发动组织起来时，为培养提拔群众领袖，巩固群众，可由下而上的召集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区救各团体。目前干部包办群众斗争，代替村会组织现象十分严重，致使群众不能很好的发动与组织起来，使群众不能形成自觉的组织力量和地方干部无法提拔。区干部长期包办村会，群众情绪时高时低，因此区会如何领导村级工作，必须迅速改正〔此现象〕。

四、团体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改善领导的主要环节，因为过去未贯彻执行，成为过去产生各种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过去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民主现象，或主任代表制，少数操纵现象已使工作受到不少损失，今后除进一步加强干部与会员的民主教育，克服封建等级观念的残余外，必须树立集体领导与〔建立〕一定的制度，建立各级团体的日常工作。

1、一切问题必须由一定组织决定，如果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因此必须有定期的常委会，在委员不能全部出席时，县以上抗联必由3人以上，区会、村会必有过半数常委出席，才有权力决定比较大的问题。在村会中一切较大的问题（如新工作的决定，干部的选举、罢免等），必由村委会提交会员大会通过才可执行。

2、一经决定，每个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如保留意见时，可于下次会议提出重新讨论，不得故意违犯决议。上级决议下级必须执行，如有原则不同意见，须经上级团体允许后方能修改。

3、下级团体须定期和及时的总结工作，向上级团体汇报工作，并应不断的在书面或会议上正式提出对上级团体的批评，上级团体必须诚恳的处理，并经常检查、帮助下级工作，征求下级意见。目前村委会应定期向会员大会报告自己工作和随时总结斗争结果，以发动群众监督干部，防止新贵产生。

4、县干部调动必经总会批准，区委员和区各救主任调动，必经

分会批准，下级团体如有新的原则性的决定，必经上级团体允许后方可执行。

五、抗联是工、农、青、妇的统一权利组织，不是取消青救、妇救，使抗联变为农救。目前以农会为主，不是以农会统一各救会，故根据目前工作发展阶段，为开展青年、妇女工作，特决定：

1、首先应认识青年、妇女工作是充分发动群众与巩固农村统战的必须工作，过去认为开展农运与青年、妇女工作间是机械的两阶段，取消村青救已使工作受到损失，是应引起警惕的。

2、县以上抗联必须执行边区各教会关于改组抗联的决定，不得任意调动青年、妇女干部，或把青年、妇女工作推到青年、妇女部，或一直不管。

3、区级各救组织应是：

①群众开始发动，青、妇工作甚差的地区，区抗联可参考县以上抗联的组织性质和任务，执行自己〔的〕任务。

②大多数农民在部分村庄已发动起来，青、妇救已在少数以上树立工作时，本区抗联应指定适当数量的青、妇干部，以青、妇救面貌用力量进行青、妇工作。而区抗联应负责对青、妇工作的领导，并推动全体干部发动与组织青年、妇女。

③群众开始发〔动〕，多数农民已在大部分村庄发动起来，抗联的性质、组〔织〕、任务，应按各教会的改组抗联决定执行，以便于进一步深入青年、妇女工作。

④群众开始发动，过去青、妇工作尚有一部分基础的地区，区抗联性质、组织应按边区各教会决定执行。但抗联应统一讨论农、青、妇工作，统一使用力量，通过村会发动农民改进原有村会工作，以逐渐由下而上改进农民与青年、妇女的组织与工作。

六、改善以上领导是发动群众与转变整个领导的关键，县会以上的团体不转变，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其领导方式应注意：

1、在一区一县范围内，大堡垒未打开，群众情绪未起大的转化，干部经验缺乏，或新的任务布置时，应着重具体帮助一齐搞村

级工作。

①以分区、县区为单位均须有重点，不得平均或乱跑（如×分区已受到损失）。上级团体除传达决议、检查工作外，应以当地组织为主实现领导，并可参加同级委员会共同决定与推动工作，但应注意推动当地组织并多提供意见，培养当地组织的能力与威信。同时应及时将工作进度向当地或县抗联（如分会帮助区村时）汇报，不得包办一切，把什么都垄断起来。如××县工作，分会干部包办了，已使工作受到损失，应引起警惕。

②帮助工作必须有计划与具备三个目的：

甲、帮助下级具体实现上级决议。

乙、锻炼自己，培养干部与下级组织的领导能力。

丙、总结经验，推动全区工作。

2、工作局面已打开，干部经验较丰富时，主要应及时检查总结工作，及时指示其工作发展方向与具体办法，必要时具体帮助解决比较大的或新的困难，将各级正规领导制度与日常工作逐渐树立起来。

3、在领导单位多的地区，除抓紧重点外，应：

①及时将重点经验传达给其他地区，这不但是学习最好办法，也是一个重要领导方式。因此总会决定加强《工作研究》，各地干部都有向《工作研究》写稿件的义务。

②必须及时了解该地情况，抓紧时间研究指示该地工作。某些地区分区、县干部钻到村会中，对其他地区分、县会领导不管不问是不正确的。

③在重点打开后，于可能条件下，应以一定时间具体帮助其他单位，不得死守重点，形成孤立。

七、因根据地分割和游击性增加，特决定：

1、个别游击县经总会批准后，可提高其工作权力（在总方针下及时决定任务，调动干部，然后报告），但必须定期向上级团体报告工作，取得密切联系，不得放任不管。

2、分会可增添需要干部辅助工作。泰西分会在不违背总会规定方针下，可决定本地区工作任务与县干部调动，但事后必须报告总会。

八、各分区、县抗联，要根据此精神与各地具体情况，检查过去领导，有重点有中心的改善自己〔的〕领导。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对一九四四年边区青运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

一、根据边区群众运动的总任务，今年边区青年运动的任务是发动与组织广大青年。在全边区是以“发动青年”为主，在某些发动起来的地区，应及时进行巩固工作。各县区应根据当地工作情况确定自己的主要任务。

今年（秋收前）基本区的青年运动，发动青年的中心问题是展开民主斗争，巩固组织的中心问题，是开展生产运动，但切忌把中心孤立起来，脱离和其他工作的联系。因此，在发动青年与巩固组织时，应正确认识以下三点：

（一）青年的责任在学习，故教育青年是青救会的基本任务，是一个经常的工作。

（二）青年是热爱民主的，必须把民主精神贯串到青年日常斗争与日常生活中去，以提高青年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三）青年也热爱武装，应及时掌握青年的武装要求，开展青抗先工作。

总之，要把中心工作和其他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掌握青年的要求，把青年运动开展起来，深入下去。

二、发动与组织青年问题

去年7月已有详细指示，希重新加以研究，并参考《工作研究》2、3期上的两篇文章。在此只提出以下几点：

（一）过去半年来的青年工作，有了不少收获，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在此特别指出的，就是在开展青运中发生了严重的“阶段

论”观点，直至现在还在不少干部中存在着，致使农村抗战与青年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并影响到整个群众工作的开展和影响到农村的□□。这些痛苦的教训，应引起今后高度警惕。

(二) 在开始发动农民时，就应注意青年工作，发动农民青年参加斗争，在斗争中锻炼他们，并注意培养青年领袖，划分青年小组，设立青年委员，作为建立青救会的基础；到农民初步发动起来，就应建立青救的独立组织，及时建立区县青救会。

(三) 发动与组织青年，首先要掌握民主斗争的中心环节，争取青年的抗日自由，否则就很难或不能进行青年的武装、生产与学习。因此，对青年争取抗日自由的民主斗争，必须抓紧开展，打破家庭束缚，反对恶霸欺压，并争取参加社会活动，以提高青年在家庭中、社会上的地位。但同时应注意农村团结与家庭团结，并与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或很快的转入生产工作，以团结家庭及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

(四) 什么是青年发动起来的标准呢？

1、提高了青年的民族觉悟与民主认识，多数青年自觉的参加了斗争，相信了自己的力量。

2、初步改善了青年的政治经济生活，取得了抗日活动的自由，开始提高了青年的地位。

3、大多数青年，自动自愿的参加了青救会，会员能爱护自己的组织。

这几个条件和农民工作是分不开的，不能把它孤立去看，不够这些条件的村会，应该继续发动。

三、巩固青会的组织问题

青年在发动和组织起来以后，应及时的进入巩固阶段。

巩固青年组织的中心，是开展生产工作，其次是继续深入青年民主斗争，强调青年学习，加强青年教育与改进青救会的组织领导，以进一步满足青年要求，改善青年生活，使青救会组织更进一步为青年服务。关于生产工作以后详谈，在此只谈：

(一) 继续深入民主斗争

1、应随着青年工作的发展与青年民主要求的提高，继续深入民主斗争。在青年发动起来以后，已提高了民主认识，增强了办事能力，应进行青年参政的工作，参加村政权的选举，参加村代表会、村政委员会等，去关心与管理村里的事情；并展开广泛的社会活动，参加各种抗日工作，继续提高青年的地位；再随着整个工作及妇女工作的开展而提出青年婚姻自主问题，直到摧垮封建制度的下层基础——家长制度，求得青年的彻底解放。

2、把民主的精神贯串到一切工作中去。不论在学习、生产中、武装斗争中以及青年日常生活中，都要随时注意青年的民主要求，解除青年所受的压迫与苦闷，以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同时在青救领导上也要高度的发扬民主作风。

(二) 强调青年学习，加强青年教育

1、教育内容主要有三：

一是民族民主教育。在民族教育上是坚定民族立场，鼓舞胜利信心；在民主教育上，是从其日常斗争与生活中进行反封建的教育，并在青年思想上为战后作准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行为，深入新民主主义教育，使在共产党的光明旗帜下，走向新的中国。

二是进行生产教育，提高生产热忱和互助精神。

三是进行组织教育，提高青年的组织观念。至于文化教育，亦应经常进行。

2、冬学结束后，应建立青年夜校或青年识字班，继续青年学习，并注意文化娱乐工作，加强对农村剧团的领导。

(三) 改进组织领导

1、在领导上要克服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领导，高度发扬民主作风，深入了解情况，具体帮助村干部，培养村委会的独立工作能力。

2、健全村的民主生活，建立民主制度，选举真正为青年所爱戴的领袖到村委会去，并开展自我批评，以此为团结进步的武器。

3、会员小组的划分，基本上应根据青年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

亦即斗争任务的需要。因此，在发动青年时，是进行民主斗争，加强青年团结，必要〔须〕将贫富青年混合划组；而到青年发动起来，一般的解决了青年团结问题后，就应做必要的变动。在生产工作中，应以劳动互助作为划组的根据，使组织形式能适合于斗争任务的需要。

四、今年上半年的三件工作

（一）扩军工作

扩军是边区上半年的中心工作，扩军对象主要是青年，这就更加重了青救会的任务。各级青救应坚决保证当地扩军工作计划的完成，并加强与党政军各教的配合。

如胜利完成扩军工作，必须继续深入拥军运动、提高抗属地位，造成青年参军最光荣的热潮；再具体确定对象，找其知心的青年伙伴去鼓动，解决其思想上的疑难，提高其政治认识，使其了解青年参军是最光荣、最模范的；并配合政府及各教解决其家庭一切困难。

在扩军工作中，要反对一般化与老一套，创造与运用青年化的工作方式。不仅在鼓动工作时要说出青年心里的话，在欢送时，也应广泛运用青年所喜欢的方式，如召开盛大的欢送会，锣鼓喧天的欢送他，让他骑马或坐轿，排着队喊着口号，一直送他到新兵招待所。在这盛大的欢送中，提高青年参军的情绪，深入拥军运动，并可杜绝参军后逃亡的道路。

（二）生产工作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区，应大量的开展生产运动。青救会应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并在生产运动中巩固青救组织。

青救领导青年生产，有下列几个内容：

- 1、普遍号召深耕勤锄多上粪，提高青年的生产热忱，争取青年在生产中的模范，并号召青年儿童拾粪、种树、养鸡及进行家庭副业，以求在青年的积极生产中，提高青年的地位。

- 2、在群众发动较好的地区，配合农教会及合作社共同组织劳动互助（以家为单位），组织“合伙合俱”；并可有重点的进行安

家计划。

3、号召青年积极参加合作社，并可在不妨碍家庭生产的条件下，组织青年的集体生产组织（如范县张庄的□红薯芽子组）。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应创造劳动英雄（青年与农民一样），以提高群众生产情绪。劳动英雄的条件，主要应是群众公认的劳动模范，具体说应包括以下几点：（1）是模范公民；（2）是群众生产劳动中的模范；（3）是生产运动的推动者与组织者。

劳动英雄的创造，应□□□的进行。抓紧劳动模范而给以教育帮助与鼓励，提高其生产的计划性与积极性，提高其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提高其为劳动英雄。企图开始就发现吴满有那样的劳动英雄，而忽视培养创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应在长期生产中创造之。同时企图创造样样皆好的劳动英雄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应分别其特长创造之，如农业劳动英雄，制盐劳动英雄等。

至于儿童不必叫什么劳动英雄，可创造儿童劳动模范，如拾柴、拾粪、养鸡、种树等儿童模范。并注意儿童劳动模范的条件不要忘记学习了。

最后特别提出，要在生产工作中，加强全体青年干部的劳动观念。因此应亲自动手，帮助群众生产及进行机关生产，在生产中改造自己，丰富自己的生产斗争知识。

（三）庆祝“五四”中国青年节

在青年已发动的地区，应号召广大青年庆祝“五四”青年节，以三、四两个月青年参军及生产工作的成绩，及武装对敌和学习等实际活动，来迎接“五四”青年节（另有指示）。以上三大工作，应正确掌握其彼此间的联系，使其密切结合起来，在进行以上工作中，求得青救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五、抗先工作与儿童工作

（一）青抗先工作

过去一年对抗先工作放弃领导，半年以来又是严重忽视，致使青抗先工作未得到应有发展，使青年运动受到不少损失。今提出以

下几点意见：

1、大量发展青抗先——在保卫生产的口号下，动员与组织积极青年，建立青抗先，开展对敌斗争及保卫群众资财。

2、基本区的抗先会形式，今后除在反“扫荡”的实际战斗中锻炼外，平时有两大工作：一是保卫生产，维持秩序；一是加强军事教育，提高青年尚武精神，锻炼青年身体，如下操、瞄准、投弹演习、野外演习与夜间演习等。否则，平时没有锻炼，战时必恐慌发抖，质量永远不会提高。但应注意，军事活动不要妨碍生产。

3、各级青救会要加强对抗先工作研究与领导，并加强与同级武委会的配合。

（二）儿童工作

半年来的儿童工作虽有了某些开展，但在青救领导上仍是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使其自流发展，对儿童斗争中的“左”倾现象和儿童团的工作内容漠不关心，致使儿童一时发动起来而停滞不前，失去了方向。今提以下意见：

1、发动农民的开始，就应注意以文化娱乐活动去组织儿童。发动儿童也应该注意进行争取抗日自由的民主斗争，并与学习、生产密切结合着进行。

2、儿童的任务是学习，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更是教育儿童，培养新社会的主人。我们应掌握这一最基本的中心工作。在儿童发动起来以后，要大力动员儿童入学，配合政府解决儿童的学习困难；对实在不能入学的儿童，可实行半日制、间日制的上学和进行组织教育；并普遍运用文化娱乐的方式进行儿童教育，创造儿童学习模范。

3、对校外儿童应鼓励他们参加生产，辅助家庭劳动；创造儿童劳动模范，也不应忽视儿童学习。

4、儿童团的组织：村为连，几个连为一营，一区为一团，团部受区会的领导。

六、欲完成以上任务，必须转变领导，改造干部

（一）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与英雄主义，加强干部的群众

观念，深入青年群众，成为其中的一员。把自己的感情和青年群众的感情结合起来，群众哭了自己也流泪，群众笑了自己也欢笑，和群众在一块斗争与工作。只有向群众学习，才能教育群众。

（二）克服主观主义的领导，了解下层情况，深入了解阶级关系与青年生活，从青年群众的政治经验与切身要求出发，去实现上级所给的任务，把两者具体结合起来。

（三）青年工作越开展，工作内容越复杂，如武装、生产、学习、文化娱乐等各种工作，我们都应去领导，因此必须加强自己的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此外，随着工作的开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大批提拔与培养干部，就成了边区青运的重要任务。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 团体领导关系与组织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

关于各级抗联性质与各教会的关系，已讨论决定，并由边区各救总会公布。关于今后各级党委对群众团体的组织领导关系，区党委决定如下：

1、区党委设青年运动委员会（简称青委）与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在党委领导下，专门研究边区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总结边区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经验。在目前，地委以下都不设青委与妇委。

2、为了专门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研究与决定群众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某些重大原则问题，在县以上各级党委下设民众运动委员会（简称民委会）。民委会可由同级各教会、合作社主要党员干部组织之。同级政府党团负责同志，必要时亦可参加。人数由5人到11人。民委会书记，由党委委员（一般是民运部长）兼任。

3、在抗联未改变性质（由集中的权力机关改变成配合机关），即工农青妇各教会未恢复独立组织时，抗联设党团；但在已经改变抗联性质与恢复各教会独立组织时，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充分发挥各教会的积极性及适应各教会的特殊性，取消抗联党团。县会以上的各教会，因驻会委员不多，各教会党团会常不够法定人数（可吸收各救委员参加党团，一切日常工作可由党团书记与党委民运部负责人商讨决定）。各教会召开执行委员会、干部扩大会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区党委出版的《党的工作》第60期。

与代表大会时，则召开党团会，保证党委决议的彻底执行。

4、群众团体的支部，各教会共同组织一个。

5、各级党委要严格纠正过去对群众团体的包办代替，一切对群众团体的决议，要经过群众团体的党团去执行。对于上级群众团体的决议，下级党委要无条件的保证执行；但上级群众团体之指示，未能完全适合于本地具体情况，下级党委必须在不违反上级群众团体决议原则下，加强对同级群众团体的领导，使上级决议具体化。对群众团体干部的调动，一定要经过群众团体系统去执行。总之，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不要包办群众团体的日常行政；同时群众团体内的党员及党团，要无条件的执行同级党的决议，一切关于工作的重要决定，一定经过党委的核准，方能发出，不得同党闹独立性。

在二地委（原冀鲁豫） 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 问题的发言*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黄 敬

区党委在发动群众中的个别指导是没有的，因此我这些意见不见得靠得住。我在最近看见几个村的工作以后，心里很着急。我的意见没有多少根据，没有经过区党委讨论，只供大家去研究讨论。

过去最大的弱点是下面的创造没有很好吸收，而且几乎没有很好注意，都是下面你错了，错了！新贵一点好处都没有。下面都错了，一切是你自己对。你的对从哪里来的？从书上看来的，或者是从脑袋中来。拿什么来批评新贵呢？政治资本又多了，好像高干会的官僚主义的一套都能拿来，但怎样爱护群众的创造是很差的。大家都喊从群众中来，而从群众中来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仅提出这个问题找出这个方向来向下面学习。今天向群众学习也很模糊，群众是抽象的，群众摸不着。谁是我们的群众呢？县委对地委来说是群众，但我们现在到处说群众不对，现在不敢说群众落后了，于是到处说新贵落后。拿我自己来说，向下级学习这点就很差。

就两个问题说，我们对下面积极东西看的很少，消极的东西看到的很多。我们对自己积极的東西看到很多，消极东西看到很少，

*本文系记录稿，未经修改。后发表于中共冀鲁豫区党委1945年9月30日编印的《群运指示汇编》。

这就是整人不整己。我们是要拿工作中存在的好东西去克服工作中存在的坏东西，不然你有什么基础呢？今天下到下面去检查，是根据上面来的一套，所以一看就这也是毛病，那也是毛病，下面的这些毛病只是给我们的概念作注解，如“可不是！没有群众观念”，“可不是！这个违犯了领导方法的那个原则”，而不是从具体的分析得来的，所以中心区工作的转变就很迟缓。用原则来看，指出的缺点一般都对的，但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呢？就要打问号！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检查工作不是从实际分析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先有结论再找现象的。但是这影响到工作，使工作不能引起很大的转变。我提起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要警惕这点，这样下去，我们的工作就积重难返。检查工作在许多地方还是单纯自上而下，先有结论，把现象作为结论的注解。用任何结论来找现象是都能找到注解的，如张青营的支部那么坏，如果先有结论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了，我们也可以来找到事实去证明；但一找到证明后，主观的结论就更加定型，更加固定化了。事实上村里的问题不一定这样，结果我们就很容易脱离实际，群众希望是这个，我们偏要做那个。为什么和群众接不上火呢？我们认为要做的，并不是群众要做的，先有定见，换句话说，就是从主观出发。这是我们工作态度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走马看花，于是把更深入的亲自下手调查研究，就看得不重要了。我们好像也得到了新的东西，其实不然，还是没有什么转变——我感到这是我们本身的毛病（这个主要是我自己的一个反省）。我为什么没有亲自下手？就是觉着我的结论很对，自己感到很深刻，结果周密的进行调查研究，从头到尾的个别指导就忽略了。究竟这些工作在自己工作中占了多么重要呢？就是疑问。我口头上承认个别指导重要，实际上没有认识，认为自己这样跑一跑，也能解决许多问题。这个主要是我的自我反省。

拿这个时期发动群众来说，群众在今天确实得到很大利益了吗？你说群众得到一些吧，他也没有得到；你说地主削弱了吧，那又没有削弱；你说搞得很坏吧，他又有些成绩。群众工作很沉闷。

今天给了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就转不上去。生产吧，群众根本还不知道生产在哪里。区级干部、群众不凑他，他一来，群众就走，对他非常冷淡。〔在〕这种冷淡下，号召生产运动，怎样能动得起来呢？如果只说“这是中心，不然就要丧失时机”，但你是不是能搞起来？生产运动并不是把粮食种在地里就行，而是要能组织起来改变一个生产的样式，要使和过去的生产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能做到，能把生产改换一个样子，这才能成为中心。对这一点我是悲观的，能改换吗？肯定是不会的。生产是不是群众的要求呢？当然是。但群众是不是相信你换呢？这是怀疑的。再说群众是不是有信心进行集体生产呢？具体的在你这个农会长的领导下，群众说：“搭伙谁不知道好，但人心不齐怎么办？”“买卖好做，伙计难搭。”这就要说明，我们群运究竟是不是达到了这个阶段。今天农民的个体还是照样，你说让他组织起来，但他还没有看到组织的力量，因此生产是搞一些，但做中心，就要怀疑（中心是要能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力量）。我感到这就是发展生产的最大障碍。今天我们不是要农民生产不生产，而是怎样去生产——变革生产关系。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贫农没有土地，没有贴底粮，没有吃的，没有种子等问题，如把生产中心〔放在〕大量搞劳动集体化，这个口号是过早的。生产内容究竟是什么呢？10亩地种1亩棉花，那可有什么值得我们做为中心呢？而劳动集体化在全区大部地区要落空。因此，我认为生产今天不能做为中心，什么时候把障碍解除了，什么时候才能做为中心。但生产是不是要搞呢？能做地一些，还要尽量地做，并不是说生产就不要了。生产要做，但不是今天的中心。

群众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冷淡呢？一小部分跟地主，一小部分跟新贵，大部群众是观望的。这个两头小中间大又是脱了节的，没有联系的，有时还是对立的（这和领导方法决定上的三种人不同）。今天这三种人方向还不很明确，为什么这样呢？我感到今天对工作对新贵还要重新估计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我考虑有这么几个问题，群众运动不透彻。我感到在发动群众中有这样几个倾向（我自

己也有)：第一，多少有点怕得罪地主(特别是怕群众来得罪地主)，基本上我们有个怕群众的观点，怕群众做错了。事情还没有做呢，就说：“不要错呀！”好一点的是提醒一句，更差的是“你别搞了，让我来搞”。区干部把村干部踢在一边，村干部把群众踢在一边，上级怕下级错，一直支配下去就要代替斗争。为什么这种倾向在边区没有得到纠正呢？就是我们往往以为自己的动机好，而麻痹了自己隐蔽的黑暗的一面，以为自己是对党负责，光明正大。我感到这种态度从上到下，连区党委也都有的。所以群众问：“这事能办不能办？”我们干部回答说：“你等等，我问问区里去。”就是要群众等我问了以后你再动，群众没有感觉。粮食埋了不对，应该分吗？一提就是你等等我问问，下面的创造性就束缚住了。这个我们不要只认为是村里新贵的问题，新贵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成份并不比我们坏，新贵首先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来的，首先就是从我“人家没有做，我就怕人家错”〔中来的〕。

等人家用你的意见做或他自己做了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毛病，(谁又有不犯毛病的呢？)但我们又不是用鼓励的态度，或是走个样子给人看，给他蹂[揉]痛苦，耐心地帮助他，而是迎头一棒。做了以后，就是消极的批评。批评的根据是在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上，这样看起来群众的毛病当然是很大的。拿一个抽象的标准去看一个新生的力量，怕群众弄成什么结果呢？就是怕创造，结果就创造不起来。只看到消极的黑暗的一方面，没有看到积极的一方面，做错了，也只是消极的批评。这是自己在领导方法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新出来的东西，好像一个小孩拿成年人来比，他是很幼稚，有很多缺点；我们不要拿最高的标准去要求他。怕得罪地主，就是怕人家在策略上犯错误，但开始时有很高的策略水平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群众的缺点采取什么态度。另外，怕得罪地主，从政治观点本身来说是右的。地主卖地，我们为什么怕他卖地，为什么可怜他呢？他“黑地”粮交不起或是反贪污粮交不起，为什么可怜他呢？一方面怕群众不能掌握策略，所以领导

上抓的紧。但领导上并不是要自流，而是不要在人家还没有行动时就说错了，（这是唯心论的，不在行动中怎样能知道错和对呢？）总希望把群众教育好了再斗争，这就是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理论。这中间我们各人都有错误的认识，不过程度不同，这就出来好多论调，所谓教育万能。究竟你认为对的是不是真对呢？这还是个疑问。如查“黑地”，指示分果实的问题，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人家还没有把粮食到手，就怕他乱吃掉，只觉着自己比群众高明。为什么不把粮食交给群众以后再搞生产呢？这就是要叫群众跳一步。再说由会员团结非会员，这不是更高一步的想法，从希望出发，他没有走就叫他跑，你那个东西在抽象上是正确的，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就有了问题了。由这里来找就有很多问题了。当然，这个指示也不是说全都错了，但分果实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这里面我想大家也要好好反省一下，在研究过去群运中反省一下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什么问题，不能说都是新贵不好，你一拳我一脚，这样新贵就太倒霉了。怕群众犯错误，这是群运没有发动起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下级对上级说都是群众）。为什么发生这个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己不犯错误，再刻薄一点，就是自己比别人高明，轻视群众，自己是个先生态度，教育者的态度，不向人家学习的态度，只对上做学生，不对下做学生，归纳起来就是从抽象的原则来要求人家符合他的原则，用尽美尽善的原则去处理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再反省一下，我们提出意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的能做不能做，还是从一个抽象的标准？如果用抽象的标准来看，马克思和毛泽东也能找出一万个缺点。认识干部，认识下级，都是有一个抽象的框子，你如果找，是没有一条满意的；自己则是策略家、战略家，结果群众的要求，群众在斗争中的新创造就吸收不进来，真正群众的斗争，他还没有看到。□说“群众力量伟大”，但结果是群众不知道东西，一切是从我来。干部中的言行不一致是我们的很大弱点，一套套能讲，但不解决实际问题，名词知道越多就越难转变。现在发动群众为什么比抗战开始要难呢？原因之一是现在都有一套很多名词，

没有从前谦虚了，总感觉自己很高明。形式越多，就越障碍他接近新的事物，认为说来说去总脱不了“集中上来，坚持下去”。这说明今天教条主义的毒中得相当的深。因此自己自负，对下面的事情不注意，自满，只看到消极的，看不到积极的，或是只看到积极的，看不到消极的，来回在这两端动荡。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在这个问题下面，就产生了好多具体问题。

果实处理问题，大部没有处理好。这果实包含很多减租减息，保证不退佃也是果实，不取消零件也是果实，要地主不更换形式向农民进攻，就是取得果实。如何巩固果实？现在很多是丧失了或变相丧失了（应享受的没有了，有报酬的没有了），没有巩固住，又弄回来了，果实就难于巩固。同志们在这些地方比我更清楚。濮范观群众是不是起来斗争了呢？是起来斗争了，但是果实呢？却没有分。为什么要种树呢？是为了开花。假如果实都叫别人弄去了，不是白闹一场！让果实都烂掉了不分，结果再种树就没有兴趣了。胜利品没有很快的为群众得到，或者埋在地里，或者让地主拿回去，没有及时分配果实，没有巩固住果实，果实一般来说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是超功利主义的表现。问一问究竟群众为什么嗷嗷叫呢？他是因为肚子饿，他的斗争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而咱们的目的，好像和群众的目的一样。如有的干部问：“发动群众究竟是个手段呢，还是个目的呢？”在我们干部中像是个手段，还是要利用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达到我这个目的，不是为群众的。为什么粮食埋的那么久，而群众饿的锅盖揭不开，而我们还不着急呢？减租的果实，为什么不注意巩固呢？就由于我们不管群众的目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什么是巩固工作？就是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巩固群众的利益，如把这个内容抛掉，巩固工作就成了单纯的选举，而不巩固已得的果实。所以，去年提出巩固工作以后，群众工作反而消沉（当然区党委本身有毛病，对群运估计过高），这样巩固工作就成了形式主义的巩固。以后区党委提出检查工作，要去找果实究竟跑到谁手里。在执行检查工作中有好多毛病，区党委没有抓紧追，各

地没有强调果实究竟到谁手里，没有抓紧解决许多的悬案，特别是没有把检查工作成为群众性的检查，还是自上而下检查，没有成为一个行动。我们这种不在行动中检查，不在行动中巩固的倾向，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着。群众有毛病没有？是有的，但是一定要群众在行动中才能得到教育。俗话说：“打兔子是打跑不打卧。”群众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暴露他的弱点，才能得到教育，而领导者不从行动中也不能向群众学习，集中不上来，这样就要脱离实际斗争的内容。斗争达到一定目的，又没有去巩固果实，这样群众积极性焉能不消失呢？群众就要起不来，群众的创造性没有发扬，领导者本身就不能丰富自己。每开会时都是那一套，“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转变”，这些要求还是没有做到，别人也照例说“原则很对，实际做不到”，如此局面就要打不开。

第三，对地主的反攻没有给以应有的反击。地主的反攻从两面来的，为什么能反攻呢？地主利用了两个东西：一个由于群众积极性没有保持住，没有充分发扬起来，群众消沉下去，这是地主一个利用的东西；再就是利用了我们和群众的脱节，干部开始在孤立。地主就抓住这两个东西，在这两个基本〔东西〕上来反攻。当然地主任什么时候都想反攻，但能够反攻不能够反攻，却要有一定条件，所以今天对复辟问题要强调干部问题，强调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把反对复辟当做群众性的问题来解决。如果只是用强迫的压力，□□□也还是新贵的办法。行政的处罚也还是要的，但是行政的处罚，要建筑在群众的斗争基础上。所以今天对于运用政权力量要有正确认识，不从群众性的基础出发，就要成为官办，就要认为自己是站在群众之上。因此地主的反攻在某些地方得到成功，表现于他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群众都说他是好人。地主争取群众的工作，我们要很好的学习。如彦村铺的当权地主黄成太刮着大风送新战士，牺牲点暂时利益，来保存永久利益；如把自己的地一顷多当给穷人，救穷人，这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地主反攻一成功，群众的情绪就更加消沉。反攻胜利，群众消沉，干部孤立，就更加增加了地主的反攻

资本，于是我们的阵地一步步往后退，地主就能一步步向前进展。再就是我们对反攻的态度有很大的毛病，没有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自己，没有看到地主反攻在我们内部的原因，前期我们是单纯打击地主（压干部），后期知道了内因，但对自己的反省不深刻，感到这是下级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下级又有下级，但今天又不能让群众落后，结果村级干部就受到三面夹攻（上级、下级、地主）。新贵流□不利，所以，强调内部原因中还有宗派主义观点，舍己求人的态度，新贵因此就不能心服。检讨起来区党委是有毛病的，但下级也不能因此就把责任全推到上级。向来中国的传统对上则是“逆来顺受”，上面反新贵越厉害，新贵批评群众也越厉害。为什么新贵反不掉呢？“整人不整己”，结果人也整不好的。严格说来，新贵就是官僚主义倾向，这个优先权，不应先摆在村干头上，应先摆在自己头上。反新贵为什么落空呢？这就是原因之一。光叫下面说，〔不〕首先反省自己，而自己不脱裤子，光叫下级脱裤子，结果还是流于空谈了。反官僚主义倾向，都没有着重从自己反起，这样反常的现象就来了。我们越不进行自我批评，下面的错误也越难纠正，结果领导与群众就越难结合，成了干部的蛮干，少数人着急，多数人不着急，我们老以为自己着急是对党负责，总以为自己着急下级不着急，反过来，下级也觉着自己着急上级不着急，这样领导就和群众脱节，走到不正常的状态。于是，工作没做好，责任在人而不在己，下面的好处就越来越少，下面的坏处越看越多，而对自己的一套就越有信心，结果下面的创造就越看不到，越脱离实际。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我在高干会中对边区一年来的创造很少表扬，甚至把创造较多的也打下去了头。但高干会到下面传达后，领导方法上也没有引起一个转变。为什么原则对实际转变慢呢？就是化不了，就是从积极方面总结边区的经验少，鼓励少，由此领导上许多问题就停留在口头上（如反官僚主义，巩固工作，检查工作）。一要行动，就要表现干部的蛮干（如灤县东牛桥把着会场不准群众走，实行民主实际上是对民主的

讽刺)，不满足于空谈时就成为蛮干。下面好的东西上不来，领导机关的领导从什么出发呢？从一般出发，还没有到村，就有了斗争计划，还没有情况，就有了计划，还没有具体就有了抽象，这都是领导上的反常现象。领导机关的一般号召，往往没有足够的根据。此外，一般号召有了，怎样使他向个别转变呢？这个转变中，今天我们到村工作往往把群众看作一堆，只有抽象的群众，没有具体的群众，群众中的个别问题不给他解决。我们领导机关可以订出×月×日要同时实行减租，而减租究竟和每个个别怎样结合，就很少注意。所以，我们的斗争口号对群众来说往往是抽象的东西。我们忘了一个东西，我们农民是个体的生活者，养成了很大的自私自利性，也养成了其个别的很大特殊性，所以发动农民中，首先的一个问题，是照顾到私（他首先看到的个体），使他沾光。他参加农会是为了解决他的切身问题，越能满足他的切身利益，也就越能使他逐渐认识阶级，认识组织。如先要他公，是不可能的。提高农民觉悟也就是这样。农民不敢斗争，也是因为他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所以，一般与个别的结合，在农民运动中是更重要的。鄞北的合作社搞起来，就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利益中看到了公。我自己过去对这个问题了解不深刻，满足于抽象的解决问题。

总起来说，发动群众的毛病，就在发动群众又看不见群众（看的不大真，没有真正看到群众），总起来说，就是群众观念的问题。问题也就要从这里解决，不要怕群众，只有群众动起来，才能向群众学习，不然教条是打不破的，真正群众的发展趋势是看不到的。

今后意见：

〔第一，〕我有这样的提议，目前一般不以生产为中心（并不是不做生产工作），今天的生产〔中心〕问题还是民主民生工作问题，主要还是解决悬念，生产工作才能做好。贫农的生产，先要处理果实、贷款，如不把领导和群众关系弄好，就不能好好的分配。我的意见暂不以生产为中心，继续作民主民生工作，而在这个期间，要附带解决生产问题。村中究竟怎样做，我们今天还不肯定，这是要看村中

今天障碍生产的是什么？解决了这个障碍，继续来弄生产。根据中心区情形，今天生产的障碍没有全除去。生产的障碍，一个是农民的封建束缚，再就是群众政治上对集体还没有自信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在民主民生工作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再有即是生产中的准备工作，改变农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即是组织起来的精神。我们不能在前一个没有解决的时候就跳到后一个去，这是跳不过去的。怎样做？一句话，是从实际出发。今天中心区一般情况，群众处在消沉状况，村干部比较孤立，生产工作做为中心是搞不起来的（这是根据最近以来的几个汇报而来的，究竟在每个具体县中怎样办，还须看具体情况）。去年年景不十分严重的地方，要搞生产就要搞集体化，但我们到村中去还要看村中的实际情况，不要先有定见，具体的县区村要从该地的具体情况来定。

第二，要强调个别指导（从区党委起到下面各级），但我们不要只看“指导”二字有兴趣，要知道个别指导也就是向个别学习。我提议区党委专搞一个县，这问题回到区党委时还得好好研究；地委本身也应这样；县本身也要集中力量搞一个区。我们上下级要来一个竞赛，看是地委搞的好，县委搞的好，还是区党委搞的好。个别指导先由区党委自己作起，学习则要向下级学习，下个大决心来突击一点，创造经验，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始终有恃无恐，说话总是非常圆满而秩序，下级的好处就看不到。只有到群众里面去，才会对自己有个真正估量。这个问题要提起我们的注意，边区全党要认真执行领导方法的决定。

第三，改变我们的观念，要走着瞧，不要人家没有行动就说人家不行，就是要在行动中来究竟是谁对。不要怕群众犯错误。当然我们也不要故意去犯错误。群众只要动起来，不要怕他而限制他的行动，究竟谁错还是值得考虑。这个观点在我们干部中应很好树立。

第四，克服干部中的片面索要观点。这种观点，就是从愿望出发，减租中也有这样，要群众你干这，你干那……这就是单纯自上而下的方式，是片面索要的具体表现。这样一级级脱离下去，一级

级的片面索要。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这就是不发扬群众的好东西，倒过来说我们给群众的东西，就看做是恩赐工作方式，就必然是包办，如意的人就很少，对群众就是利用的观点。所以减租减息〔中〕当我们能给群众时，工作还能搞起来，而现在地主把果实要了回去，恩赐也赐不彻底，于是村中发生两种倾向，一是群众没有得到东西，于是他看到的就是失去的东西，党员就要被迫作模范，于是一层层的强迫群众就出来了。党员中一种是硬抓群众当模范，再一种就是鞭打快牛，谁积极谁倒霉。这两种党员都是难能可贵的好党员，如我们硬说他是新贵，也是难忍的，问题在我们自己还有问题。但这种党员还是很少的，农村中的有些党员，就把这套原封不动的向群众索要，他自己不作模范。因为我们领导上脱离了群众生活向前发展趋势，农村中的党员也脱离了群众生活的向前发展趋势，群众还可以照他原来的式样生活，但党员不行，他有党的纪律在管着他，就鞭打快牛，党员赔不起，抗日抗穷了。党员又不能照群众的生活式样生活下去，也不能照上级的式样，于是发生了他的两面性，形式上是你的式样，暗地里搞鬼，于是贪污等问题都来了，这又是产生新贵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片面的索要观点，脱离了群众的要求。

村中的积极分子出来了这三种，一种是撑劲不沾光，一种是消沉“落后”，再一种就是撑劲又沾光。新贵有什么可恨呢？他又不是地主，又不是富农，也不是奸细，他还是基本群众，因此村级干部就相当为了难。照群众式样生活呢，是家庭观念；照我们来办呢，他又顾不了家。因此对新贵现在还不是惩办打击的问题，而是如何检讨自己，加强帮助他们，单纯从愿望出发，动机不会好的。这个一般不是从具体中来的，因此也就不能回到具体中去。

什么叫做积极分子，要搞清楚。〔对〕积极分子是不能把他和群众脱离来看。他们积极，他是群众中最先进的，又是最能和群众联系的；积极分子，比谁都干在头里是对的，但还要紧紧的联系群众。积极分子，他比谁更能，带领群众上来看，这不只看愿望，还要看效果。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 减租增佃几个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各专员、县长、办事处主任：

在边区租佃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现象和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所以经过减租增佃后，各地不断发现地主非法辞退佃户事件，使佃户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其次，在租佃关系中（特别是小种地）还存在着繁杂额外剥削，如打水、扫院子、走亲戚、泥房子、喂牲口、出粪、锄〔耪〕草等，使佃户担负许多无偿劳动。第三，减租增佃后，地主强制佃户出差，增加无偿劳动。第四，有些地主为了反对增佃，把带有奖励生产，提高佃户生产积极性的老规矩取消。最后，在副产物的批〔劈〕头上，小种地多未按规定增佃。根据以上情形，为进一步贯彻减租增佃法令，切实解决租佃关系中的现存问题，特作如下之决定：

甲、关于非法退佃问题的处理，确定的原则：

一、因减租增佃地主解退佃户，不合修正土地使用暂行条例之规定者，应一律复佃；A、已另找新佃户者，地主并应以同样之土地出租于新佃户；如事实不能时，应负责赔偿新佃户一季以上两年以下之损失。B、另雇雇工耕种者，地主对于雇工不能辞退，如事实不能雇工时，应给雇工一部或全部之工资。

二、地主出卖或典当土地，未履行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第20条之规定手续，地主应负责赔偿佃户一年以下之损失。

三、地主出卖或典当租期已满之土地，买户仍须出租或雇工经营者，原佃户有佃种或被雇用之优先权。

四、以破坏租佃关系为主要目的所为之一切行为（如出卖典当收回的种等），均得依佃户之请求宣布其无效并延续其租佃关系。

五、在过去减租增佃后，地主辞退佃户，当时虽经政府处理，但不合于修正土地使用暂行条例之规定者，得根据地主佃户任何一方之请求重新处理。

乙、根据边区情况，小种地（伴种地）在柴草分配上尚未实行增佃，一般习惯是分柴不分草，草随牲口走，而柴的范围又限定太窄，逐年加深，极不合理。为此规定：

一、柴的范围（即什么是柴）除依习惯之规定外，应将豆秸麦秸两种按柴计算（有的地区按习惯计算柴），过去某些地区只将高粱秸、玉黍秸算柴是不适当的。

二、草归喂牲口的一方（习惯分草者从其习惯），柴按正产物分配比例分配。

丙、在种佃关系中（特别小种地）尚存很多额外剥削，为了彻底取消并照顾土地生产，应该是：

一、佃户除参加所佃土地生产外，其他地主家庭的一切零活，如打水、喂牲口、扫院子、泥房、拉土垫庄子、走亲戚、锄〔耪〕草、出粪等，均为额外剥削，应当取消。但为照顾地主劳动力之缺乏，对于有关生产之出粪、锄〔耪〕草、喂牲口等活计，经双方约定佃户可以担负一部或全部，但须给佃户适当之报酬（如管饭、给工资等）。

二、禁止地主无代价着佃户替支差，但如管饭、给工资雇用佃户替支差者，政府不加干涉。

三、佃户因生产向地主所借口粮的高利贷剥削，应严加禁止，违则依法处理。

丁、为了增加生产，改善地主佃户关系，各地原有的带有奖励生产、支持佃户生产力的老规矩不能取消，如：

一、垫底粮不得取消，地主无理取消者应即恢复，实行补发垫底粮。

二、开锄粮（或称借口粮、把锄粮）不得取消，仍须按旧办法办理。

三、开锄饭、钉镰钱、四季饭、打平和、过中秋节等习惯均应保持，以利生产。

戊、本决定适用冀鲁豫边区。

冀鲁豫行署主任	晁哲甫
副主任	徐达本
	贾心斋
冀南行署主任	孟夫唐
副主任	王任重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 赎地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

二、三、四、五、六、七各专署、县政府：

冀南由于敌人残酷的焚杀掠夺及天灾的袭击，造成民国32年以来的空前严重灾荒，且延续已有2年之久，广大人民〔为〕生活维持（特别是贫苦农民），因而典卖土地求生者比比皆是，但土地典卖之价格为数寥寥（有的几个窝窝即换地一亩）。此种土地变动，显非一种正常现象。兹为保护贫苦农民不失掉土地，能渡过灾荒生活下去，在照顾农民统战原则下，根据冀南当前具体情形，特决定此种土地买卖与典当之回赎原则如次：

一、本决定适用于民国32年以后灾区灾期土地之买卖及典当，以前之土地变动情形不得援用。

二、同等阶层富力相等买卖之土地得改为典当关系。

三、地主富农买中贫农之土地，准由卖主按原价赎回，如买主尚未耕种一季者，由卖主按卖价二分行息归还买主。

四、中贫农买地主富农之土地不得赎回，如买主生活确难维持者，按双方富力情形进行调解。

五、中农买贫农之土地，准贫农赎回一半，一半改为当契。

六、贫农买中农之土地，准中农赎回一半，或一半改为当契。

七、依本决定改为典当关系或原系典当关系者，典当均以2年为限，期满即准出典人以原典价赎回；低于2年者按原约处理。贫农买中农之土地改为当契者，典期得改为3年至5年。

八、非灾区人民到灾区购买之土地，如买主系中贫农且亲自动

手耕种者，准按五、六、七各条之规定处理；如买主系地主或大商人，应准卖主按原价赎回。

九、出卖或出典之土地为青苗地者（麦田或秋苗），收割与负担归卖主或出典人，买主或承典人分受土地收获正产物不得超过20%。赎回土地如系青苗地时，收割及负担均归买主或承典人，卖主或出典人分受土地收获正产物20%。收割时参加劳动者按工资给价或酌量多分。

十、村级干部以贪污得款所买之土地，除犯罪行为依法处理外，该项土地应予没收。如卖主为中贫农时，准以原价赎回，地价归公（村款归村处理）。

十一、汉奸、奸商以不正当所得所买或典之土地，一律准卖主随时按原价赎回。如系以强迫或威胁等方式构成之买卖或典当关系，除土地准予赎回外，卖主所受损失并应由买主或承典人负责赔偿。

十二、土地回赎应由原卖主或出典人亲自经手。卖主或出典人死亡或□出无音信者，除直系亲属外，他人不得代赎。

十三、卖主或出典人承典人双方同意愿将卖地或典地改为正常买卖或典当关系者，准按目前市价找补，重立新约。

十四、贫苦农民赎地无钱时，在买主同意下改为借贷关系，三分行息或改为典当关系。此项典地出典人有承租权。

各专县应根据地区不同情形，划定灾区范围，灾荒期间，并具体讨论布置，深入到一村一户，土地赎回应根据地区性质（基本区、工作薄弱区、接敌区）以不同方式执行之。如个别区域仍未摆脱严重灾荒（如水灾蝗灾），经专署讨论得缓期执行。本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以调解方式进行工作，如调解不成立时，由政府负责处理（但须很好征求村干及群众意见）。在执行中所发现的问题及获得经验，专署负责收集报告行署。

冀鲁豫行署主任 晁哲甫

副主任 徐达本

冀南行署主任 贾心斋
 任 孟夫唐
 副主任 王任重

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

万里

八分区自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提出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过程，对包办代替的领导有了些克服。因此，各县群众运动有较普遍深入的开展；但群众观念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贯彻还是不够的。其主要表现在：

一、我们过去是站在群众之上来发动群众的，对群众的领导关系，多是站在指挥的地位上，实行片面的说服，群众是被作为一个“阿斗”来摆布的，领导者从群众之中来集中意见，服从群众多数来决定问题，是不大经常或不能这样去做的，因此就形成严重的包办代替。自从提出大胆放手强调相信群众后，由于过去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所纠缠，一般同志是不容易接受和转换的。以后由于某几个区或村放开手后，群众的确也能自己决定问题，解决问题，自觉的热烈斗争，完善的处理了斗争果实，因此大家才以为放手是可以的。但由于长期包办代替，对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开始是“放手”不“放心”，对群众的行动，如履薄冰似的小心的注视着，稍有与自己所思所想不合者，即来“说服”群众，“启发”群众，仍叫群众回到自己所想的圈子里。这里所谓“说服”与“启发”，只是我“说”你“服”，我“启”你“发”，群众的意见是不能启发与说服我们的。因此就只有群众“服”与“发”，如不服不发，则出而包办，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限

*本文后发表于《冀鲁豫日报》第392期（1945年5月12日）第4版。

制。

提倡大胆放手的压力，使不信赖群众的行动和言论的确吃不开。有些地区真的放开了手，群众真的自己运动起来，并干的轰轰烈烈，简直是翻天覆地，的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文雅”与“有秩序”。这里就有部分干部（党政军民都有）觉得很看不顺眼，他们看惯了旧秩序，对于在急烈的变化着、一向很听说的群众，这时也不如自己的意了，就对群众怀着仇视与气愤，对曾经压榨过群众、罪恶深重的被斗争的顽固分子抱着怜悯，于是大叫“过左”、“过火”、“不要统战”，出来对群众打“拦头鞭”，加以批评纠正，结果泼了冷水，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

二、有的把大胆放手解为重罚大干，以为大胆放手是对党的政策大胆放手，以为向群众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即为包办代替，产生了领导思想上的“左”，公开宣布，今天的政策与法令有不适合群众要求的地方，只要群众想干啥就干啥，政策与法令是不能限制的，主张“头大帽子长”，把政策法规与群众对立起来，大有认为过去群众发动的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政策与法令限制了似的。因此在斗争中，个别村庄或个别地区发生不论错误罪恶大小，把开明分子与顽固分子分不清，把守法地主与一贯违法的地主分不清，以致对斗争对象的处理发现不适当之处。同时在斗争顽固分子时，让群众把自己的私仇公愤结合起来，进行说理与报复，提高群众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行动，彻底从政治上打垮他，也是不够的；个别县份，又严重的发展到相当普遍的斗争中农，重罚中农，使中农恐慌，脱离了我们。

相反的还有少数干部，则产生另一种唯心观点，把法治与民治对立起来，教条的为法令服务，不顾及目前群众情况与要求，不了解群众执行法令当中的某些毛病基本上与顽固分子故意犯法是不同的，不了解群众起来后有些过火是必然的，因此执法者应当为群众服务，某几个不适合群众大多数要求的法令，应加以修改。他们不严重检讨自己的立场与群众观念，而抱怨群众与抗联，给犯法者以

口实，以抵抗群众的斗争。

三、有的人在大胆放手后，以为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来领导群众（这是对的），于是便跑到群众的外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只站在群众以外来观看（实际看不到真东西）。如一个干部说：“过去我们是演戏的，是导演的（？），今天是看戏的了。”正是因为是看戏的，所以有的跟着斗争，各村跑来跑去，就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教育组织工作，提高群众。在台子外边看到群众中一些弱点，不能纠正，心中光发急，背后检讨，群众则说我们为“事后诸葛亮”。纠正过急，则泼冷水；不吧，看不下去；教育吧，又因为当时群众内部的情况、思想的变化、觉悟的程度不了解，只能拿几个干巴巴的原则来说，与具体事物距离太远，群众当然不能自觉的接受。因此就觉着“不包办即自流，不自流即包办”，整天在苦恼着。

这些现象，都是没有把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深刻的认识，这是由于领导上及时进行思想教育不够，否定了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但新的领导方法没有建立起来和贯彻下去。关于今后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有些县已创造了不少的经验，弱点是在不断的克服着，因此有些县里发动的群众确较深刻、广泛，主要的经验是：

（一）从群众之上深入到群众之中，是贯彻大胆放手领导方法的中心关键。因为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中心意思就是从实际出发，通过群众路线，也即是发扬民主，服从多数的问题。但哪里是“实际”呢？群众多数人的要求与意见即是“实际”，就是要出发的地方。难处就在于我们不了解群众多数的意见是什么，所以常常犯主观主义。为什么不了解？就是因为我们在群众之上，群众不给讲，或者我们不愿听，站在群众之外听不到。我们愿意了解群众多数的意见，要真正的站在群众之中。这里所谓真正站在群众之中，不但在形式上（这也必要），而且在心里在意识上觉得与群众是完全平等的，不是群众的“上司”、“领导人”、“一切比他们强”，而是群众的忠实服务者，是受群众多数意见支配的。有了这

样的群众的立场，我们才能真正站在群众之中，群众也就拿我们当他们中间的一个，群众才会对我们“不外气”，“自己人有啥说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随时跟群众学习，了解情况，知道大多数人的心情、要求、思想，这才能从群众出发，有的放矢，领导的意见才是集中的群众意见，坚持下去才有充分的群众基础。

(二)充分的群众酝酿，坚决的服从多数，是我们在群众之中最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才能解决不自流即包办的困难。酝酿就是群众的民主启发，也即是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变化与结合过程。没有充分的酝酿，中间分子以下的多数群众的要求不会明显，因历史与现在的种种原因，群众开始常常不能吐心腹话。假若我们深入他们之中，耐心的启发与诚恳的关心，再经过积极分子的酝酿，是可以大部分酝酿起来的。没有充分的酝酿，则统一自觉的共同行动不能形成，那就必然形成干部或少数积极分子的包办。大胆放手后的领导，如何促成这种过程，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过程即是我们集中群众意见，我们思想与群众思想结合的过程。这种过程走的对，作的完善，就能克服我们的主观主义。

这种群众的酝酿，开始主要是交谈，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与群众，群众与群众，“商量商量”、“喊喳喳”、“闲谈”、“拉背场”，然后才是我们所习惯的小组会与群众大会。

我们的领导即在群众的酝酿中实现，在群众的酝酿中不断的了解情况，受群众的教育，群众启发我们，我们也不不断的集中群众的意见，启发群众再来酝酿，如此不断反复，一步一步提高，群众的决定，即是我们的决定，也即是民主集中的结果。

但有时我们的意见与群众的意见发生矛盾，还有可能是我们的意见正确，多数群众的意见不正确。(多数人意见正确是一般的，经常的，错是个别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是无条件的服从多数群众的意见，大胆的跟群众一块走，和群众一块做，把我们的意见还不断的在群众行动中启发，耐心的等待着群众的觉悟。如果是我们的意见不正确，就更应服从群众，在行动中来纠正我们的脑

袋。我们不应当以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是上级，因此自己的话是“圣旨”，认为服从群众意见就是“丢人”、“失掉威信”。我们除了真理与群众外，是没有不可丢掉的，在一向有统治群众思想的人看来，才会怕“失面子”与“损害威信”哩！

（三）在过去总结、检讨、纠正毛病、发扬优点与传达布置工作时，多是领导者站上面来对下层“训示”的，这种办法也是包办代替、不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事实证明大胆放手后，群众自己做的比上面推下去的更好些。他们在每次行动后，自己检讨哪里办对啦，就表扬，哪里办错啦，就批评，群众自己的表扬是正确的，自己的批评也是中肯的有分寸的。这种自己表扬与批评的办法，比我们好的地方是具体，实事求是，群众很容易学的具体，改得具体。公认的好与坏，发扬与改正起来就带有更大的自觉性与积极性。群众公认的积极分子，就是群众领袖。

有些区里斗争中农与重罚较严重时，采取了各村干部联席会，各村报告了各村情况，由大家评议谁的好，谁的坏，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经他们自己热烈的讨论和检讨后，在各村的一些弱点就由群众自己纠正了，好的东西，群众也会自动的模仿起来，这样比我们去纠正人家力量大多了。我们常常总结一大堆缺点和成绩、经验和教训，在群众未做之前即防止“这”防止“那”，给群众划成一个圈子，群众执行起来也很不带劲。这主要是在于没有通过群众自己的思想变化、认识过程，与具体的榜样不结合，群众是奉命执行，不是自觉的执行。

最近县委与地委兴开了一种会议形式——座谈会。这种会议形式是一种民主集中的好方式。会议多是由下边的好坏典型的汇报开始，然后座谈，交流经验，并提出问题大家讨论，大家决定。我们提倡座谈中的争论批评，许多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常常是解决的较深刻具体，会议的总结，仅把大家已决定的东西整理一下就完了。根据最近一年来的经验，这种领导方式是较好的。这种方式的好处是：1、民主，大家有言就发，无顾虑（因为没有总结在那里限

制着大家)。2、表扬与批评联系密切,而且是到会的大多数的批评与表扬,容易公认优点与纠正弱点。如一个同志在未开会前几个个别谈话,均不以为自己的决定有毛病,而在座谈会上,经大家发言后,就深刻认识了自己的毛病,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3、经验交流具体深刻。4、思想便于统一。其弱点是:1、开会时间长;2、掌握不好,容易失掉中心。

(四)大胆放手后,还要及时建立群众自己的领导。这个问题包括三个问题:1、建立支部核心领导,特别以佃雇贫农成份为主的建立支部。2、树立佃雇的独立运动,形成农民运动的骨干。3、培养群众领袖,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这三个问题是相结合的,都是不可少的。在此,前二者不谈,只谈第三个问题。

过去对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是长期被忽视了,老是由上而下的委派各级领导机关,也是一种严重的包办代替。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就不能真正形成群众自己的运动,群众就不能很快很好的发动起来。不从下而上的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就不能很好的集中群众的意见,我们的领导意见也不能很好的变成群众的意见并很好的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也不能很好的变成群众自觉的政策。由下而上的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经过群众自己的组织去掌握与控制自己,群众运动才能表现高度的纪律性,能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发现偏向和错误,也能及时纠正,纠正又不致于形成泼冷水,打“拦头鞭”。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与群众究竟有些隔阂,所以不能很好的做到这点。在各县工作中,群众运动起来,常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矛盾,在某些问题的决定与处理上,也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差异。解决这些矛盾与统一这些差异,经过自下而上建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对群众的困难与要求体贴不够,就不能很好的负起这种责任。这些问题,各县的特别是濮县的经验,告诉我们很清楚。群众领袖是群众行动与群众组织中的灵魂,没有群众领袖,群众运动就不能很好的开展与坚持下去。群众领袖在群众运动中,

有头等重要的作用。

我们主张：群众有行动，就应该有组织，有组织才能行动，群众行动由一村扩大到一片村（所谓小区），就应该有一片村的群众组织（小区委员会或小区代表会），群众行动扩大到一个区一个县，就应该有一个区一个县的组织（区与县的委员会或代表会）。在群众运动中及时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濮县曾创造了很好的范例。濮县已经由小区到区到县建立了各级佃雇代表会，有些区已经正式建立了农民联合会，产生了大批的地方干部与领袖，这些干部与领袖大部分不脱离生产。自下而上的建立了群众团体的组织后，外来干部就可大批的调出，开展新地区工作。

由下而上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要尊重它的独立性，显示它的领导威力。在八分区，现在为了发扬新的群众领袖的作用，强调提出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在县以下已提出“群众工作交群众团体”的口号。

总之，大胆放手是一种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是始终贯彻着群众路线的，即领导主要靠启发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及靠多数群众自觉的行动的。因此大胆放手执行中，必须有坚强的群众立场，更深入群众进行艰苦耐心的教育组织工作。党的政策是与群众利益更加结合，万不能了解为不需要政策，这是今天应当明确认识的。

站稳脚跟 放下圈子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张霖之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说起来很容易，执行起来很困难。真正能实行了这种领导方法的，工作就搞得好；只在口头上喊，在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工作就搞不好。

这两者的分野说来很简单，但追起根来又很复杂。前者是以群众为前提，自己完全站在群众之中，成为群众之一员，与群众在一起共进共退，在任何情况下不脱离群众。他不站在群众之前太远，也不落在群众之后，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又站在群众之前。他的领导是从群众切身利益与群众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善于凑近群众，善于等待群众，在一道行动中去提高群众。后者是以主观愿望为前提，自己不是站在群众之中，不是群众的一员，而是站在群众之上的“高等人”，或是站在群众之外的局外人。领导不是从群众自己切身利益及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自己首先肯定了一个固定的原则与规律，即一种抽象的“是”做为武器，站在说服教育群众的立场上，要群众来服从自己的“是”，要群众在自己划定的“是”的圈子里行动做事。群众的行动稍不如自己所想象的“是”一样时，就认为群众的行动为“非”、为“落后”。这种圈子圈住了自己，也圈住了群众，也圈住了工作，所以这种圈子就成为我们目前工作中主要的障碍了。

这种圈子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从书本、从上级的指示及别地别人总结的经验中搬运来的，不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政治经验，硬向群众头上扣，硬要群众接受自己所搬来的那一些主观要求与规律；另一种圈子就是根据现在或过去

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当做了天经地义，丝毫不允许改变的，使所有村庄所有的群众按照自己的经验做事，一丝一毫不能错步。

以上两种圈子在我们边区来讲，前者是主要的、普通的，后者则是次要的、个别的。这两种错误的领导方法共同的特点是，只对书本、对死人、对上级的指示、对别人及自己的经验负责，不对当时当地的群众负责。所以自己的耳朵没有听听当时当地的群众呼声，眼睛没有看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更没有从当时当地的群众处境去想办法（即为群众设身处地的想办法）。所以我们就常常主观的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去命令群众，群众则经常的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被播弄，结果我们“主动”恰成了被动，我们所要求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常常与群众的要求、群众要做的事情相抵触。这是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想的办法与群众的具体情况不符合。我们只从一般真理出发，只从抽象的“应该”、“不应该”（如某个顽固分子该斗不该斗，该罚不该罚，而不看群众要斗不要斗，要罚不要罚），群众则是从他们的切身经验、具体情况、目前的处境来判断是非，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常以最高标准、跑步的速度要求群众；群众呢，则以目前的可能一步一步的前进。

由于认识与方法上的错误，常感到群众“落后”，“死狗拖不上墙去”。主观上为着群众利益，为着工作，所以“不得已”采取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工作方法，强迫群众“上墙”，或用一切办法引诱群众入圈。放合作互助贷款，就强迫群众合作互助，不合作不互助就不贷款，结果群众是为着贷款而给我们合作互助。还有群众反对农会长的不民主，要求民选农会长，我们就非要群众查“黑地”（上级给的）不可，否则就不能改选农会长。所以群众为了改选农会长，就答应查“黑地”（查“黑地”是被迫的承认，不是自愿的）。还有群众要反对地主走狗，我们就非要群众查地主的“黑地”，群众不同意，我们就拼着死命去说服，不服不停。总之就是群众不入我们的圈，就不答复群众的要求，不准群众办理自己所要作的事。我们不习惯于从群众目前需要、现有的政治水平出发，在

行动中提高群众，更不善于等待群众（所谓等待不是不领导群众，而是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工作）。因为群众的革命事业是建筑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只有自觉的行动，才能提高群众，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群众运动，群众是不会提高的。这是忘了一般必须与具体相结合。我们不习惯于从小到大（大处着想〔眼〕，小处着手），从低到高（从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造成与群众的隔阂。我们来冷静的研究一下，我们多数的同志都是很好的，真的要为群众谋利益，真的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但由于自己立场与方法上的错误（好多是不自觉的），反而脱离了群众，工作没有搞好。然而这种未从群众切身利益及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要求过急过高而脱离群众的这一点，很难为自己所认识。这就是目前主观主义的圈子很难放下，领导上不易转变，工作不能深入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这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来源何在呢？首先从认识上来讲，我们的干部多是知识分子，缺乏对封建社会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之亲身的体验，因此，也就缺乏一个明确的阶级立场。由于知识分子出身，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即知识能力的来源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知识分子的知识能力多是来自书本上，片面的强调了书本知识与能力，不知道知识与能力是多方面的，是从书本上（即别人的经验），从自己的实践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斗争中所得来的，不了解实践的知识是最真实的知识，实践中所得到的能力，才是最真实的能力。毛泽东同志说：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只是一个“半知识分子”，因为片面的强调了书本知识，自然对自己从书本上所得到的那些知识与能力就自命非凡、得之非易、奇货可居了。反之，那80%以上的文盲农民，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自然是无知识无能力的“愚民”。知识分子忽视了广大的农民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压迫下的生活，就是他们实践的斗争生活，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敏感，有在劣势下应付封建势力的知识与能力，同样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后，他们也会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更懂得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各种策略。这是为我们知识分子干部所不了解

不认识的地方。由于对农民认识不足，认为是文盲“愚民”，那么革命的大事业他们也就“当然”不会了解，更不会领导革命了；“当然”对他们也就不会放手了，他们的话也就没有听的必要了，革命的大事业他们更不能做主了；我们知识分子服从多数文盲的意见是多余了；我们领导上的不民主，不放手，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不服从群众，不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领导不能与群众结合，当然也就没有甚么奇怪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还有一种人，是只靠自己经验做工作，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故步自封，同样是看不起群众的。领导不从群众出发，把自己经验当成了圈子，自然领导也便不能与群众相结合了。

其次，在我们的领导上，好从想象出发，从一种最美妙最圆满的要求出发，对下面的工作总不满意，总觉着下面错误多、成绩少，总以为下面干部都不如自己，怕下级错，不敢放手，在工作上、组织上过为限制，束缚了下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各级不能发挥各级的作用，造成只对上级负责，不敢从实际出发，也是领导不能与群众相结合的一大原因。这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再次，我们的干部生活处境与群众的生活处境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是脱离生产的干部，在生活上一般的来讲是有相当保证的，在今天的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被尊重的人；群众呢，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人（在群众未发动的村庄或发动不充分的村庄），他们在农村里仍旧受封建势力的统治与压迫，他们还没有脱离封建势力的羁绊（政治上、经济上）。由于生活处境的不同，所以我们多是从上面，从有权力的方面看问题，想办法；群众是从下层一个无权力的方面看问题，想办法。也就是我们还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从群众的现实处境看问题，想办法，尤其是没有站在当时当地自己工作周围的群众处境去看问题，想办法，而常是站在一般的抽象的群众之中，脱离了当前的具体群众。这也是领导不能与群众相结合的另一根源。

最后一个根源，就是我们立场不稳。群众观念已喊了好久，似

乎在群众观念上已不成问题。从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才感到树立一个明确的群众观念煞非易事。所谓“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为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耐心的听取并尊重群众的意见”，“相信群众的力量与能力”，“服从群众的多数”，常是抽象的，一旦是实际的碰到群众的困难与痛苦，真的为群众服务时，就变了样子，言行不能一致。自己知道农民受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我们应帮助农民从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但一个村庄没有实行减租增资或减增的不彻底（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以及地主的无故退佃解雇，自己看到听到封建势力的这种违犯行为，并不感觉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另一个村庄的群众为执行与贯彻政府法令，在减租增资或反退佃解雇的斗争中稍微激烈了些，自己就认为“过分”，怕伤害封建阶级的面皮而大惊小怪的骂群众“左”，“太野蛮，太粗鲁，太不懂政策了”，而恶意的去禁止群众的革命行动。于是发动群众变成一个空洞口号。

长期的处于一个对敌伪残酷的斗争中，强调统一对敌，这是对的，但因此而模糊了自己的立场，而抱着一种超阶级的思想，对于群众的革命行动（如减租增佃及反贪污斗争），认为是“破坏社会秩序”、“不安本分”、“乱民暴行”等错误看法，这在我们的长期对敌斗争而从新恢复了的地区发动群众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免的现象。这种现象不纠正，群众就不能发动起来。

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封建势力的关心与体贴都很具体很细致；反之，对在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下的广大群众痛苦之关心与体贴，都很抽象。这种模糊的立场、抽象的群众观念，也就是领导不能与群众相结合的主要根源。只有正确的立场，才有正确的方法，只有完全的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成为群众的一员，才能真正的认识群众是革命的唯一力量，才能看到群众的真实痛苦，体贴到群众的喜怒哀乐心情变化，才能认真的关心群众的痛苦，尊重、相信群众，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真正为群众解放事业而奋斗呀！

我们的脚跟要站的稳，在任何时期都要站在群众的方面，丝毫

不动摇。一切以群众为前提，只要方向对（如减租减息等），群众干，群众在干中一些不可免的错误，应该给以无条件的原谅，耐心的从继续行动中，在提高群众的觉悟性与自愿的原则下纠正错误。我们的领导作用是从群众中找出方向，指出方向，走吗，还是让群众自己去走。事实证明，群众自己会走，而且走的好。

最后再重复的提一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是服从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即一般与具体相结合），服从群众的大多数。服从多数成为制度（自己认为对要服从，自己认为错亦应服从，服从群众是为了团结与提高群众），这就是群众的立场与从群众中来的领导方法。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 (上册)
作者 = 谢忠厚主编
页数 = 501
SS号 = 10380690
DX号 =
出版日期 = 1991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 = 河北人民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录

出版说明

第一部分概述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 谢忠厚周振印

第二部分专题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工人运动简况 方明

冀鲁豫边区妇女运动概况 范世钧

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概况 王克等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文联工作简况 鲁西良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斗争概况 郭乐天白晶五冯培昌

冀鲁豫边区学生运动简况 陈惠敏

第三部分历史文献

鲁西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宣教工作的报告（节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如何进行会门工作王从吾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

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136页】

在鲁西区党委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张霖之

（一九四一年二月）

鲁西妇救总会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决议

（一九四一年三月）

鲁西农救总会九月主任联席会总结报告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

今后边区工运的任务（节选） 高光宇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冀鲁豫各救总会关于开办民运干部学校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

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97页】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青抗先领导关系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冀鲁豫区党委青年运动委员会关于迎接华北青运统

一 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关于边区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

(一九四二年八月)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冀鲁豫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组织大

纲

(一九四二年九月)

边区抗联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九月)

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是怎样坚持的？ 苏振华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问题 杨泽江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减租增佃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元贵

(一九四三年一月)

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节选) 黄敬

(一九四三年四月)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村级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成立民运工作委员

会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节选) 张霖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

(一九四三年)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改善团体领导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
冀鲁豫边区租佃关系的调查与研究郭绍汤
(一九四三年)【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783页】
冀鲁西南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初步调查陶力
(一九四三年)【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769页】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对一九四四年边区青运任务的指示 * 4 6 3 + + (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团体领导关系与组织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
在二地委(原冀鲁豫)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发言 黄敬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减租增佃几个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赎地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
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 万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
站稳脚跟放下圈子 张霖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冀鲁豫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濮县的农民运动及组织领导的经验 黄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 张霖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滑县查减运动简报 纪登奎
(一九四四年)
冀鲁豫分局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
对泰运工作的发言 黄敬
(一九四五年四月)
农民发动起来,要迅速坚决的转入生产运动 高元

贵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在冀鲁豫行署专员联席会上的总结报告(节选)

徐达本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
南旺接敌区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 李哲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为紧急动员起来参战告各救总
会员儿童姊妹团员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 粟森
(一九四五年八月)

在分局党校关于土地政策在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的报
告(节选) 张霖之

(一九四五年)

冀鲁豫分局民运部关于老区和新区发动群众问题的工
作通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减租与生产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新区情况研究 李进宝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清平新解放区(三区)的雇佃运动 张延积
(一九四六年二月)

冀鲁豫区党委、联合会总会召开边区群运座谈会，
确定新区清算诉苦方针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开展深入与普遍的反奸诉苦运动 郭超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对菏泽市当前群运的意见 刘镜西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大胆使用各种积极分子 张承先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

二地委总结群运 张耀华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冀鲁豫行署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鱼台一月来清诉运动总结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

定陶政权干部怎样参加了群运 孔百川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布告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冀鲁豫区的减租增佃概况

(一九四六年)

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潘复生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土改主要经验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冀鲁豫区党委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 张霖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

湖西游击战中的土改运动汇报提纲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在听取四、八地委典型汇报后关于贯彻复查的发言 (节选) 潘复生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复查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五地委民运部长联席会上五个月来土改运动的总结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

四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三个月土改复查运动总结

(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

认识新区特点，大力开辟新区工作 逯昆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布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中央局冀鲁豫工作团关于整党与民主运动向中央局并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一：在五月十五日扩干会议上的工作总结
附二：阳谷县三区赵台纠偏经过
附三：阳谷县三区冀王庄第一阶段工作总结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土改工作总结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报告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建立青年团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与结束土改工作的综合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
冀鲁豫区第一届青代大会关于目前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第四部分回忆资料
忆冀鲁豫中心区的抗战活动 安法乾
关于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和妇女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安法乾范世钧
对清(丰)南(乐)大(名)内(黄)抗日救国会的回忆 谷剑侠马毅之
肥城“红五月”运动
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忆抗战时期范县的民主民生斗争 成润
忆冠县的减租减息与民主民生斗争 司洛路
莘县境内的借粮斗争 中共莘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冀鲁豫边区群运史上的一项创举——试述滑县雇佃

贫运动

中共滑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妇救会工作 季凯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青年运动 张世珠 * 9 4 3

+ + 鲁西北和冀鲁边“民先”总队部始末 徐少岩张汝琦许法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直南地区“民先”组织概况

安法乾李靖轩

活跃在鲁西平原上的济南乡师学生抗日教导队 刘
少岱朱德兴王克宗明

我对冀鲁豫边区青抗先的几点回忆 郭乐天

聊城地区民兵斗争述略 杨明坤 * 9 7 5 + + 关于鄄
北抗日民兵联防的回忆 李勋臣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濮阳县五区党的主要工作 杨敬

仁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大事记 田苏苏王潮
后记